

斯大林选集

上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斯大林选集

上卷



M. G. Arsen.

编辑说明

为了适应广大读者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需要,我们编辑了这部《斯大林选集》。

这部选集包括了斯大林各个时期的重要著作,着重选收了他捍卫和阐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总结和论述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的论著。

选集分为上下两卷,上卷是1901—1927年的著作,下卷是1928—1952年的著作。《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的《结束语》,作为附录载于下卷之末。

收入选集的著作,大部分是全文,只有少数几篇是摘录。所有文章都按写作或发表的时间先后编排。

选集采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斯大林全集》、《列宁主义问题》和《斯大林文选》等书的译文,并对照原文作了一些修改。

每卷正文之后附有注释和人名索引。

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
中共中央 著作编译局

1979年12月

目 录

1901—1927 年

俄国社会民主党及其当前任务	1—15
一	1
二	8
无产者阶级和无产者政党(论党章第一条)	16—24
略论党内意见分歧	25—58
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	59—117
一 民族	61
二 民族运动	69
三 问题的提法	75
四 民族文化自治	82
五 崩得,它的民族主义,它的分离主义	91
六 高加索人,取消派代表会议	102
七 俄国的民族问题	112
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	118—126
一 二月革命和民族问题	118
二 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	120
三 十月革命的世界意义	124
不要忘记东方	127—128
列宁是俄国共产党的组织者和领袖	129—136

目 录

一 列宁是俄国共产党的组织者	130
二 列宁是俄国共产党的领袖	133
在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庆祝弗·伊·列宁五十 寿辰大会上的演说(1920年4月23日)	137—138
十月革命和中间阶层问题	139—143
关于党的任务(在有小组长、争论俱乐部成员和支部 委员会委员参加的俄共(布)红色普列斯尼亚区委员会 扩大会议上的报告)(1923年12月2日)	144—155
争论是党坚强有力的标志	144
争论的原因	145
党内生活的缺点	146
造成缺点的原因	148
怎样消灭党内生活的缺点?	150
关于争论,关于拉法伊尔,关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 的论文和萨普龙诺夫的论文以及关于托洛茨基 的信	156—168
关于争论	156
关于拉法伊尔	158
关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论文	161
关于萨普龙诺夫的论文	163
关于托洛茨基的信	165
悼列宁(1924年1月26日在全苏苏维埃第二次代表 大会上的演说)	169—173
论列宁(1924年1月28日在克里姆林军校学员晚会上 的演说)	174—183
山鹰	174

目 录

谦逊	175
逻辑力量	176
不灰心	177
不骄傲	178
原则性	178
相信群众	180
革命天才	181
论列宁主义基础(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的讲演).....	184—275
一 列宁主义的历史根源	186
二 方法	192
三 理论	199
四 无产阶级专政	214
五 农民问题	225
六 民族问题	236
七 战略和策略	245
八 党	259
九 工作作风	272
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走向十月革命的 道路》一书序言)	276—308
一 十月革命的内外环境	276
二 论十月革命的两个特点,或十月革命和托洛茨基 的“不断”革命论	279
三 关于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准备时期的策略的 几个特点	293
四 十月革命是世界革命的开端和前提	304
关于德国共产党的前途和布尔什维克化(和德国 共产党党员赫尔措格的谈话)	309—314

目 录

庆祝国际妇女节	315—316
致苏联无产阶级大学生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信)	317—320
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工作总结(1925年 5月9日向俄共(布)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所作的报告).....	321—353
一 国际形势	321
二 各资本主义国家内共产党的当前任务	329
三 殖民地和附属国内共产主义者的当前任务	333
四 关于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命运	335
五 党在农村中的政策	345
六 关于金属工业	350
问题和答复(1925年6月9日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的 演说)	354—394
一	354
二	359
三	366
四	371
五	373
六	376
七	378
八	380
九	382
十	390
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	395—458
一 列宁主义的定义	395
二 列宁主义的主要问题	397
三 关于“不断”革命问题	400
四 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402

目 录

五 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党和工人阶级	411	
六 关于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问题	434	
七 为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而奋斗	446	
关于苏联经济状况和党的政策(1926年4月13日给 列宁格勒党组织积极分子作的关于联共(布)中央全 会工作报告)		459—482
一 新经济政策的两个时期	459	
二 工业化方针	461	
三 社会主义积累问题	463	
四 积累的正确使用。节约制度	468	
五 要造就工业建设干部	474	
六 要提高工人阶级的积极性	475	
七 要巩固工农联盟	476	
八 要实行党内民主	478	
九 要维护党的统一	479	
十 结论	480	
论中国革命的前途(1926年11月30日在共产国际 执行委员会中国委员会会议上的演说)		483—495
一 中国革命的性质	483	
二 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干涉	485	
三 中国的革命军队	486	
四 中国未来政权的性质	488	
五 中国的农民问题	490	
六 中国的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领导权	493	
七 中国的青年问题	494	
八 几个结论	495	

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在共产国际

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的报告和结论)	496—609
报告(1926年12月7日)	496
一 几点预先的说明	496
1 党内发展的矛盾	496
2 党内矛盾的根源	501
二 联共(布)党内反对派的特点	503
三 联共(布)党内的意见分歧	509
1 社会主义建设的几个问题	509
2 “喘息”的因素	513
3 革命的“民族”任务和国际任务的一致性和不可 分割性	514
4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历史	516
5 目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特别重要的意义	521
6 关于革命的前途	523
7 实际上问题是怎样的	525
8 关于胜利的机会	527
9 实际政策上的意见分歧	528
四 行动中的反对派	531
五 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为什么称赞反对派	534
六 反对派联盟的失败	537
七 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的实际意义和作用	540
结论(1926年12月13日)	541
一 几点意见	541
1 我们需要的是事实,而不是捏造和诽谤	541
2 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为什么称赞反对派	547
3 错误是有各种各样的	551
4 季诺维也夫所理解的无产阶级专政	554

目 录

5 托洛茨基的巫师箴言	557
6 季诺维也夫象小学生那样引证马克思、恩格斯、 列宁	560
7 季诺维也夫所理解的修正主义	568
二 社会主义在个别资本主义国家内胜利的问题	571
1 帝国主义期个别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提	571
2 季诺维也夫怎样“加工”列宁的话	579
三 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583
1 反对派的“手腕”和列宁党的“民族改良主义”	583
2 我们正在苏联建立并能建成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591
3 我们和世界无产阶级结成联盟来建设社会主义	600
4 蜕化问题	602
四 反对派和党的统一问题	604
五 结论.....	608
和第一个美国工人代表团的谈话(1927年9月9日) (摘录).....	610—616
一 代表团的问题和斯大林同志的回答	610
十月革命的国际性质(为纪念十月革命十周年而作)	617—624
注释	625—661
人名索引	662—686

俄国社会民主党及其当前任务

—

人类的思维只是在经历许多磨难、痛苦和变化之后,才科学地研究和论证了社会主义。西欧社会主义者只是在空想(无法实现的,不能实现的)社会主义荒野上盲目徘徊很久之后,才给自己开辟了道路,才探索和论证了社会生活的规律,从而证明了社会主义对于人类的必然性。从十九世纪初叶起,欧洲产生了许多勇敢的、忘我的、忠诚实干的学者,他们曾力图阐明和解决这个问题:什么东西才能拯救人类,使之摆脱随着商业和工业的发展而日益严重和恶化的宿疾?为了消灭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压迫,在西欧有过多次暴风雨,多次大流血,然而悲愁依旧没有消散,创伤还是那样厉害,痛苦日益不堪忍受。我们应当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空想社会主义没有阐明社会生活的规律,而是脱离生活,好高骛远,其实需要的却是与现实的牢固联系。当实际生活中还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任何基础时,空想主义者就把实现社会主义作为当前的目标,并且依其结果讲来更可悲的是,他们(罗伯特·欧文、路易·勃朗、傅立叶,等等)期待当代有权有势的人来实现社会主义,在他们看来,这些有权有势的人是不难信服社会主义理想的正确性的。这个观点完全忽视了现实的工人运动和工人群众,其实工人群众才是社会主义理想唯一天然的代表者。空想主义者是不能了解

这一点的。他们想用立法和发表宣言的办法来创造人间的幸福,而不要人民(工人)本身的帮助。他们对于工人运动并没有特别注意,甚至往往否认它的意义。因此他们的理论始终是和工人群众不相干的理论,可是在工人群众中间却有一种伟大的思想完全不依赖这些理论而成熟起来,这种思想在十九世纪中叶由天才的卡尔·马克思宣布出来:“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从这些话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一个现在连“瞎子”也看得清楚的真理:要实现社会主义理想,就必须有工人的独立自主的活动,必须使工人不分民族和国家团结成一个有组织的力量。当时必须论证这个真理(这一点由马克思及其朋友恩格斯光辉地完成了)以便为强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奠定牢固的基础,这个政党今天好似一个难逃的劫运笼罩着欧洲资产阶级制度,威胁着这个制度,要消灭它,要在它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

社会主义思想在俄国发展的途径差不多也和在西欧一样。在俄国,社会主义者也是盲目徘徊很久之后,才达到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即科学的社会主义。在这里也有过社会主义者,也有过工人运动,可是两者互不相干,各行其是:社会主义者走向无法实现的空想(“土地和自由”社¹、“民意党”²),而工人运动则走向自发的骚动。两者在同一时期(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活动,可是互不相识。社会主义者在劳动人民中间没有基础,因而他们的活动是脱离实际的,没有根基的。工人则没有领导者,没有组织者,因而他们的运动流为混乱的骚动。这就是社会主义者争取社会主义的英勇斗争没有结果和他们非凡的勇敢精神在专制制度的坚壁上碰得粉碎

的主要原因。俄国社会主义者直到九十年代初才和工人群众接近起来。当时他们看到,只有工人阶级才是救星,只有这个阶级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俄国社会民主党随即把自己的努力和注意力全部集中到当时俄国工人中间所发生的运动上面。觉悟还不高的和对斗争还没有准备的俄国工人,力求逐渐摆脱自己的绝望境地,总设法改善自己的命运。自然,当时在这个运动中有条理的组织工作是没有的,运动是自发的。

社会民主党就在这样的情况下着手领导这个不自觉的、自发的和无组织的运动。它竭力提高工人的觉悟,竭力把成批的工人各自反对其业主的互不配合的分散的斗争统一起来,融合成总的阶级斗争,使这个斗争成为俄国工人阶级反对俄国压迫者阶级的斗争,并竭力使这个斗争具有组织性。

最初一个时期,社会民主党不能在工人群众中广泛开展自己的活动,因而只安于宣传鼓动小组的工作。当时社会民主党的唯一工作方式就是小组活动。这些小组的目的是要从工人中间造就出一批将来能领导运动的人才。因此这些小组是由先进工人组成的,也只有优秀的工人才有机会在这些小组里学习。

但是,小组活动时期很快就过去了。社会民主党不久便觉得必须走出狭隘的小组圈子,把自己的影响扩大到广大工人群众中去。外部的条件也促进了这一点。这时工人中间的自发运动特别高涨。你们谁不记得几乎整个梯弗利斯都被这种自发运动所席卷的那一年呢?各烟草工厂和铁路工厂中无组织的罢工接二连三地发生了。这种情况在我们这里发生在1897—1898年,在俄罗斯则稍微早一些。当时必须及时给以帮助,而社会民主党也就赶紧去帮助了。要求缩短工作日、废除罚款、提高工资等等的斗争开始了。社会民主党清清楚楚地知道,工人运动的发展不能局限于这些琐碎的要求,

这些要求并不是运动的目的,而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尽管这些要求是琐碎的,尽管各个城市和地区的工人今天还是各自分散地进行斗争,但这个斗争本身将教会工人,使他们认识到只有整个工人阶级结成统一的、强大的、有组织的力量去冲击他们的敌人时,才能得到完全的胜利。这个斗争也将向工人表明,他们除了自己的直接敌人资本家而外,还有另一个更警觉的敌人,这就是整个资产阶级有组织的力量,即拥有军队、法庭、警察、监狱和宪兵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既然西欧的工人要改善自己生活状况的任何最小尝试都会碰到资产阶级政权的压制,既然在已经争得人权的西欧,工人也得与政府当局进行直接的斗争,那么俄国工人自己的运动中就一定更会和专制政权发生冲突,这个政权之所以是任何工人运动的警觉的敌人,不仅因为它保卫资本家,而且因为它既是专制政权,就不能容忍各个社会阶级的独立自主活动,特别是不能容忍比其他阶级更受压迫更受践踏的工人阶级的独立自主活动。俄国社会民主党就是这样理解运动的进程,并尽全力在工人中间传播这些思想的。它的力量就在于此,它一开始便有伟大的和胜利的发展,其原因就在于此。1896年彼得堡各纺织工厂工人的大罢工就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最初一些胜利竟使某些不坚强的人失去了理智,冲昏了头脑。从前空想社会主义者只注意到最终目的,并为这个目的所眩惑而完全忽视或者否认在他们眼前展开的现实的工人运动;而某些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则恰好相反,他们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只放在自发的工人运动及其日常需要方面。当时(五年以前)俄国工人的阶级觉悟是很低的。俄国工人还刚刚从百年大梦中觉醒过来,他们的眼睛习惯于黑暗,当然看不到第一次呈现在他们面前的世界里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当时他们没有什么大的需要,他们的要求也

不高。俄国工人还只是要求稍微增加工资或缩短工作时间而已。至于必须改变现存制度、必须消灭私有制、必须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对于这一切，俄国工人群众是一点概念也没有的。他们也不大敢想到结束全俄人民在专制政权下所过的苟延残喘的奴隶生活，不大敢想到人民的自由和人民参加管理国家的问题。就在这个时候，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一部分人认为自己的职责是把自己的社会主义思想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另一部分人却醉心于经济斗争，醉心于局部地改善工人状况的斗争（例如缩短工作时间和提高工资），甘愿把自己的伟大职责、自己的伟大理想完全忘掉。

这后一部分人也象他们西欧的同道者（所谓伯恩施坦派）一样地说：“对我们来说，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³ 工人阶级究竟为了什么进行斗争，他们根本不去过问，只要有斗争就行了。于是所谓舍本逐末的政策就盛行起来了。结果有一天彼得堡《工人思想报》⁴ 竟然宣称：“我们的政治纲领就是实行十小时工作制，恢复六月二日法令⁵ 所废除的节日。”（!!!）

这部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不去领导自发运动，不把社会主义的理想灌输到群众中去，不把群众引向我们的最终目的，反而成了运动本身的盲目工具；他们盲目地跟着一部分不够开展的工人走，只限于表达当时工人群众所意识到的那些需要和要求。一句话，他们是站在那里敲着敞开的大门，不敢走进屋子里面去。他们没有能力向工人群众说明最终目的是社会主义，甚至没有能力向工人群众说明当前的目标是推翻专制制度，更可悲的是他们认为这一切是无益的，甚至是有害的。他们把俄国工人看成了小孩子，

必须指出，最近彼得堡“斗争协会”及其报纸编辑部已抛弃了自己原先那个纯经济的方针，竭力把政治斗争的思想贯彻到自己的行动中去。

唯恐这种大胆的思想吓坏了俄国工人。不仅如此,依照社会民主党某些人的看法,实现社会主义并不需要任何革命斗争,所需要的只是经济斗争,只要有罢工和工会、消费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社会主义就算成功了。他们认为老的国际社会民主党人的学说是错误的,因为这些人说,当政权尚未转入无产阶级手中(即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前,改变现存制度是不可能的,工人的彻底解放也是不可能的。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其实它和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也没有区别。譬如,据他们说,把社会主义纳入现存制度并不困难,每一个工会,甚至每一个消费合作社零售处或生产合作社,都已经是“社会主义的一部分”了。他们就想用这种补缀旧衣的荒唐办法来给受苦受难的人类缝制新衣!但最令人痛心而且为革命者所无法理解的一件事情,就是这部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把他们西欧的老师(伯恩施坦及其同伙)的学说发展到这样的地步,居然恬不知耻地宣称:政治自由(即罢工、结社、言论等等自由)和沙皇制度是可以相容的,因而特别的政治斗争,即推翻专制制度的斗争,完全是多余的,因为单是经济斗争就足以达到目的,只要不顾政府禁令,更频繁地举行罢工,政府就会疲于惩治罢工者,罢工和集会的自由也就自然而然地到来。

可见这些假“社会民主党人”要想证明的是,俄国工人只应当把自己的全部力量和精力用在经济斗争上,而不应当追求各种“远大的理想”。在实践上他们的行动表明了,他们认为自己的天职仅仅是在某个城市里进行地方工作。他们对于组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丝毫不感兴趣,反而认为组织政党是一种滑稽可笑的儿戏,会妨碍他们履行自己的直接“天职”——进行经济斗争。罢工、再罢工和为战斗基金募集几文钱,——这就是他们的全部工作。

你们一定会以为,他们既然这样缩小了自己的任务,既然抛弃

了社会民主主义,那么这些自发“运动”的崇拜者至少可以给这个运动做出许多成绩来。然而就在这点上我们也被欺骗了。彼得堡运动的历史使我们确信这一点。起初,在1895—1897年间,运动有过辉煌的发展和勇敢的迈进,以后就变为盲目的徘徊,最后竟至停滞不前。这是毫不足怪的,因为“经济派”为了进行经济斗争而建立坚固组织的全部努力,必然会碰到政府当局的坚壁,而且总是碰得粉碎。警察的残酷迫害使得任何经济组织都无法存在。罢工也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因为一百次罢工总有九十九次被警察的高压手段所扼杀,工人们被无情地赶出彼得堡,牢狱的墙壁和西伯利亚的严寒残忍地消磨着他们的革命精力。我们深信,运动之所以会这样停滞(当然是相对的停滞),不能只归咎于外部的条件,即警察的迫害,也要归咎于思想本身,即阶级意识发展方面的停滞,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工人革命精力的减弱。

由于俄国工人在进行斗争时所打的旗帜仍然是一块写着争取一戈比的经济斗争口号的陈旧褪色的破布,他们就不能随着运动的发展深刻地了解斗争的崇高目的和内容,所以工人们也就不免以较少的精力、较小的兴趣、较低的革命热情来参加这个斗争,因为伟大的精力只是为了伟大的目的而产生的。

而且,要不是我国实际生活条件日益有力地推动俄国工人去进行直接的政治斗争,上述情况对运动造成的危害是会更大的。当时,哪怕一次小小的普通罢工,也向工人正面提出我们在政治上毫无权利这个问题,使他们与政权和武装力量发生冲突,并且清清楚楚地证明单靠经济斗争是不够的。所以和这些“社会民主党人”的愿望相违背,斗争一天比一天更具有明显的政治性质。觉醒了俄国工人对于今天压得他们呻吟叫苦的经济和政治现状公开表示不满的每一尝试,他们想摆脱压迫的每一尝试,都能推动工人举行经

济斗争色彩日益减少的游行。俄国的五一节为政治斗争和政治游行示威开辟了道路。于是俄国工人在自己原来的唯一斗争手段——罢工以外,又增添了一种新的强有力的手段,即1900年规模巨大的哈尔科夫五一游行时第一次试用过的政治游行示威。

这样,俄国工人运动由于自己内部的发展,便从小组宣传和利用罢工进行经济斗争逐渐转上政治斗争和政治鼓动的道路了。

当工人阶级看见俄国其他社会阶级的人抱着争取政治自由的坚定决心登上斗争舞台时,这个转变就显著地加速了。

二

在沙皇制度压迫下呻吟叫苦的不仅仅是工人阶级。专制制度沉重的魔掌也窒息着其他的社会阶级。呻吟叫苦的有因经常挨饿而浮肿的俄国农民,他们被苛捐杂税的重担弄得贫困不堪,他们受商人、资产者和“高贵的”地主任意宰割。呻吟叫苦的有小市民,国家机关和私人机构的小职员,小官吏,总之,就是人数众多的城市平民,他们的生活也和工人阶级的生活一样没有保障,他们有理由不满意自己的社会地位。呻吟叫苦的有不能容忍沙皇鞭笞政策的一部分小资产阶级乃至中等资产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中受过教育的人,即所谓自由职业者(教员、医生、律师、大学生和一般学生)。呻吟叫苦的有俄国境内被压迫的各民族和异教徒,其中包括那些被逐出乡土而其神圣情感蒙受伤害的波兰人和芬兰人,历史赋予他们的权利和自由都被专制制度蛮横地践踏了。呻吟叫苦的有经常受迫害受侮辱的犹太人,他们甚至被剥夺了其他俄国臣民所享有的微不足道的权利,即随处居住的权利、就学的权利、供职

的权利等等。呻吟叫苦的有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以及其他民族,他们被剥夺了开办本族学校的权利、在国家机关中工作的权利,他们不得不服从专制政权所疯狂推行的可耻的、压迫少数民族的俄罗斯化政策。呻吟叫苦的有俄国千百万教派信徒,他们不愿依照东正教神父的意旨而想本着自己的良心来信奉宗教。呻吟叫苦的还有……但一切受俄国专制制度压迫摧残的人是举不胜举的。他们的人数是如此之多,要是他们都懂得这一点并且知道谁是他们的共同敌人,那么俄国的专制政权是一天也不能存在的。可惜俄国农民还处于数百年来由奴役、贫穷和无知所造成的闭塞状态,他们现在还刚刚在觉醒,还不知道谁是他们的敌人。俄国各被压迫民族,在不仅有俄国政府反对他们,甚至还有俄罗斯人民由于尚未认识专制制度是全国人民的公敌而同样也反对他们的时候,他们简直不敢想象可以用自己的力量解放自己。剩下的就是工人阶级、城市平民和资产阶级中受过教育的人。

但是,一切国家和一切民族的资产阶级都极善于攫取并非由自己的胜利所得来的果实,都极善于假他人之手火中取栗。他们从来也不愿意在与强敌斗争中,在暂时还不大容易获得胜利的斗争中,拿自己的较有特权的地位去冒险。尽管他们不满意,但他们毕竟生活得不坏,因此他们乐意把受哥萨克鞭打、被士兵枪杀、在街垒中搏斗等等权利让给工人阶级和一般平民。他们自己只是“同情”斗争,至多也不过是对残暴的敌人那种镇压人民运动的残酷行为表示(在心里)“愤慨”罢了。他们是害怕革命行动的,只有在斗争的最后几分钟,当看清敌人没有力量的时候,他们自己才转而采取革命的办法。这一点是历史经验教给我们的……只有在斗争中除了自己的锁链而外别无可失的工人阶级和一般平民才是真正的革命力量。尽管俄国的经验还很贫乏,却也证明了一切革命运动的

历史所教给我们的这个人人皆知的道理。

特权阶层中,只有一部分大学生表明决心要为实现自己的要求斗争到底。但是我们不应忘记,这部分大学生也是那些受压迫的公民的子弟,并且大学生都是在校的青年,当他们还没有投身于人生大海,还没有在那里占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时候,他们比任何人都热心地追求那号召他们为自由而斗争的理想。

不管怎样,现在大学生几乎是以首领、以先进部队的姿态出现于“社会人士”的运动中。社会各阶级中不满意的人,今天都聚集在他们周围。起初,大学生试图使用从工人那里模仿来的罢工手段进行斗争。可是,在政府对他们的罢课报之以野蛮的法令(《暂行条例》⁶),规定把参加罢课的大学生征去当兵的时候,大学生就只剩下了一种斗争手段,即向俄国社会求援,并由罢课转向街头游行示威。大学生也就是这样做的。他们没有放下武器,反而斗争得更英勇更坚决了。被压迫的公民聚集在他们周围,工人阶级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于是运动就变成了威胁政权的强大运动。俄国政府使用大批军警和宪兵来对不驯顺的公民进行残酷而毫无结果的斗争已经有两年之久了。

最近几天的事件显示,政治游行示威是不会失败的。12月初在哈尔科夫、莫斯科、下新城、里加等等城市发生的事件表明,目前公众的不满已经是有意地表现出来了,这些不满的公众已有决心从沉默的抗议转向革命的行动了。然而大学生所提出的要求,即学习自由和大学内部生活的自由,对于广阔的社会运动来说是太狭隘了。要把所有参加这个运动的人联合起来,就需要一面旗帜,一面为大家所了解而感到亲切的、能体现一切要求的旗帜。这样的旗帜就是推翻专制制度。只有摧毁专制制度,才能建立起依靠人民参加国家管理并保障学习、罢工、言论、宗教、民族及其他等等自由

的社会制度。只有这样的制度才能给人民以自卫手段,使他们不受各种压迫者、商人、资本家、僧侣、贵族的迫害;只有这样的制度才能开辟出一条自由的道路,使人们走向美好的未来,并能自由地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而奋斗。

当然,大学生只凭自己的力量是不能进行这个巨大的斗争的,他们软弱无力的手臂擎不住这面沉重的旗帜。要擎得住这面旗帜,就需要更强有力的手臂,而在当前的条件下,只有工人群众联合的力量才是这样的力量。因此俄国工人阶级必须把全国旗帜从大学生软弱的手中接过来,在上面写上“打倒专制制度!民主宪法万岁!”去引导俄国人民走向自由。对于大学生呢,我们应当感谢他们给我们上了这一课:他们让人看到了政治游行示威在革命斗争中具有何等重大的意义。

街头游行示威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为它可以很快地把大批的居民吸引到运动中来,使他们立刻知道我们的要求,并且造成广阔的肥沃土壤,使我们能够大胆撒播社会主义思想和政治自由的种子。街头游行示威可以造成街头鼓动,使社会上一部分落后的怯懦的人不能不受到它的影响。在游行示威的时候,任何人只要走到街上,就能看见勇敢的战士,就能明白他们是为了什么而斗争,就能听到号召大家起来斗争的自由演说,就能听到揭露现存制度和暴露我国社会疮痍的战斗歌曲。因此,政府当局最害怕街头游行示威。所以它恐吓大家:不但要严惩示威者,而且要严惩“好奇者”。在人民的这种好奇心中间,隐藏着对政府当局的主要危险:今天的

秘密的书籍和鼓动传单,在俄国目前条件下,很难传到每个居民手中。虽然散发秘密书刊收效很大,但在大多数场合下这些书刊只能散发到一小部分居民中间。

一个“好奇者”，明天就会作为一个示威者把一批批新的“好奇者”集合到自己的周围。而这样的“好奇者”今天在每个大城市里都是数以万计的。今天俄国居民再也不象过去那样，一听到什么地方发生骚动就躲藏起来（从前他们总是说：“说不定就会出乱子，可别把我也牵连进去，还是走开为妙。”），今天他们却赶忙到发生骚动的地方去，“好奇地打听”：究竟这种骚动是为什么发生的，这样多的人究竟为了什么要去挨哥萨克的鞭打。

在这种条件下，“好奇者”再不会漠不关心地听着皮鞭和马刀的挥舞声了。“好奇者”看到，示威者集合在街头是为了诉说自己的愿望和要求，而政府当局却用毒打和残酷镇压来回答他们。“好奇者”不惟不逃避皮鞭的挥舞声，反而要挤上前去，可是皮鞭再也分辨不出：究竟哪里是普通的“好奇者”，哪里是“暴徒”。这时皮鞭遵照着“完全民主平等”的原则，不分性别、年龄甚至阶层地位而任意乱打这两类人的脊背。皮鞭就这样帮我们的大忙，加速“好奇者”的革命化。皮鞭就从震慑人们的武器变成唤醒人们的武器。

因此，尽管街头游行示威还不能给我们带来直接的效果，尽管示威者的力量今天还很薄弱，不足以迫使政府立刻对人民的要求让步，可是今天我们在街头游行示威中所蒙受的牺牲，将来会换得百倍的补偿。在斗争中牺牲的或我们阵营中被抓去的每一个战士，都会唤起成百成千的新战士。暂时我们在街头还不止一次要挨打，政府在街头搏斗中也还不止一次要成为胜利者。但这将是“皮洛士式的胜利”⁷。再来几次这样的胜利，专制制度的失败就必不可免了。专制制度以今天的胜利给自己准备未来的失败。我们坚信这一天一定会到来，这一天已为时不远，我们要冒着皮鞭的毒打去播下政治鼓动和社会主义的种子。

政府也不亚于我们，它深知街头鼓动对于它是死刑的判决；只

要再过两三年,人民革命的幽灵就会出现在它的面前。前几天,政府通过叶卡特林诺斯拉夫省省长宣布:它“甚至不惜采取极端手段来消灭街头游行示威的最小尝试”。显然,这个声明带着子弹气味,可能还带着炮弹气味,但我们认为子弹是一种比皮鞭更能激起人们不满情绪的工具。我们并不认为,政府采取这种“极端手段”就能长期制止政治鼓动,从而阻碍它的开展。我们希望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也能使自己的鼓动工作适应因政府采取这种“极端手段”而造成的新情况。无论如何,社会民主党应当警惕地注视事变,应当迅速利用这些事变的教训,并且善于使自己的行动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况。

但是,为了这一点,社会民主党就必须有一个强大而紧密团结的组织,即党的组织,它将不仅按名称来说是团结的,而且按自己的基本原则和策略观点来说也是团结的。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建立这样一个以坚定的原则和不可摧毁的秘密活动武装起来的强大政党。

社会民主党应当利用已经开始的新的街头运动,应当把俄国民主主义的旗帜拿到自己手里并把俄国民主主义引向大家所盼望的胜利!

这样,在我们面前就开始了以政治斗争为主的时期。这种斗争对于我们是不可能的,因为在现存的政治条件下,经济斗争(罢工)是不能得到什么重大结果的。罢工在自由国家里也是一种有利也有害的武器:甚至在那里,工人虽然有各种斗争手段,即政治自由、坚强的工会组织和充足的基金会,但罢工往往还是以工人的失败而告终。至于我们这里,罢工却是一种要遭受逮捕和武力镇压的罪行,任何工会组织都要受禁止,因此我们这里的罢工只有抗议的作用了。可是就抗议而言,游行示威却是更有力的武器。在罢

工期间,工人的力量是分散的,参加罢工的只有一个厂或几个厂的工人,至多只有某一种行业的工人,举行总罢工甚至在西欧也是非常困难的,而我们这里则完全不可能,但是在街头游行示威中,工人却能立刻把自己的力量联合起来。

由此可见,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对于问题的看法是多么狭隘,他们竟想把工人运动局限在经济斗争和各种经济组织的范围里,把政治斗争让给“知识界”、大学生和社会人士去进行,而只让工人充当配角。历史教导我们,在这样的条件下,工人就只好为资产阶级火中取栗。在反对专制政权的斗争中,资产阶级常常乐于利用工人壮健的手臂,但当胜利已经取得时,他们就把胜利的果实据为己有,使工人一无所得。如果我们这里的情形也是如此,那么工人从这个斗争中是什么也得不到的。至于大学生和社会人士中的其他抗议者,其实他们也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只要给他们一个能赋予人民些微权利的无伤大体的“残缺不全的宪法”,就足以使这些抗议者唱起另一种调子来颂扬“新”制度了。资产阶级时时刻刻惧怕共产主义的“赤色幽灵”,在一切革命中他们总是当事情刚刚开始时就力图把它结束。被工人吓坏了的资产阶级只要得到一点点于自己有利的让步,就向政府伸出调和的手,无耻地出卖自由事业。

只有工人阶级才是真正民主主义可靠的砥柱。只有工人阶级才不会由于获得某种让步而和专制制度妥协,才不会因为人家弹奏宪政琵琶、唱起甜蜜调子便麻痹起来。

因此,工人阶级是能够站在整个民主主义运动的前头,还是作

当然,在这里我们不是指那些已经背弃了自己的阶级而参加到社会民主党队伍中作斗争的知识分子。但这样的知识分子只是例外,他们是“白色的乌鸦”。

为“知识界”即资产阶级的配角去做运动的尾巴,这对于俄国民主主义事业是有非常重大意义的。在前一场合下,由于推翻专制制度,就会有一个广泛的民主宪法,这个宪法给工人、受压迫的农民和资本家以平等权利。在后一场合下,我们就只会得到一个“残缺不全的宪法”,这个宪法在践踏工人的要求、只给人民一种自由的幻影方面,将不亚于专制制度。

但是,为了能起领导作用,工人阶级就必须组织成一个独立的政党。那时工人阶级在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就不会害怕自己的暂时同盟者“社会人士”的任何叛变和出卖行为了。当这些“社会人士”一旦背叛了民主主义事业时,工人阶级就会用自己的力量引导这个事业前进;而这个独立的政党将给工人阶级以担当这种事业所必需的力量。

载于 1901 年 11—12 月

《斗争报》第 2—3 号

本文没有署名

原文是格鲁吉亚文

选自《斯大林全集》第 1 卷

第 9—25 页

无产者阶级和无产者政党

(论党章第一条)

大胆宣布“俄国是统一而不可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连小孩子也知道“统一而不可分的”俄国并不存在,它早就分成两个对立的阶级,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现在谁都晓得这两个阶级间的斗争已变成我国现代生活所赖以旋转的轴心。

然而,在此以前这一点是难于看出的,其原因是由于当时只有个别集团在个别城市和个别角落里进行斗争,因此我们只看见斗争舞台上的个别集团,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作为两个阶级,当时还看不出来,也难以看出来。可是后来各个城市和各个区域联合起来了,无产阶级各个集团携起手来了,总罢工和示威运动爆发了,——于是在我们面前就呈现出两个俄国即资产阶级俄国和无产阶级俄国互相斗争的一幅壮丽的图画。在斗争舞台上出现了两支大军即无产者大军和资产者大军,这两支大军间的斗争已波及我国整个的社会生活。

既然军队没有领导者就不能行动,既然每支军队都有自己领路的先头部队,那么就很明显,和这两支大军一起行动的还应有各自的领导集团,即通常所说的政党。

于是出现了如下的情景:一边是自由主义政党率领的资产者大军,另一边是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率领的无产者大军,每支大军都

在自己的政党领导下进行阶级斗争。

我们之所以提到这点,是为了把无产者政党和无产者阶级作个比较,从而简略地阐明无产者政党的一般面貌。

上述一切已经足以说明:无产者政党作为一个战斗的领导集团,第一,按成员数量来说,它应当比无产者阶级小得多;第二,按觉悟程度和经验来说,它应当比无产者阶级更高些;第三,它应当是一个团结一致的组织。

在我们看来,上述一切是用不着证明的,因为很明显,只要有必然使人民大众贫困落后的资本主义制度存在,整个无产阶级就不能提高到应有的觉悟程度,所以必须有一个觉悟的领导者集团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无产者大军,把这支大军联合起来,并在斗争中领导他们。同样很明显,一个以领导战斗的无产阶级为目的的政党,就不应当是单个人的偶然凑合,而应当是团结一致的集中的组织,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按照统一的计划指导党的工作。

简略说来,我们党的一般面貌就是如此。

先记住这一点,再来谈我们的主要问题:我们究竟能把什么人称为党员呢?本文所论的党章第一条就是讲这个问题的。

那么,我们就来研究这个问题吧。

我们究竟能把什么人称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员呢?换句话说,党员的义务是什么呢?

我们党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党。这就是说,我们党有自己的纲领(运动的最近目的和最终目的),有自己的策略(斗争方式)和自己的组织原则(结合形式)。纲领观点、策略观点和组织观点的一致是

我们完全没有讲到俄国其他各政党,因为要来阐明我们所分析的问题,根本没有讲到这些政党的必要。

我们党赖以建立的基础。只有这些观点的一致才能把党员结成一个集中的党。如果观点的一致被破坏了,党也就要瓦解的。所以只有完全接受党的纲领、策略和组织原则的人才能称为党员,只有足够理解和完全接受我们党的纲领、策略和组织观点的人才能参加我们党的队伍,同时也就是参加无产者大军的领导者队伍。

可是,就一个党员说来,是不是只接受党的纲领、策略和组织观点就够了呢?能不能把这样的人称为无产者大军的真正领导者呢?当然不能!第一,大家知道,世界上有不少的空谈家很乐意“接受”党的纲领、策略和组织观点,可是除了讲空话以外,什么也不能做。如果把这种空谈家称为党员(即称为无产者大军的领导者),那就会亵渎党的神圣尊严!况且我们党又不是一个哲学学派或宗教教派。难道我们党不是一个斗争的党吗?既然我们党是一个斗争的党,它就不能满足于抽象地接受它的纲领、策略和组织观点,它就一定要求自己的党员实现他所接受的观点,这难道不明白吗?这就是说,谁要想成为我们党的党员,谁就不能满足于接受我们党的纲领、策略和组织观点,而应该实行这些观点,实现这些观点。

但是,就一个党员说来,实现党的观点是什么意思呢?他什么时候才能实现这种观点呢?只有当他进行斗争的时候,当他和全党一起走在无产阶级大军前头的时候。能不能单独地、分散地进行斗争呢?当然不能!相反地,人们首先要联合起来,组织起来,然后再投入战斗。否则任何斗争都是不会有结果的。很明显,只有当党员结成一个团结一致的组织时,他们才能进行斗争,因而才能实现党的观点。同样很明显,党员愈能紧密地结成一个团结一致的组织,就愈能更好地进行斗争,因而也就愈能更完满地实现党的纲领、策略和组织观点。有些人说得对,我们党是领导者的组织,而不是单个人的凑合。既然我们党是领导者的组织,那么很明显,只有在这

个组织中工作、认为自己的义务是把个人愿望同党的愿望融为一体并和党一起行动的人,才能算作这个党的一员,算作这个组织的一员。

这就是说,要做一个党员,就必须实现党的纲领、策略和组织观点;要实现党的观点,就必须为这种观点而斗争;要为这种观点而斗争,就必须在党的组织中工作并和党一起工作。显然,要做一个党员,就必须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只有当我们参加了党的一个组织、因而把我们个人的利益和党的利益融为一体的时候,我们才能成为党员,成为无产者大军的真正领导者。

既然我们党不是一些空谈家单个人的凑合,而是通过中央委员会来很好地引导无产者大军前进的领导者的组织,那么上述一切也就不言而喻了。

还要指出一点。

以前我们党很象一个好客的父权制的家庭,愿意把一切同情者都接纳进来。可是我们党在成了一个集中的组织以后,也就抛掉了那副父权制的面貌,完全变为一座只对够资格的人敞开大门的堡垒了。这对于我们是有重大意义的。正当专制政府竭力用“工联主义”、民族主义和教权主义⁸等等来腐蚀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的时候,同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又在竭力摧残无产阶级的政治独立性、竭力想控制无产阶级的的时候,我们应当非常警惕,决不应忘记

正如任何复杂的有机体都是由无数最简单的有机体组成的一样,我们党作为一个复杂的总的组织,也是由许多区域的组织即地方组织所组成的,这些组织一经党代表大会或中央委员会批准,便可称为党的组织。由此可见,并不只是委员会才称为党的组织。中央委员会的成立是为了指导这些组织使它们按照统一计划来工作,这些地方党组织通过中央委员会而组成一个巨大的集中的组织。

我们党是一座只对经过考验的人敞开大门的堡垒。

我们已经阐明了做党员的两个必要条件(接受党纲和在党组织中工作)。如果再加上一个条件,即党员必须给党以物质上的帮助,那么有权取得党员称号的一切条件就完全具备了。

这就是说,只有接受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纲、给党以物质上的帮助并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的人,才能称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

列宁同志所提出的党章第一条的条文就是这样。

可见这个条文完全是从我们党是集中的组织而不是单个人的凑合这一观点产生的。

这个条文的最大优点就在这里。

然而,竟有一些同志把列宁的条文当做“狭隘的”和“不妥当的”条文而加以摈斥,并提出了想必是既不“狭隘”又非“不妥当的”条文。我们说的是马尔托夫的条文,现在我们来分析这个条文。

依据马尔托夫的条文说来,“凡是接受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且在党的一个组织领导下经常亲自协助党的,都可以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可见这个条文中略去了做党员所必要的第三个条件,即党员必须参加党的一个组织。马尔托夫竟认为这个明确而必要的条件是多余的,并在自己的条文内加进了“在党的一个组织领导下……亲自协助党”这样一个含糊的语句来代替这个条件。这样说来,不参加党的任何一个组织(这象什么“党”呵!),不认为自己应该服从党的意志(这象什么“党的纪律”呵!)也可以成为一个党员!试问,党对于那些不参加党的任何一个组织、因而不认为自己应该绝对服从党的纪律的人,又怎能“经常地”加以领导呢?

列宁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中杰出的理论家和实践家。

马尔托夫是《火星报》⁹编辑之一。

马尔托夫提出的党章第一条的条文就在这个问题上碰得粉碎了,而这个问题在列宁的条文中却解决得很巧妙,因为列宁的条文肯定地认为参加党的一个组织是做党员所必要的第三个条件。

这样,我们只有把马尔托夫条文中“在党的一个组织领导下……亲自协助党”这个含糊而毫无意义的语句丢掉。如果丢掉这个条件,马尔托夫的条文中就只剩下两个条件(接受党纲和给予物质上的帮助),这两个条件本身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因为任何一个空谈家都可以“接受”党纲并给党以物质上的帮助,但这决不能使他享有做党员的权利。

看吧,这就是所谓“妥当的”条文!

我们说:真正的党员决不应该满足于只接受党纲,他们必须努力实现自己所接受的纲领。马尔托夫回答说:你们太严格了,因为就一个党员说来,如果他不拒绝给党以物质上的帮助等等,那么实现他所接受的纲领就不那么需要了。马尔托夫好象怜悯某些“社会民主主义者”空谈家似的,不愿意对他们关上党的大门。

其次,我们说,因为要实现党的纲领,就必须进行斗争,而要进行斗争,就必须团结起来,所以愿意做党员的人必须加入党的一个组织,必须把个人愿望同党的愿望融为一体,必须和党一起去领导战斗的无产者大军,就是必须组成集中的政党的严整部队。马尔托夫回答说:不一定非要党员组成严整的部队,结成组织不可,各人单独进行斗争也可以。

我们要问:那么我们党究竟是什么呢?是单个人的偶然凑合呢,还是团结一致的领导者的组织?如果说它是领导者的组织,那么能不能把不参加这个组织、因而不认为自己必须服从其纪律的人算作这个组织的一员呢?马尔托夫回答说:党并不是一个组织,或者确切些说,党是一个无组织的组织(请看,这是什么“集中制”

呀!)!

可见照马尔托夫看来,我们党不是一个集中的组织,而是由一些接受我们的党纲等等的地方组织和单个的“社会民主主义”分子凑合起来的。但是,如果我们党不是一个集中的组织,它也就不会是一座只对经过考验的人敞开大门的堡垒。的确,在马尔托夫看来,也正如他的条文所表明的那样,党并不是一座堡垒,而是一切同情者都可以自由参加的宴会。一个人只要有一点知识,只要表示一点同情,只要给一点物质上的帮助,那就成了,他就有充分权利算作一个党员了。马尔托夫给那些吓慌了的“党员”打气说:有些人认为党员必须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因而必须使个人愿望服从党的愿望,别听他们的话!第一,同意这些条件是很难的,因为使个人愿望服从党的愿望并不是好玩的呀!第二,我已经在自己的说明中指出过,这些人的意见是错误的。好吧,先生们,请光临……宴会吧!

马尔托夫好像是怜悯某些没有决心使个人愿望服从党的愿望的教授和中学生,于是他在我们党的堡垒上凿了一个洞,让这些可敬的先生有机会偷偷地钻进我们党内来。他向机会主义大开方便之门,而且是在成千上万的敌人压制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时大开方便之门呢!

然而,还不止于此。问题在于马尔托夫那个成问题的条文使机会主义有可能在我们党内从另一方面产生出来。

我们知道,马尔托夫的条文只说到接受纲领,关于策略和组织却只字未提,其实为了保证党内的一致,不仅要有纲领观点的一致,同样还要有组织观点和策略观点的一致。有人会对我们说,列宁同志的条文也没有讲到这一点。不错!但是要知道,列宁同志的条文是没有必要讲到这一点的!一个人既在党的一个组织中工作,就必然和党在一起进行斗争,服从党的纪律,所以他除了遵循党的

策略和党的组织原则而外,不能遵循其他的策略和其他的组织原则,难道这还不明白吗?然而对于一个只接受党纲而不参加党的任何组织的“党员”,你有什么可说呢?怎能担保这个“党员”所持的策略和组织观点就是党的策略和组织观点,而不是别的策略和组织观点呢!这就是马尔托夫的条文无法向我们说明的问题!接受了马尔托夫的条文,我们就不免会有一个奇怪的“党”,它的“党员”有同一的纲领(这还成问题!),而策略观点和组织观点却各不相同!真是妙不可言的多样性!我们的党又怎能不象一个宴会呢?

不过要问一问:究竟应当把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¹⁰所嘱咐我们的、与马尔托夫条文根本矛盾的那个思想上和实践上的集中制置于何地呢?毫无疑问,如果一定要在两者之间选择一个,那么丢掉马尔托夫的条文是会正确一些。

请看,马尔托夫向我们提出的、和列宁同志的条文相对立的条文是多么荒谬!

我们认为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马尔托夫的条文是考虑不周的结果!我们希望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一定能改正第二次代表大会的错误并采纳列宁同志的条文。

现在把以上所说的再略述一遍。无产者大军已经走上了斗争舞台。如果说任何一支大军都要有自己的先头部队,那么无产者大军也应有这样一个部队。因此,就出现了无产阶级领导者集团,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这个党既然是一定的大军的先头部队,第一,它就应当用自己的纲领、策略和组织原则武装起来;第二,它就应当是一个团结一致的组织。如果要问究竟应当把什么人称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那么这个党只能给一个回答:只有接受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在党的一个组织中工作的人,才能称为本党党员。

列宁同志在他那个杰出的条文中所表达的正是这个十分明显的真理。

载于 1905 年 1 月 1 日
《无产阶级斗争报》第 8 号

选自《斯大林全集》第 1 卷
第 55—64 页

本文没有署名

原文是格鲁吉亚文

略论党内意见分歧¹¹

“社会民主党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

——卡尔·考茨基

我们的“孟什维克”真是太讨厌了！我说的是梯弗利斯的“孟什维克”。他们一听说党内有分歧意见，就喋喋不休地说，不管你高兴不高兴，我们随时随地都要谈论意见分歧，不管你高兴不高兴，我们反正总是要骂“布尔什维克”！于是他们就拚命地骂，好象发了疯一样。在一切十字路口，在自己人或外人中间，总而言之，不管在什么地方，他们都是叫嚷着老一套：要提防“多数派”，这不是自己人，这是靠不住的人！单在“通常的”活动场所叫骂，他们还嫌不够，还把“事件”搬到合法刊物上去，从而再次向世人表明自己……惹人讨厌。

“多数派”究竟有什么过错呢？我们的“少数派”为什么要这样“生气”呢？

让我们来看看历史事实吧。

“多数派”和“少数派”是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¹⁰（1903年）上开始产生的。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分散的力量应当团结成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党。我们这些党的工作者对这次代表大会曾抱着很大的希望。我们当时欢呼：我们终于等到了这一天，我们就要团结

成一个统一的党了,我们就有可能按照统一的计划活动了!.....固然,在此以前我们也活动过,但我们过去的活动是分散的无组织的。固然,在此以前我们也曾企图统一起来,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召开了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¹²(1898年),甚至似乎是“统一起来了”,可是这种统一只在口头上存在:党仍然分散为一些单个的集团,力量仍然是分散而需要统一的。所以,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应当是把分散的力量集合起来,并把它们团结成一个整体。我们应当建立一个统一的党。

但事实证明,我们当时的希望在某种程度上是过早了。这次代表大会并没有能够使我们团结成一个统一而不可分的党,它只是为这样一个党奠定了基础。然而代表大会却向我们清楚地表明:党内存在着两条路线,一条是《火星报》(指旧《火星报》)⁹的路线,一条是《火星报》反对者的路线。因此代表大会就分成两部分,即“多数派”和“少数派”。前者拥护《火星报》路线,并团结在《火星报》周围;后者则反对《火星报》而采取相反的立场。

这样,《火星报》就成了党内“多数派”的旗帜,而《火星报》的立场就成了“多数派”的立场。

《火星报》走的是什么道路呢?它所维护的是什么呢?

要了解这一点,就必须知道它是在什么条件下登上历史舞台的。

《火星报》创刊于1900年12月。这是俄国工业开始发生危机的时候。伴随有一系列同业罢工(1896—1898年)的工业繁荣,渐渐为危机代替了。危机一天天尖锐起来,而且成了同业罢工的障碍。虽然如此,工人运动还是为自己开辟道路,并向前发展:许多细流汇成一条洪流,运动日益带有阶级色彩,渐渐走上了政治斗争的道路。工人运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了..... 不过当时还看不

见先进部队,还看不见能把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把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因而赋予无产阶级斗争以社会民主主义性质的社会民主党。

当时的“社会民主党人”(他们被称为“经济派”)究竟干了些什么呢?他们竭力赞扬自发运动,漫不经心地重复说:工人运动并不怎样需要社会主义意识,没有这种意识它也能很好地达到自己的目的,问题的实质在于运动本身。运动就是一切,而意识却是微不足道的。没有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这就是他们努力追求的目标。

既然如此,那么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使命究竟是什么呢?他们断定说:它应该是自发运动的驯服的工具。把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并不是我们的事情,领导这个运动也不是我们的事情,——这只是徒劳无益的强制;我们的义务只是倾听这个运动的声息并准确地记录社会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应该做自发运动的尾巴。一句话,社会民主党被描绘成运动中的累赘。

谁不承认社会民主主义,谁也就不应该承认社会民主党。正因

社会民主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其中包括一切社会民主主义的战士,不论他是工人或是知识分子。

我们的《社会民主党人报》¹³燃起了“批评”的热情(见创刊号《多数派还是少数派》一文),不过我应该指出,它对“经济派”和“工人事业派”(他们彼此的区别不大)估计得不正确。问题并不在于他们“蔑视政治问题”,而在于他们做运动的尾巴和只是重复运动所提示给他们的东西。过去有一个时期仅仅举行罢工。那时他们宣传的是经济斗争。到了游行示威的时期(1901年),发生了流血事件,产生了失望情绪,于是工人就采用恐怖手段,以为这能拯救他们,使他们不受暴君的统治。这时“经济派—工人事业派”也加入总的合唱队并且神气十足地宣称:现在应该采取恐怖手段,袭击监狱,释放狱中同志等等了(见《工人事业》杂志¹⁴《历史性的转变》一文)。可见这决不能说他们是“蔑视政治问题”的。该文作者是借用马尔丁诺夫的话来进行“批评”的,但如果他去了解一下历史事实,那就比较有益了。

为如此，“经济派”才这样固执己见，再三断言无产阶级政党在俄国是不可能存在的。他们说：让自由派去从事政治斗争吧，这种事情是比较合乎自由派的身分的。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应该干些什么呢？我们应该照旧以单个的小组形式存在，各小组在自己的圈子里单独活动。

需要的不是党而是小组！——他们说。

这样，一方面，工人运动发展起来了，它需要一个先进的领导的队伍；另一方面，以“经济派”为代表的“社会民主党”，不但不去领导运动，反而否认自己的作用，做了运动的尾巴。

当时必须大声疾呼地说明一个思想：没有社会主义的自发工人运动就是在黑暗中摸索，即使有一天能摸索到目的地，但谁知道要到什么时候并且要受多少痛苦，所以社会主义意识对于工人运动是有极大意义的。

同时还必须说明，这种意识的体现者社会民主党应该把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应该始终走在运动的前头，而不要冷眼旁观，做自发工人运动的尾巴。

同时还必须说明一个思想：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直接责任是把无产阶级各个先进队伍集合起来，把它们团结成一个统一的党，从而永远结束党内的分散状态。

《火星报》着手规定的正是这些任务。

请看它在一篇纲领性的论文（见《火星报》创刊号）中是怎样说的：“社会民主党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这就是说，没有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或站在工人运动外面的社会主义，都是社

会民主党应该反对的一种不良现象。可是,因为“经济派—工人事业派”崇拜自发运动,因为他们轻视社会主义的意义,所以《火星报》指出:“工人运动脱离了社会民主党,就会变得烦琐,并且必然会堕入资产阶级的泥潭。”因此,社会民主党的责任是“给这个运动指出最终目的,指出政治任务,保护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独立性”。

俄国社会民主党负有什么责任呢?《火星报》继续写道:“由此自然产生出俄国社会民主党所应该实现的任务:把社会主义思想和政治自觉灌输到无产阶级群众中去,组织一个和自发工人运动有紧密联系的革命政党。”这就是说,它应该始终走在运动的前头,它的首要任务就是把工人运动中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力量团结成一个统一的党。

《火星报》编辑部 就是这样论证它的纲领的。

《火星报》是否实现了这个出色的纲领呢?

大家都知道它是怎样努力实现这些极重要的思想的。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向我们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因为代表大会以三十五票的多数承认《火星报》为全党的中央机关报。

既然如此,那么某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还要“谩骂”旧《火星报》,难道不是很可笑吗?

请看孟什维克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对《火星报》所发的议论吧:

“它《火星报》本应当分析‘经济主义’的思想,摈斥错误的观点,采取正确的观点,并把‘经济主义’纳入新的轨道……可是事实上却不是这样。反对‘经济主义’的斗争引起了另一个极端,即轻视经济斗争,对它采取鄙弃的态度,只承认政治斗争有首要的意

当时《火星报》编辑部由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马尔托夫、斯塔罗维尔和列宁六人组成。

本选集引文中尖括号 内的话和标点符号是斯大林加的。——编者注

义。没有经济学的 应该说：“没有经济的”政治，——这就是新的方向。”（见《社会民主党人报》创刊号《多数派还是少数派》一文）

但是，可敬的“批评家”，这一切究竟是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在哪个国家发生的呢？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德、查苏利奇、马尔托夫和斯塔罗维尔做了些什么？他们既然在编辑部中占多数，为什么不把《火星报》引上“真理”之路呢？最可敬的“批评家”，在这以前你自己究竟干什么去了？你为什么没有警告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要是警告了的话，那它就不会承认《火星报》为中央机关报了。

但是，我们且把“批评家”撇开吧。

事情是这样的：《火星报》正确地看出了“迫切的问题”，正是走上了我在上面说过的那条道路，并且努力地执行了自己的纲领。

列宁在他卓越的著作《怎么办》一书中更明确、更令人信服地表明了《火星报》的立场。

我们就来谈谈这本书吧。

“经济派”崇拜自发的工人运动，但谁不知道自发运动就是没有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就是工联主义”，而工联主义是不愿看见资本主义范围以外的任何东西的。谁不知道没有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就是在资本主义圈子里踏步不前，在私有制周围徘徊，即使有一天能达到社会革命，但谁知道要在什么时候并且要受多少痛苦才能达到。工人们是在最近时期还是经过一个长时期、是经过容易的道路还是经过困难的道路才能踏上“乐土”，这些问题对于他们难道都是无所谓的吗？显然，谁赞扬自发运动并崇拜自发运动，

列宁《怎么办》第28页（参看《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256页。——编者注）。

谁就不由自主地在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之间挖掘鸿沟,谁就轻视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意义,谁就把这个思想体系逐出实际生活之外,并且不由自主地使工人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因为他不了解“社会民主党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不了解“对工人运动自发性的任何崇拜,对‘自觉因素’的作用即社会民主党的作用的任何轻视,完全不管轻视者自己愿意与否,都是加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对工人的影响”。

我们来比较详细地说明一下。在我们这个时代只能存在着两种思想体系: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它们之间的区别,也在于前者,即资产阶级思想体系,较后者要老得多,传播的范围要广得多,在生活中扎下的根要深得多,无论在自己人中间或外人中间,到处都可以碰到资产阶级的观点,而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则刚刚开始走了几步,刚刚给自己开辟道路。不用说,如果就思想的传播来讲,那么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即工联主义的意识,比刚刚走了几步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传播起来要容易得多,对于自发工人运动的影响也要广泛得多。这一点之所以正确,尤其是因为自发运动——没有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本来“就恰恰导致运动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而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支配就是排斥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因为这两种思想体系是互相否定的。

有人会问我们:怎么?难道工人阶级不是倾向社会主义的吗?是的,它是倾向社会主义的。不然的话,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就会是毫无结果的了。然而同样正确的是:反对和阻碍这个倾向的,有另

考茨基《爱尔福特纲领解说》中央委员会版第94页。

列宁《怎么办》第26页(参看《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254页。——编者注)。

同上,第28页(参看《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256页。——编者注)。

一个倾向,即接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倾向。

我刚才说过,我国社会生活中浸透了资产阶级思想,所以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比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传播起来要容易得多。不要忘记,资产阶级的思想家这时也并没有打瞌睡,他们照自己的办法装扮成社会主义者,竭力想使工人阶级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如果社会民主党人也象“经济派”一样地毫不在意,做自发运动的尾巴(社会民主党采取这种态度时,工人运动就是自发的),那么不言而喻,自发的工人运动就将沿着这条老路走去并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当然要到长期的摸索和痛苦迫使它和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断绝联系而奔赴社会革命的时候为止。

这就叫做接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倾向。

请看列宁是怎样说的:

“工人阶级自发地倾向社会主义,然而最流行的(而且时刻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复活起来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却自发地而又最猖狂地迫使工人接受它。”正因为如此,所以自发的工人运动,当它还带着自发性的时候,当它还没有和社会主义意识结合起来的时候,就要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并且有受这种思想体系支配的倾向。如果不是这样,那么社会民主主义的批评、社会民主主义的宣传就是多余的了,那么“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也是多余的了。

社会民主党一定要反对这种接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倾向,而促进另一种倾向,即接受社会主义的倾向。当然,将来有一天,经过长期的摸索和痛苦之后,自发运动没有社会民主党的帮助也会达到自己的目的,也会走到社会革命的门前,因为“工人阶级自发

列宁《怎么办》第29页(参看《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258页。——编者注)。

同上,第28页(参看《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256页。——编者注)。

地倾向社会主义”。但在那时以前怎么办呢？在那时以前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象“经济派”那样袖手旁观并且让位给司徒卢威和祖巴托夫一伙人吗？屏弃社会民主主义而促成资产阶级的工联主义思想体系的统治吗？忘掉马克思主义而不把“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吗？

不！社会民主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它的责任是始终走在无产阶级前头，它的责任是“使工人运动脱离这种投到资产阶级羽翼下去的工联主义的自发趋势，而把它吸引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羽翼下来”。社会民主党的责任是把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自发的工人运动中去，把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因而赋予无产阶级斗争以社会民主主义的性质。

有些人说，某些国家的工人阶级自己已经创立了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科学的社会主义），并且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自己也会创立这种思想体系的，因此，他们说，把社会主义意识从外面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完全是多余的。但这是极大的错误。要创立科学的社会主义，就必须领导科学，就必须用科学知识武装起来，并善于深刻地研究历史发展的规律。而工人阶级，当它还是工人阶级时，是不能领导科学、推进科学并科学地研究历史规律的，因为它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经费来做这件事情。卡·考茨基说：“科学的社会主义”只有在深刻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出来。……但掌握科学的人并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黑体是卡·考茨基用的，因为现代社会主义就是在这一阶层的个别人物的头脑

列宁《怎么办》第 29 页（参看《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258 页。——编者注）。

马克思《宣言》第 15 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64 页。——编者注）。

列宁《怎么办》第 28 页（参看《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256 页。——编者注）。

中产生的,他们把这个学说传授给才智出众的无产者……”

因此,列宁说:凡是崇拜自发的工人运动和对它袖手旁观的人,凡是经常轻视社会民主党的意义而让位于司徒卢威—祖巴托夫一伙的人,都以为这个运动本身就能创立科学社会主义。“但这是极大的错误。”有些人以为在九十年代举行罢工的彼得堡工人已经有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但这也是错误的。他们并没有这种意识,“本来也不可能有……这种意识 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 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确信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对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令,如此等等。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由有产阶级的有学识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的、历史的和经济的理论中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列宁继续写道:这当然不是说,“工人不参加创立思想体系的工作。但他们不是以工人的身分来参加,而是以社会主义理论家的身分、以蒲鲁东和魏特林 他们两个都是工人 一类人的身分来参加的,换句话说,只有当他们能在某种程度上掌握他们那个时代的知识并把它向前推进的时候,他们才能在相应的程度上参加这一工作”。

这一切可以大致设想如下。存在着资本主义制度。有工人,也有厂主。他们之间进行着斗争。科学社会主义暂时还没有在任何

列宁《怎么办》第 27 页,那里引用了考茨基发表于《新时代》杂志¹⁵(见该杂志 1901—1902 年第 3 期第 79 页)的一篇有名论文中的这段话(参看《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255 页。——编者注)。

同上,第 26 页(见《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254 页。——编者注)。

同上,第 20—21 页(参看《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247 页。——编者注)。

同上,第 27 页(参看《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256 页。——编者注)。

地方出现。当工人已在进行斗争时,科学社会主义在任何地方却还无影无踪…… 对的,工人在斗争着。然而他们是各自反对自己的厂主,和自己的地方当局发生冲突:那里在罢工,这里在举行群众大会和游行示威;那里在向当局要求权利,这里在宣布抵制;有些人在谈论政治斗争,另一些人则在谈论经济斗争,如此等等。但这并不是说工人已经具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也不是说:他们的运动的目的是要摧毁资本主义制度,他们确信推翻资本主义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就象确信旭日必然东升一样,他们认为争取自己的政治统治(无产阶级专政)是达到社会主义胜利的必要工具等等。

与此同时,科学在发展着。工人运动逐渐引起科学的注意。大部分学者有了一种想法,认为工人运动是些不安分守己的人的骚乱,不妨用皮鞭去开导他们。另外一些学者则以为富人应该分给穷人一点残羹剩饭,即认为工人运动是乞丐运动,目的是要讨得一些施舍。在一千个这样的学者中间,也许只有一个能够科学地观察工人运动,科学地研究全部社会生活,注意阶级间的冲突,倾听工人阶级的怨声,并且终于科学地证明:资本主义制度决不是什么永恒的东西,它也和封建制度一样是暂时的,随之而来的必然是把它否定了的社会主义制度,而社会主义制度只能由无产阶级经过社会革命来建立。一句话,科学社会主义正在被创立着。

当然,假如没有资本主义和阶级斗争,也就不会有科学社会主义。但同样正确的是:少数的几个人,比方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假如他们没有掌握科学的知识,也就不能创立科学社会主义。

什么是没有工人运动的科学社会主义呢?——这好象是放在船上不用的罗盘,只会生锈,结果只好把它扔到海里去。

什么是没有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呢?——这好象是一只没有罗盘的大船,虽然也能驶到彼岸,但是有了罗盘,到达彼岸就会快

得多,危险也会少一些。

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就会有一只很好的大船,它会一直驶向彼岸,安然靠近码头。

把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就会有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它会一直向前猛进,到达“乐土”。

所以,社会民主党(而不只是社会民主党的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把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把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因而赋予自发的工人运动以社会民主主义的性质。

列宁就是这样说的。

某些人断定说,似乎在列宁和“多数派”看来,工人运动如果不和社会主义思想体系联结起来,就会趋于灭亡,不能达到社会革命。然而这是一种臆说,是一些闲人的臆说,这种臆说恐怕只能从阿恩之流的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头脑中产生出来(见《旅行家》杂志¹⁶第6期《什么是党》一文)。

列宁确定地说:“工人阶级自发地倾向社会主义。”列宁之所以没有详细说明这一点,只是因为他认为用不着去证明本来已经证明了的东西。此外,列宁并没有打算研究自发运动,他只是想向实际工作者说明他们应该自觉地做些什么。

列宁在和马尔托夫论战的另一个地方又说过如下一段话:

“‘我们党是不自觉过程的自觉表现者。’正是如此。并且正因为如此,所以力求使‘每一个罢工者’都能自称为党员的这一倾向是不正确的,因为假使‘每次罢工’都不只是强大的阶级本能和必然引向社会革命的阶级斗争的自发表现,而是这个过程的自觉表

列宁《怎么办》第29页(参看《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258页。——编者注)。

现……那么我们的党……就会一下子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消灭掉。”

可见在列宁看来,即使不能称为社会民主主义的那种阶级斗争和阶级搏斗,也必然会把工人阶级引向社会革命的。

如果你们对另外一些“多数派”代表的意见也感兴趣,那么就请你们听听吧。他们中间的哥林同志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说道:

“如果让无产阶级自行其是,那么事情会怎样呢?这就会和资产阶级革命前夜所发生的事情相似。资产阶级革命家未曾有过任何科学的思想体系。然而资产阶级制度还是产生了。没有自己的思想家的无产阶级,当然,归根到底也会朝着社会革命方面工作的,不过是本能地工作……无产阶级也会本能地实行社会主义,但它不会有社会主义理论。这一过程不过是缓慢而较为痛苦罢了。”

这段话是无须解释的。

总之,自发的工人运动,即没有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必然会变得烦琐而带有工联主义的性质,它一定会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能否由此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就是一切,工人运动却是微不足道的呢?当然不能!只有唯心主义者才这样说。经过很长时期以后,总有一天经济的发展必然把工人阶级引向社会革命,因而将迫使它和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断绝任何联系。问题只在于这将是一条很漫长很痛苦的道路。

列宁《进一步,退两步》第53页(参看《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471—472页。——编者注)。

《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第129页。

另一方面,没有工人运动的社会主义,不管它是在什么样的科学基础上产生的,终究还有一句空话,毫无意义。能否由此得出结论说,运动就是一切,社会主义却是微不足道的呢?当然不能!只有那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才会发出这样的议论,他们认为意识既然是社会生活本身产生的,因而也就没有任何意义。社会主义可以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从而由空洞的词句变成锐利的武器。

结论呢?

结论就是:工人运动必须和社会主义相结合,实践活动和理论思想必须融合为一,从而赋予自发的工人运动以社会民主主义的性质,因为“社会民主党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于是,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的社会主义就会由空洞的词句变成工人手中极大的力量。于是,变成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自发运动就会循着正确的道路迅速地走向社会主义制度。

那么,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使命何在呢?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

我们的责任,社会民主党的责任,就是使自发的工人运动离开工联主义的道路而走上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我们的责任就是把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这个运动中去,并把工人阶级的先进力量团结成一个集中的党。我们的任务就是始终走在运动的前头,毫不倦怠地和一切阻碍这些任务实现的人作斗争,不管他们是敌人也罢,“朋友”也罢。

大体说来,“多数派”的立场就是如此。

我们的“少数派”不喜欢“多数派”的立场,他们说,这个立场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是和马克思主义“根本矛盾的”。最可敬的先生们,真是这样的吗?究竟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在什么行星上有这种事情呢?他们说:读一读我们的论文,你们就会相信我们是

《爱尔福特纲领解说》中央委员会版第 94 页。

即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意识。

的。好,我们就来读一读吧。

我们面前有一篇叫做《什么是党》的文章(见《旅行家》杂志第6期)。“批评家”阿恩是怎样责备党内“多数派”的呢?他们“多数派”……自称为党的首脑……硬要别人服从他们……为了替自己的行为辩护,甚至常常臆造出一些新理论,譬如说,工人群众靠自己的力量不能领会“崇高理想”等等。”

试问:“多数派”现在或过去什么时候是否提出过类似的“理论”呢?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没有提出过!恰恰相反,“多数派”的思想代表列宁同志十分确定地说,工人阶级很容易领会“崇高理想”,很容易领会社会主义。请听吧:

“人们常常说:工人阶级自发地倾向社会主义。在下述意义上说,这是完全正确的,就是社会主义理论比其他一切理论都更深刻更正确地断定了工人阶级受苦的原因,因此工人也就很容易领会这个理论。”

可见在“多数派”看来,工人是很容易领会那些叫做社会主义的“崇高理想”的。

那么阿恩为什么要异想天开,他这个奇怪的“发现”是从什么地方挖掘出来的呢?读者们,原来“批评家”阿恩所指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他指的是《怎么办》一书中的一段话,列宁在那里讲到了创立社会主义并断言工人阶级靠自己的力量不能创立科学社会主义。但你们会说:怎么会是这样的呢?创立社会主义是一回事,领会社会主义则是另一回事。为什么阿恩忘记了列宁明白地说到领会“崇高理想”的那些话呢?读者们,你们是对的,但阿恩既然很想

《旅行家》杂志第6期第71页。

列宁《怎么办》第29页(参看《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258页。——编者注)。

同上,第20—21页(参看《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247页。——编者注)。

做一个“批评家”，他应该怎么办呢？你们想一想，这是多么英勇的事情：编造出自己的一套“理论”，把它硬套在对方的头上，然后就对准自己幻想出来的果实开火。这就是所谓批评！阿恩“靠自己的力量不能领会”列宁的《怎么办》一书，这倒是毫无疑问的。

现在我们就打开所谓《社会民主党人报》来看看吧。《多数派还是少数派》（见《社会民主党人报》创刊号）一文的作者说了些什么呢？

他勇气十足、大喊大叫地攻击列宁，因为在列宁看来，“工人运动的自然的应当是“自发的”发展不是走向社会主义，而是走向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可见作者并不懂得自发的工人运动就是没有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让作者去证明不是这样吧！），而这样的运动一定会受资产阶级的工联主义的思想体系的支配，一定会倾向于它，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只能存在着两种思想体系，即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和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凡是前者不存在的地方，后者就一定出现并占据其地位（你证明这是相反的吧！）。是的，列宁正是这样说的。但同时他并没有忘记工人运动所特有的另一种倾向，即社会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不过是暂时被那种接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倾向所遮蔽罢了。列宁直截了当地说“工人阶级自发地倾向社会主义”，并且正确地指出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是除其他办法外，也采取和“经济派”作斗争的办法来加速这种倾向的胜利。可敬的“批评家”，为什么你的文章里不引用列宁的这些话呢？难道这些话不也就是这位列宁说的吗？这样做是于你不利的，对不对？

《社会民主党人报》创刊号第14版。

列宁《怎么办》第29页（参看《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258页。——编者注）。

作者又说：“依照列宁的意见……工人按其地位 黑体是我用的 来说,与其说是社会主义者,不如说是资产者……”真是蠢话,即使这样的作者我并没有料到会说出这样的蠢话 难道列宁指的是工人的地位吗 难道他断言工人按其地位来说是资产者吗 该要多么蠢的人才会说被剥夺了生产工具、靠出卖劳动力过活的工人按其地位来说是资产者呢?不!列宁所说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问题在于一个人按其地位来说可能是无产者而不是资产者,但他同时也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因而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这里谈到的工人阶级的情形正是如此。而这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作者总是爱说空话,不加思考就脱口而出 例如作者一味固执地说“列宁主义是和马克思主义根本矛盾的”,他这样反复地说,却不了解这种“思想”会把他引到哪里去。假定我们暂时相信他,以为列宁主义确实“是和马克思主义根本矛盾的”,往下又怎样呢 由此会得出什么结论呢?结论如下:“列宁主义把《火星报》旧《火星报》拉过去了”(这是作者也不否认的),可见《火星报》也“是和马克思主义根本矛盾的”。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以三十五票的多数承认《火星报》为党的中央机关报,并且对它的功绩大加称赞,可见这次代表大会及其纲领和策略也“是和马克思主义根本矛盾的”…… 读者们,这岂不可笑吗?

作者仍继续说:“照列宁的意见,自发的工人运动是去和资产阶级结合的……”是的,是的,作者无疑是去和愚蠢结合了,如果他

《社会民主党人报》创刊号第 14 版。

同上,第 15 版。

见《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第 147 页。记录里载有一项决议,把《火星报》称为社会民主主义原则的真正维护者。

能离开这条道路,那就好了。

但是,我们且把“批评家”撇开,来请教马克思主义吧。

可敬的“批评家”一味固执地说:“多数派”及其代表——列宁的立场是和马克思主义根本矛盾的,因为无论是考茨基,或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都和列宁所坚持的相反!真是这样吗?我们来看看吧!

作者告诉我们说:“卡·考茨基在他的《爱尔福特纲领解说》中写道:‘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利益互相对立到这样的程度,以致这两个阶级的意向不可能在较长的时间内相一致。在每个具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 国家中,工人阶级之参加政治活动迟早会使工人阶级脱离资产阶级政党而成立独立的工人政党。’”

但是,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结论只能是: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无产阶级的利益是互相矛盾的,无产阶级“迟早”要脱离资产阶级而成立独立的工人政党(请记住:是工人政党而不是社会民主工党)。作者以为考茨基在这里是和列宁的意见分歧的!其实列宁是说无产阶级迟早不仅要和资产阶级脱离,而且要实行社会革命,即推翻资产阶级。他又补充说: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竭力使社会革命尽可能迅速地实现,并且自觉地实现。是的,正是自觉地而不是自发地实现,因为列宁所说的正是这种自觉性。

这位“批评家”继续从考茨基的书中引证说:“……在情况已经发展到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的地方,这个党如果不是从一开始就受到社会主义倾向的感染,迟早也必定能领会社会主义倾向,最终它

见列宁《进一步,退两步》第53页(参看《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471—472页。——编者注)。

一定会成为社会主义的工人政党,即社会民主党。”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只是说工人政党将领会社会主义的倾向。难道列宁否认这一点吗?根本没有这回事!列宁直截了当地说:不仅工人政党,而且整个工人阶级也在领会社会主义。既然如此,这个《社会民主党人报》和它那位大撒其谎的英雄为什么要胡说八道呢?他们为什么要乱说一通呢?俗语说: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我们这位迷糊了的作者正是这样。

可见考茨基在这里是和列宁没有丝毫分歧的。但这一切却异常清楚地证明了作者的思考不周。

考茨基是否说过什么有利于“多数派”立场的话呢?请看,这就是他在一篇分析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的出色论文中说过的这段话:

“在我们那些修正主义的批评家 伯恩施坦的信徒 中,有许多人以为马克思似乎曾经断言经济发展和阶级斗争不仅造成社会主义生产的条件,而且还直接产生认识到社会主义生产是必要的那种意识 黑体是卡·考茨基用的。于是这些批评家就反驳道,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对于这种意识却是最陌生的。根据草案 奥地利草案 可以想见:……这一……观点,奥地利纲领的起草委员会也是赞成的。草案上写道:‘资本主义的发展越是使无产阶级的人数增加,无产阶级也就越是不得不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并且也越有可能来进行这个斗争。无产阶级就会意识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社会民主党人报》创刊号第 15 版。

列宁《怎么办》第 29 页(参看《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258 页。——编者注)。

这样一来,社会主义意识就成了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必然的直接的结果。但这种观点是完全不正确的。…… 现代社会主义意识,只有在深刻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出来。…… 但掌握科学的人并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黑体是卡·考茨基用的。因为现代社会主义就是在这一阶层的个别人物的头脑中产生的,他们把这个学说 科学社会主义 传授给才智出众的无产者,后者又……把它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可见,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東西,而不是一种从这个斗争中自发地产生出来的东西。因此,旧海因菲尔德纲领¹⁷说得非常正确: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把认清无产阶级地位及其任务的这种意识灌输到无产阶级中去。……”

读者们,你们能否回忆起列宁对这一问题的类似的思想?你们能否回忆起“多数派”的那个众所周知的立场?为什么“梯弗利斯委员会”及其《社会民主党人报》要隐瞒真情呢?为什么可敬的“批评家”讲到考茨基的时候在自己论文中却不引证考茨基的这几句话呢?那些最可敬的人是在欺骗谁呢?为什么他们这样“轻视”读者呢?莫非因为他们……害怕真理,躲避真理,以为真理也是可以隐瞒的吗?他们正象一种鸟,把头藏在翅膀下面,就以为谁都看不见它了!他们正象这种鸟一样糊涂。

既然社会主义意识是在科学基础上创立的,既然这种意识要由社会民主党 努力从外面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那么很明显,这

《新时代》杂志 1901—1902 年第 20 年卷第 3 期第 79 页。考茨基的这篇精彩论文曾被引用于列宁的《怎么办》一书第 27 页(参看《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255 页。——编者注)。

不仅是社会民主党的知识分子。

一切都是因为当工人阶级还是工人阶级的时候,就不能领导科学,不能靠本身的力量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它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经费来做这件事情。

卡·考茨基在他的《爱尔福特纲领解说》中说过如下一段话:

“……无产者至多只能领会资产阶级学者们所创造的一部分知识,并使之适合于自己的目的和需要,然而当他们还是无产者的时候,他们是没有空闲时间和经费来独立地把科学发挥到资产阶级思想家所达到的范围之外的。所以天生的工人社会主义不免带有空想主义。空想主义就是虚假的非科学的理论的一切重要特征。”

考茨基继续说:这种空想社会主义往往带有无政府主义的性质,可是“……大家知道,凡是无政府主义运动,即指无产阶级空想主义而言。——卡·考茨基注 真正深入群众而成为阶级运动的地方,尽管这种运动在表面上还带有激进的色彩,但迟早总要变为最狭隘的纯粹的工会运动”。

换句话说,工人运动若不和科学社会主义相结合,就不免会变得烦琐而具有“狭隘工会运动的”性质,因而受工联主义思想体系的支配。

“这是蔑视工人,这是抬高知识分子呀!”我们的“批评家”及其《社会民主党人报》大喊大叫起来……不幸的“批评家”,可怜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他们把无产阶级看成一位任性的小姐,对她不能说实话,永远只能恭维她,使她不至于跑掉!不,最可敬的人们!我们相信,无产阶级会表现出超过你们所想象的坚强性来。我们相信它不会害怕实话!而你们……究竟对你们有什么可说:你们现

《爱尔福特纲领解说》中央委员会版第 93 页。

同上,第 94 页。

在还是害怕实话,而且在自己的文章中没有把考茨基的真实观点告诉读者……

总之,没有工人运动的科学社会主义,永远是些随便说说的空话。

另一方面,没有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就是一种工联主义的摸索,固然它有一天也会导致社会革命,可是要付出长期的磨难和痛苦的代价。

结论呢?

“工人运动应和社会主义相结合”：“社会民主党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考茨基就是这样说的。

我们已经看到《火星报》(旧《火星报》)和“多数派”也是这样说的。

我们已经看到列宁同志也是站在这个立场上的。

可见“多数派”是坚定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

很明显,孟什维克“批评家”喋喋不休地说出的所谓“蔑视工人”、“抬高知识分子”、“多数派的非马克思主义立场”以及诸如此类的奇谈,不过是梯弗利斯“孟什维克”的胡说和空想罢了。

相反地,我们可以看出,事实上“和马克思主义根本矛盾的”是梯弗利斯“少数派”自己,是“梯弗利斯委员会”及其《社会民主党人报》。但这一点容我们以后再说。我们暂时把注意力放在下面一点上吧。

为了证明自己的言论正确,《多数派还是少数派》的作者引用马克思(?)的一段话说:“某一阶级的理论家在理论上得出的结论,乃是该阶级本身在实践中已经走到了结论。”

《爱尔福特纲领解说》第 94 页。

《社会民主党人报》创刊号第 15 版。

二者必居其一。不是作者不懂格鲁吉亚文,就是排字工人弄错了。任何一个识字的人都不会说“已经走到了的结论”。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已经得出了的结论”或者“正要得出的结论”。如果作者是指后一种说法(正要得出的结论),那就应当指出:他把马克思的话转述错了,马克思从来没有说过这类的话。如果作者是指前一种说法,那么他引证的句子就应当是这样的:“某一阶级的理论家在理论上得出的结论,乃是该阶级本身在实践中已经得出了的结论。”换句话说,如果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理论上得出了推翻资本主义和建立社会主义是不可避免的这一结论,那么,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在实践中已经推翻了资本主义,已经打倒了资本主义制度并且在它的废墟上建立了社会主义生活!

不幸的马克思!谁知道我们那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还会把多少荒谬的言论加在他的头上呵!

马克思真是这样说的吗?事实上他说的是:“小资产阶级的理论上的代表”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也就是小资产者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方面的代表人物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间的关系,都是这样”。

由此可见,马克思根本没有说“已经走到了”。这些“哲学”词句是可敬的“批评家”捏造出来的。

在这种场合,马克思的话完全是另外一种意思。

马克思在上述论点中所发挥的是什么思想呢?他所发挥的不过是:无论哪个阶级的理论家都不能创造出一种在实际生活中没

如果读者手边没有《雾月十八日》(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32页。——编者注),就请参看《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第111页,那里引用了马克思所说的这段话。

有具备要素的理想,他只能看出未来事物的要素,并据此在理论上创造出本阶级在实践中要达到的理想。差别就在于理论家超过本阶级而先看出未来事物的萌芽。这也就叫做“在理论上得出什么结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宣言》中说:

“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即社会民主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

是的,思想家是“起推动作用”的,他们比“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看得远得多,全部要点也就在这里。思想家起推动作用,正因为如此,所以思想、社会主义意识对于运动具有伟大的意义。

可敬的“批评家”,你就是为这一点攻击“多数派”吗?那么你就和马克思主义诀别吧,你要知道“多数派”正是以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自豪的。

“多数派”在这种场合同恩格斯在九十年代的情形很相似。

唯心主义者硬说思想是社会生活的泉源。在他们看来,社会意识是社会生活借以建立的基础,所以他们被称为唯心主义者。

因此必须证明,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思想是生活本身产生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走上了历史舞台并且卓绝地完成了这个使命。他们证明:社会生活是思想的泉源,因此社会生活是社会意识借以建立的基础。这样,他们也就替唯心主义挖掘了坟墓,而替唯物主义扫清了道路。

某些半马克思主义者却这样了解:似乎意识、思想在生活中只有极小的意义。

因此必须证明思想的伟大意义。

于是恩格斯出来发表意见,在他的书信(1891—1894年)中强调说:诚然,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而是生活本身所产生的,可是它一旦产生出来,就会获得巨大的意义,它把人们联合起来,组织起来,并且在产生它的社会生活上打下自己的烙印,——思想在历史运动中有巨大的意义。

伯恩施坦及其伙伴高声叫道:“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这是叛变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者只是付之一笑而已……

俄国也有过一些半马克思主义者,即“经济派”。他们硬说,既然思想是社会生活产生的,那么社会主义意识对于工人运动也就只有微不足道的意义。

因此必须证明,社会主义意识对工人运动有重大的意义,没有这种意识,运动就是工联主义的摸索,无产阶级不知何时才能从这种摸索中摆脱出来而到达社会革命。

于是《火星报》出现了,它卓绝地完成了这个使命。《怎么办》一书出版了,列宁在这部著作中强调社会主义意识的伟大意义。党的“多数派”形成了,它坚定地走上了这条道路。

然而这时一些伯恩施坦的喽罗们却跑出来叫喊道,这“是和马克思主义根本矛盾的”!

“经济派”的喽罗们,你们可知道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吗?

读者会说:真奇怪!读者会问: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普列汉诺夫写了一篇批评的文章反对列宁(见新《火星报》第70号和第71号)?他为什么非难“多数派”呢?难道梯弗利斯那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他们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不是重复着普列汉诺夫发表过的意见吗?是的,他们是在重复,但重复得很蠢笨,简直令人

讨厌。是的,普列汉诺夫发表了批评的意见。然而你们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吗?普列汉诺夫跟“多数派”和列宁是没有分歧的。不止普列汉诺夫一人,而且马尔托夫、查苏利奇、阿克雪里罗得也是如此。真的,就我们上面讲的那个问题来说,“少数派”的领袖和旧《火星报》是没有分歧的。而旧《火星报》乃是“多数派”的旗帜。不要惊讶!请看事实吧。

我们读过旧《火星报》上的一篇纲领性的论文(见上)。我们知道,这篇论文完全表明了“多数派”的立场。这篇论文是谁的呢?是当时的《火星报》编辑部的。谁参加了这个编辑部呢?列宁、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马尔托夫、查苏利奇和斯塔罗维尔。他们中间现在只有列宁一个人是“多数派”,其余五个人都在领导“少数派”,然而事实毕竟是事实,——《火星报》的这篇纲领性的论文是在他们负责编辑时发表的,因此他们不应当自食其言,他们大概相信自己所写的东西吧。

但是,好吧,我们就撇开《火星报》不谈。

且看马尔托夫写些什么:

“这样看来,社会主义思想最初并不是在工人群众中间产生的,而是在资产阶级出身的学者的书房中产生的。”

再看维拉·查苏利奇写些什么:

“甚至整个无产阶级的阶级团结的思想……也不是这么简单而能从每个工人的头脑中独立产生出来的……社会主义……也决不是在工人的头脑中‘自然而然’生长起来的……社会主义理论是由生活和知识的全部发展过程准备起来的……并且是由具有这种知识的天才头脑创造出来的。社会主义思想在工人中间的传

播,几乎在整个欧洲大陆上,都是由那些在上层阶级的学校里受过教育的社会主义者开始的。”

现在我们来听一听在新《火星报》(第70号和第71号)上郑重其事地反对列宁的普列汉诺夫所说的话吧。事情发生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普列汉诺夫驳斥马尔丁诺夫而为列宁辩护。当时,普列汉诺夫责备马尔丁诺夫,说他抓住了列宁的一句话,而忽略了《怎么办》一书的全文,然后普列汉诺夫继续说:

“马尔丁诺夫同志的手法使我想起了一个书报检查官的话:‘把“我们的父”那篇祷告词给我,让我从中抽出一句话来,我可以给你们证明,它的作者是应该判处绞刑的。’然而,不仅马尔丁诺夫同志一个人而且还有许许多多的人对这句倒霉话列宁的话的一切责难全是出于误解。马尔丁诺夫同志引证恩格斯的话:‘现代社会主义是现代工人运动在理论上的表现。’列宁同志也同意恩格斯的意见……但要知道,恩格斯的话乃是一般原理。问题在于究竟是谁最先阐述了这一理论上的表现。列宁所写的不是一篇论述历史哲学的学术论文,而是一篇反对‘经济派’的辩论文章,‘经济派’硬说:我们应当静待工人阶级不用‘革命霉菌’即社会民主党的帮助而独自达到的结局。其所以禁止社会民主党向工人进行宣传,正因为它是‘革命霉菌’,正因为它具有理论的意识。但如果你们把‘霉菌’去掉,那就只剩下没有觉悟而必须从外面把意识灌输进去的群众了。假如你们愿意公正地对待列宁并把这部书仔细地读一遍,那么你们就会看到列宁所说的正是这一点。”

普列汉诺夫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是这样说的。

然而,正是受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斯塔罗维尔

《曙光》杂志¹⁸第4期第79—80页。

见圣经《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6章第9—13节。——编者注

《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第123页。

等等唆使的同一位普列汉诺夫,过了几个月再出来说话的时候,竟抓住他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辩护过的列宁的同一句话,宣称列宁和“多数派”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知道,如果从“我们的父”那篇祷告词中抽出一句话来断章取义地加以解释,那么它的作者恐怕要因背叛上帝而受绞刑的。他知道这样做是不公正的,一个公正的批评家是不会这样做的,但他还是从列宁的书中抽出这句话来,他还是不公正地做去,当众打自己的嘴巴。而马尔托夫、查苏利奇、阿克雪里罗得和斯塔罗维尔则附和着他,由他们自己负编辑责任,把普列汉诺夫的文章登在新《火星报》(第70号和第71号)上,因而再一次使他们自己丢脸。

为什么他们表现得这样没有气节,为什么“少数派”的这些领袖们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为什么他们否认由自己署名登在《火星报》上的那篇纲领性的论文,为什么他们自食其言呢?什么时候听说社会民主党内有过这样颠倒是非的丑事?

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和普列汉诺夫的文章发表以前这几个月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从原有的六个编辑中只选出了三个即普列汉诺夫、列宁和马尔托夫来担任《火星报》的编辑。至于阿克雪里罗得、斯塔罗维尔和查苏利奇三人,代表大会则指定他们去担任别的职务了。代表大会当然有权这样做,而且每个人都应服从它的决定,因为代表大会是全党意志的体现者,是党的最高机关,谁反对它的决定,谁就是践踏党的意志。

可是这些固执的编辑却没有服从党的意志,没有服从党的纪律(党的纪律也就是党的意志)。原来党的纪律是专为我们这种普通工作者编造的,他们痛恨代表大会没有把他们选为编辑,于是退到一边,并把马尔托夫勾引过去组成了反对派。他们对党宣布抵制,拒绝党的工作,并开始威吓党说,把我们选进编辑部、中央委员

会和党总委员会¹⁹去,不然我们就要制造分裂。于是分裂开始了。这样,他们又一次践踏了党的意志。

下面就是这些罢工的编辑提出的要求:

“恢复《火星报》旧编辑部 就是说,让我们在编辑部占三个位置。

把一定数量的反对派分子 即“少数派”加进中央委员会去。让反对派分子在党总委员会中占两个位置等等……

我们提出的这些条件是使党内不至发生威胁全党生存的冲突的唯一保证。”(就是说,要满足我们的要求,不然我们就要在党内制造大分裂。)

党怎样回答他们呢?

党的代表者(中央委员会)和其他同志向他们声明说:我们不能违反党代表大会的决议,选举是代表大会的事情,可是我们仍然企图恢复和平和一致,老实说,争位置已经是可耻的了,而你们却为了争位置要来分裂党,等等。

罢工的编辑们生气了,他们不大自在,——他们确实是为了争位置而发动斗争的,——他们把普列汉诺夫拉了过去,开始干起他们的英雄事业来了。他们必须在“多数派”和“少数派”之间硬找出某种更“厉害的”“意见分歧”,借以证明他们并不是为了争位置。

《对同盟代表大会记录的述评》第 26 页。

也许读者要问:这位热烈拥护过“多数派”的普列汉诺夫怎么会转到“少数派”方面去了呢?原来是他和列宁之间发生了意见分歧。当“少数派”暴怒起来并宣布抵制的时候,普列汉诺夫就认为必须完全让步。列宁不同意他的意见。普列汉诺夫就渐渐倾向“少数派”了。他们之间的意见分歧更加扩大了,普列汉诺夫终于变成了列宁和“多数派”的反对者。关于这一点列宁写道:

“……过了几天,我真的同一位总委员会委员一起去见普列汉诺夫,当时,我们和普列汉诺夫的谈话是这样进行的:

——要知道,世界上有一种爱吵闹的老婆 即指‘少数派’,对这样的老婆

他们东找西找,结果在列宁的书中找到了一段话,如果把这段话同原文割裂开来,断章取义地加以解释,确实可以吹毛求疵地骂一通。“少数派”的领袖们暗中想道:这个主意妙极了,列宁是“多数派”的领导人,我们糟蹋了列宁,就能把党拉到自己方面来。于是普列汉诺夫那一套论调就来了,说什么“列宁及其追随者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诚然,他们今天拚命攻击的,就是他们昨天还在拥护的列宁书中的那种思想,但有什么办法:机会主义者之所以称为机会主义者,正因为他们是不尊重原则性的。

这就是他们自己打自己嘴巴的缘故,这就是他们颠倒是非的根源。

但还不止于此。

过了一些时候,他们看出,除了几个幼稚的人而外,谁也没有理睬他们反对“多数派”和列宁的那种煽动,他们看到“事情”不妙,于是决定再来粉饰一番。同一个普列汉诺夫、同一个马尔托夫和同一个阿克雪里罗得又于1905年3月10日用党总委员会的名义通过了一项决议,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同志们!他们向‘多数派’说……双方即‘多数派’和‘少数派’都曾屡次表示自己确信:现有的策略上组织上的意见分歧,并不是一种使双方不能在统一的党组织范围内进行工作的意见分

必须让步,免得她痴疯癫癫、当众大吵大闹起来。——普列汉诺夫这样说道。

——也许是这样,但即使是让步,自己也要保持力量,使更大的‘吵闹’不致发生。——我回答说。”(见《对同盟代表大会记录的述评》第37页,那里引证了列宁的信。(参看《列宁全集》第7卷第181页。——编者注))

列宁和普列汉诺夫没有达成协议。从这时起,普列汉诺夫就开始转到“少数派”方面去了。

我们根据可靠的消息得知,普列汉诺夫又在离开“少数派”,并已创办了自己的机关刊物《社会民主党人日志》²⁰。

歧。”他们说,因此我们要召集同志裁判会(由倍倍尔等组成)来解决我们之间的小小争执。

一句话,党内的意见分歧不过是一种可以由同志裁判会来解决的意气之争,而我们大家——他们说——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然而怎么会这样呢?人居然号召我们这些“非马克思主义者”到党组织中去,说我们大家还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等等……这是什么意思呢?“少数派”的领袖们,要知道这是你们叛变了党!难道可以委任“非马克思主义者”担负党的领导职务吗?难道社会民主党内有“非马克思主义者”立足的余地吗?或许是你们也叛变了马克思主义,所以改变了阵线吧?

然而,若要等待他们回答,就未免太幼稚了。原来这些妙不可言的领袖们在口袋里装着几种“原则”,需要哪一种就掏出哪一种来。你看他们是多么反复无常呵!……

所谓“少数派”的领袖就是这样的。

不难想象,跟随在这种领袖后面的喽罗们,即梯弗利斯的所谓“少数派”该是些什么样的人了……还有一件不幸的事,就是尾巴有时不听头脑的指挥,不肯服从它。例如在“少数派”的领袖们认为可能调解并号召党的工作人员取得一致时,而梯弗利斯的“少数派”及其《社会民主党人报》却继续在那里大闹特闹,说“多数派”和“少数派”之间的斗争是“生死存亡的斗争”,所以我们一定要厮杀一番!真是各人唱各人的调子。

“少数派”埋怨我们把他们叫作机会主义者(无原则的分子)。可是,既然他们自食其言,既然他们出尔反尔,既然他们始终动摇,

《火星报》第91号第3版。

见《社会民主党人报》创刊号。

试问,这不叫作机会主义又叫作什么呢?难道一个真正的社会民主党人能常常改变自己的信念吗?要知道,就连手帕也不是这样经常更换的。

我们那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味固执地说,“少数派”具有真正的无产阶级性格。真是这样的吗?好,我们来看看吧。

考茨基说:“无产者比较容易接受党的原则,他倾向于不以一时情绪、不以个人利益或局部利益为转移的原则性的政策。”

而“少数派”呢?他们也是倾向于这种不以一时情绪和其他东西为转移的政策吗?恰恰相反,他们经常摇摆,他们永远动摇,他们憎恨坚定的原则性的政策,他们宁愿采取无原则的立场,他们听从一时的情绪的驱使。至于事实,我们早已知道了。

考茨基说:“无产者喜爱党的纪律,“无产者在他还是孤零零的个体时是没有什么力量的。他的全部力量,他走向进步的全部能力,他的一切希望和愿望,都是从组织中……汲取来的。……”正因为如此,所以他不为个人利益所诱,不为个人荣誉所惑,他“在指定的任何岗位上都履行自己的职责,自愿地服从那贯穿在他的全部情感和全部思想中的纪律”。

而“少数派”呢?他们也是这样被纪律性所贯穿的吗?恰恰相反,他们藐视党的纪律,嘲笑党的纪律。“少数派”的领袖们就是天字第一号破坏党内纪律的人。请你们回想一下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斯塔罗维尔、马尔托夫及其他不服从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的人们吧。

《爱尔福特纲领解说》中央委员会版第 88 页。

见列宁《进一步,退两步》第 93 页,那里引证了考茨基的这些话(见《列宁全集》第 7 卷第 316 页。——编者注)。

见《同盟代表大会记录》。

考茨基继续说：“知识分子却完全不是这样的。”他服从党的纪律是很勉强的，是迫不得已，而不是出于自愿的。“他认为纪律只有群众才需要去遵守，而上等人物是不必遵守的。至于他自己，当然是属于上等人物之列的……李卜克内西是……理想的知识分子的榜样，他充满了无产阶级的情绪，他……在指定给他的任何岗位上工作，他使自己完全服从于我们的伟大事业，并鄙视……知识分子一落到少数地位时……的那种颓丧的啜泣。这里还可以举马克思为例，他从来没有想要出什么风头，他在国际中不止一次地处于少数地位，每次他都十分严格地服从党的纪律。”

而“少数派”呢？他们在什么地方表现过“无产阶级的情绪”呢？他们的行为象李卜克内西和马克思那样吗？恰恰相反，我们看到“少数派”的领袖们并没有使自己的“我”服从于我们的神圣事业；我们看到正是这些领袖们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落到少数地位时”，就沉溺于“颓丧的啜泣”；我们看到，在代表大会后，正是他们为了争夺“头等位置”而痛哭起来，并且正是为了争夺这种位置而挑起了党内的分裂……

可敬的孟什维克，这就是你们的“无产阶级性格”吗？

孟什维克向我们问道：那么，为什么某些城市的工人站在我们这方面呢？

是的，不错，在某些城市中工人们是站在“少数派”方面的，但这并不能证明什么。在某些城市中工人们也跟着修正主义者（德国的机会主义者）走，但这并不是说修正主义者的立场是无产阶级的立场，这并不是说他们不是机会主义者。有一次，连乌鸦也找到了

见列宁《进一步，退两步》第93页，那里引证了考茨基的这些话（见《列宁全集》第7卷第316页和第317页。——编者注）。

玫瑰花 ,但这并不是说乌鸦就是夜莺。难怪俗语说 :

乌鸦一找到了玫瑰花 ,

就把自己当作夜莺夸。

* *

*

现在很清楚 ,党内的意见分歧究竟是在什么基础上发生的。显然 ,我们党内暴露了两种趋向 :无产阶级坚定性的趋向和知识分子动摇性的趋向。现在的“少数派”就是这种知识分子动摇性的表现者。梯弗利斯“委员会”及其《社会民主党人报》就是这个“少数派”的驯服的奴隶 !

全部问题就在这里。

诚然 ,我们那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常常叫喊说他们反对“知识分子的心理” ,并且他们还企图责备“多数派”有“知识分子的动摇性” ,但这很象一个贼偷了别人的钱 ,却大声叫喊 :“捉贼呀 !”

此外 ,大家知道 ,谁害什么病 ,谁就老谈这种病。

1905年5月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高加索联合会委员会印成小册子
出版
原文是格鲁吉亚文

选自《斯大林全集》第1卷
第79—117页

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²¹

俄国的反革命时期不仅带来了“雷鸣电闪”，而且带来了运动的悲观失望、对共同力量的怀疑顾虑。从前人们相信“光明的未来”，所以大家不分民族地共同进行斗争：共同的问题高于一切。后来人们心中发生了疑问，于是大家开始分手四散，回到民族的院落里去：让各人只靠自己吧！“民族问题”高于一切！

同时国内经济生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905年不是白白过去的：农村中的农奴制残余又受到了一次打击。连年饥荒之后的几次丰收和接着到来的工业高涨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农村中的分化和城市的发展，商业和交通的发展，都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这种情形在边疆地区尤其显著。可是这种情形不能不加速俄国各民族内部经济结合的过程。于是这些民族必然要行动起来……

这一时期所确立的“宪制”也在这方面起了唤醒各民族的作用。报纸和各种书刊的增多，出版事业和文化机关的某些自由，民族剧院的发展等等，无疑地都加强了“民族意识”。杜马及其选举运动和政治集团给各个民族的活跃造成了新的机会，给各个民族的动员提供了新的广阔场所。

可是从上层掀起的黠武的民族主义浪潮，“当权人物”由于边疆地区“爱好自由”而对它进行报复的种种高压手段，在下层激起了民族主义的反击浪潮，这种民族主义有时变成粗暴的沙文主义。犹太人中的锡安主义²²的加强，波兰的沙文主义的增长，鞑靼人中的

大伊斯兰主义²³，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乌克兰人中民族主义的加强，没有教养的人反犹太主义的共同倾向，——这一切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民族主义的浪潮日益汹涌地逼来，大有席卷工人群众之势。解放运动愈趋低落，民族主义的花朵就愈加怒放。

在这困难的关头，社会民主党负有崇高的使命：给民族主义一个反击，使群众同普遍的“时疫”隔离。因为社会民主党，而且只有社会民主党，才能负起这个使命，用久经考验的国际主义武器，用统一而不可分的阶级斗争去对抗民族主义。民族主义的浪潮来势愈汹涌，社会民主党争取俄国各民族无产者友爱团结的呼声就应当愈响亮。各边疆地区直接接触到民族主义运动的社会民主党人，在这一点上需要有特别的坚定性。

然而并非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首先是各边疆地区的社会民主党人，都能完成这个任务。崩得²⁴从前强调共同的任务，现在却把它自己特殊的纯粹民族主义的目的放在首位，甚至把“过安息日”和“承认犹太语”当作自己竞选运动的战斗性条文。高加索也步崩得的后尘：一部分高加索社会民主党人从前曾和其余的高加索社会民主党人一起否定过“民族文化自治”，现在他们却把它当作迫切的要求提了出来。至于婉转地肯定民族主义动摇的取消派代表会议²⁵，就更不用说了。

由此可见，俄国社会民主党在民族问题上的观点并不是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都已经明白的。

见《崩得第九次代表会议文件汇编》。

见《八月代表会议的通报》。

同上。

显然 ,对于民族问题还必须进行一番认真的和全面的讨论。彻底的社会民主党人应当一致努力消除民族主义的迷雾 ,不管这种迷雾来自何方。

— 民 族

民族(нация)是什么呢？

民族首先是一个共同体 ,是由人们组成的确定的共同体。

这个共同体不是种族的 ,也不是部落的。现今的意大利民族是由罗马人、日耳曼人、伊特拉斯坎人、希腊人、阿拉伯人等等组成的。法兰西民族是由高卢人、罗马人、不列颠人、日耳曼人等等组成的。英吉利民族、德意志民族等也是如此 ,都是由不同的种族和部落的人们组成的。

总之 ,民族不是种族的共同体 ,也不是部落的共同体 ,而是历史上形成的人们的共同体。

另一方面 ,居鲁士帝国或亚历山大帝国虽然是历史上形成的 ,是由不同的部落和种族组成的 ,但无疑地不能称为民族。这不是民族 ,而是偶然凑合起来的、内部缺少联系的集团的混合物 ,其分合是以某一征服者的胜败为转移的。

总之 ,民族不是偶然的、昙花一现的混合物 ,而是由人们组成的稳定的共同体。

然而并非任何一个稳定的共同体都是民族。奥地利和俄国也是稳定的共同体 ,但是谁也不称它们为民族。民族的共同体和国家的共同体有什么区别呢？其中一个区别是民族的共同体非有共同的语言不可 ,国家却不一定要有共同的语言。奥地利境内的捷克民

族和俄国境内的波兰民族不能没有各该民族的共同的语言,而俄国和奥地利内部有许多种语言的事实并不妨碍这两个国家的完整。当然,这里所指的是民众的口头语言,而不是官场的文牍语言。

总之,共同的语言是民族的特征之一。

当然不是说不同的民族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操着不同的语言,也不是说凡操着同一语言的人们一定是一个民族。每个民族都有共同的语言,但不同的民族不一定要有不同语言。没有一个民族会同时操着不同的语言,但并不是说不能有两个民族操着同一语言。英吉利人和北美利坚人操着同一语言,但他们毕竟不是一个民族。挪威人和丹麦人,英吉利人和爱尔兰人也是如此。

但是,象英吉利人和北美利坚人虽然有共同的语言,却不是一个民族,这是什么道理呢?

首先因为他们不是生活在一起,而是生活在不同的地域。只有经过长期不断的交往,经过人们世代代的共同生活,民族才能形成起来。而长期的共同生活又非有共同的地域不可。从前英吉利人和美利坚人居住在一个地域,即居住在英国,所以当时是一个民族。后来一部分英吉利人从英国迁移到新的地域,迁移到美洲,于是在这个新的地域逐渐形成了新的民族,即北美利坚民族。由于有不同的地域,结果就形成了不同的民族。

总之,共同的地域是民族的特征之一。

但这还不够。单有共同的地域还不能形成民族。要形成民族,除此以外,还需要有内部的经济联系来把本民族中各部分结合为一个整体。英国和北美利坚之间没有这种联系,所以它们是两个不同的民族。但是,假如北美利坚各地未因彼此分工、交通发达等等而联成一个经济上的整体,那么北美利坚人本身也就不配叫作民族。

就拿格鲁吉亚人来说吧。改革前时期²⁶的格鲁吉亚人虽然生活在共同的地域,操着同一语言,可是严格说来,他们当时还不是一个民族,因为他们被分割成许多彼此隔离的公国,未能过共同的经济生活,长期互相混战,彼此破坏,往往假借波斯人和土耳其人的手来自相残杀。虽然有时某个侥幸成功的皇帝也曾勉强把各个公国统一起来,然而这种昙花一现的偶然的统一,至多也只是表面的行政上的统一,很快就因王侯跋扈和农民漠视而分崩离析了。而且在格鲁吉亚经济分散的情况下,也不能不这样……直到十九世纪下半叶格鲁吉亚才作为民族出现,因为当时农奴制度的崩溃和国内经济生活的发展,交通的发达和资本主义的产生,使格鲁吉亚各个地区之间实行了分工,彻底打破了各个公国在经济上的闭关自守状态,而把这些公国联成一个整体。

其他一切度过了封建主义阶段并发展了资本主义的民族也是如此。

总之,共同的经济生活、经济上的联系是民族的特征之一。

但这还不够。除了上面所说的一切,还必须注意到结合成一个民族的人们在精神面貌上的特点。各个民族之所以不同,不仅在于它们的生活条件不同,而且在于表现在民族文化特点方面的精神面貌不同。英吉利、北美利坚和爱尔兰虽然操着同一种语言,但终究是三个不同的民族,它们历代因生存条件不同而形成的特殊的心理素质,在这一点上是起了不小的作用的。

当然,心理素质本身,或者象人们所说的“民族性格”本身,在旁观者看来是一种不可捉摸的东西,但它既然表现在一个民族的共同文化的特点上,它就是可以捉摸而不应忽视的东西了。

不用说,“民族性格”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生活条件变化的,但它既然存在于每个一定的时期内,它就要在民族面貌上打上

自己的烙印。

总之,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的特征之一。

这样,我们就说完了民族的一切特征。

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

同时,不言而喻,民族也和任何历史现象一样,是受变化规律支配的,它有自己的历史,有自己的始末。

必须着重指出,把上述任何一个特征单独拿来作为民族的定义都是不够的。不仅如此,这些特征只要缺少一个,民族就不成其为民族。

假定有一些人具有共同的“民族性格”,但是他们在经济上彼此隔离,生活在不同的地域,操着不同的语言等等,那么还是不能说他们是一个民族。例如俄国的、加里西亚的、美国的、格鲁吉亚的和高加索山区的犹太人就是如此,在我们看来,他们并不是统一的民族。

假定有一些人具有共同的地域和共同的经济生活,但是他们没有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民族性格”,那么他们仍然不是一个民族。例如波罗的海沿岸边疆区的德意志人和拉脱维亚人就是如此。

最后,挪威人和丹麦人虽然操着同一语言,可是由于缺少其他特征,他们也就不是一个民族。

只有一切特征都具备时才算是一个民族。

也许有人会觉得“民族性格”不是民族的特征之一,而是民族的唯一本质的特征,其他一切特征其实都是民族发展的条件,而不是民族的特征。例如有名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民族问题理论家鲁·施普林格,特别是奥·鲍威尔,就持有这样的观点。

现在我们就来考察一下他们的民族理论吧。

在施普林格看来，“民族是思想相同和语言相同的人们的联盟”。民族是“由一群现代人组成的、和‘地域’无关的文化共同体”。（黑体是我们用的）

总之，就是思想相同和语言相同的人们的“联盟”，不管他们彼此怎样隔离，不管他们住在什么地方。

鲍威尔却更进一步。

他问道：“什么是民族呢？它是不是那种把人们联合为民族的语言共同体呢？**英吉利人和爱尔兰人……操着同一语言，却不是统一的民族，犹太人并没有共同的语言，却是一个民族。**”

那么，民族究竟是什么呢？

“民族就是相对的性格共同体。”

然而性格（这里讲的是民族性格）又是什么呢？

民族性格是“一个民族的人区别于另一个民族的人的种种特征的总和，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另一个民族的生理特质和精神特质的总和”。

鲍威尔当然知道民族性格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因此他补充说：

“人们的性格无非是由他们的命运决定的”，“……民族无非是命运的共同体”，而命运共同体又是“由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和分配自己的劳动产品时所处的条件”决定的。

见鲁·施普林格的《民族问题》1909年公益出版社版第43页。

见奥·鲍威尔的《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1909年镰刀出版社版第1—2页。

同上，第6页。

同上，第2页。

同上，第24—25页。

于是,我们就得出如鲍威尔所说的民族的最“完备的”定义了。

“民族就是那些在共同命运的基础上结合成共同性格的人们的集合体。”

总之,在共同命运的基础上结合成的共同的民族性格,并不一定和共同的地域、语言以及经济生活相联系。

这样一来,民族还剩下什么东西呢?经济上彼此隔离、生活在不同的地域、世世代代都操着不同语言的人们,还谈得上什么民族共同体呢?

鲍威尔说犹太人是民族,虽然“他们并没有共同的语言”,可是,例如格鲁吉亚的、达吉斯坦的、俄国的和美国的犹太人,既然彼此完全隔绝,生活在不同的地域,并且操着不同的语言,他们还谈得上什么“共同命运”和民族联系呢?

这些犹太人无疑地和格鲁吉亚人、达吉斯坦人、俄罗斯人以及美利坚人过着共同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受着共同文化的熏陶,这就不能不给他们的民族性格打上烙印;如果他们中间还有什么共同的东西,那就是宗教、共同的起源和民族性格的某些残余。这一切是用不着怀疑的。可是,怎么能认真地说,僵化的宗教仪式和日渐磨灭的心理残余会比这些犹太人所处的现实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更强烈地影响到他们的“命运”呢?而只有在这样的假定下,才可以说犹太人是统一的民族。

那么,鲍威尔的所谓民族和唯灵论者²⁷的所谓神秘的独立自主的“民族精神”又有什么区别呢?

鲍威尔在民族“特点”(民族性格)和民族生活“条件”之间划了

见奥·鲍威尔的《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1909年镰刀出版社版第139页。
同上,第2页。

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把它们彼此隔离开来。然而民族性格如果不是生活条件的反映,不是从周围环境得来的印象的结晶,那又是什么呢?怎能仅限于民族性格而把它和它所由产生的根源割断分开呢?

其次,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当北美利坚还叫作“新英格兰”的时候,英吉利民族和北美利坚民族究竟有什么区别呢?当然不是民族性格上的区别,因为北美利坚人是从英国迁移过去的,他们带到美洲去的除英吉利语言以外,还有英吉利的民族性格,虽然他们在新环境的影响下大概已开始形成自己特有的性格,但他们当然不会很快就丧失其英吉利的民族性格。当时他们和英吉利人在性格上虽然还有或多或少的共同点,但他们毕竟已经是和英吉利民族不同的一个民族了!显然,当时“新英格兰”民族不同于英吉利民族的地方并不是特别的民族性格,或者与其说是民族性格,倒不如说是和英吉利民族不同的环境即生活条件。

由此可见,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唯一的民族特征,而只有各种特征的总和。在把各种民族拿来作比较的时候,显得比较突出的有时是这个特征(民族性格),有时是那个特征(语言),有时又是另一个特征(地域、经济条件)。民族是由所有这些特征结合而成的。

鲍威尔把民族和民族性格看成一个东西,这样就使民族脱离了它的根基,把它变成了不见形迹的独立自主的力量。结果就不是有生命的活动着的民族,而是一种神秘的、不可捉摸的、非人世间的东西。试问,——我重说一遍,——象格鲁吉亚的、达吉斯坦的、俄国的、美国的和其他地方的犹太人,彼此语言不通(他们操着不同的语言),生活在地球上不同的地方,从来不能见面,无论和平时或战争时期都不会共同行动,这算什么犹太民族呢?!

不,社会民主党不是为这种纸上的“民族”制定自己的民族纲

领的。它只能承认那些活动着的、运动着的,因而使人们不能不承认的真正的民族。

鲍威尔显然把民族这一历史范畴和部落这一民族学范畴混淆起来了。

不过,鲍威尔本人大概也觉得自己的立论是有弱点的。他在自己那本书的开头虽然坚决地说犹太人是一个民族,但他在该书末尾就自行修正,肯定说“资本主义社会根本就不让他们犹太人保全为一个民族”,而使他们受其他民族的同化。其所以如此,原来是“犹太人没有单独的居住地区”,而捷克人却有这样的地区,因此,鲍威尔认为捷克人一定能保全为一个民族。简言之,原因就在于没有地域。

鲍威尔如此推论,原想证明民族自治不能成为犹太工人的要求,他这样一来却无意中驳倒了他自己那种否认共同的地域是民族特征之一的理论。

可是鲍威尔不以此为限。他在自己那本书的开头坚决地说:“犹太人并没有共同的语言,却是一个民族。”可是他刚刚写到第一三页就改变了阵线而同样坚决地说:“无疑地,没有共同的语言,就不可能有什么民族。”(黑体是我们用的)

鲍威尔在这里原想证明“语言是人类交际最重要的工具”,但他同时无意中证明了他不想证明的东西,证明了自己那种否认

见他的书第2页。

同上,第389页。

见第388页。

见第396页。

见第2页。

见第130页。

同上,第130页。

共同语言的意义的民族理论是站不住脚的。

用唯心论的针线缝成的理论就这样不攻自破了。

二 民族运动

民族不是普通的历史范畴,而是一定时代即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封建制度消灭和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同时就是人们形成民族的过程。例如西欧的情形就是如此。英吉利人,法兰西人、德意志人、意大利人等都是在资本主义打破封建割据局面而胜利前进时形成为民族的。

但是,西欧各民族形成的过程同时就是它们变为独立的民族国家的过程。英吉利、法兰西等民族同时就是英吉利等国家。处于这一过程以外的爱尔兰并不能改变总的情景。

东欧的情形却有些不同。当西欧各民族发展成国家的时候,东欧却形成了多民族的国家,即由几个民族组成的国家。奥匈帝国和俄国就是这样的国家。在奥地利,当时政治上最为发展的是德意志人,于是他们就负起了把奥地利各民族统一成一个国家的任务。在匈牙利,最能适应国家组织性的是匈牙利各民族的中坚——马扎尔人,于是他们成了匈牙利的统一者。在俄国,是以历史上形成的强大而有组织的贵族军事官僚为首的大俄罗斯人担负了统一各民族的使命。

东欧的情形就是如此。

只有在封建制度还没有消灭、资本主义还不大发达、被排挤到次要地位的各民族在经济上还没有结合成完整的民族的条件下,才能有这种特殊的国家形成方式。

可是资本主义在东欧各国也开始发展起来了。商业和交通日益发达,大城市相继出现,各民族在经济上逐渐结合起来。资本主义闯进了被排挤的各民族的平静生活中,惊醒了它们,使它们行动起来。报刊和剧院的发展,莱希斯拉特(奥地利)和杜马(俄国)的活动,都加强了“民族意识”。新兴的知识分子充满了“民族思想”,并在这方面进行活动……

但是那些觉醒起来要求独立生活的被排挤的民族已不能形成独立的民族国家了,因为它们在自己的道路上碰到了早已居于国家领导地位的统治民族中的领导阶层极其强烈的反对。它们来迟了!……

奥地利的捷克人和波兰人等等,匈牙利的克罗地亚人等等,俄国的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乌克兰人、格鲁吉亚人和亚美尼亚人等等就是这样形成民族的。在西欧(爱尔兰)是例外的,在东欧却成了通例。

西欧的爱尔兰用民族运动回答了这种例外的情形,东欧已觉醒的各民族也不免要这样回答。

推动东欧各个年轻民族去进行斗争的情况就是这样形成的。

其实,斗争并不是在整个民族和整个民族之间,而是在统治民族的和被排挤民族的统治阶级之间开始并激烈起来的。通常是被压迫民族中的城市小资产阶级起来反对统治民族中的大资产阶级(捷克人和德意志人),或者被压迫民族中的农村资产阶级起来反对统治民族中的地主(波兰的乌克兰人),或是被压迫民族中的整个“民族”资产阶级起来反对统治民族中的执政贵族(俄国的波兰、立陶宛、乌克兰)。

资产阶级是主角。

在年轻的资产阶级看来,市场是基本问题。它的目的是销售自己的商品,战胜和自己竞争的异族资产阶级。因此,它力求保证自

已有“自己的”“本族的”市场。市场是资产阶级学习民族主义的第一个学校。

但问题通常不仅限于市场。统治民族中的半封建半资产阶级的官僚常用他们“只捉不放”²⁸的方法干预斗争。于是统治民族中的资产阶级,不论小资产阶级或大资产阶级,就有可能“更迅速地”“更坚决地”制服自己的竞争者。“力量”既日趋统一,限制“异族”资产阶级的一连串办法以至高压手段也就开始实行起来了。斗争由经济范围转入政治范围。限制迁徙自由,限制语言使用,限制选举权,减少学校,限制宗教活动等等办法纷纷加到“竞争者”的头上。当然,采取这种办法的目的不仅是为了统治民族中的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且可以说是为了执政官僚们特殊集团的目的。但结果都是一样:资产阶级和官僚在这种场合总是携手并进的,不论奥匈帝国或俄国,情形都是如此。

被压迫民族中受各方面排挤的资产阶级自然要行动起来。它向“下层同胞”呼吁,开始高呼“祖国”,把自己的私事冒充全民的事情。它为着……“祖国”的利益而在“同胞”中间给自己招募军队。“下层”对这种号召并非始终不理,有时也在资产阶级旗帜的周围集合起来,因为上层的高压手段也在触犯它们,引起它们的不满。

民族运动就是这样开始的。

民族运动的力量取决于该民族广大阶层即无产阶级和农民参加运动的程度。

无产阶级是否站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旗帜下面,这要看阶级矛盾的发展程度,要看无产阶级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觉悟的无产阶级有自己的久经考验的旗帜,它用不着站到资产阶级的旗帜下面去。

至于农民是否参加民族运动,这首先要看高压手段的性质。如

果高压手段触犯到“土地”利益,象在爱尔兰发生过的情形那样,那么广大农民群众就会立刻站到民族运动的旗帜下面去。

另一方面,如果说在格鲁吉亚没有较为严重的反俄罗斯的民族主义,那这首先是因为那里没有使群众产生这种民族主义的俄罗斯地主或俄罗斯大资产阶级。在格鲁吉亚有反亚美尼亚的民族主义,但这是因为那里还有亚美尼亚的大资产阶级在打击着尚未巩固的格鲁吉亚小资产阶级,推动它走向反亚美尼亚的民族主义。

以这些因素为转移,民族运动可能具有群众性而愈益扩展起来(爱尔兰、加里西亚),也可能变成一连串的小冲突,流为无谓的争吵和争取用本族文字写招牌的“斗争”(波希米亚的某些小城市)。

当然,民族运动的内容决不会到处一样,它完全取决于运动所提出的各种不同的要求。爱尔兰的运动具有土地问题的性质,波希米亚的运动带着“语言问题的”性质,这里要求公民权利平等和信教自由,那里要求任用“本族的”官吏或组织本族的议会。在各种不同的要求中往往透露出民族所具有的各种不同的特征(语言、地域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鲍威尔所说的包罗万象的“民族性格”这一要求。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民族性格”就其本身来说是不可捉摸的,约·施特拉塞尔说得对,“政治家对它是奈何不得的”。

民族运动的形式和性质大致如此。

由此可见,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民族斗争是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有时资产阶级也能把无产阶级吸引到民族运动中去,那时民族斗争表面上就会带着“全民的”性质,然而这只是表面上如此。实质上这个斗争始终是资产阶级的,主要是有利于和适合于资产阶

级的。

但决不能因此说无产阶级不应当反对民族压迫政策。

限制迁徙自由,剥夺选举权,限制语言使用,减少学校以及其他种种高压政策使工人受到的损害并不比资产阶级所受到的少,甚至还要多。这种情形只能阻碍被压迫民族内无产阶级精神力量的自由发展。当鞑靼工人或犹太工人还被禁止用本族语言开会和演讲,他们的学校被关闭的时候,自然根本谈不到他们的精神才智的充分发展。

然而民族主义的高压政策对于无产阶级的事业还有另一方面的危险。它把广大阶层的视线从社会问题、阶级斗争问题转移到民族问题,转移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共同”问题。这就会为进行所谓“利益协调”的欺骗宣传、抹杀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在精神上束缚工人打下有利的基础,因而严重地阻碍各族工人的团结事业。如果说很大一部分波兰工人至今还受着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精神束缚,如果说他们至今还站在国际工人运动之外,那么这主要是因为“当权人物”历来的反波兰政策为这种束缚打下了基础,加重了工人们挣脱这种束缚的困难。

但是高压政策并不以此为限。它往往由压迫的“制度”转到挑拨各民族互相残杀的“制度”,转到屠杀和蹂躏的“制度”。当然,后者并不是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可能实现的,但是在可能实现的地方,即在缺乏起码自由的条件下,它往往达到骇人听闻的程度,使工人的团结事业有淹没在血泪中的危险。高加索和南俄有过不少例子。“分而治之”,——这就是挑拨政策的目的。这样的政策如果得逞,就会给无产阶级带来莫大的祸害,使国内各族工人的团结事业受到极大的阻碍。

但工人所关心的是使自己所有的同志完全汇合成一支统一的

跨民族的大军,使他们迅速地彻底地摆脱资产阶级的精神束缚,使任何一个民族的兄弟们的精神力量都能得到充分的和自由的发展。

因此,工人现在反对、将来还要反对从最巧妙的到最粗暴的各种各样的民族压迫政策,同样要反对各种各样的挑拨政策。

因此,各国社会民主党主张民族自决权。

自决权就是:只有民族自己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谁也没有权利利用暴力干涉这个民族的生活,毁坏它的学校和其他机关,破坏它的风俗和习惯,限制它的语言,削减它的权利。

这当然不是说社会民主党要支持一个民族的一切风俗和机关。它反对用暴力压迫民族,仅仅维护由民族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同时要进进行鼓动,反对该民族的一切有害的风俗和机关,使该民族的劳动阶层能够摆脱这些有害的东西。

自决权就是民族能按照自己的愿望去处理自己的事情。它有权按自治原则安排自己的生活。它有权和其他民族建立联邦关系。它有权完全分离出去。每个民族都是自主的,一切民族都是平等的。

这当然不是说社会民主党将维护民族的任何要求。一个民族甚至有恢复旧制度的权利,但这还不是说社会民主党将赞同该民族某个机关的这种决定。社会民主党是保护无产阶级的利益的,而民族则是由不同的阶级组成的,因此,社会民主党的义务和民族的权利是两种不同的东西。

社会民主党为民族自决权而斗争,目的是消灭民族压迫政策,使这种政策没有立足的余地,以便消除民族间的斗争,使它缓和下去,使它减到最小限度。

这就是觉悟的无产阶级的政策同资产阶级力求加剧并扩大民

族斗争、继续并激化民族运动的政策在本质上的区别。

正因为如此,觉悟的无产阶级就不能站到资产阶级的“民族”旗帜下面去。

正因为如此,鲍威尔提出的所谓“进化的民族的”政策就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政策。鲍威尔企图把自己的“进化的民族的”政策和“现代工人阶级的”政策等同起来,就是企图使工人的阶级斗争迁就民族斗争。

民族运动实质上既然是资产阶级的运动,它的命运自然就和资产阶级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只有资产阶级灭亡,民族运动才会彻底灭亡。只有在社会主义世界里,完全的和平才能建立起来。可是把民族斗争减到最小限度,从根本上瓦解它,尽量使它无害于无产阶级,这在资本主义范围内也是可以做到的。瑞士和美国的例子就可以证明这一点。为此就必须使国家民主化,使各个民族有自由发展的可能。

三 问题的提法

民族有权自由决定自己的命运。它有权随意处理自己的事情,当然,也不能侵犯其他民族的权利。这是无可争辩的。

但是,如果注意到民族中多数人的利益,首先是无产阶级的利益,那么民族究竟应当怎样处理自己的事情,民族未来的宪法究竟

见他的书第 166 页。

应当采取怎样的形式呢？

民族有权按自治原则处理自己的事情。它甚至有权分离。但这并不是说它在任何条件下都应当这样做，也不是说自治或分离无论何时何地都有利于该民族，即有利于该民族中的多数，有利于劳动阶层。例如，南高加索的鞑靼民族可以召开本族的议会，并在本族别克和毛拉的摆布之下恢复它的旧制度，决定从国家分离出去。根据民族自决的条文，它是完全有权这样做的。但这对鞑靼民族的劳动阶层是否有利呢？社会民主党能否漠不关心，听任别克和毛拉带领群众去解决民族问题呢？难道社会民主党不应当干预这种事情，不应当给民族意志以一定的影响吗？难道它不应当提出最有利于鞑靼群众的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吗？

但是如何解决才最符合于劳动群众的利益呢？自治，联邦，还是分离呢？

所有这些问题都是要根据该民族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来解决的。

不仅如此，条件也和其他一切事物一样是变化着的，因而在某个时期是正确的解决方法，在另一个时期也许是完全不可以采纳的。

十九世纪中叶，马克思曾主张俄属波兰分离，他是正确的，因为当时的问题是要把较高的文化从破坏它的那种较低的文化中解放出来。当时这个问题不是单纯理论上的问题，不是学院式的问题，而是实践中、实际生活中的问题……

十九世纪末叶，波兰马克思主义者却反对波兰分离，他们也是

别克是南高加索、中亚细亚和土耳其等地王公贵族等上层人士的尊号。毛拉在俄国指伊斯兰教宗教仪式的主持人。——编者注

正确的,因为近五十年来俄国和波兰的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它们在经济和文化方面接近起来了。此外,在这个时期,分离问题已由实践的问题变成至多只能引起国外知识分子注意的学院式的争论问题了。

当然,这并不是说从此就不会出现某种内部和外部的情况,使波兰分离问题重新提上日程。

由此可见,民族问题只有和发展着的历史条件联系起来看才能得到解决。

某个民族所处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条件便是解决该民族究竟应当怎样处理自己的事情和它的未来宪法究竟应当采取什么形式这种问题的唯一关键。同时,很可能每个民族解决问题都需要用特殊的方法。如果在什么地方必须辩证地提出问题,那正是在这个地方,正是在民族问题上。

因此,我们应当坚决反对崩得所创始的那种很流行而又很笼统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方法。我们所指的是有人轻率地拿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和南方斯拉夫社会民主党做榜样,说它们已经解决了民族问题,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只要抄袭它们的解决方法就行了。同时,他们竟以为凡在奥地利是正确的东西,在俄国也是正确的。他们忽略了这方面最重要和最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整个俄国以及俄国境内每个民族生活中的具体历史条件。

例如,请听听有名的崩得分子弗·科索夫斯基的话吧:

“当崩得第四次代表大会讨论到这一问题指民族问题。——约·斯大林注的原则方面时,代表大会中的一位代表根据南方斯拉夫社会民主党的

决议的精神所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博得了全体的赞同。”

结果，“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民族自治。

如此而已 既没有分析俄国的实际情况，也没有弄清俄国境内犹太人的生活条件，首先抄袭了南方斯拉夫社会民主党的解决方法，接着“赞同了”，然后“一致通过了”！崩得分子就是这样提出并“解决”俄国的民族问题的……

然而奥地利和俄国的条件完全不同。因此，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在布隆（1899年）²⁹根据南方斯拉夫社会民主党的决议的精神通过民族纲领（固然有一些小小的修正）时，根本就不是按俄国的情况考虑问题，当然也就不会按俄国的情况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是问题的提法。主张民族文化自治的奥地利理论家、布隆民族纲领和南方斯拉夫社会民主党的决议的解释者施普林格和鲍威尔是怎样提出问题的呢？

施普林格说：“对于多民族的国家究竟能否组成，或具体地说，奥地利各民族是否不得不组成一个政治整体这一问题，我们现在不来回答；我们应认为这些问题已经解决了。在不同意上述可能性和必要性的人们看来，我们的研究当然是没有根据的。我们的主题是：这些民族不得不共同生活；什么样的法律形式才能使它们生活得最好呢？”（黑体是施普林格用的）

总之，出发点就是奥地利国家的完整。

鲍威尔所说的也是如此：

“我们的出发点是假定奥地利各民族将仍然留在它们现在居住的国家联盟以内，于是我们就要问，在这个联盟范围内，各民族相互间的关系和它们全体对于国家的关系将是怎样的呢？”

见弗·科索夫斯基的《民族问题》1907年版第16—17页。

见施普林格的《民族问题》第14页。

见鲍威尔的《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第399页。

又是把奥地利的完整列在第一位。

俄国社会民主党能不能这样提出问题呢？不，不能。其所以不能，在于它一开始就主张民族自决，根据这种主张，民族有分离权。

甚至崩得分子戈尔德勃拉特也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¹⁰上承认俄国社会民主党不能放弃自决的主张。当时戈尔德勃拉特说：

“自决权是丝毫不容反对的。如果某一民族为独立而斗争，那就不要阻拦它，如果波兰不愿和俄国结成‘合法婚姻’，那我们就不要去妨碍它。”

这都是事实。可是由此就应得出结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和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出发点不仅不同，而且根本相反。既然如此，还说得上可以抄袭奥地利人的民族纲领吗？

其次，奥地利人是想用微小的改良、缓慢的步骤来实现“民族自由”的。他们提出民族文化自治作为实际办法时，完全没有指望根本的改变，没有指望他们远景中所没有的民主解放运动。然而，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把“民族自由”的问题和可能的根本改变联系在一起，和民主解放运动联系在一起，他们没有理由指望改良。这就使俄国各民族可能的命运问题发生根本的变化。

鲍威尔说：“当然很难设想民族自治是靠一个重大的决定，靠大胆的坚决行动就可以实现的。奥地利将逐步走向民族自治，这是一个缓慢而痛苦的过程，是艰苦的斗争，由于这种斗争，立法和行政管理将陷于慢性的瘫痪状态。不，新的国家法律制度决不是通过一个重要的立法文件就建立起来的，而是要通过分别为各个地区、各个村社而颁布的许多单项的法令才能建立起来。”

施普林格所说的也是如此。

见鲍威尔的《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第 422 页。

他写道：“我清楚地知道这种机关——民族自治机关。——约·斯大林注不是一年也不是十年可以建立起来的，单是为了改组普鲁士的行政管理机构就用了很长的时间……普鲁士用二十年才完全建立了自己的主要行政机关。因此，请不要以为我不知道奥地利要用多少时间，要克服多少困难吧。”

这一切都是很明确的。但是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能否不把民族问题和“大胆的坚决行动”联系起来呢？他们能否指望局部的改良，指望“许多单项的法令”作为争取“民族自由”的手段呢？既然他们不能而且不应这样做，那么从这里不是可以清楚地看出奥地利人的斗争方法和前途与俄国人完全不同吗？在这种情况下，怎能局限于奥地利人那种片面的不彻底的民族文化自治呢？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主张抄袭的人不指望俄国有“大胆的坚决行动”，或者是他们虽指望有这种行动，但“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最后，俄国和奥地利当前的任务完全不同，因此解决民族问题的方法也应当不同。奥地利生存在议会制度的条件下，目前那里没有议会就不能有什么发展。可是奥地利的议会生活和立法工作往往因各民族政党间的剧烈冲突而完全陷于停顿。这就是奥地利早已患慢性政治危机病的原因。因此，民族问题在那里是政治生活的轴心，是生死存亡的问题。无怪乎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家首先竭力设法解决民族冲突问题，当然是以现存的议会制度为基础用议会方法去解决的……

俄国的情形却不是这样。第一，在俄国，“谢天谢地，没有议会”³⁰。第二，这是主要的，俄国政治生活的轴心不是民族问题而是土地问题。因此，俄国问题的命运即各民族“解放”的命运在俄国是

见施普林格的《民族问题》第 281—282 页。

和解决土地问题,即和消灭农奴制残余也就是和国家民主化联系在一起。这就说明为什么俄国的民族问题并不是独立的和有决定意义的问题,而是更加重要的国家解放这个总问题的一部分。

施普林格写道:“奥地利议会之所以没有成果,只在于每一种改良都在各个民族政党内部引起矛盾而使这些政党的团结受到破坏,于是各政党的领袖们对于一切带有改良气味的东西都竭力回避。奥地利的进步只有在各民族都获得不可剥夺的法律地位时才谈得上;这样就使各民族不必在议会里保持常备的战斗队伍,使各民族有可能去解决各种经济的和社会的任务。”

鲍威尔所说的也是如此:

“民族和平首先是国家所需要的。一个国家决不能容忍立法工作因极无聊的语言问题,因民族边界上某个地方某些激动的人彼此发生一些极小的争执,因每设立一所新的学校而陷于停顿。”

这都是很明白的。但是民族问题在俄国处于完全不同的地位,这也是很明白的。决定俄国进步的命运的并不是民族问题,而是土地问题。民族问题是从属的问题。

总之,有不同的问题提法,有不同的前途和斗争方法,有不同的当前任务。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不顾空间时间地“解决”民族问题的书呆子才会拿奥地利做榜样,才会抄袭它的纲领,这难道不明显吗?

再说一遍:以具体历史条件为出发点,把辩证地提问题当作唯一正确的提问题的方法,——这就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

见施普林格的《民族问题》第 36 页。

见鲍威尔的《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第 401 页。

四 民族文化自治

上面我们已经谈过奥地利民族纲领的形式方面,谈过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不能简单地模仿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和简单地采用它的纲领的那种方法论上的根据。

现在我们谈谈这个纲领的实质。

那么,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民族纲领是怎样的呢?

一句话,这个纲领就是民族文化自治。

第一,这就是说,自治权不是给予主要是住着捷克人或波兰人的捷克或波兰,而是给予一切捷克人和波兰人,不分地域,不管他们居住在奥地利什么地方。

因此,这种自治就叫作民族自治,而不叫作地域自治。

第二,这就是说,分散在奥地利各地的捷克人、波兰人、德意志人等等都以个人资格分别组成完整的民族,并以这样的民族的资格加入奥地利国家。这样,奥地利将不是由各自治区域组成的联盟,而是由不分地域建立起来的各自治民族组成的联盟。

第三,这就是说,为着这种目的而应当给波兰人、捷克人等等建立起来的全民族机关将只管“文化”问题,不管“政治”问题。专门政治性的问题都集中在全奥地利议会(莱希斯拉特)手中。

因此,这种自治还叫作文化自治,民族文化自治。

下面就是 1899 年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在布隆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纲领。

南方斯拉夫社会民主党代表也曾投票拥护这个纲领。见《党的布隆代表大会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1906年版第72页。

纲领上先提到“奥地利民族纠纷阻碍着政治进步”，“彻底解决民族问题……首先是文化上所必需的”；“这个问题只有在根据普遍、直接和平等的选举制建立起来的真正民主的社会里才能得到解决”。然后说：

“只有在完全平等和没有任何压迫的条件下，奥地利各民族的民族特点的保存和发展才有可能。因此，首先必须屏弃官僚的国家集权制和各个领地上的封建特权。

在这种条件下，而且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能消除奥地利的民族纠纷，建立民族秩序，其原则如下：

- 1 奥地利应改组为各民族民主联盟的国家。
- 2 应组成按民族划分的自治团体来代替历代的皇朝封地，每个团体的立法权和行政权均由根据普遍、直接和平等的投票选举出来的民族议院掌管。
- 3 属于同一民族的各自治区域共同组成单一的民族联盟，该联盟完全按自治原则来处理本民族的事务。
- 4 少数民族的权利由帝国议会颁布特别法律加以保障。”

纲领的结语号召奥地利各民族团结起来。

不难看出这个纲领中还留下一些“地域主义”的痕迹，但它大体上是民族自治的纲领。无怪乎第一个鼓吹民族文化自治的施普林格热烈地欢迎这个纲领。鲍威尔也赞同这个纲领，称它为民族自治的“理论上的胜利”；不过为了更明确起见，他才提议用更确

在马·帕宁的俄译本中，“民族特点”译成了“民族个性”（见鲍威尔此书帕宁译本）。帕宁把这个地方译错了，因为在德文原本上并无“个性”一词，那里所说的是“nationlen Eigenart”，即民族特点，而这和“民族个性”是完全不同的。

见 1899 年布隆《党代表大会的讨论》。

见施普林格的《民族问题》第 286 页。

见《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第 549 页。

定的条文代替第四条,其内容是说必须“把每个自治区域内的少数民族组成公法团体”来掌管学校及其他文化事宜。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民族纲领就是如此。

我们来考察一下它的科学根据。

我们来看看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是怎样论证它所鼓吹的民族文化自治的。

我们来看看民族文化自治的理论家施普林格和鲍威尔的意见吧。

民族自治的出发点就是认为民族是和固定的地域无关的人们的联盟。

施普林格说：“民族和地域没有任何本质上的联系,民族是自治的个人联盟。”

鲍威尔也说民族是“不在某个固定地区内独占统治的”“个人的共同体”。

但组成一个民族的人并不总是大批地密集地住在一起的,他们往往分成许多集团而掺杂在别的民族机体中。这是资本主义驱使他们到各个地区和城市去谋生的缘故。可是这些集团既然掺杂在别的民族地区,并在那里占少数,于是在语言、学校等方面就会受到人数众多的当地民族的限制。由此就产生了民族冲突。由此就证明地域自治是“毫无用处的”。照施普林格和鲍威尔的意见,摆脱这种状况的唯一出路是把这个散处全国各地的少数民族组成一个共同的包括各阶级的民族联盟。他们认为只有这样的联盟才能保护少数民族的文化利益,才能消除民族纠纷。

见《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第 555 页。

见施普林格的《民族问题》第 19 页。

见《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第 286 页。

施普林裕说：“必须使各民族有正确的组织，必须给它们以权利和义务……”当然，“法律是容易制定的，但它是否能发生人们所预期的作用呢？……”“要想给民族制定法律，首先就要把这些民族建立起来……”“不组成民族便不能建立民族法和消除民族纠纷。”

鲍威尔也是这样说的，他借口“工人阶级的要求”，提议“根据个人原则把各个少数民族组成一些公法团体”。

但是，怎样组织民族呢？怎样确定某人属于某个民族呢？

施普林格说：“用民族名册来确定某人属于某个民族，居住在一个地区的每个人都应当声明自己属于某一民族。”

鲍威尔说：“个人原则的前提是根据成年公民的自由声明按民族划分居民……”为此就“应当编制民族名册”。

其次：

鲍威尔说：“居住在单一民族区内的一切德意志人以及登记在杂居区的民族名册上的一切德意志人共同组成一个德意志民族，并选出民族委员会。”

应该说，捷克人、波兰人等也是如此。

施普林格说：“民族委员会就是民族文化议会，它有权为管理民族教育、民族文学、艺术和科学，为建立学院、博物馆、美术陈列馆、剧院规定原则和批准经费”等等。

见《民族问题》第 74 页。

同上，第 88—89 页。

同上，第 89 页。

见《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第 552 页。

见《民族问题》第 226 页。

见《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第 368 页。

同上，第 375 页。

见《民族问题》第 234 页。

民族组织及其中央机关就是如此。

照鲍威尔的意见,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主张建立这种包括各阶级的机关是想“使民族文化……成为全体人民的财富,并且用这种唯一可能的办法把民族的全体成员结合成一个民族文化共同体”(黑体是我们用的)。

也许有人认为这一切只和奥地利有关。但是鲍威尔不以为然。他坚决认定在其他和奥地利一样是由几个民族组成的国家里,也必须实行民族自治。

鲍威尔认为:“在多民族的国家里,各民族中的无产阶级都应当提出自己的民族自治要求去对抗有产阶级的民族政策,即夺取政权的政策。”

然后,鲍威悄悄地用民族自治替换了民族自决而继续说:

“这样,民族自治,民族自决,就必然成为多民族国家中各族无产阶级的立宪纲领。”

但他还不以此为限。他深信他和施普林格所“规定的”包括各个阶级的“民族联盟”会成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一种雏形。因为他知道“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将把人类分成一些按民族划分的团体”;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类将分成一些民族自治团体”;“这样一来,社会主义社会无疑地是一幅由许多个人的民族联盟和地域的团体构成的五光十色的图画”;因此“社会主义的民族原则是民族原则和民族自治的最高综合”。

见《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第 553 页。

同上,第 337 页。

同上,第 333 页。

同上,第 555 页。

同上,第 556 页。

同上,第 543 页。

同上,第 542 页。

大概够了……

在鲍威尔和施普林格的著作中就是这样论证民族文化自治的。

最惹人注意的首先是他们用民族自治来替换民族自决的那种莫名其妙的毫无理由的做法。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鲍威尔不懂得自决是什么，或者是他懂得，但不知他为什么竟故意把它缩小了。因为毫无疑问的是：（一）民族文化自治是以多民族国家的完整为前提的，自决却超出了这种完整的范围；（二）自决是赋予民族以全部权利的，民族自治却只限于“文化”权利。这是第一。

第二，将来内外情况完全可能配合成这样，那时某一民族会决定退出多民族的国家，例如退出奥地利，——卢西人社会民主党人在党的布隆代表大会上就曾这样声明他们要把本族人民的“两部分”合并成一个整体。那时，对“各族无产阶级必然要采取的”民族自治怎么办呢？用削足适履的办法把各民族机械地塞进国家完整性的框子里去，这算是什么“解决”问题的方法呢？

其次，民族自治是和民族的整个发展进程抵触的。民族自治提出组织民族的口号，可是，既然实际生活、既然经济发展使得整批的人脱离本民族，并使他们散居各地，试问，怎能人为地把这种民族结合起来呢？无疑地，在资本主义的最初阶段民族逐渐集结起来。可是同样无疑地，在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开始了民族分散的过程，成批人离开本民族出外谋生，以至于完全迁移到国内其他地区去；同时，这些移民就渐渐失去旧有的联系，而在新的地方取得新的联系，一代一代地养成新的风俗习惯，也许还会通晓新的语言。试问，能否把这些彼此隔离的集团合并成统一的民族联盟呢？什么地方竟有这样一种魔箍能把无法统一的东西统一起来呢？例如，难

见《党的布隆代表大会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第 48 页。

道可以把波罗的海沿岸和南高加索一带的德意志人“结合成一个民族”吗？既然这一切都是不可想象的，不可能做到的，那么民族自治和那些力图使历史开倒车的老民族主义者的空想又有什么区别呢？

但民族的统一不仅因移居而逐渐消失，并且由于内部原因，即由于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而消失下去。在资本主义的最初阶段，还可以谈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文化共同性”。然而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和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这种“共同性”开始消失了。在同一民族的雇主和工人再不能互相了解的时候，根本就谈不到民族的“文化共同性”。在资产阶级渴望战争，无产阶级却宣布“以战争对付战争”的时候，还谈得上什么“共同命运”呢？能不能把这些彼此对立的分子组成一个统一的包括各个阶级的民族联盟呢？既然如此，还谈得上“民族的全体成员结合成一个民族文化共同体”吗？因此，民族自治是和阶级斗争的整个进程相抵触的，这不是很明显吗？

我们暂且假定“组织民族”这个口号是可能实现的口号。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议员们为了取得更多的选票而力图“组织”民族，那还可以理解。可是，社会民主党人什么时候竟也开始干起“组织”民族、“成立”民族、“建立”民族的事情来了呢？

在阶级斗争极端尖锐的时代去组织包括各个阶级的民族联盟，这算什么社会民主党人呢？到现在为止，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和其他各国的社会民主党一样，只有一个任务，就是组织无产阶级。可是这个任务看来“已经过时了”。于是施普林格和鲍威尔现在提出一个“新的”更引人入胜的任务，就是“建立”民族，“组织”民族。

不过，逻辑上必然如此：既然采取了民族自治，当然就要接受这个“新的”任务，而接受这个“新的”任务就是离开阶级立场，走上

了民族主义的道路。

施普林格和鲍威尔的民族文化自治是一种精致的民族主义。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的民族纲领责成大家关心“各民族的民族特点的保存和发展”，这也绝不是偶然的。真是异想天开：“保存”南高加索的鞑靼人在“沙黑西-瓦黑西”节日³¹自己打自己这一类的“民族特点”！“发展”格鲁吉亚人的“复仇权”这一类的“民族特点”！……

这种条文只配列在十足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纲领上，它既然出现在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上，那就因为民族自治和这类条文是相容的，而不是相抵触的。

然而对现在的社会不适用的民族自治，对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是更不适用的。

鲍威尔的“把人类分成一些按民族划分的团体”这一预言已被现代人类的整个发展进程驳倒了。民族壁垒并不是在巩固，而是在毁坏，在倒塌。马克思早在四十年代就说过：“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隔离和对立日益消失”，“无产阶级的统治将使它们更快地消失”。人类后来的发展及其资本主义生产的巨大增长，各民族的杂居和人们在愈益广阔的地域上的结合，都十分肯定地证实了马克思的思想。

鲍威尔想把社会主义社会看作“一幅由许多个人的民族联盟和地域的团体构成的五光十色的图画”，其实就是暗中企图用经过改良的巴枯宁的概念来代替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概念。社会主义的历史表明，任何这样的企图本身都包含着必然破产的因素。

至于鲍威尔竭力推崇的“社会主义的民族原则”，那就更不用

见本章前一部分。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0页。——编者注

说了。这个“原则”，在我们看来，就是想用资产阶级的“民族原则”代替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原则。如果民族自治是从这种可疑的原则出发，那就必须承认民族自治只能有害于工人运动。

固然这种民族主义并不如此明显，因为它是用社会主义的辞藻巧妙地伪装起来的，但是正因为如此，它对无产阶级就更加有害。公开的民族主义总可以对付，因为它是不难识破的。要和伪装的和伪装得不易识破的民族主义作斗争，那就困难得多。它既然装上社会主义的铁甲，也就较难攻破和较能持久了。它既然存在于工人中间，散播各民族工人互相猜忌、彼此隔离的有害思想，也就把气氛毒化了。

但是民族自治的害处还不止于此。它不仅造成各民族彼此隔离的基础，而且造成统一的工人运动分裂的基础。民族自治的思想为统一的工人政党分成一些按民族建立的单独的政党造成一种心理上的前提。党一分裂，工会就跟着分裂，结果是彼此完全隔离。统一的阶级运动就这样分成一些单独的民族细流。

奥地利，“民族自治”的故乡，提供了这种现象的最惨痛的例证。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本是一个统一的党，从1897年（党的维姆堡代表大会³²）起它就开始分裂成几个单独的党。从党的布隆代表大会（1899年）采纳了民族自治以后，分裂的程度更加深了，最后竟使一个统一的跨民族的政党分成了现在的六个民族政党，其中捷克族的社会民主党甚至不愿和德意志族的社会民主党打交道。

但是工会和党是有联系的。奥地利党内和工会内的主要工作都是由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员担任的。这就令人担忧党内的分离主义会使工会也走上分离主义的道路而陷于分裂。事实果然如此：工会也按民族分开了。现在甚至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就是捷克族工人破坏德意志族工人的罢工，或在选举市政机关时和捷克族资产

者一起反对德意志族工人。

由此可见 ,民族文化自治并不能解决民族问题。不仅如此 ,它还使民族问题更尖锐 ,更紊乱 ,更容易使工人运动的统一遭受破坏 ,使工人们彼此按民族隔离开来 ,使他们中间的纠纷加剧下去。

这就是民族自治的收获。

五 崩得 ,它的民族主义 ,它的分离主义

上面我们说过 ,鲍威尔虽然认为民族自治对捷克人、波兰人等是必需的 ,但是他反对给犹太人这种自治。对“工人阶级应否为犹太人民要求自治”这个问题 ,鲍威尔回答道 :“民族自治不能成为犹太工人的要求。”根据鲍威尔的意见 ,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不让他们 即犹太人。——约·斯大林注 保全为一个民族”。

简言之 ,犹太民族将不再存在 ,所以无从为谁要求民族自治了。犹太人在被同化着。

对犹太民族命运所持的这种观点并不是新的。马克思早在四十年代就有过这种观点 ,他当时所指的主要是德国的犹太人。考茨基在 1903 年重述过这种观点 ,他当时所指的是俄国的犹太人。现在鲍威尔在谈到奥地利的犹太人时又重述这种观点 ,不过有

见《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第 381、396 页。

同上 ,第 389 页。

见他的《论犹太人问题》1906 年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419—451 页。——编者注)。

见他的《基什尼奥夫惨案和犹太人问题》1903 年版。

一点差别,就是他所否认的不是犹太民族的现在,而是犹太民族的将来。

鲍威尔认为犹太人之所以不能保全为一个民族,在于“犹太人没有单独的居住地区”。这种解释基本上虽然正确,但还没有说出全部真理。问题首先在于犹太人没有一个和土地相联系的广大的稳定的阶层,这样一个阶层是不仅作为民族骨干,而且作为“民族”市场自然地把一个民族联结起来的。俄国的五六百万犹太人只有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四和农业有一些联系。其余百分之九十六从事商业、工业和在城市机关中工作,一般是住在城市里,并分散在俄国各处,无论在哪一省都不占多数。

可见以少数民族资格杂居在其他民族地区的犹太人主要是以工业家、商人和自由职业者的身分为“异”族服务的,在语言等各方面自然也就适应“异族”。所有这一切,再加上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而来的各个民族的日益杂居,就使犹太人受到同化。“特许犹太居住区”的废除只能加速这种同化。

因此,为俄国的犹太人要求民族自治的问题是有些滑稽可笑的:有人竟主张替一个前途被否定、存在与否尚待证明的民族要求自治!

虽然如此,崩得还是采取了这种滑稽可笑的动摇不定的立场,竟在其第六次代表大会上(1905年)通过了主张民族自治的“民族纲领”。

驱使崩得走这一步的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即崩得作为犹太人的、而且仅仅作为犹太人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组织而存在。早在1897年以前,那些在犹太工人

见《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第388页。

中进行工作的社会民主主义小组就已经打算建立一个“纯粹犹太工人组织”。1897年,他们果然建立了这样一个组织,即联合成为崩得了。这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事实上还没有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的时候。从那时起,崩得不断发展和扩大起来,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处境惨淡的时候日益显露头角……可是二十世纪到来了。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开始了。波兰社会民主党成长起来并把犹太工人吸引到群众斗争中去了。俄国社会民主党成长起来并把“崩得”工人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了。崩得那种没有地域基础的民族圈子愈见缩小了。一个问题摆在崩得面前:或者是融化到各民族的总浪潮中去,或者是坚持自己的独立存在,做一个超地域的组织。崩得选择了后者。

所谓崩得是“犹太无产阶级唯一代表”的“理论”就这样形成了。

但是要“简单地”随便为这个奇怪的“理论”作辩护已经不可能了,必须有某种“原则性的”根据、“原则性的”理由才行。民族文化自治就成了这样的根据。崩得从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那里抄袭了民族文化自治就抓住不放。即使奥地利人没有这样的纲领,崩得也一定会想出一个来,以便“从原则上”为自己的独立存在作辩护。

这样,崩得在1901年(第四次代表大会)作了一番怯懦的尝试以后,终于在1905年(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民族纲领”。

第二种情况,即犹太人作为个别的少数民族在各完整地区的其他密集的多数民族中所处的特殊地位。我们已经说过这种地位使犹太人不成其为一个民族,使他们走上被同化的道路。但这是客观的过程。主观上,在犹太人头脑中,这一过程却引起了反应,提出

见卡斯切梁斯基编的《民族运动的形式》(指《现代国家民族运动的形式》。——编者注)第772页。

了保障少数民族权利、保障不受同化的问题。崩得既然宣扬犹太“民族”富有生命力,就不能不采取主张“保障”的立场;既然采取了这种立场,就不能不采纳民族自治。因为,如果崩得能够抓住什么自治,那就只能是民族自治,即民族文化自治:犹太人的地域上政治上的自治是谈不上的,因为犹太人没有一定的完整的地域。

值得注意的是崩得一开始就强调说,民族自治的特点就是保障少数民族的权利,保障民族的“自由发展”。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崩得代表戈尔德勃拉特说民族自治就是“保障它们即各个民族。——约·斯大林注 充分自由发展文化的机关”,这也不是偶然的。崩得思想的拥护者也是抱着这种主张加入社会民主党第四届杜马党团的……

崩得就这样采取了主张犹太人民族自治的可笑的立场。

上面我们已经分析了民族自治。这一分析说明了民族自治导致民族主义。下面我们会看到崩得果然得到了这样的结局。不过崩得还从特殊方面即从保障少数民族权利方面来考察民族自治。我们也就从这个特殊方面来分析问题吧。这样做之所以尤其必要,是因为少数民族问题(不仅是犹太少数民族问题)对社会民主党具有重大的意义。

总之,就是“保障”各民族“充分自由发展文化的机关”。(黑体是我们用的。——约·斯大林注)

但“保障……的机关”等等究竟是什么呢?

这首先就是施普林格和鲍威尔的“民族委员会”,一种类似掌管文化事宜的议会。

可是这种机关能否保障民族“充分自由发展文化”呢?掌管文化事宜的某种议会能否保障民族免于民族主义的迫害呢?

见《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第 176 页。

崩得认为能保障。

但历史证明恰恰相反。

俄属波兰曾经有过议会,一种政治性的议会,它当然力求保障波兰人自由“发展文化”,可是它不但没有做到这一点,反而在同俄国总的政治条件作力量悬殊的斗争中垮台了。

芬兰早就有了议会,它也力求保护芬兰民族不受“侵犯”,但它在这方面究竟有多少成绩是有目共睹的。

当然,议会是有各种各样的,对付按民主原则组织起来的芬兰议会不象对付贵族的波兰议会那样容易。但是有决定意义的终究不是议会本身,而是俄国总的制度;如果俄国目前还象过去一样,象废除波兰议会时一样,存在着野蛮的亚洲式的社会政治制度,那么芬兰议会的处境就要坏得多。况且“侵犯”芬兰的政策正在加紧推行,决不能说这种政策遭受过失败……

历史上形成的老机关政治议会尚且如此,新的议会,新的机关,尤其象“文化”议会这样软弱的机关,就更不能保障民族的自由发展了。

问题显然不在于“机关”,而在于国内总的制度。国家没有民主化,民族“充分自由发展文化”也就没有保障。可以肯定地说,国家愈民主,对“民族自由”的“侵犯”就愈少,免受“侵犯”的保障就愈多。

俄国是半亚洲式的国家,所以这里的“侵犯”政策往往采取极粗暴的方式,即蹂躏的方式。不用说,所谓“保障”在俄国是少到最低限度的。

德国已经是多少有些政治自由的欧洲式的国家。无怪乎那里的“侵犯”政策从来不采取蹂躏的方式。

在法国,“保障”当然更多些,因为法国比德国民主。

瑞士更不用说了。那里由于有高度的、虽然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各民族都自由地生活着,不管它们是少数还是多数。

总之,崩得硬说“机关”本身能保障各民族充分发展文化,这是十分荒唐的。

也许有人会指出,崩得自己也认为俄国的民主化是“建立机关”和保障自由的先决条件。但这是不对的。从《崩得第八次代表会议文件汇编》中可以看出,崩得想在俄国现存制度的基础上通过“改革”犹太教公会去达到成立这种“机关”的目的。

有一个崩得首领在这次代表会议上说过:“犹太教公会能成为将来的民族文化自治的核心。民族文化自治是民族自我服务的形式,是满足民族需要的形式。犹太教公会这一形式也包含着同样的内容。这是一条链子的几个环节,是一个进化过程中的几个阶段。”

代表会议根据这一点决定必须争取“改革犹太教公会,通过立法程序把它变成世俗机关”,即按民主原则组织起来的机关。(黑体是我们用的。——约·斯大林注)

显然,崩得当作条件和保障的并不是俄国的民主化,而是犹太人将来的“世俗机关”,这种机关是用“改革犹太教公会”的方法,所谓根据“立法”程序,即经过杜马而成立的。

然而我们已经看到,如果在整个国家内没有民主制度,“机关”本身是不能尽“保障”之责的。

那么,在将来的民主制度下究竟怎样呢?在民主制度下是不是也需要有“保障……的”专门“文化机关”呢?例如民主的瑞士在这方面的情形是怎样的呢?那里有没有施普林格的“民族委员会”之

见《崩得第八次代表会议文件汇编》1911年版第62页。

同上,第83—84页。

类专门的文化机关呢?那里并没有这种机关。那么,在那里占少数的例如意大利人的文化利益是不是因此受到损害呢?这类事情还没有听说过。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瑞士国内的民主制度使一切似乎能“保障……的”专门文化“机关”都成为多余的了。

总之,现在是软弱的,将来是多余的,——民族文化自治机关就是如此,民族自治就是如此。

可是,如果把这种民族自治强加于一个存在和前途都成问题的“民族”身上,那么它的害处就更大。在这种情况下,主张民族自治的人必然要维护和保全“民族”的一切特点,而不管它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只求“拯救民族”免于同化,只求“保全”民族。

崩得必然会走上这条危险的道路。而它事实上已走上了这条道路。我们所指的是崩得最近几次代表会议所通过的关于“安息日”、“犹太语”等等尽人皆知的决议。

社会民主党努力为一切民族争取本族语言权,但崩得并不以此为满足,它还要求“特别坚决地”捍卫“犹太语言权”(黑体是我们用的。——约·斯大林注),而且崩得自己在第四届杜马选举时,“宁愿选举他们——即复选代表——中间答应捍卫犹太语言权的人”。

不是共同的本族语言权,而是单独的犹太语言权,犹太语权!让各个民族的工人首先去为本族语言而斗争:犹太人为犹太语言而斗争,格鲁吉亚人为格鲁吉亚语言而斗争等等。为各民族共同的权利而斗争是次要的事情。你尽可不承认一切被压迫民族的本族语言权,只要你承认犹太语权,你就可以放心:崩得会投票拥护你,

见《崩得第八次代表会议文件汇编》第85页。

见《崩得第九次代表会议文件汇编》1912年版第42页。

崩得“宁愿选举”你。

那么,崩得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究竟有什么区别呢?

社会民主党要求规定每周必须有一个休息日,可是崩得并不以此为满足,它还要求用“立法程序”“保证犹太无产阶级有权过安息日,不得强迫它也过另一个节日”。

应该想到崩得会“进一步”要求有权过一切旧的犹太节日。如果崩得不幸,犹太工人已抛弃偏见,不愿过这种节日,那么崩得就要用争取过“安息日的权利”的鼓动去叫他们想起安息日,在他们身上培植所谓“安息日精神”……

因此,完全可以理解崩得第八次代表会议上许多发言人要求设立“犹太医院”的“热烈言论”,其根据是“病人在自己人中间觉得愉快些”;“犹太工人在波兰工人中间会觉得不愉快,而在犹太店铺老板中间会觉得愉快”。

保存一切犹太的东西,保全犹太人的一切民族特点,以至保全显然对无产阶级有害的特点,把犹太人和一切非犹太的东西隔开,甚至主张设立专门的医院,——请看崩得堕落到了什么地步!

晋列汉诺夫同志说崩得“使社会主义迁就民族主义”,这是千真万确的。当然,弗拉·科索夫斯基和象他那样的崩得分子可以骂普列汉诺夫为“蛊惑者”³³(纸上是什么都能写的),然而熟悉崩得活动的人不难看出这些勇士们就是害怕说出关于自己的实话,于是用“蛊惑人心”一类的谩骂字眼来掩护自己……

崩得在民族问题上既然采取这样的立场,在组织问题上自然

见《崩得第八次代表会议文件汇编》第 83 页。

同上,第 68 页。

见《我们的曙光》杂志 341912 年第 9—10 期第 120 页。

就走上使犹太工人隔离的道路 ,走上在社会民主党内结成各民族选民团的道路。民族自治的逻辑就是如此 !

崩得果然从“唯一代表”论进到工人“民族划分”论了。崩得要求俄国社会民主党“在自己的组织结构上实行按民族划分”。然后 ,它又由“划分”论“进一步”走到了“隔离”论。无怪乎在崩得第八次代表会议上有人说“民族生存就是隔离”。

组织上的联邦制包含着瓦解和分离主义的成分。崩得正在走向分离主义。

它实在是走投无路了。它那种超地域组织的地位驱使它走上分离主义的道路。崩得没有一定的完整的地域 ,它是在“别人的”地域上活动的 ,然而和它来往密切的波兰、拉脱维亚以及俄国的社会民主党都是跨民族的地域性的集体。结果便是这些集体每扩大一步都使崩得多受一分“损失” ,使崩得的活动场所缩小。二者必居其一 :或者是整个俄国社会民主党应按民族联邦制原则实行改组 ,那时崩得就有可能“保障”自己拥有犹太无产阶级 ;或者是这些集体的跨民族的地域原则仍然有效 ,那时崩得就要象波兰和拉脱维亚的社会民主党那样按跨民族的原则实行改组。

崩得一开始就要求“俄国社会民主党按联邦制原则实行改组” ,原因就在这里。

1906年 ,崩得向下层群众要求统一的浪潮让步而选定了中间道路 ,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但它是怎样加入的呢 ?波兰和拉脱维亚的社会民主党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党是为了和平地共同进行工

见《关于崩得第七次代表大会的通报》第7页。

见《崩得第八次代表会议文件汇编》第72页。

见《民族自治和按联邦制原则改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问题》1902年崩得版。

作,但崩得加入的目的是为联邦制而战斗。崩得首领麦迭姆当时就是这样说的:

“我们不是为了太平生活,而是为了斗争才加入的。太平生活是没有的,只有马尼洛夫³⁵之流才会盼望在最近的将来能享受太平生活。崩得应当从头到脚地武装起来去加入党。”

如果认为这是出于麦迭姆的恶意,那就错了。问题并不在于恶意,而在于崩得的特殊立场,由于这种立场,它就不能不和建立在跨民族的原则上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作斗争。崩得既然和俄国社会民主党作斗争,自然就破坏了统一的利益。最后,事情竟发展到崩得违背了党章,在选举第四届杜马时联合波兰民族主义者反对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因而和俄国社会民主党正式决裂。

显然,崩得认为决裂是它的独立自主活动最好的保障。

组织上“划分”的“原则”就这样导致了分离主义,引起了完全决裂。

从前崩得和旧《火星报》⁹ 辩论联邦制问题时说:

“《火星报》想使我们相信崩得同俄国社会民主党建立联邦关系一定会削弱它们之间的联系。我们不能援引俄国的实践来驳斥这种意见,原因很简单:俄国社会民主党不是联邦制的团体。然而我们可以援引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大有教益的经验,因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根据 1897 年党代表大会的决议而变成了一个联邦性的组织。”

这是在 1902 年写的。

现在已经是 1913 年了。现在我们有了俄国的“实践”,也有了

见 1906 年在维尔纳出版的《我们的言论》杂志³⁶第 3 期第 24 页。

见《民族自治……问题》(指《民族自治和按联邦制原则改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问题》。——编者注)1902 年崩得版第 17 页。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经验”。

这些“实践”和“经验”究竟说明什么呢？

我们先来看“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大有教益的经验”吧。1896年以前,奥地利还存在着统一的社会民主党。就在这一年,捷克人在伦敦国际代表大会³⁷上首先要求单独的代表权,并取得了这种代表权。1897年,在党的维也纳(维姆堡)代表大会上正式取消统一的党,而成立了六个民族“社会民主主义团体”组成的联邦制同盟。后来这些“团体”又都变成了独立的政党。这些政党彼此又渐渐断绝了关系。接着议会党团也随着党而分裂,成立了几个民族“俱乐部”。后来工会也按民族分裂了,最后甚至连合作社也被殃及了,捷克分离主义者竟号召工人拆散合作社。至于分离主义的鼓动会削弱工人的团结精神,往往推动他们走上破坏罢工的道路,那就更不用说了。

总之,“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大有教益的经验”证明崩得是错误的,旧《火星报》是正确的。奥地利党内联邦制造成了最恶劣的分离主义,破坏了工人运动的统一。

上面我们已经看到,“俄国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崩得分离主义者也象捷克分离主义者一样和统一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决裂了。至于工会,崩得的工会,那么它们一开始就是按民族原则组织起来的,就是说,和其他民族的工人是隔绝的。

完全隔离,完全决裂,——这就是联邦制在“俄国的实践”所表明的。

这种情形自然要削弱工人的团结精神,使他们的士气涣散,而且这种涣散现象也侵入崩得里面了。我们指的是犹太工人和波兰工人因失业问题而发生日益频繁的冲突。请看崩得第九次代表会

见《分离主义的文件》第29页所援引的瓦涅克的小册子的这些话。

议关于这个问题所发的议论吧：

“……我们把排挤我们的波兰工人看成暴徒，看成黄色工人，我们不支持他们的罢工，而要破坏他们的罢工。第二，我们用排挤对付排挤：他们不许犹太工人进工厂做工，我们就不许波兰工人进手工作坊做工……如果我们不把这件事抓到自己手里来，工人就会跟着别人走。”（黑体是我们用的。——约·斯大林注）

崩得代表会议就是这样谈论团结精神的。

这真是登峰造极的“划分”和“隔离”。崩得已经达到了目的：它已经把各民族的工人划分得厮打起来，划分得破坏起罢工来了。不这样是不行的，因为“如果我们不把这件事抓到自己手里来，工人就会跟着别人走”……

工人运动的瓦解，社会民主党队伍中士气的涣散，——这就是崩得联邦制造成的恶果。

由此可见，民族文化自治的思想及其所造成的气氛，在俄国比在奥地利更为有害。

六

高加索人，取消派代表会议

前面我们已经说到，抵挡不住民族主义“时疫”的一部分高加索社会民主党人发生了动摇。这种动摇表现在这些社会民主党人步崩得的后尘（虽然这很奇怪）而宣布了民族文化自治。

见《崩得第九次代表会议文件汇编》第 19 页。

全高加索实行区域自治,高加索境内各民族实行民族文化自治,——上述社会民主党人(顺便说一下,他们是附和俄国取消派的)就是这样表述自己的要求的。

请听听他们公认的领袖,并非无名的诺某所说的话吧:

“谁都知道,高加索无论按居民的人种成分或按地域和农业文化来说,都和中部各省大不相同。要开发并在物质上发展这样的边疆区,就需要有本地的工作人员,需要有熟悉当地特点、习惯于当地气候和文化的行家。一切以开发本地为目的的法律都必须由当地颁布,并由当地人才去执行。因此,颁布有关当地各项问题的法律属于高加索中央自治机关的职权范围……所以高加索中央机关的职权就在于颁布旨在开发本地经济富源,促使边疆区物质繁荣的法律。”

总之,就是高加索的区域自治。

诺某对理由的说明有点语无伦次,互不连贯,如果撇开这点不谈,那就应该承认他的结论是正确的。由于高加索居民成分及其生活条件有许多特点,在全国性的宪法范围内(这一点诺某也不否认)实行高加索区域自治确实是必要的。这一点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也承认了的,它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曾宣布:“在生活条件和居民成分与俄国本土各地区不同的边疆地区实行区域自理。”

马尔托夫把这一条提交第二次代表大会讨论时,曾这样申述其理由:“俄国幅员的辽阔和我们的集中管理的经验,使我们有理由认为在芬兰、波兰、立陶宛和高加索这样大的地域单位实行区域自理是必要而合理的。”

由此可见,应当把区域自理了解为区域自治。

但是诺某还要更进一步。他认为高加索区域自治所包括的“只

见格鲁吉亚文的《我们的生活报》³⁸ 1912年第12号。

是问题的一方面”。

“到现在为止,我们所说的只是本地生活的物质上的发展。但可以促进边疆区经济发展的不仅是经济上的活动,而且还有精神上文化上的活动……”“文化上很强的民族,在经济方面也是很强的……”“但是只有用民族的语言才能发展民族的文化……”“因此,凡与本族语言有关的问题都是民族文化问题。教育、诉讼、教会、文学、艺术、科学、戏剧等等问题便是这样的问题。从物质上发展边疆区的事业把各民族联合在一起,而民族文化事业却使各民族彼此分开,使每个民族单独进行活动。前一种活动是和一定的地域相联系的……”“民族文化事业则不然。这种事业并不和一定的地域相联系,而和一定民族的存在相联系。格鲁吉亚语言的命运是任何地方的格鲁吉亚人同样关心的。如果以为格鲁吉亚文化只和住在格鲁吉亚的格鲁吉亚人有关,那就太无知了。举亚美尼亚的教会为例。各地和各国的亚美尼亚人都参加管理教会的事务,地域在这里是不起任何作用的。或者,例如创办格鲁吉亚博物馆,无论梯弗利斯的格鲁吉亚人或巴库、库塔伊斯、彼得堡及其他各地的格鲁吉亚人都是关心的。这就是说,一切民族文化事业均应由各有关民族自己去掌管和领导。我们主张高加索各民族实行民族文化自治。”

简言之,文化不等于地域,地域也不等于文化,所以必须实行民族文化自治。诺某可以替民族文化自治辩护的不过如此而已。

我们在这里不再一般地谈民族文化自治,因为前面我们已经把它的坏处说明了。现在我们只想指出,民族文化自治不但毫无用处,而且从高加索的条件来看,是毫无意义和荒谬绝伦的。

原因如下:

民族文化自治是以具有发达的文化和文学的、较为发达的民族为前提的。没有这些条件,这种自治就会失去任何意义而变为

见格鲁吉亚文的《我们的生活报》1912年第12号。

“文学”一词俄文是“литература”,这里泛指书面著作。——编者注

无稽之谈。但是高加索许多民族只有原始的文化,它们虽有特殊的语言,但没有本民族的文学;况且这些民族都处于过渡阶段,一部分在被同化,一部分在向前发展。怎样在它们那里实行民族文化自治呢?怎样对待这些民族呢?怎样按民族文化自治所肯定要求的那样把它们“组织”成一些单独的民族文化联盟呢?

怎样对待那些操着不同的语言但没有自己的文学的明格列里亚人、阿布哈兹人、阿扎尔人、斯万人、列兹金人等呢?应当把他们列入哪个民族呢?能不能把他们“组织”成一些民族联盟呢?应当以什么“文化事业”为中心把他们“组织”起来呢?

怎样对待那些在南高加索正受格鲁吉亚人同化(但还远没有完全被同化)、在北高加索一部分正受俄罗斯人同化、一部分又正在向前发展、创造着本民族文学的奥塞梯人呢?怎样把他们“组织”成统一的民族联盟呢?

把那些操着格鲁吉亚语言但过着土耳其文化生活并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扎尔人列入哪个民族联盟呢?是不是以宗教事业为标准叫他们脱离格鲁吉亚人而单独“组织”起来,同时又以其他文化事业为标准叫他们和格鲁吉亚人一起“组织”起来呢?还有科布列特人呢?英谷什人呢?英格洛伊人呢?

把许多民族屏弃在外,这算什么自治呢?

不,这并不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办法,这是胡思乱想的结果。

好吧,我们就来假设一下不可假设的东西,假定我们这位诺某的民族文化自治已经实现了,那么它会把事情弄到什么地步,会导致什么结果呢?例如拿南高加索那些识字人数的百分比少到最低限度、学校由支配一切的毛拉主持、文化渗透了宗教精神的鞑靼人来说吧…… 不难了解,把他们“组织”成民族文化联盟,就是让毛拉骑在他们头上,就是任凭反动的毛拉去宰割他们,就是替鞑靼群

众的死敌建立一座在精神上奴役这些群众的新堡垒。

可是,社会民主党人从什么时候起开始给反动分子助长声势呢?

把南高加索的鞑靼人圈到一个替最凶恶的反动分子奴役群众的民族文化联盟中去,——难道高加索取消派再不能“宣布”一种较好的办法吗?……

不,这不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办法。

只有把后进的民族纳入高度文化的总轨道才能解决高加索的民族问题。只有这种解决方法才是社会民主党所能采纳的进步的解决方法。高加索区域自治之可以采纳,在于它把后进的民族引上总的文化发展的大道,帮助它们跳出小民族闭关自守的狭隘范围,推动它们前进,使它们易于享受高度文化的成果。民族文化自治却适得其反,因为它把各民族禁锢在旧的狭隘范围内,把它们固定在文化发展的低级阶段,妨碍它们走上高级的文化阶段。

因此,民族自治使区域自治丧失它的优点,把区域自治化为乌有。

正因为如此,诺某所提议的那种混合式的自治,即将民族文化自治和区域自治配合起来的自治,也是毫无用处的。这种反常的配合不但无益,反而有害,因为它除了阻碍后进的民族的发展以外,还会把区域自治变成被组织在民族联盟内的各民族互相冲突的舞台。

这样,毫无用处的民族文化自治,在高加索就会变成毫无意义的反动的妄想了。

诺某及其高加索同道者的民族文化自治就是如此。

高加索取消派是否会“进一步”,是否会在组织问题上也效法崩得,这有待将来的事实证明。到现在为止,在社会民主党的历史

中总是先有组织上的联邦制,然后才有纲领上的民族自治。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从1897年起就实行了组织上的联邦制,而民族自治是两年以后(1899年)才采用的。崩得分子第一次明确地叫喊民族自治是在1901年,而组织上的联邦制远自1897年就实行了。

高加索取消派是从末尾开始,即从民族自治开始做起的。如果他们继续跟着崩得走,那么他们就得先把目前这个早在九十年代末根据跨民族的原则建立起来的组织机构全部摧毁。

但是采用工人暂时尚不明了的民族自治是很容易的,而要摧毁高加索各民族的工人苦心培育出来、多年建立起来的机构,那就很困难了。只要一一开始实行这种赫罗斯特拉特³⁹的想法,工人们就会睁开眼睛,看出民族文化自治的民族主义实质了。

如果说高加索人用来解决民族问题的是一种平常的方式,即口头讨论和文字辩论的方式,那么取消派的全俄代表会议却想出了一种完全不平常的方式。一种简便的方式。请听吧:

“听取了高加索代表团……关于必须提出民族文化自治的要求的报告以后,代表会议对这一要求的实质不表示意见,确认对纲领中承认每一民族均有自决权的条文作这种解释和纲领原意并不抵触。”

总之,首先是“对这一”问题的“实质不表示意见”,然后却来“确认”。真是一种新奇的方式……

究竟这个新奇的代表会议“确认”了什么呢?

就是确认民族文化自治的“要求”是和承认民族自决权的纲领的“原意并不抵触”的。

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个论点吧。

民族自决的条文所说的是民族权利。根据这个条文,民族不仅有权实行自治,而且有权实行分离。条文上所讲的是政治上的自

决。取消派竟企图曲解整个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早已规定的这种政治上的民族自决权,这想欺骗谁呢?

或许取消派会规避问题,用诡辩为自己辩护,说民族文化自治和民族权利“并不抵触”吧?也就是说,如果某个国家的一切民族都同意按民族文化自治原则处理自己的事情,那么所有这些民族就完全有权这样做,谁也不能强迫它们接受别的政治生活方式。真是既新颖又聪明。是否还要加上一句:一般讲来,民族有权废除自己的宪法,有权用专横制度代替宪法,有权恢复旧制度,因为民族,也只有民族本身才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重说一遍:在这个意义上讲,无论民族文化自治或任何一种民族的反动措施都和民族权利“并不抵触”。

可敬的代表会议想说的是不是这一点呢?

不,不是这一点。它分明说:民族文化自治不是和民族权利,而是和纲领“原意”“并不抵触”。这里所说的是纲领,而不是民族权利。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某个民族向取消派代表会议请求指示,那么代表会议就会直接确认民族有民族文化自治权。但是向代表会议请求指示的并不是民族,而是高加索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团”,不错,他们是一些不好的社会民主党人,但毕竟是社会民主党人。并且他们所过问的不是民族权利,而是民族文化自治是否和社会民主党的原则矛盾,是否和社会民主党纲领的“原意”“抵触”?

总之,民族权利和社会民主党纲领的“原意”并不是一个东西。

显然也有这么些要求,它们虽然和民族权利并不抵触,但可能和纲领的“原意”抵触。

例如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上有信教自由一条。按照这一条,任何一群人都有权信奉任何一种宗教:天主教、东正教等。社会民主党反对一切宗教压制,反对压制东正教徒、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这

是否就意味着天主教和新教等和纲领“原意并不抵触”呢?不,不是这个意思。社会民主党始终反对压制天主教和新教,始终维护各民族有信奉任何一种宗教的权利,但同时它要根据正确理解的无产阶级的利益去进行反对天主教、反对新教和反对东正教的宣传,以便获得社会主义世界观的胜利。

社会民主党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新教、天主教和东正教等等无疑是和纲领“原意抵触”的,即和正确理解的无产阶级的利益抵触的。

自决权问题也是如此。各民族有权按照自己的愿望处理自己的事情,有权保存自己的任何一种民族机关,无论是有害的还是有益的,谁也不能(没有权利!)用强迫手段干涉各民族的生活。但这并不是说社会民主党就不进行斗争,不进行鼓动,以反对各民族的有害的机关,反对各民族的不适当的要求。相反地,社会民主党必须进行这种鼓动,必须努力影响各民族的意志,使各民族按照最符合于无产阶级利益的方式来处理本民族的事情。正因为如此,社会民主党要为民族自决权而斗争,同时要要进行鼓动,比方说,既要反对鞑靼人实行分离,又要反对高加索各民族实行民族文化自治,因为二者虽然和这些民族的权利并不抵触,可是和纲领的“原意”抵触,即和高加索无产阶级的利益抵触。

显然,“民族权利”和纲领的“原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纲领的“原意”表现无产阶级在自己的纲领中科学地规定的利益,民族权利却可以表现任何阶级——资产阶级、贵族和僧侣等等——的利益,这要看这些阶级的势力和影响而定。一个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义务,一个是由各阶级所组成的民族的权利。谈论民族权利和社会民主主义原则是否“抵触”,正象谈论奇阿普斯金字塔⁴⁰和臭名远扬的取消派代表会议是否“抵触”一样,二者是根本不能相提并论的。

由此可见,可敬的代表会议竟无可宽恕地把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混淆起来了。结果得到的不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办法,而是一套谬论,依照这种谬论,民族权利和社会民主党的原则“并不抵触”,因此,民族的每一要求都能和无产阶级的利益相容,因此,力求自决的民族的任何一种要求都不会和纲领的“原意抵触”!

他们太滥用逻辑了……

在这套谬论的基础上,也就产生了取消派代表会议臭名远扬的决议,按照这个决议,民族文化自治的要求和纲领的“原意并不抵触”。

但是取消派代表会议所违背的不仅是逻辑的规律。

它还违背它对俄国社会民主党所负的义务,批准了民族文化自治。它确实违背纲领的“原意”,因为大家知道,通过这个纲领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是断然否决了民族文化自治的。请看这次代表大会上有关这个问题的发言吧:

“戈尔德勃拉特 崩得分子 说:……我认为必须设立一些能保障各民族自由发展文化的特别机关,因此我提议在第八条上补充一句:‘并设立一些保障它们充分自由发展文化的机关。’大家知道,这就是崩得的民族文化自治的条文。——约·斯大林注

马尔丁诺夫指出,应该设立也能保障局部利益的总机关,任何保障民族自由发展文化的特别机关都是不能设立的。

叶哥罗夫说:在民族问题方面,我们只能采纳消极的建议,就是说,我们反对对民族的一切限制。但某一民族是否会作为一个民族发展下去,这和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无关。这是一个自发的过程。

科尔佐夫说:崩得代表一听见有人说到他们的民族主义就感到委屈。然而一位崩得代表提出的修正案却带着纯粹民族主义的性质。他们竟要求我们采取非常积极的办法去维持那些甚至已在衰亡的民族。”

……结果,“戈尔德勃拉特的修正案以多数对三票被否决了”。

总之,取消派代表会议显然是和纲领的“原意抵触”的。它违背

了纲领。

现在取消派企图为自己辩护,竟求援于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⁴¹,似乎这次大会批准了民族文化自治。例如弗拉·科索夫斯基写道:

“大家知道,根据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达成的协议,崩得可以保留自己的民族纲领(直到民族问题在全党代表大会上获得解决时为止)。这次代表大会承认了民族文化自治无论如何和全党纲领并不抵触。”

但取消派的企削足适履的办法把各民族机械地塞进国家完整性的框子里去,这算是什么“解决”问题徒然的。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并没有考虑批准崩得的纲领,而只同意暂时把这一问题作为悬案。勇敢的科索夫斯基竟没有勇气说出全部真情。然而事实毕竟是事实。且看:

“加林提出修正案:‘民族纲领问题因代表大会没有讨论而留作悬案。’(五十票赞成,三十二票反对。)

有人问:留作悬案是什么意思?

主席答:我们说把民族问题留作悬案,这就是说,崩得在下届代表大会以前可以保留自己对这一问题所作的决定。”(黑体是我们用的。——约·斯大林注)

可见代表大会甚至“没有讨论”崩得的民族纲领这一问题,只是把它留作“悬案”,让崩得自己在下届全党代表大会以前去决定自己纲领的命运。换句话说,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规避了这个问题,对民族文化自治未置可否。

可是取消派代表会议对这个问题作了十分确定的评价,认为民族文化自治可以采纳,并根据党纲批准了它。

见《我们的曙光》杂志 1912 年第 9—10 期第 120 页

见《我们的言论》杂志 1906 年期第 53 页。

差别是有目共睹的。

由此可见 ,取消派代表会议虽然用尽了一切狡猾手段 ,但并不能使民族问题有丝毫进展。

在崩得和高加索民族主义取消派面前献媚 ,—— 这就是代表会议所能施展的全副本领。

七 俄国的民族问题

最后 ,我们还必须提出一个积极解决民族问题的办法。

我们的出发点是 :民族问题只有同俄国目前的形势密切联系起来才能得到解决。

俄国正处在过渡时期 ,“ 正常的 ”“ 宪制的 ”生活还没有确立 ,政治的危机还没有克服。狂风暴雨和“ 闹纠纷 ”的日子还在前面。因此 ,现在和将来的运动就是争取完全民主化的运动。

民族问题也应该同这个运动联系起来加以考察。

总之 ,国家完全民主化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基础和条件。

在解决问题时 ,不仅要估计到国内的情况 ,而且要估计到国外的情况。俄国位于欧洲和亚洲之间 ,奥地利和中国之间。民主主义在亚洲的增长是不可避免的。帝国主义在欧洲的增长不是偶然的。资本在欧洲已感到地盘狭小 ,于是冲入异国去寻找新的市场、廉价的劳动力、新的投资场所。但是这就会引起国际纠纷和战争。谁也不能说巴尔干战争⁴²是纠纷的终结 ,而不是纠纷的开始。因此 ,完全可能造成一种内外形势结合在一起的局面 ,那时俄国某个民族将认为必须提出和解决本身独立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加以阻碍 ,当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事情。

由此可见,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不能不主张民族自决权。

总之,自决权是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必要条件。

其次,对那些由于某种原因而宁愿留在整体范围内的民族怎么办呢?

我们已经知道民族文化自治是不适用的。第一,它是人为的,没有生命力的,因为它要把一些被实际生活拆散和转移到全国各地去的人勉强凑成一个民族。第二,它驱使大家走向民族主义,因为它主张人们按民族标准“划分”,主张“组织”民族,主张“保全”和培植“民族特点”,——这些都绝非社会民主党所应做的事情。莱希斯拉特中的摩拉维亚族分离主义者离开德意志族社会民主党议员而同摩拉维亚族资产阶级议员合并为一个所谓摩拉维亚“议员团”,这不是偶然的。崩得的分离主义者沉溺于民族主义,赞美“安息日”和“犹太语”,这也不是偶然的。在杜马中还没有崩得议员,在崩得活动的区域里却有教权主义的反动的犹太教公会,崩得目前就在这个公会的“领导机关”里策划犹太工人和犹太资产者“合伙”。民族文化自治的逻辑本来就是如此。

总之,民族自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出路何在呢?

正确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区域自治,就是象波兰、立陶宛、乌克兰、高加索等固定了的地域单位的自治。

区域自治的优点首先在于实行的时候所遇到的不是没有地域的空中楼阁,而是居住于一定地域上的一定居民。其次,区域自治不是把人们按民族划分的,不是巩固民族壁垒的,相反地,是打破这种壁垒,把居民统一起来,以便为实现另一种划分即按阶级划分开辟道路的。最后,它使大家不必等待整个中央机关的决议而能最

适当地利用本地区的天然富源并发展生产力，——这样的职能是民族文化自治所没有的。

总之，区域自治是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必要条件。

无疑地，不论哪一个地区都不是清一色的单一民族区，因为每个地区里都杂居着少数民族。例如波兰有犹太人，立陶宛有拉脱维亚人，高加索有俄罗斯人，乌克兰有波兰人等等。因此，有人就要担心少数民族会受多数民族的压迫。但是只有当国家还保存着旧制度的时候，这种担心才有根据。如果国家具有完备的民主制度，这种担心就失去任何根据了。

有人提议把散居各地的少数民族结成一个统一的民族联盟。但少数民族所需要的不是人为的联盟，而是它们在当地拥有的真正权利。没有完全的民主化，这种联盟能给它们什么呢？或者有了完全的民主化，民族联盟又有什么必要呢？

少数民族特别关心的是什么呢？

少数民族感到不满的不是没有民族联盟，而是没有使用本族语言的权利。让它们使用本族语言，这种不满就会自行消失了。

少数民族感到不满的不是没有人为的联盟，而是它们没有本族的学校。给它们这种学校，这种不满就失去任何根据了。

少数民族感到不满的不是没有民族联盟，而是没有信仰（信教）、迁徙等等的自由。给它们这种自由，它们就不再会不满了。

总之，在一切方面（语言、学校等等）实行民族平等是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必要条件。因此，必须在国家完全民主化的基础上颁布全国性的法律，无例外地禁止民族享有任何特权，禁止对少数民族权利加以任何妨碍或限制。

这样，也只有这样，才能实际地而不是纸上空谈地保障少数民族的权利。

关于组织上的联邦制和民族文化自治彼此之间有没有逻辑上的联系,可争论可不争论。但民族文化自治替那种可能演变为完全分裂即演变为分离主义的、漫无边际的联邦制造成有利条件,却是无可争辩的。如果奥地利的捷克人和俄国的崩得分子从自治开始,继而进到联邦制,最后竟转到分离主义,那么无疑地,民族文化自治自然而然造成的民族主义气氛,在这方面是起了巨大的作用的。民族自治和组织上的联邦制携手并进不是偶然的。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两者都要求按民族划分,两者都提议按民族进行组织。相同处是没有疑问的,不同的只是前者要求划分全体居民,后者则要求划分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员。

我们知道按民族划分工人会引起怎样的结果。统一的工人政党的瓦解,工会按民族的分裂,民族纠纷的尖锐化,民族的破坏罢工行为,社会民主党队伍中士气完全涣散,——这就是组织上实行联邦制的结果。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和俄国崩得的活动都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对付这种情况的唯一手段就是根据跨民族的原则来进行组织。

在各地把俄国各民族的工人结合成统一的完整的集体,再把这些集体结合成统一的党,——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显而易见,这样建党并不是排斥而是预计到在统一的党的整体内实行广泛的区域自治。

高加索的经验表明这种组织形式是完全适当的。如果说高加索人已经能够消除亚美尼亚工人和鞑靼工人间的民族纠纷,如果说他们已经能够使居民避免互相残杀和互相枪击,如果说在巴库这个民族杂处的地方现在已经没有发生民族冲突的可能,如果说在那里已经能够把工人群众纳入强大运动的统一轨道,那么,高加

索社会民主党的跨民族的建党原则在这方面是起了不小作用的。

组织形式不仅影响到实际工作,它还在工人的全部精神生活上打上不可磨灭的烙印。工人过着自己的组织的生活,在自己的组织中获得精神上的发展并受到教育。他既在自己的组织中交往,每次都在那里和其他民族的同志相见,和他们一起在共同集体的领导下进行共同的斗争,当然就深刻地意识到工人首先是一个阶级家庭中的成员,是统一的社会主义大军中的成员。这对于工人阶级的广大阶层就不能不有极大的教育意义。

因此,跨民族的组织形式是培养同志情感的学校,是拥护国际主义的最强有力的鼓动。

按民族建立的组织却不然。工人如按民族来组织,就会局限在民族的小圈子里,彼此被组织上的壁垒隔离开来。这样,所强调的就不是工人彼此共同之点,而是他们彼此不同之点。在这里,工人首先是自己民族中的一员,如犹太人、波兰人等等。无怪乎组织上的民族联邦制只能使工人养成民族隔离的精神。

因此,民族的组织形式是培养民族狭隘性和民族保守性的学校。

这样,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两种原则上不同的组织形式:各民族团结的形式和在组织上按民族“划分”工人的形式。

调和这两种形式的尝试直到今天也没有什么成绩。奥地利社会民主党 1897 年在维姆堡制定的调和性的章程已成了废物。奥地利党已经四分五裂,并殃及了工会。“调和”原来不仅是空想的,而且是有害的。施特拉塞尔说得对:“分离主义在党的维姆堡代表大会上初次奏了凯歌。” 俄国的情形也是如此。在斯德哥尔摩代表

见他的《工人和民族》1912年版。

大会上和崩得的联邦制所达成的“调和”，结果是完全破产了。崩得破坏了斯德哥尔摩的妥协。从斯德哥尔摩大会后第一天起，崩得就成了各地工人联合为各族工人统一组织的道路上的绊脚石。虽然俄国社会民主党在 1907 年和 1908 年再三要求最后实现各族工人自下而上的统一⁴³，但崩得还是顽固地继续实行它的分离主义的策略。崩得起初主张实行组织上的民族自治，继而事实上已转到联邦制，以便最后完全决裂，实行分离主义。它既然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决裂，也就给俄国社会民主党带来了离散和混乱。我们不妨回忆一下亚格洛事件⁴⁴。

因此，“调和”的办法应该抛弃，因为它是空想的，有害的。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接受崩得的联邦制，那么俄国社会民主党就要根据按民族“划分”工人的原则来实行改组；或者是采取跨民族的组织形式，那么崩得就要根据地域自治的原则，按照高加索、拉脱维亚和波兰的社会民主党的榜样来实行改组，而为犹太工人和俄国其他各族工人的直接统一开辟道路。

中间道路是没有的：原则只会战胜，不会“调和”。

总之，工人的民族间团结的原则是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必要条件。

1913 年 1 月于维也纳

最初载于 1913 年 3—5 月
《启蒙》杂志第 3—5 期

选自《斯大林全集》第 2 卷
第 289—358 页

署名：科·斯大林

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

民族问题不能认为是什么独立自在的、一成不变的问题。民族问题只是改造现存制度总问题的一部分,它完全是由社会环境的条件、国家政权的性质并且总的说来是由社会发展的全部进程决定的。这在俄国革命时期表现得特别明显,当时民族问题和俄国边疆地区的民族运动随着革命的进程和结局而迅速和明显地改变自己的内容。

—

二月革命和民族问题

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时代(1917年2月),各边疆地区的民族运动带有资产阶级解放运动的性质。世代受“旧制度”压迫和剥削的俄国各民族,初次感到自己的力量并奋起投入反对压迫者的战斗。“消灭民族压迫”,——这就是当时运动的口号。俄国各边疆地区转瞬间布满了“全民族”机关。领导运动的是各民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知识分子。拉脱维亚、爱沙尼亚边疆区、立陶宛、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北高加索、吉尔吉斯和伏尔加河中游地区的“民族委员会”;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拉达”;比萨拉比亚

的“斯法图尔-采利”；克里木和巴什基尔的“库鲁尔泰”；土耳其斯坦的“自治政府”，——这些就是各民族的资产阶级把各种力量聚集在它们周围的“全民族”机构。当时的问题是摆脱沙皇制度这一民族压迫的“基本原因”和成立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当时民族自决权被解释为各边疆地区民族的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并利用二月革命成立“自己的”民族国家的权利。革命进一步发展的问題，没有列入而且也不能列入上述资产阶级机构所考虑的范围之内。并且没有注意到，前来代替沙皇制度的是赤裸裸的、不戴假面具的帝国主义，这个帝国主义是各民族的更强大更危险的敌人，它是新的民族压迫的基础。

但是，沙皇制度的消灭和资产阶级的当政并没有使民族压迫消灭。旧的粗暴的民族压迫形式，被新的精致的因而是更危险的压迫形式所代替。李沃夫—米留可夫—克伦斯基政府不但没有放弃民族压迫的政策，而且还组织了反对芬兰（1917年夏季解散议会）和乌克兰（捣毁乌克兰的文化机关）的新进攻。不仅如此，这个本性是帝国主义的政府为了征服新的土地、新的殖民地和民族，还号召居民继续进行战争。推动这个政府这样做的，不仅是帝国主义的内在本性，而且还由于西方存在着老帝国主义国家，这些国家不可抑制地力图统辖新的土地和民族，有使这个政府势力范围缩小的危险。帝国主义国家为征服小民族而进行斗争（这些国家生存的条件），——这就是帝国主义战争进程中展现的一幅图景。沙皇制度的消灭和米留可夫—克伦斯基政府的上台，丝毫没有使这幅丑恶的图景改观。既然各边疆地区的“全民族”机构表现出实现国家独立的趋向，自然它们就遭到俄国帝国主义政府方面的猛烈反对。既

斯法图尔-采利，意即边疆区代表会议。——编者注

库鲁尔泰，意即大会、代表大会。——编者注

然它们在建立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权的时候,把“自己的”工人和农民的根本利益置诸不顾,所以就引起了工人和农民的埋怨和不满。所谓“民族部队”只是火上加油:对付从上面来的危险,它们无能为力,而从下面来的危险,它们又只能使它加强和加深。“全民族”机构既无法抵御外来的打击,又无法对付内部的革命爆发。刚刚萌芽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还没有来得及开花,就开始凋谢了。

这样,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对自决原则的解释就成了空谈,失去了它的革命意义。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就谈不到消灭民族压迫和确保小民族国家的独立了。显然,不同帝国主义决裂,不推翻“自己的”民族资产阶级,不由劳动群众自己来掌握政权,被压迫民族劳动群众是不能解放的,民族压迫是不能消灭的。

这在十月革命以后表现得特别明显。

二

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

二月革命包含着不可调和的内部矛盾。革命是由工人和农民(士兵)的努力完成的,但是革命的结果,政权不是归工人和农民,而是归资产阶级了。工人和农民进行革命是想要结束战争,取得和平。但是掌握了政权的资产阶级,却力图利用群众的革命热情来继续战争,反对和平。国内的经济破坏和粮食危机,要求为工人的利益剥夺资本和工业企业,为了农民的利益没收地主的土地,但是米留可夫—克伦斯基的资产阶级政府却保卫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坚决保护他们,使他们不受工人和农民的伤害。这是靠工人和农民

的手进行的有利于剥削者的资产阶级革命。

当时国家仍然呻吟在帝国主义战争、经济崩溃和粮食危机的重压之下。前线土崩瓦解。工厂时常停工。国内饥荒日益严重。内部矛盾重重的二月革命显然不足以“救国”了。米留可夫—克伦斯基政府显然没有能力来解决革命的根本问题了。

为了使国家摆脱帝国主义战争和经济崩溃的绝境,必须实行新的社会主义革命。

这个革命随着十月革命而到来了。

十月革命推翻了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政权,而代之以工人和农民政府,一举而解决了二月革命的种种矛盾。废除地主富农的无限权力,把土地交给农村的劳动群众使用;没收工厂,把它们交给工人管理;同帝国主义决裂,结束掠夺性的战争;公布密约,揭穿侵占别国领土的政策,最后,宣布被压迫民族劳动群众实行自决,承认芬兰独立,——这些就是苏维埃政权在苏维埃革命初期所实施的主要措施。

这是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

在中部开始的革命,是不能长久地停留在中部狭窄地域范围内的。革命在中部胜利后,就必然要扩展到各边疆地区去。果然,革命浪潮从革命的最初几天起就从北部泛滥到全俄国,席卷了一个又一个边疆地区。但是它在边疆地区碰到了堤坝,这就是在十月革命以前已经成立的“民族委员会”和区域“政府”(顿河、库班、西伯利亚)。原来这些“民族政府”连听都不愿意听社会主义革命。它们在本性上是资产阶级政府,根本不愿意破坏旧的资产阶级秩序,相反地,它们认为有义务来全力保存并巩固这一秩序。它们在本质上是帝国主义政府,根本不愿意同帝国主义决裂,相反地,只要有机会,它们从不放松去侵占并统辖“异”民族的几块或几小块领土。

所以,各边疆地区的“民族政府”向中部的社会主义政府宣战是并不奇怪的。它们一经宣战,自然就成了纠集俄国一切反革命势力的反动基地。谁都知道,所有被驱逐出俄国的反革命分子都奔向这些基地,他们在这些基地上编成了白卫“民族”部队。

但是,除了“民族政府”,在各边疆地区还有各民族的工人和农民。他们在十月革命以前就已经仿照俄国中部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组织了自己的革命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从来没有同自己的北部弟兄断绝过联系。他们同样力求战胜资产阶级,他们同样为社会主义的胜利而斗争。所以,他们和“自己的”民族政府的冲突与日俱增是并不奇怪的。十月革命只是巩固了边疆地区的工人和农民同俄国的工人和农民的联盟,鼓舞了他们对社会主义胜利的信心。而“民族政府”对苏维埃政权的战争则使各民族的群众同这些“政府”的冲突达到完全决裂的地步,达到以公开起义反对它们的地步。

这样就形成了全俄国工人和农民的社会主义联盟,以对付俄国各边疆地区民族资产阶级“政府”的反革命联盟。

有些人把各边疆地区“政府”的斗争描绘成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无情的中央集权制”、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这是完全不对的。世界上没有一个政权象俄国的苏维埃政权这样允许如此广泛的地方分权制,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府象俄国的苏维埃政权这样给予各民族如此充分的民族自由。各边疆地区“政府”的斗争过去是而且现在仍然是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反对社会主义的斗争。打出民族旗帜只是为了欺骗群众,因为它是一面便于掩盖民族资产阶级反革命阴谋的受人欢迎的旗帜。

但是,各“民族”政府和区域“政府”所进行的斗争是力量悬殊的斗争。“民族政府”两面受敌:外受俄国苏维埃政权攻击,内受“自己的”工人和农民攻击。因此,它们经过最初几次战斗以后就不得

不退却了。芬兰工人、托尔帕利 的起义和资产阶级“上议院”的逃亡,乌克兰工农的起义和资产阶级“拉达”的逃亡,顿河、库班、西伯利亚工农的起义和卡列金、科尔尼洛夫、西伯利亚“政府”的崩溃,土耳其斯坦贫农的起义和“自治政府”的逃亡,高加索的土地革命和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的“民族委员会”的完全孤立无援,——这些就是表明各边疆地区“政府”完全脱离了“自己的”劳动群众的尽人皆知的事实。被彻底击溃的“民族政府”不得不求助于西方帝国主义者,求助于全世界各民族数百年来压迫者和剥削者来对付“自己的”工人和农民。

这样就开始了外国干涉和边疆地区沦陷的时期,这个时期再一次揭穿了“民族”政府和区域“政府”的反革命性。

只是现在大家才明白:民族资产阶级追求的并不是使“自己的人民”从民族压迫下解放出来,而是从人民身上榨取利润的自由,是保存自己的特权和资本的自由。

只是现在才知道:不和帝国主义决裂,不推翻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政权不转到这些民族的劳动群众的手里,被压迫民族就不能解放。

对自决原则的旧的资产阶级的看法和“全部政权归民族资产阶级”的口号就这样被革命进程本身所揭穿了,抛弃了。对自决原则的社会主义的看法和“全部政权归被压迫民族劳动群众”的口号则获得了应用的全部权利和机会。

这样,十月革命结束了旧的资产阶级的民族解放运动,开辟了被压迫民族工人和农民的新的社会主义运动的纪元,这个运动的目的在于反对一切压迫(也包括民族压迫),反对“自己的”和异族的资产阶级政权,反对整个帝国主义。

三

十月革命的世界意义

十月革命在俄国中部胜利并蔓延到许多边疆地区后,就不能局限于俄国领土范围之内了。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下层民众普遍不满的气氛中,它不能不波及邻国。俄国同帝国主义决裂并摆脱掠夺性的战争;公布密约,庄严地废除侵占别国领土的政策;宣布民族自由,承认芬兰独立;宣告俄国为“苏维埃民族共和国联邦”,苏维埃政权向世界发出对帝国主义进行坚决斗争的战斗呼声,——所有这一切不能不对被奴役的东方和流血殆尽的西方发生重大影响。

果然,十月革命是世界上第一个打破了东方被压迫民族劳动群众数百年来的沉睡并把他们卷入反对世界帝国主义斗争的革命。在波斯、中国和印度效法俄国的苏维埃成立工农苏维埃的事实,十分有力地说明这一点。

十月革命是世界上第一个成为西方工人和士兵解救自己的活榜样并推动他们走上真正摆脱战争和帝国主义压迫的道路的革命。奥匈帝国和德国的工人和士兵的起义,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成立,奥匈帝国没有充分权利的各族人民反对民族压迫的革命斗争,都十分雄辩地说明这一点。

问题完全不在于东方的斗争乃至西方的斗争还没有摆脱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杂质;问题在于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开始了,这个斗争正在继续进行并且一定会达到它的逻辑的结局。

外国干涉和“外国”帝国主义者的占领政策,只是使革命危机尖锐化,把更多的民族卷入斗争,扩大同帝国主义作革命搏斗的地区。

这样,十月革命就在落后的东方各族人民和先进的西方各族人民之间建立了联系,把他们拉进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阵营。

这样,民族问题就从反对民族压迫的局部问题发展成为各民族、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从帝国主义下解放出来的总问题。

第二国际及其首领考茨基的极大的罪过之一,就是他们对民族自决问题的看法始终和资产阶级的看法相同,不了解民族自决的革命意义,不善于或是不愿意把民族问题放在和帝国主义进行公开斗争的革命基础上,不善于或是不愿意把民族问题和殖民地解放问题联系起来。

鲍威尔和伦纳一类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愚蠢的地方,其实就在于他们不了解民族问题和政权问题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力图把民族问题和政治分开并把它限制在文化教育问题范围之内,忘记了存在着帝国主义和被帝国主义奴役的殖民地这样的“小事”。

有人说,在社会主义革命日益高涨的情势下,自决和“保卫祖国”的原则已经被事变进程本身废弃了。事实上,被废弃的不是自决和“保卫祖国”的原则,而是对这些原则的资产阶级的解释。只要看一看呻吟在帝国主义压迫之下和渴求解放的沦陷区,只要看一看为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不受帝国主义强盗侵害而进行着革命战争的俄国,只要想一想奥匈帝国目前爆发的事变,只要看一看那些已经自行组织苏维埃的被奴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印度、波斯、中国),就足以理解按照社会主义解释的自决原则的全部革命意义了。

十月革命的伟大的世界意义主要在于:

(1)它扩大了民族问题的范围,使民族问题从欧洲反对民族压迫的局部问题变为各被压迫民族、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从帝国主义下解放出来的总问题;

(2)它给这一解放开辟了广泛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这就大大促进了西方和东方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把他们汇集到胜利的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巨流中去;

(3)它从而在社会主义的西方和被奴役的东方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建成了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

这其实也就说明了为什么东方和西方的劳动人民和被剥削群众现在以难于描述的热情对待俄国的无产阶级。

这主要也就说明了为什么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强盗目前这样疯狂地攻击苏维埃俄国。

载于 1918 年 11 月 6 日和 19 日

《真理报》第 241 号和第 250 号

署名:约·斯大林

选自《斯大林全集》第 4 卷

第 140—149 页

不要忘记东方

在欧洲革命运动日益高涨之际，在旧宝座纷纷倒塌和旧皇冠纷纷落地而让位于革命的工兵苏维埃的时候，在沦陷区正把帝国主义的走狗从自己的土地上赶出去的时候，大家的视线自然都转向西方。在西方，应当首先打断在欧洲锻造的、用来扼杀全世界的帝国主义锁链。在西方，应当首先沸腾起新的社会主义生活。在这样的时候，遥远的东方及其数亿被帝国主义奴役的人民就“自然”从视野中消失，被忘记了。

但是，一分钟也不能忘记东方，至少因为它是世界帝国主义“取之不尽的”后备力量和“最可靠的”后方。

帝国主义者一向把东方看做自己幸福的基础。东方各国的不可计量的自然富源（棉花、石油、黄金、煤炭、矿石），难道不是世界各国帝国主义者的“纠纷的苹果”⁴⁵吗？这其实也就说明为什么帝国主义者在欧洲作战和谈论西方的时候从来没有不想到中国、印度、波斯、埃及和摩洛哥，因为问题其实始终是在东方。他们那样热心地维持东方各国的“秩序和法制”，主要原因也在这里。因为不这样做，帝国主义的大后方就会没有保障。

但是，帝国主义者所需要的不仅仅是东方的富源。他们还需要东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特多的“听话的”“人力”。他们需要东方各民族的“随和的”廉价的“劳动力”。此外，他们需要东方各国的“听话的”“年轻小伙子”，从其中征募所谓“有色”军队，立即运用它们去对付“自己的”革命工人。正因为如此，他们把东

方各国称为自己的“取之不尽的”后备力量。

共产主义的任务就是要打破东方被压迫民族数百年来沉睡，用革命的解放精神来感染这些国家的工人和农民，唤起他们去反对帝国主义，从而使世界帝国主义失去它的“最可靠的”后方，失去它的“取之不尽的”后备力量。

不这样做，就休想社会主义取得最终胜利，休想完全战胜帝国主义。

俄国革命第一个唤起了东方被压迫民族去反对帝国主义。波斯、印度、中国的代表苏维埃的成立是东方工人和农民从数百年来沉睡中觉醒过来的鲜明标志。

西方革命无疑地会进一步推动东方革命运动，给它灌注奋发精神和胜利信心。

帝国主义者本身及其新的兼并会大大促进东方的革命化，因为这种兼并会把更多的国家卷入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扩大世界革命的基地。

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参与东方日益增长的自发运动，向前发展这种运动，使它成为自觉的反帝国主义斗争。

在这个意义上，不久以前举行的穆斯林共产党员代表会议⁴⁶关于加强在东方各国即在波斯、印度和中国的宣传工作的决议，无疑地具有深刻的革命意义。

我们希望我们的穆斯林同志们能执行自己的这个极其重要的决定。

因为必须彻底领会这个真理：谁想要社会主义胜利，谁就不能忘记东方。

列宁是俄国共产党的 组织者和领袖

有两派马克思主义者。这两派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工作，都认为自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们毕竟大不相同。不仅不同，他们之间还横着一道鸿沟，因为他们的工作方法正好相反。

第一派通常只限于表面上承认马克思主义，堂皇地标榜马克思主义。他们不善于或不愿意探究马克思主义的实质，不善于或不愿意实现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活的原理变成毫无意思的死的公式。他们的活动不是以经验、以考虑实际工作为基础，而是以摘引马克思的词句为基础。他们不是从分析活的现实，而是从类比和历史比拟中求得指示和指令。言行不一——这就是这一派的主要毛病。因此，他们灰心失望，永远抱怨命运，命运也总是愚弄他们，使他们“上当”。这一派的名字是孟什维主义（在俄国），机会主义（在欧洲）。梯什卡（约吉希斯）同志在伦敦代表大会⁴⁷上恰如其分地描述了这一派，说他们不是站在而是躺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上。

第二派恰巧相反，他们把问题的重心从表面上承认马克思主义转到实行和实现马克思主义。规定适合环境的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手段，环境改变时就改变这些方法和手段，——这一派主要就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这方面。这一派不是从历史类比和历史比拟中，而是从研究周围条件中求得指令和指示。他们的活

动不是凭借引证和格言，而是凭借实践经验，依据经验来检查自己的每一个步骤，用自己的错误来教育自己并教导别人建设新生活。这其实也就说明在这一派的活动中为什么言行是一致的，为什么马克思学说完全保持着它的革命活力。这一派完全符合马克思所说的话：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停留于解释世界，而应当更进一步去改变世界。这一派的名字是布尔什维主义，共产主义。

这一派的组织者和领袖是弗·伊·列宁。

—

列宁是俄国共产党的组织者

俄国无产阶级政党是在特殊条件下形成的，和西方工人政党组织时的条件不同。在西方，例如在法国或德国，工人政党是在工会和政党合法存在的条件下，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后的环境中，在有资产阶级议会的情况下，在窃取了政权的资产阶级面对面地和无产阶级对垒着的时候，从工会中产生出来的。在俄国却相反，无产阶级政党是在极残酷的专制制度下，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尚待发生的时候形成的。当时，一方面，党的组织中充斥着资产阶级的“合法马克思主义”分子⁴⁸，他们渴望利用工人阶级来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另一方面，党的优秀工作者不断被沙皇宪兵抓出党的队伍，而自发的革命运动的发展又要求有一个坚固的、团结的、十分秘密的、能够引导运动去推翻专制制度的革命家的战斗核心。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9页。——编者注

当时的任务是：分清良莠，和异己分子划清界限，在各地组织有经验的革命干部，给予他们明确的纲领和坚定的策略，以及把这些干部集合成统一的战斗的职业革命家的组织，这个组织要十分秘密，足以抵挡宪兵的袭击，但是同时又要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足以在必要时率领群众进行斗争。

孟什维克，就是那些“躺”在马克思主义观点上的人，解决问题很简单：既然在西方工人政党是从那些为改善工人阶级经济状况而斗争的非党的工会中产生的，那么在俄国也应当尽可能这样做，就是说，暂时只限于各地的“工人对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不建立全俄的战斗组织，等以后……以后，如果到那时还没有工会出现，就召集一个非党工人代表大会并且把它宣布为党。

孟什维克的这个“马克思主义”“计划”在俄国条件下虽然是一种空想，但是它却必定会进行广泛的鼓动工作来贬低党性思想，消灭党的干部，使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政党，使工人阶级听凭自由派去宰割，——这一点，孟什维克，而且恐怕还有许多布尔什维克，那时是未必料想到的。

列宁对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莫大功绩在于：还在孟什维克的组织“计划”刚刚萌芽，甚至这个“计划”的编造者自己都很难明显地想象出“计划”的轮廓的时候，他就揭穿了这个“计划”的全部危险性，并且在揭破它以后，就向孟什维克的组织上的松弛现象展开猛烈进攻，把实际工作者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个问题上。因为这是党的生存问题，是党的生死存亡问题。

创办全俄政治报，作为集结党的力量的中心；把各地坚定的党的干部组织起来，作为党的“正规部队”；通过报纸把这些干部联合在一起，把他们团结成为一个具有鲜明界限、明确纲领、坚定策略和统一意志的全俄的战斗的党，——这就是列宁在他的名

著《怎么办》和《进一步，退两步》中所发挥的计划。这个计划的价值在于它完全适合俄国的实际情况并高明地概括了优秀的实际工作者的组织经验。在为这个计划而进行的斗争中，大多数俄国实际工作者都坚决拥护列宁，不怕分裂。这个计划的胜利为世无伦比的团结一致和千锤百炼的共产党奠定了基础。

我们的同志（不仅孟什维克！）常常责难列宁太喜欢争辩和分裂，责难列宁同调和派进行不调和的斗争等等。毫无疑问，这两种情况都有过。可是不难了解，如果我们党不把非无产阶级的机会主义分子逐出党外，那它就不能除去内部的软弱和游移，它就不能达到它所具有的力量和坚强。在资产阶级统治的时代，无产阶级政党只有同自己内部和工人阶级中间的机会主义的、反革命的和反党的分子进行斗争才能发展并巩固起来。拉萨尔说得对：“党是靠清洗自己而巩固的。”⁴⁹

责难者通常以当时“统一”局面兴盛的德国党为例。可是，第一，并非任何统一都是强有力的标志；第二，现在只要看看过去的德国党已经分裂为三个党⁵⁰的事实，就足以了解谢德曼和诺斯克同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统一”是完全虚假的了。如果德国党内的革命分子及时地同党内的反革命分子决裂，那对于德国无产阶级不会是更好吗……不，列宁领导党同反党分子和反革命分子进行不调和的斗争是做得万分正确的。因为只是由于实行了这种组织政策，我们党才能建立内部的统一和惊人的团结，而得以丝毫不受损伤地摆脱克伦斯基执政时的七月危机⁵¹，肩负起十月起义，安然地度过布列斯特时期的危机⁵²，组织了对协约国的胜利，并且获得了从来没有的随机应变的本领，我们党就是靠了这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220—389页。——编者注

见《列宁全集》第7卷第189—420页。——编者注

种本领，才能在任何时候改编自己的队伍，集中数十万党员去做任何巨大的工作而不会使自己的队伍混乱。

二

列宁是俄国共产党的领袖

然而俄国共产党在组织上的优点还只是事情的一面。如果党的工作的政治内容，党的纲领和策略不适合俄国的实际情况，如果党的口号不能激起工人群众，不能把革命运动向前推进，那么党就不能这样迅速地成长壮大。现在我们来谈谈事情的这一面。

俄国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05年）时同西方进行革命变革时所处的条件（例如法国和德国）是不同的。西方革命是在资本主义处于工场手工业时期、阶级斗争还不发展的条件下爆发的。那时无产阶级力量小，人数少，还没有自己的能够提出本阶级要求的政党；而资产阶级很革命，足以使工人和农民相信它，并引导他们去同贵族进行斗争。在俄国却相反，革命是在资本主义处于机器时期、阶级斗争已经发展的条件下开始的（1905年）。那时人数较多而且被资本主义团结起来的俄国无产阶级已经和资产阶级进行过多次战斗，已经有自己的、比资产阶级政党更团结的政党，已经有自己的阶级要求，而俄国资产阶级（何况是靠政府订货生存的资产阶级）被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吓坏了，竟设法勾结政府和地主来反对工人和农民。俄国革命因俄国在满洲战场上遭受军事失败而爆发这一事实，只是加速了事变，但是丝毫没有改变事情的本质。

当时的环境要求无产阶级来领导革命，把革命农民团结在自己周围，同时进行反对沙皇制度和反对资产阶级的坚决斗争，以使国家完全民主化并保障自己的阶级利益。

可是，孟什维克，就是那些“躺”在马克思主义观点上的人，却按照自己那一套解决问题：既然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而资产阶级革命是由资产阶级的代表领导的（见法国革命和德国革命的“历史”），那么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俄国革命的领导者，领导权应当让给俄国资产阶级（就是那个贩卖革命的资产阶级），农民也应当让资产阶级保护，而无产阶级则应该始终保持极左的反对派的地位。

孟什维克竟把恶劣的自由派的这些庸俗老调当做“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定论捧出来！……

列宁对俄国革命的莫大功绩在于：他彻底揭穿了孟什维克的历史比拟的空虚无聊和孟什维克的把工人事业交给资产阶级宰割的“革命方案”的全部危险性。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而不是资产阶级专政；抵制布里根杜马⁵³并举行武装起义，而不是参加杜马并在杜马里进行正常工作；在杜马终于召集起来时成立“左派联盟”并利用杜马讲台来配合杜马外面的斗争，而不是成立立宪民主党⁵⁴的内阁并反动地“保护”杜马；和立宪民主党这个反革命势力作斗争，而不是和它建立联盟，——这就是列宁在他的名著《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和《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中所发挥的策略计划。

这个计划的价值在于它直截了当地提出了无产阶级在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的阶级要求，促进了向社会主义革命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511—627页。——编者注

见《列宁全集》第10卷第170—247页。——编者注

的转变，并且含有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萌芽。在为这个策略计划而进行的斗争中，大多数俄国实际工作者都是坚决不移地拥护列宁的。这个计划的胜利为我们党现在震撼世界帝国主义根基的革命策略奠定了基础。

事变的继续发展，四年的帝国主义战争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动荡，二月革命和有名的两个政权并存局面，临时政府成为资产阶级反革命的策源地和彼得堡代表苏维埃成为萌芽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十月革命和立宪会议⁵⁵的解散，资产阶级议会制的废除和苏维埃共和国的宣布成立，帝国主义战争的转变为国内战争，世界帝国主义同那些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以及那些被无产阶级抛入海中而被革命浪潮冲到资本主义岸边的死死抓住立宪会议的孟什维克可怜姿态，——这一切只是证明了列宁在《两种策略》中规定的革命策略原理的正确性。拥有这种遗产的党是能够不怕暗礁，大胆地向前游去的。

在我们这个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当党的每一个口号和领袖的每一句话都受到事实检验的时候，无产阶级向自己的领袖们提出了特别的要求。历史上有过一些无产阶级的领袖，风暴时期的领袖，实践家领袖，他们是有自我牺牲和勇敢精神的，但是在理论上很弱。人民群众不会很快忘记这些领袖的名字。例如德国的拉萨尔和法国的布朗基就是这样的领袖。但是整个运动不能只靠回忆过日子，它需要有明确的目的（纲领）和坚定的路线（策略）。

还有另一种领袖，和平时期的领袖，他们在理论上很强，但是在组织工作和实际工作方面却很弱。这种领袖只是在无产阶级的上层中间有威信，而这也只能到一定的时期为止。革命时代一

到来，当要求领袖们拿出革命实践口号的时候，理论家就退出舞台，让位给新人物了。例如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和德国的考茨基就是这样的领袖。

要始终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就必须一身兼备理论力量和无产阶级运动的实际组织经验。当巴·阿克雪里罗得还是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他评论列宁说：他“成功地把优秀实践家的经验同理论修养和广阔的政治眼界集于一身”（见巴·阿克雪里罗得给列宁《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⁵⁶一书所写的序言）。“文明”资本主义的思想家阿克雪里罗得先生现在会怎样评论列宁，这是不难猜想的。但是在我们这些深知列宁而又能客观地观察事物的人看来，毫无疑问，列宁完全保持着这个原有的品质。而且也应当从这一点来说明，为什么列宁，也只有列宁，才是现在世界上最强大最有锻炼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

载于 1920 年 4 月 23 日

《真理报》第 86 号

署名：约·斯大林

选自《斯大林全集》第 4 卷

第 272—279 页

在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庆祝 弗·伊·列宁五十寿辰大会上的演说

（1920年4月23日）

听过前面几个人的讲话和回忆以后，我要说的就很少了。我想只指出还没有人谈到的一个特点，就是列宁同志的谦虚和他勇于承认自己错误的精神。

我想起列宁这个巨人两次承认自己失算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1905年12月在芬兰坦默福斯举行的全俄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⁵⁷上关于抵制维特杜马⁵⁸的决定。当时存在着抵制维特杜马的问题。接近列宁同志的人，就是我们地方代表所十分崇敬的那七个人肯定地说，伊里奇反对抵制杜马，主张参加杜马选举。后来知道，的确是这样。于是展开了争论，地方抵制派即彼得堡代表、莫斯科代表、西伯利亚代表、高加索代表都进行攻击，而当我们讲话结束时，列宁起来讲话，他说，他原来是赞成参加选举的，但是现在他发现自己错了，因此，他同意各地代表的意见。当时我们非常惊讶。这给了我们一个电击般的印象。我们大家都向他欢呼。

还有一件这样的事情。1917年9月，在克伦斯基执政时期，那时民主会议召开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⁵⁹成立了新机构——预备议会，以便准备从苏维埃过渡到立宪会议⁵⁵，就在这个时候，我们中央委员会在彼得格勒通过了一个决议，决定不解散民

主会议并沿着巩固苏维埃的道路前进，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举行起义并宣布苏维埃代表大会为国家政权机构。伊里奇那时不在彼得格勒，处在地下状态。他不同意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在信中说，必须立刻解散这群混蛋（民主会议）并把他们逮捕起来。

我们觉得事情并不这样简单，因为我们知道，民主会议的半数代表，至少三分之一的代表是从前线来的，逮捕和解散他们只能把事情弄糟，把和前线关系搞坏。我们觉得我们实际工作者对于我们道路上的一切小沟、泥坑和坎坷要看得清楚些。但是伊里奇是伟大的，他不怕自己道路上的泥坑、坎坷或深沟，他不怕危险，他说：“站起来，一直走向目标。”而我们实际工作者认为，当时这样做对我们是不利的，应当绕过这些障碍，然后对准要害，果敢地行动。于是，我们不顾伊里奇的一切要求，没有听他的话，沿着巩固苏维埃的道路继续前进，直到10月25日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⁶⁰，直到胜利举行起义。那时伊里奇已经到了彼得格勒。他微笑着，狡黠地瞅着我们说：“是的，看来是你们对。”

这又使我们非常惊讶。

列宁同志是不怕承认自己的错误的。

这种谦虚和勇敢精神特别使我们敬服。（鼓掌）

最初载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乌里杨诺夫-列宁五十寿辰纪念
文集》1920年莫斯科版

选自《斯大林全集》第4卷
第280—282页

十月革命和中间阶层问题

毫无疑问，中间阶层问题是工人革命的基本问题之一。中间阶层就是农民和城市小劳动者。被压迫民族也应该算在里面，因为它们中间十分之九是中间阶层。可见，按经济地位来说，这是一些介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层。这些阶层的重要性是由下面两种情况决定的：第一，这些阶层是现今各国人口中的大多数，或者至少是数量很大的少数；第二，它们是资产阶级从中招募军队以反对无产阶级的重要后备力量。如果没有中间阶层首先是农民的同情和支持，无产阶级就不能保持政权，在我们共和国联盟这样的国家内尤其是如此。如果没有使这些阶层至少保持中立，如果这些阶层还没有脱离资本家阶级，如果这些阶层的大多数还是资本的军队，那么无产阶级就休想夺取政权。由此就产生了争取中间阶层的斗争，争取农民的斗争，这一斗争象一根红线贯穿在我们 1905 年到 1917 年的全部革命中，这一斗争还远没有结束，还将继续进行下去。

1848 年法国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它没有得到法国农民的同情和响应。巴黎公社崩溃的原因之一，就是它遇到了中间阶层首先是农民的抗拒。1905 年俄国革命的情形也是如此。

以考茨基为首的一些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欧洲历次革命的经验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间阶层，首先是农民，好象生来就是工人革命的敌人，因此必须采取比较长期发展的方针，使无

产阶级成为各民族中的大多数，从而为工人革命的胜利创造实际条件。这些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这个结论，警告无产阶级不要“过早”发动革命。根据这个结论，他们出于“原则上的考虑”就把中间阶层完全交给资本支配。根据这个结论，他们向我们预言俄国十月革命必遭失败；他们的论据是：无产阶级在俄国人口中占少数，俄国是个农民国家，因此工人革命在俄国不可能取得胜利。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本人对中间阶层首先是对农民的评价完全不是这样。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把农民抛开，让他们在政治上完全受资本支配，并且大叫大嚷地夸耀自己“原则性很强”；可是马克思，这位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原则性最强的马克思主义者，却坚定不移地劝告共产党不要忽视农民，要把他们争取到无产阶级方面来，要保证在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中取得他们的支持。大家知道，在五十年代，在法国和德国的二月革命失败以后，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并通过恩格斯转告德国共产党说：

“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

这是对五十年代的德国这个农民国家所说的话，当时德国的无产阶级人数极少，并且不如 1917 年俄国的无产阶级那样有组织，德国的农民由于自己所处的地位，不如 1917 年俄国的农民那样愿意支持无产阶级革命。

毫无疑问，十月革命是“农民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完美结合，关于这种结合，马克思已经不顾一切“有原则性的”空谈家的反对而论述过了。十月革命证明，这种结合是可能的，而

且是可以实现的。十月革命证明，只要无产阶级能够使中间阶层首先是农民脱离资本家阶级，能够使这些阶层由资本的后备力量变为无产阶级的后备力量，它就能够在夺取政权并保持政权。

简单地说：十月革命是世界上一切革命中第一次把中间阶层问题首先是农民问题提到首要地位的革命，它不顾第二国际英雄们的一切“理论”和哭诉而胜利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这就是十月革命的第一个功绩，如果这里可以叫功绩的话。

但是，问题不限于此。十月革命还更进一步，它力求把各被压迫民族团结在无产阶级的周围。上面已经说过，各被压迫民族中十分之九是农民和城市小劳动者。但是，这还没有把“被压迫民族”这一概念概括无遗。被压迫民族通常不仅作为农民和城市劳动者受压迫，而且作为民族，即作为属于一定的民族，具有一定的语言、文化、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的劳动者受压迫。双重压迫的压力不能不使被压迫民族的劳动群众革命化，不能不推动他们去同压迫的基本力量作斗争，去同资本作斗争。这种情况就成了无产阶级不仅能够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同“农民战争”结合，而且能够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同“民族战争”结合的基础。这一切不能不使无产阶级革命的活动范围大大地超出俄国国境，不能不使资本的最深远的后备力量受到打击。如果说争取统治民族内部的中间阶层的斗争是争取资本的最接近的后备力量的斗争，那么争取被压迫民族解放的斗争就不能不成为争取资本的某些最深远的后备力量的斗争，就不能不成为殖民地各族人民和没有充分权利的各族人民摆脱资本压迫的斗争。后面这一种斗争还远没有结束，它甚至还没有取得第一批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但是，由于十月革命，这个争取深远的后备力量的斗争已经开始了，并且它一定会随着帝国主义的发展，随着我们共和国联盟的实力的增

长，随着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进展而一步步扩展开来。

简单地说：十月革命真正使无产阶级从被压迫的和主权不完整的国家的人民群众中争取资本的深远的后备力量的斗争开始了，十月革命第一次举起了争取这些后备力量的斗争旗帜，——这就是十月革命的第二个功绩。

我们是在社会主义旗帜下把农民争取过来的。农民从无产阶级手中得到了土地，在无产阶级帮助下战胜了地主，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参加了政权，因此，他们不能不感觉到，不能不了解到他们的解放过程过去是而且将来还会是在无产阶级的旗帜下，在无产阶级的红旗下进行。这种情况就不能不使从前农民所害怕的社会主义旗帜变成了吸引他们注意并促使他们摆脱愚昧、贫困和压迫的旗帜。

关于被压迫民族也应该这样说，而且更应该这样说。争取民族解放的呼声，这个由解放芬兰、撤回驻波斯和中国的军队、成立共和国联盟以及给土耳其、中国、印度斯坦和埃及人民公开的道德上的援助等等事实证实了的呼声，是从十月革命的胜利者口中第一次发出的。在被压迫民族的眼里，俄国从前是一面压迫的旗帜，而现在，在它已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之后，就变成了一面解放的旗帜，这一事实决不能认为是偶然的。十月革命的领袖列宁同志的名字，现在成了殖民地国家和主权不完整的国家里受压抑受摧残的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中最爱戴的名字，这也不是偶然的。如果说从前，在极辽阔的罗马帝国内，基督教被认为是受压迫受摧残的奴隶的救星，那么现在的情形是：在帝国主义的极广大的殖民地国家中，社会主义可以成为（而且已经开始成为！）千百万群众解放的旗帜。不用怀疑，这种情况大大促进了同一切反社会主义的偏见作斗争的事业，并给社会主义思想开辟了一条通

向被压迫国家最遥远的角落的道路。从前社会主义者很难在被压迫国家或压迫国家的非无产阶级的中间阶层中公开露面，现在他们却可以公开地在这些阶层中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希望人们倾听他们的话，希望人们也许会听从他们，因为他们已经有了象十月革命这样一个有力的论据。这也是十月革命的成果。

简单地说：十月革命为社会主义思想扫清了通向各民族和各部落内的中间的、非无产阶级的农民阶层的道路，十月革命把社会主义旗帜变成了这些阶层所欢迎的旗帜。这就是十月革命的第三个功绩。

载于 1923 年 11 月 7 日

《真理报》第 253 号

署名：约·斯大林

选自《斯大林全集》第 5 卷

第 279—283 页

关于党的任务

(在有小组长、争论俱乐部成员和支部委员会委员参加的
俄共(布)红色普列斯尼亚区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报告)
(1923年12月2日)

同志们！首先我必须说明，在这里我不是代表党中央，而是以个人名义来做报告的。如果会议愿意听取这样的报告，我就来谈谈。(喊声：“请讲吧。”)这并不是说，我在这个问题上和中央有什么分歧，——绝对没有。我以个人名义讲话，只是因为中央关于制定改善党内状况办法的委员会⁶¹最近就要向中央呈报自己工作的结果；这个结果还没有呈报，所以我现在还没有正式权利代表中央讲话，虽然我相信，我现在要对你们讲的基本上会把中央对这些问题的态度表达出来。

争论是党坚强有力的标志

我想在这里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报刊上和支部里正在进行的争论的意义问题。这次争论说明什么呢？它标志着什么呢？这不是一场闯入党内平静生活的暴风雨？这次争论是不是象有些人说的那样，是党瓦解和崩溃的标志，或者象另一些人说的那样，是党蜕化的标志？

同志们，我认为都不是：既不是蜕化，也不是瓦解。实际情况是，党在最近时期壮大了，它清除了大量的废物，它更加无产阶级化了。你们知道，两年前我们至少有七十万党员，你们知道，当时有好多万党员退出了党或者被驱逐出党。其次，在这段时间内，由于工业的发展使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状况有所改善，由于熟练的老工人从农村归来，由于在产业工人中掀起了文化高涨的新浪潮，党的成分改善了，党的质量提高了。

一句话，由于这一切条件，党壮大了，质量更高了，它的要求提高了，它的要求更加严格了，它想比以前更多地知道一些东西了，它希望比以前更多地解决一些问题了。

已经展开的争论不是党软弱的标志，更不是党瓦解或蜕化的标志，而是党有力的标志，党坚强的标志，党的成员质量改善的标志，党的积极性提高的标志。

争论的原因

摆在我们面前的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恰恰在目前时期，恰恰在今年秋天，党内政策问题具有尖锐的性质。怎样解释这一点呢？原因在哪里呢？同志们，我认为这里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今年 8 月我国某些地区因工资问题而掀起的不满和罢工浪潮。问题在于这次罢工浪潮暴露了我们一些组织的缺点，暴露了我们一些党组织和工会组织不过问企业中所发生的事件的现象；这次罢工浪潮也暴露了我们党内存在着一些力求瓦解党的、实质上是反共的秘密组织。所有这些因罢工浪潮而暴露出来的缺点都以如此耀眼的闪光，如此令人清醒的光线映射到党的

身上，使党感到必须改变党内状况。

党内政策问题恰恰在这个时期尖锐化的第二个原因是我们党员同志大批休假。休假当然是完全合理的，但是休假的人很多就使得党内生活的节拍恰恰在工厂里产生不满情绪的时候大大地缓慢了，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促使积累下来的缺点恰恰在今年秋天这个时期暴露出来。

党内生活的缺点

我已经讲过，我们党内生活的缺点是在今年秋天暴露出来的，这些缺点提出了改善党内生活的问题。这些党内生活的缺点究竟是什么？是不是象有些同志所想象的那样是党的路线不正确，或者党的路线是正确的，但在实践中却离开了正确的道路，由于某些主观和客观的条件而被歪曲了？

我认为我们党内生活的主要缺点是：虽然体现在我们历次代表大会决议中的党的路线是正确的，但地方（当然不是任何地方，而是某些地区）上的实践是不正确的。虽然我们党的无产阶级民主路线是正确的，但地方上在实践中用官僚主义的态度歪曲了这一路线。

这就是主要的缺点。历次代表大会（第十次、第十一次、第十二次）所确定的党的基本路线和我们的地方组织在执行这一路线时的实践之间存在着矛盾，——这就是党内生活一切缺点的根源。

党的路线说，我们党的实践中的最重要问题（当然，那些急待解决的或者有关军事秘密和外交秘密的问题除外）一定要在党的会议上进行讨论。党的路线就是这样说的。但是党的地方（当然不

是任何地方)上的实践却认为:党内实践中的一些问题实在没有多大必要在党的会议上进行讨论,因为中央和其他领导组织自己会解决这些问题。

党的路线说,如果没有象党龄等等不可克服的障碍存在,我们党的负责人就一定要由选举产生。你们知道,按党章规定,省委书记必须是十月革命前入党的,县委书记必须有三年党龄,支部书记必须有一年党龄。但是党的实践却往往认为,既然需要党龄,那就是说不需要真正的选举了。

党的路线认为,必须使党员群众了解经济机关、企业和托拉斯的工作,因为我们的党支部对企业中的缺点对非党群众负有道义上的责任。然而党的实践却认为,既然有中央委员会向经济机关发布指示,既然经济机关受这些指示的约束,即使没有党员群众自下而上的监督,这些指示也是会被执行的。

党的路线认为,各部门的负责工作人员,不论是党的工作人员、经济工作人员、工会工作人员或军事工作人员,尽管他们在自己的工作中各有专业,但是他们相互之间还是要有联系,他们都是一个整体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因为他们都是为无产阶级的共同事业工作,而这个事业是不能分裂成几部分的。党的实践却认为,既然有工作上的专业化,有党本身的工作、经济工作、军事工作等等的分工,党的工作人员就可以不对经济工作人员负责,经济工作人员就可以不对党的工作人员负责,他们之间的联系就必然削弱甚至失掉。

同志们,在我们历次代表大会(从第十次代表大会到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一系列决议中所确定的党的路线和党的实践之间的那些矛盾,总的说来就是如此。

我决不因为党的路线被这样歪曲而责备地方组织,因为,如果

分析一下,这里与其说是我们地方组织的过错,不如说是它们的不幸。这种不幸表现在哪里,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这一点我在下面要讲到,但是,我想把这一事实肯定下来,以便解释这种矛盾,然后试图提出改进办法。

我也决不认为我们中央没有过错。它同其他一切机关和组织一样也有一些小过错,——中央在这里也有一部分过错和一部分不幸,中央的这一部分过错,至少表现在它由于某种原因而没有及时揭露这些缺点,没有设法克服这些缺点。

但是现在问题不在这里。现在问题是要弄清我刚才讲过的这些缺点产生的原因。这些缺点究竟是怎样造成的呢?怎样才能把它们消灭呢?

造成缺点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我们的党组织还没有铲除或者至今还没有铲除战争时期的某些残余,这个时期虽然已经过去,但是在我们工作人员的头脑中留下了党内军事作风的残余。我认为这些残余表现在下面这种对党的看法上:党不是一个有主动性的机体,不是无产阶级的有主动性的战斗组织,而是类似某种机关系统,类似某种拥有高低级职员的一系列机关的综合体的东西。同志们,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看法,它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这种看法是战争时期给我们遗留下来的残余,那时我们使党军事化,不得不把党员群众的主动性问题挪到次要地位,那时战斗命令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我不记得这种看法曾经以完备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是这种看法或者这种看法的因素仍然对我们的工作有重大影响。同志们,我们必须

竭尽全力同这种看法作斗争,因为它是最现实的危险之一,这些危险为在实践中歪曲我党实质上正确的路线造成有利条件。

第二个原因是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官僚主义的国家机关对党和党的工作人员有某种压力。1917年,当我们向上走的时候,向十月革命走的时候,我们是这样想的:我们将要有公社,这种公社将是劳动者的联合,我们将消灭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如果不在最近时期内,那末经过两三个短短的时期,国家就能变成劳动者的联合。可是实践表明,这对我们说来还是一种遥远的理想,要使国家摆脱官僚主义分子,要把苏维埃社会变成劳动者的联合,人民必须有高度的文化水平,周围必须有完全有保障的和平环境,有了这种环境就没有必要保存大量的常备军,保存常备军是需要大量的开支和庞大的机构的,因此它的存在就会影响其他一切国家机关。我们的国家机关在很大程度上是官僚主义的机关,而且在长时期内还会是这样的机关。在这个机关里工作的有我们的党员同志,而这个官僚主义机关的环境——据我看来是气氛——是这样的:它促使我们的党的工作人员、我们的党组织官僚化。

同志们,造成缺点的第三个原因是我们的一些支部缺乏积极性,落后,有的甚至全部是文盲,边疆地区尤其是如此。这些地区的支部很不积极,政治上和文化上都落后。毫无疑问,这种情况也给歪曲党的路线造成了有利条件。

第四个原因是地方上缺乏足够数量的受过训练的党员同志。不久以前,我在中央委员会听过一个乌克兰组织的代表的报告。作报告的同志极有才能,前途远大。他说,一百三十个支部中有八十一个支部的书记是由省委委派。有一种意见认为这个组织这样做是不对的,对此,这位同志摆出如下事实:支部里没有识字的人、没有够党龄的人,是支部自己请求派书记给它们等等。我可以这样说,

这位同志有百分之五十是说得过火的,事实上,这里的问题不但在于支部里没有受过训练的人,而且在于省委会过于热心和沿袭旧传统。但是,如果省委会有一半正确,那么,既然在乌克兰有这样的支部,在组织很年轻、党员干部和识字的人都比乌克兰少的边疆地区就更应该有这样的支部,这难道还不明显吗?这也是为在实践中歪曲我党实质上正确的路线造成有利条件的一个原因。

最后,第五个原因是通报工作做得很差。我们的通报工作,首先是中央的通报工作做得不好,这可能是因为它的工作过于繁忙。地方上也很少向我们汇报。应该结束这种情况了。这也是我们党内的缺点积累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

怎样消灭党内生活的缺点?

必须采取哪些办法来消灭这些缺点呢?

第一,必须用一切办法不倦地反对我们党内的战争时期的残余和习惯,反对下面这种错误的看法:我们党似乎是一个机关系统,而不是积极思考、有主动性、充满活力、破坏旧事物和创造新事物的无产阶级的战斗组织。

第二,必须提高党员群众的积极性,党员群众所关心的一切问题,只要可以公开讨论,都让他们进行讨论,对于各级党机关所提出的一切建议,保证能够自由地进行批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党的纪律成为真正自觉的真正铁的纪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党员群众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经验丰富起来。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为党员群众准备必要的条件,逐步地从下层选拔出新的积极的工作人员和新的领导者。

第三,如果没有象党龄不够等等不可克服的条件存在,那么一切党组织和负责人必须真正由选举产生。在提拔某些同志担任党的负责工作时,必须从实践中铲除忽视组织内大多数人的意志的现象,必须真正贯彻选举原则。

第四,在中央委员会、省委员会和州委员会下面必须有常设的各部门负责工作人员(经济工作人员、党的工作人员、工会工作人员、军事工作人员)会议;必须定期召开会议,在会上提出会议认为必须提出的问题;必须使各种工作人员之间的联系不致中断,使所有这些工作人员感到自己是一个党的大家庭里的一员,是在为一个共同的、不可分割的事业即无产阶级的事业工作;必须在中央和地方组织周围造成一种环境,使党能够取得和检验我们各部门负责工作人员的工作经验。

第五,必须把我们生产部门的党支部吸引到与企业 and 托拉斯的工作进程有关的问题方面来。必须使支部了解我们企业和联合企业的管理机关的工作,使它们能够影响这一工作。你们是支部的代表,你们一定知道我们生产部门的支部在企业的工作进程方面向非党群众所负的道义上的责任多么大。支部要能够在工厂里领导并带领非党群众,能够对企业的工作进程负责(对于企业中的缺点,支部无条件地向非党群众负道义上的责任),就应该了解这些工作,就应该有可能这样或那样地去影响这些工作。因此,必须吸引支部讨论与企业有关的经济问题,必须经常举行有托拉斯内部各企业的支部代表参加的经济会议来讨论与托拉斯各项工作有关的问题。这是为丰富党员群众在经济方面的经验以及组织自下而上的监督所必需的可靠方法之一。

第六,必须提高我们党支部的质量。季诺维也夫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说过,我们某些地方的党支部在质量上落后于周围的非党群

众。

当然,这种说法不能概括和适用于所有的支部。确切些说大概是这样:如果我们没有把我们的党支部弄得很空虚,如果我们没有从这些支部里调人出来担任经济、行政、工会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工作,那么这些支部的文化水平要比现在高得多,在非党群众中也会享有更高的威信。如果近六年来我们从支部调走的所有工人同志、所有干部都回到自己的支部,那么这些支部就会比一切非党工人,即使是很有见识的非党工人强好几倍,这难道还用证明吗?正因为党没有另外的干部来改善国家机关,正因为党今后仍然不得不利用这个源泉,如果我们不采取紧急办法来改善我们支部的质量,那么它们的文化水平今后还是不能很快提高。首先必须在支部里尽量加强党的教育工作。此外,必须抛弃我们的地方组织有时在接收工人同志入党时表现出来的那种多余的形式主义。我认为不应当醉心于形式主义;党可以而且应当放宽从工人阶级队伍中接收新党员的条件。地方组织已经开始进行这项工作。党应当掌握这项工作并开展一个有组织的运动,以促进从产业工人中吸收新党员。

第七,必须加强非党工人工作。这也是一种能够改善党内状况、提高党员群众积极性的办法。我必须指出,我们的组织对吸引非党工人参加我们苏维埃机关至今还很少注意。比如拿现在正在进行的莫斯科苏维埃选举来说。我认为这次选举的一个重大缺点就是非党人士当选太少。据说组织上决定至少要有一定数量的非党人士当选,要占一定的比例等等。但是,我看到实际上他们当选的人数要少得多。据说群众似乎拚命想选共产党员。同志们,我对这一点表示怀疑。我认为,如果我们不对非党人士表示某种最低限度的信任,非党人士就会相应地对我们的组织表示很大的不信任。同志们,对非党人士的这种信任是绝对必要的。必须促使共产党员

放弃自己的候选资格。不要老是说只选共产党员，要鼓励非党人士，要吸收他们参加管理国家的工作。我们一定能因此得到好处，我们的组织一定能因此得到非党人士的相应的信任。莫斯科的选举就是一个例子，它说明我们的组织是怎样不去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不去逐步地把非党人士团结在自己的周围，而开始闭关自守起来。

第八，必须加强农民工作。我们有些地方的农村支部枯萎了，它们的成员有时跑掉了，它们没有得到农民很大的信任（这一点必须承认）。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能向这些支部提出一些实际任务，例如提出下面两项任务：第一，解释和宣传同农民生活有关的苏维埃法令；第二，宣传和普及农艺基本知识，例如必须适时耕地，必须选种等等。同志们，你们是否知道，如果每个农民都有决心花一点工夫去选种，那么不经过任何土壤改良，不使用新的机器，每俄亩的产量就可以增加十普特左右？每俄亩的收成增加十普特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总产量每年增加十亿普特。这一切是不用花很大力量就可以得到的。我们的农村支部为什么不能做这些工作呢？难道这不比谈论寇松的政策重要吗？只有这样做，农民才能了解共产党员已经停止空谈，已经行动起来；只有这样做，我们的农村支部才能得到农民极大的信任。

关于在能够提供新干部的青年中、在红军中、在妇女代表中以及在一切非党人士中加强党的教育工作和政治教育工作对改善和活跃党的生活是多么必要，我就不讲了。

加强我在前面所谈到的通报工作即加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通报工作对于我们是多么必要，我也不多讲了。

俄亩是俄国地积单位，一俄亩等于一点零九公顷，合十六点三五市亩。——编者注

普特是俄国重量单位，一普特等于十六点三八公斤。——编者注

同志们,这就是中央早在今年9月规定的必须自下而上实行的改进办法,也就是党内民主的方针。

现在我想谈谈《真理报》⁶²上一些争论性的短文中所暴露出来的关于工人民主问题的两种极端的过分的看法。

第一种极端看法涉及选举问题。这就是有些同志竭力主张“彻底”选举。既然要选举,那就尽量选举吧!党龄吗?为什么要它呢?选你愿意选举的人吧。同志们,这种看法是错误的。这种看法党是不能接受的。当然,现在我们没有战争,我们处在和平发展时期。但是,我们有新经济政策。同志们,这一点是不能忘记的。清党不是在战时而是在战后开始的。为什么呢?因为在战时,党面临生死存亡的问题,失败的恐惧使党团结成一个整体,党内的一些腐化分子也不得不执行党的总路线。现在我们的头上已经没有这些箍了,因为已经没有战争了,现在我们有新经济政策,我们容许资本主义存在,资产阶级正在复活。诚然,这一切都使党纯洁,使党巩固,但是另一方面,有一种资产阶级出生和成长的新气氛笼罩着我们,资产阶级虽然还不是那么强大,但是已经能够在国内商业方面击败我们某些合作社和商业机关了。正是在新经济政策实行以后党才开始清党,把党员的人数减少了一半;正是在新经济政策实行以后党才决定:为了保护我们的组织,使它不受新经济政策的影响,必须使非无产阶级分子入党的条件更严格,必须规定党内负责人的党龄等等。党制定了这些限制“扩大的”民主的预防办法,是否做得对呢?我认为是做得对的。正因为如此,我认为民主是必需的,选举是必要的,但是第十一次和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所规定的限制办法,至少是其中的一些主要办法,也应当仍然是有效的。

第二种极端看法涉及争论的范围问题。这就是有些同志竭力主张无限制的争论。他们认为讨论问题是党的工作的全部,而忘记了党的工作的另一方面,即要求实现党的决议这一积极方面。至少

拉德津的短文给我的印象就是这样，拉德津企图援引托洛茨基的话来论证无限制争论的原则，说托洛茨基似乎讲过“党是思想一致者的自愿联盟”。我在托洛茨基的著作中找过这句话，但是没有找到。托洛茨基未必会把这句话当做党的定义的完善公式说出来，即使他说过，也未必说到这里就完了。党不仅是思想一致者的联盟，而且是行动一致者的联盟，是在共同的思想基础（纲领、策略）上进行斗争的行动一致者的战斗联盟。我认为这样援引托洛茨基的话是不对的，因为我知道托洛茨基是最爱强调党的工作的积极方面的中央委员之一。因此我认为拉德津的定义应该由他自己负责。这个定义会引起什么后果呢？会引起下面两种可能性中的一种：或者是党堕落成为宗派、哲学学派，因为只有在这种狭小的组织内才可能有完全的思想一致；或者是党变成争论不休的俱乐部，永远讨论，永远议论，直到形成派别，直到分裂。这两种可能性中的任何一种我们党都是不能接受的。正因为如此，我认为讨论问题是必要的，争论是必需的，但是，争论一定要有范围，以便防止党这个无产阶级的战斗部队堕落成为争论俱乐部。

同志们，在我结束我的报告的时候，我必须提醒你们不要走这两种极端。我想，如果我们摆脱了这两种极端看法，老实地坚决贯彻中央早在今年9月规定的关于党内民主的方针，我们就一定能够改进我们党的工作。（鼓掌）

载于1923年12月6日

《真理报》第277号

选自《斯大林全集》第5卷

第289—302页

关于争论 ,关于拉法伊尔 , 关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论文 和萨普尤诺夫的论文以及 关于托洛茨基的信

关 于 争 论

几星期以前展开的关于党内状况的争论 ,如果就莫斯科和彼得格勒两地的情况看来 ,大概快要结束了。大家知道 ,彼得格勒拥护党的路线。莫斯科各个主要的区也拥护中央的路线。12月11日举行的莫斯科组织全市积极工作人员大会表示完全赞同党中央的组织路线和政治路线。没有理由怀疑 ,即将举行的莫斯科组织全党代表会议一定会走莫斯科各区所走的道路。反对派 ,即一部分“左派”共产主义者⁶³(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斯土柯夫、皮达可夫等)同所谓民主集中派⁶⁴(拉法伊尔、萨普龙诺夫等)的联盟 ,已经溃不成军。

争论的过程和反对派在争论期间的那些变化都是值得注意的。

最初反对派就是要求重新审查近两年来即整个新经济政策时期党在党内建设和党内政策方面的基本路线。反对派要求彻底执行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党内民主的决议 ,同时坚决主张取消党的

第十次、第十一次和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所规定的限制办法（禁止派别活动、规定党龄等等）。可是反对派并不以此为限。它还硬说党实际上已经变成军队式的组织，党纪已经变成军纪，因而要求自上而下整刷党机关的全体成员，要求撤换主要工作人员等等。对中央的恶言和谩骂当然是够多的了。《真理报》⁶²载满了控诉中央犯有滔天罪行的文章。只是还没有把日本的地震归罪于中央罢了。

这个时期，整个中央都没有干预《真理报》上的争论，让党员完全自由地进行批评。中央甚至认为没有必要去驳斥批评家们常常提出的那些荒诞无稽的责难，认为党员有充分的自觉来独立解决所讨论的问题。

这可以说是争论的第一个时期。

后来，恶言使人生厌了，谩骂不起作用了，党员要求认真讨论问题了，于是争论就进入第二个时期。这个时期是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⁶⁵公布后开始的。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根据中央十月全会⁶⁶赞同党内民主方针的决定制定了一项有名的决议，规定了实行党内民主的条件。这样一来，争论的进程就发生了转变。现在已经不能局限于一般的批评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提出的具体计划，要求反对派或者接受这个计划，或者提出另外一个实行党内民主的、平行的、同样具体的计划。可是反对派无力提出一个自己的能够满足各级党组织要求的计划来同中央的计划对抗。反对派开始退却了。取消近两年来党在党内建设方面的基本路线的要求已经在反对派的武库中消失了。反对派关于取消党的第十次、第十一次和第十二次代表大会规定的限制民主办法的要求已经黯然失色了。自上而下整刷机关的要求缓和下来了，放到后面去了。反对派认为有必要用必须“确切阐明派别组织问题”、“改选过去委派的一切党机关”、

“废除委派制”等等提议来代替这一切要求了。值得注意的是：就连反对派的这些已经缓和了数倍的提议也被红色普列斯尼亚区和莫斯科河南岸区的组织否决了，这两个组织中绝大多数人拥护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决议。

这可以说是争论的第二个时期。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第三个时期。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反对派继续退却，可以说是狼狈退却。连反对派的那些已经褪了色的、缓和了数倍的要求，这次也从他们的决议案中勾销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最近向莫斯科组织积极工作人员大会（有一千多人参加）提出的决议案（似乎已经是第三个）中写道：

“只有同心协力和真心诚意地迅速执行政治局的决议，特别是通过改选来革新党内机关，才能保证我们党没有震动和没有内部斗争地转到新的方向，才能加强党的队伍的真正团结和统一。”

就连反对派的这个完全没有害处的提议也被大会否决了，这一事实决不能认为是偶然的。大会以绝大多数通过了关于“赞同中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决议，这也不是偶然的。

关于拉法伊尔

我认为拉法伊尔是目前反对派的，或者确切些说，是目前反对派联盟的最忠实最典型的代表。拉法伊尔在一次辩论会上说，我们党实际上已经变成一个军队式的组织，党纪已经变成军纪，因此必须自上而下整刷党的全部机关，整刷这个不中用的、违背真正的党性的机关。据我看来，在目前反对派分子的头脑中是存在着诸如此类的思想的，但是，他们由于种种顾虑而不敢把这种思想暴露出

来。应当承认,拉法伊尔在这方面要比他的反对派同伙勇敢。

不管怎样,拉法伊尔的这种说法是根本不对的。他的说法不仅在形式上不对,而且首先在实质上不对。因为我们党如果的确已经变成或者只是开始在变成一个军队式的组织,那么我们就不会有名副其实的党,就不会有无产阶级专政,就不会有革命,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什么是军队呢?

军队是从上面建立起来的一种封闭式的组织。军队的实质在于:领导军队的是由上面任命并按照强制原则编制军队的司令部。司令部不仅要编制军队,而且还要供给军队给养、被服、鞋袜等等。全军在物质上完全依赖司令部。军纪也建立在这上面,违犯军纪可以招致特殊的最严厉的处罚——枪决。也正因为如此,司令部仅仅根据自己的战略计划就能随时随地调动军队。

什么是党呢?

党是根据自愿原则从下面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党也有自己的司令部,但它不是由上面任命,而是由全党自下选举的。不是司令部编制党,恰恰相反,是党编制自己的司令部。党本身是根据自愿原则编制起来的。在党的司令部和全党之间没有上面所说的军队中的那种物质上的依赖关系。党的司令部不供给党给养、食物和被服。也正因为如此,党的司令部不能随时随地任意调动党的队伍,党的司令部只能根据本阶级(党本身就是这个阶级的一小部分)的经济和政治利益来领导全党。因此,党纪具有特殊的性质,它主要以说服方法为基础,而和主要以强制方法为基础的军纪不同。因此,党内最严厉的处罚(开除党籍)和军队中最严厉的处罚(枪决)有根本的差别。

只要把这两个定义比较一下,就能了解拉法伊尔的错误多么

严重。

他说,党已经变成一个军队式的组织。但是,既然党在物质上不依赖自己的司令部,既然党是根据自愿原则从下面建立起来的,既然党自己编制自己的司令部,那么党怎么能变成一个军队式的组织呢?如果党变成了军队式的组织,那么工人源源不断地入党,党在非党群众中的影响日益扩大,党在全世界劳动阶层中间享有威望,又怎样解释呢?

二者必居其一:

或者党是极其消极的、被动的,——那就无法解释,这样一个消极而被动的党怎么能领导世界上最革命的无产阶级,并且好几年来一直管理着世界上最革命的国家。

或者党是积极的、主动的,——那就不能理解,这样一个积极而主动的党为什么在这个时期内没有废除党内的军事制度,假如党内真有这种制度的话。

我们党进行了三次革命,击溃了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现在正摇撼着世界帝国主义的基础,这个党一星期也不能容忍拉法伊尔轻率地所说的那种军事制度和命令制度,它不等到拉法伊尔发出号召就会立刻废除这些制度并建立新的制度,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梦是可怕的,但上帝是仁慈的。事实是,第一,拉法伊尔把党和军队混为一谈了,因为他显然既没有真正了解党,也没有真正了解军队。第二,看来拉法伊尔自己也不相信自己的发现。他所以要说党内有命令制度这类“可怕的”话,是为了论证目前反对派的基本口号:(一)要有派别活动的自由;(二)从上到下撤换党的领导人。

看来,拉法伊尔感到不说这类“可怕的”话就不能偷运这些口号。

全部实质就在这里。

关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论文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认为,党内生活有缺点的主要原因是党在党的建设方面的基本路线不正确。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断言:“党在党内政策方面实行根本不正确的路线已有两年了”;“新经济政策时期党在党内建设和党内政策方面的基本路线”是不正确的。

党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基本路线是什么呢?党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关于工人民主的决议。党通过这项决议是否正确呢?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认为是正确的。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还规定了严格限制民主的办法(禁止派别活动)。党规定这种限制是否正确呢?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认为不正确,因为在他看来,这种限制会束缚党的独立思考。党在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规定了限制民主的新办法(规定一定的党龄等等)。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只是确认了这些限制。党规定这些限制来防止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小资产阶级倾向的侵袭,这是否正确呢?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认为不正确,因为在他看来,这些限制会束缚各级党组织的主动性。结论很明显: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提议取消党的第十次和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在新经济政策情况下通过的党在党内建设和党内政策方面的基本路线。

但是,党的第十次和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是在列宁同志直接领导下举行的。关于禁止派别活动的决议(关于统一的决议)是列宁同志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提出并争取通过的。关于进一步限制民主(规定一定的党龄等等)的决议是列宁同志亲自参加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是否想到,他实际上就是提议取消同列宁主义有着有机联系的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路线

呢？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是否开始懂得，他提议取消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党在党的建设方面的基本路线，实质上就是重复那个要求修正列宁主义的臭名远扬的“匿名纲领”¹⁶⁷中的某些提议呢？

只要提出这些问题，就可以了解党是不会走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道路的。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提议究竟是什么呢？他的提议不折不扣就是恢复“1917—1918年样式的”党内生活。1917—1918年党内生活的特点是什么呢？当时的特点是：我们党内存在着派别集团，公开进行派别斗争，党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要求至少“局部地”恢复这种已被第十次代表大会废除的党内制度。党能不能走这条道路呢？不，不能。第一，因为恢复新经济政策施行前即1917—1918年样式的党内生活，不符合而且也不可能符合党在新经济政策施行后即1923年条件下的要求。第二，因为恢复过去的派别斗争制度必然会破坏党的统一，特别是现在，在列宁同志不能视事的时候。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爱把1917—1918年的党内生活状况描绘成一种合乎愿望的理想的东西。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时期的党内生活有许多黑暗面，引起了党的极大震动。布尔什维克的党内斗争似乎从来没有象这个时期即布列斯特和约时期⁵²这样激烈。例如，大家知道，当时已经形成一个独立派别的“左派”共产主义者竟狂妄到公然说要撤换当时的人民委员会，而代之以由新的人物、由“左派”共产主义者派别内的人物组成的新的人民委员会。现在的一部分反对派分子（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皮达可夫、斯土柯夫等等）就是当时“左派”共产主义者派别的成员。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是否想在我们党内“恢复”这种“理想的”旧制度呢？

显然,党是无论如何不会同意这种“恢复”的。

关于萨普龙诺夫的论文

萨普龙诺夫认为党内生活有缺点的主要原因是党的机关里存在着“党学究”和“女学监”,他们按照“学校方法”来“教育党员”,因而阻碍党员在斗争过程中受到真正的教育。这样,萨普龙诺夫就把我们党的机关的工作人员说成了“女学监”,他却不想问一问: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党学究”怎么会在我们党的工作中占优势。萨普龙诺夫把这种极其危险极能蛊惑人心的论点当作已经证实的东西提出时,忘记了马克思主义者不能满足于简单的格言,他首先应当了解现象(如果它事实上的确存在),说明现象,进而提出切实可行的改进办法。可是,萨普龙诺夫显然是不理睬马克思主义的。他不管怎样都要辱骂党的机关,以为这样做,其他一切就好办了。照萨普龙诺夫看来,“党学究”的恶意就是造成我们党内生活缺点的原因。不用说,这是一个多么正确的解释。

不过有两点令人不能理解:

(1)这些“女学监”和“党学究”怎么能保持住对世界上最革命的无产阶级的领导?

(2)受“女学监”教育的我们“党的学生”怎么能保持住对世界上最革命的国家的领导?

显然,空谈“党学究”无论如何要比了解和评价我们党机关的极大的优点容易得多。

萨普龙诺夫打算怎样医治我们党内生活的缺点呢?他用的药象他的诊断一样简单。“重新审查我们的军官”,撤换现在的工作人

员，——这就是萨普龙诺夫所用的药。他认为这就是实行党内民主的基本保证。我决不否认，从民主的角度来看，改选对改进我们党内生活是有意义的。但是把这一点看做基本保证，那就是既不了解党内生活，也不了解党内生活的缺点。在反对派队伍中，有象别洛博罗多夫、罗森霍尔茨、皮达可夫、阿尔斯基、贝克这样的人。别洛博罗多夫的“民主”至今还留在罗斯托夫工人人们的记忆中；罗森霍尔茨的“民主”使我们的水运员工和铁路员工吃了苦头；皮达可夫的“民主”使整个顿巴斯不是号叫而是痛哭；阿尔斯基的“民主”是大家都知道的；贝克的“民主”使花拉子模至今还在痛哭。萨普龙诺夫是否认为，由上面列举的那些“可敬的同志”来代替现在的“党学究”，民主就能在党内取得胜利？我对这一点有些怀疑。

显然，有两种民主：一种是党员群众的民主，这些党员群众极愿意发挥主动性并积极参加党的领导工作；另一种是有不满情绪的党内要人的“民主”，这些党内要人认为民主的实质就是用一些人代替另一些人。党一定会赞成第一种民主，并且要坚决地实现这种民主。党一定会抛弃有不满情绪的党内要人的“民主”，因为它和真正的党内工人民主毫无共同之处。

为了保证党内民主，首先必须铲除我们某些工作人员头脑中存在的那些战争时期的残余和习惯，使他们不再把党看作一个机关系统，而看作一个有主动性的机体。可是这些残余在最短期间是铲除不了的。

其次，为了保证党内民主，必须克服我们拥有近百万职员官僚主义的国家机关对只有两三万工作人员的党机关所加的压力。但在最短期间是不能克服这部笨重机器的压力并使它服从自己的。

最后，为了保证党内民主，必须提高我们许多落后支部的文化

水平,并且把积极的工作人员合理地分配到全联盟的各个地区。这一点也不是最短期间所能做到的。

由此可见,保证充分的民主,并不象萨普龙诺夫所想象的那样简单,当然,如果指的不是萨普龙诺夫的那种空洞的形式上的民主,而是真正的非伪造的工人民主的话。

显而易见,为了保证和实现真正的党内民主,就必须自下而上振奋全党的意志。

关于托洛茨基的信

12月7日公布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关于党内民主的决议是一致通过的。托洛茨基是赞成这个决议的。因此本来可以期望,中央委员(包括托洛茨基在内)一定会一致号召党员同心协力地支持中央和中央的决议。可是,这种期望没有实现。前几天托洛茨基写了一封信给各地党的会议,这封信的用意不能作别的解释,只能说是想削弱党员一致支持中央和支持中央立场的意志。

请你们自己判断吧。

托洛茨基在讲到党机关的官僚主义、讲到老近卫军即我们党的基本核心列宁主义者有蜕化危险的时候写道:

“‘老近卫军’的蜕化在历史上发生过不止一次。就拿第二国际的领袖和政党这个最新最显著的历史实例来说。我们知道,威廉·李卜克内西、倍倍尔、辛格尔、维克多·阿德勒、考茨基、伯恩斯坦、拉法格、盖得等等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教导出来的学生。但是,我们知道,所有这些领袖——有些人是局部地,另一些人是全部地——都蜕化到机会主义方面去了……”我们,

正是我们这些‘老头子’应当说，我们这一代在党内自然是起领导作用的，可是，假如我们容许党内继续坚持和推行机关官僚主义的方法来执行政策，使青年一代变成教育的消极对象，因而必然使机关同群众、老年人同青年人疏远，那么我们自身就没有任何充分的保证，可以使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不会逐步地不知不觉地沉下去……”青年是党的最可靠的晴雨表，对党的官僚主义的反应最敏感……”青年必须通过战斗领会革命公式……”

第一，我必须消除一种可能引起的误解。从托洛茨基的信中可以看出，他自命为布尔什维克老近卫军，以此表示他有决心承担那些可能落到老近卫军头上的责难，如果老近卫军真正走上蜕化道路的话。应当承认，这种自我牺牲的决心无疑是一种可贵的优点。但是，我要保护托洛茨基，使他不致自己打自己，因为由于明显的原因，他不能而且也不应当承担布尔什维克老近卫军骨干可能蜕化的责任。牺牲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是老布尔什维克需要这种牺牲吗？我认为不需要这种牺牲。

第二，令人不解的是：怎么能把象伯恩施坦、阿德勒、考茨基、盖得等等这样的机会主义者和孟什维克，同一直反对而且一定还会光荣地反对机会主义、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的布尔什维克老近卫军混为一谈呢？这种糊涂思想，这种混淆是非的做法是怎么产生的呢？如果从党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某些决不是要维护老近卫军的次要想法出发，那么谁需要这些东西呢？关于在反机会主义斗争中成长起来的老布尔什维克已经染上机会主义的那种暗示，又怎样理解呢？

第三，我决不认为老布尔什维克绝对不会有蜕化的危险，正象没有理由断言我们这里绝对不会发生地震一样。可以而且应当设想，这种危险是可能发生的。但这是不是说，这种危险是现实的已经发生的危险呢？我认为不能这样说。就连托洛茨基本人也没有

提出任何材料来说明蜕化的危险是现实的危险。可是我们党内有一些人会使我们党的某些队伍产生真正蜕化的危险。我指的是一部分孟什维克,他们加入我们党是不得已的,而且还没有根除机会主义的旧习气。下面就是列宁同志在清党时期关于这些孟什维克和这种危险所写的一段话:

“一切机会主义者都善于适应环境……而孟什维克这班机会主义者可以说是‘从原则上’来适应在工人中占统治地位的政派的,他们涂着保护色,正象兔子一到冬天就变成白色一样。应该懂得并估计到孟什维克的这个特点。所谓估计到这个特点,就是说,在1918年以后,即在布尔什维克起初可能尔后无疑会获得胜利时混入俄国共产党的全部孟什维克,大约有百分之九十九要清除出党。”(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7卷第13页)

托洛茨基怎么会忽视这一类实际存在的危险,而把可能发生的危险,即布尔什维克老近卫军蜕化的危险提到首要地位呢?如果从党的利益出发,而不打算破坏中央大多数即布尔什维克老近卫军的领导核心的威信,那么怎么能闭眼不看现实的危险,而把实际上是不现实的可能发生的危险提到首要地位呢?这种“见解”只能有利于反对派,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第四,托洛茨基怎么会把可能蜕化的“老头子”和党的“最可靠的晴雨表”“青年”对立起来,把可能官僚主义化的“老近卫军”和必须“通过战斗领会革命公式”的“青年近卫军”对立起来呢?怎么会把他们对立起来呢?为什么要把他们对立起来呢?难道青年和老近卫军不是向来就团结一致地抗击国内外敌人的吗?难道“老头子”和“年轻人”的团结不是我国革命的基本力量吗?怎么会侮辱老近卫军并蛊惑性地阿谀青年,在我们党的这两支基本队伍中间制

造并扩大裂缝呢？如果从党的利益、党的统一和党的团结出发，而不是想动摇党的统一以迎合反对派的心意，那么谁需要这样做呢？

难道是这样来维护中央和中央一致通过的关于党内民主的决议吗？

可是，当托洛茨基写信给各地党的会议的时候，他显然并没有给自己规定这种任务。显然，这里是别有用心的，那就是：在维护中央决议的幌子下用外交手腕支持反对派反对党中央。

正因为如此，托洛茨基的信中有两面性的痕迹。

托洛茨基和民主集中派及一部分“左派”共产主义者结成了联盟，——这就是托洛茨基的言论的政治意义。

载于 1923 年 12 月 15 日

《真理报》第 285 号

署名：约·斯大林

选自《斯大林全集》第 5 卷

第 303—316 页

悼 列 宁

(1924年1月26日在全苏苏维埃
第二次代表大会⁶⁸上的演说)

同志们！我们共产党人是具有特种性格的人。我们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战略家的军队，列宁同志的军队，就是由我们这些人组成的。在这个军队里做一个战士，是再光荣不过的了。以列宁同志为创始人和领导者的这个党的党员称号，是再高尚不过的了。并不是任何人都能做这个党的党员。并不是任何人都能经得住这个党的党员所必须经历的种种苦难和风暴。工人阶级的儿女，在贫困和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儿女，在千辛万苦和英勇奋斗中成长起来的儿女，——首先就是这些人应当成为这个党的党员。正因为如此，列宁主义者的党，共产主义者的党，同时也叫做工人阶级的党。

列宁同志和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要珍重党员这个伟大称号，并保持这个伟大称号的纯洁性。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我们一定要光荣地执行你的这个遗嘱！

二十五年来列宁同志培养了我们党，把我们党培养成为世界上最坚固最有锻炼的工人党。沙皇政府及其走狗的打击，资产阶级和地主的疯狂暴行，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武装袭击，英国和法国的武装干涉，一切资产阶级报刊异口同声的造谣和诬蔑，——二十五年来所有这一切恶毒的攻击都落在我们党的头上。可是，我们党象一座石山一样屹立着，打退了敌人无数次的攻击，引导工人阶级向

胜利前进。我们党在残酷的战斗中锻炼了自己队伍的统一和团结。它依靠统一和团结战胜了工人阶级的敌人。

列宁同志和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要保护我们党的统一，如同保护眼珠一样。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我们也一定要光荣地执行你的这个遗嘱！

工人阶级的命运痛苦不堪。劳动者备受折磨和苦难。奴隶和奴隶主，农奴和农奴主，农民和地主，工人和资本家，被压迫者和压迫者，——自古以来世界就是这样构成的，而且现在绝大多数国家都还是这样的。千百年来，劳动者数十次数百次地企图推翻压迫者，使自己成为自己生活的主宰。但是他们每一次都遭到失败，受到侮辱，不得不退却，不得不把委屈和耻辱、愤怒和绝望埋在心里，仰望茫茫的苍天，希望在那里找到救星。奴役的枷锁依然如故，或者旧枷锁只是被一些同样沉重同样侮辱人的新枷锁所代替。只有在我们国家里，被压迫被践踏的劳动群众才推翻了地主和资本家的统治，建立了工人和农民的统一。同志们，你们知道，而且现在全世界都承认，这个伟大的斗争是由列宁同志和他的党领导的。列宁的伟大首先就在于他创立了苏维埃共和国，从而在事实上向全世界被压迫群众表明了：得救的希望并没有丧失，地主和资本家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劳动王国是可以靠劳动者自身的努力来建立的；劳动王国是应该建立在地上，而不应该建立在天上的。这样，他就激发了全世界工人争取解放的热望。这也就说明为什么列宁的名字成了被剥削的劳动群众最爱戴的名字。

列宁同志和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要保护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我们也一定不遗余力来光荣地执行你的这个遗嘱！

我国无产阶级专政是建立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的。这是苏维

埃共和国的第一个和根本的基石。工人和农民不结成这样的联盟就不能战胜资本家和地主。工人没有农民的支持就不能打倒资本家。农民没有工人的领导就不能打倒地主。我国国内战争的全部历史说明了这一点。可是巩固苏维埃共和国的斗争还远没有结束，它只是采取了一种新的形式。从前工农联盟具有军事联盟的形式，因为它是以反对高尔察克和邓尼金为目标的。现在工农联盟应当采取城市和乡村间、工人和农民间经济合作的形式，因为它以反对商人和富农为目标的，因为它以工人和农民互相供给一切必需品为目标的。你们知道，没有一个人象列宁同志那样坚决地执行过这个任务。

列宁同志和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要竭力巩固工农联盟。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我们也一定要光荣地执行你的这个遗嘱！

我国各民族劳动者的联盟是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基石。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巴什基尔人和白俄罗斯人，格鲁吉亚人和阿塞拜疆人，亚美尼亚人和达吉斯坦人，鞑靼人和吉尔吉斯人，乌兹别克人和土库曼人，——他们都同样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休戚相关。不仅无产阶级专政使这些民族摆脱枷锁和压迫，而且这些民族也以他们对苏维埃共和国的无限忠诚，以他们为苏维埃共和国牺牲的决心来使我们苏维埃共和国免遭工人阶级的敌人的暗算和袭击。正因为如此，列宁同志始终不倦地对我们说明我国各族人民自愿联盟的必要性，说明我国各族人民在共和国联盟内实行兄弟合作的必要性。

列宁同志和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要巩固并扩大共和国联盟。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我们也一定要光荣地执行你的这个遗嘱！

我们的红军，我们的红海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三个基石。列

宁曾屡次对我们说过,我们从资本主义国家那里争得的喘息时机可能是很短的。列宁曾屡次向我们指出,巩固红军和改善红军状况是我们党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和寇松最后通牒⁶⁹以及和德国危机⁷⁰有关的事变再一次证实了列宁向来是正确的。同志们,我们来宣誓:我们一定不遗余力地来巩固我们的红军,巩固我们的红海军!

处在资产阶级国家汪洋大海包围中的我国,象一座巨大的石山一样屹立着。波浪一个接着一个地向它冲击,声势汹汹地要把它淹没,把它冲毁。但是这座石山仍然屹立不动。我国的力量何在呢?这不仅因为我国建立在工农联盟上,它体现着各自由民族的联盟,它受到红军和红海军的强有力的保护。我国的力量,它的坚强巩固,就在于它得到全世界工人和农民深刻的同情和坚决的支持。全世界工人和农民都想保全苏维埃共和国,认为这是列宁同志用他百发百中的妙手射入敌人阵营的一枝箭,是他们希望摆脱压迫和剥削的靠山,是给他们指出解放道路的可以信赖的灯塔。他们想保全苏维埃共和国,不让地主和资本家破坏它。我们的力量就在这里。世界各国劳动者的力量就在这里。全世界资产阶级的虚弱也在这里。

列宁从来没有把苏维埃共和国看作最终目的。他始终把它看作加强西方和东方各国革命运动的必要环节,看作促进全世界劳动者战胜资本的必要环节。列宁知道,不仅从国际的观点来看,而且从保全苏维埃共和国本身的观点来看,只有这样的见解才是正确的。列宁知道,只有用这样的方法,才能鼓舞全世界劳动者去进行争取解放的坚决战斗。正因为如此,列宁这位无产阶级英明的领袖中最英明的领袖,还在无产阶级专政成立的第二天,就奠定了工人国际的基础。正因为如此,列宁始终不倦地扩大并巩固全世界劳

动者的联盟——共产国际。

这几天你们已经看见有几万几十万劳动者来拜谒列宁同志的灵柩。过一些时候你们会看见有几百万劳动者的代表们来拜谒列宁同志的陵墓。用不着怀疑,在几百万劳动者的代表们后面,一定会有全世界各地几千万、几万万劳动者的代表们接踵而至,以证实列宁不仅是俄国无产阶级的领袖,不仅是欧洲工人的领袖,不仅是殖民地东方的领袖,而且是全球整个劳动世界的领袖。

列宁同志和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要忠实于共产国际的原则。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我们一定奋不顾身地来巩固并扩大全世界劳动者的联盟——共产国际!

载于 1924 年 1 月 30 日
《真理报》第 23 号

选自《斯大林全集》第 6 卷
第 42—46 页

论 列 宁

(1924年1月28日在克里姆林军校
学员晚会上的演说)

同志们！我接到通知，说你们这里要举行回忆列宁的晚会，并邀请我也来做一个报告。我认为没有必要做一个关于列宁的生平事业的连贯性的报告。我想，倒不如只把一些表明列宁作为一个人和作为一个活动家的某些特点的事实告诉大家。这些事实相互间也许没有什么内在的联系，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得到一个关于列宁的总的概念。不管怎样，我这一次向你们讲的不可能比我刚才所答应的更多。

山 鹰

我最初和列宁认识是在1903年。固然，这次认识并不是经过亲自会面，而是经过互相通信。但是这次认识给我留下了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我在党内工作的整个时期中，这个印象始终没有消失过。那时我正被流放在西伯利亚。当我知道列宁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特别是从1901年以后，在《火星报》⁹出版以后的革命活动的时候，我就深信列宁是一个非凡的人物。当时在我看来，他不是我们党的一个普通的领导者，而是我们党的实际上的创建人，因

为只有他一个人了解我们党的内部实质和迫切需要。当我拿列宁和我们党的其他领导者比较的时候,我总觉得列宁的战友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等人都远不如列宁,列宁和他们比较起来不简单是一个领导者,而且是一个最高型的领导者,是一只山鹰,他在斗争中不知恐惧为何物,大胆地引导我们党沿着前人未曾走过的俄国革命运动的道路前进。这个印象竟这样深深地印入了我的心灵,使我感到必须写封信给一位侨居国外的好友,把这个印象告诉他,要他评论一下。过了不久,当我已经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时候——这是1903年底——我收到了我那位朋友的热情的答复,以及列宁的一封简单而内容丰富的信,原来我的朋友把我那封信给列宁看过了。列宁的这封信虽然比较短,但是它对我们党的实际工作做了大胆无畏的批评,并对我们党在最近时期的全部工作计划做了非常明确扼要的说明。只有列宁才善于把最复杂的事情描写得这样简单和明确,这样扼要和大胆,——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一颗子弹。这封简单而大胆的短信使我更加确信列宁是我们党的山鹰。可惜我按过去地下工作者的习惯,把列宁的这封信同其他许多信一样烧掉了,这是我不能宽恕自己的。

从那时起,我就和列宁认识了。

谦 逊

我第一次会见列宁是在1905年12月坦默福斯(在芬兰)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⁵⁷上。我本来希望看见我们党的山鹰,看见一个伟人,这个人不仅在政治上是高大的,而且可以说在体格上也是高大的,因为当时列宁在我的想象中是一个身材匀称和仪表堂堂的巨

人。当我看见他原来是一个和凡人毫无区别的、最平常的、身材比较矮小的人的时候,我是多么失望呵……

通常,“大人物”照例是开会迟到,让会场上的人望眼欲穿地等着他出现;而且在“大人物”就要出现之前,会场上的人彼此告诫说:“嘘……静一点……他来了。”我当时觉得这一套并不是多余的,因为它能令人肃然起敬。当我知道列宁比代表们到得更早,躲在一个角落里朴实地同那些参加代表会议的最普通的代表们进行最普通的谈话的时候,我是多么失望呵。老实说,我当时觉得这未免有点违背某些必要的常规。

后来我才明白,列宁这样质朴谦逊、这样不愿表现自己、至少是不想惹人注目、不摆架子的特点,正是他的最大长处,正是他这种新群众的新式领袖,即人类最“下层”普通群众的新式领袖所具有的最大长处。

逻辑力量

列宁在这次代表会议上发表了两个精彩的演说:论目前形势和论土地问题。可惜这两篇演说词都没有保存下来。这是两个使人兴奋的、使代表会议全场欢欣鼓舞的演说。非凡的说服力,简单明了的论据,简短通俗的词句,没有矫揉造作,没有专为加深听众印象的令人头晕的手势和力求效果的词句,——这一切都使列宁的演说远胜于通常“议会”演说家的演说。

可是当时使我佩服的还不是列宁演说的这一方面。当时使我佩服的是列宁演说中那种不可战胜的逻辑力量,这种逻辑力量虽然有些枯燥,但是紧紧地抓住听众,一步一步地感动听众,然后就

把听众俘虏得一个不剩。我记得当时有很多代表说：“列宁演说中的逻辑好象许多万能的触手，从各方面把你钳住，使你无法脱身：你不是投降，就是完全失败。”

我认为列宁演说中的这个特点是他的演说艺术中最强有力的地方。

不 灰 心

我第二次会见列宁是在 1906 年我们党的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⁴¹上。大家知道，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占了少数，遭到失败。当时我第一次看见列宁处于失败者的地位。他丝毫不象那些失败后就灰心丧气的领袖。恰恰相反，失败使列宁更加精神百倍，鼓舞自己的拥护者去作新的战斗，争取未来的胜利。我现在说的是列宁的失败。但这究竟是怎样的失败呢？必须看一看列宁的反对者，即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的胜利者——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等人：他们很少象真正的胜利者，因为列宁用他对于孟什维主义的无情的批判把他们打得体无完肤了。我记得当时我们这些布尔什维克代表都聚集在一起，望着列宁，问他的意见。在某些代表的言论中流露出疲倦和气馁的情绪。我记得列宁对于这种言论用讽刺的蔑视的口气回答说：“同志们，不要灰心，我们一定会胜利，因为我们是正确的。”憎恨灰心失望的知识分子，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胜利，——这就是列宁当时告诉我们的。当时令人感到布尔什维克的失败是暂时的，布尔什维克在最近的将来一定会胜利。

“不因失败而灰心”，——这就是列宁活动中的一个特点，这个

特点使他能够把一支忠实到底和相信自己力量的军队团结在他的周围。

不 骄 傲

在下一代表大会上,即在1907年伦敦代表大会47上,布尔什维克成了胜利者。当时我第一次看见列宁处于胜利者的地位。通常胜利总会使某些领袖冲昏头脑,使他们骄傲自大起来。在这种情形下,他们往往就夸耀胜利,高枕而卧。但是列宁丝毫不象这种领袖。恰恰相反,正是在胜利以后,列宁特别警惕和戒备起来。我记得当时列宁十分坚决地教导代表们说:“第一件事就是不要陶醉于胜利,不要骄傲;第二件事就是要巩固自己的胜利;第三件事就是要彻底击溃对手,因为对手只是被打败了,但是还远没有被彻底击溃。”他狠狠地嘲笑那些轻率地断言“孟什维克从此完蛋了”的代表。他毫不困难地证明:孟什维克在工人运动中还有基础,我们还必须善于和他们作斗争,竭力避免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尤其要避免过低估计对手的力量。

“不因胜利而骄傲”,——这就是列宁性格中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使他能够冷静地估计对手的力量,保证党不遭可能发生的意外。

原 则 性

党的领袖们不能不尊重党内多数的意见。多数,这是领袖们不

能不重视的力量。列宁对这一点的了解并不亚于党内其他任何领导者。但是列宁从来没有做过多数的俘虏,尤其是当这个多数没有原则立场的时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过党内多数的意见或党的眼前利益同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相抵触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列宁总是毫不犹豫地坚持原则,反对党的多数。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他不怕独自一人去反对全体,因为他认为——正如他自己常说的那样——“原则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

下面两个事实可以特别明显地说明这一点。

第一个事实。在1909—1911年的时期,党被反革命势力打败,处于完全解体的状态。这是人们不相信党的时期;这是不仅知识分子,而且一部分工人也纷纷退党的时期;这是人们否定地下活动的时期;这是取消主义的时期,瓦解的时期。当时不仅在孟什维克中,而且在布尔什维克中也有许多派别组织和派别思想,而且大部分都是脱离工人运动的。大家知道,正是在这个时期产生了要完全取消地下组织而把工人组织成为合法的自由主义的斯托雷平党⁷¹的思想。当时只有列宁一人没有随波逐流,而高举着党性的旗帜,以惊人的耐心和非常的坚忍精神来收集党的零散残部,猛烈攻击工人运动中所有一切反党派别,以非常的勇气和空前的毅力来捍卫党性。

大家知道,在这个为党性而进行的争论中,后来列宁成了胜利者。

第二个事实。在1914—1917年帝国主义战争炽烈的时期,所有的或几乎所有的社会民主党和社会党都染上了流行的爱国主义狂热,替本国的帝国主义尽忠效劳。这是第二国际在资本面前放下自己的旗帜,连普列汉诺夫、考茨基和盖得等等一类人物都抵挡不住沙文主义浪潮的时期。当时只有列宁一人,或几乎只有列宁一人

掀起了反对社会沙文主义和社会和平主义的坚决斗争,揭露盖得之流和考茨基之流的变节行为,痛斥骑墙派“革命家”的不彻底性。列宁明知跟随他走的只有很少的少数,但是他认为这没有决定的意义,因为他知道,彻底的国际主义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有前途的政策;因为他知道,原则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

大家知道,在这个为新国际而进行的争论中,列宁成了胜利者。

“原则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这就是列宁的公式,列宁用这个公式攻占了许多新的“不可攻占的”阵地,把无产阶级优秀分子争取到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方面来。

相 信 群 众

有些政党的理论家和领袖们虽然知道各族人民的历史,钻研过革命历史的始末,可是他们有时患着一种很不体面的病症。这种病症就叫做害怕群众,不相信群众的创造能力。在这个基础上,有时就产生了领袖对群众的某种贵族态度,而群众虽然不熟悉革命历史,却负有破坏旧制度和建立新制度的使命。怕自发势力汹涌澎湃,怕群众“破坏得太多”,想充当保姆的角色,竭力照书本去教导群众,而不愿意向群众学习,——这就是这种贵族态度的基础。

列宁和这样一些领袖完全相反。我不知道还有第二个革命者象列宁这样深信无产阶级的创造力,深信无产阶级的阶级本能适合于革命。我不知道还有第二个革命者象列宁这样善于无情地打击那些傲然批评“革命的混乱状态”和“群众的胡闹行为”的人。我记得在一次谈话中,有一位同志提出意见说“革命后必须建立正常

的秩序”，列宁讽刺地回答说：“如果想做革命者的人竟忘记了革命秩序是历史上最正常的秩序，那就糟了。”

因此，列宁总是鄙弃那些瞧不起群众，想照书本去教导群众的人。因此，列宁总是不倦地教诲我们：要向群众学习，要理解群众的行动，要细心研究群众斗争的实际经验。

相信群众的创造力，——这就是列宁活动中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使他能够理解自发势力，把自发运动引上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

革 命 天 才

列宁是为革命而诞生的。他真正是组织革命爆发的天才和领导革命的伟大能手。他在革命动荡时代觉得比任何时候都自在、愉快。我完全不是想以此说明，列宁对任何革命动荡都同样嘉许，或者他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条件下都主张革命爆发。完全不是。我只是想以此说明，列宁的英明远见在任何时候都不象在革命爆发时期那样充分和明显地表现出来。在革命的转折关头，他真是才华四溢，洞察一切，预见到各阶级的行动和革命进程的可能曲折，他对这些东西简直是了如指掌。难怪我们党内常说：“伊里奇在革命波浪里游泳，就象鱼在水里一样。”

因此，列宁的策略口号是“惊人的”明确，列宁的革命计划是“出奇的”大胆。

我记得有两个事实可以特别明显地说明列宁的这个特点。

第一个事实。在十月革命前夜的时期，为后方和前线的危机所激动的千百万工人、农民和士兵要求和平和自由；将军和资产阶级

准备军事专政,以求“作战到底”;整个所谓“舆论界”,一切所谓“社会主义的政党”都反对布尔什维克,诬蔑他们是“德国间谍”;克伦斯基企图把布尔什维克党驱入(而且已经把一部分驱入)地下;还很强大的有纪律的德奥联军同我国疲惫的处于瓦解状态的军队对峙着,而西欧的“社会主义者”安然和本国政府结成联盟,以求“作战到完全胜利”……

在这样的关头举行起义是什么意思呢?在这样的情况下举行起义就是孤注一掷。但是列宁不怕冒险,因为他知道,因为他用洞察一切的目光看见:起义必不可免,起义一定会胜利,俄国的起义一定会准备好结束帝国主义战争的条件,俄国的起义一定会鼓舞西方受尽苦难的群众,俄国的起义一定会使帝国主义战争变为国内战争,起义的结果一定会成立苏维埃共和国,而苏维埃共和国一定会成为全世界革命运动的堡垒。

大家知道,列宁的这个革命预见后来空前准确地实现了。

第二个事实。在十月革命后的最初几天,人民委员会打算使叛乱的将军杜鹤宁总司令停止军事行动并开始同德军进行停战谈判。我记得当时列宁、克雷连柯(后来的总司令)和我前往彼得格勒总参谋部去用电报同杜鹤宁直接谈判。时机十分危急。杜鹤宁和大本营坚决拒绝执行人民委员会的命令。当时军队的指挥人员完全掌握在大本营手里。至于士兵,谁也不知道这一千四百万隶属于蓄意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所谓各集团军组织的军队会表示什么态度。大家知道,当时在彼得格勒正酝酿着士官生的暴动⁷²。此外,克伦斯基正向彼得格勒进军。我记得列宁在电报机旁沉默了一会,忽然容光焕发。他显然是打定主意了。他说:“我们到无线电台去吧,无线电台会帮助我们:我们下一道特别命令把杜鹤宁将军撤职,委任克雷连柯同志做总司令,越过指挥人员去号召士兵包围将军,停

止军事行动,同德奥士兵联欢,把和平事业拿到自己手里。”

这真是“冒险的一跃”。但是列宁不怕这“一跃”,反而乐于进行这“一跃”,因为他知道军队希望和平,军队将扫除和平道路上所有一切障碍而争得和平;因为他知道用这种方法来奠定和平对德奥士兵不会没有影响,用这种方法一定会毫无例外地使所有战线上要求和平的趋向加强起来。

大家知道,列宁的这个革命预见后来也完全准确地实现了。

天才的远见,迅速抓住并看透即将发生的事变的内在意义的才能,——这就是列宁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使他能够制定正确的战略和革命运动转折关头的明确的行动路线。

载于 1924 年 2 月 12 日
《真理报》第 34 号

选自《斯大林全集》第 6 卷
第 47—57 页

论列宁主义基础

(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⁷³的讲演)

献 给

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入党的同志们

约·斯大林

列宁主义的基础是个很大的题目。要详尽地论述这个题目就得写一整本书,甚至要写好几本书。因此,我的讲演自然就不能详尽地说明列宁主义,至多也只能简要地叙述列宁主义的基础。虽然如此,我认为做这样一个叙述来指出几个为顺利研究列宁主义所必需的基本出发点,还是有益处的。

叙述列宁主义的基础并不是叙述列宁的世界观的基础。列宁的世界观和列宁主义的基础按范围来说并不是一回事。列宁是马克思主义者,他的世界观的基础当然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但是由此决不能得出结论说,叙述列宁主义应当从叙述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开始。叙述列宁主义就是叙述列宁在他的著作中所加进马克思主义总宝库的、因而自然和列宁的名字分不开的那些特别的和新的贡献。我在我的讲演中只想从这个意义上来叙述列宁主义的基础。

那么,列宁主义是什么呢?

有些人说,列宁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环境的特殊条件下的应用。这个定义含有一部分真理,可是它远没有概括全部真

理。列宁确实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俄国实际情况中,而且应用得十分巧妙。但是,如果列宁主义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特殊环境中的应用,那么列宁主义就纯粹是一国的而且仅仅是一国的现象,纯粹是俄国的而且仅仅是俄国的现象了。可是我们知道,列宁主义是根源于整个国际发展过程的国际现象,而不仅仅是俄国的现象。正因为如此,我认为这个定义带有片面性。

另一些人说,列宁主义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因素的复活,而和四十年代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不同,据说四十年代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变成温和而不革命的了。如果撇开这种把马克思的学说分为革命部分和温和部分的愚蠢庸俗的见解不说,那就必须承认,即使这个完全不充分、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定义也含有一部分真理。这一部分真理就在于列宁确实复活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所埋没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内容。但这只是一部分真理。关于列宁主义的全部真理是:列宁主义不仅复活了马克思主义,而且更进一步,在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新条件下向前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列宁主义究竟是什么呢?

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确切些说,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 and 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and 策略。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处在革命(我们指的是无产阶级革命)以前的时期,那时还没有发达的帝国主义,是训练无产者去进行革命的时期,那时无产阶级革命还不是必不可免的直接实践问题。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列宁却处在发达的帝国主义时期,无产阶级革命开展起来的时期,无产阶级革命已经在国家内获得了胜利、打破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开辟了无产阶级民主制纪元即苏维埃纪元的时期。

正因为如此,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的发展。

人们通常都指出列宁主义具有非常战斗、非常革命的性质。这是完全正确的。可是,列宁主义所以具有这个特性,是由于以下两个原因:第一,列宁主义是从无产阶级革命中产生出来的,它不能不具有无产阶级革命的特色;第二,列宁主义是在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搏斗中成长和巩固起来的,而和这个机会主义作斗争,向来就是对资本主义进行胜利斗争所必需的先决条件。不要忘记,在马克思恩格斯两人和列宁之间隔着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独占统治的整个时代,和这个机会主义作无情的斗争不能不是列宁主义的极重要的任务之一。

—

列宁主义的历史根源

列宁主义是在帝国主义条件下,即在资本主义的矛盾已经达到极点、无产阶级革命已经成为直接实践的问题、训练工人阶级去进行革命的旧时期已经达到尽头而转变为直接冲击资本主义的新时期的条件下成长和形成的。

列宁把帝国主义叫做“垂死的资本主义”。为什么呢?因为帝国主义使资本主义的矛盾达到极端,达到顶点,接着就是革命的开始。在这些矛盾中,最重要的有下列三个。

第一个矛盾是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就是工业国里垄断性的托拉斯和辛迪加、银行和金融寡头拥有极大的势力。和这种极大的势力作斗争,工人阶级通常采用的手段,如工会和合作

社、议会政党和议会斗争等等已经完全不够了。或者向资本屈服，依旧过着每况愈下的非人生活；或者拿起新的武器，——这就是帝国主义在千百万无产阶级群众面前提出的问题。帝国主义把工人阶级引向革命。

第二个矛盾是各金融集团之间以及帝国主义列强之间为争夺原料产地、争夺别国领土而发生的矛盾。帝国主义就是向原料产地输出资本，就是为独占这些原料产地而进行疯狂的斗争，就是为重新瓜分已经被瓜分完的世界而进行斗争，就是寻找“阳光下的地盘”⁷⁴的新起金融集团和列强对死抓住既得赃物不放的老旧金融集团和列强进行特别猛烈的斗争。各资本家集团之间的这种疯狂斗争的特点就在于它包含有帝国主义战争，为夺取别国领土而进行的战争这一不可避免的因素。而这个情况的特点又在于它使帝国主义者彼此削弱，使整个资本主义阵地削弱，使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机逼近，使无产阶级革命必然实现。

第三个矛盾是为数极少的占统治地位的“文明”民族和世界上十亿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就是对极广大的殖民地和附属国内十亿居民施行最无耻的剥削和最残忍的压迫。榨取超额利润就是这种剥削和压迫的目的。可是，帝国主义在剥削这些国家时不得不在那里敷设铁路，设立工厂，建立工商业中心。无产者阶级的出现，本地知识分子的产生，民族意识的觉醒，解放运动的加强，就是这个“政策”的不可避免的结果。所有一切殖民地和附属国内革命运动的加强都明显地证明了这一点。这个情况对于无产阶级所以重要，就因为它根本破坏资本主义的阵地，把殖民地和附属国由帝国主义的后备军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后备军。

帝国主义的主要矛盾，使旧的“繁荣的”资本主义变成了垂死的资本主义的那些矛盾，大体上就是这样。

十年前爆发的帝国主义战争的意义,也就在于它把所有这些矛盾集合在一起投入天平盘里,因而加速和便利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战斗。

换句话说,帝国主义不仅使革命成了不可避免的实践问题,而且造成了直接冲击资本主义堡垒的有利条件。

这就是产生列宁主义的国际环境。

有人会向我们说:这一切都不错,但是这和当时并不是而且不可能是典型的帝国主义国家的俄国究竟有什么关系呢?这和首先是在俄国而且为俄国工作的列宁究竟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正好是俄国成了列宁主义的策源地,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 and 策略的诞生地呢?

因为俄国当时是帝国主义所有这一切矛盾的集合点。

因为俄国当时孕育着革命的程度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大,所以只有俄国才能用革命方法来解决这些矛盾。

首先,沙皇俄国是最残忍最野蛮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各种压迫——资本主义压迫、殖民地压迫和军事压迫的策源地。谁不知道,在俄国,资本的极大势力和沙皇制度的暴虐、俄罗斯民族主义的侵略性和沙皇制度对非俄罗斯民族的屠杀政策是融合起来了呢?谁不知道,对土耳其、波斯、中国广大地区的剥削和沙皇制度对这些地区的侵占,和侵占领土的战争是融合起来了呢?列宁说得对:沙皇制度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沙皇制度把帝国主义各种最坏的因素集中起来,并使之变本加厉了。

其次,沙皇俄国是西方帝国主义最大的后备军,这不仅是说它任凭外国资本自由进入,让外国资本操纵俄国国民经济中象燃料和冶金业这样一些有决定意义的部门,而且是说它能拿出千百万士兵去供西方帝国主义者使用。请回想一下一千四百万俄国军队

为了保证英法资本家极高的利润而在帝国主义战线上流血牺牲的事实吧。

再其次,沙皇制度不仅是帝国主义在东欧的看门狗,而且是西方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它从巴黎和伦敦、柏林和布鲁塞尔得到借款,而从人民身上榨取几亿卢布来缴付利息。

最后,沙皇制度是西方帝国主义在瓜分土耳其、波斯和中国等等勾当中的最忠实的同盟者。谁不知道,帝国主义战争是沙皇政府和协约国帝国主义者联合进行的呢?谁不知道,俄国是这次战争的重要角色呢?

正因为如此,沙皇制度的利益就和西方帝国主义的利益交织在一起,终于融合为统一的帝国主义的利益。

西方帝国主义在为维持和保存沙皇制度而倾注全力同俄国的革命决一死战之前,它能甘心失掉象旧时沙皇资产阶级俄国这样一个东方强大的支柱,这样一个人力物力的丰富宝库吗?当然不能!

由此应该得出结论:谁想打击沙皇制度,谁也就必然要动手打击帝国主义;谁起义反对沙皇制度,谁也就必须起义反对帝国主义。因为谁要是真想不仅摧毁沙皇制度,而且彻底铲除沙皇制度,那么他推翻沙皇制度也就必须推翻帝国主义。这样,反对沙皇制度的革命就和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接近起来,并且一定要转变为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

而且,当时在俄国又掀起了最伟大的人民革命,领导这个革命的是世界上最革命的无产阶级,这个无产阶级又拥有俄国的革命农民这样一个重要的同盟者。这样的革命决不会半途而废,它一胜利就一定要举起反帝国主义的起义旗帜,继续前进,这难道还要证明吗?

正因为如此,俄国当时一定要成为帝国主义的各种矛盾的集合点,这不仅因为这些矛盾正是在俄国带有特别丑恶和特别不堪的性质而最容易暴露出来,也不仅因为俄国当时是西方帝国主义的把西方金融资本和东方殖民地联结起来的最重要的支柱,而且因为当时仅仅在俄国才有能够用革命方法来解决帝国主义矛盾的现实力量。

由此应该得出结论:俄国革命不能不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它不能不在一开始发展时就具有国际性质,因而也就不能不震撼世界帝国主义的基础。

在这样的实际情况下,俄国共产党人能不能把自己的工作局限于俄国革命的狭隘民族范围内呢?当然不能!恰恰相反,当时整个环境,无论是国内环境(深刻的革命危机)或国外环境(战争),都推动他们把自己的工作超出这个范围,把斗争搬到国际舞台上,割开帝国主义的脓疮,证明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粉碎社会沙文主义和社会和平主义,最后,推翻本国资本主义并为无产阶级锻炼出新的斗争武器,即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 and 策略,以促进世界各国无产者推翻资本主义的事业。俄国共产党人不能不这样行动,因为只有在这条道路上才可以指望国际环境发生某种变化,使俄国能够避免资产阶级制度的复辟。

正因为如此,俄国成了列宁主义的策源地,俄国共产党人的领袖列宁成了列宁主义的创造者。

俄国和列宁的“遭遇”差不多同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德国和马克思恩格斯的“遭遇”一样。德国当时孕育着资产阶级革命,正象俄国在二十世纪初期一样。当时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上写道:

“共产党人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德国,因为德国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因为同十七世纪的英国和十八世纪的法国相比,德国将在整个

欧洲文明更进步条件下,拥有发展得多的无产阶级去实现这个变革,因而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

换句话说,当时革命运动的中心移到德国了。

几乎用不着怀疑,马克思在上述这段话中所指出的情况,大概就是德国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地、德国无产阶级的领袖马克思和恩格斯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创造者的原因。

关于二十世纪初期的俄国也必须这样说,而且更必须这样说。这个时期的俄国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它应当在欧洲更进步的条件下,具有比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德国(英法更不用说)更发展的无产阶级去实现这个革命;并且一切事实都表明这个革命一定会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酵母和序幕。

不能认为下面这个事实是偶然的,就是早在1902年,当俄国革命刚刚萌芽的时候,列宁就在他的《怎么办》一书中写了以下的预言:

“历史现在向我们即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约·斯大林注提出的当前任务,是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的一切当前任务都更革命的任务。”

……“实现这个任务,即摧毁这个不仅是欧洲的同时也是(我们现在可以这样说)亚洲的反动势力的最强大的堡垒,就会使俄国无产阶级成为国际革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4卷第382页)

换句话说,革命运动的中心一定要移到俄国来。

大家知道,俄国革命的进程足以证实列宁的这个预言而绰绰有余。

既然如此,那么进行过这样的革命和具有这样的无产阶级的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5页。——编者注
参看《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245页。——编者注

国家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的诞生地,这又有什么奇怪呢?

俄国无产阶级的领袖列宁同时也成了这个理论和策略的创造者以及国际无产阶级的领袖,这又有什么奇怪呢?

二 方 法

我在上面已经说过,在马克思恩格斯两人和列宁之间隔着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占统治的整个时代。为了说得确切起见,我应当补充一下:这里所指的不是机会主义在形式上的统治,而只是机会主义在事实上的统治。在形式上,当时领导第二国际的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正统派”,即考茨基等人。可是在事实上,第二国际的基本工作是按照机会主义的路线进行的。机会主义者由于他们那种惯于迁就的小资产阶级天性而迁就了资产阶级,而“正统派”又为了和机会主义者“保持统一”、为了维持“党内和平”而迁就了机会主义者。结果就造成了机会主义占统治的局面,因为资产阶级的政策和“正统派”的政策已经完全结合起来了。

这是资本主义比较和平发展的时期,即所谓战前的时期。当时帝国主义的那些毁灭性的矛盾还没有十分明显地暴露出来;当时工人的经济罢工和工会还比较“正常地”发展着;当时用选举斗争和议会党团还能收到“令人头晕目眩的”成效;当时人们把合法斗争形式捧到天上,并想用合法手段来“消灭”资本主义,——总而言之,当时第二国际各党养得肥肥胖胖,不愿意认真地想到革命,想

到无产阶级专政,想到群众的革命教育。

脱离了生动的群众革命斗争并变成陈腐教条的一些自相矛盾的原理和理论片断,代替了完整的革命理论。为了装饰门面,他们当然也记起马克思的理论,但目的是要阉割这个理论中活的革命的灵魂。

萎靡的庸俗见解和小气的政客手腕,议会的外交手腕和议会的拉拢行为,代替了革命政策。为了装饰门面,他们当然也通过一些“革命的”决议和口号,但目的是要把这些决议和口号束之高阁。

不是使党根据本身的错误来接受教育和学习正确的革命策略,而是小心躲避迫切的问题,掩饰和抹杀这些问题。为了装饰门面,他们当然也不反对谈谈迫切而困难的问题,但目的是要用一种“橡皮性的”决议来敷衍了事。

第二国际的面目,它的工作方法,它的武库,就是这样。

然而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搏斗的新时代已经来临。在金融资本的极大势力面前,旧的斗争方法显然已经不够而无能为力了。

当时必须重新审查第二国际的全部工作及其整个工作方法,必须驱除庸俗见解、狭隘观点、政客手腕、叛徒行为、社会沙文主义和社会和平主义。必须检查第二国际的整个武库,抛弃一切生锈的陈腐的东西,锻炼出新式的武器。不做这种预备工作,就根本不能去和资本主义作战。不做这种预备工作,无产阶级在新的革命搏斗面前就会陷于武装不足甚或完全没有武装的危险境地。

对第二国际的奥吉亚斯的牛圈⁷⁵做一番总检查和总清洗这一光荣任务就落到了列宁主义的肩上。

列宁主义的方法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产生和锻炼出来的。

这个方法的要求是什么呢？

第一,要在群众的革命斗争的烈火中,在生动的实践的烈火中检验第二国际的各种理论教条,就是说,要恢复那个被破坏了的理论 and 实践的统一,消灭理论和实践分离的状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创立具有革命理论武装的真正无产阶级政党。

第二,要根据第二国际各党的实际行为,根据它们的行动,而不根据它们的口号和决议(它们的口号和决议是不可相信的),来检查第二国际各党的政策,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无产阶级群众的信任并当之无愧。

第三,要按新的革命的方式,用教育群众和训练群众去进行革命斗争的精神去改造全部党的工作,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训练群众去进行无产阶级革命。

第四,要无产阶级政党进行自我批评,要无产阶级政党根据本身的错误来学习和接受教育,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党的真正干部和真正领导者。

列宁主义的方法的基础和实质就是这样。

这个方法是如何实际应用的呢？

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有许多理论教条,他们总是反复地搬弄这些教条。现在就拿其中的几个教条来看吧。

第一个教条：关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条件。机会主义者硬说：无产阶级本身如果在全国人口中不占多数,就不能而且不应当夺取政权。一点证据也没有,因为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不可能为这个荒谬的论点辩护。列宁回答第二国际的先生们说：就算是这样吧；可是,如果形成了这样的历史环境(战争、农业危机等等),使虽占人口少数的无产阶级有可能把极大多数劳动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那么,为什么它不应当夺取政权呢？为什么无

产阶级不应当利用顺利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来突破资本战线，加速总爆发呢？难道马克思不是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就已经说过，如果当时在德国可以用“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那么德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情况就会“很好”了吗？难道不是每个人都知道，当时德国无产者，比如说，和1917年俄国无产者比较起来是更少吗？难道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没有表明，第二国际的英雄们所喜爱的这个教条对于无产阶级是毫无实际意义的吗？群众革命斗争的实践打击和打破了这个陈腐的教条，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第二个教条：无产阶级如果还没有足够的、成熟的、能够组织国家管理的文化干部和行政干部，就不能保持政权，因此首先必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造就这种干部，然后才夺取政权。列宁回答说：就算是这样吧；可是，为什么不能把事情颠倒过来，先夺取政权，为无产阶级的发展造成有利条件，然后一日千里地前进，来提高劳动群众的文化水平，来造就很多工人出身的领导干部和行政干部呢？难道俄国的实践没有表明，在无产阶级政权下，工人出身的领导干部的增长要比在资本政权下迅速百倍和牢靠百倍吗？群众革命斗争的实践也在无情地打碎机会主义者的这个理论教条，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第三个教条：政治总罢工的方法是无产阶级不能采用的，因为这种方法既然在理论上没有根据（见恩格斯的批评），在实践上有危险（会破坏国家经济生活的常态，会耗尽工会的基金），它就不能代替无产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即议会斗争形式。列宁主义者回答说：好吧；可是，第一，恩格斯当时所批评的并不是任何总罢

工,而只是某种总罢工,即无政府主义者代替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而提出的无政府主义者的经济总罢工,——这和政治总罢工的方法有何相干呢?第二,什么人和在什么地方证明了议会斗争形式是无产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呢?革命运动的历史难道不是证明议会斗争仅仅是组织无产阶级的议会外斗争的学校和助力吗?难道不是证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运动的基本问题是要用暴力,用无产阶级群众的直接斗争,用他们的总罢工,用他们的起义来解决的吗?第三,关于用政治总罢工的方法来代替议会斗争这个问题是从哪里来的呢?主张政治总罢工的人在什么时候和在什么地方曾经打算用议会外斗争形式来代替议会斗争形式呢?第四,难道俄国革命没有表明,政治总罢工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最大的学校,是在冲击资本主义堡垒的前夜动员和组织最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吗?——这和那些因为怕破坏经济生活的常态、怕耗尽工会的基金而发出的庸俗怨言有何相干呢?革命斗争的实践也在粉碎机会主义者的这个教条,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如此等等。

正因为如此,列宁说,“革命理论并不是教条”,它“只有同真正群众性的和真正革命的运动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才能最终形成”(《幼稚病》),因为理论应当服务于实践,因为“理论应当回答实践所提出的问题”(《人民之友》),因为理论应当由实践材料来检验。

指恩格斯《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61—579页)。——编者注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182页)。——编者注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参看《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76—77页)。——编者注

至于第二国际各党的政治口号和政治决议,只要回忆一下“以战争对付战争”这一口号的历史,就足以了解这些以堂皇的革命口号和决议来掩饰自己的反革命勾当的党的政治实践是如何虚伪和腐败。大家都还记得第二国际在巴塞尔代表大会⁷⁶上举行的堂皇的示威,当时第二国际恐吓帝国主义者说,如果帝国主义者敢于发动战争,那就要遇到可怕的起义,他们提出了“以战争对付战争”的吓人口号。可是过了不久,在战争就要爆发的时候,巴塞尔决议就被束之高阁,而向工人提出了新的口号——为了资本主义祖国的光荣而自相残杀。这一点有谁不记得呢?革命的口号和决议如果不加以实现,是一个钱都不值的,这难道还不明显吗?只要把列宁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政策和第二国际在战争时期的叛卖政策比较一下,就可以了解机会主义的政客是如何卑鄙,而列宁主义的方法是如何伟大。

这里我不能不引证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中的一段话,他在这本书中无情地痛斥了第二国际首领卡·考茨基企图不按实际行动去判断党,而按纸上口号和文件去判断党的机会主义态度:

“考茨基实行典型的市侩庸人政策,以为提出口号就能改变事情……全部资产阶级民主史打破了这种幻想,因为资产阶级民主派为了欺骗人民,过去和现在总是什么‘口号’都提得出来的。问题是要考察他们的诚意,把他们的言论和他们的行动加以比较,不要满足于唯心主义的或骗人的空话,而要彻底找到阶级的现实。”(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3卷第377页)

至于第二国际各党害怕自我批评的态度,它们那种竭力掩饰自己的错误、抹杀迫切而困难的问题、用一些只能把生动的思想消磨净尽而使党难于根据本身的错误去接受革命教育的粉饰太平的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667—668页。——编者注

虚伪词句来掩盖自己的缺点的态度 ,那就更不用说了。这种态度受到列宁的讥笑和痛斥。列宁在他的《幼稚病》一书中谈到无产阶级政党的自我批评问题时写道 :

“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 ,就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 ,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 ,揭露错误的原因 ,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 ,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 ,——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 ,这才是党履行自己的义务 ,这才是教育和训练阶级 ,以至于群众。”(见《列宁全集》俄文第 3 版第 25 卷第 200 页)

有些人说 :揭露本身的错误和进行自我批评 ,这对于党是有危险的 ,因为这会被敌人利用来反对无产阶级政党。列宁认为这种反驳是不郑重的 ,是完全不正确的。关于这一点 ,列宁还在 1904 年 ,当我们党还幼稚的时候 ,就在他的《进一步 ,退两步》一书中说过 :

“他们 即马克思主义者的敌人。——约·斯大林注 一看见我们发生争论 ,就幸灾乐祸 ,洋洋得意 ,他们为了自己的目的 ,当然会竭力断章取义 ,摘引我这本专门谈论我们党内种种缺点的小册子中的个别词句。可是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已经是久经战斗的了 ,决不会为这小小的针刺所惊扰 ,却能够不管这些针刺 ,继续进行自我批评并无情地揭露自己的缺点 ,这些缺点是一定会而且必然会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而被克服的。”(见《列宁全集》俄文第 3 版第 6 卷第 161 页)

列宁主义方法的特征大体上就是这样。

列宁的方法的原理 ,在马克思的学说中基本上已经有了。这个学说 ,照马克思的话说来 ,“在本质上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列宁

见《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4 卷第 213 页。——编者注

见《列宁全集》第 7 卷第 192 页。——编者注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218 页。——编者注

的方法正是从头到尾都贯串了这种批判的和革命的精神的。可是，如果以为列宁的方法仅仅是马克思的方法的恢复，那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列宁的方法不仅是马克思的批判的和革命的方法的恢复，不仅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恢复，而且是这个方法的具体化和进一步发展。

三 理 论

关于这个题目我来讲三个问题：

(一)理论对于无产阶级运动的意义；

(二)对自发“论”的批判；

(三)无产阶级革命论。

(1)理论的意义。有些人认为列宁主义是实践重于理论，就是说，列宁主义的主要点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变为事实，是“执行”这些原理，至于理论，列宁主义似乎是很不关心的。大家知道，普列汉诺夫曾经屡次嘲笑列宁对于理论，特别是对于哲学的“不关心”。大家也知道，现在许多列宁主义的实际工作者不很喜欢理论，特别是因为他们由于环境关系而不得不忙于浩繁的实际工作。我必须指出：对列宁和列宁主义所持的这种非常奇怪的见解是完全不正确的，而且是丝毫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实际工作者忽视理论的趋向是和列宁主义的全部精神相矛盾的，而且对工作是有很大的危险的。

理论是概括起来的各国工人运动的经验。当然，离开革命实践

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而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可是,理论如果是在和革命实践密切联系中形成的,那么它就能成为工人运动的极伟大的力量;因为理论,而且只有理论,才能使运动具有信心,使它有确定方针的能力,使它能了解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因为理论,而且只有理论,才能使实践不仅了解各阶级在目前如何行进和向哪里行进,而且了解这些阶级在最近的将来会如何行进和向哪里行进。不是别人而正是列宁说过和重复过几十次下面这个著名的原理: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4卷第380页)

列宁比谁都更了解理论的重要意义,特别是对于我们党这样一个党的重要意义,因为我们党负有国际无产阶级的先进战士的作用,因为我们党处于复杂的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中。列宁还在1902年预察到我们党的这种特殊作用时,就认为必须指出:

“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4卷第380页)

几乎用不着证明,现在当列宁的关于我们党的作用的预言已经成为事实的时候,列宁的这个原理具有特别巨大的力量和特别重大的意义。

依据唯物主义的哲学,把从恩格斯到列宁这个时期最重要的科学成就概括起来,并从各方面去批判马克思主义者队伍里的反唯物主义的派别,这是一个极重大的任务,而负责完成这个任务的不是别人,正是列宁,——这个事实可以说是列宁高度重视理论的

黑体是我用的。——约·斯大林注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241页。——编者注

同上,第242页。——编者注

最明显的表现。恩格斯说：“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大家知道，不是别人，正是列宁在他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部杰作中为自己的时代完成了这个任务。大家知道，喜欢嘲笑列宁“不关心”哲学的普列汉诺夫竟不敢认真着手执行这个任务。

(2)对自发“论”的批判，或关于先锋队在运动中的作用。自发“论”是机会主义的理论，是崇拜工人运动自发性的理论，是实际上否认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即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的理论。

崇拜自发性的理论坚决反对工人运动的革命性质，反对使工人运动循着反对资本主义基础的路线行进，而主张使工人运动仅仅循着资本主义“可以履行的”“可以接受的”要求的路线行进，完全主张采取“阻力最小的路线”。自发论是工联主义的思想体系。

崇拜自发性的理论坚决反对使自发运动带有自觉的和有计划的性质，反对党走在工人阶级的前面，反对党把群众提高到自觉的水平，反对党领导运动，而主张使运动中的自觉因素不致妨碍运动循着自己的道路行进，使党只依从自发运动，做运动的尾巴。自发论是降低自觉因素在运动中的作用的理论，是“尾巴主义”的思想体系，是一切机会主义的逻辑基础。

还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以前，这个理论就已经登台，而在实际上使它的那些信徒即所谓“经济派”否认俄国有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的必要，反对工人阶级进行推翻沙皇制度的革命斗争，鼓吹运动中的工联主义政策，把工人运动完全交给自由资产阶级去领导。

旧《火星报》的斗争和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对“尾巴主义”理论的精彩批判不仅粉碎了所谓“经济主义”，而且还建立了俄国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4页。——编者注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12—368页。——编者注

工人阶级真正革命运动的理论基础。

当时如果没有这个斗争,就休想在俄国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就休想使这个党在革命中起领导作用。

可是,崇拜自发性的理论不仅是俄国的现象。它在第二国际所有的党内都是流行得最广泛的,虽然形式稍有不同。我指的是被第二国际的首领们庸俗化了的所谓“生产力”论,这个理论为一切事物辩护,使所有的人都调和起来,当某些事实已经被大家听厌以后,才指出这些事实并加以解释,而指出以后,就万事大吉。马克思说:唯物主义的理论不能只限于解释世界,它还应当改变世界。可是,考茨基及其同伙却不管这一点,他们宁愿停留在马克思的公式的前半段上。

请看应用这个“理论”的许多例子中的一个吧。有人说,在帝国主义战争以前,第二国际各党曾经发表恐吓言论,说如果帝国主义者发动战争,它们就宣布“以战争对付战争”。有人说,在战争就要爆发的时候,这些党却把“以战争对付战争”这个口号束之高阁,而实行了一个相反的口号——“为帝国主义祖国而战”。有人说,这样变更口号的结果,几百万工人牺牲了生命。可是,如果以为这里应该归咎于什么人,这里有什么人叛变了或出卖了工人阶级,那就错了。绝对没有这样的事情!所有这些已经发生的事情都是一定要这样发生的。第一,因为国际是“和平的工具”,而不是战争的工具。第二,因为在当时的那种“生产力水平”下,再没有别的办法可想。“应该归咎于”“生产力”。考茨基先生的“生产力论”正是这样向“我们”解释的。而谁要是不相信这个“理论”,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党的作用呢?党在运动中的意义呢?可是,党对于象“生产力水平”这样的决定因素又有什么办法呢?……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19页)。——编者注

这种假冒马克思主义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一大堆来。

几乎用不着证明,这个以掩盖机会主义的真面目为使命的冒牌“马克思主义”,不过是还在俄国第一次革命前就受到列宁攻击的那个“尾巴主义,理论在欧洲的翻版罢了。

几乎用不着证明,打破这种理论上的假冒,是在西方建立真正的革命政党的先决条件。

(3)无产阶级革命论。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论是从三个基本原理出发的。

第一个原理:金融资本在资本主义先进国内占统治地位;发行有价证券是金融资本的一种主要业务;向原料产地输出资本是帝国主义的基础之一;金融寡头的极大势力是金融资本统治的结果,——所有这些都揭露出垄断资本主义的明显的寄生性,使资本主义的托拉斯和辛迪加的压迫百倍沉重起来,使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基础的愤怒更加增长,把群众引上无产阶级革命这条唯一的生路。(见列宁《帝国主义》)

由此得出第一个结论: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革命危机日益尖锐化,“宗主国”内部的无产阶级战线上的爆发因素日益增长。

第二个原理:加紧向殖民地和附属国输出资本;扩大“势力范围”和殖民地领土,直到占领整个地球;资本主义已经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地球上大多数居民进行金融奴役和殖民压迫的世界体系,——所有这些,一方面使各个民族的经济和领土变成所谓世界经济的整个链条的各个环节,另一方面又把地球上的居民分裂成两个阵营:一方面是剥削和压迫广大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极少数资本主义“先进”国,另一方面是不得不为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而斗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730—845页)。——编者注

争的占极大多数的殖民地和附属国。（见《帝国主义》）

由此得出第二个结论：殖民地国家内的革命危机日益尖锐化，外部的殖民地战线上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愤怒因素日益增长。

第三个原理：独占“势力范围”和殖民地；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不平衡使那些已经抢得领土的国家和那些希望得到自己的“份额”的国家为重新瓜分世界而进行疯狂的斗争；帝国主义的战争是恢复已经被破坏的“均势”的唯一手段，——所有这些都使第三条战线即资本主义国家间的战线紧张起来，因而使帝国主义削弱，并使头两条反帝国主义战线即革命的无产阶级战线和殖民地的解放运动战线易于联合起来。（见《帝国主义》）

由此得出第三个结论：在帝国主义条件下，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和东方的殖民地革命必然联合为一条世界革命战线，来反对世界帝国主义战线。

列宁把上面一切结论综合为一个总的结论说：“帝国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19卷第71页）

因此，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及其性质、范围和深度问题的看法本身也要改变，整个革命的方案，也就随着改变了。

从前，通常都是根据某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去分析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提。现在，这种看法已经不够了。现在必须根据一切国家或多数国家的经济状况，根据世界经济状况来观察这个问题，因为个别国家和个别民族的经济已经不是独立自在的单位，已经变成所谓世界经济的整个链条的各个环节，因为旧的“文明的”资本主

黑体是我用的。——约·斯大林注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730页。——编者注

义已经转变为帝国主义,而帝国主义是极少数“先进”国对地球上大多数居民进行金融奴役和殖民压迫的世界体系。

从前,通常都是说,在个别国家内,或者确切些说,在某一个发达的国家内,是否已经具备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条件。现在,这种观点已经不够了。现在必须说,在世界帝国主义经济这一整体的整个体系中已经具备革命的客观条件;而且,如果整个体系,或者确切些说,因为整个体系已经成熟到发生革命的程度,这个体系中存在着工业不够发达的国家并不能成为革命的不可克服的障碍。

从前,通常都是说某一个发达的国家内的无产阶级革命,认为这是个别的独立自在的现象,而以个别的民族的资本战线为敌方。现在,这种观点已经不够了。现在必须说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因为个别的民族的资本战线已经变成所谓世界帝国主义战线的整个链条的各个环节,必须拿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的总战线来对抗这个世界帝国主义战线。

从前,总是把无产阶级革命看做纯粹是某一个国家内部发展的结果。现在,这种观点已经不够了。现在首先应当把无产阶级革命看做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中各种矛盾发展的结果,看做世界帝国主义战线的链条在某个国家内破裂的结果。

革命将在哪里开始呢?资本战线首先会在哪里,会在哪个国家内被突破呢?

从前,通常都这样回答:在工业比较发达的地方,在无产阶级占多数的地方,在文化水平较高的地方,在民主成分较多的地方。

列宁主义的革命论反驳说:不,不一定在工业比较发达等等的地方。资本战线将在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的地方被突破,因为无产阶级革命是世界帝国主义战线的链条在其最薄弱的地方破裂的结果;而且开始革命的国家,突破资本战线的国家,也许是资本主义

不大发达的国家,而其他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却仍然留在资本主义范围内。

在1917年,世界帝国主义战线的链条在俄国比在其他国家薄弱些。这个链条就在这里被突破,而使无产阶级革命得以爆发。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在俄国展开了最伟大的人民革命,领导这个革命的是革命的无产阶级,这个无产阶级又拥有千百万被地主压迫和剥削的农民这样一个重要的同盟者。因为当时在俄国和革命对立的是沙皇制度这样一个极丑恶的帝国主义代表,它没有丝毫威信,并为全体人民所痛恨。虽然当时俄国资本主义不如法国或德国、英国或美国发达,但是帝国主义的链条在俄国却比较薄弱。

在最近的将来,这个链条将在什么地方被突破呢?还是在它最薄弱的地方。比如说,这个链条可能在印度被突破。为什么呢?因为印度有年轻的战斗的革命无产阶级,而这个无产阶级又拥有民族解放运动这样一个无疑是伟大的和重要的同盟者。因为在印度和革命对立的是外国帝国主义这样一个尽人皆知的敌人,它没有丝毫威信,并为印度全体被压迫被剥削群众所痛恨。

这个链条也很可能在德国被突破。为什么呢?因为,比如说,在印度发生作用的那些因素,在德国也开始发生作用;同时,印度和德国在发展水平上的巨大差别,当然不能不影响到德国革命的进程和结局。

正因为如此,列宁说:

“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社会主义……不会是经过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里平衡‘成熟’,而会是经过一些国家对另一些国家进行剥削,经过对帝国主义战争中第一个战败国家进行剥削,再加上对整个东方进行剥削的道路来完成的。另一方面,正是由于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的影响,东方已经最终加入了革命运动,最终卷入了全世界革命运动的总漩涡。”(见《列宁全集》俄文第

3版第27卷第415—416页)

简单地说:帝国主义战线的链条通常一定要在它最薄弱的环节被突破,但是无论如何不一定要在资本主义比较发达、无产者占百分之多少、农民占百分之多少等等的地方被突破。

正因为如此,计算个别国家内无产阶级在人口总数中所占百分数,在解决无产阶级革命问题时已经失去了第二国际的那些不了解帝国主义的、象害怕瘟疫那样害怕革命的书呆子们所喜欢赋予它的特殊意义。

其次,第二国际的英雄们曾经断定说(现在仍然断定说):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隔着一道鸿沟,或者至少是一座万里长城,使这两个革命之间隔着一个相当长的间断时期,在这个间断时期中,已经获得政权的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而无产阶级则积聚力量,准备对资本主义进行“决战”。这个间断时期通常是以好几十年来计算的,甚至更长些。几乎用不着证明,这种万里长城“论”在帝国主义环境中是毫无科学根据的,它只是而且只能是资产阶级反革命欲望的掩蔽物和粉饰品。几乎用不着证明,在孕育着冲突和战争的帝国主义环境中,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的环境中,当“繁荣的”资本主义已经变为“垂死的”资本主义(列宁),而革命运动正在世界各国发展的时候,当帝国主义同包括沙皇制度和农奴制度在内的所有一切反动势力联合起来,因而使一切革命势力,从西方的无产阶级运动到东方的民族解放运动,都必须联合起来的时候,当不和帝国主义作革命斗争就不能推翻封建农奴制残余的时候,——几乎用不着证明,在这种条件下,在一个较为发达的国家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定会和无产阶级革命接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定会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俄国革命的历史显

然证明了这个原理是正确的和不容争辩的。无怪乎列宁还在 1905 年 ,俄国第一次革命的前夜 ,就在他的《两种策略》一书中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看做一个链条的两个环节 ,看做俄国革命规模的一幅完整的图画 :

“无产阶级应当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 ,这就要把农民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 ,以使用强力打破专制制度的反抗 ,并麻痹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无产阶级应当实现社会主义革命 ,这就要把居民中的半无产者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 ,以使用强力打破资产阶级的反抗 ,并麻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这就是无产阶级的任务 ,而新火星派在他们关于革命规模的一切议论和决议中 ,却把这些任务看得非常狭隘。”(见《列宁全集》俄文第 3 版第 8 卷第 96 页)

我且不说列宁的其他较晚的著作 ,在这些著作中 ,资产阶级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是列宁主义的革命论的基石之一这一点比在《两种策略》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有些同志却以为列宁在 1916 年才产生这种思想 ,以为列宁在 1916 年以前还认为俄国革命将停滞在资产阶级的范围内 ,于是政权也将从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的机关手里转到资产阶级手里 ,而不是转到无产阶级手里。据说这种论断竟流传到我们共产党的报刊上来了。我必须指出 ,这种论断是完全不正确的 ,是完全不合乎实际情况的。

我可以引证列宁在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1905 年)⁷⁷上的著名演说 ,他在这篇演说中不是把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即民主革命的胜利称为“‘秩序’的组织” ,而是称为“战争的组织”。(见《列宁全集》俄文第 3 版第 7 卷第 264 页)

见《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591 页。——编者注

见《列宁全集》第 8 卷第 355 页。——编者注

其次,我还可以引证列宁论临时政府(1905年)的几篇著名论文,他在这几篇论文里描述俄国革命的发展前途时向党提出的任务是“力求使俄国革命成为多年的运动,而不是几个月的运动,使这个革命不仅得到执政当局的微小让步,而且要完全推翻这个执政当局”;他在这几篇论文里进一步阐明这个前途并把这个前途和欧洲的革命联系起来时继续写道:

“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时候……那时候革命的火焰将延烧欧洲;在资产阶级反动势力下备受折磨的欧洲工人也将发动起来,并向我们表明‘该怎么办’;那时候欧洲的革命高潮就会反过来影响俄国,使几年的革命时代变成几十年的革命时代……”(同上,第191页)

其次,我还可以引证列宁在1915年11月发表的著名论文,他在这篇论文中写道:

“无产阶级现在为夺取政权、为建立共和国、为没收土地……为吸收‘无产阶级的人民群众’参加使资产阶级俄国摆脱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沙皇制度)的解放运动而斗争,将来还要为此英勇忘我地进行斗争。对于这种使资产阶级俄国从沙皇制度下、从地主的土地权力下获得解放的运动,无产阶级将立即加以利用,无产阶级不是用来帮助富裕的农民去反对农业工人,而是用来联合欧洲各国的无产者,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18卷第318页)

最后,我还可以引证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中的一段著名言论,他在这里援引了我们刚才从《两种策略》中引证过的那段关于俄国革命规模的话,而得出如下的结论:

指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和临时革命政府》、《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和《论临时革命政府》(见《列宁全集》第8卷第247—262、263—273、430—449页)。——编者注

见《列宁全集》第8卷第257页。——编者注

黑体是我用的。——约·斯大林注

见《列宁全集》第21卷第399页。——编者注

见本卷第208页。——编者注

“结果正同我们所说的一样。革命进程证实了我们的论断是正确的。起初同‘全体’农民一起,反对君主制,反对地主,反对中世纪制度(因此,革命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后同贫苦农民一起,同半无产阶级一起,同一切被剥削者一起,反对资本主义,包括反对农村的富人、富农和投机者,因此革命变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企图在这两个革命中间筑起一道人为的万里长城,企图不用无产阶级的准备程度、无产阶级同贫农联合的程度而用其他什么东西来分开这两个革命,就是极端地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用自由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3卷第391页)

看来已经够了。

有人会向我们说:既然如此,为什么列宁和“不断革命”的思想作斗争呢?

因为列宁主张“用尽”农民的革命能力,彻底利用农民的革命毅力,以便彻底消灭沙皇制度,以便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而“不断革命”论者却不懂得农民在俄国革命中的重大作用,过低估计农民的革命毅力,过低估计俄国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的力量和本领,因而妨碍了把农民从资产阶级影响下解放出来的事业,妨碍了把农民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的事业。

因为列宁主张以政权转归无产阶级来完成革命事业,而“不断”革命论者却想直接从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开始,他们不知道这样做就是闭眼不看象农奴制残余这样的“小事情”,就是不考虑到俄国农民这样的重大力量;他们不知道这种政策只能阻挠把农民争取到无产阶级方面来的事业。

可见列宁和那些“不断”革命论者作斗争并不是由于不断性问题,因为列宁自己就是主张不断革命的,而是由于他们过低估计了农民这一无产阶级最大后备军的作用,由于他们不懂得无产阶级

领导权的思想。

“不断”革命的思想不能看做是一种新的思想。这种思想最初是马克思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末在他的著名的《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50年)中提出的。我们的“不断论者”正是从这个文件中取得不断革命的思想的。必须注意到,我们的“不断论者”从马克思那里把这个思想拿来以后,就多少改变了这个思想,而一改变了它,就把它“弄坏了”,使它不合实用了。当时需要列宁用老练的手法来纠正这个错误,取得马克思的真正的不断革命的思想,而使它成为自己的革命论的基石之一。

请看马克思在他的《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列举了他号召共产主义者应当争取的许多革命民主要求以后,关于不断革命的问题是怎样说的:

“民主主义的小资者至多也不过是希望实行了上述要求便赶快结束革命,而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都消灭掉,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直到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里的时候为止。”

换句话说:

(一)马克思根本没有主张直接从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来开始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德国革命事业,这和我们俄国的“不断论者”的计划是相反的;

(二)马克思只是主张以建立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来完成革命事业,一步一步地把资产阶级派别从政权的高峰上逐个推下去,以便在争得无产阶级政权后再把革命火焰燃遍世界各国,这和列宁根

据他在帝国主义环境中的无产阶级革命论所教导我们的一切以及他在我们的革命过程中所实行的一切是完全符合的。

由此可见,我们俄国的“不断论者”不仅过低估计了农民在俄国革命中的作用和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的意义,而且改变了(改坏了)马克思的“不断”革命的思想,使它不合实用了。

正因为如此,列宁嘲笑了我国“不断论者”的理论,称之为“独创的”“卓越的”理论,责备他们不肯“想一想,究竟由于哪些原因整整十年的实际生活都没有理睬他那个卓越的理论”。(列宁的这篇论文是在1915年,即在俄国“不断论者”的理论出现后过了十年写的。——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18卷第317页)

正因为如此,列宁认为这个理论是半孟什维主义的理论,说这个理论“从布尔什维克方面摄取了号召无产阶级进行坚决革命斗争和夺取政权的口号,而从孟什维克方面摄取了‘否定’农民作用的思想”(见列宁《论革命的两条路线》一文,同上)。

列宁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关于利用资产阶级革命来“立刻”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就是这样。

其次,从前认为革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是不可能的,以为要战胜资产阶级就必须要有先进国家内或至少要有多数先进国家内无产者的共同发动。现在,这个观点已经不合乎实际情形了。现在必须从这种胜利是可能的出发,因为各种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帝国主义环境内发展的不平衡性和跳跃性,帝国主义内部那些必然引起战争的灾难性矛盾的发展,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的增长,——所有这一切都使无产阶级在个别国家内的胜利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俄国革命的历史已经直接证明了这一点。不

过这里必须记住：只有具备了某些完全必要的条件，才能顺利地推翻资产阶级；没有这些条件，就根本谈不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请看列宁在他的《幼稚病》一书中关于这些条件是怎样说的：

“一切革命，尤其是二十世纪俄国三次革命所证实了的革命基本规律就是：要举行革命，单是被剥削被压迫群众感到不能照旧生活下去而要求变革，还是不够的，要举行革命，还必须要剥削者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只有当‘下层’不愿照旧生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的时候，革命才能获得胜利。这个真理的另一个说法是：没有全国性的（既触动被剥削者又触动剥削者的）危机，革命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说，要举行革命，第一，必须要多数工人（至少是多数有觉悟、能思考、政治上积极的工人）充分认识到革命的必要性，并且抱有为革命牺牲的决心；第二，必须要统治阶级遭到政府危机，这种危机甚至把最落后的群众卷入政治运动……削弱政府的力量，使革命者有可能很快地推翻它。”（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5卷第222页）

可是，在一个国家内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还不等于保证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革命获得胜利的国家的无产阶级既然已经巩固自己的政权并领导着农民，就能够而且应当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是，这是不是说，它这样就能获得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即最终胜利呢？换言之，这是不是说，它单靠一个国家的力量就能够最终巩固社会主义并完全保障国家免除外国武装干涉，也就是免除复辟呢？不，不是这个意思。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至少必须有几个国家内革命的胜利。因此，发展和援助其他国家内的革命是获得胜利的革命的重大任务。因此，在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革命不应当把自己看做独立自主的东西，而应当看做用以加速其他国家无产阶级胜利的助力和工具。

黑体是我用的。——约·斯大林注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239页。——编者注

列宁用一句话说明了这个意思,他说,获得胜利的革命的任务就在于“尽力做到在一个国家内所能做到的一切,以便发展、援助和激起世界各国的革命”(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3卷第385页)。

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论的特征大体上就是这样。

四 无产阶级专政

关于这个题目我来讲三个基本问题：

- (一)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工具；
- (二)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统治；
- (三)苏维埃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

(1)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工具。无产阶级专政问题首先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内容问题。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的进展、规模和成绩,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具体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工具,是这个革命的机关,是这个革命的最重要的据点,它的使命是:第一,镇压已被推翻的剥削者的反抗,巩固自己的成绩;第二,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使革命达到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没有无产阶级专政,革命也能战胜资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可是,如果革命不在自己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专门机关作为自己的基本支柱,那么它就不能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不能保持胜利并向前进展到社会

主义的最终胜利。

“政权问题是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列宁)这是不是说,事情只限于夺取政权,取得政权呢?不,不是这个意思。取得政权——这仅仅是事情的开始。在一个国家内被推翻的资产阶级,由于许多原因,在长时间内还比推翻了它的无产阶级有力量。因此,全部问题在于保持政权,巩固政权,使它成为不可战胜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做些什么呢?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至少必须完成在革命胜利的“第二天”就摆在无产阶级专政面前的三个主要任务:

(一)粉碎已被革命推翻和剥夺的地主和资本家的反抗,消灭他们的一切恢复资本政权的行动;

(二)用把一切劳动者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的精神来组织建设工作,并按照准备取消阶级,消灭阶级的方向来进行这一工作;

(三)把革命武装起来,组织革命军队,以便和外部敌人作斗争,和帝国主义作斗争。

所以需要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为了执行这些任务,完成这些任务。

列宁说:“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被推翻的剥削者不曾料到自己会被推翻,他们不相信这一点,不愿想到这一点,所以他们在遭到第一次严重失败以后,就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的仇恨投入战斗,为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为他们的家庭而斗争,他们的家庭从前过着那么甜蜜的生活,现在却被‘平凡的贱民’弄得破产和贫困(或者弄得只好从事‘平凡的’劳动……)。而跟着剥削者资本家走的,还有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世界各国几十年来的历史经验证明,小资产阶级总是犹豫不决,动摇不定,今天跟着无产阶级走,明天又因革命遭到困难而害怕起来,因工人遭受初次失败或挫折而张皇失措,他们心慌意乱,东奔西跑,到处诉苦,从这个

营垒跑到那个营垒。”(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3卷第355页)

而资产阶级是有根据来进行复辟行动的,因为资产阶级被推翻以后在长时间内还比推翻了它的无产阶级有力量。

列宁说:“如果剥削者只在一国内被打倒(这当然是典型的情况,因为几国同时发生革命是罕见的例外),他们依然比被剥削者强大。”(同上,第354页)

被推翻的资产阶级的力量在哪里呢?

第一,“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在于资产阶级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5卷第173页)。

第二,在于“在革命以后的长时期内,剥削者必然在许多方面保持巨大的事实上的优势:他们还有货币(货币是不能一下子消灭的),有某些动产(往往是很多的);有种种联系,有组织和管理的技能,知道一切管理‘秘诀’(习惯、方法、手段和窍门);有较高的教育程度,同高级技术人员(他们的生活和思想是资产阶级的)接近;有无比丰富的军事技能(这是很重要的),以及其他等等”(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3卷第354页)。

第三,“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世界上可惜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因为“消灭阶级不仅意味着要驱逐地主和资本家,——这个我们已经比较容易地做到了——而且意味着要消灭小商品生产者,可是对于这种人不能驱逐,不能镇压,必须同他们和睦相处,可以(而且必须)改造他们,重新教育他们,这只有通过很长期、很缓慢、很谨慎的组织工作才能做到”。(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5卷第173页和第189页)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640—641页。——编者注

同上,第3卷第639—640页。——编者注

同上,第4卷第181页。——编者注

同上,第3卷第639页。——编者注

同上,第4卷第181页和第200页。——编者注

正因为如此,列宁说:

“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更强大的敌人,对资产阶级进行的最奋勇和最无情的战争,资产阶级的反抗,由于自己被推翻……而凶猛十倍。”

“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同上,第173页和第190页)

几乎用不着证明,要在短时期内完成这些任务,要在几年内实现这一切,是绝对不可能的。因此,不应该把无产阶级专政,把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看做瞬息即逝的时期,看做一批“最革命的”法律和法令,而应该把它看做充满国内战争和国外冲突、顽强的组织工作和经济建设、进攻和退却、胜利和失败的整整一个历史时代。这个历史时代所以必要,不仅是为了创造社会主义完全胜利的经济上和文化上的前提,而且是为了使无产阶级有可能:第一,把自己教育并锻炼成为能够管理国家的力量;第二,按照保证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方针来重新教育并改造小资产阶级阶层。

马克思向工人说过:“不仅为了改变现存条件,而且为了改变自己本身,使自己具有进行政治统治的能力,你们或许不得不再经历十五年、二十年、五十年的内战和国际冲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8卷第506页)

列宁继承并发展马克思这个思想时写道: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必须重新教育千百万农民和小业主,数十万职员、官吏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使他们大家都服从无产阶级的国家和无产阶级的领导,战胜他们中间的资产阶级的习惯和传统”,同样,必须“……在长期斗争中,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上重新教育无产者自己……因为无产者不能用神

术,不能遵照圣母的意旨,不能遵照口号、决议、法令的意旨,一下子摆脱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偏见,而只有对广泛的小资产阶级影响,展开长期的艰苦的广泛的斗争,才能摆脱这种偏见”。(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5卷第248页和第247页)

(2)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统治。从上面所说的可以看出,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在不侵犯旧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条件下进行的政府人员的普通的更换、“内阁”的更换等等。各国孟什维克和机会主义者害怕专政象害怕火一样,竟用所谓“夺取政权”的概念来顶替专政的概念。他们通常都把“夺取政权”归结为更换“内阁”,归结为由谢德曼和诺斯克、麦克唐纳和韩德逊这一类人组成新内阁执政。几乎用不着解释,诸如此类的内阁更换是和无产阶级专政,和真正的无产阶级夺取真正的政权毫无共同之点的。麦克唐纳之流和谢德曼之流在保留资产阶级旧制度的条件下掌握政权,他们的所谓政府,只能是资产阶级御用的服务机关,只能是帝国主义脓疮的掩蔽物,只能是资产阶级用来反对被压迫被剥削群众的革命运动的工具。当资本没有屏风就不便于、不利于、难于剥削和压迫群众的时候,它需要这些政府来做屏风。当然,这种政府的出现是“在他们那里”(就是说,在资本家那里),“在希普卡”⁷⁸并非平安无事的征兆;虽然如此,这种政府仍然不免是稍加粉饰的资本政府。麦克唐纳政府或谢德曼政府是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相隔天壤的。无产阶级专政不是政府的更换,而是拥有新的中央政权机关和地方政权机关的新国家,是在旧国家即资产阶级国家的废墟上产生的无产阶级国家。

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在资产阶级制度的基础上产生的,而是在破坏资产阶级制度的过程中,在推翻资产阶级以后,在剥夺地主和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267页和第266页。——编者注

资本家的过程中,在把基本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社会化的过程中,在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的过程中产生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以对资产阶级使用暴力为凭借的革命政权。

国家是统治阶级用来镇压其阶级敌人的反抗的机器。就这一点来说,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和其他任何阶级的专政毫无区别,因为无产阶级国家是用来镇压资产阶级的机器。但是这里有一个本质上的差别。这个差别就在于以前所有的阶级国家是少数剥削者对多数被剥削者的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则是多数被剥削者对少数剥削者的专政。

简单地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统治,它不受法律限制,凭借暴力,得到被剥削的劳动群众的同情和拥护(列宁《国家与革命》)。

由此应当得出两个基本结论:

第一个结论:无产阶级专政不能是“完全的”民主,不能是对所有的人的民主,即既对富人又对穷人的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应当是新型民主的(对无产者和一切穷人是民主的)国家和新型专政的(对资产阶级是专政的)国家”(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1卷第393页)。考茨基及其同伙所谓普遍的平等、“纯粹的”民主和“完善的”民主等等的空话,是资产阶级用来掩饰被剥削者和剥削者不可能有平等这一无可置疑的事实。“纯粹”民主论是帝国主义强盗所驯育和豢养的工人阶级上层分子的理论。这个理论的使命就是要掩盖资本主义的脓疮,粉饰帝国主义,赋予它一种精神力量来反对被剥削群众。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被剥削者没有而且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这至少是因为房屋、印刷所、纸张仓库等等这些为享有“自由”所必需的东西都是剥削者的特权。在资本主义

黑体是我用的。——约·斯大林注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200页。——编者注

制度下,被剥削群众是没有而且不可能真正参加国家的管理的,这至少是因为即使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最民主的制度中,政府也不是由人民所指定,而是由路特希尔德家族和斯汀尼斯家族、洛克菲勒家族和摩根家族所指定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民主是资本主义的民主,是少数剥削者的民主,是以限制多数被剥削者的权利为基础并以反对这个多数为目标的。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被剥削者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无产者和农民才可能真正参加国家的管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民主是无产阶级的民主,是多数被剥削者的民主,是以限制少数剥削者的权利为基础并以反对这个少数为目标的。

第二个结论:无产阶级专政的产生不能是资产阶级社会和资产阶级民主制和平发展的结果,而只能是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资产阶级的军队、资产阶级的官吏机构、资产阶级的警察的结果。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序言中说:“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马克思在1871年给库格曼的信中说:无产阶级革命“……不应该象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摧毁,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

马克思的这句以大陆为限的话竟被各国机会主义者和孟什维克作为借口来叫喊:可见马克思曾经假定资产阶级民主有和平发展到无产阶级民主的可能,至少欧洲大陆以外的几个国家(英国和美国)是有这种可能的。马克思的确曾经假定有这种可能,并且有根据来给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英美两国做这种假定,因为当时还没有垄断的资本主义,还没有帝国主义,当时在这些国家中由于特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9页。——编者注

同上,第4卷第392页。——编者注

殊的发展条件,还没有发达的军阀机构和官僚机构。在发达的帝国主义出现以前的情形就是这样的。可是经过三四十年以后,当这些国家中的情形已经根本改变,当帝国主义已经发展并普及于所有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当军阀机构和官僚机构也已经在英美出现,当英美和平发展的特殊条件已经消失的时候,关于这些国家不在此限的说法自然就应当失去时效了。

列宁说:“现在,在1917年,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时期,马克思的这个限制已经不能成立了。英国和美国这两个全世界最大的和最后的盎格鲁撒克逊‘自由制’(从没有军阀机构和官僚机构这个意义来说)的代表,已经完全滚到官僚机构和军阀机构支配一切、镇压一切这样一种一般欧洲式的污浊血腥泥潭中去了。现在,无论在英国或美国,都要以摧毁、破坏‘现成的’(是1914—1917年间在这两个国家已制造完毕而达到了“欧洲式的”、一般帝国主义的完备程度的)‘国家机器’,作为‘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1卷第395页)

换句话说,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规律,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是这种革命的先决条件的规律,是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革命运动的必然规律。

当然,在遥远的将来,如果无产阶级在那些最重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如果现在的资本主义包围被社会主义包围所代替,那么某些资本主义国家走上“和平”发展的道路是完全可能的,这些国家的资本家由于国际环境的“不利”,会认为最好是“自愿地”向无产阶级做重大的让步。可是,这个假定所涉及的只是遥远的和可能的将来。对于最近的将来,这个假定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因此,列宁说得对:

“不用暴力破坏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不用新的国家机器代替它,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3卷第342页)

(3)苏维埃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就是镇压资产阶级,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以无产阶级的民主来代替资产阶级的民主。这是很明显的。但是要依靠什么组织才能完成这个巨大的工作呢?无产阶级的在资产阶级议会制基础上成长起来的旧的组织形式不足以完成这个工作,这是不容置疑的。那么,无产阶级的什么新的组织形式能够起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掘墓人的作用,不仅能够摧毁这个机器,不仅能够以无产阶级的民主来代替资产阶级的民主,而且能够成为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基础呢?

无产阶级的这个新的组织形式就是苏维埃。

苏维埃优越于旧的组织形式的地方在哪里呢?

就在于苏维埃是无产阶级的最能包括一切的群众组织,因为苏维埃,而且只有苏维埃,才能包括所有一切工人。

就在于苏维埃是能够团结所有的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工人和农民、士兵和水兵的唯一群众组织,因此在这个组织中,群众先锋队即无产阶级对群众斗争的政治领导就能够最容易和最充分地实现。

就在于苏维埃是群众革命斗争、群众政治发动和群众武装起义的最强有力的机关,是能够摧毁金融资本及其政治附属物的极大势力的机关。

就在于苏维埃是群众本身的直接的组织,是最民主的因而也是群众的最有威信的组织,这种组织能尽量便利群众参加新国家

的建设和管理,能尽量发挥群众在毁坏旧制度的斗争中,在建设无产阶级新制度的斗争中的革命毅力、首倡精神和创造能力。

苏维埃政权就是把各地方苏维埃统一成为一个总的国家组织,统一成为无产阶级这个被压迫被剥削群众的先锋队、这个统治阶级的国家组织,即统一成为苏维埃共和国。

苏维埃政权的实质就在于:正是从前受资本家和地主压迫的那些阶级的最群众化和最革命的组织现在成了“全部国家政权和全部国家机构的固定的和唯一的基础”;“正是那些”在法律上有平等权利、“实际上却受到各种排挤不能参加政治生活和享有民主权利和自由(甚至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也是这样)的群众,现在被吸引来经常参加对国家的民主管理并在其中起决定作用”。(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4卷第13页)

正因为如此,苏维埃政权是新的国家组织形式,与旧的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和议会制的国家组织形式有原则上的差别;它是新的国家类型,不适合于剥削和压迫劳动群众的任务,而适合于使他们完全摆脱任何压迫和任何剥削的任务,适合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

列宁说得对:自从出现了苏维埃政权,“资产阶级民主的议会制度的时代已经终结。世界历史的新的一章,即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已经开始”。

苏维埃政权的特征在哪里呢?

就在于苏维埃政权是存在着阶级的条件下可能有的一切国家组织中最群众化和最民主的国家组织,因为它既然是工人和被剥

黑体都是我用的。——约·斯大林注

参看《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724页。——编者注

削农民在反对剥削者的斗争中结合和合作的场所,并在自己的工作中依靠这个结合和合作,它就是多数居民统治少数居民的政权,是这个多数的国家,是这个多数专政的表现。

就在于苏维埃政权是阶级社会一切国家组织中最富于国际主义的组织,因为它既然摧毁任何民族压迫而依靠各族劳动群众的合作,它就使这些群众易于在统一的国家联盟内联合起来。

就在于苏维埃政权按本身结构来说,使被压迫被剥削群众的先锋队,即无产阶级这个在苏维埃中最团结和最觉悟的核心易于领导这些被压迫被剥削群众。

列宁说:“被压迫阶级的一切革命和一切运动的经验、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导我们,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够团结和领导被剥削的劳动人民中的涣散落后的阶层。”(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4卷第14页)而苏维埃政权的结构有助于实现这个经验给我们的启示。

就在于苏维埃政权既然在统一的国家组织内把立法权和行政权结合起来,并用生产单位,用工厂来代替地域选区,就把工人和一般劳动群众同国家管理机关直接联系起来,教他们学习管理国家。

就在于只有苏维埃政权才能使军队不受资产阶级长官的支配,把军队由资产阶级制度下压迫人民的工具变为使人民从本国的和外国的资产阶级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工具。

就在于“只有苏维埃国家组织才能真正一下子打碎和彻底破坏旧式的即资产阶级的、官吏的、法官的机构”(同上)。

就在于只有苏维埃的国家形式才能吸收劳动者和被剥削者的

群众组织无条件地经常参加国家的管理,只有它才能准备国家的消亡,这种消亡是将来的无国家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因素之一。

这样,苏维埃共和国就是那个找了很久而终于找到了的政治形式,在这个形式的范围内必将完成无产阶级的经济解放,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

巴黎公社是这种形式的萌芽。苏维埃政权是这种形式的发展和完成。

正因为如此,列宁说:

“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共和国不仅是更高类型的民主机构的形式……而且是能够保证最无痛苦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唯一形式。”(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2卷第131页)

五 农 民 问 题

关于这个题目我来讲四个问题:

- (一)问题的提法;
 - (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农民;
 - (三)无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农民;
 - (四)苏维埃政权巩固后的农民。
- (1)问题的提法。有人以为列宁主义中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

黑体是我用的。——约·斯大林注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377页。——编者注

题,以为列宁主义的出发点是关于农民及其作用和比重的问題。这是完全不对的。列宁主义中的基本问题,列宁主义的出发点,并不是农民问题,而是无产阶级专政、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等问题。农民问题,即无产阶级在为政权而斗争中的同盟者问题,是一个派生的问题。

可是,这个情况丝毫不会使农民问题失去它对无产阶级革命无疑具有的重大而迫切的意义。大家知道,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里,认真研究农民问题正是在第一次革命(1905年)前夜开始的,当时推翻沙皇制度和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已经全盘摆在党的面前,无产阶级在当前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同盟者问题已经具有迫切的性质。大家也知道,俄国农民问题在无产阶级革命时期具有更迫切的性质,当时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争取和保持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引起了无产阶级在当前无产阶级革命中的同盟者问题。不言而喻,谁想夺取政权,谁准备夺取政权,谁就不能不关心自己的真正同盟者的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民问题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总问题的一部分,因而也就是列宁主义的最迫切的问题之一。

第二国际各党所以漠视农民问题,有时简直否认农民问题,不仅是因为西方有特殊的发展条件,而首先是因为它们不相信无产阶级专政,害怕革命,不想引导无产阶级去夺取政权。而谁要是害怕革命,谁要是不想引导无产者去夺取政权,谁也就不会关心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同盟者问题,因为在他看来,同盟者问题是无所谓的,不迫切的。第二国际的英雄们把自己讥笑农民问题的态度看作文雅风度的表现,“真正”马克思主义的表现。其实,这里一点马克思主义的气味也没有,因为在无产阶级革命前夜漠视农民问题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直接背叛马克思

主义的明显标志。

问题是这样：由于农民的某些生活条件而潜藏在农民内部的革命的可能性是否已经用完？如果还没有用完，是否有希望、有根据把这种可能性用于无产阶级革命，把农民，把农民中的多数被剥削者由资产阶级的后备军（从前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变为无产阶级的后备军，变为无产阶级的同盟者？

列宁主义对这个问题的答复是肯定的，即认为多数农民具有革命能力，认为可以把这种革命能力用于无产阶级专政。

俄国三次革命的历史完全证实了列宁主义关于这一点的结论。

由此得出一个实际结论，就是要援助劳动农民群众的反对奴役和剥削的斗争，摆脱压迫和贫困的斗争。这当然不是说，无产阶级应当援助任何一种农民运动。这里所说的是要援助直接或间接地便利无产阶级解放运动、这样或那样地帮助无产阶级革命、促使农民变为工人阶级的后备军和同盟者的那种农民运动和农民斗争。

(2)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农民。这个时期包括俄国第一次革命(1905年)和第二次革命(1917年2月)。这个时期的特征是农民摆脱自由资产阶级的影响，离开立宪民主党人⁵⁴，而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转到布尔什维克党方面来。这个时期的历史是立宪民主党人(自由资产阶级)和布尔什维克(无产阶级)争夺农民的历史。杜马时期决定了这个斗争的命运，因为前后四届杜马时期给了农民一个实际教训，这个教训明明白白地向农民指出：他们从立宪民主党人手中既得不到土地，也得不到自由；沙皇完全拥护地主，而立宪民主党人则拥护沙皇；农民所能指望得到帮助的唯一的力量就是城市工人，即无产阶级。帝国主义战争只是证实了杜马时期的

教训,使农民最终离开资产阶级,使自由资产阶级最终陷于孤立,因为战争年份表明:希望从沙皇及其资产阶级同盟者那里得到和平完全是画饼充饥,自欺欺人。如果没有杜马时期的实际教训,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工农联盟就是这样形成的。在推翻沙皇制度的共同斗争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就是这样形成的,而这个领导权就引导到1917年的二月革命。

大家知道,西方(英、法、德、奥)资产阶级革命是循着另一条道路进行的。西方革命的领导权不是属于当时由于本身幼弱而没有成为并且不可能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的无产阶级,而是属于自由资产阶级。西方农民摆脱农奴制而获得的解放不是从人数很少和没有组织的无产阶级手里得到的,而是从资产阶级手里得到的。西方农民是和自由资产阶级一道反对旧制度的。西方农民是资产阶级的后备军。因此,西方革命的结果使资产阶级的政治比重大大增加了。

而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所产生的结果却完全相反。俄国革命的结果不是使资产阶级这个政治力量加强,而是使它削弱;不是使它的政治后备军增加,而是使它失去了基本的后备军,即失去了农民。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不是把自由资产阶级提到了首位,而是把革命无产阶级提到了首位,把千百万农民团结在革命无产阶级的周围。

这也就说明为什么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就转变成了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领导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萌芽,是向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阶段。

俄国革命为什么有这个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历史上没有先例的独特现象呢?这个独特现象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是因为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是在比西方更发展的阶级斗争条件下展开的,因为俄国无产阶级在这个时候已经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而被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所吓倒的自由资产阶级已经丧失任何革命性(尤其在1905年的教训以后),转而同沙皇和地主结成联盟来反对革命,反对工农。

必须注意下面几个决定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独特性的情况:

(一)俄国工业在革命前夜的空前的集中程度。例如大家知道,当时俄国在有五百工人以上的企业中工作的工人占全体工人的百分之五十四,而象美国这样发达的国家在同样的企业中工作的工人只占全体工人的百分之三十三。几乎用不着证明,单是这一个情况,在具备布尔什维克党这样一个革命政党的条件下,就已经使俄国工人阶级成为全国政治生活中最大的力量了。

(二)企业中丑恶的剥削形式,加上沙皇走狗残酷的警察压制,——这个情况使工人的每一次重大的罢工都变成巨大的政治行动,把工人阶级锻炼成为彻底革命的力量。

(三)俄国资产阶级的政治上的萎靡不振,在1905年革命以后已经变成对于沙皇制度的效忠和公开的反革命,这不仅因为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性使俄国资产阶级投入沙皇制度的怀抱,而且因为俄国资产阶级直接依赖政府的订货。

(四)农村中最丑恶最难堪的农奴制残余,加上地主的专权,——这个情况使农民投入了革命的怀抱。

(五)沙皇制度压制一切有生机的东西,并以自己的专横来加重资本家和地主的压迫,——这个情况使工人和农民的斗争汇合成一条革命洪流。

(六)帝国主义战争把俄国政治生活中的这一切矛盾融合为深刻的革命危机,并使革命具有莫大的冲击力量。

在这样的条件下,农民应当向哪里走呢?农民应当向谁寻求援助来反对地主专权、反对沙皇专横、反对使农民经济破产的毁灭性战争呢?向自由资产阶级吗?然而它是敌人,——这是前后四届杜马的多年的经验已经证明了的。向社会革命党人⁵⁹吗?社会革命党人当然比立宪民主党人“好些”,他们的纲领也是“合适的”,几乎是农民的纲领。可是,既然社会革命党人想单单依靠农民,既然他们在成为敌人力量的主要泉源的城市中软弱无力,那么,他们能够干出什么事情呢?什么地方有一个新的力量,它无论在农村或城市中都能一往直前,勇敢地走到前列去同沙皇和地主作斗争,帮助农民摆脱奴役,摆脱没有土地的情况,摆脱压迫,摆脱战争呢?当时在俄国究竟有没有这样的力量呢?是的,是有的。这就是俄国无产阶级,它还在1905年就已经显示出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斗争到底的本领、自己的勇气、自己的革命性。

无论如何,除了这个力量以外,别的力量是没有的,而且是无从得到的。

正因为如此,农民在离开立宪民主党人而接近社会革命党人以后,就觉悟到必须服从俄国无产阶级这个勇敢的革命领袖的领导。

决定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独特性的情况就是这样。

(3)无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农民。这个时期从二月革命(1917年)到十月革命(1917年)为止。这个时期比较短,总共只有八个月;但是从群众所受到的政治教育和革命训练来看,可以大胆地说,这八个月等于平常宪制发展时期的好几十年,因为这八个月是革命的八个月。这个时期的特点就是农民更加革命化,他们对社会革命党人感到失望,他们离开社会革命党人,他们重新转向直接团结在无产阶级的周围,认定无产阶级是能把国家导向和平的唯一

彻底革命的力量。这个时期的历史是社会革命党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布尔什维克(无产阶级民主派)争夺农民、争取掌握多数农民的历史。决定这个斗争的命运的是联合政府时期,克伦斯基统治时期,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拒绝没收地主土地,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争取继续作战,前线六月进攻,士兵死刑,科尔尼洛夫叛乱⁷⁹。

如果说从前,在前一时期,革命的基本问题是推翻沙皇和地主政权,那么现在,在二月革命以后的时期,当沙皇已经被推翻,而旷日持久的战争已经使国家经济完全破坏,使农民完全破产的时候,消灭战争的问题就成为革命的基本问题了。重心显然已经从纯粹国内性质的问题移到基本问题,即战争问题上了。“结束战争”、“摆脱战争”,——这就是疲惫不堪的全国人民首先是农民的共同呼声。

可是当时要摆脱战争,就必须推翻临时政府,必须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必须推翻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政权,因为他们,而且只有他们,要把战争拖延到“胜利为止”。当时除了推翻资产阶级,实际上没有别的出路可以摆脱战争。

这是新的革命,无产阶级的革命,因为它把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最后一个派别,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极左派,即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抛出政权以外,以便创立新的无产阶级的政权,即苏维埃政权,以便使革命无产阶级的党,主张进行革命斗争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而争取民主和平的党,即布尔什维克党掌握政权。大多数农民支持了工人为争取和平、为苏维埃政权而进行的斗争。

当时在农民面前没有别的出路,而且不可能有别的出路。

这样,克伦斯基统治时期给了劳动农民群众一个最大的实际教训,因为它明明白白地指出:在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政权

下,国家是不能摆脱战争的,农民是既得不到土地,也得不到自由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与立宪民主党人不同的地方只在于他们有甜蜜的演说和虚伪的诺言,而事实上他们所执行的还是那个帝国主义的立宪民主党的政策;只有苏维埃政权才是唯一能够引导国家走上大道的政权。战争的继续拖延只是证实了这个教训的正确,督促革命前进,推动千百万农民和士兵群众直接团结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周围。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孤立已成为确定不移的事实。如果没有联合政府时期的实际教训,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

促使资产阶级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情况就是这样。

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这样形成的。

(4)苏维埃政权巩固后的农民。如果说从前,在革命的第一个时期,主要问题是推翻沙皇制度,而后来,在二月革命以后,首要问题是推翻资产阶级以摆脱帝国主义战争;那么现在,在国内战争结束以后,在苏维埃政权巩固以后,经济建设问题就成为首要问题了。加强和发展国有化工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通过国家所调节的商业把工业和农民经济联系起来;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以便后来逐渐减少粮食税额,做到用工业品去交换农产品;振兴商业并发展合作社,吸引千百万农民参加合作社,——这就是列宁为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而制定的经济建设方面的当前任务。

有人说,这个任务也许是俄国这样一个农民国家所不能胜任的。有些爱怀疑的人甚至说,这个任务简直是空想,是无法实现的,因为农民总是农民,——农民是由小生产者组成的,因此不能利用他们来建立社会主义生产的基础。

但是,爱怀疑的人错了,因为他们没有估计到在这里有决定意义的一些情况。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其中主要的情况。

第一,决不可把苏联农民和西方农民混为一谈。苏联农民不能不和西方农民有所区别,因为苏联农民经过了三次革命的训练,跟无产阶级一起并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了反对沙皇和资产阶级政权的斗争,从无产阶级革命手里获得了土地与和平,并因此成为无产阶级的后备军;西方农民却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在自由资产阶级领导下进行了斗争,从这个资产阶级手里获得了土地,并因此成为资产阶级的后备军。未必用得着证明:向来珍视他们同无产阶级的政治友谊和政治合作并把他们获得自由归功于这种友谊和这种合作的苏联农民,不会不是无产阶级实行经济合作的最好对象。

恩格斯曾经说:“社会党夺取政权已成为最近将来的事情”,“为了夺取政权,这个政党应当首先从城市跑到农村,应当成为农村中的力量”。(见恩格斯《农民问题》1922年版)他的这一段话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写的,他当时所指的是西方农民。俄国共产党人在三次革命中在这方面做了巨大的工作,已经在农村中给自己造成了我们的西方同志所不敢梦想的影响和支柱,这一点还需要证明吗?这个情况不能不根本促进俄国工人阶级和农民实行经济合作的事业,这一点怎么能否认呢?

爱怀疑的人硬说小农是和社会主义建设不能相容的因素。可是,请听一听恩格斯关于西方小农所说的话吧:

“而我们则坚决站在小农方面;我们将竭力设法使他们的命运较为过得去一些,如果他们下决心的话,就使他们易于过渡到合作社,如果他们还不能下决心,那就甚至给他们一些时间,让他们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考虑考虑这个问题。我们所以要这样做,不仅是因为我们认为自食其力的小农可能来补充我们的队伍,而且也是为了党的直接利益。被我们挽救而没有真正转变为

无产者,还在农民地位时就被我们吸收到自己方面来的农民人数愈多,社会改造的实现也就会愈迅速和愈容易。我们无须等到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后果到处都以极端形式表现出来的时候,等到最后一个小手工业者和最后一个小农都变成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牺牲品的时候,才来实现这个改造。我们在这方面为了农民的利益而必须牺牲一些社会资金,这从资本主义经济的观点看来好象是白费金钱,然而这却是善于投资,因为这种物质牺牲可能使花在整个社会改造上的费用节省十分之九。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来,我们可以很慷慨地对待农民。”(同上)

恩格斯说这些话时所指的是西方农民。可是,恩格斯所说的这些话在任何地方都不能象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那样容易和那样充分地实现,这难道还不明显吗?只有在苏维埃俄国,才能立刻实行并完全实行使“自食其力的小农来补充我们的队伍”,实行为此所必需的“物质牺牲”,实行为此所必需的“慷慨地对待农民”,而且有利于农民的诸如此类的措施已经在俄国实行,这难道还不明显吗?这个情况也一定会便利并推进苏维埃国家的经济建设事业,这一点怎么能否认呢?

第二,决不可把俄国农业和西方农业混为一谈。西方农业是按照通常的资本主义道路发展的,是在农民深刻分化的情况下发展的,一极是大田庄和私人资本主义大地产,另一极却是大众的贫穷困苦和雇佣奴隶地位。因此,在西方,解体和分化是十分自然的。在俄国却不是这样。我国农业是不能循着这样的道路去发展的,因为单是苏维埃政权的存在和基本生产工具与生产资料国有化的事实就不容许循着这条道路去发展。俄国农业应当循着另一条道路,即循着使千百万小农和中农合作化的道路,循着在农村中发展那种由国家以优惠贷款的办法来扶持的群众性的合作社的道路去发展。列宁在论合作制的论文中正确地指出我国农业应当循着新道

路去发展,即循着通过合作社吸引多数农民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循着把集体制原则逐步应用于农业,起初应用于农产品销售方面,然后应用于农产品生产方面这一道路去发展。

在这方面,由于农业合作社工作而在农村中发生的一些新现象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大家知道,在农业合作总社⁸⁰内产生了各个农业部门(亚麻、马铃薯、油类等部门)的新的巨大组织,这些组织是有广大前途的。例如其中的亚麻合作总社包括许多麻农生产协作社。亚麻合作总社以种子和生产工具供给农民,然后向这些农民购买全部亚麻产品,在市场上大批销售,保证农民也得到利润,从而通过农业合作总社把农民经济和国家工业联系起来。怎样称呼这种生产组织形式呢?在我看来,这是国家社会主义大生产在农业方面的家庭手工制。这里所说的国家社会主义生产在农业方面的家庭手工制,是和资本主义的家庭手工制,例如纺织业的家庭手工制相比拟而说的,在资本主义的家庭手工制中,手工业者从资本家那里领得原料和工具,而把自己的全部生产品交给资本家,所以他们事实上是在家里做工的半雇佣工人。这不过是指明我国农业应当循着哪一条道路发展的许多标志之一。其他农业部门中的其他类似的标志,我就不谈了。

未必用得着证明:绝大多数农民乐意走这条新的发展道路,而抛开私人资本主义大地产和雇佣奴隶地位的道路,贫困和破产的道路。

请看列宁关于我国农业的发展道路所说的话吧:

“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最小农结成联盟,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已有保证等等,难道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难道这不是我们通过合作社,而且仅仅通过合作社,通过我们从前鄙视为买卖机关,并且现时在新经济政策下我们从某一方面也有理由加以鄙视的合作社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吗?这还

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这已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7卷第392页)

列宁往下讲到必须给予合作社这个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组织居民的新原则”和新的“社会制度”以财政支持和其他支持时继续说:

“任何社会制度,只有在一定阶级的财政支持下才会产生。不待说,自由资本主义的诞生曾花了许多万万卢布。目前我们应该特别加以支持的社会制度就是合作制度,这一点我们现在应该认识到并使它实现。但是支持合作社就应该是名副其实的支持,就是说,把这种支持仅仅理解为支持任何一种合作社的流转是不够的,而应该理解为支持确实有真正的居民群众参加的合作社的流转。”(同上,第393页)

所有这些情况说明什么呢?

说明爱怀疑的人是错误的。

说明列宁主义是对的,因为列宁主义把劳动农民群众看作无产阶级的后备军。

说明执掌政权的无产阶级能够运用而且应当运用这个后备军,以便把工业和农业结合起来,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为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过渡到社会主义经济所绝对必需的基础。

六 民族问题

关于这个题目我来讲两个主要问题:

参看《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682页。——编者注
同上,第683页。——编者注

(一)问题的提法；

(二)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

(1)问题的提法。最近二十年来,民族问题发生了许多极重大的变化。第二国际时期的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时期的民族问题远不是一回事。不仅按范围来说,而且按内在性质来说,它们都是大不相同的。

从前,通常都把民族问题限制在主要和“文明”民族有关的问题的狭隘范围内。爱尔兰人、匈牙利人、波兰人、芬兰人、塞尔维亚人以及欧洲其他一些民族,——第二国际的活动家所关心的就是这些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的命运。而那些遭受最粗暴最残酷的民族压迫的千百万亚洲人民和非洲人民,通常都不放在他们的眼里。他们不敢把白种人和黑种人,“文明人”和“不文明人”相提并论。两三个空空洞洞、不痛不痒、竭力回避殖民地解放问题的决议,——这就是第二国际的活动家所能借以自夸的一切。现在,民族问题方面的这种两重性和不彻底性可以说已经被消灭了。列宁主义揭露了这种极不相称的现象,拆毁了横在白种人和黑种人,欧洲人和亚洲人,帝国主义的“文明”奴隶和“不文明”奴隶之间的墙壁,因而把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问题联结起来了。于是民族问题就由局部的和国内的问题变成了一般的和国际的问题,变成了附属国和殖民地被压迫民族摆脱帝国主义桎梏的世界问题。

从前,民族自决原则通常都被曲解,往往把它缩小为民族自治权。第二国际的某些首领甚至把自决权变成文化自治权,就是说,被压迫民族有设立自己的文化机关的权利,而让全部政权仍旧掌握在统治民族手中。结果就使民族自决的思想有从反对兼并政策的工具变成替兼并政策辩护的工具的危险。现在,这种糊涂观念可以说已经被克服了。列宁主义扩大了民族自决的概念,把它解释为

附属国和殖民地被压迫民族有完全分离的权利,各民族有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于是就排除了把自决权解释为自治权来替兼并政策辩护的可能。于是民族自决原则就由欺骗群众的工具(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它无疑是被社会沙文主义者用来做这种工具的)变成了揭露一切帝国主义野心和沙文主义阴谋的工具,变成了用国际主义精神对群众进行政治教育的工具。

从前,通常都把被压迫民族问题看做纯粹法的问题。冠冕堂皇地宣布“民族的平等权利”,发表无数关于“民族平等”的宣言,——这就是第二国际各党所心满意足的事情。它们抹杀了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在帝国主义时代,当某一些民族(少数)靠剥削另一些民族生存的时候,所谓“民族平等”不过是对于被压迫民族的嘲弄。现在,民族问题方面的这种资产阶级的法的观点可以说已经被揭穿了。列宁主义把民族问题从大吹大擂的宣言的天空拉到地上来,指出如果无产阶级政党不直接援助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民族平等”的宣言就是空洞的虚伪的宣言。于是被压迫民族问题就成了支援,帮助,真正地经常地帮助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争取真正的民族平等,争取成立独立国家的问题。

从前,通常都用改良主义的观点来看民族问题,把它看作一个单独的孤立的问题,看作和资本政权、推翻帝国主义、实现无产阶级革命这一总问题无关的问题。人们当时都默默地认为:欧洲无产阶级不和殖民地解放运动直接结成联盟也能取得胜利;民族殖民地问题可以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的大道,可以不进行反帝的革命斗争,而悄悄地“自流地”得到解决。现在,这种反革命的观点可以说已经被揭穿了。列宁主义已经证明,帝国主义战争和俄国革命也已经证实:民族问题只有和无产阶级革命相联系并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基础上才能得到解决,西方革命必须同殖民地和附属国反帝解

放运动结成革命的联盟才能取得胜利。民族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一部分。

问题是这样:被压迫国家革命解放运动所含有的革命的可能性是否已经用完?如果还没有用完,是否有希望、有根据把这种可能性用于无产阶级革命,把附属国和殖民地国家由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后备军变为革命无产阶级的后备军,变为革命无产阶级的同盟者?

列宁主义对这个问题的答复是肯定的,即认为被压迫国家民族解放运动含有革命能力,认为可以把这种革命能力用于推翻共同的敌人,用于推翻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发展的内幕、帝国主义战争和俄国革命完全证实了列宁主义关于这一点的结论。

由此可见,“统治”民族的无产阶级必须援助,必须坚决地积极地援助各被压迫民族和附属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

这当然不是说,无产阶级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在每个具体情况下,都应当援助任何一种民族运动。这里所说的是要援助目的在于削弱帝国主义、推翻帝国主义,而不在于巩固和保持帝国主义的那种民族运动。有时候,个别被压迫国家的民族运动会和无产阶级运动发展的利益相冲突。不言而喻,在这种情况下是谈不到什么援助的。民族权利问题并不是一个独立自在的问题,而是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它服从整体,要求从整体的观点来观察。马克思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拥护波兰人和匈牙利人的民族运动,而反对捷克人和南方斯拉夫人的民族运动。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捷克人和南方斯拉夫人是“反动民族”,是欧洲的“俄国前哨”,是专制制度的前哨,而当时波兰人和匈牙利人却是反对专制制度的“革命民族”。因为当时援助捷克人和南方斯拉夫人的民族运动就是间接援助欧洲革命运动的最危险的敌人沙皇制度。

列宁说：“民主运动的个别要求，包括自决在内，并不是什么绝对的东西，而是世界一般民主主义（现在是一般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小部分。在个别的具体情况下，部分可能和总体相矛盾，那时就必须抛弃这一部分。”（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19卷第257—258页）

关于个别的民族运动问题，关于这些运动可能具有的反动性问题（当然，如果不是从形式上，不是从抽象的法的观点，而是从革命运动的利益的观点来具体地估量这些运动）就是这样。

关于一般民族运动的革命性也应该这样说。极大多数民族运动所无疑具有的革命性，也和某些个别的民族运动所可能具有的反动性一样，是相对的和独特的。在帝国主义压迫的情况下，民族运动的革命性完全不一定要以这个运动有无产阶级分子参加、有革命的或共和的纲领、有民主的基础为前提。阿富汗的艾米尔为阿富汗独立而进行的斗争在客观上是革命的斗争，因为这个斗争能够削弱、瓦解和毁坏帝国主义，虽然阿富汗的艾米尔及其战友抱有君主制的观点；可是象克伦斯基和策烈铁里、列诺得尔和谢德曼、切尔诺夫和唐恩、韩德逊和克莱因斯这些“激烈的”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革命家”和共和主义者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所进行的斗争却是反动的斗争，因为这个斗争的结果是粉饰并巩固帝国主义，使帝国主义取得胜利。埃及的商人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埃及独立而进行的斗争，由于同样的原因，在客观上也是革命的斗争，虽然埃及民族运动的首领是资产阶级出身，具有资产阶级身分，并反对社会主义；然而英国“工人”政府为保持埃及的附属地位而进行的斗争，由于同样的原因，却是反动的斗争，虽然这个政府的阁员是无产阶级出身，具有无产阶级身分，并“拥护”社会主义。更不必说其他较大的殖民地和附属国，如印度和中国的民族运动

了。这些国家在争取解放的道路上的每一步骤,即使违反形式上的民主的要求,也是对帝国主义的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就是说,毫无疑问是革命的步骤。

列宁说得对,在估量被压迫国家的民族运动时不要以形式上的民主为标准,而要以反帝国主义斗争总结中的实际结果为标准,就是说:“从世界范围来看,而不应当孤立地来看。”(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19卷第257页)

(2)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列宁主义在解决民族问题时是从下列原理出发的:

(一)世界已经分成两个阵营:一个是拥有金融资本并剥削地球上绝大多数居民的为数极少的文明民族的阵营,另一个是组成这个绝大多数的殖民地和附属国被压迫被剥削民族的阵营;

(二)被金融资本压迫和剥削的殖民地和附属国是帝国主义最巨大的后备力量和最重要的实力来源;

(三)附属国和殖民地国家被压迫民族所进行的反帝革命斗争是他们摆脱压迫和剥削的唯一道路;

(四)最重要的殖民地和附属国已经走上民族解放运动的道路,这个运动不能不引起全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

(五)发达的国家的无产阶级运动和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要求把这两种革命运动结合成一条反对共同的敌人、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的战线;

(六)如果不建立并巩固共同的革命战线,那么发达的国家中的工人阶级就不能胜利,被压迫民族就不能从帝国主义的桎梏下解放出来;

(七)如果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不直接而坚决地支援被压迫民

族的解放运动来反对“本国的”帝国主义,那么就不可能建立共同的革命战线,因为“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恩格斯);

(八)这种援助就是坚持、维护和实行下列口号:民族有分离权,有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

(九)不实行这个口号,就不能保证各民族在统一的世界经济中的联合和合作,而这种统一的世界经济是世界社会主义胜利的物质基础;

(十)这种联合只能是自愿的,是在各民族相互信任和友爱的基础上产生的。

由此就产生了民族问题上的两个方面,即两个趋向:一个趋向是在帝国主义压迫和殖民地剥削的基础上产生的,它力求在政治上摆脱帝国主义束缚而成立独立的民族国家;另一个趋向是因世界市场和世界经济的形成而产生的,它力求使各民族在经济上彼此接近。

列宁说:“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出在民族问题上有两个历史趋向。第一个趋向是民族生活和民族运动的觉醒,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民族国家的建立。第二个趋向是民族之间各种联系的发展和日益频繁,民族壁垒的破坏,资本、整个经济生活、政治、科学等等的国际统一的形成。

这两个趋向都是资本主义的世界规律。第一个趋向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占优势,第二个趋向标志着资本主义已经成熟,正在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17卷第139—140页)

对于帝国主义,这两个趋向是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因为帝国主义如果不剥削殖民地,如果不用暴力把殖民地束缚在“统一的整体”范围内,就不能生存;因为帝国主义只有靠兼并和夺取殖民地

才能使各民族互相接近,否则它根本就不成其为帝国主义了。

对于共产主义,恰恰相反,这两个趋向不过是一个问题即被压迫民族摆脱帝国主义压迫这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因为共产主义知道:各民族在统一的世界经济中的联合,只有根据相互信任和自愿协定的原则才能实现;各民族的自愿联合,只有经过使殖民地从“统一的”帝国主义“整体”分离出来的道路,经过使殖民地变为独立国家的道路才能达到。

因此,必须顽强地、不断地、坚决地反对各统治民族(英、法、美、意、日等)的“社会主义者”的大国沙文主义,这些“社会主义者”不愿意反对本国帝国主义政府,不愿意援助“他们的”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摆脱压迫、争取国家独立的斗争。

不进行这样的斗争,就不能以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以接近附属国和殖民地劳动群众的精神、以真正准备无产阶级革命的精神来教育统治民族的工人阶级。如果俄国无产阶级没有得到前俄罗斯帝国内各被压迫民族的同情和援助,那么俄国革命就不会胜利,而高尔察克和邓尼金也就不会被击溃。但是要取得这些民族的同情和援助,俄国无产阶级当时首先必须打断俄国帝国主义的锁链,使这些民族摆脱民族压迫。

不这样做,就不能巩固苏维埃政权,就不能树立真正的国际主义,就不能建立各民族合作的卓越组织,这个组织叫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它是各民族将来在统一的世界经济中联合的实际榜样。

因此,必须反对各被压迫国家社会党人的民族闭关自守、狭隘观点和隔离状态,这些社会党人不愿意超出自己的民族狭隘眼界,不了解本国解放运动和统治国无产阶级运动之间的联系。

不进行这样的斗争,就不能保持被压迫民族无产阶级的独立

政策,就不能保持它和统治无产阶级在推翻共同的敌人、推翻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的阶级团结。

不进行这样的斗争,就不能实现国际主义。

这就是以革命的国际主义精神来教育统治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劳动群众的道路。

请看列宁对于共产主义运动以国际主义精神教育工人的这个两方面的工作是怎样说的:

“这种教育工作……在压迫的大民族中和被压迫的小民族中,在兼并的民族中和被兼并的民族中,能够具体地相同吗?”

显然不能。要达到使一切民族完全平等、密切接近和进而融合的共同目的,显然要走各不相同的具体道路,就拿达到一张纸的中心点的方法来说吧,可以从纸的一端向左走,也可以从纸的相对的一端向右走,反正都会达到。如果压迫的、兼并的大民族中的社会民主党人仅仅一般地鼓吹民族融合,而忘记了,哪怕是一分钟忘记了‘他的’尼古拉二世、‘他的’威廉、乔治、彭加勒等等也主张和小民族融合(用兼并手段),忘记了尼古拉二世主张和加里西亚‘融合’、威廉二世主张和比利时‘融合’等等,那么,这样的社会民主党人在理论上是可笑的学理主义者,在实践上是帝国主义的帮凶。

在压迫国家里,工人的国际主义教育的重心必须是宣传并且要工人坚持被压迫国家有分离的自由。不这样,就没有国际主义。如果压迫民族的任何一个社会民主党人不进行这种宣传,那么我们就可以而且应该鄙视他,把他看作帝国主义者,看作坏分子。这是绝对的要求,哪怕在社会主义未实现以前,分离的机会只有千分之一是可能的和‘可以实现的’。……

相反地,小民族的社会民主党人应当以我们这个总公式——各民族‘自愿联合’的末尾两个字为其鼓动工作的重心。他既可以赞成本民族的政治独立,又可以赞成本民族加入邻近某个国家,同时又不违反他的作为国际主义者的义务。可是,他在任何场合都应当反对小民族的狭隘观点、闭关自守和隔离状态,而主张顾全整体和总体、部分利益服从全体利益。

不仔细考虑问题的人,会以为压迫民族的社会民主党人坚持‘分离自由’而被压迫民族的社会民主党人坚持‘联合自由’是‘矛盾的’。可是,只要稍微思索一下,就可以知道要达到国际主义和民族融合这一目的,除了这种状况以外,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道路。”(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19卷第261—262页)

七 战略和策略

关于这个题目我来讲六个问题：

- (一)战略和策略是指导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科学；
- (二)革命的阶段和战略；
- (三)运动的来潮退潮和策略；
- (四)战略指导；
- (五)策略指导；
- (六)改良主义和革命主义。

(1)战略和策略是指导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科学。第二国际统治时期主要是在比较和平发展的环境中编制和训练无产阶级政治军队的时期。这是把议会制度当作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的时期。当时关于大规模的阶级冲突的问题、关于训练无产阶级去进行革命搏斗的问题、关于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问题似乎都不是迫切的问题。当时的任务只是要利用一切合法的发展道路来编制和训练无产阶级军队,以适应无产阶级处于在野党地位并且似乎应当

处于在野党地位的条件来利用议会制度。几乎用不着证明,在这样的时期和这样了解无产阶级任务的情况下,既不可能有完整的战略,也不可能周密的策略。当时只有关于策略和战略的一些片断的零碎的观念,但是没有策略和战略。

第二国际的滔天罪行并不在于它当时实行了利用议会斗争形式的策略,而在于它夸大了这种斗争形式的意义,几乎把这种斗争形式看作唯一的斗争形式。而当公开的革命搏斗时期到来的时候,当议会外斗争形式问题已经成为首要的迫切问题的时候,第二国际各党竟避开了新的任务,不去接受这些任务。

只有在下一个时期,无产阶级公开发动的时期,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期,当推翻资产阶级的任务已经成为直接的实践问题的时候,当无产阶级的后备军问题(战略)已经成为一个最迫切的问题的时候,当一切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议会形式和议会外形式(策略)已经十分明显地表现出来的时候,——只有在这个时期,才能制定无产阶级斗争的完整的战略和周密的策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被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埋没了的那些关于策略和战略的英明思想,正是在这个时期被列宁发掘出来重见天日的。但是列宁并不限于恢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个别策略原理。他还向前发展了这些原理,补充了一些新的思想和原理,把这一切结合为指导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规则和指导原则的体系。列宁的《怎么办》、《两种策略》、《帝国主义》、《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以及《幼稚病》等书无疑是加进马克思主义的总宝库,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武库的最宝贵的贡献。列宁主义的战略和策略是指导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科学。

(2)革命的阶段和战略。战略就是规定无产阶级在革命某一阶段上的主要的打击方向,制定革命力量(主要的和次要的后备军)

的相应的布置计划,在革命这一阶段的整个过程中为实现这个计划而斗争。

我们的革命已经过两个阶段,十月革命后已进入第三个阶段。与此相适应,战略也有过变更。

第一个阶段。1903—1917年2月。目的是推翻沙皇制度,彻底消灭中世纪制度的残余。革命的基本力量是无产阶级。最亲近的后备军是农民。主要的打击方向是孤立自由君主派资产阶级,这个资产阶级力图抓住农民并用和沙皇制度妥协的方法来消灭革命。力量的布置计划是工人阶级和农民联盟。“无产阶级应当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这就要把农民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使用强力打破专制制度的反抗,并麻痹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8卷第96页)

第二个阶段。1917年3月—1917年10月。目的是推翻俄国的帝国主义,摆脱帝国主义战争。革命的基本力量是无产阶级。最亲近的后备军是贫苦农民。邻国无产阶级是可能的后备军。旷日持久的战争和帝国主义的危机是有利的时机。主要的打击方向是孤立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这个民主派力图抓住劳动农民群众并用和帝国主义妥协的方法来结束革命。力量的布置计划是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联盟。“无产阶级应当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这就要把居民中的半无产者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使用强力打破资产阶级的反抗,并麻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同上)

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是在十月革命后开始的。目的是在一国内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运用这个专政作为据点,以便在世界各国

推翻帝国主义。革命已经超出一国范围,世界革命的时代已经开始。革命的基本力量是一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主要的后备军是发达的国家的半无产阶级群众和小农群众,殖民地和附属国的解放运动。主要的打击方向是孤立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孤立第二国际各党,这些党是和帝国主义妥协这一政策的基本支柱。力量的布置计划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殖民地、附属国的解放运动联盟。

战略是和革命的基本力量及其后备军有关的。战略因革命由一个阶段转入另一阶段而变更,而在某一阶段的整个时期基本上是不变的。

(3)运动的来潮退潮和策略。策略就是规定无产阶级在运动的来潮或退潮、革命的高涨或低落这个较短时期内的行动路线,就是通过以新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代替旧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以新的口号代替旧的口号,通过把这些形式配合起来等等来实现这条路线而斗争。战略的目的,比如说,是要取得反对沙皇制度的战争或反对资产阶级的战争的胜利,把反对沙皇制度的斗争或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进行到底,而策略的目的却没有这样重大,因为策略并不是要取得整个战争的胜利,而是要取得某些战役、某些战斗的胜利,有成效地实行某些适合于革命某一高涨或低落时期的具体情况的运动和发动。策略是战略的一部分,是服从于战略的,是服务于战略的。

策略是随着来潮退潮而变更的。在革命第一阶段的时期内(1903—1917年2月),战略计划始终没有变更,策略却变更过几次。在1903—1905年的时期,党的策略是进攻的,因为当时革命处于来潮,运动是上升的,策略应当以这个事实为出发点。与此相适应,斗争形式也是革命的,是适合于革命来潮的要求的。地方的政

治罢工、政治示威、政治总罢工、抵制杜马、起义和革命战斗口号就是这个时期内互相代替的斗争形式。当时的组织形式也因斗争形式的变更而变更了。工厂委员会、农民革命委员会、罢工委员会、工人代表苏维埃和比较公开的工人政党就是这个时期内的组织形式。

在 1907—1912 年的时期,党不得不转而采取退却的策略,因为当时革命运动低落,革命处于退潮,策略不能不估计到这个事实。与此相适应,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也变更了。不是抵制杜马,而是参加杜马;不是杜马外的公开的革命发动,而是杜马内的发动和杜马内的工作;不是政治总罢工,而是局部经济罢工,或者简直无声无息。当然,党在这个时期内应该转入地下活动,而群众的革命组织也就由文化教育组织、合作社组织、保险会组织以及其他合法组织代替了。

关于革命的第二个阶段和第三个阶段也应该这样说,在这两个阶段中,策略变更过几十次,战略计划却始终没有变更。

策略是同无产阶级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有关的,是同这些形式的交替和配合有关的。策略在革命的某一阶段上可以随着革命的来潮或退潮、革命的高涨或低落而变更好几次。

(4)战略指导。革命的后备军有两种:

直接的:(一)本国的农民以至所有过渡阶层,(二)邻国的无产阶级,(三)殖民地和附属国的革命运动,(四)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品和成果,而无产阶级为了收买强大的敌人并取得喘息时机,可以在保持自己的实力优势的条件下暂时放弃一部分胜利品和成果;

间接的:(一)本国各个非无产者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这些矛盾和冲突是无产阶级可以利用来削弱敌人并加强自己的后备军的,(二)和无产阶级国家敌对的各个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的矛盾、冲

突和战争(例如帝国主义战争),这些矛盾、冲突和战争是无产阶级在进攻时或者在被迫退却相机行事时可以利用的。

关于第一种后备军用不着多说,因为它们的意义是大家都知道的。至于第二种后备军,因为它们的意义并不是任何时候都很明显的,所以必须指出,它们有时候对于革命进程具有头等的意义。例如第一次革命时期和第一次革命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社会革命党人)和自由君主派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人)之间的冲突的巨大意义是未必可以否认的,因为这种冲突在使农民摆脱资产阶级影响这件事情上无疑起了相当的作用。十月革命时期各主要帝国主义集团之间进行决死的战争这一事实的巨大意义更是不可否认的,当时帝国主义者忙于相互之间的战争,没有可能集中力量来反对年轻的苏维埃政权,正因为如此,无产阶级就有可能来切实地组织自己的力量,巩固自己的政权,并准备扑灭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现在,当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当它们彼此之间的新战争不可避免的时候,这种后备军对于无产阶级一定会有愈益重大的意义。

战略指导的任务就是要正确运用这一切后备军来达到革命在某一发展阶段上的基本目的。

怎样才是正确运用后备军呢?

就是要执行一些必要的条件,其中主要的是:

第一,当革命时机已经成熟,当进攻在以全力进行,当起义已经迫在眉睫,当使后备军跟上先锋队已经成为决定胜负的条件的時候,在这个决定关头,要把革命的主要力量集中在敌人最易致命的地方。党在1917年4—10月这一时期的战略可以说是这样运用后备军的实例。毫无疑问,这个时期敌人最易致命的地方是战争。毫无疑问,党正是在这个基本问题上把广大群众集合到无产阶级

先锋队的周围。党在这个时期的战略就是通过游行示威来训练先锋队去进行街头的发动,同时通过后方的苏维埃和前线的士兵委员会使后备军跟上先锋队。革命的结局表明,当时后备军是运用得正确的。

列宁在谈到革命力量的战略运用这个条件时,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武装起义的著名原理变动了一下说:

“(1)任何时候都不要玩弄起义,在开始起义时就要切实懂得,必须干到底。

(2)必须在决定的地点,在决定的关头,集中很大的优势力量,否则,更有准备、更有组织的敌人就会把起义者消灭。

(3)起义一旦开始,就必须以最大的决心行动起来并坚决采取进攻。‘防御是武装起义的死路。’

(4)必须在敌军还分散的时候,出其不意地袭击他们。

(5)每天(如果以一个城市来说,可以说每小时)都必须取得胜利,即令是不大的胜利,无论如何要保持‘精神上的优势’。”(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1卷第319—320页)

第二,要选择危机已经达到顶点、先锋队已经具有战斗到底的决心、后备军已经具有援助先锋队的决心、敌人内部已经极端慌乱的时机作为实行致命打击的时机,开始起义的时机。

列宁说:决战时机可以说完全成熟了,如果“(1)一切敌视我们的阶级力量已经十分混乱,彼此之间的厮杀已经十分厉害,由于进行力不胜任的斗争已经十分疲惫”;如果“(2)一切犹豫的、动摇的、不坚定的中间分子,即和资产阶级不同的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已经在人民面前充分暴露自己,由于实际破产而大丢其丑”;如果“(3)在无产阶级中,群众支持采取最坚决、最奋勇的革命行动来反对资产阶级的情绪,已经开始产生并且大大地高涨起

来。那时候,革命就成熟了;那时候,如果我们正确地估计到上面所指出的……一切条件,并且正确地选走时机,我们的胜利就有保证了”。(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5卷第229页)

举行十月起义可以说是这种战略的模范。

违背这个条件,就会造成危险的错误,即所谓“失其速度”,就是说,党就会落在运动进程的后面,或者向前跑得太远,因而造成失败的危险。有一部分同志在1917年9月企图从逮捕民主会议⁸¹代表来开始起义,可以说是这种“失其速度”的例子,不善于选择起义时机的例子,因为当时在苏维埃内部还有动摇情绪,前线还犹豫不决,后备军还没有跟上先锋队。

第三,要越过前进道路上的种种阻力和障碍,一往直前地实行既定的方针,只有这样,才能使先锋队不致失去斗争的基本目的,使群众不致迷失道路,而能向着这个目的前进并努力团结在先锋队的周围。违背这个条件,就会造成莫大的错误,即海员们所熟悉的所谓“失其方向”。我们党在紧接民主会议以后所采取的决定参加预备议会这一错误的步骤,可以说是这种“失其方向”的例子。当时党似乎忘记了预备议会是资产阶级企图把国家从苏维埃道路转到资产阶级议会制度道路上去的手腕,党参加这种机关就会打乱全部计划,就会使那些在“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下进行革命斗争的工农迷失道路。这个错误因为布尔什维克退出预备议会而被纠正了。

第四,当敌人力量强大,当退却不可避免,当接受敌人的挑战显然对自己不利,当在一定的力量对比下退却是使先锋队免受打击并保存其后备军的唯一手段的时候,要机动调度后备军来实行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248页。——编者注

正确的退却。

列宁说：“革命政党应当补课。它们学习过进攻。现在应当了解，除了学会进攻以外，还必须学会正确地退却。必须了解，——而且革命阶级已经从本身的沉痛经验中领会到，——不学会正确的进攻和正确的退却，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5卷第177页）

这种战略的目的就是要赢得时间，瓦解敌人，养精蓄锐，以便后来转为进攻。

缔结布列斯特和约⁸²可以说是这种战略的模范。这个和约使党有可能赢得时间，利用帝国主义阵营中的冲突，瓦解敌人的力量，为自己保留农民，养精蓄锐准备向高尔察克和邓尼金进攻。

当时列宁说：“我们缔结单独和约，就能在目前可能的最大程度上摆脱两个彼此敌对的帝国主义集团，利用它们相互之间的敌视和战争，——这种敌视和战争阻碍它们勾结起来反对我们，——取得一定时期的行动自由，来继续进行和巩固社会主义革命。”（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2卷第198页）

布列斯特和约签订后过了三年，列宁说：“现在就连头号傻瓜也看得见，‘布列斯特和约’这个让步加强了我们的实力，分散了国际帝国主义的力量。”（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7卷第7页）

保证有正确的战略指导的主要条件就是这样。

(5)策略指导。策略指导是战略指导的一部分，是服从战略指导的任务和要求的。策略指导的任务就是要掌握无产阶级的一切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保证这些形式的正确运用，以便在一定的力量对比下取得为准备战略胜利所必需的最大成果。

怎样才是正确运用无产阶级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呢？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185页。——编者注

同上，第3卷第415页。——编者注

同上，第4卷第556页。——编者注

就是要执行一些必要的条件 ,其中主要的是 :

第一 ,要把这样一种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提到第一位 ,这种形式最适合于当时运动的来潮或退潮的条件 ,能够促进和保证把群众引到革命阵地上 ,把千百万群众引到革命战线上 ,把群众配置在革命战线上。

问题并不是要使先锋队觉悟到保存旧制度的不可能和推翻旧制度的必不可免。问题是要使群众 ,使千百万群众了解这是必不可免的 ,使他们表示援助先锋队的决心。可是 ,群众只有从亲身的经验中才能了解这一点。任务就是要使千百万群众有可能根据亲身的经验认识到推翻旧政权的必不可免 ,要提出适当的斗争方法和组织形式使群众易于根据经验来认清革命口号的正确性。

如果党在当时没有决定参加杜马 ,如果它没有决定集中力量去进行杜马内的工作 ,并在这一工作的基础上去开展斗争 ,使群众易于根据亲身的经验认清杜马的无用、立宪民主党人的诺言的虚伪、和沙皇制度妥协的不可能、农民和工人阶级联盟的必不可免 ,那么先锋队就会脱离工人阶级 ,而工人阶级就会失去它和群众的联系。如果没有群众在杜马时期的经验 ,就不可能揭露立宪民主党人 ,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召回主义⁸³策略的危险性就在于它会使先锋队脱离自己的千百万人的后备军。

如果无产阶级当时跟着在 1917 年 4 月号召举行起义的“左派”共产主义者⁸⁴走 ,那么党就会脱离工人阶级 ,而工人阶级就会失去它在广大的农民和士兵群众中的影响 ,因为当时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还没有暴露自己是战争和帝国主义的拥护者 ,因为当时群众还没有根据亲身的经验认清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关于和平、土地和自由的言论的虚伪。如果没有群众在克伦斯基统治

时期的经验,就不会使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陷于孤立,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因此,“耐心说明”各小资产阶级政党的错误并在苏维埃内部进行公开斗争的策略是当时唯一正确的策略。

“左派”共产主义者策略的危险性就在于它会使党由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变成一小撮徒托空言而没有基础的密谋家。

列宁说:“单靠先锋队是不能胜利的。当整个阶级,当广大群众还没有采取直接支持先锋队的立场,或者还没有对先锋队采取至少是善意的中立态度……时,单叫先锋队去进行决战,那就不仅是愚蠢,而且是犯罪。但是要使真正整个阶级,使被资本压迫的真正广大的劳动群众都站到这种立场上来,仅靠宣传和鼓动是不够的。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这些群众本身的政治经验。这是一切大革命的基本规律,现在这个规律不仅在俄国,而且在德国也得到了十分有力而鲜明的证实。不仅对没有文化、大都不识字的俄国群众,而且对文化程度高、个个识字的德国群众,都需要亲身体验到第二国际骑士们的政府懦弱无能、毫无气节、一筹莫展、对资产阶级奴颜婢膝、卑鄙无耻,亲身体验到,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就必然是极端反动分子(俄国的科尔尼洛夫、德国的卡普之流)的专政,然后才坚决转到共产主义方面来的。”(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5卷第228页)

第二,要在每个一定的时机找出事变过程链条上的特殊环节,抓住了这个环节,就能掌握整个链条,为取得战略胜利准备条件。

问题是要从摆在党面前的许多任务中挑出这样一个当前任务,解决这个任务是中心,实现这个任务就能保证顺利地解决其他一切当前任务。

我们可以用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个原理的意义,一个例子可以引自很久以前的时期(党形成时期),另一个例子可以引自我们最接近的目前时期(新经济政策时期)。

在党形成的时期,无数的小组和组织还没有彼此联系起来,手工业方式和小组习气从上到下腐蚀着党,思想上的混乱是党内生活的特征,——在这个时期,整个链条中的基本环节和摆在党面前的各项任务中的基本任务就是创办全俄的秘密报纸(《火星报》⁹)。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只有通过全俄的秘密报纸才能形成党内意见一致的核心,才能把无数的小组和组织联结成一个整体,准备思想统一和策略统一的条件,从而为真正的党的形成奠定基础。

在由战争过渡到经济建设的时期,工业遭到破坏而奄奄一息,农业苦于城市产品的不足,国营工业和农民经济的结合已经成为顺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条件,——在这个时期,事变过程链条中的基本环节,许多任务中的基本任务,就是发展商业。为什么呢?因为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工业和农民经济只有通过商业才能结合;因为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有生产而没有销路就是置工业于死地;因为只有通过发展商业去扩大销路,才能扩展工业;因为只有商业方面巩固了,只有掌握了商业,只有掌握了这个环节,才能指望把工业和农民市场结合起来并顺利地解决其他的当前任务,以便为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创造条件。

列宁说:“仅仅做一个革命者和社会主义拥护者甚至共产主义者是不够的。必须善于在每个特定时机找出链条上的那个特殊环节,必须全力抓住这个环节,以便抓住整个链条并坚定地准备过渡到下一个环节……”

“当前……这样的环节就是在国家的正确调节(指导)下活跃国内商业。在历史事件的链条中,即在1921—1922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过渡形式中,商业正是……‘必须全力抓住的环节’。”(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7卷第82页)

参看《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577页和第578页。——编者注

保证有正确的策略指导的主要条件就是这样。

(6)改良主义和革命主义。革命的策略和改良主义的策略有什么区别呢？

有些人以为列宁主义反对一切改良，反对一切通融和妥协。这是完全不对的。布尔什维克和其他任何人一样清楚地知道：在某种意义上说来，真是“凡施皆善”；在某种条件下，改良，其中包括通融和妥协，是必要的和有益的。

列宁说：“为了推翻国际资产阶级而进行的战争，要比国家之间通常进行的最顽强的战争还要困难百倍，费时百倍，复杂百倍，进行这样的战争而事先拒绝采用机动办法，拒绝利用敌人之间的利益矛盾（哪怕是暂时的矛盾），拒绝同各种可能的同盟者（哪怕是暂时的、不稳定的、动摇的、有条件的同盟者）通融和妥协，这岂不是可笑到了极点吗？这岂不是正象我们想攀登一座崎岖险阻、未经勘察、人迹未到的高山，却预先拒绝有时要迂回前进，有时要向后折转，放弃已经选定的方向而试着向各种不同的方向走吗？”（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5卷第210页）

问题显然不在于改良或通融和妥协，而在于怎样运用改良和妥协。

在改良主义者看来，改良就是一切，而革命工作不过是拿来作谈话资料、借以转移视线的小事情。所以，改良主义策略下的改良，在资产阶级政权存在的条件下，必然要变为巩固资产阶级政权的工具，变为瓦解革命的工具。

相反地，在革命者看来，主要的是革命工作，而不是改良，——在革命者看来，改良是革命的副产品。所以，革命策略下的改良，在资产阶级政权存在的条件下，自然会变为瓦解资产阶级政权的工具，变为巩固革命的工具，变为向前发展革命运动的据点。

革命者采用改良,是为了利用它作为挂钩来把合法工作和秘密工作联结起来,是为了利用它作为掩蔽物来加强秘密工作,以便用革命精神训练群众去推翻资产阶级。

在帝国主义条件下按革命精神利用改良和妥协的实质就在这里。

相反地,改良主义者采用改良,是为了拒绝任何秘密工作,破坏训练群众去进行革命的事业,在“恩赐的”改良的福荫下高枕而卧。

改良主义策略的实质就在这里。

关于帝国主义条件下的改良和妥协的问题就是这样。

可是在帝国主义被推翻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情形就有些改变了。在某种条件下,在某种环境中,无产阶级政权也许不得不暂时离开用革命手段改造现存制度的道路,而走上逐渐改造现存制度的道路;走上”列宁在《论黄金的作用》这篇著名论文中所说的那条“改良主义的”道路”,走上迂回行进的”道路”,走上改良和向非无产者阶级让步的道路,以便瓦解这些阶级,给革命以喘息时机,养精蓄锐,准备举行新进攻的条件。不能否认,这条道路在某种意义上说来是“改良主义的”道路。只是应当记住,这里有一个根本特点,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的改良是来自无产阶级政权方面的改良,它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它给无产阶级政权以必要的喘息时机,它的使命不是要瓦解革命,而是要瓦解非无产者阶级。

于是,在这种情况下,改良就变成了自己的对立面。

无产阶级政权所以能够实行这种政策,是因为而且只是因为前一时期的革命规模已十分广大,因而开辟了十分广阔的场所,因而可以实行退却,用暂时退却的策略,用迂回行进的策略来代替进

列宁《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574—581页)。——编者注

攻的策略。

这样看来,从前,在资产阶级政权下,改良是革命的副产品,而现在,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改良的来源却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胜利品,即由这些胜利品构成的、积累在无产阶级手中的后备力量。

列宁说：“只有马克思主义才精确地正确地规定了改良同革命的关系,然而马克思只能从一方面,即只能从无产阶级还没有在一个国家取得稍微巩固、稍微持久的初次胜利的情况下看到这种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正确关系的基础就是把改良看作无产阶级的革命阶级斗争的副产品。……无产阶级即使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以后,改良同革命的关系也还会产生一种新的内容。在原则上虽然和从前一样,但在形式上却已发生变化。这种变化马克思本人当时是预见不到的,这种变化只有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政治学说才能认识到。……取得胜利以后,如果取得胜利的国家经过极度紧张的斗争,其实力显然不够用革命手段来实行某种过渡,那么改良(在国际范围内仍然是“副产品”)还是一种必要的合理的喘息时机。胜利提供了很多‘后备力量’,使我们即使在被迫退却时也能坚持下去,无论在物质方面或精神方面都能坚持下去。”(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7卷第84—85页)

八 党

在革命前的时期,在比较和平发展的时期,第二国际各党是工人运动中的统治力量,议会斗争形式是基本的斗争形式,——在这种条件下,党没有而且不可能有它后来在公开的革命搏斗的条件

下所具有的那种重大的和决定的意义。考茨基在第二国际遭受攻击时替它辩护说：第二国际各党是和平的工具，不是战争的工具，正因为如此，它们在战争时期，在无产阶级的革命发动时期，就没有力量采取什么重大措施。这是完全对的。但是这说明什么呢？说明第二国际各党对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是不适用的，它们不是引导工人去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的战斗的党，而是迁就议会选举和议会斗争的选举机关。正因为如此，在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统治的时期，无产阶级的基本政治组织并不是党，而是议会党团。大家知道，事实上党在这个时期只是议会党团的附属品和服役者。几乎用不着证明，在这样的条件下，在这样的党的领导下，是谈不到训练无产阶级去进行革命的。

可是，新时期一到来，情形就根本改变了。新时期是公开的阶级冲突的时期，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发动的时期，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期，是直接准备力量去推翻帝国主义而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时期。这个时期在无产阶级面前提出种种新的任务：要按新的革命的方式去改造党的全部工作，要用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精神去教育工人，要训练后备军并使他们跟上来，要和邻国的无产者结成联盟，要同殖民地和附属国的解放运动建立巩固的联系，如此等等。如果以为这些新任务可以用那些在议会制度的和平条件下教育出来的旧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力量来解决，那就是使自己陷于绝望的境地，遭到不可避免的失败。肩负着这样的任务而仍然以旧的政党为领导，那就是完全解除武装。几乎用不着证明，无产阶级是不能容忍这种情形的。

因此，必须有新的党，战斗的党，革命的党。这个党要有充分的勇气，能够引导无产者去夺取政权；这个党要有充分的经验，能够认清革命环境的复杂条件；这个党要有充分的随机应变的本领，能

够绕过横在前进道路上的一切暗礁。

没有这样的党,就休想推翻帝国主义,就休想争得无产阶级专政。

这个新的党就是列宁主义的党。

这个新的党有什么特点呢?

(1)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党首先应当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党应当把工人阶级的一切优秀分子,把他们的经验、他们的革命性、他们对无产阶级事业无限忠诚的精神都吸收进来。但是要成为真正的先进部队,党应当用革命理论,用运动规律的知识,用革命规律的知识把自己武装起来。否则它就不能领导无产阶级的斗争,就不能引导无产阶级。如果党只限于记录工人阶级群众的感觉和思想,如果它做了自发运动的尾巴,如果它不善于克服自发运动的因循习惯和政治上的漠不关心,如果它不善于超出无产阶级的一时的利益,如果它不善于把群众的水平提高到认识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那么它就不能成为真正的党。党应当站在工人阶级的前面,应当比工人阶级看得远些,应当引导无产阶级,而不应当做自发运动的尾巴。鼓吹“尾巴主义”的第二国际各党是资产阶级政策的传播者,而这个政策是要把无产阶级变成资产阶级手中的工具。只有采取无产阶级先进部队的观点、能够把群众的水平提高到认识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的党才能使工人阶级离开工联主义的道路,使它变成独立的政治力量。

党是工人阶级的政治领袖。

我在上面已经说到工人阶级斗争的困难,说到斗争环境的复杂,说到战略和策略,说到后备军和机动性,说到进攻和退却。这些条件的复杂程度,和战争条件比较起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谁能认清这些条件呢?谁能给千百万无产者群众以正确的方针呢?无

论哪一个作战部队如果不愿意遭到失败,就非有经验丰富的司令部不可。无产阶级如果不愿意让自己受死敌的宰割,就更加非有这样的司令部不可,这难道还不明显吗?可是这个司令部在什么地方呢?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党才能成为这样的司令部。工人阶级没有革命的党,就等于军队没有司令部。

党是无产阶级的战斗司令部。

可是,党不能仅仅是先进部队。党同时还应当是本阶级的部队,即本阶级的一部分,党应当和本阶级有根深蒂固的联系。只要阶级还没有消灭,只要无产阶级还由其他阶级出身的人来补充,只要工人阶级还不可能全部提高到先进部队的水平,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和其余群众之间的区别,党员和非党员之间的区别是不会消灭的。可是,如果这个区别变成了隔离,如果党把自己关在小圈子里而和非党群众脱离,那么党就不成其为党了。如果党不和非党群众联系,如果党不和非党群众结合,如果非党群众不接受党的领导,如果党在群众中没有道义上和政治上的信用,那么党就不能领导阶级。

不久以前,我们党从工人中接收了二十万新党员。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情况,就是这些人与其说是自己走进党内来的,不如说是被其余的一切非党群众送进党内来的,这些非党群众积极参加了接收新党员的工作,而且接收新党员都是经过他们赞同的。这件事说明:广大的非党工人群众把我们党看做他们自己的党,看做亲近的亲切的党,他们深切关心党的发展和巩固,他们自愿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党的领导。几乎用不着证明,如果没有这种看不见摸不到的精神上的线索把党和非党群众联系起来,党是不能成为本阶级的决定力量的。

党是工人阶级的不可分离的部分。

列宁说：“我们是阶级的党，因此，几乎整个阶级（而在战争时期，在国内战争年代，甚至完全是整个阶级）都应当在我们党的领导下行动，都应当尽量紧密地靠近我们党；但是，如果以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论在什么时候，几乎整个阶级或者整个阶级都能把自己的觉悟程度和积极程度提高到自己的先进部队即自己的社会民主党的水平，那就是马尼洛夫精神³⁵和‘尾巴主义’。还没有一个明白事理的社会民主党人怀疑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连工会组织（比较原始的、比较容易为落后阶层的觉悟程度接受的组织）也不能包括几乎整个工人阶级或者整个工人阶级。忘记先进部队和倾向于它的所有群众之间的区别，忘记先进部队的经常责任是把愈益广大的阶层提高到这个先进的水平，那只是欺骗自己，无视我们的巨大任务，缩小这些任务。”（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6卷第205—206页）

（2）党是工人阶级的有组织的部队。党不仅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如果党想真正领导本阶级的斗争，那么它同时还应当是本阶级的有组织的部队。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党的任务是非常巨大而繁杂的。党应当在国内外发展非常困难的条件下领导无产阶级的斗争；党应当在环境要求进攻时引导无产阶级去进攻；党应当在环境要求退却时带领无产阶级避开强大的敌人的打击；党应当向千百万无组织的非党工人群众灌注斗争的纪律性和计划性、组织性和坚定性。可是，党只有当它自己是纪律性和组织性的体现者的时候，只有当它自己是无产阶级的有组织的部队的时候，才能完成这些任务。没有这些条件，就谈不到党对千百万无产阶级群众的真正领导。

党是工人阶级的有组织的部队。

关于党是有组织的整体这个思想，是在列宁所提出的我们党章第一条的著名条文中固定下来的，这个条文把党看做组织的总和，把党员看做党内某一组织的成员。孟什维克还在1903年就反

参看《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457—458页。——编者注

对这个条文,而提出了自行列名入党的“制度”,要求把党员的“称号”扩大到每个“教授”和“中学生”,每个“同情者”和“罢工者”,即扩大到每个给党以某种援助、但是并不加入而且不愿加入党的任何一个组织的人。几乎用不着证明,如果这个奇特的“制度”在我们党内巩固起来,那就必然会使党内充满教授和中学生,使党变成一个界限模糊、没有定形、组织涣散而沉没在“同情者”大海中的“机构”,抹杀党和阶级间的界限,抛弃党把无组织群众提高到先进部队水平的任务。不用说,在这种机会主义的“制度”下,我们党是不能够在我们的革命进程中实现工人阶级的组织核心的作用的。

列宁说:“在马尔托夫同志看来,党的界限是极不明确的,因为‘每一个罢工者’都可以‘宣布自己是党员’。试问,这种界限模糊有什么好处呢?不过是使‘称号’广泛散布而已。它的害处就是会产生一种把党和阶级混淆起来的涣散组织的思想。”(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6卷第211页)

可是,党不仅是党的各个组织的总和。党同时还是这些组织的统一的体系,是这些组织正式结成的统一的整体,有上级的和下级的领导机关,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有全体党员所必须执行的实际决议。没有这些条件,党就不能成为能够有计划有组织地领导工人阶级斗争的统一的有组织整体。

列宁说:“从前,我们党还不是正式的有组织整体,而只是各个集团的总和,所以在这些集团间除了思想影响以外,别的关系是不可能有的。现在,我们已经成为有组织的政党,这也就是说造成了一种权力,思想威信变成了权力威信,党的下级机关应该服从党的上级机关。”(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6卷第291页)

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党的工作由中央来领导的原则,往往引

参看《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463—464页。——编者注
见《列宁全集》第7卷第360页。——编者注

起那些不坚定的分子的攻击,他们斥责这种原则是“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等。几乎用不着证明,如果不实行这些原则,那么作为一个整体的党的有计划的工作和对工人阶级斗争的领导就会是不可能的。列宁主义在组织问题上始终是始终一贯地实行这些原则的。列宁把反对这些原则的行为叫做“俄国的虚无主义”和“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认为这种行为应该受到讥笑和痛斥。

列宁在他的《进一步》一书中对于这些不坚定的分子是这样说的:

“这种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是俄国虚无主义者所特有的。党的组织在他们看来是可怕的‘工厂’;部分服从整体和少数服从多数在他们看来是‘农奴制’……他们一听见在中央领导下实行分工,就发出可怜又可笑的号叫,反对把人们变成‘小轮子和小螺丝钉’……他们一听见有人提起党的组织章程,就作出瞧不起人的样子,发表鄙视的……意见,说完全不要章程也可以。”

“看来很明显,高喊所谓官僚主义,不过是要掩盖他们对于中央机关人选的不满,不过是要掩盖……丑恶行为。你是官僚主义者,因为你是代表大会不按照我的意志而违反我的意志委派的;你是形式主义者,因为你是根据代表大会的形式上的决议,而没有得到我的同意;你做事极端机械,因为你凭借党代表大会的‘机械的’多数,而不考虑到我想得到补选席位的愿望;你是专制君主,因为你不愿意把权柄交给旧时的亲热伙伴。”(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6卷第310页和第287页)

(3)党是无产阶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党是工人阶级的有组织的部队。可是,党并不是工人阶级的唯一组织。无产阶级还有其他许多为顺利地进行反对资本的斗争所绝对必需的组织,如工会、

这里所说的“伙伴”指阿克雪里罗得、马尔托夫、波特列索夫等人,他们不服从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而责备列宁犯了“官僚主义”的毛病。——约·斯大林注

参看《列宁全集》第7卷第386页和第356页。——编者注

合作社、工厂组织、议会党团、非党妇女团体、出版机关、文化教育组织、青年团、革命战斗组织(在公开的革命发动时期)以及作为国家组织形式的代表苏维埃(当无产阶级执掌政权时)等等。这些组织极大多数都是非党的,其中只有某一部分直接接近党或者是党的支脉。所有这些组织,在某种条件下都是工人阶级所绝对必需的,因为如果没有这些组织,就不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各种斗争中的阶级阵地;因为如果没有这些组织,就不能锻炼无产阶级这个负有以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产阶级制度的使命的力量。可是,既然有这样的组织,怎样实现统一的领导呢?怎样才能保证在领导工作中不致因为有很多组织而发生各自为政的现象呢?有人会说,这些组织各在自己的特别范围内进行工作,因此不会互相妨碍。这当然是对的。可是还有一点也是对的,即所有这些组织都应当按照一个方向进行工作,因为它们都是为一个阶级,即为无产者阶级服务的。试问:谁来决定这一切组织在进行工作时所必须遵循的路线,即总方向呢?哪里有这样一个中央组织,它不仅因为有丰富的经验而能制定这条总路线,并且因为有充分的威信而能推动这一切组织去实现这条路线,以达到领导上的统一,排除发生不协调现象的可能呢?

这样的组织就是无产阶级的党。

党具备为此所必需的一切条件,第一,因为党是工人阶级优秀分子的集合点,这些分子和无产阶级的非党组织有直接联系,并经常领导它们;第二,因为党既是工人阶级优秀分子的集合点,所以它是培养能够领导本阶级各种组织的工人阶级领导者的最好的学校;第三,因为党既是培养工人阶级领导者的最好的学校,所以按其经验和威信来说,它是能把无产阶级斗争的领导集中起来的唯一组织,因而也就是能把工人阶级所有一切非党组织都变成使党

同本阶级联结起来的服务机关和引带的唯一组织。

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

这当然不是说,非党组织,如工会、合作社等等,应该正式服从党的领导。这只是说,参加这些组织的党员,这些无疑是有威信的人,应该采取一切说服办法,使这些非党组织在自己的工作中跟无产阶级政党接近,并自愿接受这个党的政治领导。

正因为如此,列宁说:党是“无产者的阶级联合的最高形式”,它的政治领导应当普及到无产阶级的其他各种组织中去。(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5卷第194页)

正因为如此,主张非党组织“独立”和“中立”的机会主义理论,繁殖出独立的议员和脱离党的出版家、狭隘的工会活动家和市侩化的合作社运动者的机会主义理论,是和列宁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完全不能相容的。

(4)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党是无产者阶级内部和无产者阶级各个组织中的主要的领导基础。可是由此决不能得出结论说,可以把党看做目的本身,看做独立自主的力量。党不仅是无产者的阶级联合的最高形式,而且又是无产阶级手中用来争得专政(当无产阶级还没有争得专政时)、用来巩固并扩大专政(当无产阶级已经争得专政时)的工具。如果政权问题没有摆在无产阶级的面前,如果帝国主义的条件、战争的不可避免以及危机的存在没有要求把无产阶级的一切力量集中到一点,把革命运动的一切线索集中在一个地方,以便推翻资产阶级而争得无产阶级专政,那么党的作用就不能提得这样高,党就不能超过无产阶级的其他一切组织。无产阶级所以需要党,首先因为党

是无产阶级顺利夺取政权所必需的战斗司令部。几乎用不着证明，如果没有一个能够把无产阶级的群众组织集合在自己的周围、在斗争进程中把整个运动的领导都集中起来的党，那么俄国无产阶级就不能实现自己的革命专政。

可是，无产阶级所以需要党，不仅是为了争得专政，而且更是为了保持专政，为了巩固专政并扩大专政，以求取得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

列宁说：“现在差不多每个人都已看到，如果我们党没有极严格的真正铁的纪律，如果我们党没有得到整个工人阶级全心全意的拥护，就是说，没有得到工人阶级中所有一切善于思考、诚实、有自我牺牲精神、有威信并且能带领或吸引落后阶层的人的全心全意的拥护，那么布尔什维克别说把政权保持两年半，就是两个半月也保持不住。”（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5卷第173页）

可是，“保持”和“扩大”专政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要向千百万无产者群众灌注纪律性和组织性；这就是说，要在无产者群众中间造成能够防御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和小资产阶级习惯势力的腐蚀影响的屏障和堡垒；这就是说，要加强无产者在重新教育和改造小资产阶级方面的组织工作；这就是说，要帮助无产者群众把自己教育成为能够消灭阶级并准备条件来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力量。可是，如果没有一个因为本身具有团结性和纪律性而强有力的党，要做到这一切是不可能的。

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没有铁一般的和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为本阶级全体忠实的人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

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5卷第190页)

无产阶级所以需要党,就是为了争得和保持专政。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由此应该得出结论:随着阶级的消灭,随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消亡,党也一定会消亡。

(5)党是意志的统一,是和派别组织的存在不相容的。如果没有一个因为本身具有团结性和铁的纪律而强有力的党,要争得和保持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能的。可是,如果没有意志的统一,如果没有全体党员行动上的完全的和绝对的统一,党内铁的纪律是不可思议的。这当然不是说,因此就排斥了党内争论的可能。恰恰相反,铁的纪律不是排斥党内的批评和争论,而是以此为前提的。这更不是说,纪律应当是“盲目的”。恰恰相反,铁的纪律不是排斥自觉自愿的服从,而是以此为前提的,因为只有自觉的纪律才能成为真正铁的纪律。可是,在争论已经结束,批评已经完结,决议已经通过以后,全体党员意志的统一和行动的统一就是一个必要条件,没有这个条件,无论是统一的党还是党内铁的纪律,都是不可设想的。

列宁说:“在目前激烈的国内战争时代,共产党必须按照高度集中的方式组织起来,在党内实行象军事纪律那样的铁的纪律,党的中央必须拥有广泛的权力,得到全体党员的普遍信任,成为一个有权威的机构。只有这样,党才能履行自己的义务。”(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5卷第282—283页)

在争得专政以前的斗争条件下党内纪律的问题就是这样。

关于争得专政以后的党内纪律也应该这样说,而且更应该这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200页。——编者注
同上,第312页。——编者注

样说。

列宁说：“谁要是把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哪怕是稍微削弱一点（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那他事实上就是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5卷第190页）

由此应该得出结论：派别组织的存在，无论和党内统一或党内铁的纪律都不能相容。几乎用不着证明，有派别组织就会产生几个中央；有几个中央就是表明党内没有共同的中央，就是分散统一的意志，就是削弱和破坏纪律，就是削弱和破坏专政。第二国际各党既然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不愿意引导无产者去夺取政权，当然可以容许自己有派别组织自由这种自由主义，因为它们根本就不需要铁的纪律。可是，共产国际各党既然把争得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作为自己工作的基础，就不能容许“自由主义”，也不能容许派别组织自由。

党是意志的统一，是排斥任何派别活动和党内权力分散现象的。

因此，列宁“从保持党的统一和实现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意志的统一是保证无产阶级专政胜利的基本条件这一观点出发”来说明“派别活动的……危险性”，这个说明已经载入我们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⁸⁵《关于党的统一》的专门决议中。

因此，列宁要求“彻底消灭一切派别活动”并“立即毫无例外地解散一切按某种纲领组成的派别”，否则就给以“立即无条件地开除出党”的处分。（见《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

（6）党是靠清洗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而巩固起来的。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201页。——编者注

参看《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64页和第65页。——编者注

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是党内派别活动的来源。无产阶级并不是一个和外界隔绝的阶级。农民、小市民、知识分子出身的那些因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无产阶级化的人不断地流入无产阶级的队伍。同时,无产阶级上层分子又正在腐化,他们多半是资产阶级利用从殖民地得来的超额利润所豢养的工会活动家和议员。列宁说:“这个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阶层即‘工人贵族’阶层,这个按生活方式、工资数额和整个世界观说来已经完全市侩化了的工人阶层,是第二国际的主要支柱,现在则是资产阶级的主要社会支柱(不是军事支柱)。因为这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真正代理人,是资本家阶级的工人帮办……是改良主义和沙文主义的真正传播者。”(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19卷第77页)

所有这些小资产阶级集团用种种方法钻进党内,把动摇和机会主义的情绪,把腐化和犹疑的情绪带到党内来。他们是派别活动和瓦解现象的主要来源,是涣散党和从内部破坏党的现象的主要来源。后方有这样的“同盟者”而去和帝国主义作战,就会受到两面夹攻,陷于腹背受敌的境地。因此,对这种分子进行无情的斗争,把他们驱逐出党,是顺利进行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先决条件。

主张用党内思想斗争的方法来“战胜”机会主义分子的理论,主张在一个党的范围内来“消除”机会主义分子的理论,是一种腐朽而危险的理论,它有使党麻痹和害慢性病的危险,有使党被机会主义宰割的危险,有使无产阶级丧失革命政党的危险,有使无产阶级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丧失主要武器的危险。如果我们党在自己的队伍里有马尔托夫之流和唐恩之流、波特列索夫之流和阿克雪里罗得之流,那么我们党就不能走上大道,就不能取得政权和组织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在国内战争中获得胜利。如果说我们党

已经建立了自己内部的统一和自己队伍的空前的团结,那么这首先是因为它及时清洗了机会主义的肮脏东西,从党内驱逐了取消派和孟什维克。无产阶级政党发展和巩固的道路就是把机会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社会帝国主义者和沙文主义者、社会爱国主义者和社会和平主义者从党内清洗出去的道路。

党是靠清洗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而巩固起来的。

列宁说:“在自己的队伍里有改良主义者,有孟什维克,就不能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取得胜利,就不能捍卫住无产阶级革命。这在原则上是很明显的。这是已经由俄国和匈牙利的经验具体证实了的。……在俄国……曾经有很多次处于困难的境地,当时如果让孟什维克、改良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留在我们党内……那么苏维埃制度就一定会被推翻的。大家都承认,意大利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为了争夺国家政权,就要进行决战……在这样的时候,不仅把孟什维克、改良主义者、屠拉梯分子驱逐出党是绝对必要的,甚至把那些会动摇和正在动摇的、要去同改良主义者‘统一’的优秀的共产党员从各个重要岗位上撤下来,也可以说是有益的。……在革命的前夜和为争取革命的胜利而进行最激烈的斗争的时候,党内的最小的动摇都能葬送一切,都能破坏革命,都能使无产阶级丧失政权,因为这个政权还没有巩固,因为对这个政权的攻击还非常猛烈。如果动摇的领袖在这样的时候离开,那么这不会削弱而会加强党,加强工人运动,加强革命。”(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5卷第462、463、464页)

九 工 作 作 风

这里所指的不是文风。我指的是工作作风,是列宁主义实践中

见《列宁全集》第31卷第345、346、347页。——编者注

能够造就特种类型的列宁主义工作者的那种特殊和独特的要素。列宁主义是理论的和实践的学校,它能培养特种类型的党的工作者和国家工作者,造成特殊的列宁主义的工作作风。

这种作风的特征是什么呢?它的特点是怎样的呢?

它的特点有两个:

(一)俄国人的革命胆略;

(二)美国人的求实精神。

列宁主义的作风就是党的工作和国家工作中的这两个特点的结合。

俄国人的革命胆略是消除因循习惯、守旧思想、保守主义、思想停滞以及对古老传统的盲从态度的药剂。俄国人的革命胆略是一种振奋人心的力量,它能激发思想,推动前进,破坏旧事物,开辟前途。没有这种革命胆略,就一步也不能前进。

可是,如果不把俄国人的革命胆略和美国人在工作中的求实精神结合起来,那么它在实践中就很可能堕落为空洞的“革命的”马尼洛夫精神。这种堕落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谁不知道“革命的”臆造和“革命的”设计这种病症的根源就是相信法令能安排一切和改造一切呢?有一位俄国作家伊·爱伦堡在他的《共产主义的完人》这篇小说中描写过一个患有这种病症的“布尔什维克”的典型,说他立意拟定一个理想的完人的模式……结果竟在这个“工作”中“淹死了”。这篇小说虽然有过于夸大的地方,它正确地抓住了这种病症却是毫无疑问的。可是,谁都没有象列宁那样苛刻无情地讥笑过患有这种病症的人。他把这种迷信臆造和发号施令的病症鄙视为“共产党员的骄傲自大”。

列宁说:“所谓共产党员的骄傲自大,就是说,一个置身于共产党内而还没有被清洗出去的人,以为用共产党员的名义发号施令,就能完成他的一切

任务。”(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7卷第50—51页)

列宁通常总是用日常平凡的事情来和这种“革命的”高调相对立,以此着重指出:“革命的”臆造是和真正列宁主义的精神与字句绝对相反的。

列宁说:“少说些漂亮话,多做些日常平凡的事情……”

“少唱些政治高调,多注意些极平凡的但是生动的……共产主义建设事实……”(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4卷第343页和第335页)

相反地,美国人的求实精神却是消除“革命的”马尼洛夫精神和虚幻的臆造的药剂。美国人的求实精神是一种不可遏止的力量,它不知道而且不承认有什么阻碍,它以自己的求实的坚忍精神排除所有一切障碍,它一定要把已经开始的事情进行到底,哪怕这是一件不大的事情,没有这种力量,就不可能有认真的建设工作。

可是,如果不把美国人的求实精神和俄国人的革命胆略结合起来,那么它就很可能堕落为狭隘的无原则的事务主义。谁不知道狭隘的实际主义和无原则的事务主义的病症往往使某些“布尔什维克”蜕化而脱离革命事业呢?波·皮尔尼亚克的《荒凉年份》这篇小说反映过这种特殊的病症,描写过某些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典型,说他们充满了意志和实践的决心,“干得”很“起劲”,可是看不见前途,不知道“干工作是为了什么”,因而离开了革命工作的道路。谁都没有象列宁那样辛辣地讥笑过这种事务主义的病症。列宁把这种病症鄙视为“狭隘的实际主义”;“无头脑的事务主义”。他通常总是用生动的革命事业和我们全部日常工作中所必须具有的革命前途来和这种病症相对立,从而着重指出:无原则的事务主

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59页。——编者注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17页和第8页。——编者注

义,也同“革命的”臆造一样,是和真正的列宁主义绝对相反的。

俄国人的革命胆略和美国人的求实精神结合起来,就是党的工作和国家工作中的列宁主义的实质。

只有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我们才能有完整的列宁主义工作者的典型,列宁主义的工作作风。

载于 1924 年 4 月 26、30 日
和 5 月 9、11、14、15、18 日
《真理报》第 96、97、103、
105、107、108、111 号

选自《斯大林全集》第 6 卷
第 62—165 页

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

(《走向十月革命的道路》一书序言⁸⁶)

—

十月革命的内外环境

有三个外部情况使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能够比较容易地打断了帝国主义链条,从而推翻了资产阶级政权。

第一个情况:十月革命是在两个主要帝国主义集团,即英法集团和德奥集团进行殊死斗争的时期开始的,当时这两个集团忙于决死斗争,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物力来认真注意扑灭十月革命。这个情况对于十月革命有巨大的意义,因为它使十月革命能够利用帝国主义内部的激烈冲突来巩固和组织自己的力量。

第二个情况:十月革命是在帝国主义战争进行中开始的,当时受战争极度折磨而渴望和平的劳动群众被事物的逻辑引到无产阶级革命这条摆脱战争的唯一出路。这个情况对于十月革命有极重大的意义,因为它使十月革命掌握了强有力的和平工具,使十月革命易于把苏维埃革命和结束可恨的战争联结起来,因而使十月革命在西方工人和东方被压迫民族中间获得广大的同情。

第三个情况:在欧洲有雄伟的工人运动,在西方和东方有长期的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日益成熟的革命危机。这个情况对于俄

国革命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因为它保证了俄国革命在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有可靠的国外同盟者。

可是,除了外部情况,十月革命还有许多使它易于获得胜利的内部有利条件。

其中主要的条件如下:

第一,十月革命受到俄国工人阶级绝大多数人的最积极的拥护。

第二,它受到渴望和平与土地的贫苦农民和大多数士兵的最可靠的拥护。

第三,它有布尔什维克党这样一个久经考验的政党为统帅,为领导力量,而这个政党所以有力量,不仅因为它有经验和多年来形成的纪律,而且因为它和劳动群众有密切的联系。

第四,十月革命遇到的是这样一些比较容易战胜的敌人,如较为软弱的俄国资产阶级、被农民“骚动”弄得颓丧不堪的地主阶级、在战争进程中完全破产的妥协政党(孟什维克党和社会革命党⁵⁹)。

第五,它拥有新国家的广大地域,它在这个地域内能够自由回旋,能够在环境要求退却时实行退却,能够暂时休息,能够集结力量等等。

第六,十月革命在反对反革命的斗争中能够指望得到国内充足的粮食、燃料和原料。

这些内外情况配合起来,就造成一种特殊环境,使十月革命比较容易地获得胜利。

这当然不是说,十月革命在内外环境方面没有不利的条件。例如十月革命处于相当孤独的地位,它旁边和邻近没有一个可以依靠的苏维埃国家,这个不利条件有多重大的意义呢?毫无疑问,例

如德国未来的革命在这方面就会处于比较有利的状况,因为它邻近有我们苏联这样一个实力强大的苏维埃国家。至于无产阶级在国内不占多数,这个对十月革命不利的条件我就不谈了。

可是,这些不利条件只是使十月革命上述内外特殊条件的巨大意义更加明显了。

一分钟也不可以忘记这些特殊条件。在分析 1923 年秋季的德国事变⁷⁰时,特别应当记住这些特殊条件。托洛茨基首先应当记住这些特殊条件,因为他竟笼统地把十月革命跟德国革命类比,并放肆地痛斥德国共产党的真正的和虚构的错误。

列宁说:“俄国在 1917 年那种非常独特的具体历史形势下,开始社会主义革命是容易的,而要把革命继续下去,把革命进行到底,却比欧洲各国困难。我还在 1918 年年初就已经指出了这个情况,在这以后的两年来的经验也完全证实了这种论断是正确的。俄国当时的特殊条件是:(1)有可能把苏维埃革命同结束(通过苏维埃革命)使工农痛苦万分的帝国主义战争联结起来;(2)有可能在一定时期内利用全世界两个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强盗集团之间的生死斗争,当时这两个集团不能联合起来反对苏维埃这个敌人;(3)有可能坚持比较长期的国内战争,其中原因之一是俄国幅员广大和交通不便;(4)当时在农民当中掀起了非常深刻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无产阶级政党就采纳了农民政党(即社会革命党,他们多数党员是激烈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的革命要求,并且由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立即实现了这些要求。这些特殊条件,目前在西欧是没有的,而且重新出现这样的或类似的条件也不是很容易的。除开其他一些原因以外,这也是西欧开始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比我国困难的一个原因。”(见《列宁全集》俄文第 3 版第 25 卷第 205 页)

列宁的这些话是不可以忘记的。

二

论十月革命的两个特点 ,或十月革命
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

十月革命有两个特点。要了解十月革命的内容和历史意义 ,首先必须认清这两个特点。

这是些什么特点呢 ?

第一 ,在我国诞生的无产阶级专政 ,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群众联盟为基础的政权。第二 ,在我国确立的无产阶级专政 ,是社会主义在一个资本主义不大发达的国家里获得胜利的结果 ,而在其他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仍然保存着资本主义。这当然不是说十月革命没有其他特点。可是 ,现在对于我们重要的正是这两个特点 ,这不仅因为它们清楚地表现出十月革命的实质 ,而且因为它们十分明显地揭露了“不断革命”论的机会主义本性。

我们来简略地研究一下这两个特点。

关于城乡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的问题 ,关于把这些群众争取到无产阶级方面来的问题 ,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最重要的问题。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 ,城乡劳动人民支持谁 ,支持资产阶级还是支持无产阶级 ,城乡劳动人民成为谁的后备军 ,成为资产阶级的后备军还是成为无产阶级的后备军 ,——革命的命运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都取决于这一点。法国 1848 年革命和 1871 年革命所以失败 ,主要是因为农民后备军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十月革命所以胜利 ,是因

为它从资产阶级那里夺得了农民后备军,它把这个后备军争取到无产阶级方面来,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成了城乡千百万劳动人民的唯一领导力量。

谁不了解这一点,谁就永远不了解十月革命的性质、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我国无产阶级政权对内政策的特点。

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老练的战略家”用心地“巧妙地”挑选出来”并“合理地依靠”某些居民阶层的普通政府的上层机关。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群众在以无产阶级为领导力量的条件下,为推翻资本和取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而结成的阶级联盟。

所以,这里所说的不是对农民运动的革命能力“稍微”估计不足或“稍微”估计过高,象某些耍外交手腕的“不断革命”论者现在爱说的那样。这里所说的是十月革命胜利后产生的新的无产阶级国家的本质。这里所说的是无产阶级政权的性质,是无产阶级专政本身的基础。

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是劳动者的先锋队——无产阶级同人数众多的非无产阶级的劳动阶层(小资产阶级、小业主、农民、知识分子等等)或同他们的大多数结成的特种形式的阶级联盟,是反资本的联盟,是为彻底推翻资本、彻底镇压资产阶级反抗并完全粉碎其复辟企图而成立的联盟,是为最终建立并巩固社会主义而成立的联盟。”(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4卷第311页)

其次:

“如果我们把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历史学的、哲学的、科学的拉丁名词译成普通话,那就是说:

在推翻资本压迫的斗争中,在推翻这种压迫的过程中,在保持和巩固胜利的斗争中,在建设新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的事业中,在完全消灭阶级的全部斗争中,只有一个阶级,即城市的和一般工厂的工人,即产业工人,才能领导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4卷第336页)

列宁所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就是这样。

十月革命的特点之一在于这个革命是实现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典范。

有些同志以为这个理论只是和俄罗斯实际情形有关的纯粹“俄国的”理论。这是不对的。这是完全不对的。列宁说到无产阶级所领导的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时,指的不仅是俄罗斯农民,而且是苏联境内那些不久以前还是俄国殖民地的边疆地区的劳动分子。列宁始终不倦地一再说,俄国无产阶级不和其他民族的这些群众结成联盟就不能获得胜利。列宁在他论述民族问题的文章中以及在共产国际各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中再三说过,没有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和被奴役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间的革命联盟,革命同盟,世界革命是不可能胜利的。而殖民地岂不就是被压迫的劳动群众,首先就是劳动农民群众吗?谁不知道,殖民地解放问题实质上就是非无产者阶级劳动群众摆脱金融资本的压迫和剥削的问题呢?

由此应当得出结论: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并不是纯粹“俄国的”理论,而是世界各国必须采用的理论。布尔什维主义不只是俄国的现象。列宁说:“布尔什维主义”是“可供各国效法的策略模范”。(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3卷第386页)

十月革命第一个特点的特征就是这样。

从十月革命的这个特点来看,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是怎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10页。——编者注

同上,第3卷第678页。——编者注

么一回事呢？

我们不来多讲托洛茨基在 1905 年的立场,当时他“简直”忘掉了农民是革命力量,提出了“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的口号,即不要农民参加革命的口号。现在,甚至拉狄克这位爱耍外交手腕的“不断革命”论者也不得不承认,“不断革命”在 1905 年是离开现实而“向空一跃”。现在,看来大家都认为不值得再理会这个“向空一跃”了。

我们也不来多讲托洛茨基在战争时期的立场,例如在 1915 年的立场,当时他在他的《为政权而斗争》一文中,根据“我们生活在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不是把资产阶级民族和旧制度对立起来,而是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族对立起来”这一点,作出结论说农民的革命作用一定会减少,没收土地的口号已经没有它从前所有的那种意义。大家知道,列宁在评论托洛茨基的这篇文章时,责备托洛茨基“否定”“农民的作用”,说“托洛茨基事实上是在帮俄国自由主义工人政治家们的忙,他们认识到‘否定’农民的作用就是不愿意发动农民去革命!”(见《列宁全集》俄文第 3 版第 18 卷第 318 页)

我们最好来看看托洛茨基关于这个问题的较晚的著作,看看他在无产阶级专政已经确立,他已经有可能根据事实来检查他的“不断革命”论并改正他的错误的时期内所发表的著作。就拿托洛茨基在 1922 年为《一九二五年》一书所写的《序言》来看吧。托洛茨基在这篇《序言》中关于“不断革命”是这样说的：

“正是在 1905 年一月九日事变到十月罢工这个期间,本书作者对于俄国革命发展的性质形成了获得‘不断革命’论名称的那些观点。这个奇妙的名称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直接摆在俄国革命面前的虽然是资产阶级的目的,可

是它不能停留在这些目的上面。除非使无产阶级执掌政权,革命就不能解决它当前的资产阶级任务。而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又不能以革命的资产阶级范围来限制自己。恰恰相反,无产阶级先锋队正是为了保证自己的胜利,还在它统治的初期,就不仅要最深刻地侵犯封建所有制,而且要最深刻地侵犯资产阶级所有制。在这种情形下,它不仅会和那些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初期支持过它的一切资产阶级集团发生敌对的冲突,而且会和那些协助过它取得政权的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落后国家内,工人政府所处地位的矛盾,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即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求得解决。”

托洛茨基关于他的“不断革命”就是这样说的。

只要把这段引文和上面从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著作中引出的几段话对照一下,就会看出横在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之间的鸿沟了。

列宁说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阶层的联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而托洛茨基却说“无产阶级先锋队”会和“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

列宁说无产阶级领导被剥削的劳动群众。而托洛茨基却说“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落后国家内,工人政府所处地位有矛盾”。

列宁认为革命首先要从俄国本国的工人和农民中间汲取力量。而托洛茨基却认为只有“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汲取必要的力量。

如果国际革命竟来迟了,那又怎么办呢?我国革命有没有什么光明的前途呢?托洛茨基认为没有任何光明的前途,因为“……工人政府所处地位的矛盾,只有……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

能求得解决”。按照这个计划看来,我国革命只有一个前途:在本身所有各种矛盾中苟延残喘,在等待世界革命中连根腐烂。

在列宁看来,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呢?

无产阶级专政是依靠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群众的联盟来“彻底推翻资本”和“最终建立并巩固社会主义”的政权。

在托洛茨基看来,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呢?

无产阶级专政是和“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而只有“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设法解决“矛盾”的政权。

这个“不断革命论”和否定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著名的孟什维主义理论有什么区别呢?

实质上是毫无区别的。

这是不容置疑的。“不断革命论”并不是对农民运动的革命能力的一种简单的估计不足。“不断革命论”是一种会导向否定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对农民运动的估计不足。

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是孟什维主义的变种。

十月革命的第一个特点就是这样的。

十月革命的第二个特点的特征怎样呢?

列宁在研究帝国主义特别是战争时期的帝国主义时,发现了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和政治不平衡发展、跳跃式发展的规律。按照这个规律的含义说来,各个企业、各个托拉斯、各个工业部门、各个国家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不是按照既定的次序,不是一个托拉斯、一个工业部门或一个国家始终走在前面,其他托拉斯或其他国家依次跟在后面,而是跳跃式的,即一些国家的发展停顿,另一些国家在发展中却跳到前面去了。同时,落在后面的国家“完全合乎情理地”力图保持旧阵地,而超越到前面的国家也同样“合乎情理地”力图夺取新阵地,结果就使帝国主义国家的军事冲突成为不可避免

的必然的事情。例如德国的情形就是这样,在半世纪以前,德国同英法比较起来还是一个落后的国家。日本当时同俄国比较起来也是这样。可是大家知道,在二十世纪初,德国和日本已经跳跃很远,德国超过了法国,并开始在世界市场上排挤英国,日本超过了俄国。大家知道,不久以前的帝国主义战争就是从这些矛盾中产生的。

这个规律的出发点是：

(1)“资本主义已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世界上大多数居民实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制的世界体系。”(见列宁《帝国主义》法文版序言,《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19卷第74页)

(2)“瓜分这种‘赃物’的是两三个世界上最强大的从头到脚武装的强盗(美、英、日),他们把全世界卷入他们为瓜分自己的赃物而进行的战争。”(同上)

(3)金融压迫的世界体系内部的矛盾的增长和军事冲突的必然性使帝国主义世界战线容易被革命攻破,使这条战线很可能被个别国家突破。

(4)这种突破最可能发生在帝国主义战线的链条最薄弱的地方和国家,即在帝国主义防卫最差而革命最容易展开的地方和国家。

(5)因此,在其他国家(即使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比较发达)还保存着资本主义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即使这个国家的资本主义不大发达)内胜利是完全可能的,是可以肯定的。

简单说来,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基础就是这样。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733页。——编者注
同上,第733—734页。——编者注

十月革命的第二个特点何在呢？

十月革命的第二个特点在于这个革命是实际运用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模范。

谁不了解十月革命的这个特点,谁就永远不了解这个革命的国际性质,这个革命的雄伟的国际力量,这个革命的独特对外政策。

列宁说：“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既然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就会起来反对其余的资本主义的世界,把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这些国家中掀起反对资本家的起义,必要时甚至用武力去反对剥削阶级及其国家。”因为“没有各社会主义共和国对各落后国家的相当长期的顽强斗争,便不能实现各民族在社会主义中的自由联合”。(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18卷第232—233页)

各国机会主义者断言,无产阶级革命只能在工业发达的国家开始(如果按照他们的理论,无产阶级革命毕竟会在什么地方开始的话);这些国家的工业愈发达,社会主义胜利的机会就愈多。在他们看来,在一个国家内,何况是在资本主义不大发达的一个国家内,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完全不合乎情理的,是绝对不可能的。还在战争期间,列宁就依据帝国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提出他的关于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即使这个国家的资本主义不大发达)内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来驳斥机会主义者。

大家知道,十月革命完全证实了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是正确的。

从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理论来看,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是怎么回事呢?

就拿托洛茨基的小册子《我们的革命》(1906年)来看吧。

托洛茨基写道:

“没有欧洲无产阶级直接的国家援助,俄国工人阶级就不能保持政权,就不能把自己暂时的统治变成长期的社会主义专政。这是一分钟也不能怀疑的。”

这一段话说明什么呢?说明“没有欧洲无产阶级直接的国家援助”,就是说,在欧洲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前,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这里说的是在俄国)内胜利是不可能的。

这个“理论”和列宁的社会主义可能“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胜利的论点有什么共同之点呢?

很明显,这里没有任何共同之点。

假定说,因为托洛茨基的这本小册子是在1906年出版的,当时还难于确定我们的革命的性质,所以其中含有一些无意的错误,而不完全符合托洛茨基较晚时期的观点。那么我们就拿托洛茨基的另一本小册子,他的《和平纲领》来看吧。这本小册子是在1917年十月革命前夜出版的,现在(1924年)编入《一九一七年》一书再版了。托洛茨基在这本小册子里批评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并拿欧洲联邦口号来和它对立。他断言: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是不可能的;社会主义胜利只能是欧洲几个联合为欧洲联邦的主要国家(英、俄、德)的胜利,否则社会主义胜利是完全不可能的。他直截了当地说:“德国不发生革命,俄国或英国就不能有胜利的革命,反过来说也是一样。”

托洛茨基说:“为反对联邦口号而提出的唯一的多少是具体的历史性的理由,曾由在瑞士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报》⁸⁷当时布尔什维克的中央机关

报。——约·斯大林注 归结为下面的一句话：“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社会民主党人报》由此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因而每一个别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无须以建立欧洲联邦为其先决条件。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这是完全无可争辩的意见。可是，这个不平衡本身又是非常不平衡的。英国、奥国、德国或法国的资本主义水平是不一样的。可是，跟非洲和亚洲比较起来，所有这些国家都是已经成熟到实现社会革命的资本主义“欧洲”了。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当在自己的斗争中“等待”其他国家，这是一个浅显的道理，为使国际间同时行动的思想不致为国际间消极等待的思想所代替，把这个道理反复加以说明是有益的，而且是必要的。我们不等待其他国家而在本国的基础上开始斗争并继续下去，深信我们的倡导会推动其他各国的斗争；假如事实并不如此，就休想革命的俄国能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得住脚，或社会主义的德国能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孑然独存，这是历史上的经验和理论上的推论都证明了的。”

可见在我们面前的还是那个社会主义在欧洲主要国家内同时胜利的理论，这个理论通常是排斥列宁的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革命论的。

不用说，为了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为了有免除旧制度恢复的完全保障，必须有几国无产者的共同努力。不用说，没有欧洲无产阶级对我国革命的援助，俄国无产阶级就抵挡不住总进攻；同样，没有俄国革命对西方革命运动的援助，西方革命运动就不能象它在俄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后那样迅速地发展。不用说，我们是需要援助的。但什么是西欧无产阶级对我国革命的援助呢？欧洲工人对我国革命的同情，他们破坏帝国主义者武装干涉计划的决心，——这是不是援助，是不是很大的帮助呢？当然是很大的帮助。没有这种不仅来自欧洲工人，而且还来自殖民地国家和附属国的帮助，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处于困难的境地。到现在为止，这种同情和这种帮助，再加上我们红军的实力和俄国工农挺身保卫社

会主义祖国的决心，——这一切是不是足够击退帝国主义的进攻，取得必要的环境来进行真正的建设工作呢？是足够的。这种同情是在增强还是在减弱呢？无疑是在增强。这样，我们有没有有利条件来不仅推进组织社会主义经济的工作，并且援助西欧工人和东方被压迫民族呢？是有的。俄国无产阶级专政七年的历史明显地说明了这一点。能不能否认我国已经开始了雄伟的劳动高潮呢？不，不能否认。

既然如此，托洛茨基所谓革命的俄国不能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得住脚的说法能有什么意义呢？

只能有一个意义：第一，托洛茨基没有感觉到我国革命的内部力量；第二，托洛茨基不了解西方工人和东方农民给予我国革命的精神援助的不可估量的意义；第三，托洛茨基没有觉察到现在腐蚀着帝国主义的那种内部虚弱症。

托洛茨基热中于批评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在他的 1917 年出版、1924 年再版的小册子《和平纲领》中却不知不觉地把自己彻底击溃了。

也许托洛茨基的这本小册子也陈旧了，也由于某种原因而不再符合他现在的观点了吧？那么我们就拿托洛茨基在无产阶级革命在一个国家内即在俄国胜利以后所写的最近的著作来看吧。例如，我们就拿托洛茨基在 1922 年给他的小册子《和平纲领》新版所写的《跋》来看吧。他在这篇《跋》中写道：

“在《和平纲领》中一再重复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不能在一国范围内胜利完成的论断，在某些读者看来也许已被我们苏维埃共和国将近五年的经验推翻了。但这样的结论是没有根据的。工人的国家在一国而且是在落后的一国抗住了全世界，这个事实证明无产阶级有雄伟的力量，这种力量在其他比较先进比较文明的国家里是真能做出奇迹来的。可是，我们虽然在政治上和军

事上保持为一个国家,但是我们并没有达到甚至还没有走近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阶段……当其余的欧洲国家还是资产阶级掌握着政权的时候,我们为了打破经济孤立的局面,不得不设法和资本主义世界达成协议;同时可以确信地说:这种协议至多只能帮助我们治愈某些经济创伤,获得某些进展,可是俄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只有无产阶级在欧洲几个最重要的国家内获得胜利以后,才会是可能的。”

托洛茨基这样说,显然是违背实际情况,顽固地想把“不断革命论”从完全破产中挽救出来。

原来,不管怎样辩解,也是不仅“没有达到”甚至还“没有走近”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阶段。原来有人曾希望“和资本主义世界达成协议”,但是这些协议原来也不会有丝毫结果,因为不管怎样辩解,只要无产阶级还没有“在欧洲几个最重要的国家内”获得胜利;“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是不会有有的。

那么,既然西方还没有胜利,俄国革命也就只能“二者取其一”:或者连根腐烂,或者蜕化为资产阶级国家。

无怪乎托洛茨基说我们党“蜕化”已经说了两年。

无怪乎托洛茨基在去年预言我们国家定会“灭亡”。

这个奇怪的“理论”怎能和列宁的“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理论相容呢?

这个奇怪的“前途”怎能和列宁所说的新经济政策使我们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的前途相容呢?

这种“不断的”失掉希望的思想怎能和列宁的下面一段话相容呢?

列宁说:“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是一个遥远将来,或是什么抽象幻景,或是什么神像的问题了。我们对神像依然保持着非常不好的旧有的看法。我们

把社会主义拖进日常生活中了,我们应当弄清这一点。这就是我们当前的任务,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让我在结束讲话时表示一个信念:不管这个任务是多么困难,不管它和我们从前的任务比起来是多么生疏,不管它会给我们带来多少困难,只要我们大家同心协力,不是在明天,而是在几年以内,我们大家同心协力无论如何会解决这个任务,这样,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7卷第366页)

托洛茨基的这种前途“不断”黯淡的思想怎能和列宁的下面一段话相容呢?

列宁说:“的确,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最小农结成联盟,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已有保证等等,难道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难道这不是我们通过合作社,而且仅仅通过合作社,通过我们从前鄙视为买卖机关,并且现时在新经济政策下我们从某一方面也有理由加以鄙视的合作社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吗?这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这已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7卷第392页)

很明显,这里没有而且不可能有任何相容的地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是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否定;反过来说,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是“不断革命”论的否定。

不相信我国革命有力量和有本领,不相信俄国无产阶级有力量和有本领,——这就是“不断革命”论的根源。

直到现在,通常都只指出“不断革命”论的一方面——不相信农民运动具有革命能力。现在为了公允起见,除这一方面以外还须补充以另一方面——不相信俄国无产阶级有力量和有本领。

托洛茨基的理论同孟什维主义的没有无产阶级革命“在西欧

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400—401页。——编者注

参看《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682页。——编者注

几个主要国家内”预先胜利,社会主义在一国而且还是在落后的一国内就不可能胜利这个普通的理论有什么区别呢?

实质上是毫无区别的。

这是不容置疑的。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是孟什维主义的变种。

近来在我们的刊物上出现了一些腐败的外交家,他们力图偷运“不断革命”论,说它是和列宁主义相容的东西。他们说,这个理论在1905年当然是不适用的。可是,托洛茨基的错误在于他当时跑得太远,企图在1905年的环境里运用当时不能运用的理论。他们说,可是后来,例如在1917年10月,当革命已经完全成熟的时候,托洛茨基的理论就完全适用了。不难猜到,这些外交家中最主要的是拉狄克。不妨听听他的话:

“战争在渴望争得土地与和平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政党之间掘了一道深沟,战争把农民交给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了。可能实现的已经不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的专政,而是依靠农民的工人阶级的专政。罗莎·卢森堡和托洛茨基在1905年提出来反对列宁的那个主张,即“不断革命”。——约·斯大林注,事实上成了历史发展的第二个阶段。”

这里每字每句都是颠倒是非。

在战争时期“可能实现的已经不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的专政,而是依靠农民的工人阶级的专政”,这话不对。实际上,1917年的二月革命所实现的是按特殊方式同资产阶级专政交织在一起的工人阶级和农民的专政。

拉狄克不好意思提到的“不断革命”论是罗莎·卢森堡和托洛茨基在1905年提出的,这话不对。实际上,这个理论是帕尔乌斯和托洛茨基提出的。现在,过了十个月,拉狄克来自行更正,认为应当骂帕尔乌斯提出“不断革命论”。可是要做到公道,拉狄克应当也把

帕尔乌斯的同伴托洛茨基骂一顿。

被 1905 年的革命屏弃了的“不断革命论”在“历史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即在十月革命时期是正确的,这话不对。十月革命的全部进程,十月革命的整个发展,表明并证明“不断革命”论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是和列宁主义基础完全不相容的。

用甜蜜的话和腐败的外交手腕是掩盖不了“不断革命”论和列宁主义之间的鸿沟的。

三

关于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 准备时期的策略的几个特点

要了解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准备时期的策略,至少必须弄清楚这个策略的几个特别重要的特点。所以必须这样,尤其是因为在许多论述布尔什维克策略的小册子中往往正是把这些特点忽略了。

这是些什么特点呢?

第一个特点。听了托洛茨基的话,会以为在十月革命准备史中只有两个时期,即侦察时期和起义时期,除此以外,都是鬼话。1917 年的四月游行示威⁸⁸是什么呢?“比预定‘更左的’四月游行示威,是检验群众的情绪和群众与苏维埃内大多数人的相互关系的一次侦察性攻击。”而 1917 年的七月游行示威⁸⁹是什么呢?按照托洛茨基的说法,“实质上这一次游行示威也不过是在运动的新的更高阶段上的一次新的规模更大的侦察”。不用说,依照我们党的要求举

行的 1917 年的六月游行示威⁹⁰ ,在托洛茨基看来 ,更应当称为“ 侦察 ”了。

这样说来 ,布尔什维克还在 1917 年 3 月就有了由工农组成的现成的政治军队 ,布尔什维克在 4 月、6 月、7 月都没有调用这支军队举行起义 ,而只进行了“ 侦察 ”,这是因为而且只是因为当时的“ 侦察情报 ”没有提供有利的“ 材料 ”。

不用说 ,这种对我们党的政治策略的简单化的看法无非是把通常的军事战术和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策略混为一谈罢了。

实际上 ,所有这些游行示威首先是群众自发施加压力的结果 ,是群众激于反战义愤而涌现街头的结果。

实际上 ,当时党的作用在于给予自发产生的群众发动以一定形式并加以领导 ,使之按照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口号进行。

实际上 ,布尔什维克在 1917 年 3 月没有而且不可能有现成的政治军队。布尔什维克只是在 1917 年 4 月至 10 月间的斗争和阶级冲突进程中才建立这支军队(到 1917 年 10 月终于建立了这支军队) ,它是通过四月游行示威、通过六月游行示威和七月游行示威、通过区杜马和市杜马的选举、通过反科尔尼洛夫叛乱⁷⁹ 的斗争、通过对苏维埃的争夺来建立这支军队的。政治军队不是军事军队。军事指挥部在开始作战时就已经拥有现成的军队 ,而党却要在斗争进程中 ,在阶级冲突进程中 ,在群众根据亲身经验相信党的口号正确 ,相信党的政策正确的时候建立自己的军队。

当然 ,每一次这样的游行示威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眼睛看不见的力量对比 ,在一定程度上起侦察作用 ,但是侦察在这里不是游行示威的动机 ,而是游行示威的自然结果。

列宁分析十月起义前的事变并拿这些事变和 4 月至 7 月间的事变比较时说道 :

“这时的情形恰巧跟 4 月 20—21 日前夜、6 月 9 日前夜、7 月 3 日前夜的情形不同,因为当时所发生的是自发激动,而这种激动是我们党没有察觉到的(如 4 月 20 日),或者是加以制止而使它形成为和平游行示威的(如 6 月 9 日和 7 月 3 日)。因为当时我们清楚地知道,苏维埃还不是我们的,农民还相信李伯尔唐恩和切尔诺夫的道路,而不相信布尔什维克的道路(起义),所以大多数人民决不会跟着我们走,所以起义还为时过早。”(见《列宁全集》俄文第 3 版第 21 卷第 345 页)

很明显,单靠“侦察”是做不出大事的。

问题显然不在于“侦察”,而在于:

(1)党在十月革命整个准备时期的斗争中始终依靠群众革命运动的自发高涨;

(2)党依靠自发高涨,同时保持了自己对运动的独掌领导;

(3)对运动的这种领导使党易于编组群众政治军队去举行十月起义;

(4)这样的政策不能不使十月革命的全部准备工作在一个党即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进行;

(5)十月革命的这种准备工作又使政权在十月起义胜利后落到一个党即布尔什维克党的手里。

总之,一个党即共产党的独掌领导是十月革命准备工作的基本要素,——这就是十月革命的特征,这就是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准备时期的策略的第一个特点。

未必用得着证明,没有布尔什维克策略的这个特点,无产阶级专政在帝国主义环境中的胜利就会是不可能的。

这就是十月革命优于法国 1871 年革命的地方。法国 1871 年革命的领导由两个党分担,而其中哪一个党也不能称为共产党。

第二个特点。这样,十月革命的准备工作是在一个党即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可是,党是怎样进行这种领导的,这种领导是循着什么路线进行的呢?这种领导是循着使妥协政党——在革命总爆发时期内最危险的集团陷于孤立的路线,即循着使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陷于孤立的路线进行的。

列宁主义的基本战略原则是什么呢?

这个原则是承认:

(1)在革命即将总爆发的时期,妥协政党是革命敌人的最危险的社会支柱;

(2)不使这些党陷于孤立,就不能推翻敌人(沙皇制度或资产阶级);

(3)因此,革命准备时期的主要锋芒应当指向使这些党陷于孤立,使广大劳动群众离开它们。

在反对沙皇制度的时期,在准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期(1905—1916年),自由君主派即立宪民主党是沙皇制度的最危险的社会支柱。为什么呢?因为立宪民主党是妥协政党,是主张大多数人民即全体农民和沙皇制度妥协的党。自然,党在当时把主要打击指向立宪民主党人,因为不使立宪民主党人陷于孤立,就不能指望农民和沙皇制度决裂,而不保证有这种决裂,就不能指望革命胜利。许多人当时不了解布尔什维克战略的这一特点,而责备布尔什维克过分“仇恨立宪民主党人”,断言布尔什维克以反对立宪民主党人的斗争“遮掩了”反对主要敌人即沙皇制度的斗争。可是,这些毫无根据的责备暴露出他们根本不了解布尔什维克的战略,不了解这个战略要求使妥协政党陷于孤立,是为了促进并加速对主要敌人的胜利。

未必用得着证明,没有这样的战略,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就会是不可能的。

在十月革命准备时期,各种斗争势力的重心移到新的方面来了。沙皇不存在了。立宪民主党由妥协势力变成当权势力,变成帝国主义的统治势力了。斗争已经不是在沙皇制度和人民之间进行,而是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进行了。在这个时期,小资产阶级民主政党即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是帝国主义的最危险的社会支柱。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党在当时是妥协政党,是主张劳动群众和帝国主义妥协的党。自然,布尔什维克的主要打击当时指向了这些党,因为不使这些党陷于孤立,就不能指望劳动群众和帝国主义决裂,而不保证有这种决裂,就不能指望苏维埃革命胜利。许多人当时不了解布尔什维克策略的这一特点,而责备布尔什维克“过分憎恨”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责备布尔什维克“忘记了”主要目标。可是,十月革命整个准备时期雄辩地说明,布尔什维克只有采用这样的策略,才得以保证十月革命的胜利。

这个时期的特征是劳动农民群众更加革命化,他们对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失望,他们离开这些党,他们转而直接团结在无产阶级这一能把国家导向和平的唯一彻底的革命力量的周围。这个时期的历史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同布尔什维克争夺劳动农民群众,争取掌握这些群众的历史。联合政府时期,克伦斯基统治时期,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拒绝没收地主土地,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争取继续作战,前线六月进攻,士兵死刑,科尔尼洛夫叛乱,——这些事实决定了这场斗争的命运。而这些事实是以证实布尔什维克战略的正确来决定这个命运的。因为当时不使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陷于孤立,就不能推翻帝国主义者政府,不推翻这个政府,就不能摆脱战争。使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陷于孤立的政策原来是唯一正确的政策。

总之,使孟什维克党和社会革命党陷于孤立是十月革命准备工作的基本领导路线,——这就是布尔什维克策略的第二个特点。

未必用得着证明,没有布尔什维克策略的这个特点,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群众的联盟就会悬在空中。

值得注意的是,托洛茨基在他的《十月的教训》中一点也没有说到,或者几乎一点也没有说到布尔什维克策略的这个特点。

第三个特点。这样,党对十月革命准备工作的领导是循着使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陷于孤立的路线,循着使广大工农群众离开这些党的路线进行的。可是,党是怎样具体实现了这种孤立,以什么形式,在什么口号下实现了这种孤立的呢?这种孤立是以争取建立苏维埃政权的群众革命运动的形式,在“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下,通过把苏维埃由动员群众的机关变为起义的机关、变为政权机关、变为新的无产阶级国家机构的斗争来实现的。

为什么布尔什维克正是抓住苏维埃作为能够促使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陷于孤立、能够推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并负有把千百万劳动群众引导到无产阶级专政胜利的使命的基本组织杠杆呢?

苏维埃是什么呢?

列宁还在 1917 年 9 月就说过:“苏维埃是新型的国家机构,第一,它保证有工农武装力量,并且这个武装力量不是象过去的常备军那样同人民隔离,而是同人民极密切地联系着的;在军事方面,这个武装力量比从前的军队强大得不可比拟;在革命方面,它是无可替代的。第二,这个机构保证同群众,同大多数人民有极其密切的、不可分离的、容易检查和更新的联系,这样的联系从前的国家机构是根本没有的。第三,这个机构的成员不是经过官僚手续而是依民意选出和更换的,所以它比从前的机构民主得多。第四,它保证同各种各样的行业有紧密的联系,所以它能够不要官僚而使各种各样的极深刻的改良容易实行。第五,它保证有先锋队即被压迫工农阶级中最觉悟、最有力、最先进的部分的组织形式,所以它是被压迫阶级的先锋队能够用来发动、教育、训练和领导这些阶级全体广大群众的机构,而这些群众向来都是完全处在政治生活以外,处在历史以外的。第六,它保证能够把议会制的长处和直接民主

制的长处结合起来,就是说,把立法的职能和执行法律的职能在选出的人民代表身上结合起来。同资产阶级议会制比较起来,这是在民主发展过程中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一大进步。……

假如革命阶级的人民创造力没有建立起苏维埃,那么无产阶级革命在俄国就是没有希望的事情,因为毫无疑问,无产阶级决不能利用旧的机构来保持政权,而新的机构也不可能一下子就建立起来。”(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1卷第258—259页)

正因为如此,布尔什维克就抓住苏维埃作为便于组织十月革命和建立无产阶级国家的新的强大机构的基本组织环节。

“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这个口号从它的内部发展方面来看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在布尔什维克的七月失败以前,在两个政权并存时期)和第二个阶段(在科尔尼洛夫叛乱失败以后)。

在第一个阶段,这个口号意味着使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同立宪民主党人的联盟破裂,由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组织苏维埃政府(因为当时苏维埃是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的),使在野党(即布尔什维克)有自由鼓动权,使各政党在苏维埃内可以自由斗争,预期布尔什维克能够按革命和平发展的方式通过这种斗争来夺取苏维埃并改变苏维埃政府的成分。这个计划当然还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但是它无疑有助于准备保证专政所必需的条件,因为它既然使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执掌政权,迫使他们实施他们的反革命政纲,就更快地揭露了这些党的真正本质,使它们更快地陷于孤立,使它们更快地脱离群众。可是,布尔什维克的七月失败中断了这个发展过程,使反革命势力(将军-立宪民主党)占了优势,把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抛入反革命势力的怀抱。这个情况使党不得不暂时收回“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这个口号,等到革命再度高涨时再把它提出来。

科尔尼洛夫叛乱的失败是第二个阶段的开始。“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这个口号重新提到日程上来了。但是现在这个口号已经跟第一个阶段不同了。它的内容根本改变了。现在这个口号意味着和帝国主义完全决裂并使政权转归布尔什维克，因为大多数苏维埃已经是布尔什维克的了。现在这个口号意味着革命经过起义直接进到无产阶级专政。而且，现在这个口号意味着组织无产阶级专政并使无产阶级专政具有国家形式。

把苏维埃变为国家政权机关这一策略的不可估量的意义在于它使千百万劳动群众摆脱帝国主义，揭露孟什维克党和社会革命党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并把千百万劳动群众直接引向无产阶级专政。

总之，把苏维埃变为国家政权机关这一政策是使妥协政党陷于孤立而使无产阶级专政获得胜利的最重要的条件，——这就是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准备时期的策略的第三个特点。

第四个特点。如果我们不说明布尔什维克怎样和为什么能把自己的党的口号变成了千百万群众的推进革命的口号，布尔什维克怎样和为什么不仅能使先锋队 and 大多数工人确信党的政策正确，而且能使大多数人民确信党的政策正确，那么情况就不全面了。

问题在于：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如果这个革命是有千百万群众参加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单只党的口号正确是不够的。要取得革命的胜利，还必须有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就是使群众根据亲身经验确信这些口号的正确。只有这样，党的口号才会成为群众自己的口号。只有这样，革命才会成为真正的人民革命。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准备时期的策略的特点之一在于它能够正确地确定道路和转折点，这样就自然而然把群众引到党的口号下，可以说是引到革命的门口，从而使群众易于根据亲身经验感到、察知并认清这些口

号的正确。换句话说,布尔什维克的策略的特点之一在于它不把对党的领导和对群众的领导混为一谈,它清楚地看见第一种领导和第二种领导之间的差别,因而它不仅是领导党的科学,而且是领导千百万劳动群众的科学。

召开和解散立宪会议⁵⁵的经验是表现出布尔什维克策略的这个特点的明显例子。

大家知道,布尔什维克还在1917年4月就提出了苏维埃共和国这一口号。大家知道,立宪会议是根本和苏维埃共和国基础相矛盾的资产阶级议会。布尔什维克向着苏维埃共和国前进,同时又要要求临时政府立刻召开立宪会议,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布尔什维克不仅参加选举,而且自己召开立宪会议,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在举行起义前一个月,在由旧制度向新制度过渡时,布尔什维克竟认为苏维埃共和国可以和立宪会议暂时配合,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

“发生”这种事情是因为:

(1)立宪会议思想是当时在广大民众中间最得人心的思想之一;

(2)立刻召开立宪会议的口号易于揭露临时政府的反革命本性;

(3)要使立宪会议思想在人民群众心目中威信扫地,就必须引导这些群众带着他们对土地、和平和苏维埃政权的要求走到立宪会议门前,使他们和实际存在的立宪会议接触;

(4)只有这样才能使群众易于根据亲身经验确信立宪会议的反革命性和把它解散的必要性;

(5)这一切自然就预定了苏维埃共和国和立宪会议暂时配合是可以容许的,因为这是消除立宪会议的手段之一;

(6)这种配合如果是在全部政权转归苏维埃的条件下实现的,

那就只能使立宪会议服从苏维埃,使立宪会议变为苏维埃的附属品,使立宪会议无能为害地消亡。

未必用得着证明,没有布尔什维克的这种政策,立宪会议的解散就不会进行得那样顺利,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后来在“全部政权归立宪会议!”这个口号下的发动就不会遭到那样可耻的破产。

列宁说:“1917年9—11月间,我们参加了俄国资产阶级议会,即立宪会议的选举。我们当时的策略是否正确呢?……我们俄国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9—11月间,岂不是比西方任何一国的共产党人都更有理由认为议会制度在俄国在政治上已经过时了吗?当然是这样,因为问题不在于资产阶级议会存在得久不久,而在于广大劳动群众对于采用苏维埃制度、解散(或容许解散)资产阶级民主议会的准备(思想上、政治上、实践上),达到了什么程度。1917年9—11月间,由于种种特殊条件,俄国城市工人阶级、士兵和农民对于采用苏维埃制度和解散最民主的资产阶级议会已经有了非常充分的准备,这是丝毫不容争辩的、完全确定了的历史事实。虽然如此,布尔什维克还是没有抵制立宪会议,而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和以后都参加了立宪会议的选举。”(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5卷第201—202页)

为什么布尔什维克没有抵制立宪会议呢?列宁说,这是因为:

“甚至在苏维埃共和国胜利以前几个星期,甚至在胜利以后,参加资产阶级民主议会,不仅对革命无产阶级没有害处,反而会使它易于向落后群众证明为什么这种议会应该解散,易于把这种议会解散,易于促使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在政治上过时’。”(同上)

值得注意的是,托洛茨基不了解布尔什维克策略的这个特点,把立宪会议和苏维埃配合的“理论”看做希法亭主义⁹¹而嗤之以

参看《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214页和第215页。——编者注
同上,第215页。——编者注

鼻。

他不了解,在提出起义口号和苏维埃可能胜利的条件下容许这种配合而召开立宪会议是唯一革命的策略,它同把苏维埃变成立宪会议附属品的希法亭主义策略毫无共同之点;某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所犯的错误并不能使他有理由指责列宁和党主张在一定条件下成立“联合的国家机构”这一完全正确的立场。(参看《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1卷第338页)

他不了解,布尔什维克如果没有对立宪会议采取这种特殊政策,就不能把千百万人民群众争取到自己方面来,而布尔什维克如果没有把千百万人民群众争取过来,就不能把十月起义变为深入的人民革命。

有趣的是,托洛茨基甚至对那些在布尔什维克的文章中出现的“人民”、“革命民主派”等等字眼也嗤之以鼻,认为使用这些字眼是有伤马克思主义者的体面的。

托洛茨基显然忘记了,列宁这位不容置疑的马克思主义者甚至在1917年9月即在无产阶级专政胜利前一个月还写道:“必须使全部政权立即转归革命无产阶级所领导的革命民主派掌握。”(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1卷第198页)

托洛茨基显然忘记了,列宁这位不容置疑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引证马克思给库格曼的一封谈到摧毁官僚军事国家机构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的有名的信(写于1871年4月)时,清清楚楚地写过下面一段话:

“马克思说破坏官僚军事国家机器是‘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这个非常深刻的见解是值得特别注意的。‘人民’革命这一概念出自马

参看《列宁全集》第26卷第180页。——编者注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281页。——编者注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2—393页。——编者注

克思的口中似乎是很奇怪的,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分子和孟什维克,这些愿意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命的司徒卢威信徒,也许会说马克思是‘失言’。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做了非常贫乏的自由主义的歪曲:在他们看来,除了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对立以外,再没有任何东西,而且他们对这种对立的了解也是非常死板的。……

1871年,欧洲大陆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都没有占人民的大多数。当时只有把无产阶级和农民都包括进来的革命,才能成为真正把大多数吸引到了运动中的‘人民’革命。当时的‘人民’就是由这两个阶级构成的。这两个阶级因为都受‘官僚军事国家机器’的压迫、摧残和剥削而联合起来。打碎这个机器,摧毁这个机器,——这就是‘人民’,人民的大多数,即工人和大多数农民的真正利益,这就是贫苦农民同无产者自由联盟的‘先决条件’,而没有这个联盟,民主就不稳固,社会主义改造就没有可能。”(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1卷第395—396页)

列宁的这些话是不可以忘记的。

总之,善于用引导群众走上革命立场的方法使群众根据亲身经验确信党的口号的正确,这是把千百万劳动者争取到党的方面来的最重要的条件,——这就是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准备时期的策略的第四个特点。

我认为上面所说的完全足以使人认清这个策略的特征了。

四

十月革命是世界革命的开端和前提

毫无疑问,革命在欧洲主要国家内同时胜利的万能理论,社会

主义不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理论,是编造的没有生命力的理论。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七年的历史不是证实了这个理论,而是推翻了这个理论。这个理论不仅不可采用来作为世界革命发展的方案,因为它和有目共睹的事实抵触。它尤其不可采用来作为口号,因为它不是限制那些由于一定的历史条件而有可能独立突破资本战线的个别国家的主动性;因为它不是推动个别国家积极进攻资本,而是推动个别国家消极等待“总解决”的时机;因为它不是在个别国家的无产者中间培养坚决革命的精神,而是培养“万一别人不来援助”这种哈姆莱特⁹²式的怀疑心理。列宁说得十分正确,无产阶级在一国内胜利是“典型的情况”;“几国同时发生革命”只能是“罕有的例外”。(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3卷第354页)

可是,大家知道,列宁的革命论并不仅仅限于这一方面。它同时还是世界革命发展论。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不是独立自主的任务。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革命不应当把自己看做独立自主的东西,而应当看做用以加速世界各国无产阶级胜利的助力和工具。因为革命在一个国家(这里说的是在俄国)内胜利不仅是帝国主义不平衡发展和日益崩溃的产物,而且是世界革命的开端和前提。

毫无疑问,世界革命的发展道路已不象从前革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以前,发达的帝国主义即“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出现以前所能想象的那样简单了。因为出现了在发达的帝国主义条件下发生作用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这样一个新因素,这个规律说明军事冲突不可避免,世界资本战线全线削弱,社会主义可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639—640页。——编者注

见《论列宁主义基础》。——约·斯大林注

能在个别国家内胜利。因为出现了处在西方和东方之间,处在世界金融剥削中心和殖民地压迫舞台之间的强大的苏维埃国家这样一个新因素,单是这个国家的存在就能使全世界革命化。

所有这些都是研究世界革命道路时不能不估计到的因素(其他次要的因素我就不谈了)。

从前人们通常认为革命将经过社会主义成分首先在那些最发达的“先进”国家内平衡“成熟”的道路发展起来。现在这个见解要大加改变了。

列宁说:“国际关系体系现在已成为这样:欧洲的一个国家受着各战胜国的奴役,这个国家就是德国。其次,西欧的一些国家,而且是一些最老的国家,因获得胜利而能够利用胜利向本国被压迫阶级作一些不大的让步,这些让步毕竟在推迟这些国家的革命运动,造成某种类似‘社会和平’的局面。”

“同时东方许多国家,如印度、中国等等,正是由于最近这次帝国主义战争的影响而完全被抛出了自己的常轨。这些国家的发展已完全按照一般欧洲式资本主义的标准进行。在这些国家里开始了一般欧洲式的波动。现在全世界的人都清楚,这些国家已经卷入了不能不引起整个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发展漩涡。”

因此,“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社会主义……不会是象我们从前所期待的那样完成的。它们这一种发展的过程,不会是经过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里平衡‘成熟’,而会是经过一些国家对另一些国家进行剥削,经过对帝国主义战争中第一个战败国家进行剥削,再加上对整个东方进行剥削的道路来完成的。另一方面,正是由于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的影响,东方已经最终加入了革命运动,最终卷入了全世界革命运动的总漩涡”(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7卷第415—416页)。

除此以外,不仅战败国和殖民地受战胜国的剥削,而且一部分战胜国也落入美国和英国这两个最强大的战胜国的金融剥削的罗网中;所有这些国家之间的矛盾是世界帝国主义解体的一个最重

要的因素 ;除这些矛盾以外 ,这些国家中每一个国家内部还有一些极深刻的矛盾 ,而且这些矛盾正在发展 ;所有这些矛盾又由于伟大的苏维埃共和国同这些国家并存而日益加深和尖锐化 ,—— 如果注意到这一切 ,那就可以比较全面地看到国际形势的特点了。

最可能的是 ,世界革命将经过许多新国家的无产者在帝国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援助下用革命手段使这些国家脱离帝国主义国家体系的道路发展起来。我们看见 ,第一个脱离出来的国家 ,第一个获得了胜利的国家 ,已经取得其他国家的工人和劳动群众的援助。没有这种援助 ,它就不能支持住。毫无疑问 ,这种援助将会增强和发展起来。同样毫无疑问 ,第一个获得胜利的国家内的社会主义巩固得愈彻底 ,这个国家变成进一步扩展世界革命的基地 ,变成进一步瓦解帝国主义的杠杆愈迅速 ,世界革命的发展 ,许多新国家脱离帝国主义体系的过程就进行得愈迅速 ,愈彻底。

没有几国无产者的共同努力 ,第一个获得解放的国家内的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就不可能 ,这个论点是对的 ;同样 ,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给予其余各国工人和劳动群众的帮助愈切实 ,世界革命的发展就愈迅速愈彻底 ,这个论点也是对的。

这种帮助应当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

第一 ,这种帮助应当表现在获得胜利的国家“ 尽力做到在一个国家内所能做到的一切 ,以便发展、援助和激起世界各国的革命 ” (见《列宁全集》俄文第 3 版第 23 卷第 385 页)。

第二 ,这种帮助应当表现在一个国家内“ 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既然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 ,就……起来反对其余的资本主义的世界 ,把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 ,在这些国家中掀起反对资本家的起义 ,必要时甚至用武力

去反对剥削阶级及其国家”(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18卷第232—233页)。

获得胜利的国家所给予的这种帮助的特点不仅在于它加速其他国家无产者的胜利,而且还在于它以促进这个胜利来保证社会主义在第一个获得胜利的国家内的最终胜利。

最可能的是,在世界革命的发展进程中,与个别资本主义国家的帝国主义策源地和这些国家的全世界体系并列,会出现个别苏维埃国家的社会主义策源地和这些策源地的全世界体系,而这两个体系间的斗争将充满世界革命发展的历史。

列宁说:因为“没有各社会主义共和国对各落后国家的相当长期的顽强斗争,便不能实现各民族在社会主义中的自由联合”(同上)。

十月革命的世界意义不仅在于它是一个国家在冲破帝国主义体系这一事业中的伟大创举,它是帝国主义国家汪洋大海中的第一个社会主义策源地,而且还在于它是世界革命的第一阶段,它是世界革命进一步发展的强大基地。

因此,不仅那些忘掉了十月革命的国际性质,说革命在一国内胜利纯粹是一国的而且仅仅是一国的现象的人是不对的,而且那些虽然记得十月革命的国际性质,但是竟把这个革命看做一种只应接受外援的被动现象的人也是不对的。实际上,不仅十月革命需要其他国家革命的援助,而且其他国家革命也需要十月革命的援助,以便加速和推进推翻世界帝国主义的事业。

1924年12月17日

发表于1925年国家出版社
出版的斯大林《走向十月革
命的道路》一书

选自《斯大林全集》第6卷
第310—348页

关于德国共产党的前途和 布尔什维克化

(和德国共产党党员赫尔措格的谈话)

第一个问题(赫尔措格):你是否认为德意志资本主义民主共和国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必然促使工人阶级在比较不久的将来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

答(斯大林):如果讲的是期限而不是趋向,那么要极其肯定地回答这个问题是困难的。用不着证明,不论从国际条件或从国内条件来看,目前的局势和1923年的局势⁷⁰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可是,这并不是说,在最近时期内局势不会因外部环境可能发生重大变化而产生有利于革命的急剧转变。国际形势的不稳定就是这种设想很可能成为事实的保证。

第二个问题:从目前的经济状况和力量对比来看,我们是否需要一个比较长的准备时期来争取无产阶级多数(列宁曾向各国共产党提出过这个要求,他认为这是夺取政权前极重要的任务)?

答:既然讲的是经济状况,那我只能根据我所掌握的一般材料来估计问题。我认为道威斯计划⁹³已经产生了一些效果,使局势趋于相对稳定。美国资本的投入德国工业,货币的稳定,德国一些最重要的工业部门的改善(以上三点决不意味着德国经济的根本好转),以及工人阶级物质生活状况的某些改善,——这一切都不能不使德国资产阶级的阵地得到一定的巩固。这可以说是道威斯计

划的“好的”一面。

但是道威斯计划还有“坏的”一面,这一面不可避免地要在一定的时期表现出来,而且一定会破坏这个计划的“好的”效果。毫无疑问,道威斯计划使德国无产阶级受到国内资本和国外资本的双重压榨。德国工业的扩大和它的国外市场范围的缩小之间的矛盾,协约国的过分要求和德国国民经济满足这些要求的最大可能之间的不相适应,——这一切必然使无产阶级、小农、职员和知识分子的境遇恶化,因而也就不能不引起革命爆发,促使无产阶级直接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

但是,不能把这种情况看成德国革命的唯一有利条件。为了使这个革命取得胜利,还必须使共产党能够代表工人阶级多数,使它成为工人阶级内部的决定性力量。必须揭露和粉碎社会民主党,使它降到只占工人阶级的极少数的地位。不然就休想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为了使工人能够获得胜利,必须用统一的意志去鼓舞他们,必须由一个得到工人阶级多数真正信任的党去领导他们。如果工人阶级内部有两个力量相等而彼此竞争的党,那么,即使存在着有利的外部条件,也不可能取得巩固的胜利。列宁是十月革命以前第一个特别坚持这一点的人,他认为这是无产阶级胜利最必需的条件。

可以认为对革命最有利的形势是下面这种形势:一方面德国内部发生危机和共产党的力量大大地增长,另一方面在德国外敌的阵营中发生严重的纠纷。

我认为,1923年的革命时期因为不具备上述形势的第二个方面,所以造成了相当不利的影晌。

第三个问题:你说德国共产党必须使多数工人跟自己走。至今大家还很少注意这个目标。在你看来,怎样才能使德国共产党成为

这样一个具有不断增长征召力的生气勃勃的党呢？

答：有些同志认为巩固党和使党布尔什维克化就是把一切抱有不同思想的人驱逐出党。这当然是不对的。只有在为工人阶级的具体需要进行日常斗争的进程中，才能揭穿社会民主党，使它降到只占工人阶级极少数的地位。揭露社会民主党的罪恶，不应当依靠世界性的大问题，而应当依靠工人阶级为改善自己的物质状况和政治地位而进行的日常斗争；同时工资问题、工作日问题、居住条件问题、保险问题、税收问题、失业问题以及生活费用昂贵问题等等即使不起决定性的作用，也应该起极重大的作用。每天都要在这些问题上打击社会民主党人，揭露他们的背叛行为，——任务就是这样。

但是，如果不把日常的实际问题和关于德国国内外状况的一些根本问题联系起来，如果在党的全部工作中不从革命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观点出发来阐明这一切日常工作，那就不能完全实现这个任务。

而要实行这样的政策，只有经验丰富和理论修养很高的领导干部所领导的党才有可能，因为这些干部的经验足以使他们利用社会民主党的种种失算来加强自己的党，同时他们的理论修养足以使他们不致因个别胜利而看不见革命的发展前途。

这主要也就说明了所有共产党（其中包括德国共产党）的领导干部问题是实现布尔什维克化的根本问题之一。

要实现布尔什维克化，至少必须具备若干基本条件，没有这些条件，各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根本是不可能的。

（1）必须使党不把自己看成议会选举机构的附属品，象社会民主党在实际上把自己看成的那样；必须使党不把自己看成工会的不用付出代价的附属品，象某些无政府工团主义分子有时反过来复

去所说的那样 ;而必须使党把自己看成无产阶级的阶级联合的最高形式 ,它负有使命领导无产阶级组织其他一切形式的无产阶级组织——从工会到议会党团。

(2)必须使党特别是党的领导者完全精通与革命实践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

(3)必须使党在制定口号和指令的时候 ,不是根据背熟的公式和历史的比拟 ,而是根据对革命运动所处的国内外的具体条件的仔细分析 ,同时还必须考虑到各国的革命经验。

(4)必须使党在群众的革命斗争的烈火中检查这些口号和指令的正确性。

(5)必须按照新的革命的方式来改组党的全部工作 ,特别是当社会民主党的传统在党内还没有清除的时候。这样 ,党的每个步骤和每个行动就能自然而然地使群众革命化 ,使工人阶级的广大群众受到革命的训练和教育。

(6)必须使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善于把最高的原则性(不能和宗派主义混为一谈 !)和与群众最广泛的联系及接触(不能和尾巴主义混为一谈 !)结合起来。不然 ,党不但不能教导群众 ,而且也不可能向群众学习 ;不但不能引导群众并把他们提高到党的水平 ,而且也不可能倾听群众的呼声和预料到他们的迫切需要。

(7)必须使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善于把毫不妥协的革命性(不能和革命的冒险主义混为一谈 !)和最大限度的灵活性及随机应变的本领(不能和迁就行为混为一谈 !)结合起来。不然 ,党就不可能掌握各种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 ,不可能把无产阶级的日常利益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利益联系起来 ,也不可能在自己的工作中把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配合起来。

(8)必须使党不掩饰自己的错误 ,使它不怕批评 ,使它善于用

自己的错误来提高和教育自己的干部。

(9)必须使党善于把先进战士中的优秀分子选拔到基本的领导集团中去。因为这些先进战士十分忠诚,足以成为革命无产阶级的意向的真正表达者;他们有丰富的经验,足以成为能运用列宁主义的策略和战略的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

(10)必须使党经常地改善自己组织的社会成分,清除那些腐化的机会主义分子,以便达到最大限度的团结一致。

(11)必须使党制定无产阶级的铁的纪律。这种纪律的基础是思想的一致性、运动目的明确性、实际行动的统一和广大党员群众对待党的任务的自觉态度。

(12)必须使党经常检查自己的决定和指令的执行情况。不然,这些决定和指令就有变成空洞的诺言的危险,而空洞的诺言只能破坏广大无产阶级群众对党的信任。

没有诸如此类的条件,实行布尔什维克化就是空谈。

第四个问题:你说,除了道威斯计划的坏的一面以外,德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第二个条件是:社会民主党在群众面前被彻底揭露并且不再成为工人阶级中比较重要的力量。从实际情况来看,要达到这一点还有很远的路程。这里明显地反映出党目前的工作方法上有缺点和弱点。怎样才能消除这些缺点和弱点呢?在1924年12月的选举中,社会民主党——完全是一个腐化堕落的党——不但没有失去什么,而且获得了将近两百万张选票,你对这次选举的结果如何估计?

答:这里问题不在于德国共产党工作上有缺点。这里问题首先在于:美国的借款,美国资本的输入加上货币的稳定使得状况有些好转,因而就造成一种错觉,认为和德国状况有关的国内外矛盾似乎有可能根本消除。德国社会民主党也就是借着这种错觉,象骑在

白马上那样⁹⁴进入了现今的国会。现在韦尔斯正炫耀自己在选举中的胜利。但是,他大概不了解他占有了别人的胜利。胜利的不是德国社会民主党,而是摩根集团。韦尔斯过去和现在都只是摩根的一个代理人。

载于 1925 年 2 月 3 日
《真理报》第 27 号

选自《斯大林全集》第 7 卷
第 32—37 页

庆祝国际妇女节

在人类历史上,被压迫者的任何一次伟大的运动都少不了劳动妇女的参加。劳动妇女,一切被压迫者中最受压迫的劳动妇女,从来没有而且也不会站在解放运动大道的旁边。大家知道,在奴隶解放运动中涌现出了成千上万个伟大的女烈士和女英雄。在争取农奴解放的战士行列中有过千千万万的劳动妇女。无怪乎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被压迫群众的一切解放运动中最强大的运动,把千百万劳动妇女吸引到了自己的旗帜下面。

国际妇女节是工人阶级解放运动不可战胜的标志和伟大的未来的先声。

劳动妇女,女工和农妇,是工人阶级最大的一支后备力量。这支后备力量足足占全体居民的半数。妇女这支后备力量是拥护工人阶级还是反对工人阶级,——决定着无产阶级运动的命运,决定着无产阶级革命的胜败,决定着无产阶级政权的胜败。因此,无产阶级及其先进部队共产党的第一项任务就是:为把妇女——女工和农妇——从资产阶级的影响下解放出来而进行坚决的斗争,为在无产阶级旗帜下对女工和农妇进行政治教育并把她们组织起来而进行坚决的斗争。

国际妇女节是把劳动妇女这支后备力量争取到无产阶级方面来的一种手段。

但是,劳动妇女不只是一支后备力量。只要工人阶级的政策正

确,她们能够而且应当成为工人阶级用来反对资产阶级的一支真正军队。从劳动妇女这支后备力量中训练出一支能够同无产阶级大军并肩作战的女工和农妇的军队,——这就是工人阶级的第二项有决定意义的任务。

国际妇女节应当成为一种把女工和农妇从工人阶级的后备力量变成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作战军队的手段。

国际妇女节万岁!

约·斯大林

载于 1925 年 3 月 8 日
《真理报》第 56 号

选自《斯大林全集》第 7 卷
第 43—44 页

致苏联无产阶级大学生 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⁹⁵

(信)

同志们：你们的代表要我谈谈党的任务和党在无产阶级大学生中间的工作任务。

让我同你们简单地谈谈这方面的问题。

目前形势的特点，就是我国的无产阶级已经为自己创造了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所必需的环境。如果认为在一个战胜了并且驱逐了资本家和地主的国家里不能建设社会主义，那是不正确的。在一个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拥有丰富的资源并且受到全世界无产者支持的国家里，是能够而且必须建设社会主义的。列宁说得对：我国有“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切条件。现时的特点，就是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已经把社会主义由神像变成日常实际工作的实在的目标了。

无产阶级大学生在这个建设工作中的作用应当是怎样的呢？

他们的作用无疑是重要的，——如果不是头等重要的话。高等学校，共产主义大学⁹⁶，工人进修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这都是培养经济工作和文化工作的指挥人员的学校。医学家和经济学家，合作社工作者和教育家，采矿工程师和统计学家，技师和化学家，农业工作者和铁道工程师，兽医和林业工作者，电气技师和机械师，——这都是建设新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文化

的未来的指挥人员。没有新的指挥人员就不能建设新社会,正象没有新的指挥人员就不能建立新的军队一样。新的指挥人员的优点,就在于他们进行建设的使命不是为了剥削劳动者以满足一小撮富人的私利,而是为了解放劳动者,反对一小撮剥削者。全部问题在于:要使高等学校学生——工人大学生和农民大学生,党员大学生和非党员大学生——了解自己的这个光荣的作用,并且自觉地忠实地履行这一使命。

因此,要竭力使无产阶级大学生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文化的自觉的建设者,——这就是党的第一个任务。

但是,如果没有劳动群众的直接支持,单靠指挥人员的力量是不能建设新社会的。新的指挥人员所具有的知识还不足以建成社会主义。为此还必须有劳动群众对这些指挥人员的信任和支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从事建设的旧的指挥人员的特点,就是他们脱离工人和农民,他们把自己置于劳动群众之上,既不重视劳动群众的信任,也不重视劳动群众的支持,因而也就得不到信任,得不到支持。这种方法对我们国家是完全不合适的。建设新经济和新文化的新的指挥人员之所以叫做新的,正是因为他们应当断然地坚决地和旧的发号施令的方法断绝关系。不脱离群众,而最紧密地联系群众;不把自己置于群众之上,而走在群众前面,引导群众前进;不远离群众,而和群众打成一片,争取群众对自己的信任和支持,——这就是新的指挥人员管理业务的新方法。不采取这些方法,任何社会主义建设都是不能想象的。

因此,要竭力使无产阶级大学生把自己看做劳动群众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竭力使大学生感觉到自己是社会活动家,并且在行动上表现出自己是真正的社会活动家,——这就是党的第二个任务。

最后,专门谈一谈共产党员大学生的问题。据说共产党员大学生在科学方面的成就不大。据说他们在这方面大大落后于非党员。据说共产党员大学生宁愿研究“高深的政治”,花费三分之二的时间去漫无止境地讨论“世界问题”。这一切是不是事实呢?我想是事实。既然是事实,那么至少应当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共产党员大学生有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拙劣领导者的危险,因为不掌握科学是不能领导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的。第二,培养新的指挥人员的事业有被那些需要由新的人才来接替的旧教授所垄断的危险,因为在不愿意或不善于掌握科学的人们中间,是培养不出新的接班人和新的科学研究员的。不用说,这一切不能不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个事业造成直接的威胁。这种情况能不能容忍呢?显然不能。因此,共产党员大学生和全体苏维埃大学生应当明确而肯定地给自己提出如下的当前任务:掌握科学,从新的苏维埃人中间造就新的接班人来接替旧教授。我决不是说大学生不应当研究政治。决不是这样。我只是说共产党员大学生应当善于把政治工作和掌握科学的事业结合起来。有人说,要做到这一点是有困难的。这当然是对的。但是共产党员什么时候害怕过困难呢?困难之所以在我们的建设道路上存在,正是为了要我们去同它作斗争并且克服它。

此外,我们还应当注意一种情况。我认为我们的国家和我们国家的革命习惯、传统,以及反对因循习惯和思想停滞的斗争,给繁荣科学创造了最有利的环境。未必用得着怀疑,资本主义学校旧教授所特有的小市民的狭隘性和守旧思想,是科学的绊脚石。未必用得着怀疑,只有不沾染这些缺点的新人,才能从事充分而自由的科学创造。在这方面,我们的国家有远大的前途,可以成为不受束缚的科学的堡垒和苗圃。我认为我们已经开始走上这条道路。但是,如果共产党员大学生依旧站在发展科学的大道旁边,那是可悲的,

并且是不体面的。正因为如此,掌握科学的口号就具有特殊的意义。

因此,要竭力使无产阶级大学生,首先是共产党员大学生懂得掌握科学的必要性并且去掌握科学,——这就是党的第三个任务。

顺致

敬礼

约·斯大林

1925年4月15日

载于1925年4月16日
《真理报》第87号

选自《斯大林全集》第7卷
第71—74页

俄共(布)第十四次 代表会议的工作总结

(1925年5月9日向俄共(布)莫斯科组织积
极分子所作的报告)

同志们！我认为在这里详细地分析我们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⁹⁷所通过的各项决议是没有意义的。这要花费很多时间,而且也没有必要这样做。我认为只要指出基本路线就够了,因为它象一根红线贯串在这些决议中。这样做我们就能够着重指出所通过的各项决议的基本结论。这样做也便于今后研究这些决议。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决议,决议中所谈到的各种问题可以归纳为六类主要的问题。第一类问题是国际形势问题。第二类问题是资本主义国家内共产党的当前任务问题。第三类问题是殖民地和附属国内共产主义者的当前任务问题。第四类问题是在目前国际形势下社会主义在我国的命运问题。第五类问题是我们党在农村中的政策和党在新条件下的领导任务问题。最后,第六类问题是我国整个工业的神经中枢即金属工业问题。

—

国 际 形 势

在国际形势中基本上决定目前时局性质的新的特殊情况是什

么呢？

在最近时期出现的对国际形势有影响的新情况，就是欧洲开始了革命的退潮，开始出现了某种平静现象，即我们所说的资本主义的暂时稳定，同时还出现了苏联经济的发展和政治威力的增长。

什么是革命的退潮，什么是平静现象呢？这是不是世界革命末日的开始，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消灭的开始呢？列宁说过，在我国无产阶级取得胜利以后便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即世界革命的时代，这是一个充满冲突和战争、进攻和退却、胜利和失败的时代，这是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走向胜利的时代。既然欧洲革命的退潮已经开始，那么这是不是说，列宁关于新时代即世界革命时代的论点因而也就失效了呢？这是不是说，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因而也就取消了呢？

不，不是这个意思。

世界革命时代是一个新的革命阶段，是包括好多年也许包括几十年的整整一个战略时期。在这段时期内可能有而且一定有革命的退潮和来潮。

我国革命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即两个战略时期，而在十月革命以后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即第三个战略时期。第一个阶段（1900—1917年）延续了十五年以上。这个阶段的目的是推翻沙皇制度，争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在这段时期内我们经历了许多次革命的退潮和来潮。我们经历了1905年的来潮。这次来潮是以革命暂时失败而结束的。之后，我们经历了延续好几年（1907—1912年）的退潮。接着我们经历了因连纳事件⁹⁸（1912年）而掀起的新的来潮，这次来潮后来被战争时期的新的退潮所代替。1917年（2月）开始了新的来潮，这次来潮是以人民战胜沙皇制度，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胜利而结束的。在每次退潮以后，取消派都硬说革

命完蛋了。但是,革命在经过了多次退潮和来潮以后终于在1917年2月取得了胜利。

革命的第二个阶段是从1917年2月开始的。这个阶段的目的退出帝国主义战争,推翻资产阶级和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这个阶段或者说这个战略时期一共延续了八个月。但这是革命危机极度加深的八个月,当时战争和经济破坏鞭策了革命,使革命的步伐极度加快。正因为如此,革命危机的这八个月至少可以而且应当等于通常的宪制发展的八年。这个战略时期也象前一个战略时期一样,它的特征并不象革命的庸人通常所想象的那样,是革命的一味直线上升,而是包含着退潮和来潮。在这个时期,在七月游行示威⁸⁹的日子里,我们经历了革命运动的汹涌澎湃的来潮。接着,在布尔什维克七月失败以后,我们经历了革命的退潮。这次退潮紧接着被科尔尼洛夫叛乱⁷⁹以后的新的来潮所代替,而这次来潮是以十月革命胜利而结束的。这个时期的取消派瞎说什么在七月失败以后革命已被全部扑灭。但是大家知道,革命在经历了多次考验和退潮以后,终于取得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我们进入了第三个战略时期即革命的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的目的是在世界范围内战胜资产阶级。这个时期会持续多久,——很难说。但是毫无疑问,这个时期无论如何是很长的,同样毫无疑问,这个时期也会包含着来潮和退潮。世界革命运动目前已经进入革命退潮时期,但是这次退潮由于许多原因(关于这些原因我在下面还要谈),一定会被来潮代替。来潮可能以无产阶级的胜利来结束,也可能不以胜利来结束,而被新的退潮代替,但是新的退潮也一定会被革命的新的来潮代替。现今时期的取消派说,已经出现的平静现象是世界革命的末日。但是,他们弄错了,正象他们过去在我国革命的第一个阶段和第二个阶段弄错

了一样,那时他们把革命运动的每一次退潮都看成革命的毁灭。

这就是在革命的每个阶段内即每个战略时期内的起伏情形。

这些起伏说明什么呢?它们是不是说明,列宁关于世界革命的新时代的论点已经失去意义或者可能会失去意义呢?当然不是!它们只是说明,革命的发展通常不是直线上升,不是继续不断地向上高涨,而是要经过曲折的道路,经过进攻和退却、来潮和退潮的道路的。在发展进程中来潮和退潮锻炼了革命力量并且准备了革命的最终胜利。

这就是已经到来的革命退潮时期的历史意义,这就是目前我们所处的平静时期的历史意义。

但是退潮只是事情的一面。事情的另一面是:与欧洲革命退潮的同时,苏联的经济蓬勃发展,苏联的政治威力日益增长。换句话说,现在不仅有资本主义的稳定,同时还有苏维埃制度的稳定。可见现在有两种稳定:资本主义的暂时稳定和苏维埃制度的稳定。这两种稳定之间达到了某种暂时的平衡——这就是我们目前所处的国际形势的特点。

但什么是稳定呢?这是不是停滞呢?如果稳定就是停滞,那么能不能把它应用到苏维埃制度上来呢?不,稳定不是停滞。稳定是目前局势的巩固,是进一步的发展。世界资本主义不只是在目前局势下得到巩固。它还在前进和向前发展,还在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和增殖自己的财富。如果认为资本主义不能发展,如果认为列宁在他的《帝国主义》一书中所提出的关于资本主义腐朽的理论似乎是排除资本主义的发展,那是不对的。列宁在他的关于《帝国主义》一书中充分证明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排除资本主义的逐渐

指《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730—845页。——编者注)。

腐朽,而是预定和准备资本主义的逐渐腐朽。

可见,现在有两种稳定。一端是资本主义达到稳定,它在巩固它现有的地位并且在继续发展。另一端是苏维埃制度达到稳定,它在巩固它所夺得的阵地并且在继续走向胜利。

谁战胜谁,——全部实质就在这里。

为什么一种稳定和另一种稳定同时并存呢?怎么会产生这两端的呢?因为世界上再没有单一的无所不包的资本主义了。因为世界已经分裂成两个阵营——以英、美资产阶级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因为国际形势将愈来愈取决于这两个阵营间的力量对比。

可见,目前时局的特征不仅是资本主义和苏维埃制度已经稳定,而且是这两个阵营的力量已经达到某种暂时的平衡,这对资本稍为有利,而对革命运动稍为不利,因为已经出现的平静现象和革命高涨比较起来,对社会主义无疑是不利的,虽然是暂时的不利。

这两种稳定之间有什么差别呢?这两种稳定各向哪一方面发展呢?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稳定使资本的力量暂时增强,同时也必然使资本主义的矛盾尖锐化。资本主义的矛盾就是:(一)各国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的矛盾;(二)每个国家内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三)帝国主义和世界各国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之间的矛盾。

苏维埃制度下的稳定则使社会主义的力量增强,同时也必然使矛盾缓和,使相互关系改善。这里的矛盾和相互关系就是:(一)我国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和相互关系;(二)无产阶级和各被压迫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之间的矛盾和相互关系;(三)无产阶级专政和世界各国的工人之间的矛盾和相互关系。

问题在于:不加紧剥削工人阶级,不使大多数劳动者过半饥半

饱的生活,不加紧压迫殖民地和附属国,世界资产阶级各帝国主义集团间不发生冲突和纠纷,资本主义就不能发展。而苏维埃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却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发展:不断提高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改善苏维埃国家全体劳动者的状况,世界各国工人日益接近和联合,殖民地和附属国的被压迫人民团结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周围。

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就是在收买和豢养劳动者中间的一小撮上层分子的同时,使绝大多数劳动者陷于贫困和过半饥半饱的生活的道路。

与此相反,无产阶级专政的发展道路,却是使绝大多数劳动者的物质生活不断提高的道路。

正因为如此,资本主义的发展就不能不产生使资本主义矛盾尖锐化的条件。正因为如此,资本主义就无力解决这些矛盾。

当然,如果没有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这个规律使各资本主义国家间因争夺殖民地而发生冲突和战争),如果资本主义不向落后国家,不向拥有廉价原料和劳动力的国家输出资本也能发展,如果“宗主国”的过剩的资本积累不是用于输出而是用来大力发展农业和改善农民的物质生活,最后,如果这些过剩的资本是用于提高全体工人阶级群众的生活水平,——如果这样,那就无所谓对工人阶级加紧剥削,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农民日益贫困化,对殖民地和附属国加紧压迫,以及资本家之间发生冲突和战争了。

如果这样,资本主义也就不成其为资本主义了。

全部问题在于:不使所有这些矛盾尖锐化,不积累那些归根到底促使资本主义垮台的条件,资本主义就不能发展。

全部问题在于:与此相反,不创造那些使世界各国的革命运动极度高涨并为无产阶级的最终胜利作好准备的条件,无产阶级专

政就不能继续发展。

这就是两种稳定之间的差别。

这也就说明为什么资本主义的稳定既不能持久又不能巩固。

现在我们来具体地研究一下资本主义的稳定问题。

资本主义的稳定具体表现在哪里呢？

第一,表现在美、英、法三国暂时在对德国进行掠夺的方法和范围方面达成了协议。换句话说,它们已经达成了它们称做德国道威斯化的协议⁹⁹。能不能说这个协议是比较牢靠的呢?不,不能。第一,因为它是在没有主人即没有德国人民参加的情况下达成的;第二,因为这个协议会使德国人民受到双重压迫即本国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外国资产阶级的压迫。如果以为象德国这样一个有文化的国家,象德国无产阶级这样一个有文化的无产阶级,会甘受双重束缚而不企图进行一系列重大的革命爆发,那就是相信奇迹。甚至象兴登堡当选总统这样一件实质上是反动的东西,也毫无疑问地说明协约国暂时达成的对付德国的协议是不牢靠的,而且不牢靠得可笑。

第二,资本主义的稳定表现在英、美、日三国的资产阶级暂时在确定他们在中国这个能大量容纳国际资本的市场上的势力范围方面,在对华进行掠夺的方法方面,达成了协议。能不能认为这个协议是比较牢靠的呢?还是不能。第一,因为在协议者中间由于分赃而正在发生并且还会发生殊死的搏斗;第二,因为这个协议是背着中国人民达成的,中国人民是不愿意而且也不会服从外国强盗的法律的。中国革命运动的增长难道不是说明外国帝国主义的诡计注定要破产吗?

第三,资本主义的稳定表现在各先进国家的帝国主义集团暂时在互不干涉对方对“自己的”殖民地的掠夺和压迫问题上达成了

协议。能不能认为这个协议或者说达成协议的这种尝试是比较牢靠的呢？不，不能。第一，因为每一个帝国主义集团都在拚命夺取并且还会拚命夺取别人的一小块殖民地；第二，因为帝国主义集团对殖民地的压榨和对它们所实行的压迫政策只能使这些殖民地受到锻炼，并且使它们革命化，从而加深革命危机。帝国主义者企图“平定”印度，控制埃及，驯服摩洛哥，束缚印度支那和印度尼西亚的手脚，因而施展了各种各样的阴谋诡计。他们在这方面可能会取得一些“成绩”。但是几乎用不着怀疑，这些阴谋不会也不可能长久施展下去。

第四，资本主义的稳定可能表现在各先进国家的帝国主义集团企图在建立反苏统一战线问题上达成协议。就算能够达成这个协议，就算它们能够靠施展各种各样的诡计直到在索非亚爆炸事件¹⁰⁰上进行无耻的捏造等等而建立起某种类似统一战线的东西，有没有根据认为这种反对我国的协议或者说这方面的稳定能够比较牢靠、比较成功呢？我想这样的根据是没有的。为什么呢？第一，因为资本家建立统一战线和举行联合进攻这种威胁会造成一个大圆箍，比任何时候都更紧地把我们全国束在苏维埃政权的周围，使我国变成一座比“十四国”侵犯时更坚不可摧的堡垒。请回忆一下并非无名之辈的邱吉尔所说的关于十四国侵犯的威吓话。你们知道，光是这种威吓话，就足以使全国团结在苏维埃政权的周围来反对帝国主义强盗。第二，因为向苏维埃国家进攻，就一定会解开敌人后方的许多个革命纽结，使帝国主义的队伍瓦解和涣散。近来已经积下了无数个这样的纽结，它们不是预示帝国主义将有什么好下场，——这几乎是用不着怀疑的。第三，因为我国已经不再是孤独的了，它已经有西方的工人和东方的被压迫人民做同盟者。几乎用不着怀疑，对苏联的战争将成为帝国主义对本国工人和自己的

殖民地的战争。用不着证明,如果他们一旦进攻我国,那我们不会坐着等死的,我们一定会采取一切办法来驾御世界各国的革命狮子。各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者不会不知道我们在这方面是有一些经验的。

以上这些事实和理由都说明:资本主义的稳定是不可能巩固的,这种稳定产生着使资本主义失败的条件,相反,苏维埃制度的稳定则不断积累着使无产阶级专政巩固、使世界各国的革命运动高涨和使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

两种稳定即资本主义的稳定和苏维埃的稳定之间的这种原则性的对立,是两种经济制度之间和两种管理制度之间即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对立的表現。

谁不了解这种对立,谁就永远不会了解当前国际形势的基本实质。

目前国际形势的一般情况就是这样。

二

各资本主义国家内 共产党的当前任务

现在来谈第二类问题。

目前各资本主义国家内共产党所面临的新的特殊的情况,就是革命的来潮时期被革命的退潮时期即平静时期代替了。任务就是要利用目前所处的平静时期来巩固各国的共产党,使它们布尔什维克化,使它们成为依靠工会的真正群众性的政党,把非无产阶

级的劳动分子首先是农民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并且用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精神去训练无产者。

我不打算一一列举西方各国共产党的当前任务。你们读一读各项有关的决议,特别是共产国际扩大全会关于布尔什维克化的决议,就不难了解这些任务的具体内容究竟是什么了。

我只想谈一谈西方各国共产党的一项基本任务,因为阐明了这项任务以后,其余各项当前任务就容易解决了。

这项任务是什么呢?

这项任务就是把西方各国的共产党和工会结合起来。这项任务就是:进一步开展统一工会的运动并且把它进行到底,让所有的共产党员都绝对无条件地加入工会,在那里有系统地进行工作,把工人联结成一条反资本的统一战线,从而创造各国共产党能够依靠工会的条件。

不执行这项任务,就既不能使各国共产党变成真正群众性的政党,也不能为无产阶级的胜利准备必要的条件。

西方的工会和党并不象我们俄国的工会和党。在西方工会和党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在我们俄国所形成的那种相互关系大不相同。我国的工会是在党建立以后,在工人阶级政党的周围形成起来的。当我国还没有工会的时候,党及其组织就已经不仅领导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而且还领导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直到小规模的和极小规模罢工。二月革命以前我们党在工人中间所享有的威信,比当时在我国各地存在的那些处于萌芽状态的工会所享有的威信要高得多,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此。我国真正的工会是在1917年2月以后才出现的。在十月革命以前我们就已经有了成形的工会组

指1925年3月21日—4月6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五次扩大全会通过的关于共产国际各党布尔什维克化的提纲(见贝拉·库恩编《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编者注

织,这些组织在工人中间享有极高的威信。列宁还在那时就说过,没有象工会这样的支柱,就既不能争得无产阶级专政,也不能保持住无产阶级专政。在取得政权以后,特别是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我们的工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毫无疑问,现在我们的强大的工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之一。我国工会发展史的主要特征就是:我国工会是在党建立以后,在党的周围并且在和党友好的情况下产生、发展和巩固起来的。

西欧的工会完全是在另一种情况下发展起来的。第一,它们在工人阶级政党出现以前很久就在那里产生并巩固起来了。第二,在那里,工会不是在工人阶级政党周围发展起来的,恰恰相反,工人阶级政党本身却是从工会当中分离出来的。第三,由于对工人阶级有极密切关系的经济斗争领域可以说已经被工会占领,因此党就不得不主要进行议会中的政治斗争,这就不能不影响党的工作性质和党在工人阶级心目中的重要性。正因为在那里党是在工会成立以后产生的,正因为工会在党建立以前很久就产生了,并且工会确实是无产阶级反资本斗争中的主要堡垒,——正因为如此,党就成了一支不依靠工会的独立力量,就退到了次要地位。

由此应当得出结论:如果共产党想成为一支能够把革命向前推进的真正群众性的力量,它就应当和工会结合起来并且依靠工会。

不估计到西方情况的这个特点,就一定会葬送共产主义运动事业。

在那里,在西方,现在仍然有个别“共产党员”不愿意了解这个特点,还继续沉醉于“退出工会”这一反无产阶级的和反革命的口号。必须说,诸如此类的“共产党员”对西方的共产主义运动是最有害不过的了。这些人把工会看成敌对的营垒,企图从外面来“攻

击”工会。他们不了解,实行这样的政策,工人就会把他们看成敌人。他们不了解,不管工会好不好,工人群众总是把工会看成帮助自己保持工资、工作日等等的堡垒。他们不了解,这样的政策不会促进而会破坏共产党员深入到千百万工人阶级群众中去的工作。

一个普通工人群众会向这样的“共产党员”说：“你们攻击我的堡垒,你们想要破坏我几十年来创造的事业,想向我证明共产主义比工联主义好。也许你们的共产主义理论是正确的(象我这样一个普通的工人怎么能了解你们的理论呢),这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一点,就是我有我的工会堡垒,它领导我进行斗争,它保护我(不管保护得好不好),使我免受资本家的攻击,谁想破坏这个堡垒,谁就是破坏我的事业即工人的事业。别再攻击我的堡垒了,加入工会吧,在那里工作五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帮助我们改善和巩固工会,到那时候我再来看看你们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如果你们真正够朋友,那我当然不会拒绝支持你们的”等等。

目前西方的普通工人群众就是这样或者大致是这样对待反工会主义者的。

谁不了解欧洲普通工人心理上的这个特点,谁就根本不会了解目前我们各国共产党的状况。

西方社会民主党的力量在哪里呢?

在于它依靠工会。

我们西方各国共产党的弱点在哪里呢?

在于它们还没有和工会结合起来,而且这些共产党内的某些分子不愿意和工会结合。

因此,目前西方各国共产党的基本任务就是:进一步开展统一工会的运动并且把它进行到底,让所有的共产党员个个都加入工会,在那里有系统地耐心地进行工作,团结工人阶级去反对资本,

从而使共产党能够依靠工会。

这就是共产国际扩大全会关于西方各国共产党的当前任务的决议的意义。

三 殖民地和附属国内 共产主义者的当前任务

现在来谈第三类问题。

这方面的新情况如下：

(一)由于各先进国家向落后国家加紧输出资本(这是资本主义的稳定所促成的),资本主义在殖民地国家中正在迅速地发展并且还会迅速地发展,它正在摧毁旧的社会政治条件,培植新的社会政治条件；

(二)这些国家中的无产阶级正在迅速地成长并且还会迅速地成长；

(三)殖民地内的工人革命运动和革命危机正在增长并且还会继续增长；

(四)同时民族资产阶级的某些最富裕和最有力量的阶层也在成长并且还会继续成长,他们害怕本国的革命比害怕帝国主义还要厉害,因此宁愿和帝国主义勾结而不愿为本国摆脱帝国主义的解放事业奋斗,从而也就出卖他们的祖国(印度、埃及等国)；

(五)由于这一切,只有和妥协的民族资产阶级进行斗争,这些国家才能摆脱帝国主义而得到解放；

(六)由此可以得出结论 :在工业发达的和工业正在发展的殖民地内 ,工农联盟和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应当成为迫切的问题 ,就象在 1905 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以前 ,这个问题成为迫切的问题一样。

过去的情形是这样的 :人们通常总是说东方是一个同一式样的整体。现在大家都明白 ,单一的、同一式样的东方已经不再存在了 ,现在有资本主义发达的和资本主义正在发展的殖民地 ,也有落后的和正在后退的殖民地 ,对于这些殖民地已经不能用任何同样的尺度去衡量了。

过去 ,人们总是把民族解放运动看成是殖民地和附属国内一切民族力量即从最反动的资产者起到最革命的无产者止的一条全面性的战线。现在 ,在民族资产阶级分裂为革命的一翼和反革命的一翼以后 ,民族运动的面貌就有了一些改变。除了民族运动的革命分子以外 ,从资产阶级当中还产生出妥协分子和反动分子 ,这些人宁愿和帝国主义勾结而不愿为本国的解放事业奋斗。

因此 ,殖民地国家内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就是 :和资产阶级中的革命分子 ,而首先是和农民结合起来 ,反对帝国主义同“本国的”资产阶级中的妥协分子结成的联盟 ,以便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为摆脱帝国主义的桎梏进行真正的革命斗争。

结论只有一个 :许多殖民地国家目前日益接近自己的 1905 年。

任务就是 :把殖民地国家工人中的先进分子团结成为一个能够领导日益增长的革命的统一的共产党。

下面就是列宁早在 1922 年关于殖民地国家内日益增长的革命运动所说的话 :

“第一次帝国主义大屠杀的‘胜利者’ ,现在连小得可怜的爱尔兰都不能

战胜,连它们彼此之间在财政问题和外汇问题上的混乱都不能克服。而印度和中国在咆哮着。这就有七亿多人。如果加上周围和它们完全相似的亚洲各国,那就占全世界人口的一大半。在那里,1905年日益迫近,不可遏止地愈来愈快地迫近着。而这个1905年有一个很重要的极大的不同之处:在1905年,俄国的革命还能够孤立地进行(至少在开始时),也就是说,没有一下子把其他各国卷入革命,但是现在印度和中国的日益增长的革命却正在卷入或已经卷入革命斗争、卷入革命运动、卷入国际革命。”(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7卷第293页)

殖民地国家正面临着自己的1905年,——结论就是如此。

共产国际扩大全会所通过的关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的意义也就是如此。

四

关于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命运

现在来谈第四类问题。

前面我谈的是我们党的代表会议就与共产国际直接有关的一些问题所通过的决议。现在我们来谈谈那些既与共产国际也与俄共(布)直接有关,因而是外部问题和内部问题的联结环节的问题。

资本主义的暂时稳定会怎样影响我国社会主义的命运呢?这种稳定是不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末日或是末日的开始呢?

在其他国家于相当长的时期内保存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在我们这个技术上和经济上落后的国家里,究竟能不能用自身的力量建成社会主义呢?

在资本主义包围而且是目前还稳定的资本主义包围的条件下,能不能完全保证免除武装干涉的危险,也就是说完全保证免除旧制度在我国复辟的危险呢?

由于国际关系方面的新情况,所有这些问题就必然要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不给予准确而肯定的回答是不行的。

我国有两种矛盾。一种矛盾是内部的矛盾,即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另一种矛盾是外部的矛盾,即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

现在来分别考察这两种矛盾。

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存在着某些矛盾,——这一点当然不能否认。只要回忆一下我国过去和现在由于农产品的价格政策,由于限价,由于降低工业品价格的运动等等而发生的一切事情,就会了解这些矛盾的全部现实性。我们面前有两个主要阶级:无产者阶级和私有者阶级即农民阶级。他们之间必然产生矛盾。全部问题在于:我们能不能用自身的力量克服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所存在的这些矛盾。当人们说:能不能用自身的力量建成社会主义?他们的意思是说:我国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是可以克服还是不能克服?

列宁主义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是的,我们能够建成社会主义,而且我们将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和农民一起去建设。

这样回答的根据或理由是什么呢?

这样回答的理由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除了有矛盾以外,在发展的根本问题上还有共同的利益,这些共同利益抵得上而且肯定会超过这些矛盾,这些共同利益就是工农联盟的基础。

这些共同利益是什么呢?

问题在于农业有两条发展的道路:资本主义的道路和社会主义的道路。资本主义的道路是使大多数农民陷于贫困而让城乡资

产阶级上层分子发财致富的道路。恰恰相反,社会主义的道路则是使大多数农民的物质生活不断提高的道路。无产阶级和农民,特别是农民,是乐意走第二条发展道路即社会主义的道路的。因为这条道路是农民摆脱贫困和半饥半饱的生活的唯一生路。不用说,掌握经济命脉的无产阶级专政一定会采取一切办法使第二条道路即社会主义的道路取得胜利。同时,农民显然是极乐意走这第二条发展道路的。

可见,无产阶级和农民利益的一致性抵偿了他们之间的矛盾。

正因为如此,列宁主义说,我们能够而且必须和农民一起并且依靠工农联盟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

正因为如此,列宁主义根据无产者和农民之间有共同利益这一点,说我们能够而且必须用自身的力量来克服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

列宁主义就是这样看这个问题的。

但是,显然并不是所有的同志都同意列宁主义的看法。例如托洛茨基关于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问题就这样说:

“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落后国家内,工人政府所处地位的矛盾,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即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求得解决。”(见托洛茨基《一九二五年》一书的序言)

换句话说,我们没有能力也没有可能用自身的力量克服和解决我国内部的矛盾即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因为只有通过世界革命,只有依靠世界革命,我们才能解决这些矛盾并且最后建成社会主义。

不用说,这个论点和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

同一个托洛茨基还继续说:

“没有欧洲无产阶级直接的国家援助,俄国工人阶级就不能保持政权,就不能把自己暂时的统治变成长期的社会主义专政。这是一分钟也不能怀疑的。”(见托洛茨基《我们的革命》第 278 页)

换句话说,在西方无产阶级还没有取得政权和给我们以国家援助以前,我们连梦想在比较长的时期内保持政权也是不可能的。

其次:

“休想革命的俄国能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得住脚……”(见《托洛茨基文集》第 3 卷第 1 部第 90 页)

换句话说,我们不但不能建成社会主义,而且甚至也无法短时期“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住脚,尽管全世界都知道,我们不仅支持住了,而且还打退了保守的欧洲向我国发动的多次疯狂进攻。

最后:

托洛茨基说:“俄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只有无产阶级在欧洲几个最重要的国家内获得胜利以后,才会是可能的。”(同上,第 93 页)

看来是很明白的了。

同志们,我引用这些话,是为了把这些话和列宁著作中的一些话对照一下,使你们能够领会关于在一个被资本主义国家包围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可能性问题的本质。

现在来谈谈列宁著作中的一些话。

列宁早在 1915 年帝国主义战争时就写道:

“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这

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既然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就会起来反对其余的资本主义的世界,把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这些国家中掀起反对资本家的起义,必要时甚至用武力去反对剥削阶级及其国家。……”因为“没有各社会主义共和国对各落后国家的相当长期的顽强斗争,便不能实现各民族在社会主义中的自由联合”。(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18卷第232—233页)

换句话说,被资本家包围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不但能够用自身的力量解决内部的矛盾即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而且还能够、还必须建成社会主义,在本国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和建立一支武装力量,以便帮助周围各国的无产者去进行推翻资产阶级的斗争。

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基本原理就是这样。

列宁在1920年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谈到我国电气化问题时说过同样的话(虽然说法有些不同):

“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不然我国仍然是一个小农国家,这一点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我们不仅在世界范围内比资本主义弱,在国内也比资本主义弱。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们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并且一定要努力把经济基础从小农的变成大工业的。只有当国家实现了电气化,为工业、农业和运输业打下了现代大工业的技术基础的时候,我们才能得到最终的胜利。”(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6卷第46—47页)

换句话说,列宁完全认识到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所存在的技术上的困难,但是他丝毫没有从这里得出下面这个荒谬的结论:

参看《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709页。——编者注

黑体是我用的。——约·斯大林注

参看《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399页。——编者注

“俄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只有无产阶级在欧洲几个最重要的国家内获得胜利以后,才会是可能的。”他却认为我们能够用自身的力量克服这些困难,从而取得“最终的胜利”,即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

请听列宁在一年以后即在 1921 年所说的话:

“只要在十年至二十年内和农民保持正确的关系,就能保证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甚至在发展着的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延迟的情况下)。”(《论粮食税一书纲要》1921 年版,见《列宁全集》俄文第 3 版第 26 卷第 313 页)

换句话说,列宁完全意识到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所存在的政治上的困难,但是他丝毫没有从这里得出下面这个不正确的结论:“没有欧洲无产阶级直接的国家援助,俄国工人阶级就不能保持政权。”他却认为只要对农民采取正确的政策,我们完全能够取得“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即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

但是,对农民的正确政策是什么呢?对农民的正确政策是一件完全由我们而且仅仅由我们这个领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党确定的东西。

列宁于 1923 年在他论合作制的札记中说过同样的话,但说得更加明确:

“的确,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最小农结成联盟,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已有保证等等,难道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难道这不是我们通过合作社,而且仅仅通过合作社,通过我们从前鄙视为买卖机关,并且现时在新经济政策下我们从某一方面也有理由加以鄙视的合作社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

黑体是我用的。——约·斯大林注

见《列宁全集》第 32 卷第 313 页。——编者注

一切吗？这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这已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7卷第392页）

换句话说，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我们有克服所有一切内部困难而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条件，因为我们能够而且必须用自身的力量来克服这些困难。

看来是很明白的了。

有人反对说，我国在经济上比较落后，因此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列宁反击并且驳斥了这种说法，认为这种说法是一种和社会主义不相容的东西。

列宁说：“他们在西欧社会民主党发展时期背得烂熟的一条论据，已成为他们万古不变的金科玉律。这条论据就是：我们还没有成长到实现社会主义的地步，或象他们的各种‘博学的’先生们所说的那样，我们还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客观的经济前提。”（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7卷第399页）

要不然，就用不着在十月夺取政权，用不着举行十月革命了。因为，如果根据某些理由而认为没有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可能和必要，那么十月革命也就失掉意义了。谁否认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建成的可能性，谁也就一定要否认十月革命的合理性。反过来说，谁不相信十月革命，谁就决不会承认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包围的条件下取得胜利的可能性。不相信十月革命和不承认社会主义在我国胜利的可能性，二者之间有紧密而直接的联系。

列宁说：“我知道，当然有一些自以为很聪明、甚至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聪明人，他们硬说在世界各国的革命爆发以前不应夺取政权。他们没有想到，他们这样说就是脱离革命而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等待劳动阶级完成世界

黑体是我用的。——约·斯大林注

参看《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682页。——编者注

同上，第690页。——编者注

规模的革命,——这就是使大家在等待中停滞不前。这是荒谬的。”(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3卷第9页)

关于第一种矛盾,关于内部的矛盾,也就是关于在资本主义包围的条件下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问题就是如此。

现在来谈第二种矛盾即外部的矛盾,也就是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

这种矛盾表现在哪里呢?

这种矛盾表现在:只要资本主义包围存在,就一定会有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武装干涉的危险,只要这种危险存在,就一定会有复辟的危险即资本主义制度在我国恢复的危险。

能不能认为这种矛盾是一个国家完全可以克服的呢?不,不能。因为靠一个国家的努力,即使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也不能完全保障自己免除武装干涉的危险。因此,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只有通过若干国家的无产者的共同努力,或者更好是在几个国家的无产者取得胜利以后,才能够有免除武装干涉的完全保障,也就是说,才能够取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

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什么意思呢?

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就是有免除武装干涉行动、因而就是有免除复辟行动的完全保障,因为稍微严重的复辟行动,只有在外来的重大的援助下,只有在国际资本的援助下,才有可能发生。因此,各国工人对我国革命的支援,尤其是这些工人的胜利,即使在几个国家内的胜利,是完全保障第一个获得胜利的国家免除武装干涉和复辟行动的必要条件,是保证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必要条件。

列宁说:“只要我们苏维埃共和国还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一个孤立的边沿地区,那种认为……各种各样的危险已经消失的想法,就是十分可笑的幻

想和空想。当然,只要这种根本对立还存在,危险也就存在,并且不能避免。”(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6卷第29页)

其次:

“我们不仅生活在一个国家里,而且生活在许多国家组成的体系里,苏维埃共和国和帝国主义国家长期并存是不可思议的。其结局不是这个胜利就是那个胜利。”(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4卷第122页)

正因为如此,列宁说:

“只有在全世界范围内,只有靠各国工人的共同努力,才能够最终取得胜利。”(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3卷第9页)

关于第二种矛盾就是如此。

第一种矛盾是完全可以是一个国家的努力来克服的,第二种矛盾却需要几个国家无产者的努力才能解决,——谁把这两种矛盾混为一谈,谁就犯了最粗暴的反列宁主义的错误,谁就是糊涂虫,或者是不可救药的机会主义者。

今年1月有位同志寄给我一封信,谈到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问题,这封信可以作为这种糊涂思想的一个典型例子。他困惑地写道:

“你说,列宁的理论……就是社会主义能够在一个国家内胜利。很遗憾,我在列宁著作中有关的地方没有找到关于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指示。”

当然,糟糕的不是这位同志(我认为他是我们青年学生中一位优秀的同志)在列宁著作中有关的地方没有找到关于社会主义在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379页。——编者注

见《列宁全集》第29卷第128页。——编者注

同上,第27卷第346页。——编者注

一个国家内胜利的指示”。他总有一天会找到和读到这种指示的。糟糕的是他把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混为一谈,结果就纠缠在这种糊涂思想里。我不妨把我对这位同志的来信的答复告诉你们。我的答复如下:

“那里指的不是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而是社会主义的一般胜利,就是说赶走地主和资本家,夺取政权,打退帝国主义的进攻,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经济,——这一切是一个国家内的无产阶级完全能够做到的,但是要得到免除复辟的完全保障,就只有通过‘几个国家的无产者的共同努力’。

如果确信胜利了的俄国无产阶级在其他国家的无产者公开的同情之下,在没有几个国家获得胜利的情况下;‘不能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得住脚’,那么在俄国发动十月革命就是愚蠢的。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最普通的机会主义,托洛茨基主义,随便叫什么都可以。如果托洛茨基的理论是正确的,那么伊里奇的下面这个论点便是不对的:我们一定把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我们有‘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见《论合作制》).....

我们政治实践中最危险的就是:企图把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国家看做一种被动的东西,以为它在没有得到其他国家胜利了的无产者的援助时只能在原地踏步。假定在俄国苏维埃制度建立以后五年到十年内西方还没有爆发革命,假定我们共和国在这个时期内仍然作为一个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苏维埃共和国存在,那么你是否认为我们国家在这五年到十年内只在白中捣水,而不去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呢?只要提出这个问题,就可以了解否认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可能胜利的理论的全部危险性。

这是不是说,这个胜利是完全的、最终的胜利呢?不,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只要资本主义包围还存在,就随时有受军事干涉的危险。”(1925年1月)

从我们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所通过的有名决议看来,社会主义在我国的命运问题就是这样。

五 党在农村中的政策

现在来谈第五类问题。

在谈第十四次代表会议关于党在农村中的政策的决议以前，我想简单地谈一谈资产阶级报刊因我们党批评我们自己在农村中的缺点而发出的叫嚣。资产阶级报刊吵吵嚷嚷，要所有的人都相信：我们公开批评自己的缺点是苏维埃政权软弱的标志，是苏维埃政权分崩离析的标志。不用说，所有这些叫嚣完全是捏造和欺骗。

自我批评是我们党坚强的标志，而不是我们党软弱的标志。只有深入生活的和走向胜利的强有力的政党才敢当着全体人民的面对自身的缺点进行无情的批评，过去这样，将来也永远是这样。对人民掩盖真相的政党，害怕阳光和批评的政党，并不是政党，而是一个注定要灭亡的骗子集团。资产者老爷们用自己的尺度来衡量我们。他们害怕阳光并且竭力对人民隐瞒真相，用粉饰太平的办法来掩盖自己的缺点。因此，他们以为我们共产党人也一定会对人民隐瞒真相。他们所以害怕阳光，是因为只要他们进行比较认真的自我批评，只要他们对自身的缺点进行比较自由的批评，资本主义制度就会彻底崩溃。因此，他们以为只要我们共产党人进行自我批评，那就是我们被围困和无立足之地的标志。他们这些可敬的资产者和社会民主党人正是用自己的尺度来衡量我们的。只有正在完蛋的和注定灭亡的政党才会害怕阳光和批评。我们既不害怕这个，也不害怕那个，我们所以不害怕，是因为我们是上升的政党，是走

向胜利的政党。正因为如此,已经进行了几个月的自我批评是我们党极度坚强的标志,而不是我们党软弱的标志;它是巩固我们党的手段,而不是瓦解我们党的手段。

现在来谈谈党在农村中的政策问题。

在国内和国际的新形势下,在农村中可以指出哪些新的因素呢?

我认为可以指出四件主要的事实:

(1)国际形势的变化和革命速度的缓慢要求选择一条痛苦最少的、哪怕是漫长的道路,来吸引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来和农民一道建设社会主义;

(2)农村的经济发展和农民的分化过程要求肃清农村中战时共产主义的残余;

(3)农民的政治积极性要求改变农村中旧的领导方法和行政管理方法;

(4)苏维埃的改选露出一件无可置疑的事实,就是在我国许多地区内中农站在富农方面反对贫农。

根据这些新的事实,党在农村中的基本任务是什么呢?

有些同志根据农村分化这一事实得出结论说,党的基本任务就是挑起农村中的阶级斗争。这种说法是不对的。这是无谓的空谈。这不是我们现在的主要任务。这是重弹孟什维克旧百科全书中的孟什维克老调。

现在主要的问题完全不是挑起农村中的阶级斗争。现在主要的问题是:使中农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重新把他们争取过来。现在主要的问题是:和基本农民群众结合起来,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并和这些基本群众一道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主要的问题是:和农民一道,一定要和农民一道建设社会主义,

同时一定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进行,因为工人阶级的领导是使建设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基本保障。

这就是党现在的基本任务。

不妨回忆一下伊里奇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关于这一点所说的直到现在还完全有效的几句话:

“全部关键在于,现在要同无比广大的群众,即同农民群众一道前进。”(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7卷第272页)

其次:

“同农民群众,同普通的劳动农民结合起来,并开始向前移动,其速度虽比我们所希望的慢得不可估量,慢到了极点,但整个群众却真正会同我们一道前进。到了一定的时候,这个运动就会加快到我们现在所梦想不到的速度。”(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7卷第231—232页)

因此我们在农村中有两项基本任务。

(1)第一,必须把农民经济纳入苏维埃经济发展的总体系。从前我们有两个平行的过程:城市走城市的路;农村走农村的路。资本家竭力把农民经济纳入资本主义发展的体系。但这是通过农民群众贫困和农民中的上层发财致富而实现的。大家知道,这条道路孕育着革命。在无产阶级胜利以后,把农民经济纳入苏维埃经济发展的总体系,是为了创造条件以便能够在逐步地而又是不断地提高大多数农民的生活水平的基础上,就是说在跟革命前资本家引导和邀请农民所走的道路相反的道路上把国民经济向前推进。

但是,怎样把农民经济纳入经济建设体系呢?通过合作社。通过信用合作社、农业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和工艺合作社。

通过这些道路,农民经济一定会缓慢地然而彻底地纳入社会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656页。——编者注
同上,第621页。——编者注

主义建设总体系。

(2)第二项任务是:逐步地而又不断地实现消灭农村中旧的行政管理方法和领导方法的路线,实现活跃苏维埃的路线、使苏维埃成为真正的经选举产生的机关的路线以及在农村中确立苏维埃民主制的原则的路线。伊里奇说过,无产阶级专政是大多数劳动者的民主制的最高类型。伊里奇说过,只有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只有在有可能巩固这个政权以后,这种最高类型的民主制才能实现。可见,这个巩固苏维埃政权和确立苏维埃民主制的时期已经开始。我们应当谨慎小心地沿着这条道路前进,不要性急,我们应当在工作的进程中,在党的周围培养出大批的非党农民积极分子。

如果第一项任务,即把农民经济纳入经济建设总体系的任务,使我们能够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把农民和无产阶级套在一辆马车上,那么第二项任务,即在农村中确立苏维埃民主制和活跃苏维埃的任务,就一定会有可能改造我们的国家机关,使它和人民群众联系起来,使它成为健全的、廉洁的、朴素的和节约的机关,以便创造促进从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条件。

我们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就我们党在农村中的政策问题所通过的决议的基本路线就是如此。

因此,党在农村中的领导方法也就应当有所改变。

我们党内有人断言,既然有新经济政策,既然资本主义开始暂时稳定,那么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在党内和国家机关内实行最大限度的压制政策,把周围的一切压得透不过气来。我必须说,这种政策是不正确的和致命的。现在我们需要的是不是最大限度的压制,而是在政治方面和组织方面的最大限度的灵活性,即在政治领导和

组织领导方面的最大限度的灵活性。不然,在当前复杂的情况下我们就会掌不住舵。我们所以需要最大限度的灵活性,是为了使党能掌住舵,保证党实现全面的领导。

其次,必须使农村中的共产党员放弃畸形的行政管理方式。决不能只对农民发号施令。应当学会耐心地向农民解释他们所不了解的问题,应当学会说服农民,在这方面不要吝惜时间和精力。象我们某些乡执行委员会主席那样常常只是发号施令,别的什么也不干,这当然要容易得多,简单得多。但是简单的容易做的事情不一定是好事情。不久以前有一位乡支部书记在回答省委员会代表所提出的关于该乡没有报纸的问题时说:“我们干吗要报纸呢?没有报纸倒安静些,好些,不然,农夫们一读报就会提出种种问题,那简直麻烦透了。”这位书记也算共产党员!几乎用不着证明,这不是一个共产党员,这是一种不幸。问题在于:现在要进行领导,没有“麻烦”是绝对不可能的,更不必说没有报纸了。这个简单的真理我们必须了解和领会,如果我们愿意党和苏维埃政权保持住农村中的领导的话。

其次,现在要进行领导,就必须善于经营管理,必须懂得和理解经济。现在只是高谈“世界政治”,高谈张伯伦和麦克唐纳,是不会有成就的。我们已经进入经济建设时期。因此,只有通晓经济的人,只有善于在经济发展方面向农夫提出有益意见的人,只有善于帮助农夫进行经济建设的人,才能做领导工作。研究经济,使自己和经济结合起来,深入到经济建设中的各项细节中去,——这就是农村中共产党员现在的任务。不这样做,连梦想领导也不可能。

现在不能按照旧方式进行领导了,因为农民的政治积极性已经提高,必须使这种积极性以苏维埃的形式表现出来,使这种积极

性通过苏维埃,而不是绕过苏维埃。谁能在农村中活跃苏维埃和在党的周围培养农民积极分子,谁就能做领导工作。

现在不能按照旧方式进行领导了,因为农村中的经营积极性已经提高;必须使这种积极性以合作社的形式表现出来,使这种积极性通过合作社,而不是绕过合作社。谁能在农村中开展合作社运动,谁就能做领导工作。

农村中党的领导的具体任务大体上就是这些。

六 关于金属工业

现在来谈我们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讨论过的最后一类问题。

我们经济领导方面的新的特殊的情况是什么呢?

新的特殊的情况就是:我们的经济计划已经开始落后于我们经济的实际发展,我们的经济计划订得太低,因此它们常常赶不上经济的实际发展。

我们的国家预算就是这件事的一个明显表现。你们知道,由于我们的预算草案没有估计到我们预算的收入项目的迅速增多,我们曾不得不在半年内三次更改我们的国家预算。换句话说,我们的预算草案和我们的预算计划赶不上国家收入的增多,因此国库中有了剩余。这就是说,我国经济生活的洪流正以不可遏止的力量向前奔腾,把我们财政专家的一切科学计划都冲垮了。这就是说,我们现在所经历的经济和劳动热情的蓬勃高涨,不亚于(甚至超

过)内战后美国的情形。

我国金属工业的发展可以认为是我国经济生活中这种新情况的最明显表现。去年金属的产值为一亿九千一百万战前卢布。去年 11 月,1924—1925 年的年度计划的预计产值为二亿七千三百万战前卢布。今年 1 月,由于这个计划和金属工业的实际发展速度不相适应,因而修改了一下,把产值提高到三亿一千七百万卢布。今年 4 月,这个扩大的计划又不切实际了,因此不得不把预计产值提高到三亿五千万卢布。现在有人告诉我们说:连这个计划也低了,因为还必须进一步扩大这个计划,使预计产值达到三亿六千万至三亿七千万卢布。

换句话说,今年金属工业的产值比去年的产值差不多增加了一倍。更不用说我们轻工业的巨大发展以及运输业和燃料工业等等的發展了。

这一切说明什么呢?说明在建立作为社会主义主要基础的工业方面,我们已经走上了广阔的发展道路。至于说到作为全部工业的基本动力的金属工业,那么停滞时期已经过去了,我们的金属工业是有蓬勃发展和欣欣向荣的一切条件的。捷尔任斯基同志说得对,我国能够而且应当成为金属国家。

几乎用不着再证明,这个事实无论对我国内部的发展或对国际革命,都有巨大的意义。

毫无疑问,从内部发展方面来看,我国金属工业的发展及其发展的意义是巨大的,因为它意味着我国全部工业的发展,意味着我国整个经济的发展,因为金属工业是全部工业的主要基础,因为如果没有金属工业的蓬勃发展,轻工业、运输业、燃料工业、电气化或是农业就都不能立足。金属工业的发展是全部工业发展的基础,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

请听列宁关于“重工业”(主要是指金属工业)所说的话吧：

“要挽救俄国,单靠农业的丰收还不够,而且单靠供给农民消费品的轻工的情况良好也还不够,我们还要有重工业。而要使重工业情况良好,就需要好多年的努力。”

还有：

“不挽救重工业,不恢复重工业,我们就不能建成任何工业,而没有工业,我们就会灭亡而不成其为独立国家。”(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7卷第349页)

至于我国金属工业发展的国际意义,可以说是不可估量的。因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金属工业的蓬勃发展,如果不是直接证明无产阶级不但能够破坏旧东西而且能够建设新东西,不是直接证明无产阶级能够以自身的力量建成新工业和建成没有人剥削人的新社会,那又是表明什么呢?用事实而不是用书本上的东西来证明这一点,这就等于有把握地彻底地把国际革命事业向前推进。西欧工人纷纷来我国访问并不是偶然的。这对全世界革命运动的发展有极伟大的鼓动意义和实践意义。工人们到我国来,考察我们工厂的每个角落,——这种情况说明,他们不相信书本,而想用亲身的体验证实无产阶级有建设新工业和创造新社会的本领。你们可以深信,一旦他们确信这一点,国际革命事业就会一日千里地向前推进。

列宁说：“现在,我们是通过自己的经济政策对国际革命发生我们的主要影响。所有的人,世界各国所有的劳动者,都毫无例外地(绝非夸大)注视着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在全世界范围内斗争已经转到这个方面来了。我

们一旦解决了这个任务,那我们就在国际范围内肯定取得最终的胜利。因此,经济建设问题对于我们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在这条战线上,我们应当慢慢地、逐步地——图快是不行的——而又坚持不懈地提高和前进,以取得胜利。”(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6卷第410—411页)

我们全部工业的发展特别是金属工业的发展的国际意义就是如此。

现在我们大约有四百万工业无产阶级。这个数目当然很小,但毕竟还是一种力量,可以用来建设社会主义和建立起我国的国防,使无产阶级的敌人发抖。然而我们不能而且不应当停留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有一千五百万到两千万工业无产者,我们要使我国各主要地区电气化,我们要合作化的农业和高度发达的金属工业。到那时我们就不怕任何危险了。到那时我们就一定会在国际范围内取得胜利。

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历史意义正是在于:它明确地指出了走向这个伟大目标的道路。

这条道路是正确的,因为它是列宁的道路,是使我们取得最终胜利的道路。

我们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工作总结大体上就是这样。

载于 1925 年 5 月 12 日和 13 日
《真理报》第 106 号和第 107 号

选自《斯大林全集》第 7 卷
第 75—112 页

黑体都是我用的。——约·斯大林注

见《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4 卷第 541—542 页。——编者注

问题和答复

(1925年6月9日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⁷³的演说)

同志们！我来回答你们书面提出的问题。我将按照你们问题单上的排列次序来回答问题。你们知道，这些问题一共有十个。我们从第一个问题谈起。

—

如果苏联在未来的十年至十五年内得不到西方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支持，那么应当采取什么办法和具备什么条件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结合呢？

我认为，这个问题包括了你们书面提出的其余一切问题。所以我的回答将是一般性的，因而远不是详尽的。否则在回答其余问题时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我认为，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⁹⁷的决议已经对这个问题作了详尽的回答。这些决议指出，巩固结合的基本保证，就在于对农民采取正确的政策。

什么是对待农民的正确政策呢？

这种政策只能是经济、行政政治和文化教育方面能保证使结合巩固的一系列措施。

我们先从经济方面谈起。

首先,必须消灭农村中的战时共产主义的残余。其次,必须实行正确的工业品和农产品的价格政策,以保证工业和农业的迅速增长,并且消灭“剪刀差”。此外,必须缩减农业税的总额,并且逐渐使农业税由全国总预算的轨道转到地方预算的轨道上。必须使千百万农民群众合作化,首先是使他们参加农业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因为合作化是把农民经济纳入社会主义建设总体系的手段。必须最大限度地向农村提供拖拉机,因为这是使农业进行技术革命的手段,也是在农村中创立文化技术基地的方法。最后,必须实行电气化计划,因为这是使农村接近城市和消灭城乡对立的手段。

这就是党在经济方面保证城市和农村的结合所应当遵循的途径。

我希望你们注意农业税由国家预算的轨道转到地方预算的轨道的问题。这也许会使你们感到奇怪。但是农业税现在具有并且将来也一直具有地方税的性质,这是事实。例如,大家知道,以前,大约两年以前,农业税是我们国家预算中的一项主要的或者几乎是主要的收入。而现在呢?现在它在国家预算中只占很少一部分了。国家预算现在是二十五亿卢布,而农业税在今年将要提供的和能够提供的至多不过二亿五千万至二亿六千万卢布,比去年的总数要少一亿卢布。可见,这已经不是那么多了。国家预算愈增多,农业税在国家预算中所占的比重就愈缩小。其次,在这二亿六千万卢布农业税中有一亿卢布正在转入地方预算。这占全部农业税的三分之一以上。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在现有的一切税收中,农业税最接近地方条件,最适于用作地方需要。不用怀疑,整个地方预算将日益增加。但是同样毫无疑问,地方预算的增加,首先是依靠那些要求最大限度地适合地方条件的农业税。国家收入的重

心已经转到并且将要整个转到他种收入,即国营企业收入和间接税等等方面去,这是更可以肯定的。

正因为如此,农业税由全国总预算的轨道转到地方预算的轨道,将来会成为可能的,从巩固结合的观点来看是完全适当的。

现在来谈谈在行政政治方面保证结合的措施。

为了精简国家机关并且使它们在精神上健全起来,为了驱逐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腐化分子,为了使国家机关充分接近千百万群众,就应当在城市和农村确立苏维埃民主制并且活跃苏维埃,——这就是党在行政政治建设方面巩固结合所应当遵循的途径。

无产阶级专政不是目的本身。专政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手段和道路。什么是社会主义呢?社会主义就是由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向无国家的社会的过渡。但是为了实现这种过渡,就必须按照能够真正保证专政的社会变为共产主义社会的方向和方法,来准备改造国家机关。活跃苏维埃的口号,在城市和农村中确立苏维埃民主制的口号,吸收工人阶级和农民中的优秀分子直接管理国家的口号,都是为了这个目的。改善国家机关,认真地改造它,把官僚主义分子和腐化分子从国家机关中驱逐出去,使国家机关成为同广大群众休戚相关的机关,——要做到这一切,如果没有群众本身对国家机关的经常和积极的帮助,是不可能的。但是不吸收工人和农民中的优秀分子到管理机关中来,不建立国家机关同劳动群众最“下层”的直接联系,要得到群众积极的和不断的帮助也是不可能的。

苏维埃国家机关同资产阶级国家机关有什么区别呢?

区别首先在于:资产阶级国家机关是站在群众之上的,因此它和人民之间隔着一道不可逾越的壁垒,按它的本质来说,是和人民群众格格不入的。而苏维埃国家机关却是和群众打成一片的,因为

如果它想把自己保持为苏维埃国家机关,它就不能而且不应当站在群众之上,因为如果它真正想团结千百万劳动群众,它就不能和这些群众格格不入。这就是苏维埃国家机关同资产阶级国家机关的原则性的区别之一。

列宁在他的《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这本小册子中曾经说过:二十四万布尔什维克党员,无疑是能够管理国家来为穷人谋福利而反对富人的,因为他们决不会比过去管理国家来为富人谋福利而反对穷人的十三万地主差。有些共产党员根据这一点就认为,国家机关只要有几十万党员就够了,认为这就足以管理一个大的国家了。因此,他们有时并不反对把党和国家等同起来。同志们,这是不正确的。这是曲解列宁的思想。列宁说到二十四万布尔什维克党员时,决不是想说苏维埃国家机关的人数和总的规模就以此为限,或者可以以此为限。恰恰相反,列宁除了把党员列为国家机关的人员外,还把在当时即在十月革命以前投票赞成布尔什维克的一百万人也包括在内,他说,我们有方法一下子使我们的国家机关扩大十倍,就是说,用吸收劳动者参加管理国家的日常工作的方法,至少能使国家机关达到一千万人。

列宁说:“这二十四万人现在至少已经拥有一百万成年人的选票,因为正是党员数目同党所拥有的选票数目的这种比例关系,已经由欧洲的经验 and 俄国的经验,譬如说,至少已经由彼得格勒杜马的八月选举确定了。因此,我们已经有一个由一百万思想上忠实于社会主义国家而不是为了在每个月的20号领取一大笔钱的人组成的‘国家机构’。

此外,我们还有一下子就可以把我们的国家机构扩大十倍的‘绝妙的方法’,这种方法是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从来没有过并且也不可能有的。这个绝妙的方法就是吸收劳动者、吸收贫民参加管理国家的日常工作。”(见《列宁

全集》俄文第3版第21卷第264—265页)

但是“吸收劳动者、吸收贫民参加管理国家的日常工作”这件事情是怎样进行的呢？

这件事情是通过在苏维埃、经济机关、工厂委员会、文化机关、党组织、青年团组织、各种合作组织等等团体的周围组织起来的那些群众发起的组织、各种委员会、各种会议和代表大会来进行的。我们的同志有时没有注意到，在我们基层党组织、苏维埃机关、文化机关、工会组织、教育机关、共青团组织、军队组织、妇女部门和其他一切组织的周围，有大批的拥有千百万非党工农群众的自发组织、委员会和会议在活动，它们在自己日常的细小烦琐的和无声无息的工作中建立着苏维埃的基础和生活，创造着苏维埃国家力量的泉源。没有这些环绕着我们苏维埃机关和党机关的拥有千百万群众的组织，苏维埃政权的存在和发展，以及对一个大国家的领导和管理的绝对不可思议的。苏维埃国家机关不仅仅是由苏维埃组成的。苏维埃国家机关，就这个词的深刻意义来说，是由苏维埃加上拥有千百万群众的各种各样非党的和党的组织组成的，这些组织把苏维埃同最“下层”结合起来，使国家机关同千百万群众打成一片，并且在逐步消除着国家机关同人民之间的任何类似壁垒的东西。

因此，我们应当竭力使我们的国家机关“扩大十倍”，使它成为千百万劳动群众所亲近的机关，把官僚主义的残余从国家机关中铲除出去，使国家机关同群众打成一片，从而准备由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

这就是活跃苏维埃和确立苏维埃民主制的口号的意义和作

用。

这就是在党的行政政治工作方面巩固结合所必需的基本措施。

至于在文化教育工作方面保证结合的措施,那就不用多说了,因为这些措施都很明显,大家都知道,不用再解释了。我只想指出最近时期这方面工作的基本路线。这个基本路线就是要为在全国即在全苏联实行初等普遍义务教育准备必要的条件。同志们,这是极重大的改革。实行这种改革,将不仅是文化战线上的极伟大的胜利,而且也会是政治战线上和经济战线上的极伟大的胜利。这种改革必定成为国家巨大发展的基础。但是,实行这种改革要花费几亿卢布。只要指出这一点就够了:要实行这种改革,需要一支差不多有五十万名男女教师的大军。不管怎样,如果我们真想使国家具有高度的文化水平,我们就必须保证在最近时期实行这种改革。同志们,我们一定能做到这一点。这是不用怀疑的。

这就是对你们第一个问题的答复。

现在我们来谈第二个问题。

二

如果资本主义的稳定长久保持下去,那么这种稳定会产生哪些使我们党蜕化的危险呢?

我们这里究竟有没有这些危险呢?

这些可能的甚至是现实的危险无疑是存在的。我们这里存在的危险同稳定无关。稳定仅仅使这些危险更加明显。这些危险中主要的我认为有三种:

(一)我国的建设事业失去社会主义前途的危险,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取消主义;

(二)失去国际革命前途的危险,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民族主义;

(三)降低党的领导危险,以及由此可能使党变成国家机关的附属品。

我们先从第一种危险谈起。

这种危险的特点是:不相信我国革命的内部力量;不相信工农联盟;不相信工人阶级在这个联盟中的领导作用;不相信“新经济政策的俄国”会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不相信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会胜利。

这是取消主义和蜕化的道路,因为它会取消十月革命的基础和目的,会使无产阶级国家蜕化成资产阶级民主国家。

这种“思想”的来源和它在党内产生的基础,是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在我国国民经济内部资本主义成分和社会主义成分展开殊死斗争的条件下资产阶级对党的影响的加强。资本主义成分不仅在经济方面进行斗争。它们还竭力把斗争转到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方面,企图把不相信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怀疑我们建设工作的社会主义前途的思想传染给党内最不稳定的队伍,而且不能说,它们的这种努力是绝无成效的。

一些受到传染的“共产党员”说:“我们这个落后的国家哪里能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我国生产力的状况不允许我们提出这种空想的目的,只要能马马虎虎支持下去就行,我们哪能建成社会主义呢,反正就是建设吧,将来自见分晓……”

另外一些人说:“我们已经完成了自己的革命使命,实现了十月革命,现在一切都取决于国际革命,因为西方无产阶级不预先取得胜利,我们是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严格地说,革命者在俄国已

经无事可做了……”大家知道,在1923年,在德国革命爆发的前夕,我国的一部分青年学生准备抛掉书本到德国去,他们说:“革命者在俄国已经无事可做,应当抛掉书本到德国去干革命。”

可见,这两类“共产党员”,无论第一类或者第二类都是站在否认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立场上,站在取消主义的立场上。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第一类用“科学的”“生产力论”来掩饰自己的取消主义(无怪乎前几天米留可夫赞扬他们,在《最近新闻报》¹⁰¹上称他们为“认真的马克思主义者”);第二类则用左的和“非常革命的”关于世界革命的词句来掩饰自己的取消主义。

事实上,就假定说,革命者在俄国无事可做;假定说,在其他国家社会主义获得胜利前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是不能想象和不可能的;假定说,社会主义在先进国家的胜利还要延迟十年至二十年,那在这些条件下,能不能设想我们经济中那些在资本主义包围我国的情况下活动着的资本主义成分,会同意停止同我们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作殊死的斗争,并且会袖手等待世界革命的胜利呢?只要提出这个问题,就能了解这种设想是多么荒谬了。但是,如果这种设想被排除,那么我们这些“认真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非常革命的革命家”还有什么事情可干呢?显然他们只有一件事情可干,就是开开空车,听从自发势力的支配,并且逐渐蜕化成普通的资产阶级民主派。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我们把我们的国家看作无产阶级革命的基地,我们拥有象列宁所说的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切条件,那么我们就能够而且应当建设这样的社会,来完全战胜我国国民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或者是我们不认为我们的国家是革命的基地,我们没有建成社会主义的条件,我们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那么当社会主义在其他国家的胜利延缓的时候,就应当容许

我国国民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占上风,容许苏维埃政权瓦解,容许党蜕化。

或者是前者,或者是后者。

所以,不相信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就会导致取消主义和蜕化。

所以,特别在现在,特别在资本主义暂时稳定的情况下,同取消主义的危险作斗争是我们党的当前任务。

现在我们来谈第二种危险。

这种危险的特点是:不相信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不相信它会胜利;对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抱怀疑态度,不了解我们国家如果没有其他国家革命运动的支持就不能抵挡住世界帝国主义;不了解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的胜利不可能是最终的胜利,因为只要革命还没有在若干国家里获得胜利,它就不可能保证不遭受武装干涉;不了解国际主义的基本要求,即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的胜利并不是目的本身,而是发展和支持其他国家革命的手段。

这是民族主义和蜕化的道路,是完全取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政策的道路,因为患这种病的人,不是把我们的国家看作被称为世界革命运动的那一整体的一部分,而是把它看作这一运动的开始和结束,认为其他一切国家的利益都应当为我们国家的利益而牺牲。

支持中国的解放运动吗?为什么呢?不会有危险吗?这不会使我们同其他国家发生纠纷吗?我们同其他“先进的”列强一起在中国确定“势力范围”,从中国拿到一些有利于自己的东西岂不是更好吗?这样做既有好处,又没有危险……支持德国的解放运动吗?值得冒险吗?同意协约国的凡尔赛条约¹⁰²,通过赔款获得一些利益岂不是更好吗?……同波斯、土耳其和阿富汗保持友好吗?

值得这样做吗？同某些大国恢复“势力范围”岂不是更好吗？如此等等。

这就是企图取消十月革命的对外政策和正在培养蜕化分子的新型的民族主义“思想”。

如果说,第一种危险即取消主义危险的根源,是在对内政策方面,即在我国国民经济中资本主义成分和社会主义成分的斗争方面资产阶级对党的影响的加强,那么这第二种危险即民族主义危险的根源,应当认为是在对外政策方面,即在资本主义国家同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斗争方面资产阶级对党的影响的加强。不用怀疑,资本主义国家对我们国家的压力是很大的,我们的外交工作人员不是随时都能抵挡得住这种压力的,产生各种纠纷的危险往往引诱人们走上阻力最小的道路,走上民族主义的道路。

从另一方面来看,很明显,只有在彻底的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只有在十月革命的对外政策的基础上,第一个获得了胜利的国家才能保持住世界革命运动旗手的作用,而对外政策中阻力最小的和民族主义的道路,则是使第一个获得了胜利的国家孤立和瓦解的道路。

所以,失去国际革命的前途,就会产生民族主义和蜕化的危险。

所以,同对外政策方面的民族主义危险作斗争是党的当前任务。

最后谈谈第三种危险。

这种危险的特点是:不相信党的内部力量;不相信党的领导;国家机关力图削弱党的领导,摆脱党的领导;不了解没有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

这种危险是从三方面来的。

第一方面,需要领导的各个阶级发生了变化。现在的工人和农民已经不是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工人和农民。在以前,工人阶级是丧失阶级性的,是散漫的,而农民则是充满恐惧的,他们唯恐国内战争一旦失败,地主要回来,而且党在这个时期是按照军事方式进行领导的唯一集中的力量。现在我们这里是另一种情况。战争已经没有了,因而使劳动群众集合在党的周围的军事危险也就没有了。无产阶级无论在文化方面或者在物质方面都已经复原并且提高了。农民也同样地提高和发展了。这两个阶级的政治积极性正在增长并且会继续增长。现在按照军事方式进行领导已经不行了。第一,在领导中必须有最大限度的灵活性。第二,对工人和农民的要求和需要必须有特殊的敏感。第三,必须善于把由于工人和农民的政治积极性增长而涌现出来的这两个阶级当中的优秀人物吸收到党内来。但是大家知道,这些条件和品质不是立刻就能得到的。因此在向党提出的要求和目前党所具备的可能性之间产生了不相适应的情况。因此也就产生了削弱党的领导的危险和失去党的领导的危险。

第二方面,在最近时期,即经济发展时期,国家组织和社会团体的各个机关已经大大发展和巩固了。托拉斯、辛迪加、贸易机关、信用机关、行政政治机关、文化教育机关以及各种合作社等,吸收了几十万新的人员,主要是非党人员,因而大大发展和扩大了。这些机关不仅自己的成员增多了,而且它们的力量和比重也增大了。而它们的作用愈增大,它们对党的压力就愈显著,它们就愈顽强地力图削弱党的领导,它们对党的反抗就愈猛烈。因此,在这些机关内部必须根据能够保证党在新环境中的领导这一点来重新配置力量和配备领导人员。但是大家知道,要一下子做到这一切是不可能的。因此就产生了国家机关脱离党的危险。

第三方面,工作本身复杂化和多样化了。我指的是现在的建设工作。无论是农村的或是城市的许多工作部门和分部门都复杂化和发展了。因此,领导就更为具体了。从前通常都讲“一般的”领导。现在“一般的”领导就是句空话,因为这句空话里并不包含什么领导内容。现在需要的是具体的和实际的领导。过去一个时期培养了一种自以为知识广博、准备解答一切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的工作人员。现在这种旧型的自以为知识广博的工作人员,应当让位给竭力要成为某一工作部门行家的新型工作人员了。要真正地实行领导,就应当懂得业务,就应当认真地、耐心地、顽强地钻研业务。不懂得农业,不懂得合作社,不熟悉价格政策,不研究同农村有直接关系的法令,就不能在农村中进行领导。不懂得工业,不研究工人的生活,不倾听工人的要求和需要,不懂得合作社、工会和俱乐部工作,就不能在城市中进行领导。但是能不能一下子就做到这一切呢?很遗憾,不能。要把党的领导水平提到应有的高度,首先需要提高党的工作人员的水平。现在应当把工作人员的质量放在第一位。但是要一下子提高党的工作人员的质量,并不那么容易。遗憾的是,那种不去熟悉业务而急于采取行政手段的旧习惯,依然存在党的组织中。正因为如此,所谓党的领导有时就退化成一堆可笑的谁也不需要的命令,退化成不触及任何人和任何事物的空洞的和口头上的“领导”。这就是削弱和降低党的领导的最严重危险之一。

失去党的领导危险所以会引起党的瓦解和蜕化的理由,一般说来就是如此。

所以,同这种危险作坚决的斗争是我们党的当前任务。

这就是对你们第二个问题的答复。

现在我们来谈第三个问题。

三

怎样同富农进行斗争而又不挑起阶级斗争呢？

我认为这个问题很含糊，所以是提得不正确的。这里指的是哪一种阶级斗争呢？如果指的是农村中一般的阶级斗争，那么无产阶级所进行的阶级斗争不仅仅是反对富农的。而无产阶级和全体农民之间的矛盾，——这难道不是阶级斗争（虽然这种阶级斗争具有很特殊的形式）吗？无产阶级和农民现在我们社会中的两个基本阶级，在这两个阶级之间存在着矛盾，固然，这种矛盾是可以解决的，并且终究是可以克服的，但这毕竟是引起这两个阶级之间斗争的矛盾，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我认为，如果指的是城乡之间，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则我国的阶级斗争有三条主要的战线：

（一）整个无产阶级（以国家为代表）同农民之间在规定工业品和农产品的最高价格，在使税收工作正常化等等方面的斗争战线；

（二）整个无产阶级（以国家为代表）同富农之间在消灭农产品的投机价格，在把税收负担的主要重心转到富农身上等等方面的斗争战线；

（三）农村贫民，首先是雇农同富农之间的斗争战线。

你们可以看出，这几条战线无论在它们的比重上，或者在它们那里所发生的斗争的性质上，都不可能是一样的。因此，我们对待这几条战线上的几种阶级斗争的态度，也应当是有区别的、不一样的。

让我们再进一步考察一下。

第一条战线。无产阶级(以国家为代表)考虑到我国工业薄弱和不可能为我国工业获得借款,规定了许多主要措施,这些措施可以使我国工业免受外国工业竞争的侵袭,并且能够加快工业的发展以利于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包括农业在内)。这些措施就是关于对外贸易的垄断、关于农业税、关于国家收购农产品的形式、关于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贯彻计划原则的措施。这一切都是以工业的主要部门、运输业和信贷业的国有化为基础的。你们知道,这些措施已经收到了应有的效果,就是说既制止了工业品价格的急剧下降,又制止了农产品价格的急剧上涨。从另一方面来说,很明显,因为全体农民要购买工业品,要在市场上出售自己的农产品,所以他们总想用尽量低的价格获得工业品,用尽量高的价格出售自己的农产品。同时农民还希望完全没有农业税,或者至少把农业税降到最低限度。

这就是在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发生斗争的基础。

国家能不能不采取上述各项主要措施呢?不,不能。因为在目前不采取这些措施就会使我国工业遭到破坏,使无产阶级趋于毁灭,使我国变成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殖民地,使我们的整个革命遭到失败。

全体农民是不是愿意取消我们国家的这些主要措施呢?不,不愿意。因为在目前取消这些措施就意味着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胜利,而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就是为了一小撮富人即一小撮资本家发财致富而使大多数农民贫困的发展道路。谁敢断言,农民愿意自己贫困,愿意把我国变成殖民地,根本不愿意我国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获得胜利呢?

这就是无产阶级同农民之间结成联盟的基础。

这是不是说,我们的工业主管机关依靠垄断制就可以抬高工业品价格来损害基本农民群众的利益,损害工业本身呢?不,不是这个意思。这样的政策首先会损害工业本身,使我国工业不可能从昨天温室里培养出来的娇弱植物变成明天应有的坚固强大的工业。由此就产生了降低工业品价格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运动。你们知道,这个运动获得了十分巨大的成就。

此外,这是不是说,我们的收购机关依靠垄断制,就可以随意降低农产品的价格,而使农民破产,损害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的利益呢?不,不是这个意思。这样的政策首先会危害工业,因为,第一,它会使对工人的农产品供应发生困难,第二,它会完全瓦解和破坏我们工业的国内市场。由此就产生了反对所谓“剪刀差”的运动。你们知道,这个运动已经产生了良好的效果。

最后,这是不是说,我们的地方机关或者中央机关,依靠农业税的法令和利用自己征税的权力,就可以把这种法令看作某种绝对的东西,就可以在自己实际工作中捣毁那些力量单薄的纳税者的谷仓,拆掉他们的屋顶,象在坦波夫省某些地区发生过的那样呢?不,不是这个意思。这样的政策会破坏农民对无产阶级、对国家的一切信任。由此就产生了党在最近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减少农业税,使这种税收多少具有地方性,整顿我国的整个税收工作,消除那种由于征税而在某些地方表现出来的粗暴行为。你们知道,这些措施已经产生了预期的效果。

因此,第一,在根本问题上,无产阶级同农民的利益是一致的,他们都愿意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获得胜利。由此就产生了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第二,在当前问题上,工人阶级同农民的利益是有矛盾的。由此就产生了这个联盟内部的斗争,这个斗争,按其比重来说,比不上利益的一致性,这种斗争在将来工人和

农民不再是阶级的时候,即当他们都变成无阶级社会的劳动者的时候,是必然会消失的。第三,我们拥有在维护和巩固工农联盟的范围内根据两个同盟者的利益解决工人阶级同农民之间的矛盾的手段和方法。我们不仅拥有这些方法和手段,而且我们在新经济政策和资本主义暂时稳定的复杂情况下,已经卓有成效地使用了这些方法和手段。

由此能不能得出结论说,我们应当在这条战线上挑起阶级斗争呢?不,不能。恰恰相反!由此只能得出结论说,我们应当竭力设法抑制这条战线上的斗争,用协商和互相让步的方法来调节这一斗争,并且无论如何不要把它导向尖锐化的形式,导向冲突。我们现在正这样做。因为我们有这样做的一切可能性。因为在这里利益的一致性比利益的矛盾更有力和更深刻。

可见,挑起阶级斗争的口号是完全不适合这条战线上的斗争情况的。

第二条战线。这里的出场人物是无产阶级(以苏维埃国家为代表)和富农。这里的阶级斗争也具有独特的形式,正象第一条战线上的斗争情况一样。

国家希望使农业税具有极为明显的所得税性质,把这种税收的主要负担转到富农肩上。而富农对这一点却“千方百计地”竭力摆脱,他们利用自己在农村中的一切力量和一切影响来把税收的负担转到中农和贫农的肩上。

国家在制止生活费用昂贵和竭力保持工资稳定的同时,竭力采取经济性的措施,规定出完全符合农民经济利益的最高的公平的农产品价格。而富农却去收买贫农和中农的农产品,收集了大批存粮,把它们囤积在自己的谷仓里,而不拿到市场上去,以便人为地抬高农产品的价格,把农产品价格抬高到投机价格,然后才把农

产品拿到市场上去榨取投机的暴利。你们也许知道,今年在我国某些省份,富农已经把粮价抬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了。

因此,这条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就具有独特的和比较隐蔽的形式。

可能有人认为,挑起阶级斗争的口号是完全适用于这条战线上的斗争情况的。但这是不正确的。因为在这里我们同样不愿意挑起阶级斗争。因为在这里我们完全能够并且应当避免挑起斗争,避免同斗争有关的各种纠纷。

我们能够并且应当活跃苏维埃,在苏维埃内部争取中农和组织贫农,以便减轻基本农民群众的纳税负担,而将税收的主要负担真正转到富农的肩上。你们知道,在这方面是采取了一些措施的,这些措施已产生了良好的效果。

我们能够并且应当使国家掌握足够的粮食储备,为了对粮食市场施加压力,必要时加以干涉,为了保持劳动群众所能接受的价格,从而粉碎富农的投机阴谋,这种粮食储备是必要的。你们知道,我们今年在这方面已经用去几千万普特的粮食了。你们应当知道,我们这样做了以后,已经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我们不仅在列宁格勒、莫斯科、顿巴斯、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等等地区保持住了低廉的粮价,而且还迫使许多地区的富农投降,强迫他们把过去的存粮按不高的价格抛到市场上去。

当然,在这里问题不仅仅取决于我们。在某些情况下,富农自己会挑起阶级斗争的,他们企图使阶级斗争达到沸点,企图使这种斗争采取匪徒骚扰或暴动的形式,这是完全可能的。但是,那时挑起斗争的口号就已经不是我们的口号,而是富农的口号,也就是反革命的口号了。此外,毫无疑问,到那时,富农一定会亲身体会到这一反对苏维埃国家的口号的一切不利之处了。

可见 ,在这第二条战线上挑起斗争的口号 ,并不是我们的口号。

第三条战线。这里的出场人物是两种力量 :一方面是贫农 ,而首先是雇农 ;另一方面是富农。这里 ,国家在形式上是站在旁边的。可见 ,这一条战线并不象前两条战线那样广阔。从另一方面来说 ,这条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是十分明显的和公开的 ,而前两条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却是被掩盖的和比较隐蔽的。

这里的问题是富农 - 企业主直接剥削雇佣工人或半雇佣工人。因此党在这里不能采取缓和斗争、抑制斗争的政策。我们在这里的任务是组织贫农进行反富农的斗争并且领导这一斗争。

这是不是说 ,我们因此就要挑起阶级斗争了呢?不 ,不是这个意思。挑起斗争不仅意味着组织和领导斗争。它同时意味着人为地激起和故意煽动阶级斗争。现在 ,当我们有无产阶级专政 ,当党组织和工会组织在我们这里行动完全自由的时候 ,是不是需要这种人为的办法呢?当然不需要。

因此 ,挑起阶级斗争的口号也是不适合于这第三条战线的。

第三个问题就是如此。

可见 ,关于农村中阶级斗争的问题并不象初看上去那么简单。现在我们来谈第四个问题。

四

工农政府是实际的 ,还是一个鼓动的口号?

我认为这样提问题是有些荒谬的。

工农政府是实际的 ,还是一个鼓动的口号 ,这种提法是什么意思

思呢？这就是说，仅仅为了达到不知道为什么在这里称作“鼓动”的某种狡猾手腕的目的，党可以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口号。这就是说，党可以提出一些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科学根据的口号。这不是确实的呢？当然不确实。这样的党只能存在一个短时期，然后就会象肥皂泡一样消失掉。如果是这样，我们的党就不会是执行科学政策的无产阶级政党，而是一个漂浮在政治事变表面上的泡沫。

我们的政府，按它的性质、纲领和策略来说，是工人的、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政府。对这一点不应当有任何误解和怀疑。我们的政府不可能同时有两个纲领：一个是无产阶级的纲领，另一个是别的什么纲领。它的纲领和它的实际工作都是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政府无疑是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政府。

这是不是说，我们的政府就不同时是工农政府了呢？不，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的政府按它的纲领和工作来说，是无产阶级的政府，但同时又是工农政府。

为什么呢？

因为在我国的条件下，基本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同无产阶级的利益完全一致的。

因为农民的利益就在无产阶级的纲领中，在苏维埃政府的纲领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因为苏维埃政府所依靠的是工农联盟，是在工农这两个阶级根本利益的一致性上建立起来的联盟。

最后，因为在政府机关的成员中，在苏维埃的成员中，除了工人以外，还有在工人领导下和工人一起反对共同敌人、一起建设新生活的农民。

所以“工农政府”的口号就不是一个空洞的“鼓动”口号,而是在共产主义纲领中具有科学根据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革命口号。

第四个问题就是如此。

现在我们来谈第五个问题。

五

某些同志把我们对农民的政策解释成对农民扩大民主和改变国家政权的性质。这种解释是否正确呢？

事实上我们在农村是不是在扩大民主呢？

是的,是在扩大。

这是不是对农民的让步呢？

当然是的。

这种让步是不是很大,是不是限于我国宪法范围以内？

我认为这里的让步并不很大,它丝毫没有改变我们的宪法。

既然如此,我们改变的究竟是什么,让步到底表现在哪里呢？

我们改变的是在新的发展条件下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农村工作方法。我们改变的是农村中阻碍结合工作和妨碍党把农民团结在无产阶级的周围的那些已经建立的秩序。

到现在为止,情况是这样的:在许多地区都是由一小群人在管理农村,这些人同县和省的联系多于同农村居民的联系。这种情况就使得农村的管理者多半朝上看,朝县里看,而很少朝下看,朝农村居民看,他们觉得自己不是对农村负责,不是对选民负责,而是对县和省负责,他们显然不懂得“上层”和“下层”在这里是一根链条,如果链条在下面断了,整根链条就必然散开。结果,一方面是管

理者无人监督、独断独行和恣意妄为,另一方面是农村中的不满和抱怨。现在正在坚决而彻底地消除农村中的这种秩序。

到现在为止,情况是这样的:在许多地区农村苏维埃的选举不是真正的选举,而是一小群害怕丧失权力的管理者用许多诡计和压力来私拉“代表”的一种空洞的例行手续。结果,就出现了使苏维埃从同群众亲近的机关变成同群众格格不入的机关的危险,而工人对农民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的这一基础和堡垒,则有悬在半空中的危险。你们知道,党因此不得不设法改选了苏维埃,而改选证明:许多地区的旧的选举方法是战时共产主义的残余,应当消灭这种有害的腐朽透顶的旧方法。现在正在消灭农村中的这种选举方法。

这就是让步的基础,在农村中扩大民主的基础。

这种让步不仅是农民需要的,也是无产阶级需要的,因为这种让步加强了无产阶级,提高了无产阶级在农村中的威信,巩固了农民对无产阶级的信任。大家知道,让步和妥协的主要目的,归根到底就是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

目前这些让步的界限怎样呢?

这些让步的界限已经由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和苏联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¹⁰³作了规定。你们知道,这些界限并不很宽,它只限于我刚才讲过的那些范围。但这还不是说这些界限永远不能改变。恰恰相反,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随着无产阶级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的巩固,随着西方和东方革命运动的发展,随着苏维埃国家国际地位的加强,这些界限无疑是会扩大的。列宁在1918年曾经说过,必须“随着剥削者反抗的停止,把苏维埃宪法推

广到全体居民中去”(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2卷第372页)。可见,这里所说的把宪法推广到全体居民,其中也包括资产阶级。这是在1918年3月说的话。从那时起到列宁逝世有五年多的时间。可是,列宁在这段时期内一次也没提到实行这个原理是适当的。为什么呢?因为扩大界限的时候还没有到来。但是,在苏维埃国家国内和国际的地位完全巩固以后,这种时候总会到来的,这一点是用不着怀疑的。

正因为如此,我们虽然预见到将来要进一步扩大民主,但是我们认为目前在民主方面的让步必须限制在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和苏联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所规定的范围内。

这些让步会不会改变国家政权的性质呢?

不,不会改变。

这些让步会不会改变无产阶级专政体系即会不会削弱无产阶级专政呢?

绝对不会,一点也不会。

无产阶级专政并没有被削弱,它只是由于活跃苏维埃和吸收农民中的优秀分子参加工作而日益巩固了。由于扩大民主,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不仅保持着,而且还获得新的力量,在无产阶级周围造成信任的气氛。要知道,如果就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相互关系来说,这就是专政中主要的东西。

有些同志断定说,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只限于暴力的概念,这是不正确的。无产阶级专政不只是暴力,而且是对非无产阶级的劳动群众实行领导,是建设比资本主义经济类型更高的、具有比资本主义经济更高的劳动生产率的社会主义经济。无产阶级专政是:(1)对资本家和地主使用不受法律限制的暴力,(2)无产阶级对农

民实行领导,(3)对整个社会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无论除去专政的这三方面中的哪一方面,都不免有曲解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的危险。只有把所有这三方面综合起来,我们才能得到一个完整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

党在苏维埃民主方面的新方针,会不会引起无产阶级专政体系的某种恶化呢?

不,不会引起的。恰恰相反!新方针只会改善工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体系。如果指的是专政体系中的暴力因素,而红军是暴力的表现,那就几乎用不着证明,在农村中确立苏维埃民主制只会改善红军的状况,把红军团结在苏维埃政权的周围,因为我们的军队主要是农民。如果指的是专政体系中的领导因素,那就几乎用不着怀疑,活跃苏维埃的口号只会使无产阶级便于实行这种领导,加强农民对工人阶级的信任。如果指的是专政体系中的建设因素,那也几乎用不着证明,党的新方针只会促进社会主义的建设,因为它的实施是为了巩固结合,而没有结合,建设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

结论只有一个:在目前情况下,对农民的让步只会加强无产阶级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它丝毫不会改变我国政权的性质。

第五个问题就是如此。

现在来谈第六个问题。

六

由于资本主义的稳定,我们党是不是正在对共产国际中的右倾实行让步?如果是这样,这真是必需的策略手段吗?

显然,这里指的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指的是联合什麦拉里

同志和萨波托茨基同志的集团去反对该党的右派分子这件事。

我认为我们党对共产国际中的右倾并没有实行任何让步。恰恰相反,整个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¹⁰⁴是在孤立共产国际中的右派分子的标志下进行的。如果读一读共产国际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决议,读一读关于布尔什维克化的决议,你们就不难了解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右派分子是共产国际所反对的主要目标。

正因为如此,决不能说我们党正在对共产国际中的右倾实行让步。

严格地说,什麦拉里同志和萨波托茨基同志并不是右派。他们并不赞同右派的纲领,即布隆派的纲领。确切些说,他们是动摇于列宁派和右派之间,带有动摇到右派方面去的倾向。他们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上的表现的特点,就是他们一方面受到我们批评的压力,另一方面受到右派所造成的分裂前途的威胁,他们在这一次动摇到我们这方面来了,动摇到列宁派方面来了,他们保证要与列宁派结成反对右派的联盟了。他们这样做应当得到赞扬。但是,同志们是否认为在动摇分子已经动摇到列宁派方面来的时候,在他们已经向列宁派让步而反对右派的时候,我们不应当欢迎他们呢?如果我们中间竟有人不能了解布尔什维克策略的起码道理,那是令人奇怪的,并且是可悲的。难道实践不是已经证明共产国际在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问题上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吗?难道什麦拉里同志和萨波托茨基同志没有同列宁派站在一个队伍里继续进行反对右派的斗争吗?难道捷克斯洛伐克党内的布隆派不是已经孤立了吗?

也许有人问:这种情况会不会长久呢?我当然不知道会不会长久,我不作预言。无论如何,很明显,只要什麦拉里派同右派

作斗争，就要同什麦拉里派联合起来，而一旦什麦拉里派改变了现在的立场，同他们的联合就必然会失去效力。但是现在的问题完全不在这里。现在的问题在于：目前的反对右派的联合加强了列宁派，使他们有领导动摇分子的新的可能性。现在主要的问题是在这里，而不在于什麦拉里同志和萨波托茨基同志还会发生什么动摇。

有人以为列宁派对每个左派空谈家和神经衰弱者都一定会支持，以为列宁派在任何场合下都是共产主义者中间固定不变的左派。同志们，这是不对的。我们同工人阶级的非共产主义政党比较起来是左派。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象已经死去的帕尔乌斯曾一度要求的那样，一定要“比一切都左些”，而他当时因为这一点是受到过列宁的严厉斥责的。在共产主义者中间，我们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我们就是列宁派。列宁在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时，即在既反对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倾，又反对右倾时，他知道自己是在做什么。无怪乎列宁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为题写了一本出色的小册子。

我认为，如果同志们及时地注意到这后一种情况，就不会向我提出这第六个问题。

第六个问题就是如此。

现在来谈第七个问题。

七

由于农村党组织的薄弱，在农村中有没有因采取新方针而在思想上形成反苏维埃鼓动的危险呢？

有,这种危险是有的。未必用得着怀疑,在活跃苏维埃的口号下进行苏维埃选举,就意味着地方上有选举鼓动的自由。不用说,反苏维埃分子为了乘隙再次破坏苏维埃政权,是不会放过这个好机会的。因此在农村中就有加剧和形成反苏维埃鼓动的危险。库班、西伯利亚和乌克兰等地改选前后的种种事实明显地说明了这一点。毫无疑问,我们许多地区的农村组织的薄弱加剧了这种危险。同样毫无疑问,帝国主义列强的武装干涉的癖性也促使这一危险加剧起来。

这种危险因何产生,它的根源何在呢?

它的根源至少有两个。

第一,反苏维埃分子觉察到最近在农村中发生了某种有利于富农的变动,觉察到许多地区的中农转到富农方面去了。这一点在改选以前本来就可以猜测到。在改选以后,这种猜测已经成为无可争辩的事实。这就是农村中在思想上形成反苏维埃鼓动的危险的第一个根源,也就是主要的根源。

第二,在许多地区,有人把我们对农民的让步看作我们软弱的标志。这一点在改选以前是可疑的。在改选以后就不容怀疑了。因此农村中的白卫分子发出了“继续施加压力!”的叫嚣。这就是农村中加剧反苏维埃鼓动的危险的第二个根源,虽然不是那样重要的根源。

首先,共产党员应当了解到:在农村中,目前时期是为争取中农而斗争的时期,把中农争取到无产阶级方面来是党在农村中最重要任务,不完成这个任务,形成反苏维埃鼓动的危险就会加剧起来,而党的新方针就只会对白卫分子有利。

其次,共产党员应当了解到:目前只有依据党在苏维埃、合作社、信贷、农业税、地方预算以及其他方面的新政策才能把中农争

取过来,使用行政压力只会损害工作,把事情弄糟;应当通过经济措施和政治措施来说服中农,使他们相信我们政策的正确性;只有用实例,用示范的方法才能“争取”他们。

此外,共产党员应当了解到:实行新方针不是为了活跃反苏维埃分子,而是为了活跃苏维埃和吸引基本农民群众;新方针不是取消同反苏维埃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而是预定要同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如果反苏维埃分子说“继续施加压力”,如果他们把对农民的让步看作我们软弱的标志,并且利用这些让步来达到反革命的目的,——那我们就一定要向他们证明,苏维埃政权是牢不可破的,并且提醒他们说,监狱早就在等待他们了。

我认为,我们的这些任务如果能够被领会并且付诸实现,农村中在思想上形成和加剧反苏维埃鼓动的危险就一定会彻底铲除。

第七个问题就是如此。

现在来谈第八个问题。

八

由于非党分子影响的加强,在苏维埃里有没有形成非党派别组织的危险呢?

可以说,在一定条件下才有这种危险。如果比较有组织的非党分子的影响在共产党员的影响还没有进入的地方增长起来,那就没有什么危险。例如,城市中的工会和农村中的近乎苏维埃的非党组织的情况就是这样。只是当非党的组织开始想以自己来代替党的时候,这种危险才开始产生。

这种危险是从哪里来的呢?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工人阶级中看不到或者几乎看不到这样的危险。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在党的周围,在工人阶级中间,我们有大批非党工人积极分子,他们对党充满信任,并且把党同千百万工人阶级群众连结在一起。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危险在农民中间特别严重。为什么呢?因为党在农民中间很薄弱,党还没有能够把党同数千万农民连结在一起的大批的非党农民积极分子。然而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象在农民中间那样迫切需要非党积极分子。

结论只有一个:要消除非党农民群众脱离党和疏远但是要一下子或者在几段,也是在农村中创立文化技术基地的方法。最后,必须实行电气化计划,因为这是使内就培养出这种积极分子是不可能的。只有逐渐在工作过程中,在活跃苏维埃的过程中,在开展合作社运动的过程中,才能从农民群众中间培养出和选拔出这种积极分子。为了做到这一点,应当改变共产党员对待非党员的态度。为了做到这一点,必须使共产党员以平等的态度来对待非党员。为了做到这一点,必须使共产党员学会以兄弟般的信任的态度来对待非党员。如果非党员所得到的是不信任,那就不可能要求得到他们的信任。列宁说过,党员和非党员之间的关系应当是“相互信任”的关系。列宁的这句话是不能忘记的。造成党员和非党员间相互信任的环境——这是为了给党培养出大批非党农民积极分子准备条件首先必须做到的。

但是这种相互信任怎样建立起来呢?当然不是一下子也不是通过命令就能建立起来的。如列宁所说的,这种相互信任只有通过党员和非党员的“相互检查”,通过日常实际工作过程中的相互检查才能建立起来。在第一次清党时期,曾经通过非党员检查党员,这使党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在党的周围造成了非常信任的气

氛。关于这一点，列宁在当时就已经说过，应当把第一次清党时在党员同非党员相互检查方面的教训推广到一切工作部门中去。我认为，现在应该记起列宁的这个意见并且采取措施来实现这个意见了。

因此，党员和非党员在日常实际工作过程中所进行的相互批评和相互检查，是造成他们相互信任的气氛的手段，——如果党要想消除千百万非党分子同党疏远的危险，如果党要想在自己的农村组织的周围培养出大批非党农民积极分子，这就是它所应当遵循的道路。

第八个问题就是如此。

现在来谈第九个问题。

九

没有外国的援助，我们能不能真正更新和大大扩大大工业的固定资本呢？

对这个问题可以有两种理解。

或者这里指的是苏维埃国家从现存的资本主义国家方面立即得到贷款援助，以此作为发展苏维埃工业必不可少的条件，那么，就可以作出一种符合于这一问题提法的回答。

或者指的是苏维埃国家在将来西方无产阶级取得胜利以后从他们那里得到援助，以此作为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必不可少的条件，那么，就得作出另一种回答。

为了使谁也不受委屈，我尽量对这个问题的两种可能的解释都作出回答。

我们先从第一种解释谈起。

在资本主义包围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外来的贷款是否有可能发展苏维埃的大工业呢?

是的,有可能。这件事情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同时还必须经历严重的考验,但是,尽管有这一切困难,我们没有外来的贷款还是能够实行我国的工业化的。

到现在为止,在历史上强大工业国的形成和发展有过三条道路。

第一条道路是侵占和掠夺殖民地的道路。例如英国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英国在世界各洲夺取了殖民地,它在两个世纪当中为加强本国工业而从殖民地榨取“追加资本”,最后变成“世界工场”。你们知道,我们是不能走这条发展道路的,因为对殖民地的侵占和掠夺是同苏维埃制度的本质不相容的。

第二条道路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实行军事破坏和索取赔款的道路。例如德国的情况就是这样,德国在普法战争时期击败了法国,从法国榨取了五十亿的赔款,然后把这笔款项投入自己的工业。你们知道,这条发展道路也是同苏维埃制度的本质不相容的,因为它在实质上同第一条道路毫无区别。

第三条道路是资本主义落后的国家在奴役性的条件下把经营权租让给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并且在奴役性的条件下向这些国家借款的道路。例如沙皇俄国的情况就是这样,沙皇俄国在奴役性的条件下把经营权租让出去,在奴役性的条件下取得西方列强的借款,因而就受到半殖民地生活的束缚,不过,这并没有排除它后来终于能够爬上独立发展工业的道路,当然这免不了要靠几次比较“成功的”战争,也免不了要靠对邻国的掠夺。几乎无须证明,苏维埃国家也不能走这条道路,因为我们同各国帝国主义者血战三年,

并不是为了在国内战争胜利结束后的第二天又心甘情愿地去受帝国主义的奴役。

如果以为在这几条发展道路中，每一条道路在实际生活中都必定是单纯地和其他道路截然分开地实现的，那就不对了。事实上，在个别国家的历史中，这几条道路往往是互相交错、互为补充的，并且有过交织在一起的范例。例如美国的发展历史就是这种几条道路交织在一起的例子。这种情况说明，各种不同的发展道路，虽然它们彼此有所区别，但是具有某些使它们相互接近，使它们能够交织在一起的共同特征：第一，它们都导致资本主义工业国的形成；第二，它们都是以采取某种方法从外面流入“追加资本”为前提的，这是建立这些国家必不可少的条件。但是，如果根据这一点就把它们搅在一起，混为一谈，不了解这三条发展道路毕竟是建立资本主义工业国家的三种不同方法，不了解这几条道路中的每一条道路都在这些国家的面貌上打上了特殊的烙印，那就更加不对了。

既然苏维埃国家不能走旧的国家工业化的道路，而要在不受奴役的条件下流入新的资本又不可能，那么苏维埃国家究竟还有什么道路可走呢？

剩下的只有一条新的发展道路，这是一条别的国家完全没有经历过的道路，不靠外来的贷款而发展大工业的道路，不一定要流入外国的资本来使国家工业化的道路，——这是列宁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中所指出的道路。

列宁说：“我们应当努力建成的国家，是要工人能够保持他们对农民的领导，保持农民对他们的信任，并厉行节约把自己社会关系中任何浪费现象的任何痕迹铲除干净。

我们应当使我们的国家机关尽量节约。…… 只要我们能够保持工人阶

级对农民的领导,我们就有可能在我国用厉行节约的办法把任何一点积蓄都保存起来,以发展我们的大机器工业,发展电气化……”列宁继续说道:“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打个比喻说——从一匹马上跨到另一匹马上,就是说,从农民的、庄稼汉的、穷苦的马上,从指靠破产的农民国家实行节约的马上跨到无产阶级所寻求的而且不能不寻求的马上,跨到大机器工业、电气化、沃尔霍夫水电站等等的马上。”(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7卷第417页)

这就是我们国家为了发展自己的大工业和使自己发展成为强大的无产阶级工业国而已经走上的和应当通过的道路。

正象我已经说过的那样,这条道路是资产阶级国家所没有经历过的。但是,这决不是说,这条道路对无产阶级国家来说是不可能的。在这里,对资产阶级国家是不可能的或者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对无产阶级国家却是完全可能的。因为无产阶级国家在这方面具有资产阶级国家所没有的,也许是不可能有的优越性。国有化的土地、国有化的工业、国有化的运输业和信贷业、垄断化的对外贸易、由国家调整的国内贸易,——这一切都是能够用来发展我国工业的“追加资本”的新泉源,这些新泉源在任何一个资产阶级国家中都不曾有过。你们知道,无产阶级政权已经利用这些以及和这些相类似的新泉源在发展我们的工业了。你们知道,我们在这条道路上已经取得了一些相当重要的成就。

正因为如此,对资产阶级国家是不可能的发展道路,对无产阶级国家却是完全可能的,尽管要遇到种种困难和考验。

此外,应当指出,目前这种缺少非奴役性外资流入的情况,不可能是什么永恒不变的。你们知道,已经有一些外资开始流入我国

了。几乎没有理由怀疑,这种流入将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巩固而日益增多。

关于问题的第一种解释就是如此。

现在来谈问题的第二种解释。

没有欧洲主要国家的社会主义的预先胜利,没有欧洲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在技术方面和设备方面的直接援助,在我国有没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呢?

在谈这个问题以前,——顺便说一下,这个问题我在这次讲话的开头就已经作了回答——我想消除一种同这个问题有关的非常普遍的误解。这种误解就是:某些同志爱把“更新和扩大工业的固定资本”的问题同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混为一谈。能不能同意把这两个问题混为一谈呢?不,不能。为什么呢?因为按范围来说,第一个问题要比第二个问题狭窄些。因为第一个问题,即关于扩大工业的固定资本的问题,只包括国民经济的一部分,即工业,而关于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则包括整个国民经济,既包括工业,也包括农业。因为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是组织整个国民经济的问题,是使工业同农业正确结合的问题,而关于扩大工业的固定资本的问题,严格说来,甚至不涉及这个问题。就假定工业的固定资本已经更新和扩大,但是,这还完全不是说,这样就已经解决了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社会主义社会是工业和农业工作人员的生产消费协作社。如果在这个协作社中,工业与供给原料、食物并且消耗工业品的农业不协调,如果工业与农业因此不能组成一个统一的国民经济的整体,那就根本不会有社会主义。

正因为如此,工业和农业的相互关系问题,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相互关系问题,是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中的基本问题。

正因为如此,决不能把更新和扩大工业的固定资本的问题

同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混为一谈。

那么,没有其他国家社会主义的预先胜利,没有西方胜利的无产阶级在技术方面和设备方面的直接援助,在我国有没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呢?

有,有可能。不仅有可能,而且有必要,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们已经在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在发展国有化的工业并且把它同农业结合起来,我们在农村中发展合作社并且把农民经济纳入苏维埃发展的整个体系中,我们在活跃苏维埃并且使国家机关和千百万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我们在建设新的文化和建立新的社会生活。毫无疑问,在这条道路上是困难重重的,我们还必须经受许多考验。毫无疑问,如果有西方的社会主义胜利的及时援助,事情就根本好办了。但是,第一,西方的社会主义胜利的“来临”并不象我们希望的那样快,第二,这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并且大家知道,我们已经在克服它们了。

这一切我已经在自己讲话的开头谈过了。在此以前,我在给莫斯科积极分子所作的报告中谈过这一点。而再早一些,在我的《走向十月革命的道路》一书的《序言》⁸⁶中也谈过这一点。我曾经说过,否认我国有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就是使党蜕化的取消主义。现在未必值得再来重复从前一再讲过的话了。因此我介绍你们去读读列宁的著作,在这些著作中,你们可以找到关于这一问题的足够数量的材料和原理。

我只想简单地谈谈这个问题的历史和这个问题在目前对党的意义。

如果不把1905—1906年间的争论计算在内,那么关于在一个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是在1915年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初次

指《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工作总结》(见本卷第321—353页)。——编者注

在党内提出的。大家知道,当时列宁第一次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18卷第232页)的论点。这是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期。大家知道,当时托洛茨基曾经反驳列宁的这个论点,他说:“休想革命的俄国能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得住脚……”(见《托洛茨基文集》第3卷第1部第90页)

在1921年,即在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以后,当建设问题已提到日程上的时候,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又重新在党内提出来了。这个时期,某些同志认为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是离开社会主义任务,是离开社会主义建设。大家知道,当时列宁在他的《论粮食税》小册子中断定说,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是使工业和农民经济结合的必要条件,是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条件,是通向顺利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1921年4月里的事情。好象是为了回答这一点,托洛茨基在1922年1月在他的《一九二五年》一书的序言中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提出了完全对立的论点,他说:“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落后国家内,工人政府所处地位的矛盾,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即在不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求得解决。”

此后经过了一年(在1922年),列宁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会上所作的声明同托洛茨基在《和平纲领》的跋中所作的声明又互相对立起来了,列宁说:“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而托洛茨基说:“俄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只有无产阶级在欧洲几个最重要的国家内获得胜利以后,才会是可能的。”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709页。——编者注

同上,第4卷第503—540页。——编者注

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401页。——编者注

最后,又经过了一年,列宁在他逝世前不久,在《论合作制》(1923年5月)一文中又重新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在我们苏联具有“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

问题的简短历史就是如此。

从这个历史的考证中已经可以看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是我们党的实践中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几乎用不着证明,如果列宁不认为社会主义建设是我们实践中的最重要的问题,他就不会再三重复它了。

后来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同资本主义成分的斗争的尖锐化,特别是资本主义的暂时稳定,只是加强和加深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可能性问题的意义。

从党的实践观点看来,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哪里呢?

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就在于它涉及我国建设的前途问题,涉及这个建设的任务和目的问题。不知道为什么建设,就不能真正建设。不知道前进的方向,就一步也不能前进。关于前途的问题,是惯于有自己明确而肯定的目标的我们党的最重要问题。究竟我们是为了社会主义、指望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而进行建设,还是为了给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土壤施肥、“等待全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到来”而碰运气地盲目地进行建设,——这就是现在的基本问题之一。如果不对这个很明确的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就不能真正地工作和建设。成百成千个党的工作者、工会工作者、合作社工作者、经济工作者、文化工作者、军事工作者和共青团员来找我们,询问我们,询问我们党:我们把事业向哪一方面引导,我们为什么建设?不幸的是有些领导者不善于或者不愿意对这个问题作出明确而肯定

的回答,他们支吾搪塞,把人们从本丢推给彼拉多¹⁰⁵,使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前途淹没在知识分子的怀疑主义中。

列宁主义的伟大意义之一,就在于它不认为建设是碰运气,是盲目的,它不认为建设是没有前途的,它对我们工作的前途问题作了明确而肯定的回答,它说,我们具有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一切条件,我们能够并且应当建设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

关于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可能性问题就是如此。

另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一定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这不仅取决于我们。这也取决于我们国外的敌人和朋友的强弱。如果让我们建设,如果我们能延长“喘息”时期,如果不发生严重的武装干涉,如果武装干涉不能得逞,如果国际革命运动的力量和实力同我们自己国家的力量和实力都强大得足以使重大的武装干涉企图不能实现,我们就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相反,如果武装干涉得逞而我们被击败,我们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

第九个问题就是如此。

现在来谈最后一个问题。

十

请指出我们党的和苏维埃的建设由于资本主义的稳定和世界革命的延缓而面临的最大的困难,特别是在党和工人阶级的相互关系、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相互关系方面所面临的最大的困难。

这些困难,如果就其中主要的来说,我认为有五个。资本主义稳定的作用,在于它稍微加剧了这些困难。

第一个困难。这是同外国武装干涉的危险有关的困难。这并

不是说,我们面临着武装干涉的直接危险,帝国主义者已经做好准备并且完全能够立即对我国进行武装干涉。要做到这一点,帝国主义起码应当象战争以前那样强大,但是大家知道,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目前摩洛哥的战争¹⁰⁶和对中国的武装干涉¹⁰⁷,这些未来的战争和武装干涉的演习,显著地表明了帝国主义的脊背开始发软了。可见,这里不是指直接的武装干涉,而是指只要资本主义的包围存在,总会有武装干涉的危险,而只要武装干涉的危险存在,我们就不得不为巩固国防而每年花费数亿卢布来供养陆军和海军。每年在陆军和海军上花费数亿卢布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相应地缩减了文化和经济建设方面的经费。不用说,要是没有武装干涉的危险,我们就可以把这笔款项,至少是把其中大部分用在加强工业,改进农业,实行初等普遍义务教育的改革等等方面。由此就产生了同武装干涉的危险有关的建设工作方面的困难。

同其他一切困难不同,这个困难的特点在于,克服这个困难不仅取决于我们,这个困难只有靠我国和所有其他各国革命运动的共同努力才能消除。

第二个困难。这是同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有关的困难。我在分析农村阶级斗争问题时已经谈过这些矛盾了。重复已经谈过的话是毫无必要的。这些矛盾发生在农产品和工业品的价格政策方面,发生在农业税和对农村的管理等等方面。这里的危险在于工农结合工作的混乱和无产阶级领导农民这一思想的破坏。由此就产生了同这一危险有关的困难。

同前一个困难不同,这个困难的特点在于,它是可以用我们的内部力量来克服的。农村中的新方针就是克服这一困难所必需的方法。

第三个困难。这是同我们联盟内部的民族矛盾、同“中部地

区”和“边疆地区”之间的矛盾有关的困难。这些矛盾的发展是由于“中部地区”和“边疆地区”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条件不同，是由于后者落后于前者。这方面的政治上的矛盾可以认为是已经消除了，但是文化上的，特别是经济上的矛盾还刚刚在形成，因此还需要把它们消除。这里的危险是双重的：一种危险是联盟各中央机关表现出大国的傲慢和官僚式的专横，不愿意或者不善于对各民族共和国的要求表现出必要的敏感，另一种危险是各共和国和各地区对“中部地区”的民族不信任和民族闭关自守。同这些危险作斗争，特别是同第一种危险作斗争，就是克服民族问题方面的困难的方法。

这个困难的特点在于，它也象第二个困难一样，是可以利用联盟的内部力量来克服的。

第四个困难。这是同国家机关脱离党的危险、同削弱党对国家机关的领导危险的困难。我在分析党的蜕化危险的问题时已经谈过这种危险了。重复已经谈过的话未必是必要的。这种危险是由于国家机关中存在着资产阶级官僚主义分子而滋长起来的。这种危险随着国家机关的发展及其比重的增大而加剧和严重起来了。任务就是要尽可能地精简国家机关，陆续把官僚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腐化分子从国家机关中驱逐出去，把党的领导力量分配到国家机关的各个枢纽点上去，从而保证党对国家机关的领导。

这个困难的特点在于，它也象第三个困难一样，是可以利用我们本身的力量来克服的。

第五个困难。这就是部分党组织和工会脱离工人阶级的广大群众、脱离这些群众的需要和要求的危险。这种危险所以产生和发展起来，是因为在许多党的和工会组织的机关内，其中包括各

支部和各工厂委员会里，存在着官僚主义分子的恶势力。这种危险最近因“面向农村”的口号而加剧起来了，这个口号把我们组织的注意力从城市转向农村，从无产阶级转向农民，而许多同志不懂得在面向农村的同时，决不能背向无产阶级，不懂得“面向农村”的口号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用无产阶级的力量才能实现，不懂得对工人阶级的要求采取漫不经心的态度，只能加深党组织和工会组织脱离工人群众的危险。

这种危险的特征是什么呢？

第一，我们的党组织和工会组织对工人阶级的广大群众的要求和需要失去敏感和不够关心；第二，不了解工人的自尊心和他们的统治阶级感觉已经提高了，他们是不能领受和容忍党组织和工会组织的官僚主义和文牍主义的态度；第三，不懂得用考虑不周的命令去麻烦工人是不行的，现在的重心不是在这些“措施”上，而是在争取整个工人阶级对党的信任上；第四，不懂得如果不在工人中进行准备活动，如果不举行广泛性的生产会议，就不能实行稍微广泛些的涉及工人群众的措施（例如，在纺织区改行看管三台织布机制）。

这一切使许多党组织和工会组织脱离广大工人阶级群众，使企业中发生冲突。大家知道，不久以前在纺织区爆发的冲突，揭露出我们许多党组织和工会组织是存在着这一切毛病的。

这就是我们建设道路上第五个困难的特点。

要克服这些困难，首先必须把我们的党组织和工会组织从这些严重的官僚主义分子的手中解放出来，着手改善工厂委员会的成分，一定要使生产会议活跃起来，把党的工作重心转到大的生产单位的支部方面去，并且给这些支部配备优秀的党的工作人员。

更多地注意和考虑工人阶级的要求和需要，尽量减少我们党

组织和工会组织实际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更多地关心和同情工人阶级的阶级自尊心，——这就是现在的任务。

第十个问题就是如此。

载于 1925 年 6 月 21、24、
25、28 日《真理报》第 139、
141、142、145 号

选自《斯大林全集》第 7 卷
第 131—175 页

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

献 给
联共(布)列宁格勒组织
约·斯大林

— 列宁主义的定义

在《论列宁主义基础》那本小册子里给列宁主义所下的众所周知的定义,看来已经得到公认了。这个定义就是:

“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确切些说,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 and 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

这个定义是否正确呢?

我以为是正确的。其所以正确,第一在于它正确地指出列宁主义的历史根源,确定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这正和某些批评列宁的人相反,他们错误地认为列宁主义是在帝国主义战争以后产生的。其所以正确,第二在于它正确地指出列宁主义的国际性质,这正和社会民主党人相反,他们认为列宁主义只适用于俄国一国的环境。其所以正确,第三在于它正确地指出列宁主义同马克思学说的有机联系,确定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这正和某些批评列宁主义的人相反,他们认为列宁主义不

是马克思主义进一步的发展,而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的恢复,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实际情况中的应用。

所有这些似乎都不需要特别解释了。

然而我们党内竟有人认为必须给列宁主义下一个与此稍稍不同的定义。例如季诺维也夫认为：

“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战争时代和在一个农民占多数的国家里直接开始的世界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季诺维也夫所强调的几个字有什么意义呢？把俄国的落后性，把它的农民性放到列宁主义的定义中去，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把列宁主义从国际无产阶级的学说变成俄国特殊情况的产物。

这就是为鲍威尔和考茨基效劳，因为鲍威尔和考茨基否认列宁主义能适用于其他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

不用说，农民问题对于俄国有极重要的意义，我们俄国是一个农民国家。但是这个事实对于确定列宁主义基础能有什么意义呢？难道列宁主义仅仅是根据俄国的条件专为俄国制定的，而不是根据帝国主义的条件为所有帝国主义国家制定的吗？难道列宁的著作如《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等只是对于俄国有意义，而不是对于所有帝国主义国家都有意义的吗？难道列宁主义不是各国革命运动经验的概括吗？难道列宁主义的理论原理和策略原理不是对于各国无产阶级政党都适用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730—845页。——编者注

同上，第3卷第171—276页。——编者注

同上，第616—709页。——编者注

同上，第4卷第178—269页。——编者注

和必要的吗？列宁说“布尔什维主义是可供各国效法的策略模范”（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3卷第386页），难道不对吗？列宁说“苏维埃政权以及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论原理和策略原理具有国际的意义”（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5卷第171—172页），难道不对吗？又如下面一段列宁的话难道说得不对吗：

“由于俄国是极端落后的小资产阶级的国家，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必然有一些不同于先进国家的特点。但俄国的基本力量及社会经济的基本形式却是同任何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的，所以这些特点能涉及的只是非最主要的方面。”（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4卷第508页）

如果这一切都对，难道不应当由此得出结论说，季诺维也夫给列宁主义所下的定义不能认为是正确的吗？

这种带有民族局限性的列宁主义定义怎能和国际主义相容呢？

二

列宁主义的主要问题

在《论列宁主义基础》那本小册子里说：

“有人以为列宁主义中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以为列宁主义的出发点是关于农民及其作用和比重的问題。这是完全不对的。列宁主义中的基本问

黑体是我用的。——约·斯大林注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678页。——编者注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179页。——编者注

同上，第85页。——编者注

题,列宁主义的出发点,并不是农民问题,而是无产阶级专政、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等问题。农民问题,即无产阶级在为政权而斗争中的同盟者问题,是一个派生的问题。”

这个论点是否正确呢?

我以为是正确的。这个论点完全是从列宁主义定义中得出来的。的确,既然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 and 策略,而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内容又是无产阶级专政,那么列宁主义的主要问题当然就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就是阐明这个问题,就是论证这个问题并把它具体化。

可是,看来季诺维也夫是不同意这个论点的。他在《纪念列宁》一文里说:

“我已经说过,农民的作用问题是布尔什维主义即列宁主义的基本问题。”

可见季诺维也夫的这个论点完全是从他给列宁主义所下的不正确的定义中得出来的。因此,这个论点也和他给列宁主义所下的定义一样,是不正确的。

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内容”(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3卷第337页),这个论点是否正确呢?无疑是正确的。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 and 策略,这个论点是否正确呢?我以为是正确的。那么由此应当得出什么结论呢?由此应当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列宁主义的基本问题,列宁主义的出发点,列宁主义的根基,就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

帝国主义问题,帝国主义发展的跳跃性问题,社会主义在一个

见本卷第225—226页。——编者注

黑体是我用的。——约·斯大林注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618—619页。——编者注

国家内胜利问题,无产阶级国家问题,这个国家的苏维埃形式问题,党在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作用问题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途径问题,——这些问题正是列宁都给阐明了的,这难道不对吗?正是这些问题构成了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基础、根基,这难道不对吗?不阐明这些基本问题,就不可能从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上去阐明农民问题,这难道不对吗?

不用说,列宁是位精通农民问题的人。不用说,农民问题,即无产阶级的同盟者问题,对于无产阶级有极重要的意义,并且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基本问题的组成部分。可是,如果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基本问题不曾摆在列宁主义面前,就不会有无产阶级的同盟者这个派生问题,即农民问题,这难道不明白吗?如果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这个实践问题不曾摆在列宁主义面前,就不会有和农民联盟的问题,这难道不明白吗?

如果列宁不是以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为基础,而是抛开这个基础、站在这个基础以外来阐明农民问题,那他就不会是一位最伟大的无产阶级思想家,象他确实是的那样,而只会是一个平凡的“农民哲学家”,象国外那些庸俗文人时常把他描绘的那样。

二者必居其一:

或者农民问题是列宁主义中的主要问题,那么,列宁主义对于那些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对于那些非农民的国家,就是不适用的,就是不必要的;

或者无产阶级专政是列宁主义中的主要问题,那么,列宁主义就是世界各国无产者的国际学说,对于世界各国——其中也包括那些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毫无例外地都是适用而且是必要的学说。

这里必须加以选择。

三

关于“不断”革命问题

在《论列宁主义基础》那本小册子里认为“不断革命论”是对农民作用估计过低的“理论”。那里面说：

“可见列宁和那些‘不断’革命论者作斗争并不是由于不断性问题，因为列宁自己就是主张不断革命的，而是由于他们过低估计了农民这一无产阶级最大后备军的作用。”

对俄国“不断论者”的这个评语直到最近都是大家所公认的。这个评语虽然总的说来是正确的，但还不能认为是详尽无遗的。1924年的争论以及对列宁著作的详细分析，都已表明俄国“不断论者”的错误不仅在于他们过低估计农民的作用，而且在于他们过低估计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的力量和本领，在于他们不相信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

因此，我在《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1924年12月）那本小册子里又对这个评语加以补充，并且代之以另一个比较完全的评语。在那本小册子里是这样说的：

“直到现在，通常都只指出‘不断革命’论的一方面——不相信农民运动具有革命能力。现在为了公允起见，除这一方面以外还须补充以另一方面——不相信俄国无产阶级有力量和有本领。”

这当然不是说列宁主义过去反对或者现在反对马克思在十九

见本卷第210页。——编者注

同上，第291页。——编者注

世纪四十年代所提出的那个没有带引号的不断革命的思想。恰恰相反,列宁是唯一正确了解并发展了不断革命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列宁和“不断论者”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不断论者”曲解了马克思的不断革命思想,把它变成了毫无生气的书本上的玄谈,列宁则接受了原原本本的不断革命思想并把它变成自己的革命理论基础之一。必须记着,列宁远在1905年就已提出的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就是马克思不断革命论的一个具体表现形式。请看列宁远在1905年关于这一点所写的一段话:

“我们将立刻由民主革命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并且恰恰是按照我们的力量,按照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开始过渡。我们主张不断革命。我们决不半途而废。……

我们决不陷于冒险主义,决不违背自己的科学良心,决不追求廉价的声音,我们能够说的而且要说的只有一点:我们将用全部力量去帮助全体农民实现民主革命,从而使我们的党更容易尽快地过渡到新的更高的任务即社会主义革命。”(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8卷第186—187页)

再看,经过了十六年,即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列宁对于这一问题是怎样写的:

“考茨基、希法亭、马尔托夫、切尔诺夫、希尔奎特、龙格、麦克唐纳、屠拉梯之流以及‘第二半’¹⁰⁸的马克思主义的其他英雄们,都不能了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相互关系。前一革命可以转变为后一革命。后一革命可以顺便解决前一革命的问题。后一革命可以巩固前

见马克思和恩格斯《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81—392页)。——编者注

黑体是我用的。——约·斯大林注

参看《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634页和第635页。——编者注

黑体是我用的。——约·斯大林注

一革命的事业。斗争,只有斗争,才能决定后一革命能够超过前一革命到什么程度。”(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7卷第26页)

请特别注意前一段话,这一段话是从列宁1905年9月1日发表的《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一文中引来的。我着重指出这一点是要一些人注意,因为他们直到现在还硬说列宁只是在帝国主义战争以后才有了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即不断革命的思想。这一段话毫无疑义地说明这些人是**大错而特错了**。

四

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革命不同于资产阶级革命的特征是什么呢?

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可以归结为下列主要的五点:

(1)资产阶级革命通常是在资本主义结构较为现成的形式已经具备时开始发生的,这种形式在公开革命以前就已在封建社会内部生长并成熟了;无产阶级革命却是在社会主义结构现成的形式没有具备或几乎没有具备时开始发生的。

(2)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任务是夺取政权,并使政权适合于已有的资产阶级的经济;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任务却是在夺取政权以后建设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

(3)资产阶级革命通常是以夺取政权来完成的;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却只是革命的开始,并且政权是用作改造旧经济和

组织新经济的杠杆。

(4)资产阶级革命只限于以一个剥削集团代替另一个剥削集团去执掌政权,所以它无须摧毁旧的国家机器;无产阶级革命却要把一切剥削集团都从政权上推下去,并使全体被剥削劳动者的领袖即无产阶级去执掌政权,所以它不能不摧毁旧的国家机器而代之以新的国家机器。

(5)资产阶级革命不能把千百万被剥削劳动群众稍微长期地团结在资产阶级的周围,正因为这些群众是被剥削劳动者;而无产阶级革命要完成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并建成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这个基本任务,却能够而且必须使被剥削劳动群众跟无产阶级结成长期的联盟,正因为这些群众是被剥削劳动者。

请看列宁关于这个问题的几个基本原理吧:

列宁说:“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区别之一就在于:对于从封建制度中生长起来的资产阶级革命来说,还在旧制度内部,新的经济组织就逐渐形成起来,它逐渐改变着封建社会的一切方面。资产阶级革命面前只有一个任务,就是扫除、屏弃并破坏旧社会的一切桎梏。任何资产阶级革命完成了这个任务,也就是完成了它所应做的一切:它加强资本主义的发展。

社会主义革命却处在完全另外一种情况中。由于历史进程的曲折而不得不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那个国家愈落后,它由旧的资本主义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关系就愈困难。这里除破坏任务以外,还加上一些空前困难的新任务,即组织任务。”(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2卷第315页)

列宁继续说:“如果那种经历了1905年伟大试验的俄国革命的人民创造力,不是早在1917年2月间就建立了苏维埃,那么苏维埃在10月间无论如何也不能夺得政权,因为当时的成功全靠那包括千百万群众的运动已经有了现成的组织形式。苏维埃就是这种现成的形式,因此,我们在政治方面就能预期我们后来所经历的那些辉煌成就和不断的胜利进军,因为新政权形式已经

预备好了,我们只须颁布几道法令把苏维埃政权从它在革命最初几月间所处的胚胎状态变成在俄罗斯国家内所奠定的法定形式,即变成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就行。”(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2卷第315页)

列宁说:“还剩下两个非常困难的任务,而这两个任务无论如何不能用我们革命在最初几月间所经历的那种胜利进军的方式来解决。”(同上,第315页)

“第一,就是摆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面前的内部组织任务。社会主义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就在于:在资产阶级革命时,现成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形式已经具备了;而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政权,却没有这种现成关系,有的仅是那些实际上包括一小部分上层工业而很少触及农业的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形式。组织计算工作,监督各大企业,把全部国家经济机构变成一整架大机器,变成一个使几万人都遵照一个计划工作的经济机体,——这就是放在我们肩上的巨大组织任务。根据目前劳动条件,这个任务无论如何不容许象我们从前解决国内战争任务那样用高呼‘乌拉’的方式来解决。”(同上,第316页)

“……第二个极大的困难即国际问题……如果我们很容易地战胜了克伦斯基匪帮,如果我们很容易地在本国建立了政权,如果我们毫不费力地实施了土地社会化和工人监督的法令,——如果我们很容易地获得了这一切,那只是因为当时侥幸凑成的条件使我们在一个短时间内免受国际帝国主义的侵害。国际帝国主义拥有极雄厚的资本,拥有组织得极其完备而成为国际资本真正实力和真正堡垒的军事技术,无论如何,无论在什么条件下,无论按国际帝国主义的客观地位来说,或按它所体现的那个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来说,它都不能和苏维埃共和国和睦相处,——其所以不能,在于贸易关系,在于国际金融关系。在这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在这里,俄国革命最大的困难,最大的历史课题就是:必须解决国际问题,必须唤起国际革命。”(见《列宁全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454—455页。——编者注

同上,第455页。——编者注

同上。——编者注

集》俄文第3版第22卷第317页)

无产阶级革命的内在性质和基本意义就是如此。

没有暴力革命,没有无产阶级专政,能不能对资产阶级旧制度进行根本的改造呢?

显然是不能的。如果以为可以在适合于资产阶级统治的资产阶级民主制范围内,用和平方式来进行这样的革命,那不是精神错乱,神经失常,就是公然无耻地背叛无产阶级革命。

必须特别着重特别坚决指出这个论点,因为无产阶级革命暂时还只是在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个国家被那些仇视它的资本主义国家所包围,而且国际资本又不会不帮助这个国家里的资产阶级。

正因为如此,列宁说:

“被压迫阶级要求得解放,不仅非进行暴力革命不可,而且非消灭统治阶级所建立的……国家政权机构不可。”(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1卷第373页)

“那些自称为‘社会主义者’而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奴仆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说:‘首先要使大多数居民,在保存私有制的情形下,即在保存资本政权和资本压迫的情形下,表示拥护无产阶级政党,——只有那时,无产阶级政党才能并且应当夺取政权。’”(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4卷第647页)

“我们说:‘首先要使革命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摧毁资本压迫,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构,——那时获得了胜利的无产阶级才能靠剥夺剥削者来满足大多数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需要,才能迅速博得这些群众的同情和拥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456—457页。——编者注

同上,第177页。——编者注

黑体是我用的。——约·斯大林注

参看《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136页。——编者注

护。’”(同上)

列宁继续说：“无产阶级为要把大多数居民争取到自己方面来，第一，应当推翻资产阶级，把国家政权夺到自己手里；第二，应当粉碎旧的国家机构，建立苏维埃政权，这样一举而摧毁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妥协派在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中间的统治、威信和影响；第三，应当用革命手段、靠剥夺得剥削者来满足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经济需要，以彻底铲除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妥协派在大多数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中间的影响。”(同上，第 641 页)

无产阶级革命的特征就是如此。

因此，既然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内容，那么，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特点又是什么呢？

请看列宁给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最概括的定义吧：

“无产阶级专政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而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式中的继续。无产阶级专政是取得胜利、夺得政权的无产阶级，对已被打败但还没有被消灭、没有绝迹、没有停止反抗、反而加紧反抗的资产阶级进行的阶级斗争。”(见《列宁全集》俄文第 3 版第 24 卷第 311 页)

列宁反对把无产阶级专政同“全民的”“普选的”政权，同“非阶级的”政权混为一谈。他说：

“那个夺得了政治统治的阶级，是在意识到它是独自夺取政治统治时夺得了这个统治的。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概念的内容。只有当一个阶级知道它是独自夺取政权而不用什么‘全民的、普选的、全民视为神圣的’政权的空话来自欺欺人的时候，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概念才有意义。”(见《列宁全集》俄文第 3 版第 26 卷第 286 页)

见《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4 卷第 129 页。——编者注

参看《列宁全集》第 29 卷第 343 页。——编者注

黑体是我用的。——约·斯大林注

见《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4 卷第 488 页。——编者注

但这并不是说,一个阶级的政权,即不和而且不能和其他阶级分掌政权的无产阶级的政权,不需要其他阶级被剥削劳动群众的帮助,不需要和这些群众结成联盟就能实现自己的目的。恰恰相反,这个政权,一个阶级的政权,只有通过无产阶级和各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首先是和农民劳动群众结成的特种形式的联盟,才能确立并贯彻到底。

这个特种形式的联盟究竟是什么呢?它的内容是什么呢?这个和其他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联盟是否和一个阶级专政的思想相矛盾呢?

这个特种形式的联盟的内容就是:这个联盟的领导力量是无产阶级。这个特种形式的联盟的内容就是:国家的领导者,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领导者是一个党,即无产阶级的党,即共产党,这个党决不而且也不能和其他政党分掌领导。

可见这里的矛盾只是表面上的,外表上的。

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是劳动者的先锋队——无产阶级同人数众多的非无产阶级的劳动阶层(小资产阶级、小业主、农民、知识分子等等)或同他们的大多数结成的特种形式的阶级联盟,是反资本的联盟,是为彻底推翻资本、彻底镇压资产阶级反抗并完全粉碎其复辟企图而成立的联盟,是为最终建立并巩固社会主义而成立的联盟。这是在特殊环境中,即在激烈的内战环境中形成的特种联盟,这是社会主义的坚定的拥护者和它的动摇的同盟者有时则是和‘中立者’的联盟(那时,联盟就由斗争协定变为中立协定),这是在经济、政治、社会地位、精神各方面互不相同的阶级的联盟。”(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4卷第311页)

加米涅夫在他的一个指示性的报告中反对这样了解无产阶级专政。他说:

黑体是我用的。——约·斯大林注

参看《列宁全集》第29卷第343—344页。——编者注

“专政并不是一个阶级同其他阶级的联盟。”

我想,加米涅夫在这里首先是针对我的《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那本小册子里的一段话而说的。这段话如下:

“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老练的战略家’用心地‘巧妙地’挑选出来’并‘合理地依靠’某些居民阶层的普通政府的上层机关。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群众在以无产阶级为领导力量的条件下,为推翻资本和取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而结成的阶级联盟。”

我完全坚持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表述,因为我认为它和刚才所引证的列宁的表述完全相符。

我断定:加米涅夫的“专政并不是一个阶级同其他阶级的联盟”这种武断说法是和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毫无共同之点的。

我断定:只有不懂结合的思想、无产阶级和农民联盟的思想、无产阶级在这个联盟中的领导权的思想的意义的人才会这样说。

只有不懂列宁的下面这个论点的人才会这样说。这个论点就是:

“在其他国家的革命还没有到来时,只有同农民协议,才能拯救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6卷第238页)

只有不懂列宁的下面这个原理的人才会这样说。这个原理就是:

“专政的最高原则^{就是}维护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盟,使无产阶级能够保持领导作用和国家政权。”(同上,第460页)

列宁指出专政最重要的目的之一是镇压剥削者。他说:

黑体是我用的。——约·斯大林注

见本卷第280页。——编者注

见《列宁全集》第32卷第204页。——编者注

同上,第477页。——编者注

“专政的科学概念无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不受任何法律或规章约束而直接凭借暴力的政权。”(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5卷第441页)

“专政就是(请立宪民主党人⁵⁴先生们永远记着)不受限制的、凭借暴力而不是凭借法律的政权。在国内战争时期,任何获得了胜利的政权都只有实行专政。”(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5卷第436页)

固然没有暴力就不会有专政,但无产阶级专政当然不只限于暴力。

列宁说:“专政固然非有暴力不可,但它不只是暴力,而且是比先前的组织更高级的劳动组织。”(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4卷第305页)

“……无产阶级专政不只是对剥削者使用的暴力,甚至主要的不是暴力。这种革命暴力的经济基础,它富有生命力和必获胜利的保证,在于无产阶级代表着并实现着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劳动组织。实质就在这里。共产主义力量的泉源和必获全胜的保证就在这里。”(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4卷第335—336页)

“它即专政。——约·斯大林注的主要实质在于劳动者的先进部队、先锋队、唯一领导者即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无产阶级的目的是建立社会主义,消灭社会的阶级划分,使社会全体成员成为劳动者,消灭一切人剥削人的制度的基础。这个目的不是一下子可以实现的,这需要一个相当长的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因为改组生产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根本改变生活的一切方面是需要时间的,因为按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方式经营的巨大的习惯力量只有经过长期的坚韧的斗争才能克服。所以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时期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同上,第314页)

见《列宁全集》第31卷第318页。——编者注

同上,第311页。——编者注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852页。——编者注

同上,第4卷第9页。——编者注

同上,第3卷第857页。——编者注

无产阶级专政的特征就是如此。

因此,无产阶级专政有三个主要方面:

(1)利用无产阶级政权来镇压剥削者,保卫国家,巩固和其他各国无产者之间的联系,促进世界各国革命的发展和胜利。

(2)利用无产阶级政权来使被剥削劳动群众完全脱离资产阶级,巩固无产阶级和这些群众的联盟,吸引这些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保证无产阶级对这些群众实行国家领导。

(3)利用无产阶级政权来组织社会主义,消灭阶级,过渡到无阶级的社会,即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

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所有这三方面的结合。其中无论哪一方面都不能提出来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唯一特征,反之,只要缺少其中一个特征,就足以使处在资本主义包围环境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不成其为专政。因此,无论除去这三方面中的哪一方面,都不免有曲解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的危险。只有把所有这三方面综合起来,我们才能得到一个完整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

无产阶级专政有其各个时期、各种特别形式和各种不同的工作方法。在国内战争时期最明显的是专政的暴力方面。可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在国内战争时期不进行任何建设工作。不进行建设工作就无法进行国内战争。反之,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最明显的是专政的和平工作、组织工作、文化工作、革命法制等等。可是同样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在建设时期专政的暴力方面已经消失或可以消失。现在,在建设时期中,也象在国内战争时期一样,镇压机关、军队和其他组织都是必要的。没有这些机关,专政就不可能稍微有保证地进行建设工作。不应忘记,革命暂时还只是在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不应忘记,既然还有资本主义包围,也就有武装干涉的危险以及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五 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党和工人阶级

上面我已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必然性的观点,从其阶级内容的观点,从其国家性质的观点,最后从其在整个历史时期内即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所谓过渡时期内所执行的破坏任务和创造任务的观点说明了无产阶级专政。

现在我们需要从无产阶级专政的结构观点,从其“机构”的观点,从“传动装置”、“杠杆”和“指导力量”的作用和意义的观点来说明无产阶级专政,这种“传动装置”、“杠杆”和“指导力量”综合起来就构成“无产阶级专政体系”(列宁),而且无产阶级专政的日常工作就是依靠这些东西来实现的。

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这种“传动装置”或“杠杆”是什么呢?这种“指导力量”是什么呢?为什么需要这些东西呢?

杠杆或传动装置就是无产阶级的最广泛的群众组织,不依靠这些组织就无法实现专政。

指导力量就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就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领导力量。

这些传动装置、这些杠杆和这种指导力量是无产阶级所必需的,因为没有它们,无产阶级在其争取胜利的斗争中,在有组织有武装的资本面前,就会成为手无寸铁的军队。这些组织是无产阶级所必需的,因为没有这些组织,无产阶级在其推翻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在其巩固自己政权的斗争中,在其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就必然要遭到失败。这些组织的经常帮助和先锋队的指导力量是必

要的,因为没有这些条件,就不可能有稍微长期而巩固的无产阶级专政。

这些组织是什么呢?

第一,就是工会及其在中央和地方的支脉,即许许多多生产的、文化的、教育的和其他的组织。它们把各行各业的工人都联合起来。这是非党的组织。工会可以称为我国统治阶级即工人阶级全体成员的组织。工会是共产主义的学校。工会从自己队伍中选拔出优秀分子来担任一切管理部门的领导工作。工会把工人阶级中的先进分子和落后分子联系起来。工会把工人群众和工人阶级先锋队联结起来。

第二,就是苏维埃及其在中央和地方的许许多多的支脉,即行政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和其他的国家组织,再加上无数自动组织起来的、环绕着这些组织并把这些组织和居民联结起来的劳动者的群众团体。苏维埃是全体城乡劳动者的群众组织。这是非党的组织。苏维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直接表现。所有一切巩固专政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措施都通过苏维埃来实现。无产阶级对农民的国家领导是通过苏维埃来实现的。苏维埃把千百万劳动群众同无产阶级先锋队联结起来。

第三,就是各种合作社及其所有支脉。这是劳动者的群众组织,是非党的组织。合作社首先把劳动者作为消费者联合起来,然后把他们作为生产者联合起来(农业合作社)。在无产阶级专政巩固以后,在广泛的建设时期,合作社具有特别的意义。合作社使无产阶级先锋队便于同农民群众联系,并为把农民群众引上社会主义建设轨道创造条件。

第四,就是青年团。这是工农青年的群众组织,是非党的组织,但它是靠近党的。它的任务是帮助党以社会主义精神教育青年一

代。它以青年后备军供给一切管理部门中的所有其他无产阶级群众组织。在无产阶级专政巩固以后,在无产阶级进行广泛的文化教育工作时期,青年团具有特别的意义。

最后,就是无产阶级的党,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党的力量在于它从无产阶级一切群众组织中把无产阶级所有优秀分子都吸收到自己队伍中来。党的使命是把无产阶级一切群众组织的工作毫无例外地统一起来,并把它们的行动引向一个目标,引向无产阶级解放的目标。把它们统一起来并引向一个目标是绝对必要的,因为不这样就无法统一无产阶级的斗争,因为不这样就无法领导无产阶级群众去为政权而斗争,去为社会主义建设而斗争。可是能够统一并指导无产阶级群众组织的工作的,只有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的党。只有无产阶级的党,只有共产党,才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起这种主要领导者的作用。

为什么呢?

“第一,因为党是工人阶级优秀分子的集合点,这些分子和无产阶级的非党组织有直接联系,并经常领导它们;第二,因为党既是工人阶级优秀分子的集合点,所以它是培养能够领导本阶级各种组织的工人阶级领导者的最好的学校;第三,因为党既是培养工人阶级领导者的最好的学校,所以按其经验和威信来说,它是能把无产阶级斗争的领导集中起来的唯一组织,因而也就是能把工人阶级所有一切非党组织都变成使党同本阶级联结起来的服务机关和引带的唯一组织。”(见《论列宁主义基础》)

党是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主要领导力量。

“党是无产阶级阶级联合的最高形式。”(列宁)

总之,工会是无产阶级的群众组织,它首先在生产方面把党同

本阶级联系起来,苏维埃是劳动者的群众组织,它首先在国家事务方面把党同劳动者联系起来;合作社主要是农民的群众组织,它首先在经济方面,在吸引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把党同农民群众联系起来,青年团是工农青年的群众组织,它的使命就是帮助无产阶级先锋队对新一代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并培养青年后备军;最后,党是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主要指导力量,它的使命是领导这一切群众组织,——大体说来,专政“机构”的情况,“无产阶级专政体系”的情况就是如此。

没有党这个主要领导力量,就不可能有稍微长期而巩固的无产阶级专政。

这样,用列宁的话来说:“总之,这是一个形式上非共产党的、灵活的、比较广泛的、极为强大的无产阶级机构,党就是通过这个机构同本阶级和群众取得密切联系的;阶级专政便是在党的领导下通过这个机构来实现的。”(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5卷第192页)

这一点当然不能了解为党能够或应当代替工会、苏维埃以及其他群众组织。党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但它并不是直接实现这种专政,而是借助于工会,通过苏维埃及其支脉来实现这个专政的。没有这些“传动装置”,就不能有稍微巩固的专政。

列宁说:“没有一些把先锋队和先进阶级群众、把它和劳动群众连结起来的‘传动装置’,就不能实现专政。”(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6卷第65页)

“可以说党是把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吸收到自己队伍中来的,而这个先锋队就实现着无产阶级专政。没有工会这样的基础,就不能实现专政,就不能执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204页。——编者注
同上,第404页。——编者注

行国家职能。而要实现这些职能,就必须通过一系列的也是新型的特别机关,即通过苏维埃机关。”(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6卷第64页)

例如在我们苏联,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我们的苏维埃组织和其他群众组织,没有党的原则性指示,就不会决定任何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这个事实应当认为是党的领导作用的最高表现。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的“专政”,是它的党即无产阶级的主要领导力量的“专政”。请看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¹⁰⁹上如何说明这一点:

“坦纳说他赞成无产阶级专政,但是,他所想象的无产阶级专政和我们所想象的不完全一样。他说我们所了解的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只是无产阶级中有组织和有觉悟的少数人的专政。

的确,在资本主义时代,在工人群众不断遭受剥削而不能发展人的才能的时代,工人政党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只能包括本阶级的少数。政党所能联合的只是本阶级的少数,因为在任何资本主义社会里,真正觉悟的工人都只占全体工人的少数。所以我们必须承认,只有这觉悟的少数才能领导广大工人群众,引导他们前进。如果坦纳同志说他是政党的敌人,同时又主张由少数最有组织最革命的工人给整个无产阶级指出道路,那我以为,我们之间实际上并没有分歧。”(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5卷第347页)

然而这一点不应了解为在无产阶级专政和党的领导作用(党“专政”)之间可以划等号,可以把前者和后者等同起来,可以用后者代替前者。例如索凌就说过“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我们党专政”。显然,这个论点是把“党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等同起来。如果站在列宁主义的立场上,是不是可以认为这种等同的看法是正确的呢?

黑体是我用的。——约·斯大林注

参看《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403—404页。——编者注

参看《列宁全集》第31卷第206页。——编者注

不,不可以。原因就是:

第一,上面从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演说中引来的那一段话里,列宁根本没有把党的领导作用和无产阶级专政等同起来。他只是说,“只有觉悟的少数即党。——约·斯大林注才能领导广大工人群众,引导他们前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所了解的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只是无产阶级中有组织和有觉悟的少数人的专政”。

说“实质上”,这还不等于说“完全”。我们往往说民族问题实质上是农民问题。这是完全正确的。但这还不等于说:农民问题可以代替民族问题,农民问题按内容来说和民族问题相等,农民问题和民族问题是一个东西。无须证明,民族问题按内容来说比农民问题更广泛,更丰富。同样,关于党的领导作用和无产阶级专政也应该这样说。如果说党实现着无产阶级专政,而在这个意义上,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党“专政”,那么这还不等于说:“党专政”(领导作用)和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东西,前者按内容来说和后者相等。无须证明,无产阶级专政按内容来说比党的领导作用更广泛,更丰富。党实现着无产阶级专政,但它是实现着无产阶级专政,而不是别的什么专政。谁把党的领导作用和无产阶级专政等同起来,谁就是以党“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

第二,无产阶级群众组织的任何一个重要决定都非有党的原则性指示不可。这是完全正确的。但这是不是说无产阶级专政仅仅是党的原则性指示呢?这是不是说因此就可以把党的原则性指示和无产阶级专政等同起来呢?当然不是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党的原则性指示加上无产阶级群众组织对这些指示的实行,再加上居民对这些指示的实行。由此可见,这里有一系列的过渡和中间阶

段,这些过渡和中间阶段构成无产阶级专政远非不重要的因素。可见在党的原则性指示和这些指示的实施之间存在着被领导者的意志和行动,阶级的意志和行动,以及它是否准备(或不愿)拥护这些指示,是否善于实行这些指示是否善于完全依照环境的要求来实行这些指示等等情况。未必用得着证明:负有领导责任的党不能不考虑被领导者的意志、情绪和觉悟程度,不能不顾阶级的意志、情绪和觉悟程度。因此,谁把党的领导作用和无产阶级专政等同起来,谁就是以党的指示代替阶级的意志和行动。

第三,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是取得胜利、夺得政权的无产阶级进行的阶级斗争。”(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4卷第311页)这种阶级斗争会怎样表现呢?它会表现为无产阶级以一系列的武装行动去反对那被推翻了的资产阶级的袭击或外国资产阶级的武装干涉。在无产阶级政权尚未巩固时,它会表现为国内战争。在政权已经巩固后,它会表现为无产阶级进行广泛的组织工作和建设工作,并吸引广大群众参加工作。在所有这些场合,活动者都是无产阶级这个阶级。党,仅仅一个党,没有本阶级支持而单靠自身的力量来进行所有这些活动,是从来没有的。党通常只是领导这些活动,而且领导得如何,要看本阶级支持得如何。因为党不能包括、不能代替阶级。因为无论党有怎样重要的领导作用,它毕竟是阶级的一部分。因此,谁把党的领导作用和无产阶级专政等同起来,谁就是以党代替阶级。

第四,党实现着无产阶级专政。“党呢,党是无产阶级的直接执政的先锋队,是领导者。”(列宁)在这个意义上党掌握政权,党管理国家。然而不能把这一点了解为党是越过国家政权,不要国家政

参看《列宁全集》第29卷第343页。——编者注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457页。——编者注

权而实现着无产阶级专政的,不能了解为党是越过苏维埃,不通过苏维埃而管理国家的。这还不是说,可以把党和苏维埃,把党和国家政权等同起来。党是政权的**核心**。但它和国家政权不是而且不能是一个东西。

列宁说:“我们是执政党,所以我们不能不把苏维埃的‘上层’和党的‘上层’融成一体,现在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6卷第208页)这是完全正确的。可是,列宁决不是想借此说我们所有**一切苏维埃机关**,例如我们的军队,我们的运输机关,我们的经济机关等等,都是我们党的机关,党可以代替苏维埃及其支脉,可以把党和国家政权等同起来。列宁屡次说“苏维埃制度即无产阶级专政”,“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专政”(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4卷第15页和第14页);但他从来没有说党是国家政权,苏维埃和党是一个东西。拥有数十万党员的党领导着包括千百万人——党员和非党员——的苏维埃及其在中央和地方的支脉,但党不能够而且不应当以自己代替它们。因此,列宁说:“专政是由组织在苏维埃中的、受布尔什维克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实现的”,“党的全部工作……都是通过不分职业而把劳动群众团结在一起的苏维埃来进行的”(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5卷第192页和第193页),专政是“必须……通过苏维埃机关”来“实现”的(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6卷第64页)。

因此,谁把党的领导作用和无产阶级专政等同起来,谁就是以

见《列宁全集》第32卷第166页。——编者注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726页和第724页。——编者注

黑体是我用的。——约·斯大林注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203页和第204页。——编者注

同上,第403—404页。——编者注

党代替苏维埃即代替国家政权。

第五,无产阶级专政概念是个国家概念。无产阶级专政本身一定包含暴力概念。如果按专政这个名词的本义来了解,那么没有暴力就不会有专政。列宁给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定义,就是“直接凭借暴力的政权”(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19卷第315页)。因此,谈论对无产者阶级来说的党的专政,而且把这种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等同起来,那就等于说党不仅应当是本阶级的领导者、领袖和导师,而且应当是对本阶级使用暴力的一种独裁者,这种说法当然是根本不正确的。因此,谁把“党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等同起来,谁就是默认可以把党的威信建筑在对工人阶级使用暴力的基础上,而这种想法是荒谬绝伦的,是和列宁主义完全不相容的。党的威信是由工人阶级的信任来维持的。工人阶级的信任却不是用暴力所能取得的(用暴力只能丧失工人阶级的信任),而是要靠党的正确理论,要靠党的正确政策,要靠党对工人阶级的忠诚,要靠党和工人阶级群众的联系,要靠党有决心和本领说服群众相信它的口号的正确,才可以取得的。

由此应该得出什么结论呢?

由此应该得出的结论是:

(1)列宁使用党专政这个词并不是指专政这个词的本义(“凭借暴力的政权”)而言,而是指其转义而言,即指党独掌领导而言;

(2)谁把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等同起来,谁就是曲解列宁的意思,就是错误地给党加上对整个工人阶级使用暴力的职能;

(3)谁给党加上这种党本来所没有的对整个工人阶级使用暴力的职能,谁就是违背了先锋队和阶级之间、党和无产阶级之间正

确的相互关系的起码要求。

这样,我们就直接接触到党和阶级的相互关系问题,工人阶级中的党员和非党员的相互关系问题了。

按列宁所下的定义,这种相互关系就是“工人阶级先锋队 and 工人群众之间的……相互信任”(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6卷第235页)。

这是什么意思呢?

第一,这就是说,党应当倾听群众的意见,应当重视群众的革命本能,应当研究群众的斗争实践,并根据这些来检查自己政策的正确性,所以它不仅应当教导群众,而且应当向群众学习。

第二,这就是说,党应当每日每天去取得无产阶级群众的信任,应当以自己的政策和工作博得群众的拥护,党不应当命令群众,而首先应当说服群众,使群众易于根据本身经验来认识党的政策的正确,所以它应当是本阶级的领导者、领袖和导师。

违背这些条件就是破坏先锋队 and 阶级之间的正确的相互关系,就是损害“相互信任”,就是既破坏阶级纪律,又破坏党的纪律。

列宁说:“现在差不多每个人都已看到,如果我们党没有极严格的真正铁的纪律,如果我们党没有得到工人阶级全体群众全心全意的拥护,也就是说,没有得到工人阶级中所有能思考、诚实、有自我牺牲精神、有威信并且能带领或吸引落后阶层的人的全心全意的拥护,那么布尔什维克别说把政权保持两年半,就是两个半月也保持不住。”(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5卷第173页)

列宁继续说:“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

黑体是我用的。——约·斯大林注

见《列宁全集》第32卷第200页。——编者注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180—181页。——编者注

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没有铁一般的和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为本阶级全体忠实的人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5卷第190页)

可是,党是怎样取得阶级的这种信任和拥护的呢?无产阶级专政所需要的工人阶级内部的铁的纪律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呢?它是在什么基础上成长的呢?

请看列宁是怎样说明这一点的:

“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纪律是靠什么来维持的,是靠什么来检验的,是靠什么来加强的?第一,是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它对革命的忠诚,它的坚韧性、自我牺牲精神和英雄气概。第二,是靠它善于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首先是同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但同样也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联系、接近,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同他们打成一片。第三,是靠这个先锋队所实行的政治领导正确,靠它的政治战略和策略正确,而最广大的群众根据切身经验也确信其正确。没有这些条件,革命政党的纪律,真正能够成为可以推翻资产阶级并且改造整个社会的先进阶级的政党的纪律,是不可能实行的。没有这些条件,建立纪律的企图,就必然会变成空谈,变成废话,变成装模作样。可是另一方面,这些条件又不能一下子产生。只有经过长期的努力和艰苦的实验才能造成这些条件;正确的革命理论,会使这些条件容易造成,而这个理论并不是教条,它只有同真正群众性的和真正革命的运动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才能最终形成。”(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5卷第174页)

其次:

“为了战胜资本主义,在领导的政党共产党、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同群众

黑体是我用的。——约·斯大林注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200页。——编者注

同上,第181—182页。——编者注

即全体被剥削劳动者之间,必须建立正确的相互关系。只有共产党真正成为革命阶级的先锋队,吸收了这个阶级的一切优秀代表,集中了经过顽强的革命斗争的教育和锻炼的、完全觉悟的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善于把自己跟本阶级的全部生活密切联系起来,然后通过本阶级而跟全体被剥削群众密切联系起来,取得这个阶级和这些群众的充分信任,——只有这样的党才能在反对资本主义一切势力的最无情最坚决的最后斗争中领导无产阶级。另一方面,只有在这样的党的领导下,无产阶级才能发挥自己进行革命冲击的全部威力,才能使被资本主义腐蚀的极少数工人贵族、以前的工联领袖和合作社领袖等等必然采取的冷淡态度和部分抵抗不起一点作用,才能发挥自己的全部力量。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这种力量要比无产阶级在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大得不可估量。”(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5卷第315页)

从这些引文就应得出如下的结论：

(1)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党的威信和工人阶级内部的铁的纪律,并不是建筑在对党的恐惧上,也不是建筑在党的“无限”权力上,而是建筑在工人阶级对党的信任上、工人阶级对党的拥护上；

(2)工人阶级对党的信任不是一下子取得的,不是靠对工人阶级使用暴力来取得的,而是靠党在群众中的长期工作,靠党的正确政策,靠党善于使群众根据本身经验来确信党的政策的正确,靠党善于保证自己得到工人阶级的拥护并善于引导工人阶级群众来取得的；

(3)没有以群众斗争经验为基础的正确政策,没有工人阶级的信任,就没有而且不能有党的真正领导；

(4)如果党享有阶级的信任,如果党的领导是真正的领导,那么党及其领导就不可能同无产阶级专政处于对立状态,因为没有工人阶级所信任的党的领导(党“专政”),就不可能有稍微巩固的

黑体是我用的。——约·斯大林注

参看《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295页。——编者注

无产阶级专政。

没有这些条件,党的威信和工人阶级内部的铁的纪律不是空话就是夸大和侥幸。

决不能把无产阶级专政和党的领导(“专政”)对立起来。其所以不能,在于党的领导是无产阶级专政中的主要东西,如果这里指的是稍微巩固的完全的专政,而不是象巴黎公社那样不完全不巩固的专政。其所以不能,在于无产阶级专政和党的领导可以说是处在一条工作路线,按照一个方向行动的。

列宁说:“是党专政还是阶级专政?是领袖专政(领袖的党)还是群众专政(群众的党)?”——单是这种问题的提法就已经证明思想的混乱到了不可思议的无可救药的地步。……谁都知道,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在多数情况下,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把群众专政和领袖专政根本对立起来,实在是荒唐和愚蠢得可笑。”(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5卷第187页和第188页)

这是完全正确的。可是,这个正确的原理所根据的前提是:先锋队 and 工人群众间、党和阶级间有着正确的相互关系。它所根据的假设是:先锋队 and 阶级间的相互关系是正常的,是保持在“相互信任”的范围内的。

可是,如果先锋队和阶级间正确的相互关系被破坏了,如果党和阶级间“相互信任”的关系被破坏了,那又怎么办呢?

如果党本身这样或那样把自己和本阶级对立起来,破坏了自

己和阶级间正确的相互关系的基础 ,破坏了“相互信任”的基础 ,那又怎么办呢 ?

这种情形究竟有没有可能呢 ?

是的 ,是有可能的。

这种情形在以下的场合是可能的 :

(1)如果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不是建筑在它的工作和群众的信任上 ,而是建筑在它的“无限”权力上 ;

(2)如果党的政策显然不正确 ,而党又不愿意重新审查并纠正自己的错误 ;

(3)如果党的政策总的说来是正确的 ,但群众还领会不了它的政策 ,而党又不愿意或不善于等待一下 ,让群众有机会根据本身经验来确信党的政策的正确 ,却企图强迫群众接受它的政策。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过许多次这样的情形。我们党内各种集团和派别所以土崩瓦解和烟消云散 ,就在于它们犯了这三条中的一条 ,有时甚至这三条全犯了。

但是由此应该得出结论 ,把无产阶级专政和党“专政”(领导)对立起来 ,只有在下列场合才不能认为是正确的 :

(1)如果把对工人阶级来说的党的专政不是了解为这个名词的本义的专政(“凭借暴力的政权”) ,而了解为党的领导 ,这种领导决不容许对整个工人阶级、对工人阶级大多数使用暴力 ,列宁正是这样理解的 ;

(2)如果党有条件做阶级的真正领导者 ,就是说 ,如果党的政策是正确的 ,如果这个政策是符合本阶级利益的 ;

(3)如果阶级 ,如果阶级的多数都接受这种政策 ,领会这种政策 ,并由于党的工作而确信这种政策的正确 ,信任党和拥护党。

违背这三条就一定会引起党和阶级的冲突 ,引起它们之间的

分裂,引起它们彼此间的对立。

可以不可以用暴力强迫本阶级接受党的领导呢?不,不可以。无论如何,这样的领导是不会维持长久的。党如果想始终做无产阶级的党,它就应当知道,它首先是并且主要是工人阶级的领导者、领袖和导师。我们不能忘记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关于这个问题所说的一段话:

“马克思主义教育工人的党,也就是教育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使它能够夺取政权并引导全体人民走向社会主义,指导并组织新制度,成为所有被剥削劳动者在不要资产阶级并反对资产阶级而建设自己社会生活的事业中的导师、领导者和领袖。”(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1卷第386页)

如果党的政策不正确,如果党的政策和阶级的利益发生冲突,可以不可以认为党是阶级的真正领导者呢?当然是不可以的。在这种情形下,党如果想仍然做领导者,它就应当重新审查自己的政策,应当改正自己的政策,应当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且纠正这种错误。只要从我们党的历史中援引一事实就可以证明这个原理的正确,例如在废除余粮收集制时期前,工农群众显然不满意我们的政策,当时党就公开而诚恳地重新审查这个政策。请看列宁当时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对于废除余粮收集制而施行新经济政策的问题说了些什么:

“我们不当设法隐瞒什么,而应当爽直地说:农民对于我们和他们之间所建立的这种形式的关系,是不满意的,他们不要这种形式的关系并且不愿意再这样生活下去。这是不容置辩的。他们的这种意志已经明确地表现出来了。这是广大劳动群众的意志。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一点。我们是十分清醒的

黑体是我用的。——约·斯大林注

参看《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192页。——编者注

政治家,所以能够爽直地说:“让我们来重新审查我们对农民的政策吧。”(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6卷第238页)

如果党的政策,比方说,由于本阶级政治上的落后而还没有得到它的信任和拥护,如果党,比方说,由于事件还没有成熟而不能使本阶级确信党的政策的正确,可以不可以认为党只要以自己的政策一般是正确的为理由,就应当负责发起并负责领导组织群众进行决战呢?不,不可以。在这种情形下,党如果想做真正的领导者,就应当善于等待,应当使群众确信党的政策的正确,应当帮助群众根据本身经验来确信这个政策的正确。

列宁说:“如果革命党在各个革命阶级的先进队伍内和在全国范围内没有争得多数,那就说不上什么起义。”(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1卷第282页)

“工人阶级多数人的观点如果不转变过来,革命是不可能的,而这种转变是由群众的政治经验造成的。”(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5卷第221页)

“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思想上已经被争取过来了。这是主要的。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那就连取得胜利的第一步都做不到。可是,这离胜利还很远。单靠先锋队是不能胜利的。当整个阶级,当广大群众还没有采取直接支持先锋队的立场,或者还没有对先锋队采取至少是善意的中立态度并且完全不会去支持先锋队的敌人时,单叫先锋队去进行决战,那就不仅是愚蠢,而且是犯罪。但是要使真正整个阶级,使被资本压迫的真正广大的劳动群众都站到这种立场上来,仅靠宣传和鼓动是不够的。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这些群众本身的政治经验。”(同上,第228页)

黑体是我用的。——约·斯大林注

见《列宁全集》第32卷第204页。——编者注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338—339页。——编者注

同上,第4卷第238页。——编者注

同上,第246—247页。——编者注

大家知道,我们党在 1917 年,从列宁提出四月提纲 110 到十月起义的时期内,正是这样行动的。正因为党依照列宁的这些指示而行动,所以它取得了起义的胜利。

先锋队和阶级间正确的相互关系的条件大体上就是如此。

如果党的政策是正确的,而先锋队和阶级间的正确关系又没有破坏,那么什么是领导呢?

这种条件下的领导就是要善于说服群众,使他们相信党的政策的正确,提出并实行能把群众引到党的立场上并使他们易于根据本身经验认识党的政策的正确的一些口号,把群众提高到党的觉悟水平,这样来保证得到群众的拥护并使他们具有坚决斗争的决心。

因此,说服方法是党领导工人阶级的基本方法。

列宁说:“即使现时在俄国,在我们打败本国资产阶级和协约国资产阶级,取得空前胜利已经两年半的今天,如果我们提出‘承认专政’作为加入工会的条件,那我们也是做蠢事,破坏自己对群众的影响,帮助孟什维克。因为共产党人的全部任务,就是要善于说服落后分子,善于在他们中间进行工作,而不是臆想出一些幼稚的‘左的’口号同他们隔离开来。”(见《列宁全集》俄文第 3 版第 25 卷第 197 页)

这当然不应该理解为党应该说服所有工人,直到最后一个人为止,只有到那时才能着手行动,只有到那时才能开始行动。绝不是这样!这只是说,党在采取决定性的政治行动以前,应当进行长期的革命工作,以保证自己得到多数工人群众的拥护,至少取得本阶级多数的善意的中立。否则,争取工人阶级多数到党方面来是胜利的革命的必要条件这一列宁的原理就毫无意义了。

可是,如果少数不愿意,如果少数不肯自愿服从多数的意志,

那对他们该怎么办呢？党既已得到多数的信任，它是不是可以、是不是应当强制少数服从多数的意志呢？是的，是可以而且应当的。领导是以说服群众的方法（党用以影响群众的基本方法）为保证的。可是，这并不排斥而是预计到要实行强制，只要这种强制有工人阶级多数对党的信任和拥护做基础，只要这种强制是在说服了多数以后对少数使用的。

应当回想一下我们党内工会问题争论时期关于这一点的争执。当时反对派的错误，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 111 的错误在什么地方呢？是不是在于反对派当时认为可以实行强制呢？不是的，不在这里。当时反对派的错误在于他们既不能使多数相信他们的立场的正确，既已丧失多数的信任，却还实行强制，坚持“整刷”那些获得多数信任的人。

请看列宁当时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工会问题的发言中的一段话：

“如果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犯了错误……那么为了建立工人阶级先锋队和工人群众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信任，就必须纠正这个错误。谁要为此错误辩护，那就会造成政治危险。如果我们看到库图佐夫在这里所代表的那种情绪而不采取尽可能的民主办法，那我们就会在政治上遭到破产。我们必须首先说服，然后再强制。我们无论如何必须先说服，然后再强制。我们没有能够说服广大群众，于是就破坏了先锋队和群众间的正确的相互关系。”（见《列宁全集》俄文第 3 版第 26 卷第 235 页）

列宁在他的《论工会》这本小册子里也这样说：

“只有当我们善于先为强制奠定说服的基础的时候，我们才能正确而有

黑体是我用的。——约·斯大林注

见《列宁全集》第 32 卷第 200 页。——编者注

列宁《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的错误》（见《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4 卷第 402—425 页）。——编者注

效地实行强制。”(同上,第74页)

这是完全正确的。因为没有这些条件,任何领导都是不可能的。因为就党来说,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党内行动的一致;就整个阶级来说,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阶级行动的一致。否则,工人阶级的队伍就会分裂、涣散并解体。

党对工人阶级的正确领导的原则大体上就是如此。

对于领导的任何其他见解都是工团主义¹¹²、无政府主义、官僚主义,随便说它是什么都可以,只是不可以说是布尔什维主义,不可以说是列宁主义。

如果在党和工人阶级间,在先锋队和工人群众间存在着正确的相互关系,那就不能把无产阶级专政和党的领导(“专政”)对立起来。但由此就应得出结论:尤其不能把党和工人阶级、把党的领导(“专政”)和工人阶级专政等同起来。索凌根据不能把党“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对立起来这一点做出了不正确的结论:“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我们党专政。”

可是列宁不仅说这种对立是不可容许的,而且说把“群众专政和领袖专政”对立起来也是不可容许的。那不是可以根据这一点就把领袖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等同起来吗?如果我们循着这条道路走去,我们就一定会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我们的领袖们专政”。而把党“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等同起来的政策,实在说,也就是要得出这种糊涂结论的……

季诺维也夫对于这个问题是怎样看的呢?

季诺维也夫实质上 and 索凌持一样的观点——把党“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等同起来,不同的是索凌说得更直爽更明白,而季诺维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416页。——编者注

也夫却在“兜圈子”。只要看看下面季诺维也夫所著《列宁主义》一书中的一段话就可以相信这一点了。

季诺维也夫说：“苏联的现存制度按其阶级内容来看是什么呢？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苏联政权的直接动力是什么呢？谁在行使工人阶级的政权呢？共产党！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这里 是党专政。苏联政权的法律形式是什么呢？十月革命所创立的新型国家制度是什么呢？就是苏维埃制度。二者一点也不矛盾。”

如果把对整个工人阶级来说的党的专政了解为党的领导，那么说二者不相矛盾当然是对的。可是，怎么可以根据这一点就在无产阶级专政和党“专政”间、在苏维埃制度和党“专政”间划等号呢？列宁曾把苏维埃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等同起来，他这种看法是对的，因为苏维埃，我们的苏维埃，是在党的领导下把劳动群众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的组织。可是列宁究竟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在什么著作中，曾在党“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间、在党“专政”和苏维埃制度间划过等号，象现在季诺维也夫所做的那样呢？不仅党的领导（“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不相矛盾，而且领袖的领导（“专政”）也是和无产阶级专政不相矛盾的。那不是可以根据这一点就宣布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也就是党专政的国家，也就是领袖专政的国家吗？而季诺维也夫狡猾地胆小地推行的那个把党“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等同起来的“原则”也就是要得出这种糊涂结论的。

在列宁的大量著作中我只找到五个地方稍许涉及党专政的问题。

第一个地方就是他同社会革命党人 59 和孟什维克的论战。他

在那里说：

“当有人责备我们是一党专政，而提议——象你们所听到的那样——建立社会主义统一战线时，我们就说：“是的，是一党专政，我们所依靠的就是一党专政，而且我们决不能离开这个基地，因为这个党是在几十年内争得了整个工厂无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地位的党。”（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4卷第423页）

第二个地方就是《为战胜高尔察克告工农书》。他在那里说：

“有人（特别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他们全体，甚至其中的“左派”）把布尔什维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当作稻草人来吓唬农民。

从高尔察克的实例中，农民学会不怕稻草人了。

或者是地主资本家专政（即铁的政权），或者是工人阶级专政。”（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4卷第436页）

第三个地方就是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和坦纳论战时的演说。这篇演说我在前面已经引证过了。

第四个地方就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的几行文字。这几行文字在前面已经引证过了。

第五个地方就是载于《列宁文集》第三卷内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大纲的草稿，里面有一个小标题叫作《一党专政》（见《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卷第497页）。

必须指出，在这五个地方当中有两个地方，即最后一个和第二个地方，列宁给“一党专政”这几个字加上了引号，显然是着重指明这个公式含有不确切的转用的意思。

见《列宁全集》第29卷第489—490页。——编者注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68页。——编者注

见本卷第415页。——编者注

同上，第420、421、423、426、427页。——编者注

同样必须指出,列宁在所有这五个地方都把“党专政”了解为对“地主和资本家”的专政(“铁的政权”),而并不是对工人阶级的专政,这和考茨基及其同伙的诬蔑论调恰恰相反。

值得注意的是,列宁在他解释或一般提到无产阶级专政和党在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作用的主要著作和次要著作中,没有一个地方暗示过“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我们党专政”。恰恰相反,这些著作的每页每行都是坚决地反对这种公式的(见《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书)。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论政党的作用的提纲¹¹³中,没有一个字、简直没有一个字说到党专政。这个提纲是在列宁直接领导下制定的,列宁在他的演说中一再地引证过并认为它是正确地规定了党的作用和任务的典范。

所有这些说明什么呢?

就是说明:

(一)列宁并没有认为“党专政”这个公式是无可指摘的、十分精确的公式,所以这个公式在列宁的著作中用得极少,有时还加上引号;

(二)在很少的地方,当列宁和对手论战而不得不说党专政时,他通常说“一党专政”,就是说我们党独掌政权,不和其他政党分掌政权,而且他总是解释说,必须把对工人阶级来说的党的专政了解为党的领导,党的领导作用;

(三)凡是列宁认为需要科学地规定党在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作用时,他只说党对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这种地方有几个);

(四)正因为如此,列宁才没有“想到”要把“党专政”这个公式

写入论党的作用的基本决议中，——我是指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五)从列宁主义的观点来看,那些把党“专政”因而也就是把“领袖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等同起来或企图等同起来的同志是不对的,并且在政治上是近视的,因为他们这样做就违反了先锋队和阶级间正确的相互关系的条件。

至于没有上述附带说明的“党专政”这个公式会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造成许多危险和政治缺点,那就不用说了。单拿这个公式而不加附带说明似乎就是：

(一)向非党群众示意:千万别辩驳,千万别议论,因为党是无所不能的,因为我们这里是党专政；

(二)向党员干部示意:干得大胆些吧,压制得厉害些吧,不倾听非党群众的呼声也是可以的,因为我们这里是党专政；

(三)向党的上层示意:大可以自满自足了,甚至可以骄傲自大了,因为我们这里是党专政,因而“也就是”领袖专政。

正是现在,在群众的政治积极性高涨的时期,提醒对这些危险的注意是很适宜的,因为现在党决心倾听群众的呼声对于我们是有特殊价值的,现在关心群众的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训条,现在党在政策方面必须特别谨慎特别灵活,现在骄傲自大的危险是党在正确领导群众方面所面临的最严重的危险之一。

不可不回想一下列宁在我们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¹¹⁴上所说的金玉良言：

“在人民群众中,我们共产党人。——约·斯大林注 到底是沧海一粟,只有当我们正确地表现人民所意识到的东西时,我们才能管理。否则共产党就不能引导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就不能引导群众,整个机器就要毁坏。”(见

《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7卷第256页)

“正确地表现人民所意识到的东西”，——这正是保证党在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起基本领导力量这一光荣作用的必要条件。

六

关于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问题

在《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年5月第1版)那本小册子里,关于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问题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

“从前认为革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是不可能的,以为要战胜资产阶级就必须要有切先进国家内或至少要有多数先进国家内无产者的共同发动。现在,这个观点已经不合乎实际情形了。现在必须从这种胜利是可能的出发,因为各种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帝国主义环境内发展的不平衡性和跳跃性,帝国主义内部那些必然引起战争的灾难性矛盾的发展,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的增长,——所有这一切都使无产阶级在个别国家内的胜利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见《论列宁主义基础》)

这个原理是完全正确的,而见是无须解释的。这是用来反对社会民主党人的理论的,因为社会民主党人认为:没有在其他各国内同时胜利的革命,无产阶级要在一个国家内夺得政权,那就是空想。

可是在《论列宁主义基础》那本小册子里还有第二种说法。那里说: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651页。——编者注
见本卷第212—213页。——编者注

“可是,在一个国家内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还不等于保证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即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任务尚待解决。没有几个先进国家中无产者的共同努力,能不能解决这个任务,能不能在一个国家内获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呢?不,不能。为了推翻资产阶级,一个国家的努力就够了,这是我国革命的历史给我们说明了的。为了获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为了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单靠一个国家的努力,特别是象俄国这样一个农民国家的努力就不够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中无产者的共同努力。”(见《论列宁主义基础》第1版)

这第二种说法是用来反对那些批评列宁主义的人的武断的,是用来反对托洛茨基分子的,因为他们宣称:当其他国家没有胜利时,一个国家内的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得住脚”。

就这一点而论(但只是就这一点而论),这种说法在当时(1924年5月)是足够的,而且无疑地是有过一定好处的。

可是后来,当列宁主义在这方面所受的批评在党内已被克服时,当眼前已摆着一个新问题即没有外援而可能用我国的力量来建成完全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时,第二种说法显然就有缺点了,因而也就不正确了。

这种说法的缺点在哪里呢?

缺点就在于它把两个不同的问题连接成一个问题:第一个是可能用一个国家的力量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应当给以肯定的回答;另一个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否可以认为它无须革命在其他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就有免除武装干涉、因而免除旧制度复辟的完全保障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应当给以否定的回答。我且不谈这种说法会引起一种想法,以为用一个国家的力量

组织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可能的。当然这种想法是不正确的。

根据这一点,我就在我的《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1924年12月)那本小册子里改变了并纠正了这种说法,把这个问题分成两个:一个是免除资产阶级制度复辟的完全保障的问题,另一个是可能在一个国家内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这是用以下两种方法达到的:第一,把“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解释为只是通过“几国无产者的共同努力”才有可能的“免除旧制度恢复的完全保障”;第二,根据列宁的《论合作制》那本小册子宣布的一个不容置辩的真理,就是我们拥有为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见《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

这个问题的新说法就成了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关于共产国际和俄共(布)的任务》这一著名决议的基础,这一决议联系着资本主义稳定的事实而详细分析了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问题(1925年4月),并认为用我国的力量建成社会主义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

这个新说法也是我的小册子《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工作总结》的基础。这本小册子是在1925年5月即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闭会后立即出版的。

关于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这一问题的提法,在这本小册子里说:

“我国有两种矛盾。一种矛盾是内部的矛盾,即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681—688页。——编者注

后来,在《论列宁主义基础》这本小册子以后各版中已用这个问题的新说法代替了旧说法。

指《关于共产国际和俄共(布)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的决议而产生的任务》的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分册第39—51页)。——编者注

盾 这里是指在一个国家内建成社会主义而言。——约·斯大林注。另一种矛盾是外部的矛盾,即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 这里是指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而言。——约·斯大林注。……”第一种矛盾是完全可以一个国家的努力来克服的,第二种矛盾却需要几个国家无产者的努力才能解决,——谁把这两种矛盾混为一谈,谁就犯了最粗爆的反列宁主义的错误,谁就是糊涂虫,或者是不可救药的机会主义者。”(见《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工作总结》)

关于社会主义在我国胜利的问题,在这本小册子里说:

“我们能够建成社会主义,而且我们将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和农民一起去建设。……”因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我们有克服所有一切内部困难而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条件,因为我们能够而且必须用自身的力量来克服这些困难。”(同上)

关于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问题在这本小册子里则说:

“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就是有免除武装干涉行动、因而就是有免除复辟行动的完全保障,因为稍微严重的复辟行动,只有在外来的重大的援助下,只有在国际资本的援助下,才有可能发生。因此,各国工人对我国革命的支援,尤其是这些工人的胜利,即使在几个国家内的胜利,是完全保障第一个获得胜利的国家免除武装干涉和复辟行动的必要条件,是保证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必要条件。”(同上)

看来是很明白的了。

大家知道,在我的《问题和答复》(1925年6月)那本小册子里,以及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1925年12月)中,也是以这种精神来解释这个问题的。

见本卷第336页和第343页。——编者注

同上,第336页和第341页。——编者注

同上,第342页。——编者注

见《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217—328页。——编者注

事实就是如此。

这些事实,我想所有同志,包括季诺维也夫,都是知道的。

如果现在,在党内思想斗争之后将近两年,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通过了决议(1925年4月)之后,季诺维也夫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1925年12月)¹¹⁵上作结论时,竟把斯大林1924年4月所写的小册子里一个很不全面的陈旧的公式拖出来,作为解决这个早已解决了的关于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问题的基础,——那么,季诺维也夫的这种特殊的手法就只是说明他在这个问题上完全弄糊涂了。在党已向前进展的时候又把它拉回去,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决议已由中央全会¹¹⁶批准以后又避开这项决议,这就是不可救药地陷入了矛盾,就是不相信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就是离开了列宁的道路,就是自己承认自己的失败。

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可能用我国内部力量来解决无产阶级和农民间的矛盾,这就是在其他国家无产者的同情和支援下,但无须其他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预先胜利,无产阶级可能夺得政权并利用这个政权来在我国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

没有这种可能,社会主义建设就是没有前途的建设,就是没有建成社会主义的信心的建设。要是不相信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要是不相信我国技术落后并不是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条道路上不可克服的障碍,就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否认这种可能就是不相信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是离开列宁主义。

没有其他国家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获得完全的最终胜利,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没有至少几个国家革命的胜利,就不可能有免除武装干涉因而不可能有免除资产阶级制度复辟的完全保障。否认这一个不容置辩的原理,就是离开国际主义,就是离开列宁主义。

列宁说：“我们不仅生活在一个国家里，而且生活在许多国家组成的体系里，苏维埃共和国和帝国主义国家长期并存是不可思议的。其结局不是这个胜利就是那个胜利。在这个结局还没有到来的时候，苏维埃共和国和资产阶级国家间的一系列最可怕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说，统治阶级即无产阶级只要愿意统治并继续统治下去，就应当也用自己的军事组织来证明这一点。”（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4卷第122页）

列宁在另一个地方说：“我们现在面临着某种极不稳定但毕竟是确定无疑、不容置辩的均势。这种均势能否长久保持下去，——我不知道，而且我认为，这是无法知道的。因此，我们应当极端谨慎。我们政策中的第一个训条，从我们政府一年来的活动中所得出的第一个教训，所有工人和农民都应当记取的教训，就是要时刻戒备，要记住我们是被那些公开表示极端仇恨我们的人、阶级和政府包围着的。必须记住，我们随时都有遭受任何入侵的危险。”（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7卷第117页）

看来是很明白的了。

季诺维也夫对于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问题所持的观点又是怎样的呢？

请听吧：

“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至少应当了解为(1)消灭阶级，因而也就是(2)取消一个阶级的专政，这里指的是取消无产阶级的专政……”季诺维也夫往下又说：“为了更确切地弄清1925年我们苏联的问题是怎样的，必须分清两件事情：(1)建设社会主义的有保证的可能性，——这种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当然在一国范围内也是完全可以设想的；(2)最终建成并巩固社会主义，即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社会。”

所有这些能表明什么呢？

就是表明季诺维也夫并不把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的最终胜

见《列宁全集》第29卷第128—129页。——编者注

同上，第33卷第121页。——编者注

利了解为有免除武装干涉和免除复辟的保障,而了解为有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可能性。至于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的胜利,季诺维也夫则把它了解为不能够而且不应当使社会主义建成的一种社会主义建设。碰碰运气,茫无前途的建设,在没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情况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就是季诺维也夫的立场。

没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而去建设社会主义,明知不能建设成功而去建设,——请看,季诺维也夫荒唐到什么地步了。

但这是嘲弄问题,不是解决问题!

季诺维也夫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结论中还有一段话:

“你们看一看,例如雅柯夫列夫同志在最近一次党的库尔斯克省代表会议上竟胡说八道起来。他问道:‘我们能不能在一个四面受着资本主义敌人包围的国家内,我们能不能在这样的条件下在一个国家内建成社会主义呢?’他自己回答道:‘根据上述一切,我们有理由说,我们不仅正在建设社会主义,而且我们虽然暂时还是单独的,我们虽然暂时还是世界上唯一的苏维埃国家,但我们一定能建成这个社会主义。’(1925年12月8日《库尔斯克真理报》第279号)”季诺维也夫问道:“这难道是列宁主义对问题的提法吗?难道这里没有民族狭隘性的气味吗?”

这样,照季诺维也夫的说法,承认可能在一个国家内建成社会主义就是采取民族狭隘性的观点,而否认这种可能却是采取国际主义的观点了。

可是,如果这是对的,那么,究竟还值不值得为战胜我国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而进行斗争呢?由此不是应当得出结论说这种胜利没有可能吗?

向我国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投降,——这就是从季诺维也

夫论据的内在逻辑中得出的结论。

季诺维也夫竟把这种和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点的谬论当作“国际主义”，当作“百分之百的列宁主义”呈献给我们！我肯定地说：季诺维也夫在社会主义建设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上，是离开列宁主义而滚到孟什维克苏汉诺夫的观点上去了。

让我们请教列宁吧。列宁还在十月革命以前，即在 1915 年 8 月谈到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问题时，就已说过：

“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既然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就会起来反对其余的资本主义的世界，把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这些国家中掀起反对资本家的起义，必要时甚至用武力去反对剥削阶级及其国家。”（见《列宁全集》俄文第 3 版第 18 卷第 232—233 页）

上面标出的列宁的这句话——“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获得了胜利的那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在夺得政权以后，能够而且应当在本国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又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未必用得着证明：列宁的这个明确的原理是无须再加解释的。否则，列宁在 1917 年 10 月对无产阶级发出的夺取政权的号召就会是不可理解的了。

可见列宁的这个明显的原理和季诺维也夫的所谓我们能够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在一国范围内”建设社会主义那个反列宁主义的糊涂“原理”是有天壤之别的。

这是列宁在 1915 年即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前说的。可是也

黑体是我用的。——约·斯大林注

参看《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2 卷第 709 页。——编者注

许有了夺取政权的经验以后,在 1917 年以后,他的观点发生了变化吧?我们来看看列宁在 1923 年写的小册子《论合作制》。

列宁说:“的确,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最小农结成联盟,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已有保证等等,难道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难道这不是 我们通过合作社,而且仅仅通过合作社,通过我们从前鄙视为买卖机关,并且现时在新经济政策下我们从某一方面也有理由加以鄙视的合作社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吗?这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这已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见《列宁全集》俄文第 3 版第 27 卷第 392 页)

换句话说,我们能够而且应当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因为我们拥有为建成这个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

看来不容易说得更清楚了。

试把列宁这个经典性的原理和季诺维也夫用来反驳雅柯夫列夫的那个反列宁主义的论调比较一下,就会懂得雅柯夫列夫只是重复列宁认为在一个国家内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言论,而季诺维也夫反对这个原理,斥责雅柯夫列夫,因而背离列宁,采取了孟什维克苏汉诺夫的观点,采取了认为我国因技术落后而没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观点。

只是不明白,如果我们不打算建成社会主义,那我们在 1917 年 10 月夺取政权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1917 年 10 月夺取政权本来是不应当的,——这就是从季诺维也夫论据的内在逻辑中得出的结论。

其次,我肯定地说:季诺维也夫在社会主义的胜利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上反对我们党的明确决定,而这些决定是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关于共产国际和俄共(布)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

黑体是我用的。——约·斯大林注

参看《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4 卷第 682 页。——编者注

全会的决议而产生的任务》的著名决议里规定的了。

我们来看看这个决议吧。关于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的胜利，在这个决议中是这样说的：

“两个直接对立的社会制度的存在，经常引起资本主义封锁、其他种种经济压力、武装干涉和复辟的危险。因此，几个国家内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唯一保障，即免除复辟的唯一保障。……”“列宁主义教导说：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即免除资产阶级关系复辟的完全保障，只有在国际范围内……才有可能。”“但由此决不能得出结论说，在俄国这样落后的国家中，如果没有技术上经济上比较发达的国家的‘国家援助’（托洛茨基），就不可能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见决议）

由此可见，决议是把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解释为免除武装干涉和复辟的保障，这和季诺维也夫在他的《列宁主义》一书中的解释是完全相反的。

由此可见，决议认为在俄国这样落后的国家中，没有技术上经济上比较发达的国家的“国家援助”也对能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这和季诺维也夫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做结论时用来反驳雅柯夫列夫的那个论调是完全相反的。

试问，这不是季诺维也夫反对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决议又是什么呢？

当然，党的决议有时也免不了有差错。有时候，党的决议也含有错误。一般地说，可以假定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决议也含有一些错误。可能季诺维也夫认为这决议是错误的，那么他就应当象布尔什维克所应有的那样明白而公开地指出这一点。但不知为什么季诺维也夫没有这样做。他宁愿选择另外一条道路，对党的第十

黑体是我用的。——约·斯大林注

参看《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分册第47页和第44页。——编者注

四次代表会议的决议绝口不谈,不作任何公开批评,却从背面袭击这个决议。季诺维也夫大概以为这条道路最容易达到目的。而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改善”决议并“稍微”修改列宁的话。未必用得着证明,季诺维也夫打算错了。

季诺维也夫的错误是从什么地方发生的呢?这个错误的根源在哪里呢?

据我看,这个错误的根源在于:季诺维也夫深信我国技术的落后对于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来说是不可克服的困难,深信无产阶级因我国技术落后而不能建成社会主义。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党的四月代表会议⁹⁷前的一次党中央会议上曾试图提出这个论据。但是他们受到了反驳,不得不实行退却,表面上服从和他们相反的观点,即中央多数的观点。季诺维也夫虽然表面上服从这个观点,却始终和这个观点作斗争。请看我们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在给党的列宁格勒省代表会议的《复信》¹¹⁷中是怎样说明俄共(布)中央内的这次“事件”的吧:

“不久以前,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在政治局坚持过一种观点,似乎国际革命不来拯救我们,我们会因我国技术上经济上的落后而不能克服内部困难。而我们和中央多数一样却认为:虽然我国技术落后,但我们能够不管这种落后而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正在建设,并且一定会把它建成。我们认为:这样进行建设,当然比在全世界革命胜利的条件下缓慢得多,然而我们还是在前进,而且要继续前进。我们同样认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观点表现出不相信我国工人阶级以及跟着我国工人阶级走的农民群众的内部力量。我们认为这个观点是背离列宁主义的立场的。”(见《复信》)

这个文件是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最初几次会议时出现在报刊上的。季诺维也夫当然有可能就在代表大会上发言反对这个文件。值得注意的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没有找到论据来反驳

我们党的莫斯科委员会所提出来反对他们的这一严厉谴责。这是偶然的吗？我认为不是偶然的。这种谴责看来是命中要害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所以用缄默来“回答”这种谴责，正是因为他们无法“招架”。

“新反对派”抱怨人们谴责季诺维也夫不相信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能获胜利。可是，既然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问题已经讨论了整整一年，既然季诺维也夫的观点已被中央政治局（1925年4月）屏弃，既然党关于这个问题的确定意见已经形成，并把这种意见载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1925年4月）的著名决议中，既然在这一切之后，季诺维也夫还敢在他的《列宁主义》（1925年9月）一书中反对党的观点，既然他以后又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重复这种言论，——那么这一切，这种坚持自己错误的顽强性和固执性，如果不是因为季诺维也夫中了毒，而且无可救药地中了不相信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能获胜利的毒，又是因为什么呢？

季诺维也夫可以随便把他这种不相信的态度解释为国际主义。但是从什么时候起，我们竟把那种在列宁主义的根本问题上背离列宁主义的行为解释为国际主义呢？

在这里，违反国际主义和国际革命的不是党，而是季诺维也夫，这样说不是更正确吗？我们这个“建设着社会主义”的国家不是世界革命的根据地又是什么呢？但是，如果这个国家没有能力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它能不能成为世界革命的真正根据地呢？如果它没有能力战胜我国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没有能力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它能不能继续成为吸引世界各国工人的最大中心，象它现在无疑地是这样的中心一样呢？我认为是不可能的。但是不相信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鼓吹这种不相信的思想，结果就会使我国丧失世界革命根据地的资格，而使我国丧失这种资格，结果就会削

弱世界革命运动，——难道不应得出这样的结论吗？社会民主党人先生们是用什么来恐吓工人使他们离开我们的呢？就是鼓吹说“俄国人是什么也做不成的”。我们现在用什么来打击社会民主党人，把工人代表团一批一批地吸引到我们这里来，因而巩固全世界共产主义的阵地呢？就是用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成绩。既然如此，那么谁鼓吹不相信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成绩，谁就是间接帮助社会民主党人，谁就是缩小国际革命运动的规模，谁就必然背离国际主义，——这难道还不明白吗？……

由此可见，季诺维也夫的“国际主义”是和他在一个国家内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百分之百的列宁主义”一样恶劣的。

因此，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把“新反对派”的观点确定为“不相信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确定为“曲解列宁主义”，那是很正确的。

七

为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而奋斗

我认为不相信社会主义建设能够获得胜利是“新反对派”的基本错误。在我看来，这个错误所以是基本错误，在于“新反对派”的其他一切错误都是从这个错误产生的。“新反对派”在新经济政策、国家资本主义、我国社会主义工业的性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合作社的作用、对富农斗争的方法、中农的作用和比重等等问题方面所

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分册第79页。——编者注

犯的一切错误,都是从反对派的基本错误、从不相信我国能用自己的力量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观点产生的。

不相信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能够获得胜利,这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这就是不相信基本农民群众可以被吸引来(由于我国发展中的一定条件)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第二,这就是不相信掌握着国民经济命脉的我国无产阶级能够吸引基本农民群众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反对派关于我国发展道路的论断就是默然从这两个论点出发的,——他们是否有意识这样做,反正都是一样。

能不能吸引苏联基本农民群众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呢?

在《论列宁主义基础》那本小册子里,对于这个问题有两个基本论点:

(1)“决不可把苏联农民和西方农民混为一谈。苏联农民不能不和西方农民有所区别,因为苏联农民经过了三次革命的训练,跟无产阶级一起并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了反对沙皇和资产阶级政权的斗争,从无产阶级革命手里获得了土地与和平,并因此成为无产阶级的后备军;西方农民却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在自由资产阶级领导下进行了斗争,从这个资产阶级手里获得了土地,并因此成为资产阶级的后备军。未必用得着证明:向来珍视他们同无产阶级的政治友谊和政治合作并把他们获得自由归功于这种友谊和这种合作的苏联农民,不会不是无产阶级实行经济合作的最好对象。”

(2)“决不可把俄国农业和西方农业混为一谈。西方农业是按照通常的资本主义道路发展的,是在农民深刻分化的情况下发展的,一极是大田庄和私人资本主义大地产,另一极却是大众的贫穷困苦和雇佣奴隶地位。因此,在西方,解体和分化是十分自然的。在俄国却不是这样。我国农业是不能循着这样的道路去发展的,因为单是苏维埃政权的存在和基本生产工具与生产资料国有化的事实就不容许循着这条道路去发展。俄国农业应当循着另一条道路,即循着使千百万小农和中农合作化的道路,循着在农村中发展那种由国家以优惠贷款的办法来扶持的群众性的合作社的道路去发展。列宁在论合作制的

论文中正确地指出我国农业应当循着新道路去发展,即循着通过合作社吸引多数农民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循着把集体制原则逐步应用于农业,起初应用于农产品销售方面,然后应用于农产品生产方面这一道路去发展。

.....

未必用得着证明:绝大多数农民乐意走这条新的发展道路,而抛开私人资本主义大地产和雇佣奴隶地位的道路,贫困和破产的道路。”

这两个论点是否正确呢?

我认为这两个论点对于我们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整个建设时期都是正确而不容置辩的。

这两个论点只是表达下述的列宁的几个著名论题:关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结合,关于把农民经济纳入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体系,关于无产阶级应当和基本农民群众一起走向社会主义,关于使千百万农民合作化是在农村中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康庄大道,关于在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发展条件下,“在我们看来,单是合作社的发展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7卷第396页)。

那么,我国的农民经济可能而且应当沿着什么道路发展呢?

农民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农民经济按绝大多数农户来说是小商品经济。小商品农民经济又是什么呢?它是站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间的十字路口的经济。它既可以向资本主义方面发展,象现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的情形那样,也可以向社会主义方面发展,象在我们国家里,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一定要发生的情形这样。

为什么农民经济这样不稳固这样不独立呢?原因在哪里呢?

原因在于农民经济散漫,无组织,依赖城市,依赖工业,依赖信

见本卷第232—233页和第234—235页。——编者注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687页。——编者注

用系统,依赖国家政权性质,最后还有一个大家知道的原因,即无论在物质方面,还是在文化方面,农村都是跟着城市走,而且一定是跟着城市走的。

农民经济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就是通过农民最深刻的分化去发展,——一极是巨大的大地产,另一极是大众贫困化。这样的发展道路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农村,农民经济,是依赖城市,依赖工业,依赖城市的集中信贷和依赖政权性质的,而在城市里统治一切的却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信用系统和资本主义国家政权。

在我们国家里,城市完全是另一种面貌,工业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运输业、信用系统、国家政权等等都集中在无产阶级手里,土地国有化是全国通行的法令,那么,农民经济是不是一定沿着这条道路去发展呢?当然不一定。恰恰相反,正因为城市是农村的领导者,而在我国城市里统治一切的又是掌握着国民经济全部命脉的无产阶级,所以农民经济就应当沿着另外一条道路去发展,即沿着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去发展。

这是一条什么道路呢?

这就是用各种合作社的方式使千百万农户普遍合作化的道路,把散漫的农户团结在社会主义工业周围的道路,在农民中间,起初是在农产品销售方面和农户所需要的城市产品供应方面,然后是在农业生产方面应用集体制原则的道路。

而且愈往前去,这条道路也就愈成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不可避免的道路,因为销售方面的合作化、供应方面的合作化、最后,信贷和生产方面的合作化(农业合作社)是提高农村生活水平的唯一道路,是使广大农民群众免于贫困和破产的唯一方法。

有人说,我国农民按其地位来说是非社会主义性的,因此,他

们不能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发展。农民按其地位来说是非社会主义性的,这当然是对的。但是,既然证明农村是跟着城市走的,而在城市里指挥一切的又是社会主义工业,那么这就不成其为反对农民经济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论据了。在十月革命时,农民按其地位来说也是非社会主义性的,而且他们根本不想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他们当时所争取的主要是消灭地主政权,结束战争,奠定和平。可是他们当时还是跟着社会主义无产阶级走了。为什么呢?因为推翻资产阶级,由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在当时是摆脱帝国主义战争的唯一方法,是奠定和平的唯一方法。因为当时没有而且不可能有其他的方法。因为当时我们党已摸索到、寻找到一种能把农民的特殊利益(推翻地主,奠定和平)和全国共同利益(无产阶级专政)结合起来并使前者服从后者的尺度。这种尺度对于农民是可以接受的,并且是有利的。因此,农民虽有其非社会主义的性质,当时还是跟着社会主义无产阶级走了。

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关于把农民引上这个建设的轨道也应当这样说。农民按其地位来说是非社会主义性的。但是,他们应当走上而且一定会走上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因为除了和无产阶级结合,除了和社会主义工业结合,除了通过农民普遍合作化把农民经济引上社会主义发展的总轨道以外,没有而且不可能有其他足以使农民免于贫困和破产的道路。

为什么非通过农民普遍合作化不可呢?

因为普遍合作化就是“我们已经找到了私人利益、私人买卖的利益与国家在这种利益的检查监督相结合的尺度,找到了使私人利益服从共同利益的尺度”(列宁),这种尺度对于农民是可以接

受的,并且是有利的,这种尺度保证无产阶级有可能把基本农民群众吸引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正因为农民通过合作社来销售自己的商品和使自己的农庄得到机器供应是有利的,正因为如此,农民应当沿着而且一定会沿着普遍合作化道路走去。

而在社会主义工业领导下实行农户普遍合作化又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使小商品农民经济离开那条必然使农民大批破产的旧的资本主义道路,而过渡到新的发展道路,即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

正因为如此,我们党的当前任务就是为争取农民经济的新的发展道路而奋斗,为吸引基本农民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奋斗。

因此,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做得很正确,它决定:

“农村中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道路,就是在社会主义国营工业、国家信用机关和无产阶级所掌握的其他经济命脉的经济领导作用日益加强的条件下,吸引基本农民群众参加合作社组织,并保证这种组织循着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同时利用、克服并排挤这种组织里的资本主义成分。”(见代表大会就中央总结报告所通过的决议)

“新反对派”最严重的错误就在于他们不相信农民这条新的发展道路,看不见或不懂得这条道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是绝对不可免的道路。而他们不懂得这一点,是因为他们不相信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能够获得胜利,不相信我国无产阶级能引导农民跟着自己走向社会主义。

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分册第80页。——编者注

因此,他们也就不懂得新经济政策的两重性,夸大新经济政策的消极方面,把新经济政策解释为主要是退却。

因此,他们也就夸大我国经济中资本主义成分的作用,轻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各个杠杆(社会主义工业、信用系统、合作社、无产阶级政权等等)的作用。

因此,他们也就不懂得我们国营工业的社会主义性质,怀疑列宁的合作社计划的正确。

因此,他们也就夸大农村中的分化,在富农面前张皇失措,轻视中农的作用,企图破坏党关于保证和中农结成巩固的联盟的政策,而且在党的农村政策问题上总是摇摆不定。

因此,他们也就不懂得党为了吸引千百万工农群众来参加工业和农业建设,参加活跃合作社和苏维埃,参加国家管理,参加反官僚主义斗争,参加为改善并改造我们国家机关的斗争所进行的巨大工作。这种工作标志着新的发展阶段,没有这种工作,任何社会主义建设都是不可思议的。

因此,他们也就在我国建设中的困难面前灰心失望,茫无所措,怀疑我国工业化的可能,悲观地胡说党在蜕化等等。

在他们那里,在资产者那里,一切事情或多或少是好的;在我们这里,在无产者这里,一切事情却或多或少是坏的;如果西方不能及时发生革命,我们的事业就要破产,——这就是“新反对派”的总论调,而这种论调在我看来是取消派的论调,但不知为了什么(大概是为了安慰自己吧)反对派竟拿它来冒充“国际主义”。

反对派说新经济政策是资本主义。季诺维也夫说新经济政策主要是退却。所有这些说法当然都是不对的。其实,新经济政策是党容许社会主义成分和资本主义成分斗争并预计社会主义成分要战胜资本主义成分的政策。其实,新经济政策只是以退却为开始,

但它打算在退却过程中重新部署力量并举行进攻。其实,我们已经进攻几年了,而且很有成效地进攻着:发展我们的工业,发展苏维埃商业,排挤私人资本。

可是说新经济政策是资本主义,新经济政策主要是退却,这种论点的意义是什么呢?这种论点是从什么出发的呢?

它是从一种不正确的假设出发的:我们这里现在就是在恢复资本主义,就是使资本主义“卷土重来”。正因为作这样的假设,反对派才怀疑我国工业的社会主义性质。正因为作这样的假设,反对派才在富农面前张皇失措。正因为作这样的假设,反对派才那样急急忙忙地抓住那些关于农民分化的不正确的数字。正因为作这样的假设,反对派才对于中农是我国农业中的中心人物这一点特别健忘。正因为作这样的假设,反对派才过低估计中农的比重,并怀疑列宁的合作社计划。也只有用这种假设才可以“论证”“新反对派”那种不相信农村的新的发展道路,即吸引农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的观点。

其实,现在在我国发生的并不是恢复资本主义的单向过程,而是发展资本主义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双向过程,是社会主义成分和资本主义成分斗争的矛盾过程,是社会主义成分克服资本主义成分的过程。这无论对于以国营工业为社会主义基础的城市,或是对于以和社会主义工业相结合的群众性的合作社为社会主义发展的主要据点的农村,同样是不容置辩的。

只恢复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这至少因为我国政权是无产阶级的政权,大工业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运输业和信贷业由无产阶级国家支配着。

农村中的分化不可能象先前那样厉害,中农仍旧是基本农民群众,而富农不能再有过去那样的势力,这至少因为我国土地已经

国有化并禁止买卖,而我国的商业政策、信贷政策、税收政策以及合作社政策又是以限制富农的剥削企图、提高最广大农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消除农村中的两极对立为目标的。至于我们现在和富农的斗争,不仅是按照老的路线即按照组织贫农去反对富农的路线进行,而且是按照新的路线即按照巩固无产阶级同贫农和中农群众的联盟去反对富农的路线进行,这一点我就不说了。反对派不懂得按照第二条路线去和富农作斗争的意义和作用,——这件事再次证实了反对派滚到农村发展的老路,滚到农村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了,在这条老路上,富农和贫农是农村中的主要力量,中农却“被冲刷”。

反对派援引列宁的《论粮食税》,说合作社是变相的国家资本主义,因而他们不相信可能利用合作社作为社会主义发展的主要据点。反对派在这里又犯了极大的错误。在写作《论粮食税》的1921年,这样来解释合作社是足够的,令人满意的,当时我国还没有发达的社会主义工业,当时列宁是把国家资本主义设想为我们经济工作可能的基本形式,而把合作社和国家资本主义结合起来考察的。可是,这种解释现在已经不够了,已被历史所超过了,因为从那时起,情况改变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已经发展了,国家资本主义没有培植到所预期的那种程度,而现在拥有一千万以上社员的合作社却已经开始和社会主义工业结合起来。

难道不就是这个缘故列宁才在《论粮食税》发表后两年即1923年用另一种看法考察了合作社,认为“在我国条件下合作制往往是同社会主义完全一致的”吗?(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7卷第396页)

难道不就是因为这两年内社会主义工业已经壮大,国家资本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503—540页。——编者注
同上,第686页。——编者注

主义却没有培植到应有的程度,列宁才不把合作社和国家资本主义结合起来考察,而把它和社会主义工业结合起来考察吗?

合作社的发展条件已经改变了。对合作社问题的看法也应当有所改变。

例如请看列宁的《论合作制》(1923年)那本小册子里说明这个问题的一段精辟的话:

“在国家资本主义下,合作企业与国家资本主义企业不同,因为合作企业既是私人企业,又是集体企业。在我国现存制度下,合作企业与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不同,因为合作企业是集体企业,但它与社会主义企业没有区别,如果它占用的土地和使用的生产资料是属于国家即属于工人阶级的。”(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7卷第396页)

在这一小段引文中解决了两个大问题。第一是关于“我国现存制度”不是国家资本主义的问题。第二是关于同“我国制度”结合起来的合作企业和社会主义企业“没有区别”的问题。

我认为很难说得比这更明白了。

再看看列宁那本小册子里的另一段话吧:

“在我们看来,单是合作社的发展就等于(只有上述一点“小小的”例外)社会主义的发展,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同上)

显然,《论合作制》那本小册子对于合作社已经有了新的估价,而这种新的估价是“新反对派”所不愿意承认的,是“新反对派”违反事实、违反明显的真理、违反列宁主义而绝口不谈的。

黑体是我用的。——约·斯大林注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686页。——编者注

同上,第687页。——编者注

和国家资本主义结合起来的合作社是一回事 ,和社会主义工业结合起来的合作社又是一回事。

可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 ,说在《论粮食税》和《论合作制》这本小册子之间隔着一道鸿沟。这当然是不正确的。例如 ,只要援引《论粮食税》中下面一段话就可以立刻看出《论粮食税》和《论合作制》在对合作社的估价问题上是有不可分离的联系。请看这一段话吧 :

“由租让制向社会主义过渡 ,是由一种大生产形式向另一种大生产形式过渡。由小业主合作社向社会主义过渡 ,是由小生产向大生产过渡 ,就是说 ,是比较复杂的过渡 ,但是它在成功时 ,却能包括更广大的居民群众 ,却能把旧的关系 ,社会主义以前的 ,甚至资本主义以前的即最顽强地反抗一切‘革新’的那些关系的更为深固的根拔掉。”(见《列宁全集》俄文第 3 版第 26 卷第 337 页)

从这段引文可以看出 ,列宁远在写《论粮食税》时 ,即在我国还没有发达的社会主义工业时 ,就已经认为合作社在成功时能变为反对“社会主义以前的”关系因而也反对资本主义关系的强有力的斗争工具。我认为正是这个思想后来成了他的《论合作制》这本小册子的出发点。

可是 ,从这一切应当得出什么结论呢 ?

由此就应当得出结论 :“新反对派”不是马克思主义地而是形而上学地看合作社问题的。“新反对派”不是把合作社看作和其他现象结合起来 ,比如说 ,和国家资本主义结合起来(1921 年)或者和社会主义工业结合起来(1923 年)的历史现象 ,而是把它看作一

黑体是我用的。——约·斯大林注

见《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4 卷第 523 页。——编者注

种永恒不变的东西,看作“自在之物”。

因此,反对派在合作社问题上犯了错误,因此,反对派不相信农村可能经过合作社而向社会主义发展,因此,反对派滚到了老路上去,滚到了农村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

“新反对派”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实际问题上的观点大体上就是如此。

结论只有一个:反对派的路线(既然他们有路线),反对派的游移和动摇,反对派的不相信我们的事业和在困难面前张皇失措,这一切将导致向我国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投降。

因为既然新经济政策主要是退却,既然国营工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值得怀疑,既然富农几乎万能,合作社很少有希望,中农作用日益减少,农村发展的新道路很成问题,党几乎在蜕化,而西方革命还不怎么逼近,——既然如此,反对派的武库里究竟还剩下什么呢?他们打算靠什么去对我国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进行斗争呢?单靠一套《时代哲学》¹¹⁸是不能作战的。

很明显,“新反对派”的武库,如果它还可以称为武库的话,也是不值得羡慕的。这个武库不是为了进行斗争,更不是为了取得胜利的。

很明显,党如果靠这样一个武库去作战,它“一下子”就会断送自己,——它只好向我国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投降。

因此,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做得完全正确,它决定:“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胜利而奋斗是我们党的基本任务”;解决这个任务所必需的条件之一就是“反对那种不相信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态度,反对那种把我们的‘彻底社会主义式的’(列宁)企业看作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的企图”;“这种思潮使群众不能自觉地对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社会主义工业建设,所以只能阻碍经济中的社会

主义成分的增长,而帮助私人资本来和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作斗争”、“因此,代表大会认为必须进行广泛的教育工作去克服这种对列宁主义的曲解”。(见就联共(布)中央总结报告所通过的决议)

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历史意义就在于它彻底揭露了“新反对派”的错误,屏弃了“新反对派”的不相信的态度和悲泣,明确地指出了进一步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道路,给党指出了胜利的前途,因而用对社会主义建设必获胜利的坚强信念武装了无产阶级。

1926年1月25日

1926年印成单行本

选自《斯大林全集》第8卷
第13—88页

参看《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分册第77页和第79页。——编者注

关于苏联经济状况和党的政策

(1926年4月13日给列宁格勒党组织积极分子作的
关于联共(布)中央全会¹¹⁹工作的报告)

同志们！让我开始报告吧。

我党中央四月全会的议程有四项：

第一项——我国的经济状况和我党的经济政策。

第二项——根据精简方针改组我们的粮食收购机关。

第三项——从解决我国经济建设关键问题的角度来制定我们
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全会1926年的工作计划。

第四项——另派什维尔尼克同志接替叶夫多基莫夫为中央委
员会书记。

如果除去最后一个关于更换书记的问题不算，那么成为中央
全会主要讨论中心的其他问题可以归结为一个基本问题，即关于
我国经济状况和党的政策的问题。因此，我在这个报告中只讲一个
基本问题，就是关于我国经济状况的问题。

—

新经济政策的两个时期

决定我们政策的一个基本事实，就是我国在经济发展上已进

入新经济政策的新时期,进入直接工业化的时期。

自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宣布新经济政策以来,已经有五年了。当时摆在我们面前,摆在党面前的基本任务,是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在大规模的商品流转的条件下,建立我国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基础。这个战略任务现在还是作为我们的基本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在新经济政策的第一个时期,自1921年起,就从首先发展农业的角度来对待这一基本任务。列宁同志说,我们的任务是建立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基础,但是要建立这样的基础,必须有发达的工业,因为工业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开端和终结,而要发展工业就必须从农业开始。

为什么呢?

因为要在我们当时所处的经济破坏的情况下扩展工业,首先必须给工业创造某些市场的、原料的和粮食的前提。在空地上发展工业是不可能的,如果国内没有原料,如果没有粮食供给工人,如果没有稍微发达的农业作为我国工业的基本市场,要发展工业是不可能的。所以要发展工业,至少要有三个前提:第一,要有国内市场,而目前我们的国内市场主要是农民市场;第二,要在农业中有较为发达的原料生产(甜菜、亚麻、棉花等等);第三,要使农村能分出必要数量的农产品来供给工业,供给工人。因此,列宁说,我们要建立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基础,要建设工业,就应当从农业开始。

当时许多人不相信这一回事。当时特别反对这一点的是所谓“工人反对派”¹²⁰。他们说,这是怎么一回事:我们的党叫作工人党,而它发展经济却从农业开始。他们说,这怎样理解呢?其他的反对派当时也表示反对,他们不顾现实的可能性,认为在任何条件下,甚至在空地上也可以建设工业。可是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历

史清楚地表明了党是正确的,要建立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基础,要扩展工业,就必须从农业开始。

新经济政策的第一个时期就是如此。

现在我们已进入新经济政策的第二个时期。现在我国经济状况中最重要和最突出的一点,就是重心已转移到工业方面了。如果当时,在新经济政策的第一个时期,因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是依靠农业的,我们必须从农业开始,那么现在要继续建设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基础,要推进整个经济,所需要的正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工业上。现在,如果不及及时供给农业机器、拖拉机和工业品等等,农业本身就不能进展。因此,如果当时,在新经济政策的第一个时期,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事业是依靠农业的,那么现在它却要依靠而且已经依靠工业的直接扩展了。

二 工业化方针

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¹¹⁵所宣布而现在正在实现的国家工业化的口号和方针,其实质和基本意义就在这里。今年4月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工作就是从这一基本口号出发的。所以我们当前的基本任务就是加快我国工业的发展速度,利用现有的资源来全力推进我国工业,从而加速整个经济的发展。

正是现在,在目前,这一任务具有特别迫切的性质,其原因之一就是:在我国,由于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在城乡对工业品的需求和工业对这些产品的供应之间就形成某种不相适应的现象,对

工业品的需求比工业本身增长得更快,我们目前存在的商品不足和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都是这种不相适应的现象的表现和结果。几乎无须证明,迅速发展我国的工业是消灭这种不相适应和商品不足的最可靠手段。

有些同志认为工业化就是发展任何一种工业。甚至有这样的怪人,他们认为在很早以前创造过某种工业胚胎的伊万雷帝就已经是工业化主义者了。如果以此类推,彼得大帝就应该叫作第一个工业化主义者了。这当然是不正确的。不是发展任何一种工业都是工业化。工业化的中心,工业化的基础,就是发展重工业(燃料、金属等等),归根到底,就是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发展本国的机器制造业。工业化的任务不仅要增加我国整个国民经济中工业的比重,而且要在这种发展中保证受资本主义国家包围的我国在经济上的独立,使我国不致变成世界资本主义的附属品。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中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如果自己国内不能生产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如果停留在这样一个发展阶段,即不得不使国民经济受制于那些生产并输出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的阶段,就不可能保持经济上的独立。停留在这个阶段就等于让自己隶属于世界资本。

拿印度来说吧。谁都知道印度是一个殖民地。印度有没有工业呢?无疑是有的。印度的工业是不是在发展呢?是的,在发展。但是,那里发展的是不生产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工业。那里的生产工具是从英国输入的。因此(当然不仅这一个原因),那里的工业完全隶属于英国的工业。这是帝国主义的特殊方法——在殖民地发展工业,使它受制于宗主国,受制于帝国主义。

由此可见,我国的工业化不能只了解为发展任何一种工业,比如说,发展轻工业,虽然轻工业及其发展是我们所绝对必需的。由

此可见 ,工业化首先应当了解为发展我国的重工业 ,特别是发展我国自己的机器制造业这一整个工业的神经中枢。否则就谈不到保证我国在经济上的独立。

三

社会主义积累问题

可是 ,同志们 ,要推进工业化 ,就必须革新我们工厂的旧设备并建立新工厂。我们现在所处的我国工业发展时期 ,其特点就是我们已经使沙皇时代资本家留给我们的旧工厂的设备能力充分利用了 ,而现在要继续前进 ,就应该改进技术 ,就应该重新装备旧工厂 ,建立新工厂。否则现在就无法前进。

同志们 ,要在新技术基础上革新我国工业 ,就需要很大很大一笔钱。可是我们的钱很少 ,这是你们大家都知道的。今年我们对工业基本建设这一主要事业大约只能投资八亿多卢布。这当然是很少的。但总算有了一些。这是我们对我国工业第一次较大的投资。我说这很少 ,因为我国工业随便就可以吞下比这大几倍的数目。我们必须推进我国工业。我们必须以尽快的速度扩大我国工业 ,把工人数量增加一两倍。我们必须把我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 ,而且越快越好。但是要做到这一切 ,就需要一大笔钱。

因此 ,为发展工业积累资金的问题 ,社会主义积累问题 ,现在对于我们就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我们专靠自己 ,不借外债 ,凭借我国内部力量 ,究竟能不能保证我国工业拥有实行工业化方针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胜利所必需

的积累和后备呢？

这是一个应该特别注意的重大问题。

历史上有过各种不同的工业化方法。

英国的工业化是靠数十年数百年掠夺殖民地,在那里收集“追加的”资本,把它们投入本国的工业并加快自己工业化的速度来实现的。这是一种工业化方法。

德国由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对法战争的胜利而加速了自己的工业化。当时德国向法国人索取了五十亿法郎的赔款,把这笔赔款投入自己的工业。这是第二种工业化方法。

这两种方法对我们都是行不通的,因为我们是苏维埃国家,因为对殖民地的掠夺和以掠夺为目的的军事侵略都是和苏维埃政权性质不相容的。

俄国,旧的俄国,在受奴役的条件下出让经营权,在受奴役的条件下获得借款,它竭力用这种方法逐步爬上工业化的道路。这是第三种方法。但这是被奴役的或半被奴役的道路,是使俄国变成半殖民地的道路。这条道路对我们也是行不通的,因为我们进行了三年的国内战争,打退了所有的干涉者,并不是为了以后,在战胜干涉者以后,自愿地去受帝国主义的奴役。

还有第四条工业化的道路,靠本国节约来发展工业的道路,即社会主义积累的道路。列宁同志屡次指出这条道路是我国工业化唯一的道路。

那么,我国工业化是否可能靠社会主义积累来实现呢？

我国有没有这种足以保证工业化的积累的来源呢？

是的,是可能的。有的,我国有这样的来源。

我可以举出这样的事实,例如我国地主和资本家已因十月革命而被剥夺,土地、工厂等等的私有制已被消灭,而变成全民所有

制了。几乎无须证明,这个事实就是相当大的积累来源。

其次,我可以举出这样的事实,例如沙皇债务的废除从我国国民经济的肩上卸下了几十亿卢布的债务负担。不应忘记,如果这些债务还存留下来,单是利息一项,我们每年就得付出几亿卢布,因而使工业受到损害,使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受到损害。不用说,这种情况给了我们的积累事业以极大的便利。

我可以指出我们国有化的工业,它已经恢复起来,正在发展,并且提供进一步发展工业所必需的若干利润。这也是积累的来源。

我可以指出我们国有化的对外贸易,它提供若干利润,所以也是一种积累的来源。

可以举出比较有组织的我们国营的国内贸易,它也提供一定的利润,因而也是一种积累的来源。

可以指出我们国有化的银行系统这样的积累杠杆,它提供一定的利润,并尽力滋养我国的工业。

最后,我们有国家政权这样的武器,国家政权支配着国家预算,并为整个国民经济、尤其为我国工业的进一步发展积聚若干资金。

我国内部积累的主要来源大体上就是如此。

它们的意义就在于它们使我们有可能建立必要的后备,没有这种后备,我国工业化是不可能的。

但是,同志们,可能性还不是现实性。如果不善于办事,在积累的可能性和实际的积累之间就会有相当大的距离。因此,我们不能以仅有可能性为满足。如果我们真想为我国工业建立必要的后备,我们就应当把社会主义积累的可能性变成实际的积累。

由此就产生一个问题:必须怎样进行积累才能使工业得到好处呢?我们首先必须抓住经济生活中的哪些关键才能把积累的可

能性变成实际的社会主义积累呢？

积累的渠道很多，其中必须指出的主要渠道至少有下列几条：

第一，为了把国内余资首先用在工业的需要上，必须不使它分散，而让它集合到我们合作社的和国营的信用机关中，同时要采用发行国内公债的办法。自然，存户因此应得到一定的利息。决不能说我们这方面的情况多少是令人满意的。改善我们的信贷网，提高信用机关在人民心目中的威信，发行国内公债等等，显然是我们当前的任务，我们无论如何必须加以解决。

第二，必须严密地堵塞一切使国内一部分余资流入私人资本的腰包因而损及社会主义积累的道路和漏洞。为此必须实行一种使批发价格和零售价格不太悬殊的价格政策，必须采取一切办法来降低工业品和农产品的零售价格，使余资不再流入私商腰包，或至少使它减到最低限度。这是我们经济政策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因为从那里会产生一种既有害于我们积累的事业又有害于切尔文¹²¹的严重危险。

第三，为了企业折旧、扩大企业和进一步发展企业，必须在工业本身，在工业每个部门中，积存一定的储备。这件工作是必需的，是绝对需要的，无论如何必须加以推进。

第四，国家手中必须积蓄为防备国家遭受任何意外（歉收），为滋养工业、扶助农业、发展文化等等所必需的一定后备。现在没有后备是不能生活和工作的。就连一个从事小经营的农民现在也非有一定的储备不可，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更非有后备不可。

我们在对外贸易方面首先需要后备。我们需要把我们的出口和进口经营得使国家手中能保持一定的后备，保持一定的对外贸易出超。这是完全必要的，因为这不仅可以防备国外市场上的意外事情，而且是维持我们切尔文的手段。我们的切尔文暂时是稳定

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达到对外贸易出超的话,它还可能波动。加强我们的输出,使我们的输入和输出的能力相适应,——任务就是如此。

我们不能象旧时那样地说:“自己吃不饱,也得要输出。”我们不能说这样的话,因为工人和农民要象人一样地吃饭,而我们在这一点上是完全支持他们的。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在不损害人民消费的条件下采取一切办法使我国输出增加,使国家手中能保有一定的外汇储备。我们1923年能由苏维埃纸币进到稳定的货币,其原因之一就是我们当时由于我国对外贸易出超而有一定的外汇储备。如果我们想维持我们的切尔文,我们今后也应当把对外贸易事业经营得使我国手中能保有外汇储备,作为我们切尔文的基础之一。

其次,我们在国内贸易方面需要有一些后备。我所指的主要是国家手中要有粮食后备去干预粮食市场,以便跟那些肆意抬高农产品价格的富农和其他粮食投机者作斗争。即使为了防止人为地抬高各工业中心的生活费用和破坏工人工资这种危险,这也是必要的。

最后,我们需要这样的税收政策:把捐税负担转嫁到有产阶级的肩上,同时在国家预算方面使国家手中拥有一定的后备。我们四十亿卢布的国家预算执行的进程表明,我们能达到收入超过支出大约一亿或者更多些。同志们当中有人觉得这个数字太大。可是这些同志的眼光大概太短了,否则,他们会看到一亿卢布的后备对于我们这样的国家只是沧海一粟。有些人认为我们根本不需要这种后备。好吧,如果我们今年遭到歉收或受到其他什么灾害,那怎么办呢?我们将靠谁的资金来周转呢?要知道别人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白白给我们帮助的,所以我们必须有自己的一点储备。如果

今年不发生意外事情,我们就可以把这笔后备用于国民经济事业,首先是用于工业。放心吧,这些后备是不会没有用处的。

同志们,为了把我国工业化所必需的国内积累的可能性变为实际的社会主义积累,在我们经济生活中首先必须抓住的几个关键大体上就是如此。

四

积累的正确使用。节约制度

但是问题不只限于并且不能只限于积累,还要善于合理地、节省地支出积累起来的后备,使人民的财产一个钱也不白费,使积累主要用在满足我国工业化最迫切需要的方面。没有这些条件,我们所积累的资金就有被贪污的危险,就有被分散地使用在和工业、推进整个国民经济毫无关系的各种大大小小的开支上去的危险。善于合理地、节省地支出资金,——这是极其重要的艺术,并不是一下子就能掌握的。决不能说,我们,我们苏维埃机关和合作社机关,在这方面是特别高明的。恰恰相反,所有的材料都说明,我们在这方面还差得很远。同志们,承认这一点是很痛心的,但这是事实,是用任何决议都掩盖不了的。有时我们的管理机关真象这样一个农民:积蓄了一点钱,但不用这点钱去修理犁头,去改进自己的经营,却买了一架大留声机,结果……破产了。至于所积累的后备被直接贪污的事实,我们许多国家机关大肆挥霍的事实,偷窃的事实等等,我就不说了。

因此,必须采取一系列的的办法来保护我们的积累不被分散,不

被贪污,不被挪用在不必要的用途上,不离开我国工业建设的基本路线。

第一,必须使我国工业计划不是按照官僚主义的臆想而是密切联系我国国民经济状况、联系对我国资源和后备的估计来制定的。在制定工业建设计划上不能落后于工业发展。但也不能向前跑得太远,脱离农业,不顾我国的积累速度。

我国国内市场需求和我国资源的规模——这就是我国工业扩展的基础。我国工业是以国内市场为基础的。就这方面来说,我国的经济发展很象美国,而不同于英国,因为美国工业是在国内市场基础上成长起来的,而英国工业首先是以国外市场为基础的。英国许多工业部门的产品百分之四十至五十是输往国外市场的。美国则相反,它一直以国内市场为基础,其产品输出国外市场的不过百分之十至十二。比起美国工业来,我国工业将在更大的程度上依靠国内市场,首先是依靠农民市场。这就是工业和农民经济结合的基础。

关于我国积累的速度,关于我们握有的用以发展我国工业的后备,也应该这样说。我们有些人有时喜欢制定空想的工业计划,而不顾我们的资源。人们有时忘记了,没有一定的最低限度的资金,没有一定的最低限度的后备,就不能制定工业计划,也不能建设任何“规模宏大”和“包罗万象”的企业。他们忘记了这一点,向前跑得太远了。在制定工业计划上向前跑得太远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不量力地建设。这就是高喊宏大计划,招收成千上万的工人到生产中来,大嚷大叫,到后来发现资金不够,就解散工人,发遣散费,于是遭受极大的损失,给建设事业带来失望,在政治上出丑。这是我们所需要的吗?不,同志们,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既不需要落在工业发展进程的后面,也不需要向前跑得太远。我们需要

和工业发展在同一水平上前进,我们需要推进工业而又使它不脱离自己的基础。

我国工业是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的领导因素,它带领着、引导着我国国民经济(包括农业)前进。它依照自己的面貌和模样改组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它领导农业,通过合作社把农民引上社会主义建设的轨道。但是我国工业,只有在下脱离农业,只有在不撇开我国积累的速度,不撇开我们所握有的资源和后备的情况下,才能光荣地完成这个领导和改造的使命。军队中的指挥人员如果脱离自己的军队并失去同它的联系,就不再成其为指挥人员了。同样,工业如果脱离整个国民经济并失去同它的联系,也就不再成其为国民经济的领导因素了。

正确而合理地制定工业计划是适当使用积累的必要条件之一,其理由就在这里。

第二,必须自下而上地精简并健全我们国家机关和合作社机关、我们各人民委员部的机关和经济核算机关。我们管理机关的编制庞大和挥霍无度已成为大家谈话的资料。难怪列宁曾几十次几百次重复说,工人和农民忍受不了我们国家机关的机构臃肿和开支浩繁,无论如何要用一切办法和一切手段来加以精简。最后,应该以认真的态度,以布尔什维克的精神从事这项工作,实行极严格的节约制度。(鼓掌)最后,如果我们今后不愿使我国的积累分散从而损害工业,就应该担当起这项工作来。

这里给你们举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有人说我们的粮食输出是无利的,不合算的。为什么这是无利的呢?因为收购机关在收购粮食上花费了过多的钱。经我们所有制定计划的机关查明,收购一普特粮食只需八戈比。实际上呢,收购一普特所花的不是八戈比而是十三戈比,多花了五戈比。怎么会弄成这样呢?因为每个比较独立

的收购人员,共产党员或非党员都是一样,在着手收购粮食以前,都认为必须扩充自己的工作编制,添用大批速记员和打字员,一定要置备一辆汽车,造成一大笔非生产开支,等到后来结账时,才发现我们的输出是不合算的。假如我们收购了几亿普特粮食,每一普特多花五戈比,那么浪费的钱就达几千万卢布了。如果我们不采取最严厉的措施来对付我们国家机关的挥霍现象,我们积累起来的资金就会这样花掉,而且将来还会这样花掉。

我在这里只举了一个例子。但是谁不知道这样的例子我们有几百个几千个呢?

我们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决定精简我们的收购机关。全会通过的与此有关的决议,你们大概已经看过。这个决议已经在报刊上发表了。我们将十分严格地执行这个决议。但是,同志们,这还是不够的。这只是我们国家机关的混乱状况和缺陷的极小部分。我们应当更进一步,应当采取办法来自下而上地精简整个国家机关,各人民委员部的机关和经济核算机关,所有的合作社机关和整个商品运销网。

第三,我们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来反对我们管理机关和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铺张现象,反对我们这里最近可以看到的对人民财产和国家后备所采取的犯罪的态度。我们这里现在放荡成风——毫无节制地庆祝各种节日,举行各种庆祝大会、纪念典礼、纪念碑揭幕式等等。几万几十万卢布白白糟蹋在这些“事业”上。各式各样的纪念对象和盛大仪式的爱好者在我们这里如此之多,纪念半周年、周年、二周年等等典礼的心愿如此之大,要满足这种需要,真得有几千万卢布才行。同志们,应该结束这种共产党员所不应有的放荡行为了。最后,应该明白,我们背后既有我国工业方面

指 1926 年 4 月 9 日联共(布)中央全会通过的《关于组织粮食收购机关开展 1926—1927 年度粮食收购运动》的决议。——编者注

的需要,面前又有大批失业和儿童流离失所的事实,自然就不能容许而且没有权利容许这种放荡行为和这种毫无节制的铺张浪费。

最值得注意的是非党群众有时比党员更爱惜我们国家的资财。共产党员在这种场合的行动是更勇敢更坚决的。他毫不在乎地发给许多职员补助金,称之为分红,虽然这里并没有什么红利气味。他毫不在乎地逾越法律,回避法律,违犯法律。非党群众在这方面倒是较为小心较为审慎的。这大概是共产党员有时认为法律、国家等等东西都是家里事情的缘故。(笑声)正因为如此,有些共产党员有时就不费什么气力,象猪一样地(同志们,请原谅我这样说)跨进国家菜园,在那里饱吃一顿,或者是拿国家资财来表示自己的慷慨。(笑声)同志们,应该消灭这种不成体统的现象了。如果我们想真正保存我们的积累以应我国工业的需要,那就应该展开坚决的斗争来反对我们管理机关和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放荡行为和铺张浪费。

第四,我们必须和盗窃行为,和我们国家机关、合作社、工会以及其他机关里所谓“快乐的”盗窃行为进行不断的斗争。象报刊上所說的,有羞怯的隐蔽的盗窃行为,也有勇敢的“快乐的”盗窃行为。不久以前我在《共青团真理报》¹²²上读了奥库涅夫关于“快乐的”盗窃行为的短文。原来有这样一个潇洒放肆的家伙,一个留着小胡子的年轻人,他在我们的一个机关里快乐地进行盗窃,他经常地、不停手地进行盗窃,并且总是盗窃到手。在这里值得注意的并不是盗贼本人,而是这样的事实:周围的公众明明知道他是盗贼,可是不仅不和他斗争,反而觉得可以拍拍他的肩膀,称赞称赞他的手法高明,因而盗贼在公众眼里成了一种英雄。同志们,这是值得注意的,这是最危险的。当捉到一个奸细或叛徒的时候,公众有无限的愤怒,都要求枪决他。可是当盗贼公然横行,盗窃国家财产的

时候,周围的公众却只是和善地笑笑,拍拍他的肩膀。其实很明显,盗贼既然盗窃人民的财产,损害国民经济的利益,也就是奸细和叛徒,甚至比奸细和叛徒还坏。当然,这个留着小胡子的潇洒放肆的家伙终于被逮捕了。但是逮捕一个“快乐的”盗贼有什么意思呢?这样的盗贼在我们这里何止千百。单靠国家政治保卫局是不能把他们全部除尽的。这里必须采取另外的办法,采取更有效更认真的办法。这种办法就是在这些小偷周围造成公众普遍的道德抵制和憎恨的气氛。这种办法就是在工人和农民中间掀起一个运动,造成一种道德气氛,使盗窃行为绝无发生的可能,使盗窃和贪污人民财产分子,不论“快乐的”或“不快乐的”,都不能生活并存在下去。和盗窃行为作斗争是保护我们的积累不被贪污的手段之一,——任务就是如此。

最后,我们必须进行一个运动来消灭工厂里的旷工现象,提高劳动生产率,巩固我们企业中的劳动纪律。旷工现象使工业丧失几万以至几十万个工作日。因此,白白地丢掉几十万以至几百万卢布而使我国工业受到损害。如果旷工现象不停止,如果劳动生产率停留在一点上,我们就不能推进我国的工业,我们就不能提高工资。应该向工人们特别是进工厂不久的工人们说明,要是听凭旷工现象存在而不提高劳动生产率,他们实际上就是损害共同事业,损害整个工人阶级,损害我国工业。为了我国工业的利益,为了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必须对旷工现象作斗争,争取提高劳动生产率,——任务就是如此。

为了保护我们的积累和我们的后备不被分散,不被贪污,为了使这些积累和这些后备用在我国工业化方面,其必需的办法和手段就是如此。

五 要造就工业建设干部

我已经讲过工业化的方针,讲过积累后备来开展工业化的道路,最后,讲过合理地使用积累以满足工业需要的办法。但是,同志们,这一切还是不够的。要实现党关于我国工业化的指示,除了这一切以外,还必须造就新的干部,新的工业建设干部。

任何一种任务,特别是象我国工业化这样的巨大任务,如果没有富有朝气的人,没有新的人才,没有新的建设干部,那就不可能实现。从前,在国内战争时期,我们特别需要建军和作战的指挥干部,需要团长和旅长、师长和军长。没有这些出身下层和因为有才干而提升起来的新的指挥干部,我们就不能建立军队,我们就不能战胜我们的许许多多的敌人。是他们这些新的指挥干部当时挽救了我们的军队和我们的国家,——当然这是在工人和农民的共同支持之下。但是我们现在是处在工业建设时期。现在,我们已从国内战争的战线转到工业战线了。与此相适应,现在我们需要新的工业指挥干部,需要优秀的工厂经理,优秀的托拉斯领导干部,能干的商业人员,聪明的工业建设计划人员。现在我们需要锻炼出经济方面和工业方面新的团长和旅长、师长和军长。没有这样的人才我们就一步也不能前进。

因此,任务就在于从工人和苏维埃知识分子——那些把自己的命运和工人阶级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并且跟我们一道建设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基础的苏维埃知识分子——队伍中,造就大批的工

业建设干部。

任务就在于造就这样的干部并把他们提拔到重要的岗位上，给他们一切帮助。

近来我们老是爱斥责经济工作人员，说他们腐化堕落，而且爱把个别不好的现象推广到一切经济工作干部身上。无论是谁，只要他高兴，往往就会认为必须把经济工作人员痛骂一顿，斥责他们罪大恶极。同志们，应该把这种恶劣习惯永远抛掉。要知道，丑事家家有。要知道，我国工业化和提拔新的工业建设干部的任务，不是要求责骂经济工作人员，恰恰相反，而是要求在我国工业建设方面给他们一切帮助。使经济工作人员处在信任和支持的气氛中，在造就新的工业建设人才方面帮助他们，使工业建设者的岗位成为光荣的社会主义建设岗位，——这就是我们党组织的工作现在应有的方向。

六

要提高工人阶级的积极性

由于我国采取了工业化方针而摆在我们面前的最近任务就是如此。

没有工人阶级的直接帮助、直接支持，能不能实现这些任务呢？不，不能。推进我国工业，提高工业生产率，造就新的工业建设干部，正确地进行社会主义积累，合理地使用积累以满足工业需要，建立极严格的节约制度，整顿国家机关，使它精简廉洁，清除国家机关在我国建设时期所沾染的恶习和污秽，经常对贪污和浪费

国家财产的人作斗争，——所有这些任务，如果没有千百万工人阶级群众直接的和经常的支持，任何政党都是不能解决的。因此，任务就在于吸引千百万非党工人群众来参加我国的全部建设工作。需要使每个工人和每个诚实的农民都帮助党和政府实行节约制度，对贪污和分散国家后备的现象作斗争，驱逐戴着各种假面具的盗贼和骗子，健全并精简我们的国家机关。在这方面生产会议会给予不可估价的帮助。有一个时候，生产会议在我国非常盛行，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却不听说了。同志们，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无论如何要使生产会议活跃起来。在生产会议上需要提出的不仅是小问题，比方说，保健设施问题。必须使生产会议讨论的内容更广泛些，更丰富些。应该在生产会议上提出工业建设的基本问题。只有用这样的办法才能提高千百万工人阶级群众的积极性，才能使他们成为自觉的工业建设的参加者。

七

要巩固工农联盟

但是在谈到提高工人阶级的积极性时，也不可把农民忘掉。列宁教导我们说，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则。这是我们不应当忘记的。发展工业，实行社会主义积累，实行节约制度，——所有这些任务，如果不加以解决，我们就不能战胜私人资本并消灭我国经济生活中的困难。但是，如果没有苏维埃政权存在，没有无产阶级专政，这些任务就一个也不能解决。而无产阶级专政是依靠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的。因此，如果我们破坏或

削弱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我们的一切任务就会悬在空中。

我们党内有一些人把劳动农民群众看成异类,看成工业的剥削对象,看成我国工业的殖民地之类的东西。同志们,这些人是危险的人。对于工人阶级来说,农民既不能是剥削对象,也不能是殖民地。农民经济是工业的市场,正象工业是农民经济的市场一样。但农民对于我们不仅是市场,而且是工人阶级的同盟者。正因为如此,农民经济的提高,农民的普遍合作化,农民物质生活状况的改善,是一种前提,没有它就不能保证我国工业有较大的发展。反过来说,发展工业,生产农业机器和拖拉机,以大量工业品供给农民,又是一种前提,没有它就不能推进农业。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极重要的基础之一。因此,我们不能同意一些同志的意见,他们时常要求用过多增加税收、提高工业品价格等等办法来加紧压榨农民。我们不能同意他们,因为他们是在不自觉地破坏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动摇无产阶级专政。我们所要做的是巩固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而不是破坏这种联盟。

但是我们所捍卫的不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的任何一种联盟。我们所主张的是领导作用属于工人阶级的这种联盟。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工人阶级在工农联盟体系中的领导作用,被剥削劳动群众就不可能战胜地主和资本家。我知道有些同志是不同意这一点的。他们说,联盟是好事情,但是,为什么还要工人阶级的领导呢?这些同志大错特错了。他们错了,因为他们不懂得只有久经考验和最革命的阶级即工人阶级所领导的工农联盟才能取得胜利。

为什么普加乔夫或斯切潘·拉辛所领导的农民起义失败了呢?为什么当时农民没有能够把地主赶走呢?因为他们没有而且当时也不可能象工人阶级这样的革命领导者。为什么法国革命是以资产阶级胜利和早先被赶走的地主的返回而结束呢?因为当

时法国农民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象工人阶级这样的革命领导者，——当时领导农民的是资产阶级自由派。我们国家是世界上工农联盟战胜了地主和资本家的唯一国家。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过去领导并且现在继续领导我国革命运动的是在战斗中久经考验的工人阶级。只要破坏我们的工人阶级领导这一思想，工农联盟就会完全垮台，资本家和地主就会重回自己的老巢。

正因为如此，我们应当保持并巩固我国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

正因为如此，我们应当保持并巩固工人阶级在这个联盟体系中的领导。

八 要实行党内民主

我已经讲过提高工人阶级积极性的问题，讲过吸引千百万工人阶级群众来参加我国经济建设事业、参加工业建设事业的问题。可是提高工人阶级积极性是一件严肃而重大的事情。要提高工人阶级积极性，首先必须使党本身积极起来，必须使党本身毅然决然走上党内民主的道路，必须使我们的各级组织吸引那些决定我们党的命运的广大党员群众来参加我国建设问题的讨论。否则就谈不到工人阶级的积极化。

我特别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我们的列宁格勒组织不久以前经历了这样一个时期，当时某些领导者不愿谈党内民主，不然就是带着嘲笑的口吻来谈它。我所指的是党代表大会即将举行时、代表大会

期间以及代表大会刚开完之后的那个时期,当时在列宁格勒不许党组织集会,当时党组织的某些领导者对于党组织俨然是一个小警长(请原谅我的直率),禁止党组织开会。以季诺维也夫为首的所谓“新反对派”就是在这一点上碰了钉子的。

如果说,我们中央委员们在列宁格勒积极分子帮助下,两周内就能把你们这里那个反对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决议的反对派挤到一边并使它孤立,那么,这是由于代表大会决议的解释运动符合民主精神,这种精神在列宁格勒组织内曾经有过,它竭力要表现出来,而且终于表现出来了。同志们,我希望你们接受不久以前的这个教训。我希望你们接受这个教训,忠实而坚决地实行党内民主,提高党员群众的积极性,吸引他们来讨论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问题,并说服他们相信我们党中央四月全会所通过的决议的正确性。我所希望的就是你们要说服党员群众,因为说服的方法是我们在工人阶级队伍中的基本工作方法。

九 要维护党的统一

有些同志认为党内民主就是各派别集团的自由。在这一点上,同志们,那可要请原谅了!我们不是这样理解党内民主的。党内民主和派别集团的自由之间没有而且不能有丝毫共同之处。

党内民主是什么呢?党内民主就是提高党员群众的积极性并加强党的统一,加强党内自觉的无产阶级纪律。

派别集团的自由是什么呢?派别集团的自由就是瓦解党的队

伍 ,把党分裂为各个中心 ,削弱党 ,削弱无产阶级专政。

在这里 ,它们之间能有什么共同之处呢 ?

我们党内有一些人 ,他们在睡眠中也梦见全党展开了争论。我们这里有一些人 ,他们不能想象党会没有争论 ,他们满想得到职业争论家的头衔。让这些职业争论家离开我们远些吧 ! 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臆造出来的争论 ,不是把我们党变成争论的俱乐部 ,而是加紧我们的整个建设工作 ,特别是加紧工业建设 ,把坚定而满怀信心地领导我国建设工作的党 ,战斗的团结的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党巩固起来。谁力图进行永无止境的争论 ,谁力图争取派别集团的自由 ,谁就是破坏党的统一 ,谁就是损害我们党的实力。

我们过去的强大是靠什么 ,我们现在的强大又是靠什么呢 ? 就是靠正确的政策和我们队伍的统一。正确的政策已由我们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给我们制定出来了。现在任务就在于保证我们队伍的统一 ,保证我们党的统一。我们党决心不顾一切来实行党代表大会的决议。

我们党中央全会的决议的意义基本上就是如此。

十 结 论

现在让我来做结论吧。

第一 ,我们应当推进我国工业 ,因为它是社会主义的基础和引导整个国民经济前进的领导力量。

第二 ,我们应当造就新的工业建设干部 ,因为他们是工业化方

针的直接执行者。

第三,我们应当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积累的速度,应当积累后备以应我国工业的需要。

第四,必须正确使用积累起来的后备,并建立最严格的节约制度。

第五,必须提高工人阶级的积极性,并吸引千百万工人群众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第六,必须巩固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以及工人阶级在这一联盟中的领导。

第七,必须提高党员群众的积极性,实行党内民主。

第八,我们应当维护并巩固我们党的统一、我们队伍的团结。

我们是否能完成这些任务呢?是的,能完成,只要我们愿意这样做。而我们是愿意这样做的,这一点大家都看得出来。是的,能完成,因为我们是布尔什维克,因为我们不怕困难,因为困难的存在就是为了让它跟它作斗争并克服它。是的,能完成,因为我们的政策是正确的,我们知道我们是在往哪里走。我们坚定地满怀信心地向着目标前进,向着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前进。

同志们!九年以前,1917年2月,我们在列宁格勒是一个小小的集团。老党员都记得,我们布尔什维克当时在列宁格勒苏维埃中占极小的少数。老布尔什维克应当记得,当时布尔什维主义的许许多多敌人都讥笑我们。但是我们前进了,夺取了一个阵地又一个阵地,因为我们的政策是正确的,我们是以团结的队伍来进行斗争的。后来这个小小的力量发展成一个伟大的力量。我们粉碎了资产阶级并推翻了克伦斯基。我们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我们粉碎了高尔察克和邓尼金。我们从我国境内赶走了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强暴者。我们克服了经济破坏状态。最后,我们恢复了我国的工业和

我国的农业。现在 ,我们面前摆着一个新任务—— 我国工业化的任务。最严重的困难已经过去了。可以不可以怀疑我们能完成我国工业化这个新任务呢 ?当然不可以。相反地 ,我们现在有一切条件来克服困难并实现我们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向我们提出的新任务。

同志们 ,正因为如此 ,我才认为在新的工业战线上我们一定会取得胜利。(热烈鼓掌)

载于 1926 年 4 月 18 日
《列宁格勒真理报》第 89 号

选自《斯大林全集》第 8 卷
第 109—134 页

论中国革命的前途

(1926年11月30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中国委员会会议上的演说)

同志们 在谈到本题以前,我认为必须声明,关于中国问题,我手头缺乏展示中国革命全貌所必需的详尽材料。因此,我不得不只谈几点带原则性的和中国革命基本方向问题有直接关系的一般意见。

关于中国问题,我有彼得罗夫的提纲、米夫的提纲、谭平山的两个报告和拉费斯的意见书。我认为所有这些文件虽然各有长处,可是都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它们都忽略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的根本问题。我认为首先必须注意这些缺点。因此,我的意见将同时带有批判性质。

—

中国革命的性质

列宁说过,中国人在最近期间将有自己的1905年。某些同志把这句话了解为在中国人那里一定会一模一样地重演我们俄国1905年所发生过的事情。同志们,这是不对的。列宁根本不是说中国革命将是俄国1905年革命的翻版。列宁只是说中国人将有自己

的 1905 年。这就是说 ,除 1905 年革命的一般特点外 ,中国革命将还有它自己独有的特点 ,而这些特点又一定会给中国革命印上自己的特别标记。

这些特点是什么呢 ?

第一个特点是中国革命既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又是把自己的锋芒指向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的民族解放革命。这就是它首先和 1905 年俄国革命不同的地方。因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不仅表现在它的军事威力上 ,而且首先表现在中国工业的命脉即铁路、工厂、矿山、银行等都处在外国帝国主义者支配或控制之下。由此可以得出结论 ,和外国帝国主义及其中国走狗作斗争的问题不能不在中国革命中发生重大作用。这就使中国革命和世界各国无产者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直接结合起来。

中国革命的第二个特点是中国大民族资产阶级极端软弱 ,它比 1905 年时期的俄国资产阶级软弱得多。这是不言而喻的。既然工业的命脉集中在外国帝国主义者手里 ,中国大民族资产阶级就不会不软弱和落后。在这一方面 ,米夫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是中国革命特有的事实之一 ,是完全正确的。由此应该得出结论 ,中国革命的倡导者和领导者 ,中国农民的领袖 ,必然应当由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担任。

同时不应该忘记中国革命的第三个特点 ,就是在中国旁边有苏联存在着并且发展着 ,它的革命经验和它的帮助不能不对中国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中国中世纪封建残余的斗争起促进作用。

决定中国革命的性质和方向的中国革命的主要特点就是如此。

二

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干涉

前面提到的那些提纲的第一个缺点,是它们都忽略了或低估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干涉问题。要是细读这些提纲,就可能认为目前中国,说实在的,并没有帝国主义的干涉,而只有北军对南军的战争,或一派军阀对另一派军阀的战争。并且有些人惯于把干涉了解为确有外国军队进入中国境内这样一种状况;如果没有这种事实,那就没有干涉。

同志们,这就大错特错了。干涉决不限于军队入境,而军队入境也决不是干涉的主要特点。在资本主义国家现今革命运动的条件下,在外国军队直接入境可能引起许多抗议和冲突的时候,干涉已带有比较圆滑的性质和比较隐蔽的形式。帝国主义在现今的条件下进行干涉,偏重于采取在附属国组织国内战争的办法,采取资助反革命势力反对革命的办法,采取在精神和财政上支持其中国走狗反对革命的办法。帝国主义者喜欢把邓尼金和高尔察克、尤登尼奇和弗兰格尔反对俄国革命的斗争描绘为纯粹的国内斗争。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而且不仅我们,连全世界都知道,站在这些反革命的俄国将军背后的是英、美、法、日帝国主义者,假使没有他们的支持,俄国根本不会有严重的国内战争。关于中国也必须这样说。假使各国帝国主义者不鼓励吴佩孚和孙传芳、张作霖和张宗昌,假使各国帝国主义者不供给他们款项、军械、教官、“顾问”等等,这些反革命军阀反对中国革命的斗争简直是不可能的。

广州军队的力量在哪里呢?在于他们有思想,有热情,这鼓舞

着他们为摆脱帝国主义而斗争 ;在于他们给中国带来解放。中国反革命军阀的力量在哪里呢 在于他们背后站着各国帝国主义者 ,站着中国所有一切铁路、租界、工厂、银行和洋行的老板。

因此 ,问题不仅仅在于或者甚至并不在于外国军队的入境 ,而在于各国帝国主义者给予中国反革命的援助。假他人之手进行干涉 ,——这是现在帝国主义干涉的根本特点。

因此 ,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干涉是毫无疑问的事实 ,这也正是中国革命的矛头所向。

因此 ,谁忽略或低估帝国主义干涉中国的事实 ,谁就是忽略或低估中国最主要和最基本的东西。

据说日本帝国主义者对广州派和整个中国革命有表示“好感”的某些迹象。据说美国帝国主义者在这方面也不落后于日本帝国主义者。同志们 ,这是自己骗自己。必须善于区别帝国主义者(包括日、美帝国主义者)的政策的本质和它的伪装。列宁常说 ,革命者很难被棍棒和拳头制服 ,可是 ,他们有时却很容易被亲善制服。同志们 ,永远不要忘记列宁说的这个真理。十分明显 ,日、美帝国主义者是很好地领会了这个真理的意义的。因此 ,必须把帝国主义者对广州派的亲善和恭维同最殷勤地表示亲善的帝国主义者死抓住“自己”在中国的租界和铁路而不肯放弃这一事实严格区别开来。

三

中国的革命军队

对于前面提到的那些提纲的第二个意见是关于中国革命军队

的问题。因为军队问题在这些提纲中都被忽略或低估了。(有人喊道：“对！”)提纲的第二个缺点就在这里。通常不是把广州派的北进看作中国革命的展开，而是看作广州军阀对吴佩孚和孙传芳的战争，看作一些军阀和另一些军阀争雄称霸的战争。同志们，这就大错特错了。中国的革命军队是中国工农争取自身解放的极重要的因素。在今年5月或6月以前，有人估计冯玉祥军队失败后中国的局势是反动势力得势；可是后来，在今年夏天，当广州派常胜军向北推进而占领湖北时，局面就根本改观而有利于革命了，难道这是偶然的吗？不，这不是偶然的。因为广州派的推进就是对帝国主义的打击，对其中走狗的打击，就是给中国一切革命分子，特别是给工人以集会自由、罢工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中国革命军队的特点和极重要的意义就在这里。

从前，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革命是这样开始的，通常是大部分没有武装或武装很差的人民举行起义，他们和旧政权的军队发生冲突，他们竭力瓦解这种军队，或者至少把一部分军队拉到自己方面来。这是过去革命爆发的典型形式。1905年我们俄国的情形也是这样。中国的情况却不同。在中国，和旧政府的军队对抗的，不是没有武装的人民，而是以革命军队为代表的武装的人民。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中国革命军队的特殊意义正在这里。

这就是为什么对革命军队的低估是上述那些提纲的不可容忍的缺点。

由此应得出结论，中国共产党人应当特别注意军队工作。

第一，中国共产党人应当尽力加强军队中的政治工作，竭力使军队成为中国革命思想的真正的和模范的体现者。这一点所以特别必要，因为和国民党没有丝毫共同点的各种各样的军阀现在都

依附广州派,依附这股正在摧毁中国人民的敌人的力量,而他们在依附广州派时,也把腐化作风带进了军队。要使这些“同盟者”不起什么作用或者使他们成为真正的国民党人,只有加强政治工作并对他们进行革命监督。不这样做,军队就会陷于极困难的境地。

第二,中国革命者,包括共产党人在内,应当着手深入研究军事。他们不应当把军事看作次要的事情,因为军事在中国现在是中国革命极重要的因素。中国革命者,其中包括共产党人,应当学好军事,以便逐渐前进并在革命军队中担任某些领导职务。要使中国革命军队循着正确道路向目的前进,其保证就在这里。不这样做,军队中的动摇和犹豫就会不可避免。

四

中国未来政权的性质

第三个意见是提纲中对于中国未来革命政权性质的问题没有估计到或者估计不足。米夫在他的提纲中刚接触到这个问题,这也就是他的贡献。但是他在刚接触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不知道怕什么,不敢把问题彻底阐明。米夫认为中国未来的革命政权将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小资产阶级的政权。这是什么意思呢?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⁵⁹在1917年二月革命时期也是小资产阶级政党,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是革命的政党。这是不是说中国未来的革命政权将是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的政权呢?不,不能这么说。为什么呢?因为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的政权在本质上是帝国主义的政权,而中国未来的革命政权不会不是反帝国主义的政权。这里有

根本的差别。

麦克唐纳政府甚至是“工人的”政权,但它同时又是帝国主义的政府,因为它是以保存英国的帝国主义政权例如在印度和埃及的政权为基础的。中国未来的革命政权优于麦克唐纳政府的地方就是它将是反帝国主义的政权。

问题不仅在于广州政权(未来全中国革命政权的萌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而首先在于这个政权是并且不会不是反帝国主义的政权,这个政权的每一进展都是对世界帝国主义的打击,因而也是有利于世界革命运动的打击。

列宁说得对,既然从前,在世界革命时代到来以前,民族解放运动是一般民主主义运动的一部分,那么现在,在俄国苏维埃革命胜利和世界革命时代到来以后,民族解放运动就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了。

这个特点米夫没有估计到。

我以为中国未来的革命政权,就其性质来说,大体上将类似我们在1905年所说的那种政权,即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之类的政权,然而不同的是,这主要将是反帝国主义的政权。

这将是走向非资本主义发展,或者更确切些说,走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过渡政权。

这就是中国革命应当走的方向。

下面三种情况有利于这条革命的发展道路:

第一,中国革命是民族解放革命,它的矛头将指向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

第二,中国的大民族资产阶级是软弱的,比1905年时期俄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更软弱,这使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使无产阶级政党对中国农民的领导易于实现;

第三,中国革命将在可能利用苏联胜利了的革命的经验和帮助的情况下发展起来。

这条道路是否一定和绝对能取得胜利,这取决于许多情况。不管怎样有一点是很明显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任务正是为中国革命的这条发展道路而斗争。

由此就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怎样对待国民党和中国未来革命政权这个问题上的任务。有人说,中国共产党人应当退出国民党。同志们,这是不对的。中国共产党人现在退出国民党将是极大的错误。中国革命的全部进程、它的性质、它的前途都毫无疑问地说明中国共产党人应当留在国民党内,并且在那里加强自己的工作。

但是,中国共产党可不可以参加未来的革命政权呢?不仅可以而且必须参加。中国革命的进程、它的性质、它的前途都雄辩地说明中国共产党必须参加中国未来的革命政权。

真正实现中国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必要保证之一就在这里。

五 中国的农民问题

第四个意见是关于中国的农民问题。米夫认为必须立即提出成立苏维埃即在中国农村成立农民苏维埃的口号。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米夫往前跑得太远了。不能撇开中国的工业中心而在农村建立苏维埃。而且在中国工业中心组织苏维埃的问题现在还不是迫切的问题。此外,必须注意:不能脱离环境来看苏维埃。苏维

埃,这里说的是农民苏维埃,只有在中国已处于摧毁旧事物并创造新政权的农民运动最高涨的时期,并且估计到中国工业中心已经冲破堤防而进入成立苏维埃政权的阶段,才能进行组织。可以不可以说中国农民和整个中国革命已经进入这个阶段了呢?不,不可以。因此,现在谈苏维埃就是往前跑得太远了。因此,现在应该提出的不是苏维埃的问题,而是成立农民委员会的问题。我是指由农民中选举出来的农民委员会,这种农民委员会能够表达农民的基本要求,并将采取一切办法以使用革命手段来实现这些要求。这种农民委员会应当成为一个轴心,农村的革命将围绕它不断开展起来。

我知道在国民党人中间,甚至在中国共产党人中间,有些人认为不可能在农村掀起革命,他们害怕把农民卷入革命以后会破坏反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同志们,这是极端荒谬的。把中国农民卷入革命愈迅速愈彻底,中国反帝国主义的战线就愈有力愈强大。提纲起草人,特别是谭平山和拉费斯说得完全正确,他们断言立即满足农民一些最迫切的要求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最必要的条件。我认为现在应该打破某些国民党人物行动中那种对农民冷淡和“不介入”的态度了。我认为不论中国共产党或国民党(也就是广州政权)都应当立即从言论转到行动,提出立刻满足农民最切身要求的问题。

在这方面前途会怎样,可以而且应该达到什么程度——这要看革命的进程而定。我以为归根到底应该引导到土地国有化。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弃绝土地国有化这样的口号。

为了唤起中国千百万农民参加革命,中国革命者应当走哪些道路呢?

我认为在当前条件下可以谈到的只有三条道路:

第一条道路就是成立农民委员会以及中国革命者加入这种委员会来影响农民的道路。(有人喊道：“可是农民协会呢？”)我认为农民协会将聚集在农民委员会的周围,或者把农民协会变成农民委员会,使它具有为实现农民的要求所必需的某种权力。关于这条道路,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但是只有这条道路是不够的。如果以为中国有足够的革命者来做这件事情,那就可笑了。中国约有四亿人口。其中约三亿五千万是汉族。其中十分之九以上是农民。如果以为几万个中国革命者就能汲干这个农民的汪洋大海,那就弄错了。这就是说,还需要其他道路。

第二条道路就是通过新的人民革命政权的机关来影响农民的道路。无疑地,在新解放的省份里将成立广州政权这种类型的新政权。无疑地,这种政权和这种政权的机关,如果要真正推进革命,就应当设法满足农民最迫切的要求。所以中国共产党人和一切革命者的任务就在于加入新政权机关,使这个机关接近农民群众,并通过这个机关来帮助农民群众满足他们的迫切要求,至于采用剥夺地主土地的办法还是采用减税减租的办法,则看情况而定。

第三条道路就是通过革命军队来影响农民。我已经讲过革命军队在中国革命中的极重要的意义。中国革命军队是这样的一种力量,它第一个打进新的省份,它第一个深入农民群众,农民首先凭它来判断新政权,判断新政权质量的好坏。农民对新政权、对国民党和对整个中国革命的态度,首先是看革命军队的行为,看它对农民和地主的态度,看它帮助农民的决心而定的。如果注意到有不少可疑分子混进了中国革命军队,这些分子可能使军队的面貌变坏,那就可以明白,军队的政治面貌以及它的农民政策在农民心目中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和一切中国革命者应当采取一切办法使军队中反农民的分子不起什么作用,保持军队

的革命精神,并做到使军队帮助农民,唤起农民参加革命。

据说在中国,人们都热烈欢迎革命军队,但是后来,在军队驻扎下来以后,就有些失望了。我们苏联在国内战争时期也有过同样的情形。这是由于军队解放了新的省份而在那里驻扎下来的时候,不得不这样或那样地靠周围的居民来养活。我们苏联革命者通常能够用如下的方法弥补这些缺点:我们竭力通过军队来帮助农民反对地主分子。必须使中国革命者也学会通过军队实行正确的农民政策来弥补这些缺点。

六

中国的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领导权

第五个意见是关于中国无产阶级的问题。我认为在提纲中对于中国工人阶级的作用和意义强调得不够。拉费斯问道:中国共产党人应当面向谁——面向国民党的左派还是中间派?奇怪的问题。我认为中国共产党人首先应当面向无产阶级,并使中国解放运动的活动者都面向革命。只有这样,问题才会提得正确。我知道在中国共产党人中间,有些同志认为工人为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状况和法律地位而举行罢工是不应该的,劝告工人不要罢工。(有人喊道:“广州和上海都有过这样的事情。”)同志们,这是很大的错误。这是极严重地低估了中国无产阶级的作用和比重。在提纲中应当指出这种绝对要不得的现象。如果中国共产党人不利用目前有利的形势帮助工人(即使通过罢工的方法)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状况和法律地位,那就是很大的错误。如果这样,在中国进行革命是为了什么呢?无产阶级的儿女在罢工期间遭受帝国主义走狗的鞭笞

和拷打,这样的无产阶级是不能成为领导力量的。无论如何必须消灭这种中世纪的祸害,使中国无产者感到自己的力量和尊严,使他们能够领导革命运动。没有这一点,中国革命就休想获得胜利。因此,中国工人阶级为了认真改善他们的地位而提出的经济的和法律的要求,应当在提纲中占有适当地位。(米夫说:“在提纲中已经说到这一点。”)是的,在提纲中已经说到这一点,但是可惜这些要求提得不够突出。

七 中国的青年问题

第六个意见是关于中国的青年问题。真奇怪,提纲中竟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然而青年问题现在在中国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谭平山的报告中讲到了这个问题,但是可惜讲得不够突出。青年问题现在在中国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学生青年(革命学生)、工人青年、农民青年——所有这些青年,如果使他们受国民党的思想和政治影响的话,都是一种可以推动革命一日千里地前进的力量。必须注意,谁也不象中国青年那样深刻而敏锐地体验到帝国主义的压迫,谁也不象中国青年那样尖锐而痛楚地感觉到必须和这种压迫作斗争。就尽力加强青年工作这一点来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者应当尽量估计到这种情况。在中国问题的提纲中,青年应当占有自己的地位。

附注:在当时条件下这种政策是正确的,因为那时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人和或多或少左倾的国民党人的联盟,执行着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政策。后来这种政策由于不再符合中国革命的利益而被取消了,因为国民党已经离开了革命并且后来变为反对革命的中心,而共产党人则与国民党决裂,退出了国民党。

八 几个结论

我想就中国反帝国主义斗争和农民问题方面指出几个结论。

无疑地,中国共产党现在不能只限于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了。现在甚至连张学良这样的反革命派也赞成这个要求了。显然,中国共产党应当更进一步。

其次,必须在自己面前提出铁路国有的问题作为远景。这是必要的,而且应该向这一方面做去。

再其次,必须注意到把最重要的工厂收归国有的远景。在这方面首先摆着的问题是把那些对中国人民特别仇视和特别富于侵略性的业主的企业收归国有。接着必须把农民问题向前推进,使它与中国革命前途联系起来。我认为最后还应该做到为农民没收地主的土地,并使土地国有。

其余的问题是不言而喻的。

同志们,我想提出的意见就是这些。

载于 1926 年 12 月 10 日
《共产国际》杂志第 13 期
(总第 71 期)

选自《斯大林全集》第 8 卷
第 321—334 页

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
全会¹²³上的报告和结论)

报 告

(1926年12月7日)

—

几点预先的说明

同志们！在讲到问题的实质以前，让我先作几点说明。

1 党内发展的矛盾

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党内斗争的问题，这个斗争不是昨天才开始的，而且它一直没有停止。

如果考察我们党自1903年作为布尔什维克派形成以来的历史，并探讨我们党从那时起直到今天的各个阶段，那么，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我们党的历史就是党内各种矛盾斗争的历史，就是克服这些矛盾并在克服这些矛盾的基础上逐渐巩固我们党的历史。也许有人以为俄国人太好吵架，喜欢争辩，爱闹意见，所以他们的党是通过克服党内矛盾而发展的。同志们，这是不对的。这里问题不在于好吵架。这里问题在于存在着原则上的意见分歧，这些分歧是

在党的发展的进程中,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进程中发生的。这里问题在于:只有通过为维护一定的原则、一定的斗争目标、以及达到目标的一定的斗争方法的斗争,矛盾才能克服。在当前政策问题上,在纯属实际性质的问题上,可以而且应该和党内抱有不同思想的人作各种妥协。但是,如果这些问题和原则上的意见分歧有关,则任何妥协、任何“中间”路线都无济于事。在原则性的问题上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没有“中间”路线。应当成为党的工作基础的不是这些原则,便是另一些原则。原则问题上的“中间”路线是引起思想混乱的“路线”,是掩饰意见分歧的“路线”,是使党在思想上蜕化的“路线”,是使党在思想上灭亡的“路线”。

西方社会民主党目前是怎样生活和发展的呢?它们有没有党内矛盾,有没有原则上的意见分歧呢?当然有。它们有没有在党员群众面前诚恳坦白地揭露这些矛盾并竭力克服这些矛盾呢?没有,当然没有!社会民主党的实践是要把这些矛盾和分歧掩盖起来,隐藏起来。社会民主党的实践是要把自己的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变成空洞的粉饰太平的集会,竭力隐藏和掩饰内部的意见分歧。但这只能造成党的思想混乱和思想贫乏。这就是过去是革命的而现在改良主义的西欧社会民主党堕落的原因之一。

但是,同志们,我们是不能这样生活和发展的。在原则问题上采取“中间”路线的政策不是我们的政策。在原则问题上采取“中间”路线的政策是衰颓的和蜕化的党的政策。这样的政策不能不使党变成一个开空车和脱离工人群众的空洞的官僚主义机构。这条道路不是我们的道路。

我们党过去的一切都证实了这个原理:我们党的历史就是克服党内矛盾并在克服这些矛盾的基础上不断巩固我们党的队伍的历史。

拿第一个时期,即《火星报》⁹时期,亦即我们党的第二次代表

大会¹⁰时期来看,当时在我们党内第一次发生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意见分歧,我们党的上层终于分裂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布尔什维克(列宁),一部分是孟什维克(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马尔托夫、查苏利奇、波特列索夫)。列宁当时是孤军作战的。你们要知道,当时关于那些离开了列宁的“了不起的人物”曾发出多少叫喊和呼号,然而斗争的实践和党的历史表明,这种分歧是有其原则基础的,这种分歧是真正革命的和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政党诞生和发展所必经的阶段。斗争的实践当时表明:第一,问题不在于数量而在于质量;第二,问题不在于形式上的统一,而在于统一要有原则基础。历史表明列宁是对的,而那些“了不起的人物”是不对的。历史表明,如果不克服列宁和“了不起的人物”之间的矛盾,我们就不会有真正革命的党。

拿下一个时期即1905年革命前夜的时期来看,当时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作为两个持有完全不同的政纲的营垒,仍然在一个党内处于互相对立的状态,当时布尔什维克正处于党的正式分裂的前夜,他们为了坚持我们革命的路线,不得不召开自己的单独的代表大会(第三次代表大会⁷⁷)。党的布尔什维克部分当时何以占了上风,何以博得了党内多数的同情呢?这是因为它没有掩饰原则上的意见分歧,并且用孤立孟什维克的办法来为克服这些分歧而斗争。

其次,我还可以举出我们党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即1905年革命失败以后的时期,亦即1907年的时期,当时有一部分布尔什维克,即以波格丹诺夫为首的所谓“召回派”⁸³,背离了布尔什维主义。这是我们党生活中的一个危急时期。这个时期有许多资格很老的布尔什维克离开了列宁和列宁的党。孟什维克当时大叫布尔什维克要灭亡。然而布尔什维主义并没有灭亡,短短一年半的斗争实践表明,列宁和列宁的党为克服布尔什维主义队伍中的矛盾而

斗争,是正确的。这些矛盾得以克服,并不是由于掩饰了它们,而是由于揭露了它们,由于进行了有利于我们党的斗争。

其次,我还可以举出我们党历史的第四个时期,即1911—1912年的时期,当时布尔什维克已恢复了几乎被沙皇反动势力击溃的党并驱逐了取消派¹²⁴。这时,也象以往各个时期一样,布尔什维克得以恢复并巩固了党,并不是由于掩饰了和取消派之间的原则上的意见分歧,而是由于揭露并克服了这些分歧。

再其次,我还可以指出我们党发展的第五个阶段,即1917年十月革命前夜的时期,当时以布尔什维克党几个著名领袖为首的一部分布尔什维克动摇了,不想举行十月起义,认为这是一种冒险。大家知道,布尔什维克能克服这个矛盾,也不是由于掩饰了意见分歧,而是由于为十月革命进行了公开的斗争。斗争的实践表明,如果不克服这些分歧,我们就会使十月革命陷于危急的境地。

最后,我还可以指出此后我们党内斗争发展的各个时期,即布列斯特和约时期⁵²,1921年(工会问题的争论)时期以及其他各个时期,这些时期你们都已知晓,我在这里就不多说了。大家知道,在所有这些时期中,也象过去一样,我们党是通过克服内部矛盾而成长和巩固起来的。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

结论就是:联共(布)是通过克服党内矛盾而成长和巩固起来的。

结论就是:以斗争的方法来克服党内意见分歧是我们党的发展规律。

可能有人会说,这是联共(布)的规律,而不是其他无产阶级政党的规律。这是不对的。这个规律是一切较大政党的发展规律,无论苏联无产阶级政党或西方无产阶级政党都是一样。如果在小国中的小党内可以用某种方法掩饰意见分歧,用一个人或几个人的

威信把意见分歧掩盖起来,那么在大国中的大党内,通过克服矛盾而发展,则是党成长和巩固所必不可少的因素。过去如此,现在还是如此。

我想在这里引证一下曾和马克思一起领导过西方无产阶级政党达数十年的恩格斯的一段有权威的话。这是十九世纪八十年的事情,当时德国施行反社会党人非常法¹²⁵,马克思和恩格斯侨居伦敦,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国外秘密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¹²⁶实际上指导着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工作。伯恩施坦当时是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还没有变成改良主义者),恩格斯常常和他通信讨论德国社会民主政策中最迫切的问题。下面就是他当时(1882年)写给伯恩施坦的一段话:

“看来大国的任何工人政党,只有在内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这是符合一般辩证发展规律的。德国党是在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¹²⁷的斗争中变成了现在的样子的,在这个斗争中连吵架本身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只有被拉萨尔特意豢养起来充当其工具的一帮恶棍没落以后,团结才有可能,其实就在那时我们的人去谋取团结也是过于匆忙了。在法国,有些人虽然抛弃了巴枯宁的理论,却继续运用巴枯宁的斗争手段,同时还想为了自己的特殊目的而牺牲运动的阶级性质,这些人也必须先行没落,然后团结才有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宣传团结就是十足的愚蠢。道德的说教对于反对目前情况下不可避免的幼稚病是没有帮助的。”(见《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1卷第324—325页)

在另一个地方(1885年)恩格斯说道:

“矛盾绝不能长期掩饰起来,它们总是以斗争来解决的。”(同上,第371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32页。——编者注

页)

首先必须这样来解释我们党内矛盾的存在以及我们党是以斗争的方法克服这些矛盾而发展起来的。

2 党内矛盾的根源

可是,这些矛盾和意见分歧从何而来,其根源何在呢?

我想,无产阶级政党内部的矛盾的根源在于两种情况。

这两种情况是什么呢?

第一,就是在阶级斗争的环境中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压力,无产阶级中最不坚定的阶层和无产阶级政党中最不坚定的分子往往受到这种压力的影响。不能认为无产阶级是完全与社会隔绝的,是站在社会之外的。无产阶级是社会的一部分,它和社会各种不同的阶层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党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因此,党也就不能和资产阶级社会中各种不同的阶层断绝联系并摆脱它们的影响。资产阶级及其思想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压力表现于:资产阶级的观念、风俗、习惯和情绪往往通过某些和资产阶级社会有一定联系的无产阶级阶层而渗透到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来。

第二,就是工人阶级的庞杂性,工人阶级内部存在着各种阶层。我认为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说可以分为三个阶层。

第一个阶层就是无产阶级的基本群众,它的核心,它的固定部分,就是那些早已和资本家阶级断绝联系的“纯血统的”无产者群众。这一无产阶级阶层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可靠的柱石。

第二个阶层就是那些不久以前才从非无产阶级,即从农民、小市民队伍、知识分子中分化出来的人。这批出身于其他阶级的人,在不久以前才加入无产阶级队伍,并把自己的作风、习惯、犹豫和动摇带到工人阶级中来。这个阶层是滋长各种无政府主义派别、半无政府主义派别和“极左”派别的最好的土壤。

最后,第三个阶层就是工人贵族,工人阶级的上层分子,无产阶级中生活最有保障的一部分,他们力求和资产阶级妥协,极爱巴结有权有势的人物,喜欢“出人头地”。这个阶层是滋长露骨的改良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的最好的土壤。

工人阶级的这后两个阶层虽然在外表上有所不同,却或多或少是培养一切机会主义的共同园地,在工人贵族的情绪占上风时,它培养公开的机会主义,而在和小资产阶级还没有完全断绝关系的工人阶级半小市民阶层的情绪占上风时,则培养以“左的”词句为掩护的机会主义。“极左的”情绪和公开的机会主义的情绪往往是一致的,这个事实一点也不奇怪。列宁不止一次地说过,“极左的”反对派是右的、孟什维克的、露骨的机会主义的反对派的改头换面。这是完全正确的。如果说“极左派”主张革命仅仅是因为他们盼望革命在明天就胜利,那么很明显,如果革命一旦受到阻碍,如果革命在明天不能胜利,他们一定会悲观失望,对革命丧失信心。

自然,每当阶级斗争发展到转折点的时候,每当斗争尖锐化和困难加重的时候,无产阶级各个阶层间在观点、作风和情绪上的差别,必不可免地表现为党内的某些意见分歧,而资产阶级及其思想的压力必然使这些分歧尖锐化,使这些分歧通过无产阶级政党内部的斗争来解决。

这就是党内矛盾和意见分歧的根源。

能不能避开这些矛盾和意见分歧呢？不，不能。以为能避开这些矛盾，就是欺骗自己。恩格斯说得对：长期掩饰党内矛盾是不可能的，这些矛盾总是以斗争来解决的。

这并不是说，党应当变成一个争论的俱乐部。相反地，无产阶级政党是而且应当始终是无产阶级的战斗组织。我仅仅想说，对党内的意见分歧，如果这些分歧是原则性的，不能把眼一闭，置之不理。我仅仅想说，只有为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路线而斗争，才能使无产阶级政党摆脱资产阶级的压力和影响。我仅仅想说，只有克服党内矛盾才能使党健全和巩固起来。

二

联共(布)党内反对派的特点

我已经作了几点预先的说明，现在让我谈谈联共(布)党内反对派的问题。

首先，我想指出我们党内反对派的几个特点。我指的是它表面上的显而易见的特点，而暂不涉及意见分歧的实质。我想这些特点可以归结为三个主要的特点。第一，联共(布)党内的反对派是联合起来的反对派，而不是什么“一般的”反对派。第二，反对派竭力以“左的”词句掩盖自己的机会主义，以“革命的”口号炫耀自己。第三，反对派由于自己没有一定的原则，往往抱怨别人不了解他们，反对派的首领们实质上代表着“不被了解的人们”的派别组织。(笑声)

先从第一个特点谈起。反对派在我们这里是作为联合起来的

反对派,作为过去受过党的谴责的种种派别的联盟而出现的,并且它不是随随便便“一般地”出现,而是在托洛茨基主义领导下出现的,——这一事实用什么来说明呢?

这要用下面的情况来说明:

第一,结成联盟的一切派别,不论是托洛茨基派、“新反对派”、“民主集中派”⁶⁴残余或是“工人反对派”¹²⁰残余,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机会主义的派别,它们或者是从产生时起就和列宁主义作斗争,或者是近来才开始和列宁主义作斗争。不用说,这个共同特点一定促使它们结成联盟来进行反对党的斗争。

第二,目前这一时期是个转折时期,这个转折时期重新直截了当地提出了我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因为这一切派别在某些革命问题上是和我们的党有过意见分歧的,而且继续存在着意见分歧,所以很自然,目前这个时期所具有的总结性质,在清算我们的一切意见分歧时,一定会推动这一切派别结成一个联盟,结成一个反对我们党的基本路线的联盟。不用说,这种情况不能不促使各色各样的反对派别联合成一个共同的营垒。

第三,一方面是我们党的强大有力和团结一致,一方面是一切反对派别的软弱无力和脱离群众,这就不能不使这些派别的分散的反对党的斗争成为显然无望的斗争,因此,各反对派别必然要走上把力量联合起来的道路,以使用各个集团的结合来弥补它们的软弱无力,从而,至少在表面上增加反对派成功的机会。

那为什么领导反对派联盟的正是托洛茨基主义呢?

第一,因为托洛茨基主义是我们党内现有一切反对派别中最完整的机会主义派别(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¹²⁸认定托洛茨基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的倾向,这是对的)。

第二,因为在我们党内没有一个反对派别能象托洛茨基主义

那样灵活而巧妙地以“左的”和最最最革命的词句掩盖自己的机会主义。(笑声)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托洛茨基主义领导各种反对派别来反对我们党,这并不是第一次。我想举出我们党历史上一个人所共知的前例,这是在1910—1914年间发生的,当时成立了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各种反党的反对派别的联盟,即所谓八月联盟。我所以要举出这个前例,是因为它是目前反对派联盟的某种原型。当时托洛茨基把取消派(波特列索夫、马尔托夫等人)、召回派(“前进派”¹²⁹)和他自己的集团联合起来一同反对党。而现在他又企图把“工人反对派”、“新反对派”和他自己的集团联合成一个反对派联盟了。

大家知道,列宁当时同八月联盟斗争了三年之久。关于即将形成的八月联盟,列宁曾这样写道:

“因此,我们代表全党声明:托洛茨基在执行反党的政策,他在破坏党的合法性,走上冒险和分裂的道路……托洛茨基对这个不容争辩的事实所以默不作声,是因为这个事实是同他的政策的实际目的不相容的。而这些实际目的愈来愈明显,甚至连最没有远见的护党分子都看得很清楚了。这些实际目的就是托洛茨基所支持和组织的波特列索夫之流同前进派结成的反党联盟。……这个联盟当然要支持托洛茨基的‘基金’和他所召开的反党的代表会议,因为波特列索夫先生之流和前进派从这里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使他们的派别组织得到自由,使派别组织神圣化,掩盖派别组织的活动,在工人面前为这种活动辩护。

正是从‘原则基础’上来看,我们不能不认为这个联盟是千真万确的冒险主义。托洛茨基不敢说他认为波特列索夫和召回派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社会民主主义原则性的真正维护者。冒险主义者的立场实质也就在于他不得经常躲躲闪闪。……正是从‘原则基础’上来看,托洛茨基和波特列索夫及前进派的联盟是一种冒险行为。从党的政治任务上来看,这样说也是对的。……中央全会闭幕后一年来的经验在事实上说明:体现着资产阶级对

无产阶级的这种影响的正是波特列索夫集团,正是前进派的派别组织。……最后,第三,托洛茨基的政策是组织上的冒险行为,因为,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它破坏党的合法性,而且以一个国外集团的名义(或者以呼声派¹³⁰和前进派这两个反党的派别组织的联盟的名义)召开代表会议,直接走上分裂的道路。”(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15卷第65、67—70页)

这就是列宁对以托洛茨基为首的第一个反党派别联盟的评论。

对目前还是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反党派别联盟,这个评论基本上也是适用的,但还须更尖锐一些。

这就是我们的反对派目前作为一个联合起来的反对派出现,并且不是“一般地”出现而是在托洛茨基主义领导下出现的原因。

反对派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如此。

现在谈谈第二个特点。我已经说过,反对派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力图以“左的”、“革命的”词句掩盖自己的机会主义的行为。我认为在这里不可能多谈那些证明在我们反对派的实践中“革命的”言论总是和机会主义的行为不一致的事实。只要看看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所通过的论反对派的提纲¹³¹,就完全可以了解这种伪装的内幕。我只想从我们党的历史上举出几个例子,来说明我们党内的一切反对派别在取得政权以后的时期中都竭力以“革命的”词句掩盖自己的非革命的行为,不断“从左面”批评党和党的政策。

例如拿“左派”共产主义者⁶³来看,他们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1918年)是反对党的。大家知道,他们“从左面”批评党,反对布列斯特和约⁸²,并认为党的政策是机会主义的、非无产阶级的、对帝

见《列宁全集》第17卷第14—15、17、18、19、20页。——编者注

国主义者妥协的政策。而事实上却是这样：“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布列斯特和约，就是在妨碍党获得“喘息时机”以组织和巩固苏维埃政权，帮助当时反对布列斯特和约的社会革命党人⁵⁹和孟什维克，为帝国主义力图扼杀刚刚出生的苏维埃政权这一勾当提供方便。

拿“工人反对派”(1921年)来看。大家知道，“工人反对派”也“从左面”批评党，百般“攻击”新经济政策，把列宁关于恢复工业必须先发展供给工业以原料和粮食的农业的论点“痛骂”得“体无完肤”；“痛骂”列宁这一论点是忘记了无产阶级的利益，是一种农民的倾向。而事实上却是这样：如果没有新经济政策，没有供给工业以原料和粮食的农业的发展，我们就不会有任何工业，而无产阶级就会处于丧失阶级性的状态。此外，“工人反对派”在这之后是向哪方面发展的，向右还是向左，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最后，拿托洛茨基主义来看，它“从左面”批评我们党已有好几年了，而且如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所正确指出的，它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倾向。在小资产阶级倾向和真正的革命性之间能有什么共同点呢？“革命的”词句在这里不过是小资产阶级倾向的掩盖物，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至于用“左的”叫喊来掩盖自己做了托洛茨基主义的俘虏的“新反对派”，我就不谈了。

这些事实说明什么呢？

它们说明用“左的”假面具来掩盖机会主义的行为，是取得政权以后我们党内所有一切反对派别的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

这是由于苏联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由于我国无产阶级内部保留下来的伟大的革命传统。这是由于苏联工人根本仇视反革命分

子和机会主义分子。这是由于我国工人不会轻信露骨的机会主义分子,因此,“革命的”假面具就是反对派用来至少在表面上吸引工人注意并使工人信任他们的钓饵。例如我国工人不能了解为什么英国工人直到现在还没有想到要把托马斯这样的叛徒溺死,把他们扔到井里去。(笑声)凡是知道我国工人的人都容易了解,象托马斯那样的人和那样的机会主义者在苏联工人中间简直是无容身之处的。然而大家知道,英国工人不仅不打算把托马斯这帮先生们溺死,而且又把他们选入总理事会¹³²,同时不是平平淡淡地选举他们,而是在选举时还举行游行示威。显然,对于这样的工人是用不着以革命的假面具掩盖机会主义的,因为他们本来就不反对把机会主义者吸收到自己的队伍里去。

这是由于什么呢?这是由于英国工人缺乏革命的传统。这种革命的传统目前正在产生。它们正在产生和发展,而且没有理由怀疑,英国工人正在革命战斗中受到锻炼。但是当这点还不具备时,英国工人和苏联工人间的差别是依然会存在的。这也就说明了这一事实:我们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如不戴上某种“革命的”假面具便去接近苏联工人,那是很冒险的。

反对派联盟使用“革命的”假面具的原因就在这里。

最后,谈谈反对派的第三个特点。我已经说过,这个特点就是反对派联盟没有一定的原则,它没有原则性,它象变形虫一样地善变,因此,反对派首领们经常抱怨“人们不了解”他们,“曲解了”他们,把他们“没有说过”的话硬加在他们身上等等。这的确确实是“不被了解的人们”的派别组织。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告诉我们,这个特点(“人们不了解!”)是任何机会主义最平常和最普遍的特点。同志们,你们应当知道,在九十年代末和二十世纪初,德国社会民主党队伍中著名的机会主义者伯恩施坦、福尔马尔、奥艾尔等人的

“遭遇”完全与此相同,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是革命的,这些地道的机会主义者曾经在好几年内抱怨“人们不了解”他们,“曲解了”他们。大家知道,当时德国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曾骂伯恩施坦的派别组织是“不被了解的人们”的派别组织。因此,人们把反对派联盟列入“不被了解的人们”的派别组织一类,这一事实不能认为是偶然的。

反对派联盟的几个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如此。

三

联共(布)党内的意见分歧

现在谈谈意见分歧的实质。

我想,我们的分歧可以归结为几个基本问题。我不打算详细讲这些问题,因为时间很少,而报告又已拉得很长了。况且你们有了关于联共(布)问题的材料,这些材料在翻译上确实有些错误,但对我们党内意见分歧基本上仍能提供一种正确的概念。

1 社会主义建设的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可能性的问题,关于胜利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问题。这里所说的当然不是门的内哥罗,甚至也不是保加利亚,而是我们的国家,是苏联。这里所说的是这样一个国家,那里有过而且发展过帝国主义,那里有一定数量的大工业,那里有一定数量的无产阶

级,那里有领导无产阶级的政党。那么,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是否可能呢?靠我国内部力量,靠苏联无产阶级所拥有的条件,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是否可能呢?

如果用具体的阶级语言解释这一公式,建成社会主义是什么意思呢?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就是在斗争进程中用本身的力量战胜我们苏联的资产阶级。所以,问题归结起来就是苏联的无产阶级能不能战胜自己本国的,即苏联的资产阶级。因此,当人们说在苏联有没有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时,也就是想说苏联的无产阶级能不能用本身的力量战胜苏联的资产阶级。在解决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课题时,问题就是如此,而且只能是如此。

党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党所持的出发点是:苏联的无产阶级、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有可能用本身的力量战胜苏联的资产阶级。

假如这是不正确的,假如党没有理由断定苏联无产阶级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虽然我国在技术上比较落后,那么党就没有理由继续掌握政权,它无论如何应当放弃政权并转到在野党的地位。

因为二者必居其一:

或者是我们能战胜本“民族的”资产阶级,能建设社会主义,并最终把它建成,那么党就应该继续掌握政权,领导国内社会主义建设,以期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获得胜利;

或者是我们不能用本身的力量战胜本国的资产阶级,那么,鉴于不能立即得到外援,即其他国家革命胜利的支援,我们就应当老实地和公开地放弃政权,而采取将来在苏联组织新革命的方针。

党能不能欺骗自己的阶级即工人阶级呢?不,不能。这样的党应当被肢解。正因为我们党没有权利欺骗工人阶级,它就应该直截了当地说:对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缺乏信心,就会使我们党

放弃政权,使我们党由执政党的地位转到在野党的地位。

我们争得了无产阶级专政,从而建立了走向社会主义的政治基础。我们能不能用本身的力量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建成社会主义所必需的新的经济基础呢?社会主义的经济实质和经济基础是什么呢?是不是在人间创造“天堂”使大家都富足呢?不,不是这样的。这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实质的庸俗的、市侩的见解。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就是把农业和社会主义工业结合为一个整体经济,使农业服从社会主义工业的领导,在农产品和工业品交换的基础上调整城乡关系,堵死和消灭阶级借以产生首先是资本借以产生的一切孔道,最后造成直接导致阶级消灭的生产条件和分配条件。

对于这一点,列宁同志在我国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时候,在建立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基础的问题已经完全摆在党的面前的时候,曾这样说:

“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这一代替的根本意义就是从‘战时’共产主义转向正常的社会主义基础。不是余粮收集制,也不是粮食税,而是用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化的”)工业的产品来交换农民的产品,这就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实质,社会主义的基础。”(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6卷第311—312页)

列宁对于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问题的看法就是如此。

但是,为了把农业和社会主义化的工业结合起来,首先必须有巨大的产品分配机关网,巨大的合作社机关网,即消费合作社和农业生产合作社机关网。正是从这个论点出发,列宁在他的小册子《论合作制》中说:

“ 在我国条件下合作制往往是同社会主义完全一致的。”(见《列宁全集》俄文第 3 版第 27 卷第 396 页)

那么,在我国被资本主义包围的条件下,苏联无产阶级能不能用本身的力量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呢?

党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见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决议)。列宁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只要看看他的小册子《论合作制》就可知道)。我国建设的全部实践对这个问题作了肯定的回答,因为我国经济中的社会主义部分的比重,无论在生产方面或流通方面,都由于私人资本比重的减少而逐年增加,同时私人资本的作用和我国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的作用比较起来却在逐年降低。

可是反对派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呢?

他们对这个问题作了否定的回答。

可见社会主义在我国的胜利是可能的,可以认为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可能性是有保证的。

这是不是说可以把这种胜利称为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最终胜利,这种胜利能保证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免除任何外来的危险,免除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以及与之相联的复辟的危险呢?不,不是这个意思。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是战胜本“民族的”资产阶级的任务,而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问题是战胜世界资产阶级的任务。党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单靠本身的力量是不能战胜世界资产阶级的。党告诉我们,为了使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获得最终胜利,就必须战胜世界资产阶级或至少使之中立。党告诉

见《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4 卷第 686 页。——编者注

指《关于共产国际和俄共(布)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的决议而产生的任务》的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56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3 分册第 39—51 页)。——编者注

我们,这样的任务只有靠几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才能完成。因此,社会主义在某一个国家内的最终胜利就意味着无产阶级革命至少在几个国家内的胜利。

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没有引起特别的意见分歧,因此,我就不多讲了。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同志可以参看前几天发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各个委员的我们党中央的材料。

2 “喘息”的因素

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苏联目前的国际状况的条件问题,关于我国开始和展开社会主义建设工作的“喘息”时期的条件问题。我们能够而且应当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但是要建设社会主义,首先必须生存。必须有一个摆脱战争的“喘息时机”,必须没有武装干涉企图,必须争取到为生存和建设社会主义所必需的某些起码的国际条件。

试问,如果已经证明武装干涉的危险存在着而且将来还会存在,证明这种危险只有在无产阶级革命在一些国家内取得胜利以后才能消除,那么,目前苏维埃共和国的国际状况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就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而言的我国目前这种“和平”发展时期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已经争得的、使资本主义世界没有可能立即进行严重的武装干涉的、并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造成必要的外部条件的这个“喘息”或“喘息”时期,是以什么为根据的呢?

目前的“喘息”时期至少是以下面四个基本事实为根据的。

第一,帝国主义者阵营内的矛盾,这些矛盾并没有减弱,这些矛盾使他们难以勾结起来反对苏维埃共和国。

第二,帝国主义和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矛盾,殖民地国家和附属

国解放运动的发展。

第三,资本主义国家中革命运动的发展和全世界无产者对苏维埃共和国的同情日益增长。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者还无力直接进行反对本国资本家的革命来支援苏联的无产者。但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家已经无力推动“自己的”工人来反对苏联无产阶级了,因为全世界无产者对苏维埃共和国的同情正在增长而且不能不日益增长起来。而现在没有工人是不能进行战争的。

第四,苏联无产阶级的强大有力,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苏联红军的组织力量。

诸如此类的条件结合起来,便造成一个成为苏维埃共和国目前国际状况的特点的“喘息”时期。

3 革命的“民族”任务和 国际任务的一致性和不可分割性

第三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是关于某一国家内无产阶级革命的“民族”任务和国际任务的问题。党所持的出发点是:苏联无产阶级的“民族”任务和国际任务融合为一个共同的任务,即从资本主义压迫下解放各国无产者的任务;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利益和各国革命运动的利益完完全全融合为一个共同的利益,即社会主义革命在世界各国的胜利。

假使世界各国无产者不同情和不支持苏维埃共和国,那会怎样呢?苏维埃共和国就会遭到武装干涉,就会被摧毁。

假使资本得以摧毁苏维埃共和国,那会怎样呢?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内最黑暗的反动时代就会到来,工人阶级和被压迫的民族就会受到摧残,国际共产主义的阵地就会被摧毁。

如果各国无产者对苏维埃共和国的同情和支持加强和增长起来,那将怎样呢?那将从根本上促进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

如果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不断扩大,那将怎样呢?那将从根本上加强世界各国无产者和资本作斗争的革命阵地,将摧毁国际资本和无产阶级作斗争的阵地,将使世界无产阶级有更多的机会取得胜利。

因此,应得出结论说,苏联无产阶级的利益和任务是同各国革命运动的利益和任务交织在一起并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反过来说,各国革命无产者的任务是同苏联无产者在社会主义建设战线上的任务和胜利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

因此,把某个国家无产者的“民族”任务与国际任务对立起来,就是在政治上犯了极严重的错误。

因此,把苏联无产者在社会主义建设战线上的那种勤奋和热忱说成“民族闭关自守”和“民族狭隘性”的表现,象我们的反对派有时所做的那样,这不是失去了理智,就是害了幼稚病。

因此,确认一个国家无产者的利益和任务跟各国无产者的利益和任务的一致性和不可分割性,这是各国无产者的革命运动获得胜利的最可靠的道路。

正因为如此,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不是最终目的,而是各国革命的发展和胜利的手段和助力。

因此,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就是从事各国无产者的共同事业,就是不仅在苏联而且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内逐步造成对资本的胜利,因为苏联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是世界革命的开端及其发展的基础。

4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历史

第四个问题。第四个问题是关于所讨论的问题的历史。反对派硬说,在一个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是 1925 年才在我们党内第一次提出的。至少托洛茨基在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曾直截了当地声明:“为什么要求在理论上承认一个国家能建成社会主义呢?这个前途从何而来呢?为什么在 1925 年以前谁也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呢?”

这样说来,在 1925 年以前这个问题没有在我们党内提出过。这样说来,只有斯大林和布哈林在党内提出了这个问题,并且是在 1925 年才提出的。

这对不对呢?不,不对。

我肯定地说,在一个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还在 1915 年就由列宁第一次在党内提出了。我肯定地说,当时反驳列宁的不是别人,正是托洛茨基。我肯定地说,从那时起,也就是从 1915 年起,在一个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在我们报刊上和我们党内就曾多次地论述过。

我们来看看事实。

(一)1915 年。布尔什维克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87)上列宁的论文《论欧洲联邦口号》。列宁在这篇论文中说道:

“然而把世界联邦口号当做一个独立的口号未必是正确的,因为第一,它和社会主义混合起来了;第二,它会产生认为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不正确的见解,以及对这个国家和其余各国间的关系的不正确的见解。

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

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既然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就会起来反对其余的资本主义的世界，把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这些国家中掀起反对资本家的起义，必要时甚至用武力去反对剥削阶级及其国家。……”因为“没有各社会主义共和国对各落后国家的相当长期的顽强斗争，便不能实现各民族在社会主义中的自由联合”。（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18卷第232—233页）

而托洛茨基于同年即1915年在他所领导的报纸《我们的言论报》¹³³上反驳道：

“‘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社会民主党人报》1915年布尔什维克中央机关报，列宁的上述论文就是在该报上发表的。——约·斯大林注 由此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因而每一个别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无须以建立欧洲联邦为其先决条件。……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当在自己的斗争中‘等待’其他国家，这是一个浅显的道理，为使国际间同时行动的思想不致为国际间消极等待的思想所代替，把这个道理反复加以说明是有益的，而且是必要的。我们不等待其他国家而在自己的国土上开始斗争并继续下去，深信我们的倡导会推动其他各国的斗争；假如情况不是这样，就休想革命的俄国能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得住脚，或社会主义的德国能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孑然独存，这是历史上的经验和理论上的推论都证明了的。在民族范围内观察社会革命的前途，就意味着变为构成社会爱国主义实质的民族狭隘性的牺牲品。”（托洛茨基《一九一七年》第3卷第1部第89—90页）

可见，“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问题，早在1915年，在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前夜，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摆在日程上的时候，就由列宁提出来

黑体是我用的。——约·斯大林注

参看《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709页。——编者注

了。

可见,当时反驳列宁同志的不是别人,正是托洛茨基,他显然知道列宁的论文说的是“社会主义的胜利”和“在一个国家内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可能性。

可见,关于“民族狭隘性”的责难,早在1915年就由托洛茨基第一次提出来了,而且这个责难不是针对斯大林或布哈林,而是针对列宁的。

现在季诺维也夫也常常发出关于“民族狭隘性”的可笑的责难。但他大概不了解他是在重复并从而恢复托洛茨基旨在反对列宁和列宁的党的论点。

(二)1919年。列宁的论文《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列宁在这篇论文中写道:

“不管各国资产者及其公开的和隐蔽的帮凶们(第二国际的“社会党人”)怎样造谣诬蔑,有一点是不容怀疑的:从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经济问题来看,共产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在我国是有保证的。全世界资产阶级之所以疯狂地拼命地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组织军事进攻,策划阴谋活动等等来反对布尔什维克,正是因为他们十分清楚,若不用武力把我们压倒,我们就必然会在改造社会经济方面获得胜利。但资产阶级要想这样把我们压倒是办不到的。”(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4卷第510页)

可见,列宁这篇论文中说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问题”,是为了“共产主义胜利”而“改造社会经济”的问题。而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问题”和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改造社会经济”呢?这无非是在一个国家即我们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

(三)1921年。列宁的小册子《论粮食税》。关于我们能够而且

黑体是我用的。——约·斯大林注

参看《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87页。——编者注

同上,第503—540页。——编者注

应当建立“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基础”这一著名的论点(见《论粮食税》)。

(四)1922年。列宁同志在莫斯科苏维埃会议上的演说。他在演说中说道：“我们把社会主义拖进日常生活中了”；“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7卷第366页) 1922年托洛茨基在他的《和平纲领》的《跋》中加以反驳,但他没有直接指出他在和列宁进行论战。托洛茨基在这篇《跋》中说道：

“在《和平纲领》中一再重复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不能在民族范围内胜利完成的论断,在某些读者看来也许已被我们苏维埃共和国将近五年的经验推翻了。但这样的结论是没有根据的。工人的国家在一个国家而且是一个落后的国家里抗住了全世界,这个事实证明无产阶级有雄伟的力量,这种力量在其他比较先进、比较文明的国家里是真能做出奇迹来的。可是,我们虽然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保持为一个国家,但是我们并没有达到甚至还没有走近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阶段。这个时期为革命的国家的自卫而进行的斗争引起了生产力的异常低落;只有在生产力发展和繁荣的基础上,社会主义才是可能的。同资产阶级国家进行的贸易谈判、租让、热那亚会议¹³⁴等等,是不可能民族-国家范围内孤立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极其明显的证据……俄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只有无产阶级在欧洲几个最重要的国家内获得胜利以后,才是可能的。”(托洛茨基《一九一七年》第3卷第1部第92—93页)

托洛茨基在这里讲的“不可能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孤立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反驳谁呢?当然不是反驳斯大林或布哈林。托洛茨基在这里是反驳列宁同志,并且他所反驳的不是别的问题,而是一个基本问题,即关于“在民族-国家范围内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可能性问题。

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400—401页。——编者注
黑体是我用的。——约·斯大林注

(五)1923年。成为列宁的政治遗嘱的小册子《论合作制》。列宁在这本小册子中说道：

“的确，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最小农结成联盟，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已有保证等等，难道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难道这不是我们通过合作社，而且仅仅通过合作社，通过我们从前鄙视为买卖机关，并且现时在新经济政策下我们从某一方面也有理由加以鄙视的合作社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吗？这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这已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7卷第392页）

看来不能说得更明白了。

在托洛茨基看来，“在民族-国家范围内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不可能的。列宁则肯定说，我们苏联无产阶级，现在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具有“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这两种观点是完全对立的。

事实就是如此。

由此可见，在一个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还在1915年就已经在我们党内提出来了，这个问题是列宁亲自提出的，在这个问题上和列宁争论过并以“民族狭隘性”责难列宁的，不是别人，正是托洛茨基。

可见，从那时起直到列宁同志逝世为止，这个问题并未从我们党的工作日程上取消。

可见，这个问题曾几次被托洛茨基以某种隐蔽的但分明是和列宁同志论战的形式挑起来，而且托洛茨基每次论述这个问题都不是本着列宁和列宁主义的精神，而是反对列宁和列宁主义的。

黑体是我用的。——约·斯大林注

参看《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682页。——编者注

可见,托洛茨基硬说一个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在 1925 年以前谁也没有提出过,这是公开的撒谎。

5 目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 特别重要的意义

第五个问题。第五个问题是关于目前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的迫切性的问题。为什么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恰恰在目前,恰恰在最近具有特别迫切的性质呢?为什么在 1915 年、1918 年、1919 年、1921 年、1922 年、1923 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只是偶尔在个别的文章中讨论过,而在 1924 年、1925 年、1926 年,这个问题却在我们党的实践中占了特别突出的地位呢?其原因何在呢?

在我看来有三个主要原因。

第一,近几年来,其他国家的革命速度缓慢下来了,所谓“资本主义的局部稳定”到来了。由此便产生一个问题:资本主义的局部稳定是否会削弱或甚至消除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可能性呢?由此人们对我国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命运问题的注意就增加了。

第二,我们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容许私人资本存在并实行了某种退却,以便重新部署力量,再行进攻。由此便产生一个问题:新经济政策的实行是否会削弱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可能性呢?由此人们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可能性问题就更加注意了。

第三,我们在内战中取得了胜利,赶走了武装干涉者,争得了摆脱战争的“喘息时机”,保证了和平,保证了为消灭经济破坏状态、恢复国内生产力和从事我国经济建设提供有利条件的和平时期。由此便产生一个问题:应该把经济建设导向哪一方面,导向

社会主义方面还是导向别的方面呢？由此便产生一个问题：如果把经济建设导向社会主义方面，是否有根据指望我们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和在资本主义局部稳定的情况下有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呢？由此便引起了全党和整个工人阶级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命运问题的莫大注意。由此党的机关和苏维埃政权机关便从增加工业、商业和农业方面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的比重这一观点出发每年对各种统计材料加以总结。

这就是说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对于我们党和我国无产阶级以及对于共产国际都已成为最迫切的问题的三个主要原因。

反对派以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只有理论上的意义。这是不对的。这是极糊涂的。这样论述问题只能说明反对派完全脱离了我们党的实践，脱离了我国的经济建设，脱离了我国的合作社建设。现在，当我们消灭了经济破坏状态，恢复了工业，并进入了在新的技术基础上改造整个国民经济的时期以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便具有莫大的实践意义。经济建设事业应导向哪里，朝哪个方向建设，建设些什么，我们建设的前途应当怎样，这些问题如不解决，诚实的和肯思考问题的经济工作人员就一步也不能前进，假使他们愿意真正自觉地和慎重地来对待建设事业的话。我们从事建设是为了给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施肥，还是为了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这就是现在我们建设工作的根本问题。现时，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局部稳定的情况下，我们是否有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可能，——这就是现在我们党和苏维埃工作中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列宁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只要看看小册子《论合作制》就可知道）。党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见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决议）。而反对派呢？我已经说过，反对派对这个问

题的回答是否定的。我已经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说过,而现在不得不在这里重复一遍:反对派联盟的首领托洛茨基,还在不久以前,即在1926年9月,曾在其所共知的告反对派书中声称,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在理论上为民族狭隘性辩护”。(见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的报告)

把托洛茨基的这段话(1926年)和他在1915年所写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他就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可能性问题和列宁进行论战,第一次提出了关于列宁同志和列宁主义者的“民族狭隘性”问题)比较一下,你们就会懂得,托洛茨基对于在一个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依然是站在自己过去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否定的立场上的。

正因为如此,党认定托洛茨基主义是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

6 关于革命的前途

第六个问题。第六个问题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前途问题。托洛茨基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的发言中说道:“列宁认为在二十年内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由于我们农民国家的落后性就是三十年也不能建成。最低限度也要三十年至五十年。”

同志们,我应当在这里声明,托洛茨基所臆造的这个前途和列

指斯大林《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206—264页)。——编者注

宁同志指出的苏联革命的前途毫无共同之处。几分钟以后,托洛茨基本人就开始在他的发言中和这种前途作斗争。不过这是他自己的事情。但是我应当声明,不论是列宁或党都不能对托洛茨基所臆造出来的这种前途和由此得出的结论负责。托洛茨基捏造了这种前途,然后开始在自己的发言中和他自己的捏造作斗争,这个事实只能说明托洛茨基糊涂已极并使自己陷入可笑的境地。

列宁根本没有说过在三十年或五十年内“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建成社会主义”。其实列宁说的是：

“只要在十年至二十年内和农民保持正确的关系,就能保证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甚至在发展着的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延迟的情况下),否则就会遭到二十年至四十年白卫恐怖的苦难。”(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6卷第313页)

能不能从列宁这一论点得出我们“在二十年至三十年或五十年内无论如何也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结论呢?不,不能。从这一论点只能得出下列的结论：

(一)在和农民保持正确关系的条件下,我们可以保证在十年至二十年内取得胜利(即社会主义的胜利);

(二)这个胜利将不仅是苏联的胜利,而且是“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

(三)如果我们在这个时期内没有取得胜利,这就说明我们被击溃了,无产阶级专政制度被白卫恐怖制度代替了,这种恐怖制度可能延长二十年至四十年之久。

当然,对列宁这个论点以及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可同意可不同意的。但象托洛茨基那样地歪曲它是不行的。

“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不是说这样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的胜利意思相同呢？不，不是这个意思。列宁在自己的著作中是把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的胜利和“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严格地区别开来的。列宁谈到“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他的意思是说：我国社会主义的成就，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具有如此巨大的国际意义，它（胜利）不能局限于我国范围内，它定要在各资本主义国家中引起强大的争取社会主义的运动，而且，既然它在时间上和其他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不能一致，那它无论如何也必然会掀起其他国家无产者争取世界革命胜利的强大运动。

如果指的是革命胜利的前途，则列宁所说的革命前途就是如此，其实我们党内所谈的也是如此。

将这个前途和托洛茨基的三十年至五十年的前途混淆起来就是诬蔑列宁。

7 实际上问题是怎样的

第七个问题。反对派对我们说：好吧，但究竟和谁结成联盟好，是和世界的无产阶级还是和我国的农民呢？选择谁做同盟者好呢，是世界的无产阶级还是苏联的农民呢？于是事情被描绘成这样：好象在苏联无产阶级面前有两个同盟者，一个是世界无产阶级，它准备立即推翻自己的资产阶级，但等着我们对此欣然同意；另一个是我国的农民，他们准备帮助苏联无产阶级，但不完全相信苏联无产阶级会接受这种帮助。同志们，这是问题的幼稚的提法。问题的这种提法，完全不符合我国革命的进程以及世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斗争战线上的力量对比。请原谅我这样说，不过这样提问的只

能是贵族女学生。可惜情况并不象一些反对派向我们描绘的那样，而且也没有理由怀疑这一点：我们会乐意接受两方面的帮助，假使这仅仅取决于我们的话。不，在实际生活中问题并不是这样的。

问题是这样的：既然世界革命运动的速度缓慢下来，在西方还没有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而苏联无产阶级已掌握政权，一年年地巩固这个政权，把基本农民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在社会主义建设战线上已经取得重大胜利，并且顺利地巩固着自己与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的友好联系，那么，是否有理由否认这一点，即虽然资本主义包围存在，但苏联无产阶级能够战胜本国的资产阶级并在我们国内继续胜利地建设社会主义呢？

当然，如果不象反对派联盟那样从幻想出发，而是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斗争战线上的实际力量对比出发，那么现在问题就是这样。

党回答这个问题说，苏联无产阶级在这种条件下能够战胜本“民族的”资产阶级并胜利地建设社会主义经济。

反对派却说：

“没有欧洲无产阶级直接的国家援助，俄国工人阶级就不能保持政权，就不能把自己暂时的统治变成长期的社会主义专政。”（见托洛茨基《我们的革命》第 278 页）

托洛茨基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欧洲无产阶级的国家援助”又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西方无产阶级不预先取得胜利，西方无产阶级不预先夺得政权，苏联无产阶级不仅不能战胜本国的资产阶级和建设社会主义，甚至不能保持政权。

问题就是这样，我们意见分歧的根源就在这里。

托洛茨基的这种立场和孟什维克奥托·鲍威尔的立场有什么区别呢？

可惜一点也没有。

8 关于胜利的机会

第八个问题。反对派说：好吧，可是谁有更多的机会获得胜利呢，是苏联无产阶级呢，还是世界无产阶级？

托洛茨基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的发言中说道：“能不能设想欧洲资本主义会腐朽三十年至五十年，而无产阶级还没有能力完成革命呢？我要问：为什么我应当接受这个只能称之为对欧洲无产阶级怀着毫无根据的极端悲观心理的前提呢？……我断言，我没有任何理论的和政治的根据来设想我们和农民一起建设社会主义要比欧洲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容易些。”(见托洛茨基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的发言)

第一，应当毫无保留地抛弃欧洲要停滞“三十年至五十年”的前途。谁也没有要托洛茨基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这个前途出发，这个前途与我们党的前途是毫无共同之处的。托洛茨基本人既把他自己和这个臆造的前途联在一起，他就应当对这种做法的后果负责。我认为，如果指的是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真正的前途，这个期限至少应该缩短一半。

第二，托洛茨基毫无保留地断定西方无产者战胜现在执政的世界资产阶级，要比苏联无产阶级战胜在政治上已被打垮的、已被赶出国民经济指挥所的、在经济方面不得不在无产阶级专政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形式的压力下退却的本“民族的”资产阶级有更多的机会。

我认为这样提问题是不正确的。我认为托洛茨基这样提问题

恰好暴露了他自己。难道孟什维克在 1917 年 10 月没有向我们说过同样的话吗,当时他们不是到处大喊大叫地说,西方无产者推翻资产阶级和夺取政权要比技术不大发达、无产阶级人数不多的俄国的无产者有更多的机会吗?不管孟什维克怎样痛哭流涕,俄国无产者在 1917 年 10 月比英国、法国或德国的无产者有更多的机会夺取政权和推翻资产阶级,这难道不是事实吗?难道全世界革命斗争的实践没有表明和没有证实不能象托洛茨基那样提问题吗?

谁有更多的机会迅速获得胜利的问题,其解决办法不是拿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相对比,或者拿我国农民和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相对比。这样的对比是把比较当儿戏。谁有更多的机会迅速获得胜利的问题,是要由现实的国际情况、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斗争战线上的实际的力量对比来解决的。可能在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建成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基础时,西方无产者就已战胜自己的资产阶级并夺得政权。这并不是不可能的。但是,也可能在西方无产者还没有推翻自己的资产阶级时,苏联无产阶级就已建成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基础。这也不是不可能的。

谁有机会迅速获得胜利的问题的解决,取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斗争战线上的实际情况,而且只是取决于这种实际情况。

9 实际政策上的意见分歧

以上就是我们意见分歧的基础。

从这些基础中产生了一些对外对内政策方面的和纯属党内的实际政策性质的意见分歧。这些分歧就是第九个问题的题目。

(一)党从资本主义局部稳定这个事实出发,认为我们正处于革命间歇时期,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我们正走向革命,各国共产党的

基本任务是开辟接近群众的道路,加强自己和群众的联系,掌握无产阶级的群众组织,训练好广大工人群众去迎接即将到来的革命搏斗。

可是反对派不相信我们革命的内部力量,惧怕资本主义局部稳定这个事实会毁灭我们的革命,认为(或者曾经认为)可以否认资本主义局部稳定这个事实,认为(或者曾经认为)英国罢工¹³⁵是资本主义稳定已经结束的标志;但当终于发现稳定是事实的时候,反对派却强词夺理地说,那就该事实倒霉,就是说可以跳过事实,同时他们装腔作势地提出修改统一战线策略、与西方工会运动破裂等等耸人听闻的口号。

可是不顾事实,不顾事物的客观进程,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离开科学的立场而站到巫术的立场上去了。

由此就产生了反对派联盟在政策上的冒险主义。

(二)党从工业化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道路而我国的国内市场又是社会主义工业的基本市场出发,认为应当在不断改善基本农民群众(更不用说工人)的物质生活的基础上实行工业化,认为工业和农业间、无产阶级和农民间的结合以及无产阶级在这个结合中的领导,是象列宁所说的“苏维埃政权的 和 ”和我国建设胜利的 和 ,因此,我们的一般政策,其中包括税收政策和价格政策,应当符合于这个结合的利益。

可是反对派不相信有吸收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可能性,显然他们认为可以损害基本农民群众的利益来实行工业化,因

(阿耳法)(奥米伽)是第一个和最末一个希腊字母。和 是始终、全部或主要东西、基本东西的意思。——编者注

见《列宁全集》第32卷第311页。——编者注

而走上资本主义工业化方法的邪路,走上把农民当做“殖民地”、当做无产阶级国家的“剥削”对象的邪路,并且提出一些只能瓦解工业和农业的结合、损害贫农和中农的经济地位、破坏工业化基础的工业化办法(加紧对农民的捐税压榨,提高工业品的出厂价格等等)。

由此就产生了反对派对无产阶级和农民联盟以及无产阶级在这个联盟中的领导权这一思想的否定态度——这是社会民主党所特有的态度。

(三)我们的出发点是:党,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工具;一个党的领导(这个党不与其他政党而且不能与其他政党分掌这种领导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条件,没有这个条件就不可能有稍微巩固的和发展的无产阶级专政。因此,我们认为在我们党内不容许有派别存在,因为显而易见,在党内存在着各种有组织的派别,就会使统一的党分裂成一些平行的组织,就会在国内形成一个或几个新党的萌芽和细胞,也就是说,会瓦解无产反对派虽然不反对派虽然不公开反驳这些论点,但他们在自己实际工作中:必须削弱党的统一,必须有在党内成立派别的自由,也就是说,必须造成建立新党的因素。

由此就产生了反对派联盟在实际工作中的分裂政策。

由此就产生了反对派关于党内“制度”的号叫,其实这正是国内非无产阶级分子反抗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的反映。

由此就产生了关于两个政党的问题。

同志们,我们和反对派的意见分歧总括起来就是如此。

四 行动中的反对派

现在来谈谈这些意见分歧是怎样表现在实际工作中的问题。

那么,我们的反对派在其实际工作中,在其反党斗争中究竟是怎样表现的呢?

大家知道,反对派不仅在我们党内进行活动,而且在共产国际其他支部,如德、法等国的支部内进行活动。因此,问题应该这样提出:反对派及其门徒们在联共(布)党内以及在共产国际其他支部内的实际工作究竟是怎样的呢?

(一)反对派及其门徒们在联共(布)党内的实际工作。反对派是从对党发出最严厉的责难来开始其“工作”的。反对派声称党正在“爬上机会主义的道路”。反对派断言党的政策“与革命的阶级路线背道而驰”。反对派断言党在蜕化并走向特米多尔¹³⁶。反对派声称我们的国家“远非无产阶级的国家”。这一切或者是在反对派代表的公开宣言和演说(1926年中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七月全会¹³⁷)中发表过,或者是在反对派门徒们所散发的反对派的秘密文件中发表过。

反对派对党发出这些严厉的责难,从而为在党内组织平行的新支部、组织平行的新的党中央、成立新政党造成基础。反对派的门徒之一奥索夫斯基先生在其文章中曾直言不讳地说,现有的党即我们党是保护资本家利益的,因此,必须组织一个新党,即与现有的党同时存在和活动的“纯无产阶级政党”。

反对派可以说他们对奥索夫斯基的立场不负责任。但这是不对的。反对派对奥索夫斯基先生的“行为”要负完全责任。大家知道,奥索夫斯基公开自命为反对派的门徒,反对派对这一点一次也没有试图加以反驳。其次,大家知道,托洛茨基在中央七月全会上曾经袒护奥索夫斯基而反对莫洛托夫同志。最后,大家知道,虽然党一致反对奥索夫斯基,但反对派在中央表决时却反对开除奥索夫斯基出党。这一切都说明反对派对奥索夫斯基的“行为”负有道义上的责任。

结论:反对派在联共(布)党内的实际工作,已经表现在奥索夫斯基的立场上,表现在他所持的必须在我国成立一个与联共(布)平行并反对它的新党这一立场上了。

不这样也不可能。因为二者必居其一:

或者是反对派在对党发出这些严厉的责难时,自己并不相信这些责难的严重性,提出来仅仅是为了示威,那么,他们就是把工人阶级引入迷途,这是犯罪的;

或者是反对派过去相信而且现在仍然相信自己的责难的严重性,那么,他们就应当采取打垮党的领导干部和组织新党的方针,他们也真的采取了这个方针。

1926年10月以前,我们的反对派在其反对联共(布)的实际工作中的面貌就是如此。

(二)反对派的门徒们在德国共产党内的实际工作。以科尔施先生为首的德国“极左派”,从我们的反对派对党的责难出发,做出了自己的“进一步的”结论并说得更加露骨。大家知道,这个德国“极左派”的思想家科尔施硬说我们的社会主义的工业是“纯粹资本主义的工业”。大家知道,科尔施把我们的党叫作“富农化了的”党,而把共产国际叫作“机会主义的”组织。其次,大家知道,科尔施

因此就鼓吹必须进行“新革命”来反对苏联现存政权。

反对派可以说他们对科尔施的立场不负责任。但这是不对的。反对派对科尔施先生的“行为”要负完全责任。科尔施说的话,就是从我们的反对派首领以众所周知的对党的责难的形式传授给自己门徒的那些前提得出的自然的结论。既然党在爬上机会主义的道路,既然党的政策与革命的阶级路线背道而驰,既然党在蜕化并走向特米多尔,而我们的国家又“远非无产阶级的国家”,那么从这里只能得出一个结论:进行新的革命来反对“富农化了的”政权。此外,大家知道,德国的“极左派”,包括韦丁派¹³⁸在内,在表决时曾反对开除科尔施出党,因而对科尔施的反革命宣传负有道义上的责任。可是,谁不知道“极左派”是拥护联共(布)党内的反对派的呢?

(三)反对派的门徒们在法国的实际工作。关于法国的反对派门徒也必须这样说。我指的是苏瓦林及其在法国一个著名杂志上活动的集团。从我们的反对派在其对党的责难中所提供的前提出发,苏瓦林得出结论说,革命的主要敌人是党内的官僚,是我们党的上层领导集团。苏瓦林硬说:“生路”只有一条,就是进行新革命来反对党和苏维埃政权中的上层领导集团,首先是反对联共(布)中央书记处。在那里,在德国,是反对苏联现存政权的“新革命”。在这里,在法国,是反对中央书记处的“新革命”。那么怎样组织这个新革命呢?没有一个适合于新革命的目标的特殊政党,能不能组织这个新革命呢?当然不能。由此便产生了建立新党的问题。

反对派可以说他们对苏瓦林的言论不负责任。但这是不对的。第一,大家知道,苏瓦林及其集团是反对派的门徒,特别是托洛茨基那一部分反对派的门徒。第二,大家知道,不久以前反对派还计划把苏瓦林先生安插到法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去。诚然这个计划没有成功。但这不是我们的反对派的过失,而是他们的倒

霉！

由此可见,如果不看反对派自己对自己的描绘,而看他们在我们苏联以及法国和德国的工作过程中的表现,那么我要说,反对派在自己的实际工作中下一步就要打垮我们党现有的干部和组织新的党了。

五

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为什么称赞反对派

社会民主党和立宪民主党人为什么称赞反对派呢？

或者换句话说,反对派反映了什么人的情绪呢？

你们大概已经注意到,所谓“俄国问题”近来已经成为西方的社会民主党报刊和资产阶级报刊极为注意的问题了。这是偶然的吗？当然不是偶然的。苏联社会主义的发展和西方共产主义运动的开展,不能不在资产阶级及其在工人阶级中的代理人——社会民主党的首领们——当中引起极度的惊慌。革命和反革命间的界限,现时就截然表现在一些人对苏联无产阶级政党采取深恶痛绝的态度而另一些人则采取同志友好的态度上。“俄国问题”的极其重大的国际意义目前已成为共产主义的敌人不能不加以重视的事实了。

围绕着“俄国问题”形成了两条战线,一条是苏维埃共和国的敌人的战线,一条是苏维埃共和国的奋不顾身的朋友的战线。苏维埃共和国的敌人所希望的是什么呢？他们力求在广大民众中造成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上和精神上的前提。苏维埃共和国的朋

友所希望的是什么呢？他们力求在无产阶级广大阶层中间造成支持和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思想上和精神上的前提。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社会民主党人和俄国资产阶级的流亡分子中的立宪民主党人⁵⁴为什么称赞我们的反对派。

例如，德国著名的社会民主党首领保尔·勒维说道：

“我们一向认为工人的特殊利益归根到底就是社会主义的利益，它是与农民私有制的存在相矛盾的，工农利益的一致只是表面的现象，俄国革命进一步的发展将使这个矛盾更加尖锐更加鲜明。我们认为利益一致的思想是一种变相的联合思想。如果马克思主义还有一点根据，如果历史是辩证地发展的，那么这个矛盾一定会粉碎联合的思想，正如它在德国已被粉碎一样……我们这些从旁边，从西欧观察苏联事变的人看得很清楚：我们的观点和反对派的观点是一致的……当前的事实是：在阶级斗争的口号下，独立的、反资本主义的运动又在俄国开始了。”（1926年7月30日《莱比锡人民报》¹³⁹）

在这里，在这段引文中，对于工农利益“一致”的问题存在着糊涂观念，这是显而易见的。但保尔·勒维因为我们的反对派同工农联合的思想，同工农联盟的思想作斗争而称赞他们，这也是无庸置疑的。

“俄国”社会民主党首领、主张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俄国”孟什维克的首领、并非无名之辈的唐恩关于我们的反对派说道：

“布尔什维克的反对派对现存制度的批判几乎是逐字逐句地重复着社会民主党的批判，他们正以这种批判进行……思想上的准备来接受社会民主党的建设性的纲领。”

往下又说：

“反对派不仅在工人群众中间而且在工人共产党员中间培育这种思想和情绪的幼苗，这种幼苗若是好好地加以培植，就会很容易结出社会民主主义的果实。”（《社会主义通报》¹⁴⁰第17—18期）

看来是很明白的了。

米留可夫的反革命资产阶级政党的中央机关报《最近新闻报》¹⁰¹关于我们的反对派写道：

“今天,反对派在破坏专政,反对派的每一种新的刊物都在发表越来越‘可怕的’言论,反对派自己正在向愈益猛烈抨击统治制度这方面演变,在目前这已足以令人感激不尽地把反对派当做政治上不满的广大居民阶层的喉舌来看待了。”(《最近新闻报》第 1990 号)

往下又写道：

“对苏维埃政权来说,现在最可怕的敌人就是悄悄地爬近苏维埃政权,用自己的触须从各方面把它包围起来,并在它没有发觉之前就把它消灭的那些人。苏维埃的反对派所扮演的正是这种在我们还没有度过的准备时期中所不可缺少的角色。”(1926 年 8 月 27 日《最近新闻报》第 1983 号)

我想,这里是用不着解释的。

由于时间有限,我只引用了这几段话,虽然这样的引证还可以举出几十段几百段来。

这就是社会民主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称赞我们的反对派的原因。

这是偶然的吗?不,不是偶然的。

由此可见,反对派所反映的不是我国无产阶级的情绪,而是不满无产阶级专政、仇视无产阶级专政、急切期待无产阶级专政瓦解和崩溃的非无产阶级分子的情绪。

这样,我们的反对派的派别斗争的逻辑,实际上就使得我们的反对派的战线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对者和敌人的战线在客观上合而为一了。

反对派是否愿意这样呢?也许他们不愿意这样。但是这里的问题不在于反对派愿意怎样,而在于他们的派别斗争在客观上会引起怎样的后果。派别斗争的逻辑比某些人的愿望更有力量。正

因为如此,反对派的战线实际上便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对者和敌人的战线合而为一了。

列宁曾教导我们说,共产党员的基本义务就是保卫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然而事情却颠倒成这样:反对派由于采取派别政策而坠落到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的营垒中去了。

正因为如此,我们说反对派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也背离了列宁主义。

不这样也是不可能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斗争战线上的力量对比是这样的:工人阶级队伍里现在只能采取下列两种政策中的一种,或者是共产主义的政策,或者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政策。反对派企图在反对联共(布)的斗争尖锐化的时候采取第三者的立场,这必然要以反对派被派别斗争的进程抛到列宁主义的敌人的营垒中去而告终。

正象上述事实所表明的,结果正是如此。

这就是社会民主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称赞反对派的原因。

六 反对派联盟的失败

我在上面说过,反对派在其反党斗争中对党发出了种种极严厉的责难。我已说过,反对派在其实际工作中下一步就要分裂党和组织新党了。由此就产生一个问题:反对派在这个分裂的立场上能够坚持多久呢?事实告诉我们,反对派在这个立场上一共才坚持了几个月。事实告诉我们,到今年10月初,反对派已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失败,已不得不退却了。

反对派退却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认为反对派退却有下列几个原因。

第一,在苏联反对派没有自己的政治军队。很可能,建立新党是一种吸引人的事情。但是,在争论以后既发现已经没有人可以用来建立新党,那么很明显,退却便是唯一的出路了。

第二,在派别斗争进程中,不论我们苏联的或国外的各种卑鄙齷齪分子都和反对派结成一伙了,而社会民主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则竭力称赞反对派,同他们接吻,使他们在工人眼中大丢其脸。因此,反对派应该有所选择:或者接受敌人的这种称赞和接吻,视为理所当然;或者猛然转身退却,使附着在他们身上的肮脏尾巴自动地掉下来。反对派既已退却而且承认了自己的退却,也就是承认了第二条出路是他们唯一可走的道路了。

第三,苏联国内状况比反对派所预料的要好,而党员群众的觉悟程度和团结程度也比反对派在斗争开始时所看到的要高。当然,假如国内发生了危机,假如工人日益不满,假如党表现得不够团结,那么反对派就会走上另一条道路,他们就不会决定退却。但是,事实表明反对派在这方面的打算也落空了。

这就是反对派失败的原因。

这就是反对派退却的原因。

反对派的失败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这就是反对派1926年10月16日的“声明”。反对派在这个文件中放弃了派别自由的理论和实践,放弃了派别斗争的方法,公开地毫不含糊地承认了自己在这方面的错误。但反对派所放弃的不止于此。既然反对派在自己的“声明”中同“工人反对派”以及各种各样的科尔施和苏瓦林划清了界限,从而他们也就放弃了不久以前还使他们和这些派别接近的思想立场。

第二个阶段,这就是反对派事实上放弃了他们不久以前对党

发出的种种责难。应该承认这一点,而且在承认以后应该着重指出,反对派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已不敢重复自己对党的责难了。如果把中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七月全会的记录与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的记录比较一下,那就不能不指出,以前的种种责难,如说党是机会主义,是特米多尔主义,是背弃了革命的阶级路线等等,在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连一点影子也没有了。此外,如果注意到这种情况,即好多代表向反对派提出关于过去的种种责难的问题,而反对派对此仍然默不作声,那就不能不承认反对派实际上已经放弃他们过去对党的种种责难了。

是否可以把这种情况看作反对派事实上放弃了自己一系列的思想立场呢?可以而且应该。这是反对派在失败面前自觉地卷起了战斗的旗帜。不这样也是不可能的。发出责难是打算建立一个新党。既然这种打算落了空,这些责难至少也要暂时收起来了。

第三个阶段,这就是反对派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的完全孤立。应该指出,反对派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连一票也没有得到,因而完全陷于孤立。你们回想一下反对派在今年9月底向党举行进攻、举行公开的进攻时所发出的叫嚣,并把这种叫嚣和反对派在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可以说处于孤立无援状态的事实比较一下,你们就会懂得反对派的失败真是“无以复加”了。

反对派实际上放弃了他们对党的责难,虽然有代表要求,他们也不敢在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重复这些责难,这个事实能不能否认呢?

不,不能,因为这是事实。

反对派为什么走上了这条道路,他们为什么卷起了自己的旗帜呢?

因为反对派思想旗帜的展开必然地和不可免地意味着两个党

的理论 ,意味着各种各样的卡茨、科尔施、马斯洛夫、苏瓦林及其他卑鄙龌龊的分子的活跃 ,意味着我们国内一切反无产阶级的力量的蠢动 ,以及社会民主党人和俄国流亡分子中的自由资产者对反对派的称赞和同他们的接吻。

反对派的思想旗帜害了反对派。同志们 ,这就是问题的所在。

因此 ,反对派为了不致彻底垮台 ,便不得不退却并抛掉自己的旗帜。

反对派联盟失败的根源就在于此。

七

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的实际意义和作用

同志们 ,我要结束我的讲话了。现在我只从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的各项决议的意义和作用方面来把几个结论谈一谈。

第一个结论就是 :这次代表会议总结了第十四次代表大会 115 以后的党内斗争 ,正式肯定了党对反对派的胜利 ,孤立了反对派 ,结束了反对派在前一时期硬在我们党内造成的派别混乱局面。

第二个结论就是 :这次代表会议在我国建设的社会主义前途的基础上 ,在为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而向我们党内一切反对派别、向我们党内一切倾向作斗争的思想的基础上 ,使我们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

现在我们党内最迫切的问题就是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列宁说得对 :全世界都看着我们 ,看着我们的经济建设 ,看着我

们在建设战线上的胜利。可是为了在这个战线上取得胜利,就必须使我们党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工具有进行这个事业的决心,使它意识到这个任务的重要性,使它能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胜利的杠杆。第十五次代表会议的意义和作用,就在于它正式肯定并完成了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胜利的思想武装我们党的工作。

第三个结论就是:这次代表会议坚决反击了我们党内所有一切思想上的动摇,从而促进了列宁主义在联共(布)党内的完全胜利。

如果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批准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的决议并承认我们党对反对派的政策是正确的(我没有理由怀疑这一点),那就可以得出第四个结论说,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为使列宁主义在整个共产国际、在世界各国和各族人民的革命无产阶级队伍里获得胜利准备了若干相当重要的必要条件。(热烈鼓掌,全场欢呼。)

结 论

(1926年12月13日)

—

几 点 意 见

1 我们需要的是事实,而不是捏造和诽谤

同志们 在谈到问题的实质以前,请允许我对反对派那些不是

歪曲事实就是捏造和诽谤的声明作几点事实上的修正。

(1)第一个问题就是反对派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上的发言问题。反对派声明说,他们所以决定发言,是因为联共(布)中央没有直接指出反对派的发言会违背反对派 1926 年 10 月 16 日的“声明”,假如中央禁止他们发言,反对派首领们是不会决定发言的。

其次,反对派声明说,他们在这里,在扩大全会上发言,是要用一切办法不使斗争尖锐化,他们只是作几点一般的“解释”:老天在上,他们连想也没有想到向党进攻;老天在上,他们丝毫没有打算向党提出什么责难和控告党的决定。

同志们,这都是不真实的。这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这是反对派的伪善表现。事实表明,特别是加米涅夫的发言表明,反对派首领们在扩大全会上的发言并不是“解释”,而是向党进攻,向党袭击。

公开提出谴责党右倾的问题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向党进攻,这是向党袭击。

难道联共(布)中央在自己的决定中没有指出反对派的发言会使斗争尖锐化,会激起派别斗争吗?是指出了的。这也就是联共(布)中央对反对派的警告。中央能不能再前进一步呢?不,不能。为什么呢?因为中央不能禁止发言。每个党员都有权向上级机关控告党的决定。中央不能不重视党员的这种权利。可见联共(布)中央为了防止斗争更加尖锐化,防止派别斗争更加剧烈,是做了它力所能及的一切的。

反对派的首领们既然都是中央委员,那就应当知道他们的发言不能不变成对自己党的决定的控告,对党的进攻,对党的袭击。

这样,反对派的发言,特别是加米涅夫的发言,并不是他个人

的发言,而是整个反对派联盟的发言,因为他所宣读的发言稿是由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签了名的,加米涅夫的这次发言是反对派联盟从1926年10月16日提出的放弃派别斗争方法的“声明”发展到重新采用派别斗争方法进行反党斗争的新阶段的转折点。

由此得出结论:反对派违背了他们自己1926年10月16日的“声明”,又采用了派别斗争的方法。

同志们,让我们就这样记下来吧。用不着来这一套伪善。加米涅夫说得对:猫应该叫做猫。(喊声:“对!”“猪应该叫做猪!”)

(2)托洛茨基在发言时说:“斯大林在二月革命后宣传过列宁称之为考茨基倾向的错误策略。”

同志们,这是不真实的。这是诽谤。斯大林没有“宣传过”任何考茨基倾向。我流放回来后有过一些动摇,这一点我并没有隐瞒,而且亲自写在我的《走向十月革命的道路》⁸⁶那本小册子里了。但是,我们中间谁没有过一瞬间的动摇呢?至于说到1917年列宁的立场和他的四月提纲¹¹⁰(这里所说的正是这一点),那么党知道得很清楚,我当时是和列宁同志站在一道同当时反对列宁提纲的加米涅夫及其集团作斗争的。读过我们党1917年四月代表会议¹⁴¹记录的人不能不知道,我是和列宁站在一道并和他一起反对加米涅夫反对派的。

这里的魔术就是托洛茨基把加米涅夫弄成我了。(笑声,鼓掌。)

加米涅夫当时站在反对列宁、反对他的提纲、反对党内多数的立场上,并且发挥了近似护国主义的观点,这是千真万确的。当时加米涅夫在《真理报》⁶²上,例如在3月间发表了半护国主义性的文章,对这样的文章我当然不能负丝毫责任,这也是千真万确的。

托洛茨基倒霉的地方就在于他在这里把加米涅夫弄成斯大林了。

在 1917 年四月代表会议期间,在党和加米涅夫集团进行斗争时,托洛茨基究竟在什么地方呢?他当时是在哪一个党里面呢,在左派孟什维克里面呢,还是在右派孟什维克里面?为什么他当时没有加入齐美尔瓦尔德左派¹⁴²呢?让托洛茨基对我们讲清这一点吧,哪怕在报刊上也行。但他当时不是我们党的党员,这是托洛茨基应该记得的事实。

(3)托洛茨基在发言时说:“在民族问题上斯大林犯了很大的错误。”什么错误,在什么情况下犯的,托洛茨基始终没有说出来。

同志们,这是不真实的。这是诽谤。在民族问题上,我和党或者和列宁从来没有过任何意见分歧。托洛茨基在这里所说的大概是一件小事,即列宁同志在我们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¹⁴³之前责备过我,说我对于穆迪瓦尼(不久以前做过驻法国的商务代表)这一类格鲁吉亚的半民族主义者、半共产主义者采取了过严的组织政策,说我“迫害”他们。可是后来的事实表明,对待所谓“倾向分子”如穆迪瓦尼一类人的态度,实际上应比作为我们党中央的一个书记的我所采取的态度更严厉些。后来的一些事件证明这些“倾向分子”是最露骨的机会主义的腐化的派别。让托洛茨基证明不是这样的吧。列宁当时不知道而且不能知道这些事实,因为他卧病在床,不可能注意这些事件。但是这件小事和斯大林的原则立场能有什么关系呢?分明是托洛茨基进行诽谤,暗示我和党之间有什么“意见分歧”。可是,整个中央委员会,连托洛茨基也在内,一致投票赞成斯大林的民族问题提纲,这难道不是事实吗?这次投票是在穆迪瓦尼事件以后,在我们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前举行的,这难道不是事实吗?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作民族问题报告的正是斯

大林而不是别人,这难道不是事实吗?民族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到底在哪里呢?托洛茨基究竟为什么要提起这件小事呢?

(4)加米涅夫在发言时说,我们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向左边开火”,也就是说向反对派开火,是犯了错误。这样说来,党过去和现在一直在反对党的革命核心。这样说来,我们的反对派是左派而不是右派。

同志们,这都是胡说。这是我们的反对派分子散布的诽谤。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没有想到向革命的多数开火,而且不能这样做。实际上它是向右派开火,向我们的反对派分子开火,他们是右的反对派,虽然他们披着“左的”外衣。当然,反对派喜欢以“革命的左派”自居。但是我们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相反地认为,反对派只是用“左的”词句来掩饰自己,实际上他们是机会主义的反对派。我们知道,右的反对派常常用“左的”外衣来掩饰自己,以便把工人阶级引入迷途。“工人反对派”也自以为最左,而实际上他们是最右的。现在的反对派也自以为最左,而现在的反对派的实践和全部工作都证明他们是一切右的机会主义派别——从“工人反对派”和托洛茨基派到“新反对派”和各种各样的苏瓦林——的集中点和策源地。

加米涅夫在“左派”和“右派”的问题上犯了一个“小小的”颠倒是非的毛病。

(5)加米涅夫引证了列宁著作中说我们还没有打好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基础那句话,宣称党犯了错误,说党好象断言我们已经打好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基础了。

同志们,这是胡说。这是加米涅夫的一点小诽谤。党从未宣称过它已经打好了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基础。现在争论的完全不是我们已经打好或是还没有打好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基础。现在争论的并不是这一点。争论的只是我们能不能用自己的力量来打好

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基础。党肯定说我们有可能打好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基础。反对派却否认这一点,因而滚到失败主义和投降主义的道路上去了。现在争论的正是这一点。加米涅夫感到自己的阵地不稳固,力图回避这个问题。但他是回避不了的。

加米涅夫又犯了一个“小小的”颠倒是非的毛病。

(六)托洛茨基在发言时说,他“已先知列宁在1917年3—4月间的政策”。这样说来,托洛茨基“已先知”列宁同志的四月提纲。这样说来,托洛茨基还在1917年2—3月间就已经独自想出列宁同志在1917年4—5月间在四月提纲中所维护的政策了。

同志们,请允许我说,这是愚蠢而不体面的吹牛。托洛茨基居然比列宁“先知”——这真令人好笑。碰到这样的事情,农民总是说得很对:“以苍蝇比巨人。”(笑声)托洛茨基居然比列宁“先知”……

让托洛茨基试出面在报刊上证明这一点吧。为什么他连一次也不尝试呢?托洛茨基比列宁“先知”……但是,1917年4月列宁同志一出现在俄国舞台上就认为必须和托洛茨基的立场划清界限,这个事实如何解释呢?“后知者”认为必须和“先知者”划清界限,这个事实如何解释呢?列宁在1917年4月几度声明他和托洛茨基的基本公式“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毫无共同之处,这难道不是事实吗?列宁当时几度声明他和企图跳过农民运动、跳过土地革命的托洛茨基毫无共同之处,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先见之明”究竟在哪里呢?

结论:我们需要的是事实,而不是捏造和诽谤,可是反对派却喜欢进行捏造和诽谤。

2 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为什么称赞反对派

我在报告中说过,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俄国流亡分子中的孟什维克和立宪民主党人,都在称赞反对派。我说过,他们称赞反对派是因为反对派正在干着破坏党的统一也就是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勾当。我作了许多引证,说明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称赞反对派正是因为这一点,正是因为反对派进行活动来策动国内反无产阶级的力量,力图破坏我们党的威信,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威信,从而帮助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的事业。

为了回答这一点,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也一样)首先引用了称赞我们党和斯大林的西方资本主义报纸的言论,然后引用了赞同我们党立场的我国资产阶级专家的代表人物——路标转换派分子¹⁴⁴乌斯特里亚洛夫的话。

说到资本家,那么他们对我们党的看法有很大的分歧。例如不久以前,资本家在美国报纸上赞扬斯大林,说他使他们有可能获得很大的租让权。而现在又百般责骂斯大林,硬说斯大林“欺骗了”他们。一个时候在资产阶级报纸上出现了一幅讽刺斯大林的漫画,画着斯大林手里提着一桶水在扑灭革命的火焰。可是后来又出现了另一幅跟它相反的讽刺画,画着斯大林手里提着一只桶,但桶里不是水而是煤油,原来斯大林不是在扑灭革命的火焰,而是在火上加油。(鼓掌,笑声。)

可见,他们资本家对我们党的立场以及对斯大林的立场的看法是有很大的分歧的。

我们来谈一谈乌斯特里亚洛夫的问题。乌斯特里亚洛夫是什么人呢?乌斯特里亚洛夫是资产阶级专家和整个新资产阶级的代

表人物。他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敌人。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敌人是有各种各样的。有一种阶级敌人,他们不愿跟苏维埃政权和好,无论如何要推翻它。也有这样一种阶级敌人,他们愿在某种程度上跟苏维埃政权和好。有一种敌人,他们竭力准备条件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立宪民主党人等等。但也有这样一种敌人,他们跟苏维埃政权合作,反对主张推翻苏维埃政权的人,希望专政一点点地削弱、蜕化,以至将来能适合新资产阶级的利益。乌斯特里亚洛夫就是属于后一类的敌人。

加米涅夫为什么要引用乌斯特里亚洛夫的话呢?也许是为了表明我们党蜕化了,因此乌斯特里亚洛夫才称赞斯大林,或者称赞我们党吧?看来不是为了这一点,因为加米涅夫对此不敢直言不讳。那么,加米涅夫究竟为什么要引用乌斯特里亚洛夫的话呢?显然是为了暗示“蜕化”。

但是加米涅夫忘记说,就是这位乌斯特里亚洛夫对列宁更是称赞不已。乌斯特里亚洛夫那些称赞列宁的文章是我们全党都知道的。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也许列宁同志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时候就“蜕化了”,或开始“蜕化”了吧?只要把这个问题一提出,就足以了解这种关于“蜕化”的推测是多么荒谬的了。

这样看来,乌斯特里亚洛夫为什么称赞列宁和我们党,孟什维克和立宪民主党人为什么称赞反对派,这是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也是加米涅夫千方百计力图回避的问题。

孟什维克和立宪民主党人称赞反对派,是因为反对派破坏我们党的统一,削弱无产阶级专政,从而帮助孟什维克和立宪民主党人去干颠覆苏维埃政权的勾当。这一点已由引文证明了。乌斯特里亚洛夫称赞我们党,则是因为苏维埃政权采取了新经济政策,容许私人资本存在,容纳了资产阶级专家,而这些专家的帮助和经验

是无产阶级所需要的。

孟什维克和立宪民主党人称赞反对派,是因为反对派以自己的派别活动去帮助他们准备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而乌斯特里亚洛夫们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推翻不了,便抛弃了颠覆苏维埃政权的观点,力图在无产阶级专政旁边占一席之地,力图钻入无产阶级专政;至于他们称赞党,则是因为党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容许新资产阶级在一定的条件下存在,这个新资产阶级想利用苏维埃政权去达到本阶级的目的,而苏维埃政权则正利用他们来达到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

我国无产阶级的各种阶级敌人之间的差别就在于此。

孟什维克和立宪民主党人称赞反对派,而乌斯特里亚洛夫这班先生们则称赞我们党,其根源就在于此。

我想请你们注意一下列宁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列宁说:“在我们苏维埃共和国内,社会制度是以工人和农民这两个阶级的合作为基础的,而现在也容许‘耐普曼’即资产阶级在一定的条件下参加这个合作。”(《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7卷第405页)

正因为容许新资产阶级参加某种有条件的合作(当然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并在苏维埃政权的监督下),——正因为这一点,乌斯特里亚洛夫才称赞我们党,希望抓住这个容许参加合作的机会,并利用苏维埃政权去达到资产阶级的目的。而我们,我们党则有另外的打算:利用新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及其经验和知识,以便使他们一部分人苏维埃化,使他们被同化,而另一部分不能苏维埃化的人则叫他们滚开。

列宁把新资产阶级跟孟什维克和立宪民主党人区别开来,容

许前者存在并加以利用,而建议逮捕后者,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关于这一点,列宁同志在其《论粮食税》中写道:

“不要害怕让共产党员去向资产阶级专家也包括向商人,向办合作社的小资本家,向资本家‘学习’。向他们学习,虽与我们过去向军事专家学习在形式上有所不同,但在实质上是一样的。‘领教’的成绩,只有靠实际经验来检查:要比自己身旁的资产阶级专家做得更好些,要善于用各种办法振兴农业,振兴工业,使农业和工业间的流转发展起来。‘为了领教’要不惜破费:多花点钱去学习并不可惜,只要学习能收到成效就行。”(《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6卷第352页)

关于以乌斯特里亚洛夫为代表的新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专家,列宁就是这样说的。

关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列宁则讲过下面的话:

“而对于那些实际上不外乎换上了时髦的喀琅施塔特式非党服装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非党分子’,那就要小心地把他们关在监狱里,或者把他们遣送到柏林马尔托夫那里去自由地享受纯粹民主制的一切滋味,去自由地和切尔诺夫、米留可夫以及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们交换意见吧。”(同上,第352页)

列宁就是这样说的。

也许反对派不同意列宁的意见吧?那就让他们直截了当地说出来。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逮捕孟什维克和立宪民主党人,而容许新资产阶级在一定的条件和一定的限制下存在,以使用经济手段和他们作斗争,一步步地战胜他们,同时利用他们的经验和知识来进行我们的经济建设。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540页。——编者注
同上。——编者注

由此可见,乌斯特里亚洛夫之类的阶级敌人称赞我们党,是因为我们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容许资产阶级和现存的苏维埃制度实行某种有条件的和有限度的合作,而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利用这个资产阶级的知识和经验来进行我们的建设,我们正在实现这个目的,大家知道,这方面并不是没有成绩的。而孟什维克和立宪民主党人一类的阶级敌人称赞反对派,却是因为反对派的活动在破坏我党的统一,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帮助孟什维克和立宪民主党人去干推翻专政的勾当。

我希望反对派最终会了解第一类称赞和第二类称赞之间的全部差别。

3 错误是有各种各样的

反对派在这里说到个别中央委员的一些错误。当然,个别的错误是有过的。我们没有绝对“不犯错误的”人。这样的人是没有的。但错误是有各种各样的。有一种错误,犯者并不坚持,而且不致由此形成纲领和派别,这种错误很快就被忘却。另外还有一种错误,犯者一直坚持,而且由此形成派别、纲领和党内斗争。这种错误就不能很快被忘却了。

必须把这两种错误严格地区别开来。

例如托洛茨基说,我在对外贸易垄断问题上有一个时候犯过错误。这是确实的。在我们收购机关混乱时期我的确提议过暂时开放一个港口来输出谷物。但我没有坚持自己的错误,在和列宁商谈后我立刻就纠正了。至于托洛茨基的这类经中央纠正后不再坚持的错误,我可以举出数十个数百个。如果我列举托洛茨基在中央工作中犯过的但没有坚持而且被忘却的一切极严重的、不大严重

的和不严重的错误,那么我得为此做几次专题报告。但是,我认为在政治斗争中,在政治论战中,应当谈的不是这类错误,而是后来发展成纲领并引起党内斗争的那种错误。

但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谈到的,恰好是关于这类没有发展成反对派别而且很快就被忘却的错误的的问题。因为反对派谈的正是这些问题,让我在这里也提一下反对派首领们过去所犯的这类错误吧。也许这对他们是一个教训,下次他们就不会再想拚命抓住已被忘却的错误了。

有一个时候,托洛茨基在我们党中央委员会里硬说:苏维埃政权正处于千钧一发的境地,“布谷鸟已经叫过了”,苏维埃政权存在的时间即使不是几个星期,也只有几个月了。这是1921年的事情。这是最危险的错误,它说明托洛茨基具有危险的情绪。但是中央为此嘲笑了他,而托洛茨基也没有坚持自己这个错误,于是错误就被忘却了。

有一个时候,这是在1922年,托洛茨基提议准许我们的工业企业和托拉斯把国家财产连固定资本在内抵押给私人资本家,以便获得贷款。(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喊道:“这是投降的道路。”)也许就是这样。无论如何,这会成为我们企业的非国有化的前提。但是中央否定了这个计划,托洛茨基争了一下,可是后来不再坚持自己的错误,于是现在错误就被忘却了。

有一个时候,这是在1922年,托洛茨基提议把我们的工业严格地集中起来,那么狂乱地集中起来,以致必然会把我们将近三分之一的工人阶级抛出工厂大门。中央否决了托洛茨基的这个学究式的、狂乱的和政治上危险的提议。托洛茨基几次向中央提到将来势必走上这条道路。然而我们并没有走上这条道路。(有人喊道:

“那就非把普梯洛夫工厂关闭不可。”)是的,是会弄到这个地步的。可是后来托洛茨基不再坚持自己的错误,于是错误就被忘却了。

如此等等。

或者我们拿托洛茨基的朋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来说吧,他们常常喜欢提到布哈林有一次说的“发财吧”,并且围着这个“发财吧”手舞足蹈。

这是 1922 年的事情,当时我们正讨论厄克特的租让和这一租让的极苛刻的条件的问题。结果怎样呢?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建议接受厄克特租让的苛刻条件,并且坚持自己的建议,这难道不是事实吗?可是中央拒绝厄克特的租让,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不再坚持自己的错误,于是错误就被忘却了。

或者再从加米涅夫的错误中举出一件事来说吧,本来我是不想说它的,但是加米涅夫使我不得不提到它,因为他令人厌烦地屡次提到布哈林的错误,提到布哈林早已纠正和消灭了的错误。我说的是加米涅夫在西伯利亚流放时发生的一件事。在二月革命后,加米涅夫与西伯利亚阿钦斯克的巨商合拍了一封贺电给立宪派米哈伊尔·罗曼诺夫,(高喊:“可耻!”)就是沙皇逊位后授以“即位权”的那个米哈伊尔·罗曼诺夫。当然这是一个愚蠢的错误,加米涅夫由于这个错误在 1917 年四月代表会议上受到我们党的严厉斥责。可是,加米涅夫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于是错误就被忘却了。

要不要提到这类错误呢?当然不要,因为它们已被忘却而且早已消灭了。为什么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拿这类错误来指责党内论战的对方呢?他们这样做只能使我们不得不提起反对派首领们的许多错误,这不是很明显吗?即使是为了杜绝反对派的吹毛求疵和恶意诽谤,我们也不得不这样做。

但是还有另一类错误,这类错误为犯者所坚持而且后来发展

为派别的纲领。这完全是另一种错误。党的任务就是要揭发这类错误并克服它们。因为克服这类错误是在党内确立马克思主义原则、保持党内统一、消灭派别活动并保证不再重犯这类错误的唯一手段。

例如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的错误,就变成了一套完整的反党纲领。是否应该公开而坚决地反对这种错误呢?是的,是应该的。

又如托洛茨基在工会问题争论时期的错误,在我们党内就引起了全国性的争论。

又如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十月错误就造成了党在1917年十月起义前的危机。

又如反对派联盟目前的错误则形成了派别的纲领和反党的斗争。

如此等等。

是否需要公开而坚决地反对这种错误呢?是的,是需要的。

谈到党内意见分歧时能不能对这种错误绝口不谈呢?显然是不能的。

4 季诺维也夫所理解的无产阶级专政

季诺维也夫在发言中谈到无产阶级专政时,硬说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这篇人所共知的论文中不正确地解释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

同志们,这是胡说。季诺维也夫在这里是嫁祸于人。实际上只能说季诺维也夫是在曲解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

观。

季诺维也夫对无产阶级专政有两种说法,其中没有一种能称为马克思主义的,而且两种说法根本互相矛盾。

第一种说法。季诺维也夫从党是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基本领导力量这个正确的论点出发,得出一个完全不正确的结论:无产阶级专政是党的专政。这样,季诺维也夫就把党的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等同起来了。

而把党的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等同起来是什么意思呢?

第一,这就是在阶级和党之间,在整体和部分之间划等号,这是荒谬绝伦的。列宁从来没有把党和阶级等同起来,而且也不会这样做。在党和阶级之间有许多无产阶级的非党的群众组织,在这些组织背后则站着无产者阶级的全体群众。忽视这些非党的群众组织的作用和比重,尤其是忽视工人阶级全体群众的作用和比重,并认为党可以代替无产阶级的非党的群众组织以及无产阶级全体群众,那就是使党脱离群众,使党极度官僚化,使党变成永无过错的力量,在党内培植“涅恰也夫主义”¹⁴⁵、“阿拉克切也夫制度”¹⁴⁶。

不用说,列宁和这种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毫无共同之处的。

第二,这就是说,不是象列宁同志那样从转义上、从党领导工人阶级的意义上去了解党的专政,而是从“专政”这个名词的本义上,即以党对工人阶级的暴力代替党对工人阶级的领导的意义上去了解党的专政。专政这个名词的本义是什么呢?专政这个名词的本义是依靠暴力的政权,因为从专政这个词的本义上看,没有暴力的因素就没有专政。党能不能成为以暴力对付本阶级,以暴力对付工人阶级的多数的政权呢?显然不能。不然,这就不是对资产阶级的专政,而是对工人阶级的专政了。

党是本阶级的导师、领导者、领袖,而不是以暴力对付工人阶级的多数的政权。不然,就谈不上说服方法是无产阶级政党在工人阶级队伍中的基本工作方法了。不然,就谈不上党应当说服无产阶级广大群众,使他们相信党的政策的正确性,就谈不上党只有在执行这个任务的过程中才能认为自己是能够领导无产阶级进行战斗的真正群众性的党。不然,党对无产阶级势必以命令和恐吓来代替说服的方法。这是荒谬的,是和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观完全不相容的。

请看季诺维也夫把党的专政(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等同起来的“理论”达到了何等荒谬的地步。

不用说,列宁和这种“理论”是毫无共同之处的。

我在《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反对季诺维也夫的时候,就驳斥了这种荒谬绝伦的说法。

在这里声明一下这篇论文的写作和付印都是得到我们党领导同志的完全同意和赞许的,大概不是多余的吧。

季诺维也夫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种说法就是如此。

再来看看第二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在一个方向上曲解列宁主义,而第二种说法则是在完全和前者相反的另一个方向上曲解列宁主义。这第二种说法就是,季诺维也夫确定无产阶级专政不是无产者阶级一个阶级的领导,而是工人和农民两个阶级的领导。

季诺维也夫关于这一点说道:

“现在,国家生活的领导权、舵轮、方向是掌握在工人阶级和农民这两个阶级手中。”(季诺维也夫《工农联盟和红军》1925年列宁格勒波涛出版社版第4页)

能不能否认我国现在存在着无产阶级专政呢?不,不能。我国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呢?在季诺维也夫看来,无产阶级专政原来是

两个阶级管理我国的国家生活。这和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观是否相容呢？显然是不相容的。

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者阶级一个阶级的统治。在无产阶级和农民联盟的条件下,这个无产阶级独裁表现为这个联盟中的领导力量是无产阶级和它的政党,这个政党不与也不能与其他力量或其他政党分享国家生活的领导权。这一切都是如此的浅显和不容争辩,几乎没有必要再作解释。季诺维也夫却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两个阶级的领导。那为什么把这个专政称为无产阶级专政而不称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呢？按照季诺维也夫的无产阶级专政观,我们就应当有两个政党的领导,以符合于两个阶级掌握“国家生活的舵轮”的情况,这难道还不明白吗？季诺维也夫的这个“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观能有什么共同之处呢？

不用说,列宁和这种“理论”是毫无共同之处的。

结论:不论季诺维也夫“理论”的第一种说法或第二种说法,都同样说明季诺维也夫显然是在曲解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

5 托洛茨基的巫师箴言

其次,我想谈一谈托洛茨基的几个含糊不清的声明,这些声明的目的实际上是要把人引入迷途。我只想举出几件事实。

一件事实。关于托洛茨基如何看待自己孟什维克的过去这一问题,托洛茨基装模做样地回答说:

“我加入布尔什维克党这事实本身……这事实本身已经证明,我已经把过去所有那些使我和布尔什维主义分开的东西放在党的门口了。”

“已经把所有那些使”托洛茨基“和布尔什维主义分开的东西放在党的门口了”是什么意思呢？雷梅勒当时质问得对：“怎能把这些东西放在党的门口呢？”真的，怎能把这些肮脏东西放在党的门口呢？（笑声）对这个问题托洛茨基始终没有答复。

此外，把托洛茨基的孟什维克残余放在党的门口是什么意思呢？他把这些东西放在党的门口是为了储藏起来以备将来在党内进行斗争之用呢，还是干脆把它们拿去烧掉？看样子，托洛茨基把它们放在党的门口是为了储藏起来。否则，如何解释托洛茨基入党后不久就跟党发生的并且直到现在还没有停止的那些连续不断的意见分歧呢？

请大家自己判断吧。1918年，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与党发生分歧，引起了党内斗争。1920—1921年，托洛茨基在工会运动问题上与党发生分歧，引起了全国的争论。1923年，托洛茨基在党的建设和经济政策的基本问题上与党发生分歧，引起了党内争论。1924年，托洛茨基在对十月革命的评价问题和党的领导问题上与党发生分歧，引起了党内争论。1925—1926年，托洛茨基及其反对派联盟在我国革命和当前政策的基本问题上与党发生分歧。

对于一个“已经把所有那些使他和布尔什维主义分开的东西放在党的门口了”的人来说，意见分歧不是太多了吗？

能不能说托洛茨基与党发生的这些连续不断的意见分歧是“偶然发生的事件”而不是合乎规律的现象呢？

恐怕不能这样说。

那么，托洛茨基这个极端含糊的声明追求的是什么目的呢？

我想只有一个目的：混淆视听，把听众引入迷途。

另一件事实。大家知道，从我们党的思想体系来看，从我国革

命的前途来看,关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理论”的问题是有相当重要的意义的。大家知道,这个“理论”曾经妄图而且继续妄图在我国革命动力问题上与列宁主义理论较量一番。因此,人们不止一次要托洛茨基表明他现在(1926年)对其不断革命“理论”的态度,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全会上发言时是怎样回答的呢?回答得十分含糊。他说,不断革命“理论”有某些“缺陷”,这个“理论”的某些方面在我们革命实践中没有得到证实。这样说来,这个“理论”的某些方面是有“缺陷”的,而这个“理论”的其他方面并没有“缺陷”,它们必然还有效。但是,怎样把不断革命“理论”的某些方面和这个“理论”的其他方面分开来呢?难道不断革命“理论”不是一套完整的观点吗?难道可以把不断革命“理论”看做一只箱子,比方说,它的两角已经腐朽,而其余两角依然完整无缺吗?其次,难道在这里可以只作一个简单的毫不负责的声明,一般地提到有“缺陷”,而说不出托洛茨基所指的究竟是哪些“缺陷”,不说出他认为不断革命“理论”究竟有哪些方面是不正确的吗?托洛茨基说不断革命“理论”有某些“缺陷”,可是他所指的究竟是什么“缺陷”,他认为这个“理论”有哪些方面是不正确的,这一切他都只字未提。因此,应当把托洛茨基对于这个问题的声明看做敷衍塞责的答复,看做他企图以“缺陷”这样含糊不清、毫不负责的词句来搪塞别人。

托洛茨基在这里的所作所为正象古时某些狡猾的巫师一样,这些巫师总是用含糊不清的回答来搪塞问卜者,如“渡河时一支大军将被击溃”。渡什么河,谁的军队将被击溃,——随你怎么理解。(笑声)

6 季诺维也夫象小学生那样引证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

其次,我想稍微谈谈季诺维也夫引证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家的特殊手法。季诺维也夫这种手法的特点就是把一切时期和日子弄乱,搅做一团,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个别原理和公式同它们与现实的有机联系割裂开来,把它们变为陈腐的教条,从而违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一基本要求。

请看几件事实。

(1)第一件事实。季诺维也夫在自己的发言中引证了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848—1850年)这本小册子中的尽人皆知的一句话:“工人阶级的任务 指社会主义的胜利。——约·斯大林注 是不能在本国范围内解决的。”

其次,季诺维也夫从马克思在 1858 年给恩格斯的信中摘引了下面一段话:

“对我们来说,困难的问题是:大陆上革命已经迫在眉睫,并将立即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但是,由于在极为广阔的领域内资产阶级社会还在走上坡路,革命在这个小小角落里不会必然被镇压吗?”(见《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集》俄文版第 74—75 页)

季诺维也夫引证了马克思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至五十年代所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468 页。——编者注

黑体是我用的。——约·斯大林注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9 卷第 348 页。——编者注

说的这些话并作出结论说：因此，就资本主义的一切时期来说，对社会主义在个别国家内胜利的问题的解答都是否定的。

能不能说季诺维也夫了解了马克思及其关于社会主义在个别国家内胜利的问题的观点和基本路线呢？不，不能这样说。相反地，从这些引证中可以看出季诺维也夫完全没有了解马克思，他歪曲了马克思的基本观点。

从马克思这些话中能不能得出结论说，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任何条件下，社会主义在个别国家内的胜利都是不可能的呢？不，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从马克思的话中只能得出结论说，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还在走上坡路”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在个别国家内胜利才是不可能的。可是，如果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由于事物发展的进程而改变了自己的方向，开始走下坡路，那会怎样呢？从马克思的话中可以得出结论说，在这样的条件下，否认社会主义在个别国家内胜利的可能性的根据便消失了。

季诺维也夫忘记马克思这些话是指垄断前的资本主义时期而言，当时整个资本主义是在向上发展，当时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未伴随着象英国那样的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的腐朽过程，当时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还不是而且不能是瓦解资本主义的强有力的因素，象它以后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在帝国主义时期那样。对于垄断前的资本主义时期来说，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的基本任务不可能在个别国家内完成的话是完全正确的。我还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就说过：在旧时，在垄断前的资本主义时期，对社会主义在个别国家内胜利的问题的解答是否定的，而且解答得完全正确。可是现在，在目前的资本主义时期，当垄断前的资本主义变成了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时候，能说整个资本主义现时是在向上发展吗？不，不能这样说。列宁对帝国主义经济实质的

分析说明,在帝国主义时期,整个资产阶级社会是走下坡路的。列宁说得完全对: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列宁同志关于这一点说道:

“不难了解为什么帝国主义是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垂死的资本主义,因为从资本主义中成长起来的垄断已是资本主义的垂死状态,是它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开始。帝国主义造成的大规模的劳动社会化(即辩护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称之为“交织”的东西),其含义也是一样。”(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19卷第302页)

整个向上发展的垄断前的资本主义是一回事。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是另一回事,这时,世界已被各资本主义集团瓜分完了,资本主义跳跃式的发展要求以军事冲突重新瓜分已被瓜分的世界,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各帝国主义集团间的冲突和战争,削弱着资本主义的世界战线,使它易被击破,造成在个别国家内突破这一战线的可能。在那时,在垄断前的资本主义时期,社会主义在个别国家内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在现时,在帝国主义时期,在垂死的资本主义时期,社会主义在个别国家内的胜利已成为可能的了。

同志们,问题就在这里,而季诺维也夫不愿意了解的也就是这一点。

你们看,季诺维也夫象小学生那样引证马克思,抛开马克思的观点,抓住马克思的个别词句,他不是作为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作为社会民主主义者来应用这些引文。

修正派引证马克思的手法是什么呢?修正派引证马克思的手法就是离开一定时代的具体条件,从马克思的个别原理中引出一些话来顶替马克思的观点。

季诺维也夫引证马克思的手法是什么呢？季诺维也夫引证马克思的手法就是引证马克思的词句，割断这些词句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发展条件的有机联系，把它们变成教条，用它们来顶替马克思的观点。

我想这里是用不着解释的。

(2)第二件事实。季诺维也夫从《共产主义原理》(1847年)中引证了恩格斯关于工人革命“不能单独在某个国家内发生”的话，把恩格斯的这些话和我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关于我们苏联已经实现了恩格斯所提出的十二条要求的十分之九的声明加以对比，并由此作出两个结论：第一，社会主义在个别国家内胜利是不可能的！第二，我在自己的声明中粉饰了苏联的现时条件。

说到引自恩格斯的那段话，需要指出，季诺维也夫在解释恩格斯这段话时也犯了他在解释马克思的话时所犯的错误。显然，在垄断前的资本主义时期，在资产阶级社会整个向上发展的时期，恩格斯对社会主义在个别国家内可能胜利的问题必然给以否定的解答。把恩格斯这个适用于资本主义的旧时期的原理机械地应用到资本主义的新时期即帝国主义时期，这就是歪曲恩格斯和马克思的观点，以迁就那些离开垄断前的资本主义时期的实际发展条件而引来的个别词句。我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已经说过，恩格斯的这个公式在当时是唯一正确的公式。可是应该了解，不能把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还谈不上垂死的资本主义的时期和资本主义发展的现时期，即整个资本主义成了垂死的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时期混为一谈。从前认为不可能的，现在在资本主义新的条件下已经成为可能的和必要的了，这难道难以了解吗？

你们看,季诺维也夫在这里对待恩格斯,正如对待马克思一样,始终是坚持自己那种修正派的引证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家的手法的。

至于季诺维也夫的第二个结论,那他是直接歪曲了恩格斯关于工人革命的十二条要求或措施的。季诺维也夫把事情描绘成这样,似乎恩格斯在他的十二条要求中提供了一个包括消灭阶级、消灭商品生产以及消灭国家的详尽的社会主义纲领。这是完全不对的。这完全曲解了恩格斯。在恩格斯的十二条要求中,没有一个字提到消灭阶级,消灭商品经济,消灭国家,消灭各种各样的私有制。相反地,恩格斯的十二条要求是以“民主”(恩格斯当时所理解的“民主”是指无产阶级专政)的存在、阶级的存在和商品经济的存在为出发点的。恩格斯直截了当地说,他的十二条要求指的是直接“侵犯私有制”(而不是完全消灭它)和“保证无产阶级的生存”(而不是消灭无产阶级这个阶级)。下面是恩格斯的话:

“征象显著即将来临的无产阶级革命,只能逐步改造现代社会,并且只有在废除私有制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创造出来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首先无产阶级革命将建立民主制度,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假如无产阶级不能立即利用民主来实行直接侵犯私有制和保证无产阶级生存的各种措施,那么,这种民主对于无产阶级就会毫无用处。这些由现有条件中必然产生出来的最主要的措施如下……”

接下去就是列举大家已经知道的十二条要求或措施(见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

由此可见,恩格斯在这里说的不是消灭阶级、国家、商品生产

黑体都是我用的。——约·斯大林注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19页和第220页。——编者注

等等的详尽的社会主义纲领,而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最初步骤,是直接侵犯私有制、保证工人阶级生存、巩固无产阶级政治统治所必需的初步措施。

结论只有一个:季诺维也夫曲解了恩格斯,把他的十二条要求说成详尽的社会主义纲领。

我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的结论中说的是什么呢?我说的是恩格斯所提出的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最初步骤的那些要求或措施,有十分之九已在我们苏联实现了。

这是不是说我们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呢?

显然不是这个意思。

可见,坚持自己的引证手法的季诺维也夫,在说到我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的声明时犯了一个“小小的”颠倒是非的毛病。

请看,季诺维也夫引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特殊手法竟使他走到怎样的地步。

季诺维也夫的引证手法使我想起了关于社会民主党人的一个很可笑的“故事”,这个“故事”是瑞典一个革命的工团主义者在斯德哥尔摩讲的。这是在1906年我们党的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⁴¹开会时候的事情。这位瑞典同志把某些社会民主党人引证马克思和恩格斯时所表现的书呆子气描绘得十分可笑,我们这些代表听了,笑得全身发软。“故事”的内容是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克里木水兵和步兵起义的时候。水兵和步兵的代表去见社会民主党人说:近几年来你们号召我们起义以反对沙皇制度,我们深信你们的号召是正确的,我们水兵和步兵约定起义,现在特来请求你们指示。社会民主党人慌张了起来,回答说他们不召开专门代表会议不能解决起义问题。水兵们示意说,不能再迟延了,事情已准备好了,如果他们得不到社会民主党人明白的答复,社会民主党人不来领导起义,

事情就会失败。水兵和步兵随即离去,等候指示,而社会民主党人就召开代表会议来讨论这个问题。他们拿出《资本论》第一卷,拿出《资本论》第二卷,最后拿出《资本论》第三卷。他们寻找马克思有关克里木、塞瓦斯托波尔的指示,有关克里木起义的指示。但是找遍三卷《资本论》,都没有找到一个,确实没有找到一个有关塞瓦斯托波尔、有关克里木、有关水兵和步兵起义的指示。(笑声)他们又翻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其他著作,寻找指示,还是任何指示也没有找到。(笑声)怎么办呢?水兵们已经来了,等着答复。结果怎样呢?社会民主党人只好承认,在这样的情形下他们不能给水兵和步兵任何指示。瑞典同志结束自己的故事说:“水兵和步兵的起义就这样失败了。”(笑声)

无疑地,这个故事夸大了事实。但是,同样无疑地,这个故事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季诺维也夫引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手法的主要毛病。

(3)第三件事实。这里谈的是引证列宁著作的问题。季诺维也夫为了从列宁著作中胡乱摘引一大堆话来把听众弄得“目瞪口呆”,用尽了一切办法。看来季诺维也夫认为引证愈多愈好,可是他很少注意到引文谈的是什么,说明什么问题。如果细读这些引文,那就不难了解,季诺维也夫从列宁著作中引证的话,没有一句(哪怕用暗示的方式)是有利于反对派联盟现在的投降主义立场的。列宁曾说过,必须认为专政的“经济问题”的解决和苏联无产阶级在解决这一问题上的胜利是有保证的。必须指出,季诺维也夫不知为什么没有从列宁这方面的主要论述中引出一段话来。

季诺维也夫引证了列宁的小册子《论合作制》里说到我们苏联有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的那段话。但他甚至没打算用一点点心思来提出(哪怕暗示一下)这样的问题:这段话说明什么,把它引来对谁有利,对反对派联盟有利,还是对

联共(布)有利。

季诺维也夫力图证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可是他从列宁著作中引来用以证明这个论点的那些话,却把自己的论点完全推翻了。

例如下面就是这些引文中的一段;

“我屡次说过:与各先进国家相比,俄国人开始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把它继续到获得最终胜利,即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就比较困难了。”(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4卷第250页)

季诺维也夫竟没有想一想,这段话不是有利于反对派联盟而是有利于党的,因为它不是说在苏联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而是说这种建设是困难的;并且这段话承认,在苏联有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是一种不言而喻的事情。党总是说,在苏联开始革命比在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容易些,但是建成社会主义则困难些。这是不是说承认这个事实就等于否认在苏联有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呢?当然不是。相反地,从这个事实只能得出结论说,尽管有困难,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是完全可能和必要的。

试问,季诺维也夫需要这类引证是为了什么呢?

大概是为了用一大堆引证来把听众弄得“目瞪口呆”,把水搅浑。(笑声)

但是,季诺维也夫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引证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家的那种非常可笑的手法,确定无疑地使他陷入困境,我想这一点现在是很明白的了。

黑体是我用的。——约·斯大林注

参看《列宁全集》第29卷第277页。——编者注

7 季诺维也夫所理解的修正主义

最后稍微谈谈季诺维也夫对“修正主义”这一概念的解释。在季诺维也夫看来,凡是使马克思或恩格斯的旧公式或个别原理更加完善,更加精确,尤其是用适合新情况的其他公式代替这些公式的都是修正主义。试问,为什么呢?难道马克思主义不是科学,难道科学不是不断发展,不断用新经验丰富自己、使旧公式更加完善的吗?原来他认为“修正”就是“修改”,而要使旧公式更加完善,更加精确,就不能不把这些公式作某些修改,因此,凡是使旧公式更加精确、更加完善,凡是用新经验和新公式丰富马克思主义的都是修正主义。这一切当然是可笑的。但如果季诺维也夫置自己于可笑的境地,同时以为自己是在和修正主义作斗争,那对他又有什么办法呢?

例如斯大林有没有权利完全按照列宁主义的指示和基本路线,把他自己关于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公式(1924年)加以改变并使之更加精确呢?在季诺维也夫看来是没有这个权利的。为什么呢?因为改变旧公式并使之更加精确,就是修改这个公式,而照德文的意思,修改就是修正。斯大林岂不是显然陷入了修正主义吗?

由此看来,我们有一个新的季诺维也夫的关于修正主义的标准,这个标准使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修正主义罪名的威胁下必然陷于完全停滞的境地。

例如马克思在十九世纪中叶说,在资本主义向上发展的时期,社会主义在本国范围内获得胜利是不可能的;而列宁在1915年说,在资本主义向下没落的时期,在垂死的资本主义时期,这种胜

利是可能的,那么说,列宁在对待马克思方面是陷入修正主义了。

例如马克思在十九世纪中叶说:“欧洲大陆的任何一个国家甚至整个欧洲大陆在经济方面的”社会主义“变革,如果没有英国参与,都不过是杯水风波”;而恩格斯后来根据阶级斗争的新经验改变了这种论点,说社会主义革命“将由法国人开始,而由德国人完成”,那么说,恩格斯在对待马克思方面是陷入修正主义了。

恩格斯说,社会主义革命将由法国人开始,而由德国人完成,列宁根据苏联革命胜利的经验,改变了这个公式,代之以另一个公式,说社会主义革命已由俄国人开始,而由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完成,那么说,列宁在对待恩格斯尤其在对待马克思方面是陷入修正主义了。

请看列宁关于这个问题所说的话吧:

“社会主义的伟大创始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几十年来考察工人运动的发展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成长,清楚地看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需要经过长期的分娩痛苦,经过长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摧毁一切旧东西,无情地消灭各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团结全世界的工人,全世界的工人则应当联合自己的一切力量来保证彻底的胜利。他们并且说过,在十九世纪末叶,‘将由法国人开始,而由德国人完成’,其所以由法国人开始,是因为法国人在几十年的革命中已经养成奋不顾身的革命创造精神,使他们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先锋队。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国际社会主义力量的另一种结合。我们说,比较容易开始革命运动的,并不是那些有可能易于进行掠夺和有力量收买本国工人上层分子的剥削国家。……现在的局势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预期的不同了,它把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先锋队的光荣使命交给了我们——俄国的劳动的和被剥削的阶级了;我们现在清楚地看到革命的发展会多么远大;俄国人开始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175页。——编者注
黑体是我用的。——约·斯大林注

了,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将去完成,社会主义定将胜利。”(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2卷第218页)

你们看,列宁在这里简直“修改了”恩格斯和马克思的话,照季诺维也夫的说法,他是陷入“修正主义”了。

例如恩格斯和马克思确定巴黎公社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大家知道,公社是由两个党领导的,其中没有一个党是马克思主义的;然而列宁后来根据帝国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的新经验,说稍微发展的无产阶级专政,只有在一个政党即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那么说,列宁在对待马克思和恩格斯方面是陷入明显的“修正主义”了。

列宁在帝国主义战争之前曾说联邦制是不可采用的国家组织形式,而在1917年,他根据无产阶级斗争的新经验,改变、修改了这个公式,说联邦制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适当的国家组织形式,那么说,列宁在对待自己和列宁主义方面是陷入“修正主义”了。

如此等等。

这样,在季诺维也夫看来,马克思主义不应当用新的经验来丰富自己,凡是使马克思主义某些经典著作家的个别原理和公式更加完善的都是修正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呢?马克思主义就是科学。如果马克思主义不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新经验来丰富自己,如果它不从马克思主义观点,不从马克思主义方法的角度来吸取这些经验,马克思主义这门科学能保持和发展吗?显然是不能的。

马克思主义要求在保持马克思主义观点、保持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条件下根据新的经验来改善和丰富旧公式,而季诺维也夫则相反,他保持词句,以马克思主义个别原理的词句顶替马克思主义

的观点和方法 ,这难道还不明白吗 ?

以马克思主义个别公式的词句和个别原理的摘引顶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路线 ,这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有什么共同之处呢 ?

这不是马克思主义 ,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 ,这难道还用怀疑吗 ?

马克思和恩格斯说“ 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 ,而是行动的指南 ” ,正是针对季诺维也夫那样的“ 马克思主义者 ”说的。

季诺维也夫倒霉的地方就在于他不懂得马克思和恩格斯这句话的意义和作用。

二

社会主义在个别资本主义 国家内胜利的问题

我已经谈到反对派的一些错误和反对派首领发言中所表现出来的与事实不符的地方。我已在结论的第一部分即几点意见中说明了这个问题。现在让我直接来谈本题。

1 帝国主义时期个别国家 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提

第一个问题就是帝国主义时期社会主义在个别资本主义国家内胜利的可能性问题。你们知道 ,这里所说的不是某一个国家 ,而是一切较为发达的帝国主义国家。

反对派在社会主义在个别资本主义国家内胜利的问题上的主要错误在什么地方呢 ?

反对派的主要错误在于他们不了解或者不愿了解帝国主义以前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之间的全部差别,他们不懂得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把资本主义的两个不同的阶段即帝国主义以前的阶段和帝国主义阶段混为一谈。

反对派的这种错误产生了他们的另一种错误,即他们不懂得帝国主义时期发展不平衡的规律的意义和作用,把均衡趋势与这个规律对立起来,因而滚到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的立场上去了。

这两个错误引起了反对派的第三个错误,即他们把根据帝国主义以前的资本主义所得出的公式和原理机械地应用到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因此他们就否认社会主义在个别资本主义国家内胜利的可能性。

旧的垄断前的资本主义和新的垄断的资本主义,如用三言两语来说明,其差别在哪里呢?

差别在于:资本主义通过资本家庞大的垄断同盟的发展代替了通过自由竞争的发展;金融资本、“腐朽的”资本代替了旧的、“文明的”、“进步的”资本;跳跃式的发展,通过帝国主义集团以军事冲突来重新瓜分已被瓜分的世界的发展,代替了资本“和平的”扩大和向“空闲的”土地的伸展;因此,垂死的资本主义,整个向下没落的资本主义,代替了旧的整个向上发展的资本主义。

列宁关于这一点说道:

“我们回想一下,从前的‘和平的’资本主义时代被现代的帝国主义时代所代替的基础是什么,这就是自由竞争已让位于资本家的垄断同盟,整个地球已被瓜分。显然,这两件事实(和因素)确实具有世界意义:当资本能够畅行无阻地扩大殖民地和夺取非洲等处未被占据的土地,而资本的集中还很薄弱,垄断企业即庞大到能够控制某一个工业部门的企业还没有产生时,自由贸易与和平竞争是可能的和必然的。这种垄断企业的发生和发展……使以往的自由竞争成为不可能了,并且破坏了它的基础,而地球的瓜分又迫使从

和平扩张转到用武装斗争来重新瓜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18卷第254页)

他继续说道：

“现在已不能象过去那样在资本主义稳步发展和逐步向新的国家扩展的比较平静、文明、和平的环境中生活了，因为另一个时代已经来到。金融资本正在排挤这样的国家，并且一定会把它挤出大国的行列，夺取其殖民地和势力范围。”(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18卷第256—257页)

由此就得出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性质的基本结论：

“不难了解为什么帝国主义是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垂死的资本主义，因为从资本主义中成长起来的垄断已是资本主义的垂死状态，是它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开始。帝国主义造成的大规模的劳动社会化(即辩护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称之为“交织”的东西)，其含义也是一样。”(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19卷第302页)

我们的反对派倒霉的地方就在于他们不懂得帝国主义以前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之间的这种差别的全部重要性。

而我们党的立场的出发点则是承认现代的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这一事实。

可惜，这还不是说资本主义已经死亡了。但是，毫无疑义，这是说整个资本主义不是走向复兴而是走向衰亡，整个资本主义不是向上发展而是向下没落。

从这个总的问题就产生出帝国主义时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参看《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632页。——编者注

黑体是我用的。——约·斯大林注

参看《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635页。——编者注

同上，第884—885页。——编者注

列宁主义者在讲到帝国主义时期的发展不平衡时通常指的是什么呢？

是不是指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水平有很大的差别，一些国家在发展上落后于其他一些国家，并且这种差别在日益加大呢？

不，不是指这一点。把帝国主义时期的发展不平衡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水平的差别混为一谈，那是庸俗观念。反对派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把发展不平衡问题和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状况水平的差别问题混淆起来，正是这种庸俗观念。反对派正是以这个糊涂观念为出发点而得出了一个极不正确的结论：过去的发展不平衡比在帝国主义时期更厉害。正因为如此，托洛茨基在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说：“这种不平衡在十九世纪比在二十世纪更厉害。”（见托洛茨基在联共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的发言）季诺维也夫当时也这样断言：“说在帝国主义时代开始以前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比较缓和，这是不正确的。”（见季诺维也夫在联共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的发言）

诚然，现在，经过了在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的争论，反对派认为必须改变阵线，因而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上发表了一种完全相反的意见，或者干脆不提自己这种错误。例如托洛茨基在扩大全会上发言时说：“至于发展的速度，那么，帝国主义是无止境地加剧了这种不平衡性。”至于季诺维也夫，他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会上的发言中则认为对这个问题只字不提是最明智的办法，虽然他不会不知道所争论的正是帝国主义时期不平衡规律的作用是在增强还是在削弱的问题。但这只说明争论多少教育了反对派，对反对派不是没有益处的。

总之，不能把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和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状况水平的差别问题混为一谈。

能不能说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水平差别的减小和这些国家的日趋均衡是在减弱帝国主义时期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呢？不，不能这样说。这种发展水平上的差别是在加大还是在缩小呢？无疑是在缩小。均衡化是在上升还是在下降呢？无疑是在上升。均衡化的上升是不是和帝国主义时期发展不平衡的加强相矛盾呢？不，不相矛盾。相反地，均衡化正是帝国主义时期发展不平衡作用可能加强的背景和基础。只有象我们的反对派那样不懂得帝国主义经济实质的人，才能把均衡化和帝国主义时期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对立起来。正因为落后国家在加速自己的发展并和先进国家取得均衡，正因为如此，一些国家为超过另一些国家而进行的斗争便尖锐起来，正因为如此，便造成了一些国家超过另一些国家并把它们从市场中排挤出去的可能，从而为军事冲突、为削弱世界资本主义战线、为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者突破这一战线创造前提。谁不了解这个简单的道理，谁就一点也不了解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实质问题。

因此，均衡化是帝国主义时期发展不平衡加强的条件之一。

能不能说，帝国主义时期的发展不平衡就是一些国家按照通常的方式，即按照所谓进化的方式，不经过跳跃，不经过战争灾祸，不经过重新瓜分已被瓜分的世界而在经济方面赶上另一些国家，然后超过它们呢？不，不能这样说。这种不平衡在垄断前的资本主义时期就已经有了，这一点马克思是知道的，列宁在他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也曾谈到过。当时资本主义的发展大体上是平稳的，大体上是采取进化的方式的，一些国家是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不经过跳跃，不一定经过世界规模的军事冲突而超过另一些

国家的。现在说的不是这种不平衡。

那么,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的规律究竟是什么呢?

帝国主义时期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就是:一些国家通过跳跃式的发展超过另一些国家,一些国家很快地被另一些国家从世界市场上排挤出去,以军事冲突和战争灾祸的方式周期性地重新瓜分已被瓜分的世界,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的冲突加深和加剧起来,世界资本主义战线削弱,个别国家的无产阶级可能突破这条战线,社会主义可能在个别国家内获得胜利。

帝国主义时期发展不平衡规律的基本要点是什么呢?

第一,世界已被各帝国主义集团瓜分完了,世界上不再有“空闲的”、未被占据的土地了;为了占据新的市场和原料产地,为了扩展势力,必须用武力从别国夺取这些土地。

第二,技术的空前发展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水平的日趋均衡,使一些国家可能并易于以跳跃方式超过另一些国家,使不很强盛但在迅速发展的国家可能并易于排挤比较强盛的国家。

第三,各个帝国主义集团间势力范围的旧的划分总是和世界市场上新的力量对比发生冲突,为了在势力范围的旧的划分和新的力量对比之间求得“平衡”,必须通过帝国主义战争来周期性地重新瓜分世界。

因此,帝国主义时期发展的不平衡是在加强和加剧起来。

因此,帝国主义阵营内的冲突是不可能用和平方式解决的。

因此,鼓吹可能和平解决这些冲突的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是不能成立的。

由此应得出结论:否认帝国主义时期发展不平衡的加强和加剧这一事实的反对派是滚到超帝国主义的立场上去了。

帝国主义时期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就是如此。

各个帝国主义集团是在什么时候把世界瓜分完毕的呢？

列宁说是在二十世纪初叶把世界瓜分完毕的。

事实上第一次提出重新瓜分已被瓜分的世界的问题是在什么时候呢？

是在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战争时期。

由此应得出结论：只有在二十世纪初叶才能发现和论证帝国主义时期发展不平衡的规律。

我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已谈到这一点，当时我说，帝国主义时期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是列宁同志发现和论证的。

帝国主义世界战争是重新瓜分已被瓜分的世界的初次尝试。这次尝试使资本主义付出的代价是俄国革命的胜利与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和附属国内的基础的破坏。

不用说，继重新瓜分世界的第一次尝试之后必有第二次尝试，并且帝国主义阵营已在进行这种准备工作。

无庸怀疑，重新瓜分世界的第二次尝试将使世界资本主义付出的代价比第一次大得多。

从帝国主义条件下的不平衡规律看来，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前途就是如此。

可见，这种前途直接造成在帝国主义时期社会主义在个别资本主义国家内胜利的可能性。

大家知道，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可能在个别国家内胜利的结论是直接来自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中得出的。列宁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帝国主义时期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使所有一切社会民主党人失去任何根据，来玩耍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个别资本主义国

家内获得胜利这种“理论的”把戏。

列宁在 1915 年所写的纲领性的论文中关于这一点说道：

“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见《列宁全集》俄文第 3 版第 18 卷第 232 页）

结论是：

（一）反对派的基本错误是他们看不见资本主义两个阶段的差别，或者回避强调这种差别。为什么他们回避这一点呢？因为从这种差别里会得出帝国主义时期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来。

（二）反对派的第二个错误是他们不懂得或者低估了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规律的决定性意义。为什么他们低估这一点呢？因为正确估计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规律就会得出社会主义可能在个别国家内胜利的结论。

（三）由此产生了反对派的第三个错误，即否认在帝国主义时期社会主义在个别资本主义国家内胜利的可能性。

谁否认社会主义在个别国家内胜利的可能性，谁就不得不对帝国主义时期发展不平衡规律的意义默不作声，而谁不得不对不平衡规律的意义默不作声，谁就不能不抹杀存在于帝国主义以前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之间的差别。

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提问题就是如此。

这个问题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从实际上说，在我们面前摆着两条路线。

一条路线是我们党的路线，它号召个别国家的无产者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革命，机警地注视事变的进程，并准备在有利条件下

黑体是我用的。——约·斯大林注

参看《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2 卷第 709 页。——编者注

独立地突破资本战线,夺取政权,动摇世界资本主义的基础。

另一条路线是我们反对派的路线,他们对独立突破资本主义战线的适当性散播怀疑情绪,并号召个别国家的无产者等待“总解决”时刻的到来。

我们党的路线是使个别国家的无产者加强对本国资产阶级的革命进攻并发挥他们的主动性的路线,而我们反对派的路线则是使个别国家的无产者在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消极等待并限制他们的主动性的路线。

第一条路线是使个别国家的无产者积极起来的路线。

第二条路线是削弱无产阶级革命意志的路线,是消极等待的路线。

列宁万分正确地写了一段和我们目前的争论有直接关系的至理名言:

“我知道,当然有一些自以为很聪明、甚至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聪明人,他们硬说在世界各国的革命爆发以前不应夺取政权。他们没有想到,他们这样说就是脱离革命而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等待劳动阶级完成世界规模的革命,——这就是使大家在等待中停滞不前。这是荒谬的。”(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3卷第9页)

列宁的这段话是不应该忘记的。

2 季诺维也夫怎样“加工”列宁的话

我已经谈过个别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提。现在我想稍微谈谈季诺维也夫怎样歪曲或者“加工”列宁那篇论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提和社会主义在个别资本主义国家内胜利的主要论

文。我指的是列宁在 1915 年写的并在我们讨论时几次引证过的那篇著名论文《论欧洲联邦口号》。季诺维也夫责备我对这篇论文引证得不完全；同时他力图给这篇论文作一种只能说是完全歪曲列宁的观点、完全歪曲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在个别国家内胜利问题的基本路线的解释。让我把这段话全部引出来，并把上次由于时间短促而被我去掉的几行字用黑体标出。这段话就是：

“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既然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就会起来反对其余的资本主义的世界，把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这些国家中掀起反对资本家的起义，必要时甚至用武力去反对剥削阶级及其国家。无产阶级借以推翻资产阶级、获得胜利的社会的政治形式将是民主共和国，它日益集中这一民族或这些民族里的无产阶级力量，同还没有转到社会主义方面来的国家作斗争。没有无产阶级这一被压迫阶级的专政，便不能消灭阶级。没有各社会主义共和国对各落后国家的相当长期的顽强斗争，便不能实现各民族在社会主义中的自由联合。”（见《列宁全集》俄文第 3 版第 18 卷第 232—233 页）

季诺维也夫在引证这段话时作了两点说明：第一点是关于民主共和国的，第二点是关于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

我们先谈第一点说明。季诺维也夫认为，既然列宁在这里说的是民主共和国，那么最多只能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同时季诺维也夫恬不知耻地在这里做出极其含糊而又固执的暗示，说列宁在这里大概指的是资产阶级共和国。这对不对呢？当然不对。要反驳季诺维也夫这个不大正派的暗示，只须读一下引文中谈到“各社会主义共和国对各落后国家的斗争”的最后几行就够了。显然，列宁

说的民主共和国不是指资产阶级共和国,而是指社会主义共和国。

列宁在 1915 年还不知道苏维埃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列宁早在 1905 年就知道个别的苏维埃是推翻沙皇制度时期的革命政权的萌芽。但他当时还不知道在全国范围内联合起来的苏维埃政权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列宁在 1917 年才发现苏维埃共和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他在 1917 年夏天,主要在其《国家与革命》一书中详尽地研究了过渡社会的这一新的政治组织形式问题。其实这也正说明列宁在上面引文中不提苏维埃共和国,而谈民主共和国,从引文中可以看出,这指的是社会主义共和国。列宁在这里的做法,正象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做法一样,在巴黎公社以前,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共和国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社会的政治组织形式,而在巴黎公社以后解释这个名词时则说这种共和国应当是巴黎公社式的共和国。我更不必说,假如列宁在这段话里指的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那就谈不上“无产阶级专政”、“剥夺资本家”等等了。

可见,季诺维也夫“加工”列宁的话的尝试不能说是成功的。

现在谈谈季诺维也夫的第二点说明。季诺维也夫硬说列宁同志的“组织社会主义生产”这句话不应当象平常人一般所应了解的那样去了解,而应当有所不同,应当了解成这样:列宁在这里指的只是着手组织社会主义生产。为什么,根据什么,季诺维也夫并没有说明。我得声明:季诺维也夫在这里又一次试图“加工”列宁的话。上面引文直截了当地说道:“这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既然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就会起来反对其余的资本主义的世界。”这里说的是“组织了”,而不是“组织着”。

是否还需要证明这中间有差别呢？假如列宁指的只是着手组织社会主义生产，那他就会说“组织着”，而不会说“组织了”，这是否还需要证明呢？可见，列宁指的不单是着手组织社会主义生产，而且是可能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可能在个别国家内建成社会主义生产。

可见，季诺维也夫“加工”列宁的话的第二次尝试也应当认为是惨败了。

季诺维也夫竭力用“不能靠仙法在两星期或两个月内建设社会主义”这类笑话来掩盖自己“加工”列宁的话的尝试。恐怕季诺维也夫需要这类笑话是为了“在败局中强作欢颜”。季诺维也夫究竟在什么地方找到了打算在两星期、两个月或两年内建设社会主义的人呢？假如世界上真有这种人，他为什么不指出他们来呢？他不指出他们来，是因为世界上没有这种人。季诺维也夫需要这类捏造的笑话是为了掩盖其“加工”列宁和列宁主义的“工作”。

总之：

(一)列宁根据帝国主义时期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在其《论欧洲联邦口号》那篇主要论文中得出了社会主义可能在个别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的结论；

(二)列宁所说的社会主义在个别国家内的胜利，是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剥夺资本家和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同时这一切任务并不是最终目的，而是用来反对其余的世界即资本主义世界和帮助全世界无产者与资本主义作斗争的手段；

(三)季诺维也夫试图把列宁主义的这些原理截头去尾和“加工”列宁的话，使之适合于目前反对派联盟的半孟什维克的立场。然而这种尝试不过是手段笨拙的尝试而已。

我认为再解释是多余的了。

三

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同志们,现在让我谈谈我们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

1 反对派的“手腕”和列宁党的 “民族改良主义”

托洛茨基在发言时说,斯大林的最大的错误是关于在一个国家即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理论。这样看来,这里所说的并不是列宁关于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理论,而是斯大林的一种谁也不知道的“理论”。我对这一点的了解是这样:托洛茨基的目的是要和列宁的理论作斗争,但公开反对列宁是一件冒险的事情,于是他决定装出和斯大林的“理论”作斗争的样子来进行这一斗争。托洛茨基想借此使自己更易于和列宁主义作斗争,想通过批判斯大林的“理论”来掩盖这个斗争。实际情况正是这样的,这和斯大林毫无关系,根本谈不上什么斯大林的“理论”,斯大林从来没有在理论上创造什么新东西的奢望,他只是不顾托洛茨基修正主义的挣扎,竭力促使列宁主义在我们党内获得完全胜利,——关于这些我想在下面加以说明。现在要指出的是:托洛茨基关于斯大林的“理论”的说法是一种手腕,一种诡计,一种怯懦而又笨拙的诡计,他指望用这种诡计来掩盖他与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在个别国家内胜利的理论所作的斗争,这一斗争从1915年就已开始并一直继续到现在。托洛茨基的这种手法是不是老老实实的论战的表现,让

同志们来判断吧！

我们党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问题的决议是以列宁同志的纲领性的名著为出发点的。列宁在这些著作中说：在帝国主义条件下，社会主义在个别国家内的胜利是可能的；就解决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问题来说，这一专政的胜利是有保证的；我们苏联无产者具有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

列宁那篇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在个别国家内胜利的可能性问题的著名论文中的一段话，我刚才引证过了，因此在这里就不重复了。这篇论文写于 1915 年。这篇论文说，社会主义在个别国家内获得胜利，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剥夺资本家并组织社会主义生产，这一切都是可能的。大家知道，托洛茨基就是同一年即 1915 年发表文章反对列宁这篇论文，称列宁的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民族狭隘性”的理论。

试问，这和斯大林的“理论”有什么关系呢？

其次，我在报告中还从列宁的名著《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里摘引了一段话，在那里列宁直接而明确地说，就解决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问题来说，苏联无产阶级的胜利应该认为是有保证的。这篇著作写于 1919 年。下面就是这段引文：

“不管各国资产者及其公开的和隐蔽的帮凶们（第二国际的“社会党人”）怎样造谣诬蔑，有一点是不容怀疑的：从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经济问题来看，共产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在我国是有保证的。全世界资产阶级之所以疯狂地拼命地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组织军事进攻，策划阴谋活动等等来反对布尔什维克，正是因为他们十分清楚，若不用武力把我们压倒，我们就必然会在改造社会经济方面获得胜利。但资产阶级要想这样把我们压倒是不可能的。”（见

《列宁全集》俄文第 3 版第 24 卷第 510 页)

可见,列宁在这里直接说到苏联无产阶级在改造社会经济方面、在解决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问题方面是可能获得胜利的。

大家知道,托洛茨基和整个反对派是不同意这段引文所阐述的基本论点的。

试问,这和斯大林的“理论”有什么关系呢?

最后,我从列宁的著名小册子,即他在 1923 年写的小册子《论合作制》中摘引了一段话。这段话是这样的:

“的确,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最小农结成联盟,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已有保证等等,难道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难道这不是我们通过合作社,而且仅仅通过合作社,通过我们从前鄙视为买卖机关,并且现时在新经济政策下我们从某一方面也有理由加以鄙视的合作社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吗?这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这已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见《列宁全集》俄文第 3 版第 27 卷第 392 页)

可见,这段话使人们对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不会再有任何怀疑。

可见,这段引文列举了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因素:无产阶级政权,无产阶级政权掌握的大生产,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无产阶级在这个联盟中的领导,合作社。

不久以前,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托洛茨基企图把这段话同列宁著作中的另一段话即“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见《列宁全集》俄文第 3 版第 26 卷第 46 页)对立起

参看《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4 卷第 87 页。——编者注

黑体是我用的。——约·斯大林注

参看《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4 卷第 882 页。——编者注

同上,第 399 页。——编者注

来。但把这两段话互相对立起来就是曲解列宁《论合作制》这本小册子的基本意思。难道电气化不是大生产的组成部分吗？难道在我国没有集中在无产阶级政权手里的大生产，电气化有任何可能吗？列宁在《论合作制》这本小册子里说大生产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因素之一，这句话本身就包含着电气化，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大家知道，反对派正在进行多少公开的而多半是隐蔽的斗争，来反对列宁的小册子《论合作制》的这段引文所阐明的基本论点。

试问，这和斯大林的“理论”有什么关系呢？

列宁主义关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基本论点就是如此。党断言，托洛茨基和反对派联盟的某些众所周知的论点，如“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建设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在理论上为民族狭隘性辩护”，“没有欧洲无产阶级直接的国家援助，俄国工人阶级就不能保持政权”（托洛茨基），是和列宁主义的上述论点根本矛盾的。

党断言，反对派联盟的这些论点是我们党内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表现。

党断言，托洛茨基关于“欧洲无产阶级直接的国家援助”的公式，是一个完全和列宁主义背道而驰的公式。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依赖“欧洲无产阶级直接的国家援助”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欧洲无产阶级在最近几年内不能夺取政权，那怎么办呢？能不能无限期地等待西方革命胜利而让我国革命开空车呢？能不能指望我国资产阶级同意等待西方革命胜利而放弃其反对我国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的活动和斗争呢？从托洛茨基这个公式中产生出来的前途，不就是在西方的胜利的革命延迟的情况下，我们党逐步地把自己的阵地让给我国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然后放弃政权吗？

这里两条完全不同的路线，一条是党和列宁主义的路线，另

一条是反对派和托洛茨基主义的路线,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我在做报告时问过托洛茨基,现在还要问他:托洛茨基在1915年认为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在个别国家内胜利的可能性的理论是“民族狭隘性”的理论,这难道不是真的吗?但是我没有得到答复。为什么呢?难道默不作声就是论战中有勇气的表现吗?

其次,我问过托洛茨基,现在还要问他:不久以前,在1926年9月,他在众所周知的告反对派的文件中又责难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是“民族狭隘性”,这难道不是真的吗?但是这次我也没有得到答复。为什么呢?是否因为默不作声也是托洛茨基的一种“手腕”呢?

这一切说明什么呢?

说明托洛茨基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这一基本问题上仍然是站在他那反对列宁主义的旧立场上的。

说明托洛茨基没有勇气直接反对列宁主义,而企图借批评事实上不存在的斯大林的“理论”来掩盖这一斗争。

现在来谈谈另一位“耍手腕的”加米涅夫。他大概受到托洛茨基的传染,也耍起手腕来了。但他的手腕耍得比托洛茨基还要笨拙。托洛茨基企图责备斯大林一个人,而加米涅夫竟责备起全党来了,说它(即党)“以民族改良主义的前途顶替国际革命的前途”。请看,原来我们党是以民族改良主义的前途顶替国际革命的前途。但是,既然我们党是列宁的党,既然党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决议完全以列宁的著名原理为依据,那么,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就是民族改良主义的理论了。列宁是“民族改良主义者”,——加米涅夫就是拿这样愚蠢的话来款待我们的。

我们党有没有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决议呢?有,甚至有非常明确的决议。这些决议是什么时候被党通过的呢?这些决议是1925年4月在我党第十四次代表会议上通过的。我指的是第

十四次代表会议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著名决议。这项决议是不是列宁主义的呢？是的，是列宁主义的，对于这一点，象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样的权威人士都能向我们作证，季诺维也夫在第十四次代表会议上曾做报告维护这项决议，加米涅夫曾在这次代表会议上担任主席并在表决时赞成这项决议。

为什么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没有设法揭发党，指出它和第十四次代表会议一致通过的（这是人所共知的）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决议有矛盾有分歧呢？

党有一个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特别的决议，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在表决时曾赞成这项决议，现在他们两人责备党是民族改良主义，为什么他们不把党的这个重要文件，即第十四次代表会议这个论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并且显然完全是列宁主义的决议当做他们的论据呢？看来这样做是再容易不过的了。

你们是否注意到整个反对派，特别是加米涅夫，避开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决议，象猫儿避开热粥一样（笑声）为什么他们那样惧怕这个根据季诺维也夫的报告并在加米涅夫的积极赞助下通过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决议呢？为什么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对于这项决议连提都不敢提一下呢？难道这项决议不是论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吗？难道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不是我们辩论中引起争执的基本问题吗？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事情是这样的：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在 1925 年曾赞成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决议，但后来背弃这项决议，因而也就背弃列宁主义，转到托洛茨基主义方面去了，现在他们唯恐被人揭穿，对于这项决议连提也不敢提了。

这项决议说些什么呢？

下面就是这项决议中的一段：

“一般说来，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不是指最终胜利）是绝对可能的。”

其次：

“……两个直接对立的社会制度的存在，经常引起资本主义封锁、其他种种经济压力、武装干涉和复辟的危险。因此，几个国家内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唯一保障，即免除复辟的唯一保障。但由此决不能得出结论说，在俄国这样落后的国家中，如果没有技术上经济上比较发达的国家的‘国家援助’（托洛茨基），就不可能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俄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只有无产阶级在欧洲几个最重要的国家内获得胜利以后，才会是可能的’（托洛茨基，1922年）这一论断，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组成部分，这种论断是要使苏联无产阶级在目前采取听天由命的消极态度。列宁同志反驳这一类的‘理论’说：‘他们在西欧社会民主党发展时期背得烂熟的一条论据，已成为他们万古不变的金科玉律。这条论据就是：‘我们还没有成长到实现社会主义的地步，或象他们的各种“博学的”先生们所说的那样，我们还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客观的经济前提。’（《评苏汉诺夫的札记》）”（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关于共产国际和俄共（布）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的决议而产生的任务》的决议）

可见，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决议确切地说明了列宁主义关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问题的基本原理。

可见，决议认为托洛茨基主义是与列宁主义相反的东西，而决议中一系列的论点都是以直接否定托洛茨基主义的原则为出发点

黑体是我用的。——约·斯大林注

参看《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690页。——编者注

参看《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分册第47—48页。——编者注

的。

可见,决议完全反映了现在重新掀起的关于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问题的争论。

你们知道,我的报告是以这项决议的指导性的原理为基础的。

你们大概还记得,我在报告中特别提到了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决议,责备了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说他们违反了这项决议,背弃了这项决议。

为什么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不设法消除这种责难呢?

秘密究竟在哪里呢?

秘密就在于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早已背弃了这项决议,并且一背弃了这项决议就转到托洛茨基主义方面去了。

因为二者必居其一:

或者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决议不是列宁主义的,那么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既然在表决时赞成了这项决议,也就不是列宁主义者了;

或者这项决议是列宁主义的,那么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既然屏弃了这项决议,也就不再是列宁主义者了。

有几位发言人(里泽似乎也在内)在这里说,不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转到托洛茨基主义方面去了,相反地,是托洛茨基转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方面去了。同志们,这完全是胡说。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背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决议这一事实,正是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转到托洛茨基主义方面去的直接证据。

总之:

是谁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背弃了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决议中所规定的列宁主义路线呢?

原来是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

是谁以托洛茨基主义“顶替国际革命前途”呢？

原来是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

加米涅夫现在叫嚷我们党是“民族改良主义”，这是因为他企图借此转移同志们对他的罪过的注意并嫁祸于人。

正因为如此，加米涅夫“耍手腕”，叫嚷什么我们党是“民族改良主义”，这是一种诡计，一种丑恶而又笨拙的诡计，他指望用叫喊我们党是“民族改良主义”来掩盖自己背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决议、背弃列宁主义而转到托洛茨基主义方面去的行为。

2 我们正在苏联建立并能建成 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我在报告中说过，社会主义的政治基础在我国已经建立了，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我说过，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还远没有建立，还必须把它建立起来。其次，我说过，问题因此是这样的：我们有没有可能用本身的力量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最后，我说过，如果用阶级语言来表述这个问题，那问题就是这样的：我们有没有可能以本身的力量战胜我们苏联的资产阶级呢？

托洛茨基在发言中断言，我说战胜苏联资产阶级是指在政治上战胜它。这当然是不对的。这是托洛茨基醉心于派别活动的表现。从我的报告中可以看出，我说战胜苏联资产阶级是指在经济上战胜它，因为在政治上它已经被战胜了。

在经济上战胜苏联资产阶级是什么意思呢？换句话说，在苏联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什么意思呢？

“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就是把农业和社会主义工业结合为一个整体经济，使农业服从社会主义工业的领导，在农产品和工业品交换的基础上

调整城乡关系，堵死和消灭阶级借以产生首先是资本借以产生的一切孔道，最后造成直接导致阶级消灭的生产条件和分配条件。”（见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的报告）

这就是我在报告中给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实质所下的定义。

这个定义确切地说明了列宁在其著名的《论粮食税》小册子纲要中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实质”、“经济基础”所下的定义。

这个定义是否正确，我们能否指望我国有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可能性，——这就是现时我们意见分歧的基本问题。

托洛茨基甚至没有提到这个问题。他干脆避开了这个问题，大概他认为默不作声是比较明智的。

至于我们正在建立并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这至少从下列几点可以看出：

（一）我们社会主义化的生产是联合的大生产，而我国非国有化的生产则是分散的小生产，大家知道，大生产而且是联合的大生产对小生产占优势，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

（二）我们社会主义化的生产已在领导并开始控制小生产，无论城市的或乡村的小生产都是一样；

（三）在我国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与资本主义成分作斗争的战线上，前者对后者占有无疑的优势，并在步步前进，在生产或流通方面不断战胜我国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

至于促使我国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战胜资本主义成分的其

见本卷第 511 页。——编者注

指《论粮食税 一书纲要》（见《列宁全集》第 32 卷第 309—318 页）。——编者注

他一些因素,我就不谈了。

有什么理由推断说战胜我国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的过程今后不会再延续下去呢?

托洛茨基在发言时说:

“斯大林说,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就是力求消灭阶级和国家,就是战胜我国的资产阶级。是的,同志们,但是要知道国家是需要军队去反对国外的敌人的。”(引自速记记录。——约·斯大林注)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从这段话里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因为建成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就是消灭阶级和国家,因为我们仍然需要军队来保卫社会主义祖国,可是没有国家就不可能有军队(托洛茨基这样想),所以在武装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必要性还没有消失以前,我们是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

同志们,这是把一切概念混淆起来了。或者在这里把国家理解为不过是武装保卫社会主义社会的机构。这是荒谬的,因为国家首先是一个阶级反对其他阶级的工具,而且不言而喻,既然没有阶级,也就不会有国家。或者在这里认为没有国家就不可能有保卫社会主义社会的军队。这也是荒谬的,因为从理论上说来,完全可以有这样的社会状态:没有阶级,没有国家,但是有保卫无阶级的社会免于外敌侵犯的武装人民。社会学提供不少的例子,说明人类历史上有过没有阶级没有国家但用某种方法防御外敌侵犯的社会。未来的无阶级的社会也将是这样,它虽然没有阶级和国家,但仍可以有防御外敌侵犯所必需的社会主义的民兵。我认为我国发展到这种地步是不大可能的,因为不容置疑,我国社会主义的建设成就,尤其是社会主义的胜利和阶级的消灭,——这些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实,不能不引起资本主义国家无产者追求社会主义的强烈的愿望,不能不引起其他国家革命的爆发。但是从理论上说来,

完全可以有这样的社会状态 ;没有阶级和国家 ,却可能有社会主义的民兵。

而这个问题在我们的党纲中也有一定的说明。党纲中是这样说的 :

“红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它不能不有公开的阶级性质 ,即完全要由无产阶级和接近无产阶级的半无产的农民阶层组成。只有在阶级消灭以后 ,这类阶级军队才能变为全民的社会主义的民兵。”见《联共(布)党纲》)

托洛茨基大概忘记了我们党纲中的这一条。

托洛茨基在发言时谈到我国国民经济对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依赖 ,硬说“我们正在日益脱离孤立的战时共产主义而和世界经济结合起来”。

这样说来 ,本身存在着资本主义成分和社会主义成分的斗争的我国国民经济 ,正在和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结合起来。我所以讲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 ,是因为目前世界上并不存在另一种世界经济。

同志们 ,这是不对的。这是荒谬的。这是托洛茨基醉心于派别活动的表现。

谁也不否认我国国民经济对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依赖是存在的。过去和现在谁也不否认这一点 ,正象谁也不否认每个国家和每个国家的国民经济(美国的国民经济也不例外)对国际资本主义经济的依赖是存在的一样。但这种依赖是双方面的。不只是我们的经济依赖资本主义国家 ,而且资本主义国家也依赖我们的经济 ,依赖我们的石油、我们的粮食、我们的木材以及我们广大的市场。比方说 ,我们从“美孚油公司”那里得到贷款。我们从德国资本家那里

黑体是我用的。——约·斯大林注

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536页。——编者注

得到贷款。但我们得到贷款,不是因为我们的眼睛生得漂亮,而是因为资本主义国家需要我们的石油,需要我们的粮食,需要我们的市场来销售设备。不可忘记我国占世界六分之一的面积,是一个广大的销售市场,资本主义国家不和我们的市场保持某种联系是不行的。这一切就是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经济的依赖。在这里依赖是双方面的。

这是不是说我国国民经济对资本主义国家的依赖使我国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呢?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以为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绝对闭关自守、绝对不依赖周围各国国民经济的東西,这就是愚蠢之至。能不能断言社会主义经济绝对不会有任何输出和输入,不会输入本国所没有的产品,因而也不会输出自己的产品呢?不,不能这样断言。而什么是输出和输入呢?这是一些国家依赖另一些国家的表现。这是经济上相互依赖的表现。

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也是这样。你们不能设想出一个没有输出和输入的国家。就拿世界上最富的国家美国来说吧。能不能说现在的资本主义国家譬如英国或美国是绝对不依赖他国的国家呢?不,不能这样说。为什么呢?因为它们依赖输出和输入,它们依赖其他国家的原料(例如美国依赖橡胶和其他原料),它们依赖销售市场来销售自己的设备和其他成品。

这是不是说既然没有绝对不依赖他国的国家,也就不能有各个国家国民经济的独立性呢?不,不是这个意思。我国依赖其他国家,正象其他国家依赖我国国民经济一样,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因而丧失了或就要丧失自己的独立性,它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它应当变成国际资本主义经济的小螺丝钉。应该把一些国家对另一些国家的依赖性和这些国家的经济独立性区别开来。否认各个国民经济单位的绝对不相依赖,并不等于也不能等于否认这些单位

的经济独立性。

但是托洛茨基不仅说到我国国民经济的依赖性。他还把这种依赖性说成是我国经济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结合。但我国国民经济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结合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把我国国民经济变成世界资本主义的附属品。可是，难道我们国家是世界资本主义的附属品吗？当然不是！同志们，这是愚蠢的。这是不严肃的。

假如这是对的，我们就没有任何可能来保护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我们对外贸易的垄断、我们国有化的运输、我们国有化的信贷、我们对经济的有计划的领导。

假如这是对的，我们就已走上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蜕化成普通资本主义工业的道路。

假如这是对的，我们就不会在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成分和资本主义成分斗争的战线上获得胜利。

托洛茨基在发言时说：“实际上我们将始终处于世界经济控制之下。”

这样说来，我国国民经济将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控制之下发展，因为目前世界上除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以外再没有其他的世界经济。

这对不对呢？不，不对。这是资本主义豺狼的梦想，这种梦想是永远不会实现的。

什么是资本主义世界的控制呢？资本家嘴里的控制不是一句空话。资本家嘴里的控制是一种实在的东西。

资本主义的控制首先就是金融控制。可是，难道我们的银行不是国有化的吗？难道它们是在欧洲资本主义银行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吗？金融控制就是在我国设立各个资本主义大银行的分行，就是

设立所谓“女儿”银行。可是,难道我国有这样的银行吗?当然没有!不但没有,而且只要苏维埃政权存在,就永远不会有。

资本主义的控制就是控制我们的工业,使我们社会主义工业非国有化,使我们运输业非国有化。可是,难道我们的工业不是国有化的吗?难道它不正是作为国有化的工业而在发展吗?难道有人打算把我们国有化的企业,即使是一个企业,变为非国有化的吗?当然,我不知道在托洛茨基的租让委员会里有什么打算。(笑声)不过只要苏维埃政权存在,取消国有化的人就不能在我国立足,这一点可以不必怀疑。

资本主义的控制就是支配我们市场的权利,就是取消对外贸易的垄断。我知道,西方的资本家在竭力冲破对外贸易垄断的铁壁时曾不止一次被碰了回去。大家知道,对外贸易的垄断是我们年轻的社会主义工业的盾牌和屏障。可是,难道资本家在取消对外贸易垄断方面已经获得胜利了吗?只要苏维埃政权存在,不管怎样,对外贸易垄断都会长久存在下去,这难道不易理解吗?

最后,资本主义的控制就是政治上的控制,就是使我国丧失政治上的独立性,使我国的法律适合国际资本主义经济的利益和口味。可是,难道我国不是一个政治上独立的国家吗?难道我们的法律不是根据我国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利益来制定的吗?为什么不举出事实,即使是一个事实,来说明我国丧失了政治上的独立性呢?让他们举举看吧。

这就是资本家所理解的控制,当然,这里是说实际的控制,而不是空谈什么有名无实的控制。

如果说的是这种实际的资本主义控制(也只能是这种控制,因为只有蹩脚的文人才能空谈有名无实的控制),那么我应当声明:在我国没有这种控制,只要我们的无产阶级存在,只要我们有苏维

埃政权 ,永远也不会有这种控制。(鼓掌)

托洛茨基在发言时说 :

“现在所说的是要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包围中建成子然独存的社会主义国家。要达到这一点 ,只有使这个子然独存的国家的生产力超过资本主义的生产力 ,因为从远景上看 ,不是在一年或十年内 ,而是在半世纪甚至一世纪内 ,能够使自己巩固起来的只有生产力比旧经济制度的生产力更为强大的那种国家、那种新的社会形态。”(见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的发言速记记录)

这样说来 ,要有五十年甚至一百年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才能在生产力发展方面实际证明自己比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优越。

同志们 ,这是不对的。这是混淆了一切概念和前途。

封建经济制度为了证明自己比奴隶经济制度优越 ,大约费去了二百年 ,也许略少些。不这样也不可能 ,因为当时发展的速度极为缓慢 ,而生产的技术又非常原始。

资产阶级经济制度为了证明自己比封建经济制度优越 ,大约费去了一百年 ,或者不到一百年。还在封建社会内部 ,资产阶级经济制度就已显示出它比封建经济制度优越 ,并且优越得多。这里所需时间的不同是因为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有更快的发展速度 ,有更发达的技术。

从那时起 ,技术显示了空前的进步 ,发展速度简直快极了。试问 ,托洛茨基有什么根据来推断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为了证明自己比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优越而要用将近一百年的时间呢 ?

领导我国生产的将不是寄生虫 ,而是生产者本人 ,这个事实难道不是使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有一切机会足以一日千里地发展经济 ,并在较短期间内证明自己优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极重要的因素吗 ?

社会主义经济是最统一最集中的经济,社会主义经济是按计划进行的,这个事实难道不是说明社会主义经济会有一切有利条件足以在较短期间内证明自己优于被内部矛盾所分裂、被危机所腐蚀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吗?

既然如此,在这里还搬出五十年和一百年的前途,那就是和受惊的市侩一样,患了迷信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万能的病症,这难道还不明白吗?(喊声:“对!”)

结论是什么呢?结论有两个。

第一,托洛茨基就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进行反驳时,已经从旧的论战基地退却到新的基地了。从前反对派是从内部矛盾、从无产阶级和农民间的矛盾来进行反驳,认为这些矛盾是不可克服的。而现在托洛茨基是强调外部矛盾,强调我国国民经济和世界资本主义经济间的矛盾,认为这些矛盾是不可克服的。从前托洛茨基认为无产阶级和农民间的矛盾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绊脚石,而现在他改变战线,退到另一个基地来批评党的立场,硬说我国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间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绊脚石。这样他也就在实际上承认了反对派的旧论据是不能成立的。

第二,但托洛茨基的退却是退却到绝路上去了,退却到泥潭里去了。托洛茨基实际上是直接公开地退却到苏汉诺夫那里去了。实质上托洛茨基的“新”论据归结起来是什么呢?归结起来就是:由于经济的落后性,我们没有发展到建设社会主义的地步,我们没有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客观条件,我国国民经济因而正在变成而且定要变成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的附属品,变成世界资本主义控制下的经济单位。

但这是“苏汉诺夫思想”,是露骨的和赤裸裸的“苏汉诺夫思想”。

反对派滚到孟什维克苏汉诺夫那里去了,滚到直接否认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可能胜利的苏汉诺夫立场上去了。

3 我们和世界无产阶级 结成联盟来建设社会主义

我们是和农民结成联盟来建设社会主义,这一点看来我们的反对派已不敢公然否认。我们是否和世界无产阶级结成联盟来建设社会主义,这一点反对派却打算表示怀疑。某些反对派分子甚至硬说我们党低估了这个联盟的意义。而其中有一位加米涅夫,甚至责备党是民族改良主义,说党以民族改良主义的前途顶替国际革命的前途。

同志们,这是愚蠢,不可救药的愚蠢。只有疯子才会否认我国无产者和其他各国无产者的联盟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极大意义。只有疯子才会责备我们党低估全世界无产者联盟的事业。只有和世界无产阶级结成联盟才能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

整个问题就在于如何理解这一联盟。

苏联无产者在 1917 年 10 月夺取了政权,这就是对世界各国无产者的帮助,这就是和他们的联盟。

德国无产者在 1918 年掀起了革命,这就是对世界各国无产者特别是对苏联无产者的帮助,这就是和苏联无产阶级的联盟。

西欧无产者瓦解对苏联的武装干涉活动,不替反革命将军们运输武器,组织行动委员会并破坏本国资本家的后方,这就是对苏联无产者的帮助,这就是西欧无产者和苏联无产者的联盟。没有资本主义国家无产者的这种同情和这种援助,我们就不能在国内战争中获得胜利。

资本主义国家无产者派遣许多代表团到我们这里来,检查我们的建设,然后向全欧洲的工人宣扬我们的建设成就,这就是对苏联无产者的帮助,这就是对苏联无产者极大的援助,这就是和苏联无产者的联盟,这就是对帝国主义可能对我国实行的武装干涉的扼制。没有这种援助和这种扼制,我们现在就不会有“喘息时机”,而没有“喘息时机”,我们就不能在我国展开社会主义建设工作。

苏联无产者巩固自己的专政,消灭经济破坏状态,展开建设工作,并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做出成绩,这就是对全世界无产者、对他们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对他们夺取政权的斗争的极大援助,因为苏维埃共和国的存在、它的坚不可摧、它在社会主义建设战线上取得的成就,是鼓舞全世界无产者去进行反对资本主义斗争的世界革命的极重要的因素。而苏维埃共和国的消灭会引起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最黑暗最残酷的反动统治,这几乎是无可怀疑的。

我国革命的力量和资本主义国家革命运动的力量就在于全世界无产者的这种互相援助和这种联盟。

这就是苏联无产者和世界无产阶级的联盟的种种形式。

反对派的错误在于他们不懂得或不承认这些联盟形式。反对派倒霉的地方在于他们只承认一种联盟形式,即西欧无产者对苏联无产阶级的“直接的国家援助”的形式,可惜这种形式目前还无法采用,而反对派却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命运直接寄托于这种未来的援助上面。

反对派认为只有承认这种援助形式才能使党保有“国际革命前途”。但是我已经说过,在世界革命延迟的情况下,这种立场只能使我们向我国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不断让步并终于走向投降主义和失败主义。

由此可见,反对派提出来的这种和世界无产阶级联盟的唯一

形式,即欧洲无产阶级的“直接的国家援助”的形式,在世界革命延迟的情况下,是投降主义的烟幕。

加米涅夫的“国际革命前途”是投降主义的烟幕,——这就是加米涅夫勾当的归宿。

因此,加米涅夫在这里责备我们党是民族改良主义时的那种勇气只能令人惊讶罢了。

说得客气一些,这位革命性或国际主义向来不比人强的加米涅夫的这种勇气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们这位一向是孟什维克中的布尔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中的孟什维克的加米涅夫的这种勇气是从哪里来的呢?(笑声)

这位被列宁当时有充分根据称为十月革命的“工贼”的加米涅夫的这种勇气是从哪里来的呢?

加米涅夫想知道苏联无产阶级是不是国际主义者。我应当声明,苏联无产阶级不需要十月革命的“工贼”来鉴定。

你想知道苏联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的程度吗?去问一问英国工人,问一问德国工人,(热烈鼓掌)问一问中国工人吧,——他们会向你讲述苏联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

4 蜕化问题

由此看来,可以有根据地认为反对派的观点是公开否认在我国有胜利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

但是,否认胜利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就会导致党蜕化的前途,而蜕化的前途又会导致放弃政权并引起组织另一政党的问题。

托洛茨基装出一副样子,似乎他不会把这个问题看得那样严

重。这是伪装。

不容置疑,假如我们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其他各国的革命又延迟下去,而我们这里资本的增长正如我国国民经济和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结合”的增长一样,那么,从反对派的观点看来,出路只有两条:

(一)或者是继续掌握政权而实行资产阶级民主的政策,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因而实行“米勒兰主义”¹⁴⁷;

(二)或者是为了不致蜕化而放弃政权,组织一个和正式的党并列的新党。这正是我们的反对派一向追求的、实际上还在继续追求的目的。

两个党的理论,或组织新党的理论,是否胜利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直接结果,是蜕化前途的直接结果。

这两条出路都是引向投降主义,引向失败主义的。

在内战时期问题是怎样的呢?问题是这样的:如果我们不善于组织军队和抗击敌人,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垮台,我们就会失去政权。当时战争占第一位。

现在,当内战已经结束和经济建设任务占第一位的时候,问题是怎样的呢?现在问题是这样的:如果我们不能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对资产阶级作越来越大的让步,就一定会蜕化,变成资产阶级民主的尾巴。

共产党人能不能同意使无产阶级专政蜕化而实行资产阶级政策呢?

不,不能而且不应该。

因此出路就是:放弃政权,成立新党,给复辟中的资本主义扫清道路。

投降主义是反对派联盟目前的立场的必然结果,结论就是如

此。

四 反对派和党的统一问题

现在来谈谈最后一个问题,谈谈反对派联盟和我们党的统一问题。

反对派联盟是怎样形成的呢?

党断言,反对派联盟是经过“新反对派”、经过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转到托洛茨基主义方面去而形成的。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否认这一点,暗示说不是他们到托洛茨基那里去了,而是托洛茨基到他们这里来了。

我们来看看事实。

我已谈到第十四次代表会议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决议。我已谈到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背弃了这个托洛茨基不接受而且不能接受的决议,他们背弃它是为了靠近托洛茨基并转到托洛茨基主义方面去。这是对的吗?是的,这是对的。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是否打算用什么来反对这种论断呢?没有,他们没有这样打算过。他们避开问题,默不作声。

其次,我们还有我党第十三次代表会议的决议,这项决议认定托洛茨基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的倾向,是对列宁主义的修正。大家

指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根据斯大林《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的报告》通过的《关于争论总结和党内小资产阶级倾向》的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362—372页)。——编者注

知道,这项决议是由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批准的。我在报告中说过,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背弃了这项决议,他们在自己的特别声明中承认托洛茨基主义 1923 年的反党斗争是正确的。这是否对呢?是的,这是对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是否打算用什么来反对这种论断呢?没有,他们没有这样打算过。他们默不作声。

还有几件事实。加米涅夫在 1925 年关于托洛茨基主义写道:

“托洛茨基同志已成为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借以在我们党内表现出来的孔道。他的言论的全部性质、他过去的全部历史都表明是这样的。他在反党斗争中已成为国内一切反党力量的象征。……”“我们必须采取一切办法使非布尔什维主义学说所指望的那一部分党员,也就是我们的青年,也就是应当掌握党的命运的未来成员,不受这种学说的感染。因此,尽力用各种方法说明托洛茨基同志的立场的不正确,说明必须在托洛茨基主义和列宁主义之间有所选择,不能把二者结合起来,这应该是我们党的当前任务。”(见加米涅夫《党和托洛茨基主义》,《拥护列宁主义》文集第 84—86 页)

加米涅夫现在有没有足够的勇气来重复这些话呢?如果他准备重复这些话,为什么他现在和托洛茨基结成联盟呢?如果他不敢重复这些话,他就是抛弃旧有立场而转到托洛茨基主义方面去了,这不是很明显的吗?

季诺维也夫在 1925 年关于托洛茨基主义写道:

“托洛茨基同志近来的言论(《十月的教训》)不是别的,而是相当公开地企图修正甚至直接取消列宁主义基础。稍过一些时候,我们全党和整个共产国际都会明白这一点的。”(见季诺维也夫《布尔什维主义还是托洛茨基主义》,《拥护列宁主义》文集第 120 页)

把季诺维也夫的这段话和加米涅夫在发言中所说的关于“我们和托洛茨基站在一起,是因为他没有修正列宁的基本思想”的那

段话比较一下,你们就会明白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已经堕落到多么严重的地步。

季诺维也夫在同一年即 1925 年关于托洛茨基写道:

“现在要解决的就是 1925 年俄国共产党究竟是一个什么党的问题。在 1903 年,这个问题是根据对党章第一条的态度来解决的,而在 1925 年,则是根据对托洛茨基的态度、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态度来解决的。谁说托洛茨基主义可以成为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合法派别’,谁就不再是布尔什维克。谁现在想和托洛茨基联合、和公开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托洛茨基主义合作来建党,谁就是背弃列宁主义基础。必须懂得托洛茨基主义已经是过去的阶段,现在要建设列宁主义的党,只有反对托洛茨基主义才有可能。”(1925 年 2 月 5 日《真理报》)

季诺维也夫现在有没有足够的勇气来重复这些话呢?如果他准备重复这些话,为什么他现在和托洛茨基结成联盟呢?如果他不能重复这些话,他就是背弃列宁主义而转到托洛茨基主义方面去了,这不是很明显的吗?

这一切事实说明什么呢?

说明反对派联盟是经过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转到托洛茨基主义方面去而形成的。

反对派联盟的纲领是什么呢?

反对派联盟的纲领是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纲领,是我们党内右倾的纲领,是集合所有一切机会主义派别来反对党、反对党的统一、反对党的威信的纲领。加米涅夫说到我们党内的右倾时暗示这是指中央委员会。但这是一种诡计,一种笨拙而又虚伪的诡计,其目的是用对党的大声责难来掩盖反对派联盟的机会主义。实际上表现我们党内右倾的是反对派联盟。我们判断反对派不是根据他

们的声明而是根据他们的行动。而反对派的行动则说明反对派是所有一切机会主义分子——从奥索夫斯基和“工人反对派”到苏瓦林和马斯洛夫、科尔施和路特·费舍等人——的集合点和策源地。如果根据加米涅夫的发言来判断,则反对派现在所追求的就是恢复派别活动,恢复我们党内派别自由的理论,把我们党内一切机会主义分子集合起来,反对党的统一,反对党的领导干部,为组织新党而斗争。加米涅夫的发言是在这一方面从反对派 1926 年 10 月的“声明”发展到恢复反对派的分裂路线的转折点。

从党的统一来看,反对派联盟是什么呢?

反对派联盟是我们党内新党的萌芽。反对派有自己的中央委员会和平行的地方委员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反对派在其 1926 年 10 月 16 日的“声明”中硬说他们已放弃了派别活动。但加米涅夫的发言难道不是说明他们又在进行派别斗争吗?有什么保证能说反对派没有恢复他们的中央组织和平行的地方组织呢?反对派为自己的基金会收集特别党费,这难道不是事实吗?有什么保证能说他们没有重新走上这条分裂的道路呢?

反对派联盟是破坏我党统一的新党的萌芽。

任务就在于摧毁这个联盟和消灭这个联盟。(热烈鼓掌)

同志们,当其他各国还被帝国主义统治着的时候,当一个国家,仅仅一个国家,能突破资本的战线的时候,在这种条件下如果没有一个以铁的纪律武装起来的党的统一,无产阶级专政是连一分钟也不能存在的。我们要想保持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要想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根除破坏党的统一的企图,就必须彻底消灭组织新党的企图。

因此,任务就在于消灭反对派联盟和巩固我们党的统一。

五 结 论

同志们,我就要讲完了。

要是把讨论做一总结,那就可以得出一个不容怀疑的总结论:我们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说得对,反对派的毛病就是不相信我国无产阶级的力量,不相信我国胜利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

这就是同志们不能不得出的总的印象和总的结论。

可见在你们面前有两种力量。一方面是我们的党,它满怀信心地领导苏联无产阶级前进,建设社会主义,并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起来斗争。另一方面是反对派,它象一个腿患风湿症、腰患酸痛病、头患偏头风的衰朽的老头子,一步一拐地跟在党的后面,到处散布悲观主义,制造恶毒的流言,说我们在苏联搞社会主义是不会有什结果的,说在他们资产者那里什么都好,而在我们无产者这里什么都不好。

同志们,这就是你们面前的两种力量。

你们应当在这二者之间有所选择。(笑声)

我不怀疑,你们是会作出正确的选择的。(鼓掌)

反对派被自己的派别活动所迷惑,竟把我们的革命看做一种毫无独立能力的东西,看做未来的尚未获胜的西方革命的一种无须付出代价的附属品。

列宁同志并不是这样看我们的革命,看苏维埃共和国的。列宁同志认为苏维埃共和国是给全世界无产者照亮道路的火炬。

关于这一点列宁同志曾经说过:

“苏维埃共和国这个榜样将长期地摆在他们——即世界各国无产者。——约·斯大林注 面前。我们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将作为国际社会主义的火炬,作为各国劳动群众的范例而稳固地屹立着。在那边是争吵、战争、流血、千百万人的牺牲、资本的剥削,在这边是真正的和平政策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2卷第218页)

在这把火炬周围形成了两条阵线:一条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的阵线,他们力图损害这把火炬,动摇它和扑灭它;一条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朋友的阵线,他们努力支持这把火炬,使它发出熊熊的光焰。

任务就在于支持这把火炬,巩固它的存在,以争取世界革命的胜利。

同志们,我相信你们定会采取一切办法使这把火炬光芒四射,给一切被压迫被奴役的人们照亮道路。

我相信你们定会采取一切办法使这把火炬光焰万丈,使无产阶级的敌人胆战心惊。

我相信你们定会采取一切办法使这样的火炬在世界各地燃烧起来,使世界各国的无产者欢欣鼓舞。(长时间鼓掌,经久不息。全体代表起立,高唱《国际歌》,三呼“乌拉”。)

载于1926年12月9、10、
19、21、22日《真理报》第
285、286、294、295、296号

选自《斯大林全集》第9卷
第3—135页

和第一个美国工人代表团的谈话(摘录)

(1927年9月9日)

—

代表团的问题和斯大林同志的回答

第一个问题 :列宁和共产党实际上给马克思主义补充了哪些新原则 ?说列宁相信“创造性的革命”,而马克思则比较倾向于等待经济力最高度的发展,这样说是否正确?

答 :我认为列宁没有给马克思主义“补充”任何“新原则”,同样列宁也没有取消马克思主义的任何一个“旧”原则。列宁始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忠实最彻底的学生,他是完完全全以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为依据的。

但是列宁不仅仅是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实行者,同时还是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继承者。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他适应发展的新条件,适应资本主义的新阶段,适应帝国主义时代,向前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这就是说,列宁在阶级斗争的新条件下向前发展了马克思的学说,他给马克思主义总宝库加进了某种比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供的、比帝国主义以前的资本主义时期内所能提供的更新的东西,而且列宁对马克

思主义宝库的这种新贡献是完完全全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供的原则为基础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在下面几个问题上列宁作了某种新贡献,向前发展了马克思的学说。

第一,关于垄断资本主义问题,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新阶段的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资本论》中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基础。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生活在垄断前的资本主义统治时期,即资本主义平稳进化并向全球“和平”扩展的时期。

这个旧阶段是到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完结的,那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逝世了。显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条件,即由于资本主义新阶段代替了旧阶段、由于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即垄断阶段而产生的新条件,只能作一种推测。在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的平稳进化已经为资本主义的跳跃式的、剧变式的发展所代替,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和矛盾已经表现得特别厉害,在发展极不平衡的条件下,争夺销售市场和资本输出市场的斗争已经使周期性的重新瓜分世界和势力范围的周期性的帝国主义战争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列宁的功绩即列宁在这方面的新贡献,就在于他依据《资本论》的基本原理,对帝国主义作了一个有根据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指出它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揭露了它的溃疡以及它必然灭亡的条件。在这个分析的基础上产生了列宁的著名原理:在帝国主义条件下,社会主义可能在个别的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

第二,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

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是用暴力推翻资本主义的方法,——这个基本思想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出的。

列宁在这方面的新贡献在于:

(一)他利用巴黎公社和俄国革命的经验,发现了苏维埃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最好的国家形式;

(二)他从无产阶级同盟者问题着眼,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公式,规定了无产阶级专政是领导者无产阶级和被领导者非无产阶级被剥削群众(农民等等)的阶级联盟的特殊形式;

(三)他特别着重指出这个事实:无产阶级专政是阶级社会中民主的最高类型,是代表多数人(被剥削者)利益的无产阶级民主的形式,它和代表少数人(剥削者)利益的资本主义民主是完全相反的。

第三,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期,在一个被资本主义国家所包围的国家里顺利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式和方法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看作相当长的并充满革命搏斗和国内战争的时期,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在这个时期内采取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和组织上的种种必要措施,以便建立社会主义的新社会、没有阶级的社会、没有国家的社会,来代替资本主义的旧社会。列宁是完完全全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基本原理为根据的。

列宁在这方面的新贡献在于:

(一)他论证了在一个被帝国主义国家包围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可能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只要这个国家不被周围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所扼杀;

(二)他拟定了经济政策的具体办法(“新经济政策”),使握有

经济命脉(工业、土地、运输业、银行等等)的无产阶级能运用这些具体办法把社会主义的工业同农业结合起来(“工业和农民经济的结合”),从而把整个国民经济引向社会主义;

(三)他拟定了通过合作社把基本农民群众逐渐引上并纳入社会主义建设轨道的具体办法,而合作社是无产阶级专政用来改造小农经济并以社会主义精神改造基本农民群众的最强有力的手段。

第四,关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在任何人民革命中,在反对沙皇制度的革命中以及在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提供了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的基本要点。列宁在这方面的新贡献,就在于他向前发展了这些要点,把它们扩展为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严整体系,扩展为无产阶级不仅在推翻沙皇制度和推翻资本主义的事业中,并且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都对城乡劳动群众实行领导的严整体系。

大家知道,由于有列宁和列宁的党,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才在俄国得到了巧妙的运用。这也是俄国革命产生了无产阶级政权的原因。

从前的情况通常是这样:在革命时期,工人在街垒里进行搏斗,他们流了血,推翻了旧制度,而政权却落到资产者的手里,然后资产者又来压迫和剥削工人。英国和法国的情形就是这样。德国的情形就是这样。我们俄国的情形却不同了。在我们这里,工人不仅仅是革命的突击力量。俄国无产阶级一方面是革命的突击力量,同时还力求成为领导者,成为城乡所有被剥削群众的政治领导者,把他们团结在自己周围,使他们脱离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把资产阶级孤立起来。俄国无产阶级既然是被剥削群众的领导者,它进行斗争就是为了夺取政权并利用这个政权来谋取自身的利益,来反对

资产阶级,来反对资本主义。正因为如此,俄国革命每一次强有力的发动,无论是在1905年10月或在1917年2月,都把工人代表苏维埃这个负有镇压资产阶级使命的新政权机构的萌芽搬上舞台,来对抗资产阶级议会这个负有镇压无产阶级使命的旧政权机构。

在我们这里,资产阶级曾经两次企图恢复资产阶级议会,消灭苏维埃:一次是在1917年9月,即在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以前的预备议会⁸¹开会期间;一次是在1918年1月,即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的立宪会议⁵⁵开会期间,——而每一次都遭到了失败。为什么呢?因为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已经陷于孤立,千百万劳动群众已经认定无产阶级是革命的唯一领袖,而苏维埃已经经受过群众的检验和考验,被群众看作是自己的工人政权了;对无产阶级来说,拿这个政权去换资产阶级议会就等于自杀。所以无怪乎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在我们这里行不通。正因为如此,革命在俄国就产生了无产阶级政权。

这就是实行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思想的结果。

第五,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分析爱尔兰、印度、中国、中欧各国、波兰、匈牙利等国的事件时,已提供了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基本的原则思想。列宁在自己的著作中就是以这些思想为基础的。

列宁在这方面的新贡献在于:

(一)他把这些思想集合成为一个关于帝国主义时代民族殖民地革命学说的严整体系;

(二)他把民族殖民地问题和推翻帝国主义的问题联系起来;

(三)他宣布民族殖民地问题是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总的的问题的

一个组成部分。

最后,关于无产阶级政党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提供了关于党的基本要点,认为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无产阶级没有党就不能获得自己的解放,就是说,既不能夺取政权,也不能改造资本主义社会。

列宁在这方面的新贡献,就在于他适应帝国主义时期无产阶级斗争的新条件,向前发展了这些要点。他指出:

(一)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高于无产阶级的其他各种组织形式(工会、合作社、国家组织),它的使命是综合和指导这些组织的工作;

(二)无产阶级专政只有通过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指导力量的党才能实现;

(三)无产阶级专政只有由一个党,由共产党来领导,才能成为完全的专政,共产党不和而且不应当和其他政党分掌领导;

(四)如果党内没有铁的纪律,无产阶级专政所担负的镇压剥削者以及把阶级社会改造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就不能实现。

列宁在自己的著作里所作的新贡献大体上就是如此,他适应帝国主义时期无产阶级斗争的新条件,把马克思的学说具体化了并向前发展了。

所以我们说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由此可见,决不能把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分割开来,更不能把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

在代表团提出的问题中还说到:

“说列宁相信‘创造性的革命’,而马克思则比较倾向于等待经济力最高度的发展,这样说是否正确?”

我认为这样说是完全不正确的。我认为任何一种人民革命,只要是真正的人民革命,就是创造性的革命,因为它打破旧的制度而创造新的制度,建立新的制度。

某些落后的国家里有时也发生一些部落反对另一些部落的儿戏似的“起义”,这样的所谓“革命”当然是不会有丝毫创造性的。可是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没有把这种儿戏似的“起义”看作革命。这里指的显然不是这种“起义”,而是发动被压迫阶级去反对压迫者阶级的群众性的人民革命。这样的革命不能不是创造性的革命。马克思和列宁正是主张这样的革命,并且只是主张这样的革命。同时很明显,这样的革命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能发生的,它只是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具备了一定的有利条件时才能爆发。

载于 1927 年 9 月 15 日
《真理报》第 210 号

选自《斯大林全集》第 10 卷
第 85—92 页

十月革命的国际性质

(为纪念十月革命十周年而作)

十月革命不能认为只是“一国范围内的”革命。它首先是国际性的、世界性的革命,因为它是全世界人类历史中从资本主义旧世界到社会主义新世界的根本转变。

过去的革命,结局通常都是由一个剥削者集团代替另一个剥削者集团执掌政权。剥削者更换了,剥削仍然存在。奴隶解放运动时期的情形是如此。农奴起义时期的情形是如此。英、法、德三国有名的“大”革命时期的情形也是如此。我不提巴黎公社,因为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为反对资本主义而扭转历史的第一次光荣的英勇的然而毕竟没有成功的尝试。

十月革命根本不同于这些革命。十月革命的目的不是由一种剥削形式代替另一种剥削形式,不是由一个剥削者集团代替另一个剥削者集团,而是消灭人对人的任何剥削,消灭所有一切剥削者集团,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至今所有存在过的被压迫阶级中最革命的阶级的政权,组织新的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

正因为如此,十月革命的胜利是人类历史中的根本转变,是世界资本主义历史命运中的根本转变,是世界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中的根本转变,是全世界被剥削群众的斗争方法和组织形式、生活方式和传统、文化和思想上的根本转变。

十月革命所以是国际性的、世界性的革命,根据就在这里。

世界各国被压迫阶级所以对十月革命表示深切的同情,把它看作自己获得解放的保障,根源也就在这里。

可以指出几个基本问题来说明十月革命对全世界革命运动发展的影响。

(一)十月革命卓越的地方,首先是它冲破了世界帝国主义战线,在一个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推翻了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并使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

被雇佣阶级、被奴役阶级、被压迫被剥削阶级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上升到统治阶级的地位,并以自己的榜样来鼓舞世界各国无产者。

这就是说,十月革命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即各帝国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

十月革命剥夺了地主、资本家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并把这些东西变成公有财产,因而把社会主义所有制同资产阶级所有制对立起来。这样,十月革命就揭穿了资本家的所谓资产阶级所有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永恒不变的那一套骗人鬼话。

十月革命夺取了资产阶级手里的政权,剥夺了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利,摧毁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机构,并把政权交给了苏维埃,因而把社会主义苏维埃政权这一无产阶级民主制同资产阶级议会制度这一资本主义民主制对立起来。拉法格还在1887年就正确地说,在革命后的第一天,“所有从前的资本家都将被剥夺选举权”。

这样,十月革命就揭穿了社会民主党人的所谓现在有可能通过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那一套骗人鬼话。

可是,十月革命并没有而且也不能停留在这一点上。十月革命

保尔·拉法格《革命后的第一天》,(见《拉法格文集》1925年俄文版第1卷第329—330页)。——编者注

摧毁了资产阶级旧制度以后,就着手建设社会主义新制度。十月革命的十年,也就是党、工会、苏维埃、合作社、文化组织、运输业、工业和红军的建设的十年。苏联社会主义在建设战线上显著的成就清楚地说明:无产阶级能够在不要资产阶级并且反对资产阶级的情况下顺利地管理国家,能够在不要资产阶级并且反对资产阶级的情况下顺利地建设工业,能够在不要资产阶级并且反对资产阶级的情况下顺利地领导整个国民经济,能够不顾资本主义包围而顺利地建设社会主义。

那种认为被剥削者离不开剥削者正如头部和躯体的其他各部离不开胃部一样的陈旧“理论”,并不是古代史上著名罗马元老梅涅尼·阿格利巴一个人所独有的东西。这种“理论”现在是社会民主党的一般政治“哲学”的基础,特别是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结成联盟这一社会民主党政策的基础。这种带偏见性的“理论”现在是妨害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化的最大障碍之一。十月革命最重要的结果之一就是它给这种骗人的“理论”以致命的打击。

十月革命的这些以及诸如此类的结果,过去和现在都不能不对资本主义国家内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发生重大的影响,这难道还需要证明吗?

共产主义在资本主义国家内不断发展,世界各国无产者对苏联工人阶级的同情日益增长,以及许多工人代表团络绎不绝地到苏维埃国家参观,——这些尽人皆知的事实,都毫无疑问地说明十月革命所播下的种子已经开始结果了。

(二)十月革命不仅在帝国主义统治的中心、在“宗主国”内动摇了帝国主义,而且还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后方,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外围,震撼了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和附属国的统治。

十月革命既然打倒了地主和资本家,也就粉碎了民族殖民地压迫的锁链,把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内所有一切被压迫民族都毫

无例外地从压迫下解放出来。无产阶级不解放被压迫民族就不能解放自己。十月革命的特点就是它在苏联进行的这种民族殖民地革命不是以各民族仇视和各民族冲突为旗帜,而是以苏联各民族工人农民互相信任和亲密团结为旗帜,不是为了民族主义,而是为了国际主义。

正因为我国的民族殖民地革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和在国际主义旗帜下进行的,所以被蔑视的民族、被奴役的民族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上升到真正自由和真正平等的民族的地位,并以自己的榜样来鼓舞全世界一切被压迫的民族。

这就是说,十月革命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即在世界各被压迫国家中,在同无产阶级结成联盟并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的殖民地革命的时代。

从前,“照例总是”认为:自古以来人类就分成低等人种和高等人种,分成黑种人和白种人,前者没有达到文明的能力,注定成为剥削的对象,后者是文明的唯一代表者,负有剥削前者的使命。

现在应该认为这种奇谈被打破了,被抛弃了。十月革命最重要的结果之一就是它给这种奇谈以致命的打击,因为它在事实上表明,那些获得解放而被引上苏维埃发展轨道的非欧洲民族,他们推进真正先进文化和真正先进文明的能力是丝毫不亚于欧洲民族的。

从前,“照例总是”认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方法,使各民族彼此分离的方法,使各民族彼此隔开的方法,使各民族劳动群众间的民族仇视加深的方法,是解放被压迫民族的唯一方法。

现在应该认为这种奇谈被推翻了。十月革命最重要的结果之一就是它给这种奇谈以致命的打击,因为它在事实上表明,用唯一正确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方法解放被压迫的民族,是可能的而且是适当的,因为它在事实上表明,各民族的工人和农民根据自愿原则并在国际主义基础上结成兄弟般的联盟,是可能的而且是适

当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世界各国劳动者将来在统一的世界经济之内联合的榜样)的存在不能不是这一点的直接证明。

不用说,十月革命的这些以及诸如此类的结果,过去和现在都不能不对殖民地和附属国的革命运动发生重大的影响。中国、印度尼西亚、印度和其他各国被压迫民族革命运动日益发展以及这些民族对苏联的同情日益增长,——所有这些事实都毫无疑问地说明了这一点。

安然剥削和压迫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殖民地和附属国的解放革命的时代,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觉醒的时代,无产阶级在革命中掌握领导权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三)十月革命既然把革命种子播到帝国主义的中心和后方,削弱了帝国主义在“宗主国”的势力,动摇了帝国主义在殖民地的统治,因而也就使整个世界资本主义本身的存在发生了问题。

既然在帝国主义条件下,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由于纠纷和军事冲突不可避免,以及由于空前未有的帝国主义大屠杀,资本主义的自发发展已经变成资本主义腐朽和衰亡的过程,那么,十月革命和一个大国由于这次革命而脱离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事实,就不能不加速这一过程,一步一步地破坏世界帝国主义的基础。

不仅如此,十月革命不仅震撼了帝国主义,同时为世界革命运动建立了强大的公开的基地即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世界革命运动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基地,现在它可以把这个基地作为靠山了。十月革命为世界革命运动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公开的中心。世界革命运动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中心,现在它能团结在这个中心的周围,组织世界各国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统一战线了。

首先,这就是说,十月革命使世界资本主义受了一次永远不会康复的致命伤。正因为如此,资本主义永远不能恢复它在十月革命以前有过的那种“均势”和“稳固”了。

资本主义可以得到局部稳定,可以使自己的生产合理化,可以

把国家管理权交给法西斯主义,可以暂时压制工人阶级,但是它永远不能恢复它从前所炫耀的那种“安宁”和“信心”,那种“均势”和“稳固”了,因为世界资本主义危机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以致革命烈火必然时而在帝国主义中心、时而在帝国主义外围燃烧起来,使资本主义的补缀方法一概无效,使资本主义的死期日近一日。这正象有名的寓言中所说的:“尾巴拔出来,鼻子陷进去;鼻子拔出来,尾巴陷进去。”

其次,这就是说,十月革命已经把全世界被压迫阶级的力量和作用、英勇精神和战斗决心提到了一定的高度,迫使统治阶级重视它们,把它们看作一个新的重要因素。现在已经不能再把世界劳动群众看作在黑暗中徘徊的前途茫然的“群氓”了,因为十月革命给他们建立了一座照耀道路并指出前途的灯塔。从前没有一个全世界性的公开的会场可以从那里表明并陈述被压迫阶级的希望和意愿,可是现在已经有这种会场了,这就是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

未必用得着怀疑,如果这个会场被消灭,那么肆无忌惮的黑暗的反动势力就会使“各先进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长期陷于黑暗之中。不能否认,甚至单是“布尔什维克国家”存在这一事实就牵制着黑暗的反动势力而便于被压迫阶级为自己的解放而斗争。其实就是这个缘故,世界各国剥削者才象野兽一样地仇恨布尔什维克。

历史在重演,不以是在新的基础上重演。正象从前在封建制度灭亡时期,“雅各宾派”¹⁴⁸这一名词曾经使世界各国贵族胆战心惊、深恶痛绝一样,现今在资本主义崩溃时期,“布尔什维克”这一名词也使世界各国资产阶级胆战心惊、深恶痛绝。另一方面,正象从前巴黎是新兴资产阶级的革命代表的避难所和学校一样,现在莫斯科是新兴无产阶级的革命代表的避难所和学校。对雅各宾派的仇恨并没有挽救封建制度免于崩溃。对布尔什维克的仇恨也不能挽救资本主义免于必然的灭亡,——这还用怀疑吗?

资本主义“稳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所谓资产阶级制度不可动摇的奇谈也一同过去了。

资本主义灭亡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四)十月革命不能认为只是经济关系和社会政治关系方面的革命。十月革命同时是意识上的革命,是工人阶级思想上的革命。十月革命是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在无产阶级专政思想旗帜下,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旗帜下诞生并巩固起来的。因此,十月革命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对改良主义的胜利,列宁主义对社会民主主义的胜利,第三国际对第二国际的胜利。

十月革命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之间,在列宁主义政策和社会民主主义政策之间掘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从前,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以前,社会民主党可以拿马克思主义旗帜来炫耀,不公开否认无产阶级专政思想,但是对早日实现这个思想却无所作为,毫无作为,——很明显,社会民主党的这种做法对于资本主义是没有任何危险的。当时,在那个时期,社会民主党表面上是和马克思主义合在一起的,或者几乎是合在一起的。

现在,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以后,大家都已清楚地看出马克思主义会导致什么结果,马克思主义的胜利会意味着什么,社会民主党再也不能拿马克思主义旗帜来炫耀,再也不能向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献媚,不然就会给资本主义造成相当的危险。社会民主党既然早已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结果也就不得不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而公然不讳地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产儿,反对十月革命,反对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了。

现在社会民主党必然要和马克思主义划清界限,而且确实和马克思主义划清界限了,因为在目前的条件下,谁不全心全意地公开支持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谁不对本国资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谁不为本国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创造条件,谁就不能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

社会民主党和马克思主义之间已经横着一道鸿沟。从此以后,列宁主义、共产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唯一的代表和堡垒了。

可是问题并不只限于这些。十月革命不仅使社会民主党和马克思主义划清界限,而且更进一步把社会民主党抛到那些反对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而公开维护资本主义的人们的阵营中去了。阿德勒之流和鲍威尔之流、韦尔斯之流和勒维之流、龙格之流和勃鲁姆之流这些先生咒骂“苏维埃制度”,赞扬议会制度的“民主”,就是想以此说明,为了在苏联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为了在各“文明”国家保存资本主义奴隶制度,他们现在进行斗争,而且将来依然要进行斗争。

现在的社会民主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思想支柱。列宁说得非常对:现在的社会民主党的政客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真正代理人,是资本家阶级的工人帮办”;他们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中是必然要站在“凡尔赛派”方面来反对“公社社员”的。

不消灭工人运动中的社会民主主义,就无法消灭资本主义。因此,资本主义衰亡的时代,同时就是工人运动中的社会民主主义衰亡的时代。

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之一就在于它表明了列宁主义必然战胜世界工人运动中的社会民主主义。

第二国际和社会民主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统治的时代已经完结了。

列宁主义和第三国际统治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载于 1927 年 11 月 6—7 日

《真理报》第 255 号

署名:约·斯大林

选自《斯大林全集》第 10 卷

第 203—212 页

注 释

- 1 土地和自由社 是秘密的民粹派组织，1876 年在彼得堡建立，最初称为北方革命民粹主义社，1878 年改用此名，主要成员有亚·德·米哈伊洛夫、格·瓦·普列汉诺夫、谢·米·克拉夫钦斯基、奥·瓦·阿普捷克曼等。土地和自由社有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主张通过暴力推翻沙皇政府，取得土地和自由。但它错误地认为：俄国能够走非资本主义的特殊发展道路，农民村社是这条道路的基础；俄国主要革命力量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农民，只靠农民就可以推翻沙皇政府。由于农民不了解他们的宣传，没有跟他们走，同时政府又对革命者加紧迫害，该社一部分成员主张采取暗杀手段进行反对沙皇政府的斗争。土地和自由社因此发生了分歧，形成了两派，一派（安·伊·热里雅鲍夫等人）主张采取恐怖手段，另一派（以普列汉诺夫为首）主张继续采取原来的策略。两派于 1879 年分裂为民意党和土地平分社。——第 2 页。
- 2 民意党 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俄国革命民粹派的组织，在土地和自由社分裂后于 1879 年 8 月建立，主要领导人是安·伊·热里雅鲍夫、亚·德·米哈伊洛夫、亚·亚·克维亚特科夫斯基、索·李·彼罗夫斯卡娅等。民意党人主张同专制制度进行政治斗争，他们的纲领包括有广泛的民主改革的要求，如召开立宪会议，实现普选权，设置常设人民代表机关，实行言论、信仰、出版和集会自由，实行广泛的村社自治，给人民以土地，给被压迫民族以自决权，用人民武装代替常备军等。但他们仍然是空想的社会主义者，没有摆脱民粹派的基本思想，相信俄国可以越过资本主义，通过农民革命而走向社会主义。民意党人从“英雄”和“群氓”的错误理论出发，把暗杀沙皇政府的个别代表人物作为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主要手段。他们在 1881 年 3 月 1 日刺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此后不久，民意党在沙皇政府打击下趋于瓦解。——第 2 页。

- 3 爱·伯恩斯坦的这一修正主义公式,最早是在他 1898 年 1 月发表的《崩溃论和殖民政策》一文中明确地提出来的。——第 5 页。
- 4 《工人思想报》(《Рабочая Мысль》)是俄国经济派的机关报,由弗·巴·伊万申、康·米·塔赫塔廖夫等编辑。1897 年 10 月—1902 年 12 月先后在彼得堡、柏林、华沙和日内瓦等地出版,共出了十六号。列宁在《怎么办》等著作中批判了《工人思想报》,指出它的观点是国际机会主义的俄国变种。——第 5 页。
- 5 指 1897 年 6 月 2 日(公历 14 日)俄国沙皇政府颁布的关于缩短工厂工作日的法令。这个法令是在 1895—1896 年彼得堡工人群众罢工的压力下通过的。它规定工业企业和铁路工厂的工作日日班为十一个半小时,夜班为十小时(在这以前,工作日没有限制,甚至达到十四五个小时),但同时规定节假日一年为六十六天(比习惯上的节假日约减少了四分之一)。——第 5 页。
- 6 指 1899 年 7 月 29 日(公历 8 月 10 日)俄国沙皇政府批准的《因聚众滋事而被开除的高等学校学生服兵役的暂行条例》。这个条例规定,凡参加集体行动反对高等学校的警察制度的学生,一律开除学籍并罚当兵一至三年。——第 10 页。
- 7 皮洛士——古希腊伊庇鲁斯国王,公元前 280 年入意大利同罗马作战,两次获捷,但损失惨重。他曾说:“如果再取得这样一次胜利,谁也不能跟我回到伊庇鲁斯去了。”“皮洛士式的胜利”表示代价特大、得不偿失的意思。——第 12 页。
- 8 教权主义是一种反动的政治思潮,主张以宗教神学理论为基础,由教会统治社会的政治和文化生活。——第 19 页。
- 9 《火星报》(《Искра》)是第一个全俄马克思主义的秘密报纸,由列宁创办。创刊号于 1900 年 12 月在莱比锡出版,以后在慕尼黑、伦敦出版,自 1903 年春起在日内瓦出版。参加《火星报》编辑部的有:列宁、格·瓦·普列汉诺夫、尔·马尔托夫、亚·尼·波特列索夫、巴·波·阿克雪里得和维·伊·查苏利奇。自 1901 年 4 月起,娜·康·克普普

斯卡娅任编辑部的秘书。列宁实际上是《火星报》的主编和领导者。1900—1903年列宁在《火星报》上发表了五十多篇论文，阐述了有关党的建设和俄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基本问题，并对国际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作了评论。《火星报》从国外秘密运进俄国散发，其中一部分曾由国内秘密印刷所翻印。《火星报》在俄国国内有代办员网，代办员在俄国传播《火星报》思想和建立火星派组织。《火星报》在建立俄国工人阶级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方面起了重大作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承认它为党的中央机关报。《火星报》在1903年10月出版第五十一号后，被普列汉诺夫支持下的一些孟什维克分子所篡夺。列宁于1903年11月1日退出了编辑部。从第五十二号起，《火星报》成了孟什维克的机关报。因此，人们把五十一号以前的《火星报》称作旧《火星报》，以后的称作新《火星报》。——第20、26、100、174、256、498页。

- 10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03年7月17日—8月10日（公历7月30日—8月23日）先后在布鲁塞尔和伦敦举行。大会的主要任务是根据《火星报》提出的思想原则和组织原则建立真正的政党。列宁在大会上为在俄国建立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进行了斗争，并取得了胜利。在讨论党纲时，列宁坚决主张在党纲中肯定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原则，着重指出农民的革命斗争的重大意义，并坚持把民族自决权列入党纲，维护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大会通过了《火星报》提出的工人阶级政党的革命纲领。在讨论党章，特别是关于党员资格的第一条条文时，列宁及其拥护者同尔·马尔托夫等人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大会通过了列宁拟订的党章，但关于党章第一条，却以一票弃权，二十八票对二十二票的多数通过了马尔托夫的文。在选举中央机关时，拥护列宁的人获得多数票，反对列宁的人获得少数票。从这时起，前者被称为布尔什维克，后者被称为孟什维克。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参看《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1975年人民出版社版第42—48页。——第23、25、79、498页。
- 11 《略论党内意见分歧》这本小册子是斯大林于1905年4月底写成的。它是对格鲁吉亚孟什维克领袖诺·尼·饶尔丹尼亚的几篇论文（在

《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的《多数派还是少数派》和在《旅行家》杂志上发表的《什么是党》等等)的答复。布尔什维克中央国外局很快就知道了《略论党内意见分歧》出版的消息,1905年7月18日,国外局秘书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写信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合会委员会索取这本小册子。这本小册子在南高加索各布尔什维克组织中传播得很广泛,先进工人们根据这本小册子认识了党内的意见分歧,认识了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立场。这本小册子是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合会秘密印刷所(阿弗拉巴尔印刷所)用几种文字(1905年5月用格鲁吉亚文,同年6月用俄文和亚美尼亚文)印刷的,每种文字印了一千五百册至二千册。——第25页。

- 12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898年3月1—3日(公历13—15日)在明斯克秘密举行。出席大会的有六个组织的九名代表:彼得堡、莫斯科、基辅和叶卡特林诺斯拉夫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代表各一名,基辅《工人报》小组的代表两名和崩得的代表三名。列宁因被流放西伯利亚未能出席。大会选举了中央委员会,批准了《工人报》为党的正式机关报。中央委员会以大会名义发表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宣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立。但实际上俄国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并没有建立起来,因为这次大会既没有制定出党纲和党章,也没有形成中央的统一领导,各个马克思主义小组和团体之间几乎没有任何联系。大会闭幕后不久,中央委员们就被捕了,因此中央委员会也未能开展工作。——第26页。
- 13 《社会民主党人报》是高加索孟什维克的秘密报纸,由格鲁吉亚孟什维克领袖诺·尼·饶尔丹尼亚领导,于1905年4月20日—11月26日在梯弗利斯用格鲁吉亚文出版,共出了六号。《社会民主党人报》创刊号是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梯弗利斯委员会机关报”出版的,后来该报自称“高加索社会民主工人组织机关报”。——第27页。
- 14 《工人事业》(《Рабочее Дело》)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联合会的不定期机关刊物。主要编辑是经济派著名领袖弗·巴·伊万申、波·纳·克里切夫斯基、亚·萨·马尔丁诺夫等人。1899年4月—1902年2月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十二期(九册)。——第27页。
- 15 《新时代》(《Die Neue Zeit》)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杂志。1883—

- 1923年在斯图加特出版。1890年10月前为月刊,后改为周刊。1917年10月以前编辑为卡·考茨基,以后为亨·库诺。1885—1894年该杂志发表了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和恩格斯的许多文章。恩格斯经常关心和帮助杂志编辑部的工作,并且不时地对它背离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提出批评。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新时代》开始系统地刊登修正主义者的文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杂志采取中派主义立场,实际上支持社会沙文主义者。——第34页。
- 16 《旅行家》是一种格鲁吉亚文的历史-考古学和地理-民族学杂志,于1901—1905年11月在梯弗利斯出版。从1905年1月起,《旅行家》成了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人的文艺政治周刊,由菲·马哈拉泽主编。它除刊登布尔什维克的文章外,还刊登孟什维克的文章。——第36页。
- 17 海因菲尔德纲领是1888年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在海因菲尔德召开的建党大会上通过的纲领。这个纲领的原则部分包含一些正确阐明社会发展进程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任务的论点。后来,在1901年维也纳代表大会上,它被含有修正主义原则的新纲领取代。——第44页。
- 18 《曙光》(《Заря》)是列宁创办的俄国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政治杂志,和《火星报》由同一个编辑部编辑,1901—1902年在斯图加特公开出版,共出了四期(第2、3期为合刊)。——第51页。
- 19 党总委员会是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根据党章建立的全党最高机关。它的基本任务是协调并统一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活动。党总委员会由五名委员组成: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代表二人(列宁、列·叶·加尔佩林),中央委员会二人(弗·威·林格尼克、弗·亚·诺斯科夫)以及第二次党代表大会选出的委员一人(格·瓦·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担任总委员会主席。在这次代表大会以后的一段时期,党总委员会曾站在布尔什维克的正确立场上。在普列汉诺夫转向机会主义、孟什维克夺去了中央机关报以后,党总委员会就成了孟什维克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工具。1905年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以党的中央委员会为统一的中央领导机关,撤销了党总委员会。——第53页。
- 20 《社会民主党人日志》(《Дневник 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а》)是格·瓦·普列汉诺夫主办的不定期杂志,1905年3月—1912年4月在日内瓦出

版，共出了十六期。1916年《日志》曾在彼得格勒复刊，但只出了一期。——第54页。

- 21 《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是斯大林于1912年底—1913年初在维也纳写的，第一次发表在1913年《启蒙》杂志第3—5期上，署名科·斯大林，题为《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这篇论文于1914年由波涛出版社（彼得堡）出了单行本，书名为《民族问题和马克思主义》。按照沙皇政府内务大臣的命令，所有公共图书馆和阅览室都把它列为禁书。1920年，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重印这一著作，把它编入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论文集》（图拉国家出版社版）。1934年，这篇文章编入了斯大林的论文演说选辑《马克思主义和民族殖民地问题》。斯大林的这篇著作问世后，列宁对它作了很高的评价。在《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民族纲领》一文中，列宁在谈到民族问题在这个时期被提到显著地位的原因时写道：“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文献中，对于这种情况和社会民主党民族纲领的原则，最近已经作了阐明（在这方面首屈一指的是斯大林的论文）。”（《列宁全集》第19卷第542页）在有人提议把这篇文章当作讨论的文章时，列宁说：“当然我们绝对反对。那篇文章写得很好。这是当前的重要问题，我们丝毫不放弃反对崩得混蛋们的原则立场。”（《列宁全集》第35卷第73页）——第59页。
- 22 锡安主义即犹太复国主义，产生于十九世纪末。它主张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是统一的犹太民族，有一致的民族利益，号召犹太人从世界各地回到巴勒斯坦重建国家。锡安是耶路撒冷的一座山，古犹太人曾以它作为政治和宗教的中心，锡安主义以此得名。在俄国，锡安主义为犹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一部分落后的犹太工人所拥护。1904年成立的俄国锡安主义社会工党认为，犹太无产阶级的主要任务是取得自己的领土并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而斗争。它鼓吹同犹太资产阶级实行阶级合作，在各民族的工人中间散布敌对情绪，妄图使犹太工人同俄国的和国际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隔离开来。锡安主义社会党人的民族主义活动模糊了犹太工人的阶级意识，给俄国工人运动带来了很大的危害。——第59页。
- 23 大伊斯兰主义是一种宗教政治思想。它宣传一切信奉伊斯兰教的民

- 族联合成一个整体。十九世纪末，这种思想在东方各国的剥削阶级中间广泛传播。土耳其曾利用这种思想企图达到使全世界回教徒服从于土耳其苏丹这个“全体穆斯林的哈里发”的目的。列宁说，大伊斯兰主义是企图利用反欧美帝国主义的解放运动来巩固可汗、地主、毛拉等的地位的一个派别（《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275页）。——第60页。
- 24 崩得（依地语“Bund”一词的音译，意即联盟）是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的简称。崩得成立于1897年，参加者主要是俄国西部各省的犹太手工业者。1898年3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崩得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崩得分子要求承认崩得是犹太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在大会否决了这个要求以后，崩得退出了党。在1906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上，崩得重新加入了党。崩得形式上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实际上是一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性质的组织。它在党内一直支持孟什维克，反对布尔什维克。它提出民族文化自治的要求同布尔什维克的民族自决权这个纲领性的要求相对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崩得分子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崩得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1918—1920年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崩得的领导同反革命势力勾结在一起，而一般的崩得分子则开始转变，主张同苏维埃政权合作。1921年3月崩得自行解散，部分成员加入俄共（布）。——第60页。
- 25 取消派代表会议（八月代表会议）是1912年8月12—20日（公历8月25日—9月2日）在维也纳召开的。列·达·托洛茨基在会上组织了反党的八月联盟。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崩得、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高加索区域委员会的代表，以及侨居国外的《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编辑部、托洛茨基的维也纳《真理报》和前进集团的代表等。从俄国国内派遣代表的有彼得堡的“中央发起小组”以及取消派的《我们的曙光》杂志和《涅瓦呼声报》的编辑部。会议的绝大多数代表都是侨居国外的，与俄国工人阶级和地方党的组织毫无联系。会议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一系列纲领性要求作了修改，并且反对秘密党的存在。——第60页。

- 26 指格鲁吉亚废除农奴制的农民改革以前的时期。格鲁吉亚各地废除农奴制的时间不一致：梯弗利斯省在 1864 年，依麦列梯亚和古里亚在 1865 年，明格列里亚和列奇胡姆县在 1866 年，阿布哈兹在 1870 年，斯瓦涅季亚在 1871 年。——第 63 页。
- 27 唯灵论者 是信奉精神统治自然界的一种唯心主义学说的人。唯灵论者承认灵魂、精神是唯一的实体，而把肉体看作是灵魂的产物。——第 66 页。
- 28 只捉不放 是形容沙俄时代警察专横的成语，出自格·伊·乌斯宾斯基的短篇小说《岗亭》。小说中描写一个名叫梅穆列佐夫的警察，滥用职权，动辄捉人，不肯释放。——第 71 页。
- 29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布隆代表大会于 1899 年 9 月 24—29 日举行。斯大林在本文第四章所引用的就是这次代表大会关于民族问题所通过的决议（见本卷第 83 页）。——第 78 页。
- 30 “在我国，谢天谢地，没有议会”——这句话是沙皇政府的财政大臣弗·尼·科科夫策夫 1908 年 4 月 24 日在国家杜马中说的。——第 80 页。
- 31 沙黑西-瓦黑西 节日是什叶派伊斯兰教徒的哀悼日。伊斯兰教历史上第四代哈里发、什叶派宗奉的第一代伊玛目——阿里的儿子胡塞因于公元 680 年在战斗中殉难。什叶派教徒每年在他的忌日举行各种哀悼仪式。在举行模拟胡塞因出殡的游行时，参加者呼喊：“沙黑，胡塞因！瓦黑，胡塞因！”（意思是：“王呀，胡塞因！啊呀，胡塞因！”“沙黑西-瓦黑西”一词即由此而来）同时用铁链抽打自己，甚至用刀剑刺砍自己，以表示对殉难者的同情。沙黑西-瓦黑西节日常被利用来激起宗教狂热。——第 89 页。
- 32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维也纳代表大会，或称维姆堡代表大会，于 1897 年 6 月 6—12 日在维也纳维姆堡旅馆举行。——第 90 页。
- 33 格·瓦·普列汉诺夫在 1912 年 10 月 2 日（公历 15 日）《护党报》第三号上发表了《又一个分裂的代表会议》一文，斥责取消派的八月代表会议，指出崩得分子和高加索社会民主党人的立场是使社会主义迁

- 就民族主义。为此，崩得领袖弗拉·科索夫斯基用《不可宽恕的蛊惑行为》为题致函取消派杂志《我们的曙光》编辑部，以回击普列汉诺夫。——第 98 页。
- 34 《我们的曙光》（《Наша Заря》）是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合法月刊，1910 年 1 月—1914 年 9 月在彼得堡出版。该杂志的领导人是亚·尼·波特列索夫，撰稿人有费·伊·唐恩、谢·奥·策杰尔包姆（弗·叶若夫）等。在《我们的曙光》杂志周围形成了一个俄国取消派的中心。——第 98 页。
- 35 马尼洛夫是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中的一个游手好闲、痴心妄想、阿谀逢迎和虚假伪善的地主。马尼洛夫精神是想入非非的意思。——第 100、263 页。
- 36 《我们的言论》（《Наше Слово》）是崩得的合法周刊，1906 年在维尔诺出版，共出了九期。——第 100 页。
- 37 伦敦国际代表大会即第二国际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于 1896 年 7 月 27 日—8 月 1 日召开。大会讨论了工人阶级的政治活动问题、战争问题、土地问题和民族问题等。——第 101 页。
- 38 《我们的生活报》是格鲁吉亚孟什维克的日报，于 1912 年 7 月 1—22 日在庫塔伊斯用格鲁吉亚文出版。——第 103 页。
- 39 赫罗斯特拉特是公元前四世纪的希腊人。据传说，他为了留名于后世，竟纵火焚烧了被称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爱非斯城阿尔蒂米斯神殿。后来“赫罗斯特拉特”一词成了为追求个人名声而不惜犯罪的人们的通称。——第 107 页。
- 40 奇阿普斯金字塔是埃及最大的金字塔，古埃及第四王朝法老奇阿普斯（约公元前二十七世纪时在位）的陵墓，位于开罗附近的吉萨，高一百四十六点五米，底边各长约二百三十米，用了二百余万块每块平均重两吨半的巨石，不施泥灰，叠砌而成。——第 109 页。
- 41 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于 1906 年 4 月 10—25 日（公历 4 月 23 日—5 月 8 日）举行。大会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土地纲领问题、对目前形势和无产阶级的任务

的估计、对国家杜马的态度、武装起义问题等。在所有这些问题上,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都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列宁就以上主要问题作了报告或发言,并参加了党章起草委员会的工作。斯大林化名伊万诺维奇代表梯弗利斯布尔什维克组织出席大会。他在大会关于土地纲领、对目前形势的估计和国家杜马等问题的辩论中曾几次发言,并发表声明,用具体事实揭露了南高加索孟什维克对于国家杜马、对于和崩得订立协约等等问题上的机会主义策略。由于布尔什维克占多数的工业区党组织在1905年十二月起义时和起义后遭到严重破坏,孟什维克在代表大会上占了多数。这种情况决定了大会在许多问题上通过的决议具有孟什维克的性质。但孟什维克也被迫接受了列宁拟订的关于党员资格的党章第一条条文,从而否定了马尔托夫的机会主义条文。孟什维克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中占多数,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成员则全是孟什维克。列宁和斯大林对这次代表大会工作的分析,见《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列宁全集》第10卷第286—351页)和《目前形势和工人党统一代表大会》(《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31—253页)。——第111、177、565页。

- 42 指1912年10月9日爆发的第一次巴尔干战争。战争的一方是由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希腊、门的内哥罗组成的巴尔干同盟,另一方是土耳其。结果土耳其战败。根据1913年5月30日签订的伦敦和约,马其顿等地区摆脱了土耳其的统治。——第112页。
- 43 关于统一民族组织问题,在1907年11月5—12日(公历18—25日)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会议(“第三次全俄代表会议”)和1908年12月21—27日(公历1909年1月3—9日)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会议(“1908年全俄代表会议”)的决议中都作了规定。(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232—233页和第256—257页)——第117页。
- 44 亚格洛事件发生在1912年。叶·约·亚格洛是波兰社会党党员,在崩得和波兰社会党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反对波兰社会民主党人而组成的联盟的支持下,被华沙市选为第四届国家杜马代表。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以孟什维克的七票对布尔什维克的六票通过决议,接受

- 亚格洛为社会民主党党团的成员。——第 117 页。
- 45 “纠纷的苹果”是希腊神话中的故事。赫拉、阿芙罗狄蒂、雅典娜三个女神拿了一个金苹果，请牧童帕里斯评判：她们中间谁最美丽，就把苹果给谁。牧童把苹果给了阿芙罗狄蒂。结果纠纷迭起，特洛伊战争亦由此发生。——第 127 页。
- 46 指 1918 年 11 月在莫斯科举行的穆斯林共产党员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大会选出了俄共（布）穆斯林民族共产党组织中央常务局。——第 128 页。
- 47 伦敦代表大会 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于 1907 年 4 月 30 日—5 月 19 日（公历 5 月 13 日—6 月 1 日）举行。列入大会议程的是：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杜马党团的工作报告和杜马党团的组织，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国家杜马，工人代表大会和非党工人组织，工会和党，游击活动，失业、经济危机和同盟歇业，组织问题，斯图加特国际代表大会，军队中的工作等。由于波兰代表和拉脱维亚代表的支持，布尔什维克在大会上占了稳定的多数。在几个最重要的原则性问题上都通过了布尔什维克的决议案。斯大林代表梯弗利斯组织出席了大会。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参看列宁的《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列宁全集》第 12 卷第 476—496 页）和斯大林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代表大会（一个代表的札记）》（《斯大林全集》第 2 卷第 49—75 页）。——第 129、178 页。
- 48 十九后纪九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在俄国迅速传播，某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在合法的即沙皇政府准许出版的报刊上发表文章，因此被称为合法马克思主义分子。合法马克思主义分子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歪曲马克思主义。他们企图利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使工人运动服从和适应资产阶级的利益。——第 130 页。
- 49 这句话出自 1852 年 6 月 24 日斐·拉萨尔给马克思的信，列宁在《怎么办》一书的题词中引用过。——第 132 页。
- 50 指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分裂后所形成的三个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第 132 页。

- 51 克伦斯基执政时的七月危机 指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联合资产阶级和白卫将军镇压 1917 年 7 月 3 日（公历 16 日）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的游行示威而造成的局势。当时政权完全转入了反革命的临时政府手中，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已告终。布尔什维克和革命力量受到攻击和镇压。《真理报》编辑部被捣毁，许多布尔什维克报纸被封闭。临时政府开始解除赤卫队的武装，颁布了逮捕列宁的命令，对布尔什维克革命活动家进行迫害。革命的和平发展时期宣告结束。布尔什维克党转入地下，开始准备武装起义。——第 132 页。
- 52 布列斯特时期的危机 指 1917 年 12 月—1918 年 3 月苏维埃俄国同德奥等国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谈时期出现的危险局势。当时，俄国的旧军队已经瓦解，不能继续作战，建立工农军队的工作刚刚开始；人民已经筋疲力尽，渴望结束战争；其他国家还没有爆发革命。列宁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进行战争，那就便于帝国主义摧毁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列宁主张不惜接受苛刻的议和条件，立即签订和约。但是列宁的方针在党内遭到尼·伊·布哈林等“左派共产主义者”和列·达·托洛茨基的反对，他们或主张对德国宣布革命战争，或主张“不战不和”。当德国提出最后通牒时，担任苏维埃政府代表团首席代表的托洛茨基违背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的指示，拒绝签订和约，同时又声明说：我们在复员军队，我们不进行战争。这样，德国军队就在 1918 年 2 月 18 日发动全线进攻，占领了苏维埃国家的许多领土，并威胁首都彼得格勒。列宁号召人民起来保卫祖国，年轻的革命军队英勇地抗击了德国强盗的入侵。同时列宁跟布哈林、托洛茨基等人进行坚决的斗争，说服了党中央委员会的多数，终于在比德方原来的最后通牒更加苛刻的条件下于 3 月 3 日缔结了和约。列宁曾指出，俄共（布）这次“由于党内出现‘左倾’反对派而遇到的严重危机，是俄国革命所遇到的最大的危机之一”（《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3 卷第 462 页）。——第 132、162、499 页。
- 53 布里根杜马 是沙皇政府宣布要在 1906 年 1 月中旬以前召集的谏议性代表机关。成立谏议性国家杜马的法案和选举条例由内务大臣亚·格·布里根主持拟订，于 1905 年 8 月 6 日（公历 19 日）和沙皇的宣言一起公布。布尔什维克党宣布积极抵制布里根杜马。布里根杜马始终没有召集起来。——第 134 页。

- 54 立宪民主党（或称人民自由党）是俄国自由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成立于1905年10月，领袖是巴·尼·米留可夫。立宪民主党企图用立宪君主制形式保存沙皇君主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党支持沙皇政府的对外侵略政策。1917年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人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占据领导地位。十月革命胜利后，立宪民主党人多次策划反革命阴谋和暴乱。在武装干涉和白卫分子被击溃后，立宪民主党上层的大部分人逃亡国外，继续进行反对苏维埃俄国的活动。——第134、227、296、409、535页。
- 55 立宪会议于1917年11—12月选举，1918年1月5日（公历18日）在彼得格勒召开。召开立宪会议是在反对沙皇专制的斗争中得到广泛传播的口号，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的纲领包括了这项要求。1917年二月革命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发展，但布尔什维克党并没有简单地抛弃这个口号。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形式上把召开立宪会议作为它的主要任务，实际上却百般拖延，始终没有兑现。十月革命后，人民委员会于10月27日（公历11月9日）批准立宪会议选举日期。立宪会议选举是按照临时政府原来制定的条例进行的，其结果并没有反映当时真正的政治力量对比。但为了揭穿立宪会议的反革命实质，布尔什维克党仍决定召开立宪会议。会上，在立宪会议中占多数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立宪民主党人拒绝承认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和平法令、土地法令以及关于政权转归苏维埃的决议，并拒绝讨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布尔什维克党团当即退出了立宪会议，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也随之退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18年1月6日（公历19日）通过法令，解散了立宪会议。——第135、137、301、614页。
- 56 《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一书是列宁于1897年底在西伯利亚流放时写的（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95—115页）。该书第一版附有巴·阿克雪里罗得的序言，于1898年在日内瓦由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出版。——第136页。
- 57 全俄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即坦默福斯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于1905年12月12—17日（公历25—30日）在芬兰坦默福斯举行。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二十六个布尔什维克组织的代表。列宁和斯大林在这次会

上第一次见面。列入会议议程的是：各地的报告，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报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两部分的统一问题，党的改组问题，土地问题，国家杜马问题。列宁在会上作了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和土地问题的报告，并就对维特杜马的态度问题发表了演说。会议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会议通过的关于恢复党的统一问题的决议，规定根据平等原则合并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中央及其中央机关报，委托统一中央委员会召开统一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列宁和斯大林参加起草的关于抵制第一届国家杜马的决议。斯大林在会上作了关于南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工作报告，并积极捍卫了关于抵制杜马的策略。在得到莫斯科已经开始武装起义的消息后，会议根据列宁的建议立即闭会，以便代表们分赴各地参加起义。——第 137、175 页。

- 58 维特杜马 即沙皇政府大臣会议主席谢·尤·维特筹划召开的第一届国家杜马，于 1906 年 4 月 27 日（公历 5 月 10 日）开幕。召开杜马的目的是想利用杜马引诱群众脱离革命。1905 年 12 月，沙皇政府颁布了法令，要召开与谏议性的布里根杜马不同的所谓“立法”杜马，但在维特杜马开幕前不久，沙皇政府又公布了一项《国家根本法》，这等于取消了维特杜马的立法权。维特杜马的选举法是反民主的，半数以上居民被剥夺了选举权。选民被分成四个选民团：地主选民团、资产阶级选民团、农民选民团和工人选民团。各选民团的权利是不平等的。杜马中最大的党团是立宪民主党人，他们标榜自己主张改革（包括土地改革），企图以此博得农民的信任。1906 年 7 月 8 日（公历 21 日），维特杜马被沙皇政府解散。——第 137 页。
- 59 社会革命党 是俄国的小资产阶级政党，1901 年底—1902 年初由一些民粹派团体和小组合并而成。社会革命党的观点是民粹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大杂烩，他们“竭力用机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时髦‘批评’的补钉来修补民粹主义的破洞”（《列宁全集》第 9 卷第 295 页）。社会革命党人否认农民内部的阶级矛盾，反对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人多数支持沙皇俄国的战争政策，少数反对战争，形成了后来的左派社会革命党的核心。1917 年二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同孟什维克、立宪民主党人一起充当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主要支柱，党的

- 领袖亚·费·克伦斯基、尼·德·阿夫克森齐也夫、维·米·切尔诺夫等在临时政府内担任要职。1917年11月，社会革命党的左翼组成了独立的左派社会革命党。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一段时间内承认苏维埃政权，同布尔什维克合作，但很快又开始反对苏维埃政权。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则始终敌视十月革命。1918—1920年外国武装干涉和内战时期，社会革命党人曾多次策划反革命的破坏活动，策动富农叛乱，暗害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人。内战结束后，它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被苏维埃政权粉碎。——第137、230、277、431、488、507页。
- 60 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17年10月25—27日（公历11月7—9日）在彼得格勒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共六百四十九名，其中布尔什维克代表三百九十名，是代表大会上最大的党团。孟什维克、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崩得分子拒绝承认社会主义革命。他们看到大会的多数代表支持布尔什维克，便退出了大会。大会听取了列宁关于占领冬宫和逮捕临时政府成员的报告，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批准了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宣布政权转归苏维埃，并组成了第一届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列宁为人民委员会主席，斯大林为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大会选举了由一百零一人组成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其中有六十二名布尔什维克，二十九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第138页。
- 61 指根据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和1923年9月23—25日举行的俄共（布）中央全会的决议成立的委员会。——第144页。
- 62 《真理报》（《ИПРАВДА》）是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它最初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日报，是遵照列宁的指示，由斯大林、米·斯·奥里明斯基和尼·古·波列塔也夫发起创办的。创刊号于1912年4月22日（公历5月5日）在彼得堡出版。从1917年3月5日（公历18日）起，《真理报》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的中央机关报。——第154、157、543页。
- 63 “左派共产主义者”是在布列斯特和谈时期俄共（布）党内出现的一个“左”倾机会主义集团，产生于1918年1月，核心人物是尼·伊·布哈林、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格·列·皮达可夫和卡·伯·拉狄克等。“左派共产主义者”否认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可

能性，认为没有西欧革命的直接支持，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必定在国际资本的打击下毁灭。他们反对缔结布列斯特和约，主张同帝国主义进行战争，以“促进”国际革命。在苏维埃政权缔结了和约、取得了喘息时机并着手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时，“左派共产主义者”在1918年4月发表了一个《时局提纲》，同列宁的《关于苏维埃政权当前任务的提纲》相对抗。他们否定过渡时期的必要性，反对利用资产阶级专家和国家资本主义，反对在企业中建立纪律和实行经济核算，认为实行列宁的这些政策就是恢复资产阶级秩序。布尔什维克党在列宁的领导下，同“左派共产主义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左派共产主义者”在1918年夏承认了错误。——第156、506页。

- 64 民主集中派是俄共（布）党内的一个反党集团，于1919—1920年形成，核心人物是季·弗·萨普龙诺夫、恩·奥新斯基和弗·米·斯米尔诺夫等。民主集中派否认党在苏维埃中的领导作用，反对在企业中实行一长制和严格的纪律，要求党内有组织派别和集团的自由，排斥中央对地方的领导。党的第九次和第十次代表大会斥责了民主集中派后，该集团的领导人继续进行反党活动：1923年他们在托洛茨基挑起的争论中反对党及其领导，1926年他们参加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在1927年12月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这个集团的成员被开除出党。——第156、504页。
- 65 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是在1923年12月5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上通过的，主要内容是关于党内民主和工人民主的问题。该决议发表在1923年12月7日《真理报》第二七八号上。——第157页。
- 66 指1923年10月25—27日举行的有十个党组织的代表参加的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这次全会讨论了党内状况问题，批准了政治局制定的党内民主的方针，斥责了托洛茨基1923年10月8日给党中央的诬蔑性信件和他10月15日炮制的所谓四十六个反对派分子的声明，指出托洛茨基在世界革命和党所经历的最严重的关头进行这些活动是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第157页。
- 67 指自称工人团的反革命秘密集团在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前夕

- 发出的匿名纲领。工人团是被开除出党的米雅斯尼柯夫和库兹涅佐夫于 1923 年在莫斯科组成的,参加的人数不多,同年秋被清除。——第 162 页。
- 68 全苏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于 1924 年 1 月 26 日—2 月 2 日在莫斯科举行。大会的第一次会议是列宁追悼会,斯大林在会上代表布尔什维克党庄严地宣誓要忠实执行列宁的遗嘱。大会就列宁逝世发布了《告劳动人民书》。大会为永久纪念列宁作出了下列各项决议:出版《列宁全集》,规定列宁逝世纪念日,将彼得格勒改名为列宁格勒,在莫斯科红场建造列宁墓,在各加盟共和国首都以及列宁格勒和塔什干建立列宁纪念像。代表大会讨论了苏联政府的工作报告、苏联预算问题和设立中央农业银行问题。1 月 31 日,代表大会批准了第一部苏联宪法,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联盟院和民族院。斯大林被选为联盟院成员。——第 169 页。
- 69 英国外交大臣乔·纳·寇松于 1923 年 5 月 8 日向苏联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对苏联提出一系列无理指责,要求苏联政府召回它驻波斯和阿富汗的全权代表,释放因在苏联北部领海内非法捕鱼而被扣留的英国渔船,并威胁说,如果在十天内不接受最后通牒的条件,就要断绝英苏间的贸易关系。寇松的最后通牒造成了对苏联新的武装干涉的威胁。苏联政府拒绝了英国政府的无理要求,表示准备以和平方式调整两国关系,同时采取了加强国防力量的措施。——第 172 页。
- 70 德国危机指 1923 年德国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当时德国国内展开了声势浩大的群众革命运动,工人开始大批地从社会民主党转到共产党方面来。在萨克森和图林吉亚成立了工人政府,在汉堡发生了武装起义。德国革命运动被镇压下去以后,资产阶级反动势力在整个欧洲猖獗起来,对苏维埃共和国进行新的干涉的危险也增大了。——第 172、278、309 页。
- 71 斯托雷平党(斯托雷平工党)是人们对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的讥讽性称呼,因为他们迁就斯托雷平制度,同它妥协,想以放弃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和策略为代价,来换取在沙皇制度下的合法地位。——第 179 页。

- 72 士官生暴动 指 1917 年 10 月 29 日（公历 11 月 11 日）沙皇俄国军事学校的学生在彼得格勒发动的反苏维埃的武装暴动。这是克伦斯基—克拉斯诺夫反革命叛乱的一个组成部分。领导这次暴动的是以尼·德·阿夫克森齐也夫、阿·拉·郭茨为首的一个反革命组织“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指挥这次暴动的是彼得格勒军区司令格·彼·波尔柯夫尼科夫上校。暴动者计划占领电报局、米哈伊洛夫练马场、彼得-保罗要塞和斯莫尔尼，逮捕苏维埃政府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们。暴动原定在 10 月 30 日发动，由于阴谋暴露而提前。部分士官生部队曾占领了米哈伊洛夫练马场和电报局。当天傍晚暴动被水兵和赤卫队平定。——第 182 页。
- 73 斯维尔德洛夫大学 即斯维尔德洛夫工农共产主义大学，是苏联培养党政干部的第一所高级党校。它的前身是 1918 年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倡议成立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附属鼓动员和指导员训练班。1919 年 1 月该训练班改组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附属苏维埃工作学校。根据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在这个学校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央苏维埃工作和党务工作学校。1919 年 7 月，根据俄共（布）中央组织局的决定，这个学校改为斯维尔德洛夫工农共产主义大学。——第 184、354 页。
- 74 “阳光下的地盘”一语引自德意志帝国外交大臣伯·毕洛夫的演说。1897 年他在国会中说：“让别的民族去分割大陆和海洋而我们德国人只满足于蓝色天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也要为自己要求阳光下的地盘。”——第 187 页。
- 75 据希腊神话传说，奥吉亚斯王有个大牛圈，养牛三千头，三十年未打扫。后来人们用“奥吉亚斯的牛圈”来比喻极其肮脏的地方。——第 193 页。
- 76 第二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 于 1912 年 11 月 24—25 日在瑞士巴塞尔举行。出席大会的有五百五十五名代表。这次大会是在欧洲面临战争威胁的情况下召开的。大会开幕的当天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战示威游行和抗议发动战争的国际集会。大会讨论了国际形势和共同反对战争问题。大会通过的宣言揭露了即将爆发的战争的掠夺性质，号召全世界工人运用无产阶级的组织和力量进行反对战争危险的革命斗

- 争。第二国际的领袖们在会上投票赞成反战宣言,但是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一开始他们就背弃了巴塞尔宣言和其他反战决议,站到了本国帝国主义政府一边。——第 197 页。
- 77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于 1905 年 4 月 12—27 日(公历 4 月 25 日—5 月 10 日)在伦敦举行。这次大会是由布尔什维克筹备召开的,孟什维克拒绝参加而在日内瓦召开了他们自己的代表会议。大会研究了当时已经展开的的根本问题,确定了领导革命的无产阶级的任务。大会讨论了武装起义、在革命前夕对政府策略的态度、临时革命政府、对农民运动的态度、对党内已经分裂出去的部分(孟什维克)的态度、党的公开的政治活动等问题。大会通过的各项主要决议都是由列宁起草的。大会制定了党在革命中的策略路线,修改了党章,通过了列宁在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关于党员资格的党章第一条条文,废除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这样两个中央机关并存的制度。大会决定创办新的中央机关报——《无产者报》,中央全会任命列宁为该报编辑。——第 208、498 页。
- 78 在 1877—1878 年俄土战争中,俄军曾冒严寒扼守巴尔干的希普卡山隘,大批士兵冻死冻伤,俄军司令部战报却多次说:“在希普卡平安无事。”——第 218 页。
- 79 科尔尼洛夫叛乱指 1917 年 8 月间俄国资产阶级和地主策划的一次反革命叛乱。指挥这次叛乱的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任命的俄国军队最高总司令、沙皇将军拉·格·科尔尼洛夫,准备叛乱的中心是设在莫吉廖夫的大本营。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是准备这次叛乱的同谋者。科尔尼洛夫于 8 月 25 日调集军队,企图占领彼得格勒,消灭苏维埃,建立反革命军事独裁政府。布尔什维克党组织工人和革命士兵奋起保卫革命,于 8 月底粉碎了这次叛乱。——第 231、294、323 页。
- 80 农业合作社总社即全俄农业合作社,于 1921 年 8 月成立,1926 年 6 月撤销。——第 235 页。
- 81 民主会议于 1917 年 9 月 14—22 日(公历 9 月 27 日—10 月 5 日)在彼得格勒举行。会议是由工兵代表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中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领袖们召集的。参

- 加会议的有各社会主义政党、苏维埃、工会、地方自治局、工商业界和军队中的妥协派代表。会上产生了临时政府的谘议机关——预备议会(共和国临时议会)。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想利用它来制止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使俄国从苏维埃革命的道路转到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道路上去。关于民主会议,参看列宁《论进行伪造的英雄和布尔什维克的错误》和《政论家札记》(《列宁全集》第26卷第26—34页和第35—41页)。——第252、614页。
- 82 布列斯特和约 指1918年3月3日苏维埃俄国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同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土耳其四国签订的条约。签订这个条约,是当时新建立的苏维埃政权为了退出帝国主义战争、集中力量巩固十月革命取得的胜利而采取的一种革命的妥协。按照这个和约,苏维埃俄国丧失约一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并要付出巨额赔款。由于签订了和约,年轻的苏维埃政权赢得了时间,从而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整顿国家经济并建立红军,为后来战胜白卫军和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创造了条件。1918年11月13日,即协约国对德停战协定签字后两天,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废除了布列斯特和约。——第253、507页。
- 83 召回主义 是俄国1905—1907年革命失败后在布尔什维克队伍中产生的“左”倾机会主义派别,代表人物是亚·亚·波格丹诺夫、阿·瓦·卢那察尔斯基、格·阿·阿列克辛斯基、米·尼·波克罗夫斯基等。召回派要求从第三届国家杜马中召回社会民主党的代表,拒绝参加工会、合作社以及其他合法和半合法的组织,放弃一切合法斗争。召回派以“革命”词句作幌子,执行了取消派的路线。列宁把召回派叫作“改头换面的孟什维克”。1909年6月,布尔什维克机关报《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实际上是布尔什维克中央全体会议)斥责了召回派,把波格丹诺夫开除出布尔什维克组织。——第254、498页。
- 84 这里是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堡委员会中以谢·亚·帕格达季耶夫为首的少数委员。他们在1917年四月游行示威时提出了立刻推翻临时政府的口号。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在游行示威的次日(4月22日)通过列宁提出的决议,严厉地谴责了帕格达季耶夫等人

- 的冒险主义行为，认为他们提出的口号不合适、不正确，妨碍党把苏维埃的多数争取到自己方面来，同当时党的方针相抵触。——第 254 页。
- 85 俄国共产党（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于 1921 年 3 月 8—16 日在莫斯科举行。列入大会议程的问题有：中央的总结报告、民族问题、工会问题、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问题、党的建设问题、党的统一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问题等。列宁在大会上作了中央的政治报告、关于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关于党的统一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的报告。大会根据列宁的报告通过了关于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即关于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入新经济政策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决议。大会作了关于工会问题争论的总结，严厉谴责了托洛茨基派、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等机会主义派别的观点，并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列宁的工会问题纲领。大会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要求立即解散一切派别集团，保持党的队伍的统一和团结。斯大林在大会上作了《关于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当前任务的报告》，并代表民族问题委员会提出了相应的决议草案，为大会一致通过。——第 270 页。
- 86 斯大林的《走向十月革命的道路》一书在 1925 年 1 月和 5 月出了两版，收入这本书中的文章和演说编入了《斯大林全集》第三卷。作者在 1924 年 12 月写完该书序言，序言全文只在《走向十月革命的道路》一书中发表过。序言的大部分用《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的标题刊载在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一书各版和各种文集中，并印成单行本发行。序言的另一部分作为《反对联邦制》一文的作者注发表于《斯大林全集》第三卷。——第 276、387、543 页。
- 87 《社会民主党人报》（《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的秘密机关报，于 1908 年 2 月—1917 年 1 月出版，共出了五十八号。创刊号在俄国出版，第二至三十二号（1909 年 2 月—1913 年 12 月）在巴黎出版，第三十三至五十八号（1914 年 11 月—1917 年 1 月）在日内瓦出版。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编辑部由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组成。在编辑部内，列宁坚持布尔什维克路线，同孟什维克取消派进行了斗争；列·波·加米涅夫和格·叶·季诺维也夫对取消派采取调和态度；孟什维克·

- 马尔托夫和费·伊·唐恩实行怠工，同时又在他们的《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上公开为取消主义辩护。1911年6月，马尔托夫和唐恩退出了编辑部。自1911年12月起，《社会民主党人报》由列宁主编。该报先后刊登了列宁的八十多篇文章、短评和斯大林的许多篇文章。——第287、516页。
- 88 四月游行示威 指 1917年4月20—21日（公历5月3—4日）彼得格勒群众的游行示威。1917年4月18日（公历5月1日），俄国临时政府外交部长巴·尼·米留可夫照会盟国，声明要把战争进行到底，并完全遵守对盟国承担的义务。4月20日，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号召群众抗议临时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4月20—21日，约有十万工人和士兵群众激于反战义愤，在彼得格勒举行了游行示威。提出的口号是：“打倒战争！”“公布秘密条约！”“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等。莫斯科、乌拉尔、乌克兰等城市和地区的群众也举行了游行示威。反革命军官曾下令向示威群众开枪，但军队拒绝执行。四月游行示威标志着临时政府危机的开始，加速了俄国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第293页。
- 89 七月游行示威 指 1917年7月3—4日（公历16—17日）在彼得格勒举行的群众游行示威。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遵照英法帝国主义的意旨，坚持进行帝国主义战争，激起了工人和士兵的极大愤慨。7月3日（公历16日），维堡区工人和士兵自发地开始了反对临时政府的游行示威，而且有发展成为反对临时政府的武装起义的趋势。布尔什维克党中央考虑到当时俄国的革命危机尚未成熟，反对在这种不利的情况下实行武装发动，但在看到劝阻群众举行游行示威已不可能时，便于7月3日深夜作出了参加游行示威的决定，以图把它变成和平的有组织的运动。这次游行示威尽管是和平性质的，仍遭到临时政府的血腥镇压。——第293、323页。
- 90 六月游行示威 指 1917年6月18日（公历7月1日）彼得格勒工人在革命烈士墓旁举行的游行示威。提出的口号是：“打倒战争！”“打倒十个资本家部长！”“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这次游行示威显示了群众革命情绪不断高涨，布尔什维克党的影响和威信大大提高，同时沉重打击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以及临时政府。列宁指出：“6月18日的

游行示威，成了革命无产阶级的力量 and 政策的示威，无产阶级指出了革命的方向，指出了摆脱绝境的道路。”（《列宁全集》第 25 卷第 95 页）——第 293 页。

- 91 这里是指鲁·希法亭在德国十一月革命中对苏维埃地位问题所持的机会主义立场。1919年2月9日，希法亭在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机关报《自由报》上发表文章，主张苏维埃可以变为国家组织，但要同资产阶级议会即“国民会议”并存共处。希法亭的这一主张随即变成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口号。列宁指出，希法亭等人是“企图把资产阶级专政同无产阶级专政结合起来”（见《列宁全集》第 29 卷第 356 页）。——第 303 页。
- 92 哈姆莱特 是莎士比亚悲剧《哈姆莱特》的主角，是一个内心矛盾、犹豫不决、耽于幻想而不能坚决打动的人的典型。——第 305 页。
- 93 道威斯计划 即关于德国赔偿问题的报告书。它是由美国摩根财团代表、银行家查·道威斯为主席的国际专家委员会制定的。1924年8月16日被第一次世界大地各战胜国代表伦敦会议批准实施，并为德国接受。道威斯计划旨在使德国的经济得到恢复，以保证德国能偿付赔款。它规定由战胜国向德国提供贷款以稳定马克，确定德国每年度的具体赔款数额，还规定以德国政府主要财政收入作为赔款的保证，把苏联及其他一些地方划为德国的工业品市场等。道威斯计划的实施为美国资本涌入德国开辟了道路。1930年道威斯计划为杨格计划所代替。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对道威斯计划作了评论（见《斯大林全集》第 7 卷第 225—226 页）。——第 309 页。
- 94 古罗马举行凯旋仪式时，统帅头戴桂冠，高坐在套着四匹白马的镶金的凯旋车上，前呼后拥，耀武扬威。后人乃以骑白马比喻胜利者的派头。——第 314 页。
- 95 苏联无产阶级大学生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 于 1925 年 4 月 13—17 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约有三百人，代表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和工人进修学校的二十五万名学生。会议讨论了下列几个问题：苏联所处的国际形势和国内状况，工会和大学生，无产阶级大学生中央常务局的活动的总结，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职业

- 教育总局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职业教育总局的工作,高等学校与生产的联系。斯大林于4月13日和会议的代表团谈话,4月15日写了这封致会议的信。——第317页。
- 96 共产主义大学是苏联早期培养党、政和工会干部的高级党校。这些学校是在各大城市的短期党员学习班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中成立最早的是斯维尔德洛夫工农共产主义大学。俄共(布)中央直接领导共产主义大学的工作,于1923年批准了《共产主义大学示范章程》。共产主义大学招收党龄三年以上的党的工作者入学,学制是三年,后改为四年。为了提高地方领导干部的理论水平,还附设一年制的学习班。大多数共产主义大学设有党的工作和政治教育、工会运动、经济、政法等科系,教学大纲中包括社会政治(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学)、自然科学(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以及俄语、外语等课程。1927年在莫斯科成立了全苏函授共产主义大学,其他共产主义大学也设立了函授部。根据联共(布)中央1932年9月21日的决定,多数共产主义大学后来改成了共产主义高等农业学校。——第317页。
- 97 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于1925年4月27—29日在莫斯科举行。会议讨论了党的建设、合作社、单一农业税、金属工业、革命法制、共产国际和俄共(布)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的决议而产生的任务等问题。——第321、354、444页。
- 98 指1912年4月4日(公历17日)沙皇军队屠杀西伯利亚连纳金矿工人的事件。连纳金矿工人因不堪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从1912年2月底开始罢工,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取消罚款、提供医疗救护、改善粮食供应和居住条件等,参加者达六千人。4月4日沙皇军队逮捕了罢工委员会全体委员,并奉命向工人群众开枪,死伤五百多人。连纳惨案激起了全俄工人的愤怒,罢工浪潮迅速席卷全国,使俄国革命运动进入了新的高涨时期。——第322页。
- 99 指美、英、法等战胜国制定和批准关于德国赔偿问题的道威斯计划,参看本卷注93。——第327页。
- 100 1925年4月16日,保加利亚索非亚的“圣礼拜”大教堂发生了爆炸事件,当时以亚·灿科夫为首的保加利亚法西斯政府的成员和其他

政界人士正聚集在这里。事后,灿科夫发表声明,诬蔑苏联政府是爆炸事件的唆使者,各国反动报刊也掀起了反对社会主义苏联的宣传运动。灿科夫政府并借机大肆迫害人民群众,有数万人被捕,数千人被杀害。1925年5月召开的苏联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发表声明,谴责了灿科夫政府的暴行,驳斥了对苏联的诬蔑性攻击。——第328页。

- 101 《最近新闻报》《Последние Новости》)是十月革命后逃亡国外的立宪民主党人办的报纸(日刊),1920年4月—1940年7月在巴黎出版,巴·尼·米留可夫任主编。——第361、536页。
- 102 凡尔赛条约是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胜国英、法、美、意、日等为一方和战败国德国为另一方签订的帝国主义和约。该和约于1919年6月28日在巴黎近郊凡尔赛宫签订。列宁指出:“凡尔赛条约不过是强盗和掠夺者的条约”,“是一个高利贷者的和约,刽子手的和约,屠夫的和约”。(《列宁全集》第31卷第291页)和约的主要内容是:德国将亚尔萨斯—洛林交还法国,并将许多边界地区割让给比利时、波兰等国,萨尔煤矿归法国;德国的殖民地由英、法、日等国瓜分;德国向美、英、法等战胜国支付巨额赔款;限制德国军备,规定德国境内莱茵河以西整个地区和莱茵河以东五十公里为非军事区。美国代表在和约上签了字,但国会未予批准,后来美国于1921年8月单独同德国签订了一项内容几乎完全相同的条约。中国于1917年8月对德奥宣战,是战胜国之一,但和约却规定将战前德国在我国山东省的特权转交给日本。由于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中国政府代表未在和约上签字。——第362页。
- 103 苏联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于1925年5月13—20日在莫斯科举行。苏维埃建设问题是大会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米·伊·加里宁就这个问题作了报告。大会还讨论了关于土库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加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问题、苏联政府的工作报告、苏联工业状况、提高和巩固农民经济的措施、关于红军的报告等。大会制定了苏联的对内和对外政策方面的具体措施,制定了提高国家防御能力、改进苏维埃工作、进一步提高工农业和财政等方面的措施。——第374页。

- 104 指 1925 年 3 月 21 日—4 月 6 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五次扩大全会。全会研究了下列几个问题：国际发展趋势和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争取世界工会运动统一的斗争、农民问题、俄共（布）党内的争论、共产国际个别支部的问题等。在大会上成立了政治委员会、捷克斯洛伐克委员会、南斯拉夫委员会等。斯大林被选为政治委员会委员和捷克斯洛伐克委员会委员。3 月 27 日，斯大林在捷克斯洛伐克委员会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演说（见《斯大林全集》第 7 卷第 51—58 页）。3 月 30 日，斯大林在南斯拉夫委员会会议上发表了《论南斯拉夫的民族问题》的演说（同上，第 59—64 页）。——第 377 页。
- 105 “从本丢推给彼拉多”一语出自圣经《新约全书·路加福音》第二十三章。耶稣被捕后解交罗马帝国驻犹太总督本丢·彼拉多审讯，本丢·彼拉多知道耶稣是加利利人，就把他送交加利利分封的王——希律，希律拒绝审讯，又把他送回给本丢·彼拉多。人们沿用此语时省去希律，而说“从本丢推给彼拉多”，指推来推去，不解决问题的意思。——第 390 页。
- 106 指 1925 年春开始的摩洛哥里弗人反对法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摩洛哥的里弗区原是西班牙的殖民地，1921 年宣布独立，成立里弗共和国。法国垂涎于摩洛哥的这个矿藏丰富的地区，派兵到里弗区边境，截断里弗区水源，从而挑起了战争。在 1925 年春季和夏季，里弗人使法国人遭到了一连串的严重失败。后来法国和西班牙缔结了反对里弗人的军事同盟，才在 1926 年 5 月把里弗人击败，——第 391 页。
- 107 指 1924 年下半年英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在华南，英国人出动军舰支持广州商团为反对孙中山领导的广东革命政府而发动的武装叛乱。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采取断然措施，平定了这一叛乱，粉碎了英帝国主义的阴谋。在华北，英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分别支持它们的代理人吴佩孚和张作霖进行了第二次直奉战争。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激起了中国民族解放斗争的新高潮。——第 391 页。
- 108 第二半国际 又称维也纳国际，正式名称是社会党国际工人联合会，

- 于 1921 年 2 月在维也纳举行的各中派政党和集团的代表会议上成立。这些政党和集团在革命工人群众压力下暂时退出了第二国际,实际上在无产阶级运动的一切主要问题上都执行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路线。成立第二半国际的目的是想阻止广大劳动群众站到共产国际方面,削弱共产党人在世界各国日益增长的影响。1923 年 5 月,第二半国际和第二国际合并成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第 401 页。
- 109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于 1920 年 7 月 19 日—8 月 7 日举行。开幕式在彼得格勒举行,以后会议在莫斯科举行。出席大会的有三十七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组织的代表二百一十八名。大会的任务是:在各国共产党力量迅速增长、革命运动日益高涨的情况下,研究如何克服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危险,确定共产主义运动的组织原则、行动纲领和战略策略。列宁领导了大会的全部筹备工作,并在会前发表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重要著作,为大会的召开作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列宁提出的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基本任务提纲、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土地问题提纲和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都被批准为大会的决议。大会批准了共产国际章程,通过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并发表了一系列号召书。列宁和斯大林被俄共(布)代表团推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斯大林在这里引证的是列宁在这次大会上作的《关于共产党的作用的发言》中的一段话。——第 415 页。
- 110 《四月提纲》(《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是 1917 年 4 月列宁从国外回到彼得格勒后,在布尔什维克会议上所作报告的提纲。这个提纲分析了二月革命后俄国的局势,向布尔什维克党和俄国无产阶级提出了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明确的革命路线和具体计划。在政治方面,提纲指出工人代表苏维埃是革命政府唯一可能的形式,主张全部政权归工人代表苏维埃。在经济方面,提纲提出了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要求没收地主的土地,把全国土地收归国有,实行银行国有化,实行工人对社会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的监督。提纲建议立即召开党代表大会,修改党纲,把被第二国际玷污了的“社会民主党”这个名称改为共产党,并要求建立第三国际。列宁的《四月提纲》对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俄国工人阶级争取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斗争起了巨大作用。——第 427、543 页。

- 111 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 即铁路和水路运输联合工会中央委员会,成立于1920年9月。1920年底—1921年初,托洛茨基分子掌握了这一组织的领导权,在工作中采取赤裸裸的强迫命令的方法。1921年3月举行的全俄铁路和水路运输员工第一次代表大会把托洛茨基分子赶出了运输工会中央领导机关,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并规定了工会工作的新方法。——第428页。
- 112 工团主义(“革命工团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是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一种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思潮,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传播于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瑞士和拉丁美洲等地。工团主义者否认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必要性,否认党的领导作用和无产阶级专政,认为工人阶级只要通过工会(工团联合会)采取所谓“直接行动”(罢工、怠工、抵制等)就能够推翻资本主义,鼓吹由工会领导和组织生产,以各地工会在经济上的联合来代替国家机构。——第429页。
- 113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提纲《论共产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是作为代表大会的决议被通过的。——第432页。
- 114 俄国共产党(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于1922年3月27日—4月2日在莫斯科举行。这次大会是列宁出席并直接领导的最后一次党代表大会。列入大会议事日程的是: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和组织报告、中央检查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俄共(布)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总结报告、工会问题、红军问题、财政政策、清党的总结和巩固党的队伍以及附属于这个议题的关于青年工作、关于报刊和宣传工作的补充报告等。大会对新经济政策第一年的实行情况作了总结。列宁在会上作了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和关于这个报告的结论。列宁指出新经济政策意味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一场“谁战胜谁”的殊死斗争,同时宣布,现在退却时期已经结束,必须重新配置力量,对资本主义成分进行坚决的进攻。列宁提出:党的当前任务是学会管理经济,学会文明经商;为了顺利完成党的当前任务,必须正确地挑选干部和检查执行情况。大会严厉地谴责了工人反对派的派别活动。这次代表大会后的第一次中央全会根据列宁的建议,选举斯大林为党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第433页。
- 115 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于1925年12月18—31日在莫斯科举

- 行。斯大林于12月18日在大会上作了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并于12月23日作了关于这个报告的结论。大会讨论了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和组织报告、中央检查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俄共(布)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总结报告,还讨论了工会工作、共青团工作、修改党章等报告。大会一致赞同中央委员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批准了党在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面的总方针,并责成中央委员会同一切破坏党的统一的企图进行坚决的斗争。大会在决议中着重指出了在依靠贫农的条件下进一步巩固工人阶级和中农的联盟去同富农作斗争的重要性。大会指出了必须支持和推进农业的发展:提高农业技术,通过合作社把更多的农户引上社会主义建设的轨道。根据大会决议,俄共(布)改称为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第438、461、540页。
- 116 指1925年4月23—30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全会批准了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通过的各项决议,其中《关于共产国际和俄共(布)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的决议而产生的任务》的决议,阐明了党关于社会主义在苏联胜利问题的观点(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分册第39—51页)。——第438页。
- 117 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对俄共(布)列宁格勒省第二十二次代表会议来信(这是格·叶·季诺维也夫、列·波·加米涅夫的追随者的派别攻击)的答复,发表在1925年12月20日《真理报》第二九一号上。——第444页。
- 118 《时代哲学》是格·叶·季诺维也夫在1925年写的一篇文章的标题。斯大林对该文的批评,见《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三一三至三一六页。——第457页。
- 119 这次联共(布)中央全会于1926年4月6—9日举行。4月9日,斯大林在全会的上午会议上就关于经济状况和经济政策的报告作了讲话,在下午会议上作了关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全会1926年工作计划的报告。——第459页。
- 120 工人反对派是俄共(布)党内的无政府工团主义集团,在1920—1921

年工会问题争论的过程中形成,核心人物是亚·加·施略普尼柯夫、谢·巴·梅德维捷夫、亚·米·柯伦泰等。它要求把管理整个国民经济的工作交给工会——全俄生产者代表大会,主张各国民经济管理机关一概由相应的工会选举产生,而且党政机关不得撤销工会提出的候选人,从而否定了党和无产阶级国家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作用。它把工会同苏维埃国家和共产党对立起来,认为工人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不是党,而是工会。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斥责了工人反对派,认为宣传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的思想是同党员称号不相容的。——第460、504页。

- 121 切尔文是1922—1947年苏联国家银行发行的银行券的单位名称。这种银行券开始发行时规定:一切尔文的含金量相当于十月革命前的十卢布硬币,以百分之二十五的贵金属和稳定外币、百分之七十五的短期期票和易销商品为保证。切尔文银行券的流通对1922—1924年苏联币制改革的成功起了很大作用。——第466页。
- 122 《共青团真理报》(《Комсомольская Правда》)是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和莫斯科委员会的机关报(日刊),1925年5月24日创刊。——第472页。
- 12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于1926年11月22日—12月16日在莫斯科举行。全会讨论了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任务的报告,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关于英国问题的报告,关于托拉斯化、合理化和由此而产生的共产党员在工会中的任务的报告,关于联共(布)党内问题的报告,关于德国问题和荷兰问题的报告;审查了马斯洛夫—路特·费舍事件、布兰德勒和塔尔海默事件、苏瓦林事件。会上成立了政治委员会、中国委员会、英国委员会、德国委员会和其他委员会。斯大林被选为政治委员会、中国委员会和德国委员会的委员。全会在讨论斯大林关于联共(布)党内问题的报告以后,斥责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联盟,指出它是在在政纲上滚到孟什维克立场上去的分裂主义者的联盟,要求共产国际各个支部进行坚决的斗争,以反对联共(布)党内的反对派及其在各国共产党内的门徒破坏共产国际和联共(布)队伍的思想统一和组织统一的一切企图。全会批准了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关于联共(布)党内的

反对派联盟的决议，并决定把它作为自己的决议附在全会决议的后面。斯大林关于联共（布）党内问题的报告和关于这个报告的结论于1926年12月印成了单行本，题为《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第496页。

- 124 取消派 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孟什维克右倾机会主义派别。它出现在俄国1905—1907年革命失败后的斯托雷平反动时期，代表人物是巴·波·阿克雪里罗得、费·伊·唐恩和亚·尼·波特列索夫等。“所谓取消主义，这就是：‘党内有一部分知识分子企图取消即解散、毁坏、废除、停止现有的党组织，代以一种绝对要在合法范围内活动的即“公开”存在的不定形的联盟’，‘甚至不惜以公然放弃党的纲领、策略和传统即过去经验为代价’。”（《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458—459页）取消派是自由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政党内的代理人。1912年1月，党的第六次（布拉格）全俄代表会议把取消派清除出党。——第499页。
- 125 反社会党人非常法 即《防止社会民主党危害治安法》，也叫反社会党人法，是德国俾斯麦政府在1878年10月通过的镇压工人运动的反动法令。它使德国社会民主党处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和工人的组织被取缔，社会主义书刊被查禁，社会民主党人遭到迫害。德国社会民主党组织工人阶级进行长期的艰苦斗争，终于迫使反动政府在1890年10月废除了这个法令。——第500页。
- 126 《社会民主党人报》（《Der Sozialdemokrat》）是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的秘密机关报（周刊）。1879年9月—1888年9月在苏黎世出版，1888年10月—1890年9月在伦敦出版。1880年以前编辑为格·福尔马尔，1881年以后为爱·伯恩施坦。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积极帮助该报编辑部执行党的无产阶级路线，批评并纠正它的个别错误和动摇。——第500页。
- 127 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 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期德国工人运动中的两个派别。爱森纳赫派是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在威·李卜克内西和奥·倍倍尔领导下，于1869年爱森纳赫代表大会上创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由于经常接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导，爱森纳赫派执行了比较彻底的革命政策，尤其是在重新统一德国的

问题上一贯坚持民主的和无产阶级的道路。拉萨尔派是德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斐·拉萨尔的拥护者，是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成员。他们否定工人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认为可以用普鲁士反动政府资助生产合作社的办法把资本主义和平地改造为社会主义，主张用争取普选权的斗争和议会活动来代替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这两个派别进行过激烈的斗争，后来于1875年在哥达代表大会上合并为统一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第500页。

- 128 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于1924年6月17日—7月8日在莫斯科举行。参加大会的有四十九个共产党及其他组织的代表共五百零四名。大会讨论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活动、世界经济状况、苏联经济状况和俄共（布）党内的争论、法西斯主义、工会运动中的策略、生产单位的支部等问题，还讨论了个别国家的党的问题、纲领问题、民族问题、土地问题以及其他问题。斯大林是大会主席团委员并且是几个最重要的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纲领委员会、关于列宁主义的决议起草委员会的委员和波兰委员会的主席。大会支持布尔什维克党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批准了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和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关于争论总结和党内小资产阶级倾向的决议，并决定把它作为共产国际的决议予以公布。大会通过决定，要求加强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使这些党布尔什维克化，成为依靠工会的真正群众性的党。——第504页。
- 129 前进派（前进集团）是由俄国召回派、最后通牒派、造神派和马赫主义者组成的一个反党集团，在亚·亚·波格丹诺夫和格·阿·阿列克辛斯基的倡议下，于1909年12月成立，曾发行反党刊物《前进》文集。它的主要成员还有维·列·尚采尔、阿·瓦·卢那察尔斯基、马·尼·利亚多夫、米·尼·波克罗夫斯基、维·鲁·明仁斯基、费·伊·加里宁等人。1912年1月党的布拉格代表会议后，他们与孟什维克取消派和托洛茨基分子联合起来反对会议的决议。由于前进派无原则地反党，得不到工人的支持，在1913年就已瓦解，1917年二月革命后解散。——第505页。
- 130 呼声派是以俄国孟什维克的国外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为中心而形成的派别组织。《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于1908年2月—

1911年12月先后在日内瓦和巴黎出版，编辑为巴·波·阿克雪里罗得、费·伊·唐恩、尔·马尔托夫、亚·马尔丁诺夫和格·瓦·普列汉诺夫。《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从第一号起便袒护取消派分子，为他们的反党活动辩护。普列汉诺夫谴责了它的取消派立场，并于1908年12月退出编辑部。此后，该报便彻底地成了取消派的思想中心。——第506页。

- 131 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于1926年10月26日—11月3日在莫斯科举行。会议讨论了国际形势、国内经济状况和党的任务、工会的工作总结和当前任务、反对派和党内状况等问题。会议批准了中央的政策，号召进一步为维护党的统一、为揭露滚到孟什维主义立场上去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而进行坚决斗争。

《关于联共(布)党内的反对派联盟》这一提纲(《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191—205页)是斯大林受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委托于1926年10月21—25日之间写成的。提纲说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联盟代表布尔什维克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提纲经政治局同意后，在10月26日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讨论通过。11月3日，这个提纲由党的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作为决议一致通过，当天由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批准。——第506页。

- 132 总理事会是英国工联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1921年在加的夫代表大会上首次选出。——第508页。

- 133 《我们的言论报》(Hawe Слово)是孟什维克—托洛茨基派的报纸，于1915年1月—1916年9月在巴黎出版。——第517页。

- 134 热那亚会议(热那亚国际经济会议)于1922年4月10日—5月19日在意大利热那亚举行。参加会议的有苏、英、法、意、比、德、日等二十九国和英国的五个自治领，美国派观察员列席。这次会议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陷入总危机和帝国主义国家武装干涉苏维埃俄国遭到失败的情况下召开的。帝国主义国家在会上向苏维埃俄国代表团施加压力，要求苏维埃政府偿还沙皇政府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债务，取消对外贸易的垄断，将已收归国有的外国财产归还原主。苏维埃俄国代表团断然拒绝这些无理要求，提出了反提

- 案，要求赔偿由于外国武装干涉而造成的损失。这次会议任何问题都没有解决，只是决定将部分问题移交海牙会议审议。苏维埃俄国代表团在会议期间利用德国同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于4月16日与德国缔结了拉巴洛条约（条约规定建立两国间的外交关系，双方放弃赔偿战费的要求），击破了帝国主义的反苏统一战线。——第519页。
- 135 指1926年5月3—12日英国工人举行的总罢工。参加罢工的有各主要工业部门和运输部门的五百多万有组织的工人。斯大林在《关于英国罢工和波兰事件》的报告中对这次罢工作了论述（见《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140—149页）。——第529页。
- 136 特米多尔，亦译热月，是1793年法国国民公会重颁的革命历法的第十一月，相当于公历7月19—20日至8月17—18日这段时间。共和二年热月9日，即1794年7月27日，发生热月政变，雅各宾派革命专政被推翻，政权从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手里转到了大资产阶级手里。特米多尔主义是托洛茨基反对派对联共（布）的诬蔑。斯大林说：“反对派说现在我们这里发生了特米多尔式的蜕化。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我国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我国的经济和政治正在破产和倒退，我们不是在走向社会主义，而是在走向资本主义。这种说法当然是奇怪的、愚蠢的。”（《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293—294页）——第531页。
- 137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于1926年7月14—23日举行。全会讨论了政治局关于英国总罢工、波兰事件和中国事件的决议的通报、关于改选苏维埃的总结的报告、关于拉舍维奇等人事件和党的统一的报告、关于住宅建设的报告、关于粮食收购运动的报告。斯大林在会上就政治局关于英国、波兰和中国的事件的决议的通报、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关于拉舍维奇等人事件和党的统一的报告以及其他问题作了讲话。全会赞同了中央政治局和联共（布）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国际问题方面的活动，通过了关于全国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党内生活和工人状况等重大问题的决议。全会撤销了格·叶·季诺维也夫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第531页。

- 138 韦丁派 是德国共产党内极左派集团之一,存在于柏林市内西北部的韦丁区党组织内。韦丁反对派的领导人支持联共(布)党内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联盟。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斥责了韦丁反对派,要求它完全停止派别活动,同被开除出德国共产党和敌视德共的分子断绝一切关系,无条件地服从德共和共产国际的决议。——第 533 页。
- 139 《莱比锡人民报》(《Leipziger Volkszeitung》)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日报,1894 年创刊。1901 年以前由布·舍恩兰克领导,1902—1907 年由弗·梅林担任主编。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的机关报。1917—1922 年是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1922 年以后成了右翼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机关报。1933 年希特勒上台后被查封。1946 年起是德国统一社会党莱比锡地区委员会的机关报。——第 535 页。
- 140 《社会主义通报》(《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й Вестник》)是十月革命后逃亡国外的俄国孟什维克的刊物。1921 年 2 月由尔·马尔托夫创办,1933 年 3 月前在柏林出版,1933 年 5 月—1940 年 6 月在巴黎出版,以后在纽约出版。——第 535 页。
- 141 四月代表会议 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于 1917 年 4 月 24—29 日(公历 5 月 7—12 日)在彼得格勒举行。这是布尔什维克第一次公开举行的代表会议,就其意义来说等于一次代表大会。会议以列宁的《四月提纲》为基础,确定了党在战争和革命的一切基本问题上的路线,规定了党争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方针。会议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关于战争、关于对临时政府的态度、关于目前形势、关于修改党纲、关于土地问题等一系列决议案。斯大林在会上作了拥护列宁提出的关于目前形势的决议案的发言,并作了民族问题的报告。列宁和斯大林批判了列·波·加米涅夫和阿·伊·李可夫的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投降主义和孟什维主义立场,批判了格·列·皮达可夫的废除国界、反对民族自决权的错误立场。——第 543 页。
- 142 齐美尔瓦尔德左派 是 1915 年 9 月在国际社会党人第一次(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上形成的左派国际主义者集团。在这个左派集团

中，只有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采取了唯一正确的彻底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立场。——第 544 页。

- 143 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于 1923 年 4 月 17—25 日在莫斯科举行。这是十月革命后列宁因病未能出席的一次党代表大会，但大会的决议考虑了列宁最后几篇文章和一些书信中提出的意见。大会讨论了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中央检查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俄共（布）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总结报告、关于工业的报告、关于党和国家建设中的民族问题的报告、关于农村税收政策的报告、关于区域划分的报告等。大会作了两年来实施新经济政策的总结，坚决反击了把新经济政策理解为放弃社会主义阵地的列·达·托洛茨基、尼·伊·布哈林和他们的拥护者。大会对组织问题和民族问题给予很大的注意。斯大林在 4 月 17 日下午会议上作了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报告。大会根据列宁的建议通过了关于工农检察院同中央监察委员会合并的决议。4 月 23 日大会听取了斯大林关于党和国家建设中的民族问题的报告，23 日和 24 日讨论了这一报告，25 日通过了以斯大林的提纲为基础的决议案。大会揭露了民族主义倾向分子，号召全党坚决反对民族问题上的两种倾向，即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倾向和资产阶级地方民族主义倾向。——第 544 页。
- 144 路标转换派分子是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的俄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的一个政治集团的成员。这个集团因 1921 年 7 月在布拉格出版《路标转换》文集和 1921—1922 年在巴黎出版《路标转换》杂志而得名，代表人物是立宪民主党人尤·弗·克柳奇尼科夫、尼·瓦·乌斯特里亚洛夫、斯·斯·鲁基亚诺夫、亚·弗·博勃里舍夫-普希金、斯·斯·查霍金、尤·尼·波切欣等。路标转换派在事实证明用外国武装干涉的办法不能推翻苏维埃政权后，转而指望新经济政策的实行会使苏维埃政权蜕化成为资产阶级政权。列宁指出：“路标转换派反映了成千成万的各色各样资产阶级分子或者参加我们新经济政策工作的苏维埃职员的情绪。”（《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4 卷第 636 页）——第 547 页。
- 145 涅恰也夫主义是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分子谢·根·涅恰也夫提出的密谋和恐怖主义策略。1869 年，涅恰也夫在莫斯科建立

了一个叫作人民惩治会的密谋组织。该组织内部实行独裁式的集中制，成员的意志和意见完全受到压制。——第 555 页。

- 146 阿拉克切也夫制度 指十九世纪头二十五年在俄国施行的警察暴虐、军阀专横、用暴力镇压人民的制度，因其推行者陆军大臣阿·安·阿拉克切也夫伯爵而得名。——第 555 页。
- 147 米勒兰主义 亦称内阁社会主义，因法国社会党人亚·埃·米勒兰于 1899 年参加反动的资产阶级政府而得名。米勒兰主义是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首领同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合作、放弃革命斗争、背叛无产阶级利益的明显表现，是“实践的伯恩斯坦主义”。——第 603 页。
- 148 雅各宾派 是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它的领袖是马·罗伯斯比尔、让·保·马拉、若·雅·丹东、路·安·圣茹斯特。1793 年 5 月 31 日—6 月 2 日胜利的人民起义，推翻了吉伦特派的统治，使政权转到雅各宾派手里。雅各宾派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建立了革命民主专政，实行了废除封建所有制、镇压反革命活动和抗击外国侵略者的政策。1794 年 7 月 27 日热月政变后，雅各宾派专政被颠覆，雅各宾派被解散。列宁称赞雅各宾派“给法国做出了民主革命的最好榜样和打击反对共和政体的君主联合的最好榜样”（《列宁全集》第 25 卷第 107 页）。——第 622 页。

人名索引

A

- 阿德勒, 弗里德里希 (Adler, Friedrich 1879—1960)——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之一,“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维·阿德勒的儿子。1907—1911年为苏黎世大学副教授,1910—1911年任瑞士社会民主党机关报《民权报》编辑,1911—1916年任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书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中派立场。1918年后公开宣扬改良主义。1921年参加创建第二半国际,1923—1940年任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在哲学上是马赫的信徒。——第 624 页。
- 阿德勒, 维克多 (Adler, Victor 1852—1918)——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创建人和领袖之一。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参加工人运动。1886年创办《平等报》,1889年起任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工人报》编辑。1889—1895年期间同恩格斯有通信联系。恩格斯逝世后不久转向改良主义,成为第二国际机会主义领袖之一。1905年起为议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中派立场,鼓吹“阶级和平”。1918年曾一度担任过奥地利政府外交部长。——第 165、166 页。
- 阿恩 (Ан 1869—1953) (真名饶尔丹尼亚, 诺依·尼古拉也维奇 Жордания, Ной Николаевич)——俄国格鲁吉亚孟什维克领袖之一。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加入南高加索第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组织“麦撒墨达西社”。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是火星报少数派分子。1906年是第一届国家杜马代表、社会民主党党团领袖。1907年当选中央委员(代表孟什维克)。斯托雷平反动时期支持取消派。1914年为托洛茨基的《斗争》杂志撰稿。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社会沙文主义者。1917年二月革命后任第比利斯苏维埃主席。1918—1921年是格鲁吉亚孟什维克反革命政府主席。1921年逃亡国外。——第 29、30、36、39、40—48、102—106 页。
- 阿尔斯基, 阿尔卡季·奥西波维奇 (Альскі́й, Аркаді́й Осипович 1892—1939)——190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在沃罗涅什、立陶宛、白俄罗斯和莫斯科等地的财政部门担任领导工作,后任俄共(布)中央登记分配处处长。1921—1927年先后任俄罗斯联邦和苏联财政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和部务委员。以后从事经济工作。1923年起支持托洛茨基,成为托洛茨基派骨干分子。1927年被开除出党,1930年恢复党籍,1933年再次被开除出党。——第 164 页。
- 阿克雪里罗得, 巴维尔·波里索维奇 (Аксельрод, Павел Борисович 1850—1928)——俄国孟什维克领袖之一。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参加民粹派运动。1883

年参加创建劳动解放社,1900年起任《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编委。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成为孟什维克思想家。斯托雷平反动时期是取消派领袖之一。1912年参加反党的八月联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社会沙文主义者。1917年二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反对苏维埃政权。——第29、30、50、52—54、56、136、175、177、265、271、498页。

爱伦堡,伊里亚·格里哥里也维奇(Зренбург, Илья Григорьевич 1891—1967)——苏联作家,政论家。——第273页。

奥艾尔,伊格纳茨(Auer, Ignaz 1846—1907)——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之一。1874年起任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书记,1875年该党同拉萨尔派合并后任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书记。多次当选议员。后来转向改良主义,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派领袖之一。——第509页。

奥库涅夫(Окунев)——第472页。

奥索夫斯基(Оссовский)——联共(布)党内的反对派分子。——第531、532、607页。

B

巴枯宁,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Бакунин, 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14—1876)——无政府主义创始人之一,俄国早期民粹主义思想家。1849年5月在德国参加领导德累斯顿起义,10月被捕。1851年被引渡给沙皇政府,在囚禁期间向沙皇写《忏悔书》。1861年

从西伯利亚流放地逃到伦敦。1864年加入第一国际,在国际内部组织秘密团体——社会主义民主同盟,进行阴谋破坏活动。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国际。——第89、500页。

鲍威尔,奥托(Bauer, Otto 1882—1938)——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领袖之一,“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民族文化自治”理论的炮制者之一。1907年担任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秘书,同年参加创办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斗争》杂志,1912年起任社会民主党报纸《工人报》编辑。1918年11月—1919年7月任奥地利共和国外交部长。二十年代初参加创建第二半国际和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主张通过议会道路实现和平过渡,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第65—68、72、75、78、79、81、83—92、94、125、396、527、624页。

倍倍尔,奥古斯特(Bebel, August 1840—1913)——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创建人和领袖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1867年起领导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是第一国际会员。多次当选议员。1869年与威·李卜克内西共同创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曾进行反对拉萨尔派的斗争。1870—1871年普法战争时期持国际主义立场,捍卫巴黎公社。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和二十世纪初反对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第55、165页。

贝克(Бык)——俄共(布)党内的反对派分子。——第164页。

彼得大帝(Петр Великий 1672—1725)(即

- 彼得一世 (Петр I) —— 俄国沙皇, 第一个全俄皇帝 (1682—1725 年)。——第 462 页。
- 彼得罗夫 (Петров 1892—1939) (真名拉斯科尔尼科夫, 费多尔·费多罗维奇 Раскольников, Федор Федорович) —— 1910 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任副海军人民委员、海军人民委员、伏尔加河—里海区舰队和波罗的海舰队司令员。1920—1921 年工会问题争论期间, 支持托洛茨基的纲领。1921 年后历任苏俄驻阿富汗外交代表、《青年近卫军》和《红色处女地》杂志编辑、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等职。1930—1938 年在爱沙尼亚、丹麦和保加利亚从事外交工作。——第 483 页。
- 别洛博罗多夫, 亚历山大·格奥尔基也维奇 (Белобород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Георгиевич 1891—1938) —— 1907 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8 年起历任乌拉尔区域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劳动国防委员会驻南线全权代表、第九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高加索劳动军革命委员会副主席、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东南局书记等职。1919 年当选俄共(布)中央委员。1921 年底起任俄罗斯联邦副内务人民委员, 1923 年起任内务人民委员。1920 年 9 月开始追随托洛茨基派。1927 年被开除出党, 1930 年恢复党籍, 后来再次被开除出党。——第 164 页。
- 波格丹诺夫, 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 (Богдан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73—1928) (真姓马林诺夫斯基 Малюневский) —— 俄国哲学家, 经济学家。1896 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 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是布尔什维克。1905、1906 年当选中央委员, 1907 年当选中央候补委员。参加过布尔什维克的《前进报》、《无产者报》和《新生活报》的编辑工作。一九一五年革命失败后成为召回派和前进派的领袖。在哲学上, 试图建立自己的体系——“经验一元论”(马赫主义哲学的变种), 修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1909 年被开除出布尔什维克组织。十月革命后在莫斯科大学讲授经济学。1918 年成为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思想家。1926 年起任输血研究所所长。——第 498 页。
- 波特列索夫, 亚历山大·尼古拉也维奇 (Потрес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Николаевич 1869—1934) (笔名斯塔罗维尔 Старовел) —— 俄国孟什维克领袖之一。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参加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900 年参加创办《火星报》和《曙光》杂志。1903 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是孟什维克。斯托雷平反动时期是取消派思想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社会沙文主义者。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 反对苏维埃政权。——第 29、30、50、52、53、56、265、271、498、505、506 页。
- 伯恩斯坦, 爱德华 (Bernstein, Eduard 1850—1932) —— 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领袖之一, 修正主义理论家。1872 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 1881—1890 年任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主编。恩格斯逝世后发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 公开地全面地修正马克思主义。1902 年后多次当选议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反对俄国十月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第 6、43、49、165、166、500、

- 509 页。
- 勃朗, 路易 (Blanc, Louis 1811—1882) —— 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 历史学家。一八四八年革命期间参加临时政府, 领导所谓“研究工人问题”的卢森堡委员会, 推行妥协政策, 诱使工人放弃革命斗争。1848年8月流亡英国, 是在伦敦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导人之一。1870年回国。次年当选国民议会议员, 对巴黎公社持敌视态度。鼓吹改良主义, 幻想依靠资产阶级国家帮助建立的工人生产协作社来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第1页。
- 勃鲁姆, 莱昂 (Blume, Léon 1872—1950) —— 法国政治家, 法国社会党领袖。1902年加入法国社会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敌视俄国十月革命。1919年首次当选议员。1920年反对法国社会党参加共产国际, 造成该党的分裂。他创建并领导的新党仍称法国社会党。1928年主编社会党中央机关报《巴黎人民报》。写过一些颂扬资产阶级民主制和改良主义、反对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著作。——第624页。
- 布哈林,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Бухарин, 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1888—1938) —— 190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曾在莫斯科工人区进行宣传工作。1911年侨居国外, 研究经济学。1917年当选中央委员。十月革命后历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真理报》主编等职。1918年组织“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 1920—1921年工会问题争论期间组织“缓冲”集团, 1928年同季可夫等人结成右倾集团。1929年被撤销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职务, 1937年被开除出党。——第516、518、519、553页。
- 布朗基, 路易·奥古斯特 (Blanqui, Louis - Auguste 1805—1881) —— 法国革命家, 空想共产主义者。参加过1830年七月革命和一八四八年革命, 领导过多次秘密起义, 组织和领导过四季社以及其他秘密革命社团。曾多次被捕判刑, 在狱中度过近半生。巴黎公社时期被反动派囚禁在凡尔赛, 缺席当选公社委员。他否认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想依靠少数人的密谋推翻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和列宁曾高度评价过布朗基的革命功绩, 同时也尖锐地批评了他的错误和密谋策略。——第135页。
- 布里根, 亚历山大·格里哥里也维奇 (Булыгин, Александр Григорьевич 1851—1919) —— 俄国官僚。1900—1904年任莫斯科副总督。1905年1月任内务大臣。同年8月主持制定关于召开咨议性国家杜马的法案, 企图用召开杜马来平息日趋高涨的革命浪潮。1905年10月辞职。——第134页。
- <
- 策列铁里, 伊拉克利·格奥尔基也维奇 (Церетели, Ираклий Георгиевич 1881—1959) —— 俄国孟什维克领袖之一。1907年是第二届国家杜马代表、社会民主党党团领袖。斯托雷平反动时期是取消派分子。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中派分子。1917年二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17年5—7月任临时政府邮电部长, 七月事变后任内务部长, 是迫害布尔什维克的主谋之

- 一。十月革命后是立宪会议中反苏维埃联盟首领,后为格鲁吉亚孟什维克反革命政府首脑之一。1921年逃亡国外,1923年参加组织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晚年住在美国。——第240页。
- 查苏利奇,维拉·伊万诺夫娜 (Засулич, Вера Ивановна 1849—1919)——俄国民粹主义运动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著名活动家。1868年开始革命活动,1879年参加民粹派的组织土地平分社,1883年参加创建劳动解放社。1900年参加《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编辑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成为孟什维克领袖之一。斯托雷平反动时期是取消派分子。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社会沙文主义者。对十月革命持敌视态度。——第29、30、50—53、56、498页。
- >
- 道威斯,查理·盖茨 (Dawes, Charles Gates 1865—1915)——美国政治家和银行家,共和党人。1923—1924年任关于德国赔偿问题的国际专家委员会主席,1925—1929年任副总统,1929—1932年任美国驻英大使。——第309、310、313、327页。
- 邓尼金,安东·伊万诺维奇 (Деникин, Антон Иванович 1872—1947)——沙俄将军。1911年4—5月任俄国军队最高总司令的参谋长。积极参加科尔尼洛夫叛乱。十月革命后与科尔尼洛夫等人组织反革命“志愿军”。1918—1920年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期间充当英、法、美帝国主义的走卒,任反革命的“南俄武装力量”总司令。1920年3月逃亡国外。——第160、169、171、243、250、253、481、485页。
- 杜鹤宁,尼古拉·尼古拉也维奇 (Духонин, 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1876—1917)——沙俄将军,君主派分子。1917年9月任俄国军队最高总司令的参谋长。十月革命后自封为最高总司令。由于拒绝执行苏俄人民委员会1917年11月20日关于立即同德奥指挥部举行和平谈判的命令,11月22日被撤职,12月3日被捕。后被起义士兵打死。——第182页。
- E
- 厄克特,约翰·莱斯利 (Urquhart, John Leslie 1874—1933)——英国金融家和工业家,矿业工程师。1896—1906年在俄国巴库油田当工程师,后为在俄国开办的一些英国公司的董事、俄亚联合公司董事长、一些大采矿企业的企业主。十月革命后是对苏维埃俄国进行武装干涉和经济封锁的策划者之一,任俄国债权人协会主席。1922年任英国出席热那亚和海牙会议代表面顾问。1921—1929年同苏联政府谈判其原有产业的租让权问题,没有成功。——第553页。
- 恩格斯,弗里德里希 (Engels, Friedrich 1820—1895)——第2、34、35、38、42、47—49、51、140、166、185、186、190—192、195、200、201、220、233、234、242、246、251、500、501、503、560、563—566、568—571、581、610—615页。
- F
- 费舍,路特 (Fischer, Ruth 1895—1961) (真名艾斯勒,埃尔弗里德

- Eisler, El-friede)——德国共产党极左派领袖之一。1924年4月以她和马斯洛夫为首的教条主义宗派集团掌握了德共中央的领导权,阻挠党在革命低潮时实行新的斗争策略,反对统一战线和群众工作。1925年秋被解除领导职务。1926年被开除出党。——第607页。
- 冯玉祥(1882—1948)——辛亥革命后历任北洋陆军旅长、师长、陕西和河南督军及陆军检阅使等职。1924年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发动北京政变,改所部为国民军,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1925年任西北边防督办,将国民军第一军改编为西北陆军。1926年3—4月间在直奉等系军阀的联合打击和帝国主义的威胁干涉下退出河南、直隶、天津、北京。1926年4月参加国民党,历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南京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长。九一八事变后,赞成抗日。1933年5月,与共产党合作,在张家口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任总司令。晚年继续同共产党合作。——第487页。
-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见列宁,弗·伊·。
- 弗兰格尔,彼得·尼古拉也维奇(Врангель, Петр Николаевич 1878—1928)——沙俄将军,君主派分子。1918—1920年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期间充当英、法、美帝国主义的走卒,是南俄反革命首领之一。1920年4—11月任反革命的“南俄武装力量”总司令,被红军击溃后逃亡国外。——第485页。
- 福尔马尔,格奥尔格·亨利希(Vollmar, Georg Heinrich 1850—1922)——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机会主义派领袖之一,记者。1876年加入社会民主党,1879—1880年任该党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主编。1881年起多次当选议员和巴伐利亚邦议会议员。鼓吹同资产阶级合作,同政府妥协,主张社会民主党同自由派联合。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社会沙文主义者。——第509页。
- 傅立叶,沙尔(Fourier, Charles 1772—1837)——法国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第1页。

G

- 盖得,茹尔(Guesde, Jules 1845—1922)(真名巴季尔,马蒂约 Basile, Mathieu)——法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第二国际领袖之一。早年是资产阶级共和党人,拥护巴黎公社。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前半期追随无政府主义者,后来接受并宣传马克思主义。1879年同拉法格等人创建法国工人党,领导法国社会主义运动革命派,并同机会主义作过斗争。1893年当选众议员。1901年参加创建法兰西社会党(1905年同法国社会党合并后称法国统一社会党)。二十世纪初转向机会主义立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社会沙文主义者,参加了资产阶级政府。——第165、166、179、180页。
- 高尔察克,亚历山大·瓦西里也维奇(Колчак, Александр Васильевич 1874—1920)——沙俄海军上将,君主派分子。1916年任黑海舰队司令。十月革命后,在外国帝国主义支持下,自封为俄国的最高执政,在乌拉尔、西伯利亚和远东建立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军事独裁政府。1919年被平叛的红军俘虏,1920年2

月7日被枪决。——第160、169、171、243、250、253、431、481、485页。

哥林, 弗拉基米尔·菲力波维奇 (Горин, Владимир Филиппович 1863—1925) (真姓加尔金 Галкин) ——俄国职业革命家, 布尔什维克。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前半期参加过民意党小组。九十年代中期成为社会民主党人。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是火星报多数派分子。会后积极参加反对孟什维克的斗争。1917年8月起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委员会工作, 十月革命前夕任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 参加了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1918—1920年在红军中做政治工作。1920年起在普及军训部任职。——第37页。

戈尔德勃拉特——见麦迭姆, 弗·达·。

H

韩德逊, 阿瑟 (Henderson, Arthur 1863—1935) ——英国工党领袖之一。1911—1934年任工党书记, 1908—1910和1914—1917年任工党议会党团主席。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社会沙文主义者。1915—1917年先后参加阿斯奎斯和劳合·乔治政府, 任教育大臣、邮政大臣和不管大臣等职。1919年参加创建伯尔尼国际, 1923年起任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1924和1929—1931年两次参加麦克唐纳政府, 先后任内政大臣和外交大臣。——第218、240页。

赫尔措格 (Herzog) ——德国共产党员。——第309—314页。

J

季诺维也夫, 格里哥里·叶夫谢也维奇

(Зиновьев, Григорий Евсеевич 1883—1936) (真姓拉多梅斯尔斯基 Радомысльский) ——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1907年起为中央委员。1908—1917年侨居国外期间任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编委和布尔什维克的《无产者报》编委。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对取消派、召回派和托洛茨基派持调和态度。1917年4月回国。十月革命前夕同加米涅夫公开发表声明, 不赞成党中央关于武装起义的决议, 从而泄露了党的起义计划。十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等职。1917年11月主张成立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参加的联合政府, 1925年参加组织“新反对派”, 1926年同托洛茨基组成反党联盟。1927年被开除出党。后来两次恢复党籍, 两次被开除出党。——第151、396—398、429、430、438—446、452、478、518、543、547、553—557、560—568、570、571、574、579—582、588、590、591、604—606页。

加林 (Галли) (阿尔特舒勒 Альтшулер)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代表, 孟什维克。——第111页。

加米涅夫, 列夫·波里索维奇 (Каменев, Лев Борисович 1883—1936) (真姓罗森费尔德 Розенфельд) ——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是布尔什维克。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对取消派、召回派和托洛茨基派持调和态度。1917年二月革命后反对党的社会主义革命方针。十月革命前夕同季诺维也夫公开发表声明, 不赞成党中央关于武装起义的决议, 从

而泄漏了党的起义计划。十月革命后历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莫斯科苏维埃主席、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委员等职。1917年11月主张成立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参加的联合政府,1925年参加组织“新反对派”,1926年参加组织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党联盟。1927年被开除出党。后来两次恢复党籍,两次被开除出党。——第407、408、444、445、542—548、552—554、587、588、590、591、600、602、604—607页。

捷尔任斯基, 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 (Дзержинский, Феликс Эдмундович 1877—1926)——苏联共产党和国家的著名活动家,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创建人之一。1895年入党。曾在波兰和俄国做党的工作。1906年起当选中央委员。1917年二月革命后在莫斯科做党的工作。十月革命期间任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和领导武装起义的党的军事革命总部成员。十月革命后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1921年兼任俄罗斯联邦交通人民委员和内务人民委员。1924年起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24年6月起为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组织局委员。——第351页。

K

卡茨(Katz)——德国共产党极左派分子。1926年被开除出党。——第540页。

卡列金, 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 (Каледин, Алексей Максимович 1861—1918)——沙俄将军。1917年6月任顿河哥萨克军队统领,反革命军政府首

脑。1917年8月在莫斯科国务会议上提出镇压革命的纲领。科尔尼洛夫叛乱的骨干分子。十月革命后参加建立白卫“志愿军”并策动哥萨克叛乱,是顿河哥萨克反革命首领之一。1918年1月因与红军作战连续失败自杀。——第123页。

卡普, 沃尔弗冈 (Kapp, Wolfgang 1858—1922)——德国容克和军阀的代表人物。1917年参加创建反动的祖国党。1920年3月策动反革命君主派发动军事政变,一度占领柏林,成立了以他为首的政府,为工人总罢工所推翻。——第255页。

卡斯切梁斯基 (Кастелянский)——《现代国家民族运动的形式》一书的编者。——第93页。

考茨基, 卡尔 (Kautsky, Karl 1854—1938)——德国社会民主党中派领袖,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理论家。1875年加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后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1883—1917年任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刊物《新时代》杂志主编。十九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写过一些宣传和解释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但也暴露了一些机会主义观点。1910年以后逐渐转到机会主义立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提出超帝国主义论,大战期间打着中派旗号支持帝国主义战争。1918年以后发表《无产阶级专政》等书,攻击俄国十月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第25、31、33、34、38、42—46、56、57、91、125、135、139、165、166、179、180、192、197、202、219、259、396、401、432、543、572、576页。

科尔尼洛夫, 拉甫尔·格奥尔基也维奇 (Корнилов, Лавр Георгиевич 1870—

- 1918)——沙俄将军,君主派分子。1917年7—8月任俄国军队最高总司令。同年8月发动反革命叛乱。叛乱平定后被捕入狱,11月逃至顿河流域,参加组织白卫“志愿军”,后任司令。在战斗中被击毙。——第123、231、255、294、297、299、300、323页。
- 科尔施,卡尔(Korsch, Karl 1886—1961)——德国共产党极左派领袖之一,哲学家。1926年被开除出德国共产党。1928年后退出政治活动,从事哲学研究。——第532、533、538、540、607页。
- 科尔佐夫,德·(Кольцов, Д. 1863—1920)(真名金兹堡,波里斯·阿布拉莫维奇 Гинзбург, Борис Абрамович)——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孟什维克。1880年参加民意党。八十年代后期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是火星报少数派分子,会后成为孟什维克骨干分子。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社会沙文主义者。1917年二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苏维埃劳动委员。敌视十月革命。——第110页。
- 科索夫斯基,弗拉基米尔(Косовский, Владимир 1870—1941)——俄国崩得领袖之一。1897年参加崩得成立大会,当选中央委员,任崩得中央机关报《工人呼声》主编。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是反火星派分子,会后成为孟什维克。斯托雷平反动时期是取消派分子。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社会沙文主义者。十月革命后逃亡国外。——第77、78、98、111页。
- 克莱因斯,约翰·罗伯特(Klynes, John Robert 1869—1949)——英国工党领袖之一。1893年加入独立工党。1906—1931和1935—1945年任议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社会沙文主义者。1918年任粮食大臣。1924和1929—1931年先后任掌玺大臣和内政大臣,参与推行反对工人的政策。——第240页。
- 克雷连柯,尼古拉·瓦西里也维奇(Крыленко, Николай Васильевич 1885—1938)——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曾在彼得堡、莫斯科等地做党的工作。1917年6月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前线和后方军事组织全国代表会议,当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全俄军事组织局委员。十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陆海军事务委员会委员、最高总司令。1918年起历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最高革命法庭庭长、俄罗斯联邦副检察长、检察长、司法人民委员。1936年起任苏联司法人民委员。——第182、183页。
- 克伦斯基,亚历山大·费多罗维奇(Керенский, Александр Федорович 1881—1970)——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首脑,社会革命党人。1912—1917年为第四届国家杜马代表、劳动派党团领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护国派分子。1917年二月革命后参加资产阶级临时政府,1917年3—5月任司法部长,5—9月任陆海军部长,7月21日起任总理,9月12日起兼任俄国军队最高总司令。十月革命后反对苏维埃政权。1918年逃亡国外。——第119—121、132、137、182、231、240、254、297、404、481页。
- 寇松,乔治·纳萨涅尔(Kurzton, George

- Nathaniel 1859—1925)——英国政治家,保守党领袖之一。1899—1905年任印度总督,残酷镇压印度民族解放运动。1915—1918年担任政府和议会职务。1919—1924年任外交大臣,是武装干涉苏维埃俄国的策划者之一。1920年波苏战争期间照会苏俄政府,要求红军不得越过1919年12月8日协约国最高会议规定的波兰东部边界线(所谓寇松线),1923年5月又对苏发出最后通牒,以新的武装干涉相威胁。——第153、172页。
- 库格曼,路德维希(Kugelmann, Ludwig 1830—1902)——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医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一国际会员。参加过德国一八四八年革命。曾帮助马克思出版和传播《资本论》。1862—1874年经常和马克思通信,反映德国的情况。——第220、303页。
- 库图佐夫,伊万·伊万诺维奇(Кутузов, 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1885—1943)——191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1917年二月革命后任莫斯科苏维埃委员、莫斯科纺织工会主席。1918年任纺织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1920年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20—1921年追随“工人反对派”。以后任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俄共(布)党团委员会委员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委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国家信贷和储蓄事业促进委员会主席。——第428页。
- L
- 拉德津(Радзин)——1923年联共(布)党内争论时在《真理报》上发表《党的新任务》短文的作者。——第155页。
- 拉狄克,卡尔·伯恩哈多维奇(Радек, Карл Бернгардович 1885—1939)——1903年起参加加里西亚,波兰和德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国际主义立场,但表现向中派动摇。191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十月革命后在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曾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在俄共(布)第八次至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委员。1926年任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1918年为“左派共产主义者”,1923年起为托洛茨基派骨干分子,1926年参加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党联盟。1927年被开除出党,1930年恢复党籍,1936年再次被开除出党。——第282、292页。
- 拉法格,保尔(Lafargue, Paul 1842—1911)——法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和政论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和战友,马克思的女儿劳拉的丈夫。1866年加入第一国际,任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71年巴黎公社时期曾领导波尔多无产阶级保卫公社。公社失败后流亡西班牙和葡萄牙,参加建立西班牙和葡萄牙国际支部,积极反对巴枯宁主义。1879年和盖得等人创建法国工人党。1891年当选众议员。写过许多著作,宣传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反对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第165、618页。
- 拉法伊尔(Рафаил 生于1893年)(真名法布曼,尔·勃·Фарбман, Р. Б.)——1910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0年任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后任莫斯科国民教育局局长。1930年起任矿产贸易股份公司管理局副局长和人事处处长。1920—1921年是“民主集中派”分子,1927年是托洛茨基派

- 骨干分子。1927年被开除出党,1932年恢复党籍,1933年再次被开除出党。——第156、158—160页。
- 拉费斯·莫伊塞·格里哥里也维奇 (Рафес, Моисей Григорьевич 1883—1942)——1899年起参加俄国革命运动,1903年加入崩得,1912—1919年为崩得中央委员。1917年二月革命后为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1919年夏加入俄共(布)。国内战争期间任红军政委,后在共产国际中央机关工作,曾是共产国际书记处鼓动宣传部负责人。——第483、491、493页。
- 拉萨尔,斐迪南 (Lassalle, Ferdinand 1825—1864)——德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德国工人运动中一种机会主义——拉萨尔主义的创始人。1848—1849年参加莱茵省的民主运动。1863年参加创建全德工人联合会,任主席。在担任联合会主席期间推行机会主义路线,主张通过争取普选权和建立由国家资助的工人生产合作社来解放工人。诬蔑农民是“反动的一帮”,反对工农联盟,宣扬铁的工资规律。与俾斯麦暗中勾结并支持其在普鲁士的霸权下“自上”统一德国的政策。1864年8月死于决斗。——第132、135、500页。
- 拉辛,斯切潘·季莫费也维奇 (Разин, Степан Тимофеевич 1630左—1671)——俄国农民起义领袖,顿河哥萨克。1667年春组织哥萨克远征伏尔加河下游和里海地区。1670年春又组织一次远征。在阿斯特拉罕起事后,溯伏尔加河北上,所到之处群起响应,形成了一支庞大的农民起义队伍。这次农民战争席卷了俄国广大地区。起义失败后,率残部返回顿河流域。1671年4月被叛徒缚送沙皇政府,同年6月在莫斯科就义。——第477页。
- 勒维,保尔 (Levi, Paul 1883—1930)——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律师。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属社会民主党左翼,大战期间是斯巴达克联盟成员。1919年参加创建德国共产党,并被选为中央委员。1920年当选议员。在德共党内持右倾机会主义立场,1921年2月退出德共中央委员会,4月被开除出党。1922年又回到社会民主党。——第535、624页。
- 雷梅勒,赫尔曼 (Remmele; Hermann 1880—1939)——德国共产党领导人之一。1897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是青年工人运动的发起人之一。1917年参加创建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1920年随独立社会民主党左翼转入德国共产党。1920—1933年任德共中央委员,后任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1924年2—4月任德国共产党主席。1920—1933年为议员。1926年起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32年退出书记处。同年8月移居莫斯科。——第558页。
- 里泽 (Riese)——出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的德国代表。德国共产党内的反对派分子。——第590页。
- 李伯尔,米哈伊尔·伊萨科维奇 (Либер, Михаил Исаакович 1880—1937)(真姓戈尔德曼 Гольдман)——俄国崩得领袖之一。1902年起为崩得中央委员会委员。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是反火星派分子,会后成为孟什维克。1907年当选中央委员。斯托雷平反动时期是取消派分子,1912年是反党的八月联盟的骨干分子。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社会沙文主义者。1917年二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

- 委员和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敌视十月革命。——第 294 页。
- 李卜克内西, 卡尔 (Liebknecht, Karl 1871—1919)——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 德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 威·李卜克内西的儿子。1900 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 积极反对机会主义和军国主义, 后为该党左派领导人之一、社会主义青年国际创建人之一。1912 年当选议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国际主义者。1914 年 12 月 2 日在帝国国会中只有他一人投票反对军事拨款。参加创建和领导斯巴达克联盟。1918 年参加领导德国十一月革命。1919 年 1 月领导柏林工人起义, 起义失败后被诺斯克匪帮杀害。——第 132 页。
- 李卜克内西, 威廉 (Liebknecht, Wilhelm 1826—1900)——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创建人和领袖之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参加过德国一八四八年革命, 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第一国际会员。1867 年起为议员。1869 年同倍倍尔共同创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 (爱森纳赫派), 曾进行反对拉萨尔派的斗争。1868—1900 年先后任《民主周刊》、《人民国家报》和《前进报》编辑。1870—1871 年普法战争期间持国际主义立场, 捍卫巴黎公社。1889 年参加第二国际的创建工作, 积极反对军国主义。——第 57、165 页。
- 李沃夫, 格奥尔基·叶甫盖尼也维奇 (Львов, Георгий Евгеньевич 1861—1925)——俄国立宪民主党人, 大地主, 公爵。1906 年当选第一届国家杜马代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任全俄地方自治机关联合会主席, 后为地方自治机关和城市联合会领导人之一。1917 年 3—7 月任临时政府总理。十月革命后流亡法国, 参加策划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第 119 页。
- 列宁 (乌里杨诺夫),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Ленин [Ульянов], Владимир Ильич 1870—1924)——第 20、22—24、28—34、36、37、39—44、46、49—54、56、57、129—136、137、138、142、161、162、167、169—173、174—183、184—186、188、190—192、194—201、203、204、206—219、221—225、232、234—236、240—242、244—247、251—253、255—259、262—265、267—274、278、280—291、294、298、302—308、309、310、317、322、324、325、331、334、335、388—344、347、348、351、352、357、358、361、374、375、378、381、382、384、385、387—389、395—409、411、413—434、436、438、439、441、442、444、448、450、452—457、460、464、470、476、483、486、489、498、499、502、505—507、511、512、516—525、529、537、540、543—546、548—551、555—557、560—562、566—570、572、573、575、577—587、589、592、602、605、608、609、610—616、624 页。
- 列诺得尔, 比埃尔 (Renaudel, Pierre 1871—1935)——法国社会党改良主义领袖之一。1906—1915 年任法国社会党机关报《人道报》编辑, 1915—1918 年任该报社长。1914—1919 和 1924—1935 年为众议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社会沙文主义者。反对社会党参加共产国际, 主张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1927 年辞去社会党的领导职务。

- 1933年被开除出党。——第240页。
- 龙格,让(Longuet, Jean 1876—1938)——法国社会党和第二国际领袖之一,马克思的外孙。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中派立场。1916年参加创办《人民报》。反对法国社会党加入共产国际。1920年起为法国社会党中派领袖之一。三十年代主张社会党和共产党人联合反对法西斯主义,参加了反法西斯和反战的国际组织。——第401、624页。
- 卢森堡,罗莎(Luxemburg, Rosa 1871—1919)——德国和波兰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左翼领袖之一,德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生于波兰。1893年参加创建和领导波兰社会民主党。1898年移居德国,积极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工作,对伯恩斯坦主义和米勒兰主义进行了斗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国际主义者,参加创建和领导斯巴达克联盟。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后参加并领导了德国共产党成立大会。1919年1月被诺斯克匪帮杀害。——第132、292页。
- 路特希尔德家族(Rothschild)——德国金融资本家族,创始人是迈尔·阿姆施尔·路特希尔德(Meyer Amschel Rothschild 1743—1812)。这个家族靠发战争财和金融投机起家,先后在巴黎、伦敦、维也纳等地设立银行,控制法、英、奥等国的许多铁路、保险公司以及电气、化工、石油、钢铁等企业,逐步发展成一个规模巨大、联系广泛的银行集团。——第220页。
- 伦纳,卡尔(Renner, Karl 1870—1950) (笔名施普林格,鲁道夫SPringer, Rudolf)——奥地利政治家,奥地利社会民主主义右翼领袖,“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民族文化自治”理论的炮制者之一。1907年起为议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社会沙文主义者。1919—1920年任奥地利首相,1931—1933年任议长。1945年为临时政府首脑,1945—1950年任奥地利共和国总统。——第65、78、80、81、83—86、88、89、94、97、125页。
- 罗曼诺夫,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Романов, 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78—1918)——俄国末代皇帝尼古拉二世的弟弟。——第553页。
- 罗森霍尔茨,阿尔卡季·巴甫洛维奇(Романов, 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89—1938)——190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期间任莫斯科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国内战争期间是一些集团军和战线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后担任军事、外交和苏维埃工作。1927年起先后当选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中央候补委员、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等职。1920—1921年工会问题争论期间支持托洛茨基纲领。1937年被开除出党。——第164页。
- 洛克菲勒家族(Rockefeller)——美国金融和工业资本家族,创始人是约翰·戴维逊·洛克菲勒(John Davison Rockefeller 1839—1937)。1870年创办美孚油公司,此后逐步发展成以石油工业为主的大垄断集团,拥有大金融机构和许多大企业,对美国的内外政策有重大影响。——第220页。

M

马尔丁诺夫,亚历山大·萨莫伊洛维奇

- (Мартинов, Александр Самойлович 1865—1935)(真姓皮凯尔 Пикер)——俄国经济派领袖之一,孟什维克,晚年是俄共(布)党员。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参加民意党。1889年被捕流放,成为社会党人。1900年侨居国外,任经济派的《工人事业》杂志编辑,反对列宁的《火星报》。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是反火星派分子,会后成为孟什维克。斯托雷平反动时期是取消派分子。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中派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是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十月革命后脱离孟什维克。1918—1922年在乌克兰做教员。1923年加入俄国共产党(布)。1924年起为《共产国际》杂志编委。——第27、51、110页。
- 马尔托夫,尔·(Мартов, Л. 1873—1923)(真名策杰尔包姆,尤利·奥西波维奇 Чедербаум, Юлий Осипович)——俄国孟什维克领袖之一。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895年参加创建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参加筹办和编辑《火星报》和《曙光》杂志。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领导机会主义少数派,会后成为孟什维克领袖。孟什维克中央机关的领导成员和孟什维克报刊的编辑。斯托雷平反动时期是取消派分子,参加组织反党的八月联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中派分子。1917年二月革命后领导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集团。十月革命后反对苏维埃政权。1919年当选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19—1920年为莫斯科苏维埃代表。1920年流亡德国,是第二国际的组织者之一。在柏林出版孟什维克杂志《社会主义通报》。——第20—23、29、30、36、50、52—54、56、103、175、177、264、265、271、401、498、505、550页。
- 马克思,卡尔(Marx, Karl 1818—1883)——第2、33—35、38、42、43、46—48、57、76、89、91、129、130、140、165、166、185、186、190—193、195、198、199、202、211、212、217、220、221、239、246、251、259、303、304、396、401、409、500、560—566、568—571、575、581、610—616页。
- 马斯洛夫,阿尔卡季(Маслов, Аркадий 1891—1941)(真名切美林斯基,伊萨克 Чемеринский, Исаак)——德国共产党极左派领袖之一。1924年4月以他和费舍为首的教条主义宗派集团掌握了德共中央的领导权,阻挠党在革命低潮时实行新的斗争策略,反对统一战线和群众工作。1925年秋被解除领导职务,1926年被开除出党。后退出政治活动。——第540、607页。
- 麦达姆(格林贝格),弗拉基米尔·达维多维奇(Медем [Гринберг], Владимир Давидович 1879—1923)(戈尔德勃拉特 Гольдблат)——俄国崩得领袖之一。1900年加入明斯克崩得组织。1901年从流放地逃往国外。1903年起为崩得国外委员会委员。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是反火星派分子。1906年当选崩得中央委员。1907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支持孟什维克。十月革命后为波兰崩得组织的领袖。1921年到美国,在犹太右翼社会党人的《前进报》上发表反对苏维埃俄国的文章。——第79、94、99、100、110页。
- 麦克唐纳,詹姆斯·拉姆赛(Macdonald,

- James Ramsay 1866—1937) —— 英国政治家,工党领袖之一。1886年加入费边社。1894年加入独立工党。1900—1912年任工党主席、书记,推行机会主义政策,鼓吹阶级合作。1912—1924年任工党司库。1906年首次当选议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和平主义立场。1924年任第一届工党政府首相,1929—1931年任第二届工党政府首相。1931—1935年主持由保守党决策的所谓“国民内阁”。——第218、349、401、489页。
- 梅涅尼·阿格利巴 (Menenius Agrippa 死于公元前493年) —— 罗马贵族。据传说,公元前五世纪初罗马平民为抗议贵族压迫开展撤离运动时,他曾用人体的各部和胃彼此不能离开的寓言劝说撤离的平民返回罗马。——第619页。
- 米夫,巴维尔·亚历山大罗维奇 (Миф, Паве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901—1939) (真名福尔图斯,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 Фортус, 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 191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1925年任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1927年起任校长。1928年3月起任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1929年起领导苏联的中国研究所。1936年任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校长,1937年任苏联民族殖民地问题研究所所长。——第483、484、488—490、494页。
- 米留可夫,巴维尔·尼古拉也维奇 (Милоков, Павел Николаевич 1859—1943) —— 俄国立宪民主党领袖,历史学家和政论家。1905年10月参加创建立宪民主党,后任该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央机关报《言语报》主编。1907年起先后当选第三届和第四届国家杜马代表。1917年二月革命后任临时政府外交部长,推行把战争进行到底的帝国主义政策。1917年8月参加策划科尔尼洛夫叛乱。十月革命后在外国帝国主义的支持下阴谋策划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后逃亡国外。——第119—121、361、535、550页。
- 摩根,约翰·皮尔庞特 (Морган, John Pierpont 1867—1943) —— 美国金融寡头,大垄断资本家,老摩根(约翰·皮尔庞特·摩根 1837—1913)之子。——第314页。
- 摩根家族 (Morgan) —— 美国金融资本家族,创始人是朱尼乌斯·斯潘塞·摩根和约翰·皮尔庞特·摩根(老摩根)。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在英国创办汇兑所,将英国资本大量输入美国。二十世纪初组织许多托拉斯,建立垄断地位。势力遍及大银行、大保险公司、铁路公司、军火工业、航空工业和电机工业等等。对美国的内外政策有重大影响。——第220页。
- 莫洛托夫,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 (Молотов, Вячеслав Михайлович 生于1890年) (真姓斯克里亚宾 Скрыбин) —— 苏联共产党和国家的著名活动家。1906年入党。1912年在《明星报》工作,后任《真理报》编委和秘书。1917年二月革命后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俄国局委员。1919年起任下新城省执行委员会主席、俄共(布)顿涅茨省委员会书记。1920年当选中央候补委员,1921年当选中央委员。1921—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30—1941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1941—1957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并几度兼任外交人民委员(部长)。1926—1952年为联

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52—1957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1957—1960年任驻蒙古大使。——第532页。

穆迪瓦尼, 波利卡尔普·古尔格诺维奇 (Мудивани, Поликарл Гургенович 1877—1937) —— 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8年底至1920年3月任第十一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和第十一集团军政治部主任。1920—1921年任俄共(布)中央高加索局委员。1921年任俄罗斯联邦驻土耳其外交代表,同年6月任格鲁吉亚革命委员会主席。1924年任苏联驻法国商务代表。1931—1936年历任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轻工业人民委员、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1928年因追随托洛茨基派被开除出党,1931年恢复党籍,1936年再次被开除出党。——第544页。

N

尼古拉二世 (Николай 1868—1918) (罗曼诺夫, 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 Романов, 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 俄国末代沙皇(1894—1917年)。——第244页。

诺某, 即饶尔丹尼亚, 诺·尼·——见阿恩。

诺斯克, 古斯塔夫 (Noske, Gustav 1868—1946) —— 德国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领袖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社会沙文主义者。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期间参与镇压柏林工人和水兵的起义,是镇压德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罪魁之一,是杀害卡·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策划者。1919—1920年任陆军部长。由于庇护卡普叛乱,被迫下台。后

任普鲁士汉诺威省省长。——第132、218页。

O

欧文, 罗伯特 (Owen, Robert 1771—1858) —— 英国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第1页。

P

帕尔乌斯, 亚历山大·拉扎列维奇 (Парус, Александр Лазаревич 1869—1924)(真姓格尔方德 Гельфанд) —— 俄国孟什维克,生于俄国。1886年侨居瑞士,后移居德国。九十年代末起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工作,接近该党左翼。二十世纪初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工作。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成为孟什维克。1905年回到俄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的炮制者之一。斯托雷平反动时期退出社会民主党。后移居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沙文主义者和德国帝国主义的走卒,贩卖军火发了战争财。1915年起在柏林出版反动的《钟声》杂志。——第292、378页。

帕宁, 马· (Панин, М. 生于1876年) (真名马卡久勃, 马尔克·萨乌洛维奇 Макадзюб, Марк Саулович) —— 俄国孟什维克。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是火星报少数派分子。1905年5月被选入孟什维克组织委员会(即孟什维克中央)。斯托雷平反动时期是取消派分子。1917年二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十月革命后退出政治活动。——第83页。

- 彭加勒, 雷蒙 (Poincaré, Raymond 1860—1934) —— 法国政治家, 律师。1887—1903年为众议员, 1893年起多次参加法国政府。1912—1913年任总理, 1913—1920年任总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坚持把战争进行到底。俄国十月革命后是外国武装干涉苏维埃俄国的策划者之一。1922—1924和1926—1929年任总理, 力主分割德国(1923年占领鲁尔区), 企图建立法国在欧洲的霸权。——第244页。
- 皮达可夫, 格奥尔基·列昂尼多维奇 (Пятаков, Георгий Леонидович 1890—1937) —— 1910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曾在乌克兰和国外做党的工作。1917年二月革命后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基辅委员会主席, 反对党的社会主义革命方针。十月革命后任乌克兰临时工农政府主席, 1918年领导乌克兰“左派共产主义者”。1920年起历任中央顿巴斯煤炭工业管理局局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等职。1920—1921年工会问题争论期间支持托洛茨基纲领。1923年起是托洛茨基派骨干分子。1927年被开除出党, 1928年恢复党籍, 1936年再次被开除出党。——第156、162、164页。
- 皮尔尼亚克, 波里斯·安德列也维奇 (Пильняк, Борис Андреевич 1894—1937) (真姓沃高 Boray) —— 苏联作家。——第274页。
- 蒲鲁东, 比埃尔·约瑟夫 (Proudhon, Pierre-Joseph 1809—1865) —— 法国政论家, 庸俗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 小资产阶级思想家, 无政府主义创始人之一。一八四八年革命期间当选制宪会议员。——第34页。
- 普加乔夫, 叶梅利扬·伊万诺维奇 (Пугачев, Емельян Иванович 1742左右—1775) —— 俄国农民起义领袖, 顿河哥萨克。1773年8月, 自称遇救的彼得三世皇帝, 在亚伊茨基地区的哥萨克村落发动哥萨克起事。这次农民战争席卷了俄国的广大地区。1774年8月起义军失败后, 率残部退到外伏尔加草原地带, 9月被叛徒缚送沙皇政府, 次年1月在莫斯科就义。——第477页。
-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 叶甫盖尼·阿列克谢也维奇 (Преображенский, Евгений Алексеевич 1886—1937) —— 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7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反对党的社会主义革命方针。十月革命期间是乌拉尔区域党的领导人, 国内战争期间任第三集团军政治部主任。1918年是“左派共产主义者”。1920年当选中央委员, 后任中央委员会书记。1920—1921年工会问题争论期间支持托洛茨基纲领。1921年起先后任党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财政委员会主席、教育人民委员部职业教育总局局长。1923年起是托洛茨基派骨干分子。1927年被开除出党, 1929年恢复党籍, 后来再次被开除出党。——第156、158、161—163页。
- 普列汉诺夫, 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 (Плеханов, Георгий Валентинович 1856—1918) —— 俄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 俄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 后来成为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领袖之一。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参加民粹派运动, 是民粹派组织土地和自由社成员及土地平分社领导人之一。1883年创建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

义团体——劳动解放社，翻译和介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著作，对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起了重大作用；写过不少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批判了民粹派、“合法马克思主义”、经济派、马赫主义。二十世纪初与列宁一起编辑《火星报》和《曙光》杂志。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逐渐转向孟什维克。一九一五年革命时期反对列宁的民主革命的策略。后来在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之间摇摆。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反对取消主义，领导了孟什维克护党派。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反对布尔什维克党的社会主义革命方针。——第29、30、49—54、98、135、175、177、179、199、201、498页。

Q

乔治五世(George V 1865—1936)——英国国王(1910—1936年)。——第244页。

切尔诺夫，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Чернов, Викт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1873—1952)——俄国社会革命党的领袖和理论家之一。1902—1905年任社会革命党中央机关报《革命俄国报》编辑。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17年5—8月任临时政府农业部长。1918年1月任立宪会议主席，同年夏领导乌法立宪会议委员会，参加策划反苏维埃叛乱。1920年逃亡国外，继续进行反苏维埃政权活动。——第240、294、401、550页。

邱吉尔，温斯顿(Churchill, Winston 1874—1965)——英国政治家，保守党领袖。1906—1917年历任副殖民大臣、

贸易大臣、内政大臣、海军大臣和军需大臣。1918—1921年任陆军和空军大臣，是武装干涉苏维埃俄国的策划者之一。1921—1922年任殖民大臣。1924—1929年任财政大臣。1939年任海军大臣。1940—1945年任联合政府首相，1940—1955年为保守党领袖。1951—1955年任首相。1955年辞去首相和保守党领袖的职务，从事著述。——第328页。

S

萨波托茨基，安托宁(Z Potocky Antoň

1884—1957)——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和国家的活动家，作家。1902年加入社会民主党，1919年起是社会民主党革命派(马克思主义左派)的领导人之一。参加创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1921年5月当选中央委员，1922年任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29—1939年任捷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红色工会总书记。1939—1945年被希特勒分子监禁。1945—1950年任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1945年起任捷共中央主席团(1945—1954年称政治局)委员。1948年6月—1953年3月任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政府总理，1953年3月起任总统。——第377、378页。

萨普龙诺夫，季莫菲·弗拉基米罗维奇(Сапронов, Тимофе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1887—1939)——1912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十月革命后历任莫斯科省执行委员会主席、俄共(布)中央乌拉尔局书记、国家建筑工程委员会主席、小人民委员会主席、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等职。1922年当选中央委员。1918年是“左派共产主义者”，1920—

- 1921年工会问题争论期间组织和领导“民主集中派”，1923年在托洛茨基的四十六人声明上签名，1925—1927年是“新反对派”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党联盟的骨干分子，以及十五人集团（民主集中派）的领袖。1927年被开除出党，后来恢复党籍，1932年再次被开除出党。——第156、163—165页。
- 施普林格，鲁道夫——见伦纳，卡·。
- 施特拉塞尔，约瑟夫（trasser, Josef 1871—1933）——早期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左派分子。1912年出版了一本反对机会主义的小册子《工人和民族》。1918年加入奥地利共产党。1919—1924年多次担任《红旗报》编辑。后转向机会主义，支持保·勒维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1931年退党。——第72、116页。
- 什麦拉里，鲍胡米尔（Smeral, Bohumir 1880—1941）——捷克斯洛伐克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创建人之一。1897年加入社会民主党，是该党领导人之一，中央机关报《人民权利报》编委。1921年参加创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当选中央委员。1922—1935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第376—378页。
- 什维尔尼克，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Щверник, Николай Михайлович 1888—1970）——苏联共产党和国家的活动家。1905年入党。十月革命后历任萨马拉市苏维埃主席、东线和南线政治委员、俄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和俄罗斯联邦工农检查人民委员、联共（布）列宁格勒省委书记和中央西北局书记等职。1926—192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27—1928年任联共（布）乌拉尔省委委员会书记。1930年后历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第一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第一副主席和主席、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苏共中央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等职。1925年起先后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第459页。
- 斯塔罗维尔——见波特列索夫，亚·尼·。
- 斯汀尼斯家族（Stinnes）——德国垄断资本家族，创始人是胡果·斯汀尼斯（Hugo Sinnes 1870—1924）。1893年创办采矿工业企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从事军工生产，发了战争财。战后低价收买了一千五百多家工业企业，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康采恩。——第220页。
- 斯土柯夫，英诺森·尼古拉也维奇（Стуков, Иннокентий Николаевич 1887—1936）——190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7年二月革命后历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堡委员会委员、莫斯科区域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会委员。十月革命后历任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鼓动宣传部部长、莫斯科工人出版社责任编辑等职。1918年是“左派共产主义者”。1920—1921年参加“民主集中派”。1927年参加托洛茨基派。后来从事军事、党务和经济工作。——第156、162页。
- 斯托雷平，彼得·阿尔卡季也维奇（Столыпин, Петр Аркадьевич 1862—1911）——俄国官僚，大地主。1906—1911年任大臣会议主席兼内务大臣。1907年发动“六三政变”，解散第二届国家杜马，颁布新选举法，开始了“斯

- 托雷平反动时期”(1907—1910年),残酷镇压革命运动。颁布新土地法,培植富农作为沙皇专制制度在农村中的支柱。企图实行某些改革来维护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利益,巩固专制制度。1911年被社会革命党人刺死。——第179页。
- 司徒卢威,彼得·伯恩哈多维奇(Струве, Петр Бернгардович 1870—1944)——俄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哲学家和政治家,立宪民主党领袖之一。十九世纪九十年代鼓吹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要适应资产阶级的利益,是“合法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二十世纪初投靠资产阶级自由派阵营。1902年起编辑自由资产阶级的《解放》杂志,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组织“解放社”的理论家和组织者。1905年后成为立宪民主党的领袖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鼓吹俄国帝国主义向外侵略。十月革命后敌视苏维埃政权,参加邓尼金和弗兰格勒的反革命叛乱。后流亡国外。——第33、34、304页。
- 苏汉诺夫,尼·(Суханов, Н. 1882—1940)(真名吉姆美尔,尼古拉·尼古拉也维奇 Гиммер, 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俄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早期是民粹派分子,1903年起是社会革命党人,1917年起是孟什维克。曾为《俄国财富》、《同时代人》杂志撰稿。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国际主义者。1917年二月革命后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是《新生活报》编辑之一。任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十月革命后在苏维埃经济机关工作。1920年以前属于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1922—1923年发表《革命札记》,宣扬俄国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前提。1931年因参加孟什维克地下组织而被判刑。——第441、442、599、600页。
- 苏瓦林,波里斯(Souvarine, Boris 1895—1968)——法国社会党人,记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中派分子。1921年加入法国共产党。1924年因进行托派活动被开除出党。后来是法国托派领袖之一。1929年同托洛茨基主义决裂,后退出政治活动。——第533、538、540、545、607页。
- 孙传芳(1885—1935)——北洋直系军阀。1921年后历任师长、福建军务督理、闽浙巡阅使兼浙江军务督理、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等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镇压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其军队主力于1926年在江西被国民革命军打垮。后投奔奉系军阀张作霖,继续在江苏、山东同蒋介石、冯玉祥作战。1928年败退到河北滦州一带,残部被阎锡山收编。——第485、487页。
- 索凌,弗拉基米尔·哥尔杰也维奇(Сорин, Владимир Гордеевич 1893—1944)——191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1918年任谢尔普霍夫县委员会书记,是“左派共产主义者”。1918年后历任东方战线革命法庭庭长、俄共(布)莫斯科省委员会委员、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会委员。1924年起先后在俄共(布)中央列宁研究院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工作。——第415、429、430页。

T

谭平山(1886—1956)——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是1920年成立的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发起人之一,1927年前是中国共

- 产党党员，曾出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和武汉国民政府委员、国民政府农民部部长。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参加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农工民主党的前身)。1948年参加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监察委员会主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483、491、494页。
- 坦纳，杰克 (Tanner, Jack 生于1890年)——英国工联领袖之一。1918年起为机器制造工人、造船工人、五金工人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1920年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同年加入英国共产党，1921年后追随工党。1939—1954年任机器制造工人联合会主席。从四十年代末起为英国工联右翼分子，持反共立场。——第415、431页。
- 唐恩，费多尔·伊里奇 (Дан, Федор Ильич 1871—1947) (真姓古尔维奇 Гурвич)——俄国孟什维克领袖之一。1894年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加入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903年成为孟什维克领袖之一。斯托雷平反动时期是取消派领袖。取消派的《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编辑。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社会沙文主义者。1917年二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和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支持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反对苏维埃政权。1922年初被驱逐出俄国，在柏林领导孟什维克进行反革命活动。1923年参加创建社会主义工人国际。1941—1947年在美国出版孟什维克流亡者刊物《新路》杂志。——第240、271、294、535页。
- 梯什卡，扬 (Tyszka, Jan 1867—1919) (真名约吉希斯，利奥 Jogiches, Leo)——波兰和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1893年参加创建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为总执行委员会委员。积极参加俄国一九一五年革命。1907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候补委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国际主义者。1916—1918年被捕入狱。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时获释，后参加创建德国共产党，被选为中央委员会书记。1919年3月被逮捕，处死于狱中。——第129页。
- 屠拉梯，菲利浦 (Turati, Filippo 1857—1932)——意大利工人运动活动家，意大利社会党创建人之一，该党右翼领袖。1896年起为议员，领导议会中的社会改良派。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中派立场。敌视俄国十月革命。1922年意大利社会党分裂后，成为改良主义的统一社会党领袖。1926年流亡法国。——第401页。
- 托洛茨基，列夫·达维多维奇 (Троцкий, Лев Давидович 1879—1940) (真姓勃朗施坦 Броцтейн)——189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是火星报少数派分子，会后同孟什维克一起反对布尔什维克。1905年同帕尔乌斯一起提出和鼓吹反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斯托雷平反动时期以调和派面貌出现，实际上持取消派立场。1912年组织反党的八月联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中派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参加区联派，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随区联派集

体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被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十月革命后历任外交人民委员、陆海军人民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1918年反对签订布列斯特和约。1920—1921年挑起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列宁逝世后进行反党派别活动。1925年被解除陆海军人民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科学技术委员会主席和租让总委员会主席。1926年与季诺维也夫结成反党联盟,1927年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被开除出党。1929年被驱逐出境。在国外继续进行反对苏联党和国家的活动。死于墨西哥。——第155、156、165—168、278、279、281—284、286—293、298、302、303、337、338、340、344、388、389、443、505、506、516—521、523—528、532、543—546、551—554、557—559、574、583—587、589—594、596—599、602、604—606页。

托马斯,詹姆斯·亨利(Thomas, James Henry 1874—1949)——英国政治家和工会活动家,工党领袖之一。1917—1931年任全国铁路员工联合会总书记。1910—1936年为议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社会沙文主义者。1920—1924年任改良主义的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主席。1921年起多次被选进英国工联总理事会。在1924—1931年的几届工党政府中任殖民大臣、掌玺大臣、就业大臣、自治领大臣等职,1931—1936年在保守党政府中任自治领大臣和殖民大臣。——第508页。

W

瓦涅克,卡尔(Vaněk, Karel)——捷克

社会民主党人,奥地利议会议员。公开持沙文主义和分离主义立场,是捷克分离主义者领袖之一。——第101页。

威廉二世(Welhelm 1859—1941)——德国皇帝和普鲁士国王(1888—1918年)。——第244页。

韦尔斯,奥托(Wels, Otto 1873—1939)——德国右翼社会民主党人。1912年起为议员。1913年被选入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护国派分子,支持德国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后积极策划反革命活动,1919年初参与镇压柏林工人和水兵的起义。1922年被选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之一。1931年起是该党的正式领袖。曾任第二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第314、624页。

维特,谢尔盖·尤利也维奇(Витте, Сергей Юльевич 1849—1915)——俄国官僚。1892年2—8月任交通大臣,1892—1903年任财政大臣,1903年8月起任大臣委员会主席,1905年10月—1906年4月任大臣会议主席,是镇压一九〇五年革命的刽子手。——第137页。

魏特林,威廉(Weitling, Wilhelm 1808—1871)——德国早期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理论家。1836年在巴黎加入正义者同盟。1841—1843年在瑞士宣传平均共产主义思想。1842年出版主要著作《和谐与自由的保证》。1846年加入布鲁塞耳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1846年流亡美国。德国一八四八年革命爆发后回国,1849年底再次流亡美国,后退出工人运动。——第34页。

乌斯特里亚洛夫,尼古拉·瓦西里也维奇(Устрялов, Николай Васильевич

1890—1938)——俄国法学家,政论家,立宪民主党著名活动家,路标转换派思想家。1913年起在莫斯科大学和彼尔姆大学任教。1916—1918年为《俄国思想》杂志和《俄国晨报》撰稿。1918年任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东方部主任。高尔察克匪帮被粉碎后,逃往哈尔滨。1921—1922年为《路标转换》文集和杂志撰稿。1935年回国。1937年6月被捕和判刑。——第547—550页。

吴佩孚(1874—1939)——北洋直系军阀。曾任陆军第三师代师长、直鲁豫巡阅副使、两湖巡阅使。1922年战胜奉系军阀后成为北洋军阀首要人物,受到英美帝国主义的有力扶持。1923年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是制造二七惨案的罪魁祸首。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战败逃走,后又勾结奉系军阀进攻冯玉祥国民军。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其军队主力在湖北被国民革命军击败,残部在豫南被彻底消灭。——第485、487页。

X

希尔奎特,莫里斯(Hillquit, Morris 1869—1933)——美国社会党创建人之一,律师。1888年加入社会主义工人党。反对党内革命派,于1901年创建改良主义的社会党。1904年起为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委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社会沙文主义者。敌视俄国十月革命,反对共产主义运动。——第401页

希法亭,鲁道夫(Hilferding, Rudolf 1877—1941)——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领袖之一,“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1907—1915年任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编辑。1910年发

表《金融资本》一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中派分子,1917年成为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员。战后公开修正马克思主义,提出“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理论。1924年起为议员。1923和1928—1929年任魏玛共和国政府财政部长。法西斯上台后,流亡法国。——第401页。

谢德曼,菲利浦(Scheidemann, Philipp 1865—1939)——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之一。1903年起参加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1911年起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委员。1913年起是该党主要领导人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社会沙文主义者。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期间参与镇压柏林工人和水兵的起义,是镇压1918—1921年德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罪魁之一。1919年2—6月任魏玛共和国联合政府总理。——第132、218、240页。

辛格尔,保尔(Singer, Paul 1844—1911)——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之一,第二国际中马克思主义派的著名活动家。1878年加入社会民主党。1887年起任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委员,1890年起任执行委员会主席。1884—1911年是议员和社会民主党党团主席。1900年起是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委员。——第165页。

兴登堡,保尔(Hindenburg, Paul 1847—1934)——德国政治家,元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东线德军司令、总参谋长等职。1918年参加镇压德国十一月革命。1925—1933年任魏玛共和国总统。1933年授命希特勒组织政府,从而把全部政权交到法西斯分子手中。——第327页。

Y

- 雅柯夫列夫, 雅柯夫·阿尔卡季也维奇 (Яковлев, Яков Аркадьевич 1938)(真姓爱泼斯坦 Эпштейн)——191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曾在彼得格勒等地做党的工作。十月革命后先后在哈尔科夫、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基辅等地担任党和苏维埃的领导工作。1918—1920年为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政治局委员,领导乌克兰地区的地下工作。1920年后历任政治教育总委员会会务委员、俄共(布)中央鼓动宣传部副部长、副工农检查人民委员、农业人民委员、联共(布)中央农业部长等职。1924年后当选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和中央委员。——第440、442、443页。
- 雅罗斯拉夫斯基, 叶梅利扬·米哈伊洛维奇 (Ярославский, Емельян Михайлович 1878—1943)——苏联共产党的活动家、历史学家和政论家。1898年入党。十月革命期间任莫斯科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是莫斯科武装起义的领导人之一。1918年任莫斯科军区政治委员。1919—1922年任彼尔姆省委员会主席、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委员,1921年任党中央委员会书记,1923—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曾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列宁研究院院务委员。1919年起先后当选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中央监察委员。——第552页。
- 亚格洛, 叶甫盖尼·约瑟佛维奇 (Ягелло [Jagiello], Евгений Посифович 生于1873年)——波兰工人运动活动家,波兰社会党(左派)党员。1912年当选第四届国家杜马代表,参加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参加波兰工人运动左翼,后退出政治活动。——第117页。
- 叶夫多基莫夫, 格里哥里·叶列梅也维奇 (Евдокимов, Григорий Еремеевич 1884—1936)——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曾任第七集团军政治部主任。1919年起为俄共(布)中央委员。1922年起任彼得格勒工会理事会主席、彼得格勒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25年任俄共(布)列宁格勒省委书记,是“新反对派”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党联盟的骨干分子。1927年被开除出党。——第459页。
- 叶哥罗夫(Егоров 生于1873年)(真名列文, 叶弗列姆·雅柯夫列维奇 Левин, Ефрем Яковлевич)——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南方工人社领导人之一。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参加哈尔科夫社会民主党人小组。参加过《南方工人报》编辑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持中派立场,会后成为孟什维克。同年9月在哈尔科夫被捕,后来退出政治活动。——第110页。
- 伊里奇——见列宁, 弗·伊·。
- 伊万雷帝 (Иван Грозный 1530—1584)(即伊万四世·瓦西里也维奇 Иван IV Васильевич)——莫斯科和全俄罗斯大公(1533—1584年),第一个俄国沙皇(1547—1584年)。——第462页。
- 尤登尼奇, 尼古拉·尼古拉也维奇 (Юденич, 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1862—1933)——沙俄将军。1917年任高加索战线总司令。十月革命后是反革命的“西北政府”成员、白匪西北军总司令。在外国帝国主义支持下,1919年两次进攻彼得格勒,失败后退出爱沙尼亚。

1920年流亡英国。——第485页。

Z

张伯伦, 奥斯汀 (Chamberlain, Austen 1863—1937) ——英国政治家, 保守党人。1892年当选下院议员。1903—1906和1919—1921年任财政大臣, 1915—1917年任印度事务大臣, 1924—1929年任外交大臣, 是1925年《洛迦诺公约》的炮制者。——第349页。

张学良(生于1901年)——奉系军阀张作霖的长子。初为奉系将领, 1928年继张作霖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 后历任南京国民党政府的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等职。1936年春接受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同红军成立协定。同年12月12日联合杨虎城将军发动了逼蒋介石抗日的西安事变。后被蒋介石软禁。——第495页。

张宗昌(1881—1932)——军阀。1924年后任宣抚军第一军军长、山东军务督办。北伐战争期间率军两次南下支援直系军阀孙传芳。1928年5月在蒋介石、冯玉祥联合进攻下退出山东, 9月所部在河北滦州地区被收编。——第485

页。

张作霖(1875—1928)——北洋奉系军阀。1911年辛亥革命后任奉天国民保安会军事部副部长。1916年起任奉天督军兼省长, 东三省巡阅使兼蒙疆经略使等职, 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长期盘踞东北。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后进而把持北洋军阀政府, 1927年成立安国军政府, 僭称海陆军大元帅, 是杀害共产党人李大钊的刽子手。1928年同蒋介石作战失败, 撤回东北。——第485页。

祖巴托夫, 谢尔盖·瓦西里也维奇 (Зубатов, Сергей Васильевич 1864—1917)——沙俄宪兵上校, “警察社会主义”(祖巴托夫主义)的炮制者。1896—1902年任莫斯科保安处处长, 组织政治侦察网, 建立密探别动队, 破坏革命组织。1902年任警察司特别局局长。1901—1903年组织过警方办的工会——莫斯科机械工人互助协会和圣彼得堡市俄国工厂工人大会等, 诱使工人脱离革命斗争。1903年由于他的离间政策的破产和反内务大臣的内讧, 被解职和流放。1917年二月革命期间畏罪自杀。——第33、34页。